



马尔库塞文集

第六卷

马克思主义、  
革命与乌托邦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高海青 连杰 陶锋 译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UME SIX

MARXISM, REVOLUTION AND UTOPIA

 人民文学出版社













马尔库塞文集

第六卷

马克思主义、  
革命与乌托邦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高海青 连杰 陶锋 译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UME SIX

MARXISM, REVOLUTION AND UTOPIA

 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引 言 马尔库塞的马克思主义历险	
..... 道格拉斯·凯尔纳 克莱顿·皮尔斯	1

---

## 一 马克思主义研究

---

评卡尔·福尔伦德的《马克思生平及其著述》.....	82
价值与交换价值.....	86
近来的共产主义文献.....	88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辩证法与逻辑.....	98
1954年版《理性和革命》的增补后记.....	112
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8)的序言.....	118
评乔治·里希特海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的批判研究》.....	124
人道主义与人性.....	127
为何要继续谈社会主义？ .....	136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跋.....	142
本雅明《暴力批判》的后记.....	149
辩证法中的否定概念.....	155

辩证法的历史..... 160

---

## 二 马克思主义的介入

---

马尔库塞论古巴..... 186

压抑性社会中的妇女解放：与马尔库塞及彼特·弗思的  
一次座谈..... 195

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 205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218

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228

革命主体与自治..... 237

对革命概念的再考察..... 242

鼠辈马尔库塞..... 251

英格·马尔库塞致威廉·麦吉尔校长及马尔库塞的评论..... 253

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论解放》的报告..... 256

安吉拉·戴维斯与马尔库塞..... 259

论科学和社会..... 267

宽容的真实本性..... 269

---

## 三 关于马克思主义、革命以及时事的演讲与访谈

---

马克思主义与发达工业社会的相遇..... 276

社会主义过时了..... 295

乌托邦的终结..... 314

马尔库塞与彼得·梅塞堡之间的讨论..... 331

马尔库塞：新左派哲学家..... 339

人道主义诸变体：马尔库塞对话哈维·惠勒..... 349

1969 年革命：与亨里奇·努斯鲍姆的讨论（科隆）.....	356
1969 年 5 月 21 日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会议.....	364
比耶尔·维扬松－蓬德访马尔库塞.....	375

#### 四 书信、证词及对批评者的回应

致霍克海默.....	380
1957 年 6 月 7 日、6 月 11 日、10 月 7 日及 10 月 11 日致 拉亚·杜娜叶夫斯卡娅.....	382
1961 年 3 月 6 日致拉亚·杜娜叶夫斯卡娅.....	397
弗兰茨·纽曼的《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序言.....	400
苏联的理论与实践.....	405
致卡莱尔·科西克.....	409
悼念保罗·巴兰.....	412
论改变世界：对卡尔·米勒的回应.....	414
《卫报》，1968 年 12 月 5 日对批评者的回应.....	421
解放的辩证法以及激进的行动主义：马尔库塞与利奥· 洛文塔尔的通信.....	423
论基辛格.....	427
致鲁迪·杜切克.....	430
[1978 年] 7 月 10 日哈贝马斯致马尔库塞.....	435

#### 五 反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革命

马尔库塞在 20 世纪 70 年代 马克思主义与新人性：一场 未竟的革命.....	440
1970 年 4 月 17—23 日《街报》和圣迭戈自由出版社访	

马尔库塞.....	447
论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与准马克思.....	458
《世界外交论衡》.....	463
詹圭多·皮安尼访马尔库塞.....	467
米利亚姆·米德成·马里诺维奇 1978 年访马尔库塞.....	475
无产阶级的物化.....	506
初期社会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基于巴罗分析之上的一种 理论综合.....	511
关于多元主义、未来以及哲学对话马尔库塞.....	534
比尔·里特访马尔库塞.....	543
后 记..... 彼得·马尔库塞	555
索 引.....	558

## 马尔库塞的马克思主义历险

道格拉斯·凯尔纳 克莱顿·皮尔斯

纵观其一生，为顺应现代文化、政治与社会发展轨迹的变化，马尔库塞将黑格尔、马克思及其他现代哲学思潮与力图重建马克思理论的现代哲学整合了起来。马尔库塞始终坚持一种批判的、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他认为，要想发展一种关乎当代运动的批判理论，马克思的历史与社会理论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在社会地、历史地解释马克思的范畴时，马尔库塞看到，马克思理论必须根据新的历史和理论发展不断修正、更新，正如马尔库塞自己所做的那样，他以现有社会条件、政治斗争和历史可能性为依据不断地更新和发展他自己的成果，就是为了获得一个他终生都在勾勒的更自由、更幸福、更平等的社会蓝图，可以替换各种支配体系。

正如前面几卷所指出的那样，马尔库塞的理论与政治学的特点是，他对哲学、精神分析、美学和批判社会理论做了风格独特的、新颖的整合。在马尔库塞的作品中，对这些传统的综合把马尔库塞的研究引向了人类的解放和社会的变革，而这两方面在现如今的马克思主义的支配理论和解放理论中始终有其位置。在本“引言”中，我们认为，马尔库塞对乌托邦式的、自由社会的渴望一直以来都是其作品的主题，它同样也对我们现今更好地理解逐渐演变的支配体系与在 21 世纪帮助构建我们今天历史境遇的社会斗争产生了

持久的影响。

然而，人们经常错误地认为，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不过就是一种不太消极、不太悲观的理论。对马尔库塞而言，乌托邦概念表达了善的生活和善的社会的规范性愿景，以及对更好的世界的渴望。马尔库塞及其同代人都深受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的影响，布洛赫曾在他的三卷本《希望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Hope*）中，从幻想和神话一直到可供选择的政治组织，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或者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清晰地描述了他在哲学上和政治上对乌托邦的一贯看法。<sup>①</sup> 在当代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结构调整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和暴动为特征的历史情境下，马尔库塞的革命观念，即动荡的总体，无疑对批判性地解释 2011 年的暴动，解释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其他反抗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和国家镇压的斗争，具有重要意义。<sup>②</sup> 我们甚至可以说，马尔库塞早就在理论上为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所谓的“诸众的”（multitudinal）抵抗，或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通过以最新发生的社会叛乱为依据来解释和认识自发拒绝资本主义的形式，而在一定程度上发展起来的“敲打资本主

① 参见 Ernst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 three volume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6。关于布洛赫的著作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参见 Douglas Kellner, “Ernst Bloch, Utopia and Ideology Critique,” in *Existential Utopia: New Perspectives on Utopian Thought*, edited by Patricia Vieira and Michael Marder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pp.83-96；这本书提供了最前沿的学者研究布洛赫与乌托邦的例证，展示了它与当代思想与政治活动的持续关联。此外，马尔库塞的乌托邦概念还深受其布兰迪斯的同事弗兰克·曼纽尔（Frank E. Manuel）、弗里切·曼纽尔（Fritzie P. Manuel）的权威著作《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思想》（Frank E. Manuel, Fritzie P. Manuel, *Utopian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的影响。

② 参见 Douglas Kellner, *Media Spectacle 2011: From the Arab Uprisings to Occupy Everywhere!*, New York: Bloomsbury, 2012; Slavoj Žižek, *The Year of Dreaming Dangerously*, New York: Verso, 2012。另参见 Marc Lynch, *The Arab Uprising.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s of the New Middle East*,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2。

义”的命题做了准备。<sup>①</sup>

显然，从他热情洋溢的 1969 年的《论解放》直至他 1979 年去世，马尔库塞一直都在致力于以概念来思考自发的但却相互联系的反抗资本、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乃至美国的帝国主义形式的社会运动。马尔库塞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涌现的各式各样的造反运动出发，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与主体性理论，而这也使他的思想与他所处的时代乃至我们的时代尤为相关，因此，我们认为，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最好是从马克思的这些理论来理解。 [3]

本卷挑选的文章将表明，革命对马尔库塞来说指的是，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关系的发展，创造与当前新自由主义的支配和社会控制体制彻底决裂的条件，从而与现有社会秩序决裂并推翻该秩序。因此，我们在本卷想问的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自由主义时期，阅读和思考马尔库塞的作品到底意味着什么。由于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特别擅长识别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新的支配和控制制度将内在矛盾稳定下来的方式，所以我们认为，马尔库塞在反革命的情境下设想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方式与现在面临着创造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的挑战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自由主义阶段有着高度的相关性。比如，马尔库塞对福利—战争国家（Welfare/Warfare state）的批判和理论化就有助于突出许多理论家所勾勒的新自由主义的某些鲜明特征，也有助于突出马尔库塞所提出的发达工业社会体系与 21 世纪全球性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之间的差异。<sup>②</sup>

① 比如参见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Commonweal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另参见 John Holloway, *Crack Capitalism*, London: Pluto Press, 2010。

② 参见福柯在《生命政治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中对西方新自由主义形式的探讨；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另参见 Naomi Klein,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New York: Picador, 2007。

但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延续至今通过不间断地废止凯恩斯的社会政策所实现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财富再分配（财富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转移到了精英企业寡头的手中），私有化的扩张，从生态灾难和社会灾难牟利，比如，在 2008 年银行破产之后不断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或者为了企业的利益重建新奥尔良，这些所揭示的是一种更具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形式，而此形式早在马尔库塞所讨论的发达的工业社会体系中就已初露端倪。<sup>①</sup>更进一步讲，各种展现新自由主义统治合理性的制度和政策还带来了允许以新的、强有力的方式来监管民众主体性的新型的技术控制，特别是在卫生和教育领域，而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和极权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支配与控制的分析有助于阐明该问题。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理性最具破坏性的一个特征已经在主观的维度上出现，由此，一种定性的认识，即把人当成对自身幸福负责、把幸福建立在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市场决策基础上的投资机器，也浮现了出来。事实上，就像乌尔里希·布洛克林（Ulrich Bröckling）所讲的那样，他研究主体性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中的形成时注意到，“个人像选择投资和撤资一样对待他们自身的健康”带来了以道德律令（ethical imperative）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环境，而“这里的规则是责怪受害者：谁病了，谁就是没有充分照料好他的健康；谁成了事故或犯罪的受害者，谁就应该更好地注意他自身的安全”<sup>②</sup>。

因此，由发达工业社会向新自由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最大挑战是，马尔库塞所谓的压抑的俗化形式变得更深层次化了，因为个人整个地被整合进了资本主义支配与控制体系的工具理性，欢愉渐渐变成了支配形式，比如，疯狂成瘾的消费者纵情或者迷恋媒体、运动或其他休闲活动。简

①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参见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Robert McChesney, *The Endless Crisis: How Monopoly-Finance Capital Produces Stagnation and Upheaval from the USA to Chin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2。

② Ulrich Bröckling, “Human Economy, Human Capital: A Critique of Biopolitical Economy”, in *Governmentality: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Challenges* edited by U. Bröckling, S. Krasmann, and T. Lemke,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261.



言之，塑造主体的同一性已经变成了新自由主义治国策略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人的生命本身已经变成了公司、政府和机构投资或撤资的场所，因为它们对从人口和自然世界中提取出最大可能的价值很感兴趣。举例来说，现在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政策就把学生和人口建成了潜在的人力资本增值的场所（或者说剩余劳动力后备军），以确保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力争上游”。<sup>①</sup>或者，在更为直接的意义上，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及他人所指出的那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扩张拼命地搜求市场成长的新领地，分子和细胞材料已经变成了交换的物质基础。<sup>②</sup>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马尔库塞所理解的人和自然世界将进一步融入资本的交换、生产系统，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学校和新成立的基因实验室都有责任。

[5]

对马尔库塞来说，构建一个解放了的社会不仅要求拒绝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推翻与之相伴的支配性的制度和文化的，还要求创造一种在生物层面拒绝晚期资本主义这个“病态社会”的“新人类”。从这层意义上讲，在社会政治控制加剧的形式下，马尔库塞对革命的理解表明，要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之外创造一种使人的生命这一本体从中涌现出来的社会条件。对于我们来说，在动物和人的细胞材料已经具有商品交换价值的时期，马尔库塞关于以不同于构成“生物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控制（人的和非人的）生命的技术正在这里迅速扩张——的价值为基础的“新人类”的提议仍然很重要。换言之，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行业基本上已经改变了人类的（其实，也改变了动物的）本质，因此也改变了资本流通中那些可以被买卖和交易的东西的本质。确实，21世纪某些最强大的经济部门一直都在通过新的控制和规训形

① 关于美国当前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制方案的生命政治维度，参见 Clayton Pierce's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Biocapitalism: Optimizing Educational Life for a Flat Worl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② 参见 Donna Haraway, *Modest Mouse@Second\_Millennium.Female©\_Meets\_ OncoMouse™*,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When Species Meet*,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nd Sarah Franklin and Margaret Lock, *Remaking Life and Death: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the Life Sciences*,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2003。

式，包括在基因层面上监管生命，改造生命的生物学基础。因此我认为，在“后基因”时代，马尔库塞就拒绝从生物学意义上进一步整合人类和自然界所作的筹划值得重新考虑，据此，“大拒绝”现在必须也要批判“生物资本”，或者说，也要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向生命的分子维度和基因维度的推进。

[6] 针对现有的支配和控制体系，马尔库塞设想了本能地拒绝晚期资本主义造就的病态社会价值的新的革命主体。我们认为，马尔库塞的革命概念对准确地定位当代的暴动仍然很有用，因为它为全面社会变革提供了一种立足于“新人类”在技术越来越复杂的反革命政权的系统控制下发展的规范性视角，此外，它还对该政权做了激进的批判。因此我们认为，马尔库塞的作品存在着一个至关重要的生命政治维度，与福柯后期的思想及其他批判理论一起，都可以被用于发展当今时代的支配与解放理论。对马尔库塞来说，革命概念必须使全新的生活方式理论化和实践化，而他的研究兴趣就在于彻底地批判包括发达资本主义与现已不存在的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在内的现有社会制度，谋求替换当代的压抑和支配体系。马尔库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塑，其重点放在了“生命本身”最终是如何在遭受野蛮管制的社会中被置身险境的，这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得到了诸如基因工程与药物等有前途的生物科学行业的鼓舞）不断占有越来越多的生命形态，而且以惊人的速度将其转变为商品化的“生命资本”形态的时期显得尤为重要。<sup>①</sup>

① 尼古拉斯·罗斯 (Nikolas Rose) 对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体化的研究曾经指出，个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经由新的生物技术与生物医学治疗手段和话语部分地形成一种自我关照的伦理。参见他关于生物医学与主体性的交汇的出色研究，*The Politics of Life Itself: Biomedicine, Power,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另参见 Donna Haraway, *When Species Meet*,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Steven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The Postmodern Adventur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Third Millenniu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1；Melinda Cooper, *Life as Surplus: Biotechnology and Capitalism in the Neoliberal Era*,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以及 Clayton Pierce,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Biocapit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因此，我们的核心主张是，马尔库塞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对非人的生命和人的生命何以不断地被资本的流通与交换过程所包围、所整合的思考，绝对具有时效性。他的革命辩证法在发达工业社会一直以来都非常契合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超越先前限制——把市场延伸到了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进一步推动对自然的支配的方式。因为我们每天面对的都是这样的东西，比如，孟山都公司的“绝育种子”或第一种用于人们消费的转基因动物——转基因三文鱼，所以马尔库塞的强调很准确，即革命变革必须首先拒绝旨在以市场为目标重构生活本身的“资本主义的精神错乱”扩大它的影响范围。<sup>①</sup>事实上，现在的基因、分子、动物材料以及人的生命都从属于一种更高层次的技术重建。不仅人的性冲动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技术控制和消费形式下被重塑了，甚至生命特有的生物基础也正在以市场生命为目标被重构。

马尔库塞辩证的革命理论还阐明了人的社会生活如何通过技术控制的新发展被更进一步地纳入了资本的价值化过程。比如说，在教育领域，作为美国教育制度默认的目标，人力资本积累这一主导范式基本上已经被完全标准

[7]

<sup>①</sup> Cooper, *Life as Surplus*, op cit.

<sup>②</sup> 汤马斯·佛里曼 (Thomas Loren Friedman) 认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借以在全球化的经济中公平竞争的“扁平世界” (flat world)，也就是说，为这一受强大的跨国公司、民族国家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体系所左右的世界提供了一种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建构。参见 Thomas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6。

所谓的经济人 (Homo economicus): 自私自利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个人。

符合主流人力资本框架的教育是使经济人有可能为了积累最主要的人力资本 (比如, 在高科技劳动领域的教育), 以便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阶段成为有竞争性的行动者而做出决定性投资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很明显, 马尔库塞早就意识到了, 这就是大学和高校这类机构的未来。事实上, 从马尔库塞在本卷对巴罗的初期社会主义 (protosocialism) 概念所做的评论来看, 他主要是列举了近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物质劳动” (immaterial labor)<sup>①</sup> 中所谓的居支配地位的生产劳动方式。谈到巴罗的“剩余意识”时, 马尔库塞指出:

自由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更多地取决于这种植根于同时超越了物质生产过程的意识形态的传播。巴罗称之为“剩余意识”。它是“自由之人 [心理上] 的能力, 是不再用以满足生存斗争的能力”, 而它会转化成实践。工业的、科技的生产方式——在此, 脑力劳动变成了本质因素——提高了生产者 (“集体工人”) 的素质、技能、想象力以及行动与享乐的能力, 它们在资本主义和压制性的非资本主义社会遭到了扼杀或滥用。但正是它们推动着人们超越非人的现实, 走向真正的人的现实。

[8] 紧接着, 马尔库塞又指出:

在主体的剩余意识中, 补偿的兴趣和解放的兴趣被迫达成了统一。补偿的兴趣主要关心的是物质商品层面: 更大更好的消费、事业、竞

<sup>①</sup> Mario Lazzarato, “Immaterial Labor”, in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edited by Michael Hardt and Paolo Virno,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133–147;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争、利润、“身份象征”，等等。它们可以（至少目前来说如此！）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中得到满足：它们可以补偿非人化。<sup>①</sup>

在马尔库塞对巴罗的“剩余意识”这一令人着迷的概念的分析中，两个重要的方面暴露了出来。它们可以表明在新的劳动形式迫使个人耗费更多的教育和培训——简言之，人力资本投资——时马尔库塞是如何思考革命主体（及其现实可能性）的。<sup>②</sup>按照马尔库塞的解释，脑力劳动形式（非物质劳动）不仅会给个人带来更深层次的压抑性的俗化，同时也会“超越”物质生产过程。易言之，智力劳动并没有被束缚在工厂里，它也可以出现在实验室这样的新的生产场所，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可以通过电脑做“灵活的”安排。马尔库塞在这里似乎有可能会建议说，革命主体（如今拥有特定类型的剩余意识）应该设法转变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扭曲的“想象的质量、技术、形式，活动和娱乐的能力”，以一种新的表现拒绝的、可以创造新人类和新的社会生活的形式来使用它们。

巴罗与马尔库塞认为，个人追求“补偿的兴趣”只能表面上实现他们新的由技术建构起来的需要和满足感。他们的批判对于理解人的主体性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受管制的、被建构起来的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具体而言，马尔库塞认为，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劳动模式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持续不断地转向脑力或非物质劳动，新的压抑性的俗化形式与新的抵抗形式也会浮现出来。如果现在把马尔库塞对巴罗的“剩余意识”这一概念的分析放在以人力资源为本的社会——在这里，所有人关注的都是对他们的社会经济生活进行最理性的、负责任的、最高回报率的投资——情境中，我们可以说他的分析非常准确。如此来看，马尔库塞早已明确地意识到了脑力劳动丰富的

[9]

① 参见第 548 页。

② 关于马尔库塞参与巴罗对革命性变革的新的主观条件的讨论的分析，另参见 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4。

社会中形成的剩余意识不仅会带来新的控制和禁锢主体的形式，还会带来新的改善和丰富人的生活生活的潜能。

因此，马尔库塞意识到了新的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形式不仅包含着对人进行支配和社会管制的可能，也包含着抵抗和对人类生活进行乌托邦式重建的可能。这一分析就发生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总会带来新形式的社会管制、利润率，也总有可能带来新形式的生活和社会。

本卷，我们将收录几篇很关键的文本，它们可以揭示马尔库塞对马克思主义的占有如何决定性地影响到了他的作品，同时它们仍然与当代的批判社会理论和激进政治紧密相关。第一部分涉及“马克思主义研究”，收录了一些评论、文章、百科全书词条和演讲稿，其中有很多从未发表过，这些材料可以表明马尔库塞认同和信任马克思理论的主要方面，他信奉马克思主义。第二部分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介入”，收录了一些讨论、访谈以及其他记录马尔库塞在不同场合——从1962年的古巴抗议集会到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研讨会，再到马尔库塞对压抑性社会中的妇女解放的反思，以及他在学生安吉拉·戴维斯因激进政治受到国家侵害时替她辩护的记录——所做演讲的文本（其中有些先前都没有发表过）。

千万别忘了，马尔库塞不仅是一位学者和作家，还是一名政治积极分子和激进分子。因此，第三部分通过收集“关于马克思主义、革命以及时事的演讲与访谈”，即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这段时间讨论马克思主义和革命问题的电台谈话、演讲和公开辩论（在那段动荡时期，这些论战占据着政治关切和斗争的中心位置），展示了马尔库塞生命中的这个方面。第四部分是“书信、证词及对批评者的回应”，这些材料可以证明马尔库塞的核心立场和政治纲领何以成就了当代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与未来所展开的决定性议题与争论的核心。第五部分讨论了“反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革命”，该部分的文本承认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愿望和革命运动已经被70年代的反革命时期——马尔库塞在这期间看到，他数十

年来不间断批判的压抑性与支配性的制度、实践和话语重新出现了——所取代。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尔库塞早已对里根与撒切尔政府及 20 世纪 80 年代其他反革命力量有所预感，对此，他的作品也早已提供了批判和抗议的工具。

在马尔库塞 1979 年离世之后的几十年里，他的作品在全球化时代对于资本主义与技术新近的结合、新近的社会运动和抗议与斗争形式、新近的危机（包括生态灾难、民主政治危机和全球高新技术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困境）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来说仍然至关重要。为了在当代激进社会运动中寻求政治变革和转型的可能，马尔库塞的作品对当代社会的支配与压抑形式做了理论分析和批判，而它的核心范畴就是批判和危机。此时，他的思想通常有一个乌托邦面向，就像在《爱欲与文明》——写于毫无生气的冷战时期，正值麦卡锡主义在顺从的 20 世纪 50 年代盛行——中那样，他从自由、性解放和快乐的游戏的愿景预见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和运动。

[10]

同时，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乌托邦式的未来观。对马尔库塞来说，社会主义代表着另一种生活方式，它能创造解放了的、成熟的新人类，使其可以在一个以合作、与自然和谐一致、和平、尊重一切生命形式为标志的新社会中，运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及其他形式的产品来提升人的感性、身体、社会关系以及生活本身。此外，马尔库塞反对由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官僚化的共产主义形式，他认为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制度与资本主义同样都具有压抑性。就像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及其法兰克福的同事一样，马尔库塞反对“科学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形态，支持更具批判性的、黑格尔式的（辩证的）、有助于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形态——既抨击一切形式的支配，又促进解放。同时，马尔库塞也拥护激进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形态，而按照这一形态，理论的目的就是实践，并且随着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新的历史形式的涌现，它本身也会发展。

我们认为，以马尔库塞的主要出版物和《马尔库塞文集》六卷本（本书是最后一卷）为例，他的作品与当今时代的问题、危机和斗争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像前面几卷一样，本卷我们将收录一些我们认为对于理解其作品全部意义与重要性很重要并且与当代政治、理论问题密切相关的文本。与前面几卷一样，我们的重点是未公开出版的、由于种种原因不为人知的材料，它们有的来自德国法兰克福马尔库塞档案馆，有的来自凯尔纳的个人档案馆，其中有些是马尔库塞自己收藏的手稿、书信和研究材料。与《马尔库塞文集》系列的其他几卷类似，为了理解马尔库塞的生活和工作，我们依靠这些材料和经典著作以及近来的马尔库塞研究协助构建了一个情境，而在“引言”中，我们将简要概述马尔库塞的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探险。

[11] 自1998年六卷本的《马尔库塞文集》开始发行以来，全球对马尔库塞著作的兴趣持续不断地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举办两年一度的全球学术会议和2013年11月7—9日在肯塔基大学举办第五次两年一度的学术会议的国际马尔库塞学会的发展得到证实。上一次，在2011年，“批判的拒绝”（Critical Refusals）会议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举行，把安吉拉·戴维斯推举成了主讲人，会议结束时，为了与“占领费城运动”会合，参与者举行了集体的游行示威活动，后来他们还在毗连费城市政厅的迪尔沃斯广场驻扎了下来。再之前的会议包括，2009年在多伦多举行的“马尔库塞与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会议，2007年齐聚费城圣约瑟夫大学的“马尔库塞作品中的批判与解放”会议，以及2005年同样在费城圣约瑟夫大学以“50年后读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为题举行的第一届国际马尔库塞学会会议。<sup>①</sup>事实上，上面提到的大多数学术会议的组织者都是年轻学者，比如安德鲁·拉马斯和阿诺德·法尔，在保持马尔

<sup>①</sup> 关于国际马尔库塞学会会议，参见网站 <http://www.marcusesociety.org/>（2013年2月20日登录）。



库塞作品的鲜活性及其与 21 世纪的挑战的相关性上，他们一直是热心的参与者。<sup>①</sup>

除此之外，其他很多研讨马尔库塞作品的学术会议和活动出现在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他的作品不仅引起了 20 世纪 60 年代——那时，马尔库塞是世界上最具有影响的激进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长大成人的学者的共鸣，而且还持续不断地引起了年青一代的共鸣。我们也许注意到了哈罗德·马尔库塞的网站，其中有“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的官方网站”（[http:// www.marcuse.org/herbert/index.html](http://www.marcuse.org/herbert/index.html); 2013 年 2 月 20 日登录）和马尔库塞的家族网站，从官方网站可以看到世界各地不同马尔库塞研究者提及马尔库塞及其著作的文献，而从家族网站可以看到马尔库塞的家谱及其相关出版物的信息。<sup>②</sup>

[12]

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通过指出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的具体特

① 比如，雷兰·热巴卡（Reiland Rabaka）已经在理论上对法兰克福学派与他所谓的“非洲批判理论”（*W.E.B. Du Bois and the Problem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 Essay on Africana Critical Theory*, Lexington Books, 2007; *Africana Critical Theory: Reconstructing The Black Radical Tradition, From W. E. B. Du Bois and C. L. R. James to Frantz Fanon and Amilcar Cabral*, Lexington Books, 2010）之间的联系与分歧做了说明。更具体地说，热巴卡对社会批判理论狭隘的、欧洲中心论的认识论渊源做了批判，与此同时，他对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如此这般地强调“以全力对付他们那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为首要任务，而不是指向或指出未来的‘变革力量’”（Rabaka, 2010, p. 362）表示肯定。从这个意义来讲，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强烈地依赖于欧洲哲学和政治传统（特别是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不过他是唯一一位以社会运动——比如，反对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父权制的社会运动——来挑战其自身社会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创始成员。热巴卡并没有忽略马尔库塞自身的理论盲点，而是把马尔库塞视为更宽泛、更多样的知识分子传统的一部分，该传统“创造了思想与实践，而后者不仅与现有的帝国秩序相对立、相矛盾，同时也促进杜波依斯（Du Bois）、法农（Fanon）、切·格瓦拉（Che Guevara）、马尔库塞以及其他极力倡导的‘新人类’和‘新社会’的形成”（Rabaka, 2007, p. 88）。

② 参见马尔库塞的家族网站，网址是 <http://www.marcuse.org/index.html>，以及哈罗德·马尔库塞的“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的官方网站”，网址是 <http://www.marcuse.org/herbert/index.html>（2013 年 2 月 20 日登录）。

性——我们认为，它们与我们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时期尤为相关——借由把一系列的作品、讲座、来往信函和演讲置于其著作宽阔的轨道之中来介绍这些材料。首先，对于马尔库塞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政治活动的相遇，以及他所阐发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很多核心主题与概念——比如，在其作品和政治介入中的异化、积累、革命与反革命——的方式，我们做了历史分析。在下一部分，我们将着重讨论马尔库塞从哪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不仅仅预料到了当代的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而且还对以下几个方面做了诊断：(1) 人的主体性被平滑地整合到各种社会控制形式中的方式；(2) 与他所谓的“新人类”的出现相关联的“革命主体”何以可能在这样的状况下发展起来。我们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时期，一个应该被理论化的关键领域是，人的主体性何以可能脱离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延长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发展，拼命地搜寻新的生产与交换场所——的需求与价值。举例来说，随着高等教育、医疗保健公司、制药业和基因食品行业等部门不断地推进一种依赖和投资这些资本主义发展领域的公共教育学，现如今要在这些机构和企业人为地建构起来的人性之外识别和实践一种不同的形成人性的方式有着史无前例的重要性。因此，该“引言”的其中一个主旨就是指出马尔库塞著作中那些可以清楚地表达“大拒绝”或拒绝新自由主义攻击主体性的行为（事实上，也就是，拒绝“生活本身”攻击这个星球的行为）的部分。回想一下，马尔库塞对于更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与解放和社会变革理论是做了很多贡献的，而他的生活、工作与马克思理论在 20 世纪命运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但如此，正如我们的“引言”和本卷所含的文章表明的那样，马尔库塞还为 21 世纪提供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框架。

### [13] 马尔库塞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

马尔库塞声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住在柏林的时候，也就是

在 1918 年紧随俄国革命他所参与的工人委员会也爆发了革命的时候，他开始对政治、革命的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sup>①</sup> 此时，马尔库塞开始认真研究起了马克思。<sup>②</sup> 尽管马尔库塞在战争期间一直都在阅读社会主义的小册子，但激烈的政治活动使他根本无法全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强调说，为了更准确地理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動力以及德国革命的失败，他对战争与德国革命的经验指引他在 20 世纪 20 年代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另外，他还决心要理解他无法认同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两个主要的左派政党的原因。因此，为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社会主义观念，马尔库塞开始阅读起了马克思及其他社会主义者的经典。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深深地影响到了马尔库塞及其在魏玛时期——以德国法西斯主义崛起宣告终结——将成为激进知识分子的同代人。<sup>③</sup> 不同于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所推动的更具经济与政治意义的还原主义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了具有批判与哲学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相比更强调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与科尔施对类主体与意识的看法更积极、更有创造性，他们都强调哲学与批判对激进的社会变革工程的重要性。

尽管像大多数同时代的激进派一样，马尔库塞也为俄国革命而兴奋，但他并没有加入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KPD*），不过他经常把选

① 关于马尔库塞参与德国工人委员会运动，参见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马尔库塞生活与工作的权威传记，因此，关于当时马尔库塞参与 1918 年德国革命及其政治观念的解释，参见 Interview with Marcuse by Douglas Kellner in La Jolla, California, December 1978。

② Interview with Herbert Marcuse, December 1978.

③ 参见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1；另参见 Karl Korsch, *Marxism and Philosophy*；他们著作的第一版都发表于 1923 年。关于科尔施，参见 Douglas Kellner, *Karl Korsch: Revolutionary Theory*,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7。

- [14] 票投给共产党以示“抗议”。<sup>①</sup>毫无疑问，对于马尔库塞那样阶级背景的年轻人来说，是很难认同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政治纲领的。尽管卢卡奇与科尔施加入了共产党，但那是因为他们比马尔库塞年长，他们的决定都建立在马尔库塞无法获取的政治经验和政党政治知识基础上。在骚乱的战争与德国革命之后，马尔库塞似乎无力做出任何明确的政治承诺。不过，他早已在政治上认为自己是左派，并终身不渝。1972年的访谈中，我问他为什么那时不加入共产党组织，他的回答是：

我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共产党组织，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我必须对自己无言以对感到羞愧。坦白地讲，我也不知道。1919年，我离开了柏林，来到了弗莱堡，在弗莱堡，我过着完全非政治的生活。后来在我再次回到柏林的时候，共产党早已分裂了。我察觉到了外国势力的影响——俄国的影响，而我并不认为该影响完全有益，这也许是我为什么不加入的其中一个原因。不过，在这个时期，我却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很明显，法西斯主义正在步步逼近，正因为如此，我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而对弗洛伊德的研究来得稍晚一些。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理解该问题，即在真正革命的条件准备就绪的时候，革命为什么轰然崩溃、被打败了，旧势力为什么重新夺回了权力，以及整个

<sup>①</sup> 尽管许多评论者认为，马尔库塞是斯巴达克斯联盟的成员，但他却在1978年12月与凯尔纳的交谈中明确地否定了该观点，并公开承认他确实加入了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PD）。对于安德森（Perry Anderson）提出的马尔库塞加入了独立社会民主党（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USPD），他也予以了否认（参见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p. 27；另参见 Goran Therborn, “The Frankfurt School,” in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7, p. 84）。关于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与斯巴达克斯联盟之间的区别，参见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历史，Hartfield Krause, *USPD, Zur Geschichte der 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dependent Social Democrats]*,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75。

事业为什么会以退化的形式重新开始。<sup>①</sup>

马尔库塞还太过年轻，缺乏经验，以致无法追求一种职业革命家的事业，自然也就被吸引到了他先前感兴趣的钻研哲学上。马尔库塞最早刊发的文章《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论稿》提出要整合马克思主义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的存在主义。他的目的是形成一种能够解决日常主要问题的“具体哲学”。<sup>②</sup> 这个非凡的哲学开端不仅预示着他随后要试图创建“现象学的”或“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历史地使马尔库塞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为了提供一种与第二国际的主流即“修正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即教条主义不同的版本而力图重构马克思主义——这个流派联系了起来。该文章清楚地表明这位激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做了以实践为取向的解释——一直不断地影响着马尔库塞后期的著作，它是最早的也是最好的对海德格尔有影响的《存在与时间》做出解释与批判的文献之一。

[15]

马尔库塞最早发表的文章表明，他在那时把马克思主义主要当成了革命实践的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他写道：

[马克思主义] 不是科学理论，不是真理体系，即不像“知识”那

① Marcuse, *Revolution or Reform? A Confrontation*, Rutgers,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5, p. 578.

② 参见 Marcuse, “Beitrage zu einer Phenomenolog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Philosophische Hefte*, I, Berlin: 1928, pp.43–68。《哲学杂志》(*Philosophische Hefte*) 由他的朋友麦斯米兰·贝克 (Maximilian Beck) 所编，主要面向现象学与德国唯心主义，但偶尔也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该文已经在马尔库塞著作集的第一卷被重印再版，参见 *Schriften I*, Frankfurt: Suhrkamp, 1978, pp.347–384。页码索引前面参考的是《哲学杂志》的原版，后面参考的是著作集 (*Schriften*, 简称 S1) 版本；英文版本是编者所译。该文在《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已被翻译成英文，参见 *Heidegger Marxism*, edited by John Abromeit & Richard Wolin,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5。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在博梅特与沃林整理的文集中所包括的马尔库塞早期整合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文章——大约在 1933 年就被抛弃，我们在本卷中一篇也没有发表，因为他们所选的材料现在很容易看到。

样其意义仅在于它的精确性，而是社会活动与历史行动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性批判。<sup>①</sup>

[16] 马尔库塞与卢卡奇和科尔施一直以来都抵制这样的倾向，即第二国际主要马克思主义者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了以“科学般精确”的标准来评判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sup>②</sup>然而，马尔库塞并不倡导唯意志论的激进行动观念，他反倒认为，“就这一希望赢得解放和确立地位的革命活动仍要求对其历史必然性与真理有深刻洞察而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sup>③</sup>但是他强调，最重要的是“理论与实践、科学与行动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任何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都必须将其视为最高的指南”<sup>④</sup>。我们在这里看到，马尔库塞还没有开启其科学批判——将成为其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这时候，他还把科学与理论看成是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sup>⑤</sup>

① 参见 Marcuse, “Contributions,” p. 45, *S1*, p. 347。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定义几乎是照搬了卢卡奇的《列宁》一书的观点，参见 Lukács, *Leni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9。

② 引自 1923 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Lukács, i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1) 和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Korsch, *Marxism and Philosoph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针对主流的客观主义—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理论系统地阐发了植根于经济的、必然通往社会主义胜利的“客观的”科学规律，两部论著强调了马克思革命理论中主体因素的重要性。针对“科学社会主义”，卢卡奇与科尔施重新恢复了强调主客相互作用、矛盾与中介以及强调主体作用的黑格尔辩证法。马尔库塞欣赏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之黑格尔根源的重要性所做的评价，也欣赏他们激进的行动主义的解释，他那时认为卢卡奇与科尔施是最重要的关于马克思理论中批判与进步元素的解释者 (Interview with Marcuse, 28 December 1978)。马尔库塞在 1930 年的文章中提到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要性，参见 “Zum Problem der Dialektik,” first published in *Die Gesellschaft*, vol. VII, 1930; reprinted in *S1*, pp.407ff and translated in *Telos*, 27, Spring 1976, pp.12ff。关于马尔库塞对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评论，参见 “Das Problem der geschichtlichen Wirklichkeit”, *Die Gesellschaft*, vol. 8, 1931, reprinted in *S1*, pp.469ff。

③ Marcuse, “Contributions,” p. 45; *S1*, p. 347.

④ Ibid.

⑤ Marcuse, “Contributions,” p. 47; *S1*, p. 350.

马尔库塞认为，只有在“行动被把握为人的本质的决定性的实现，同时这种实现表面上又恰好不具有实际可能性的时候，即在革命形势下”<sup>①</sup>，革命实践的问题才会被果断地提出。只要对具体历史状况的调查研究表明，人的力量与潜能的自由发展在“个人力量转化为物的力量”的社会中是不可能的，那么他“本身的活动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sup>②</sup>在异己力量的统治下，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生活内容”（即，自由、个性、欢愉等等），被简化成了“抽象的个人”这种形式。该图景描绘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状况，它揭示了经济与意识形态形式背后‘非人生存的现实’（《神圣家族》）”<sup>③</sup>。马尔库塞辩称，资本主义社会妨害并压抑自由的人类活动，因此，他呼吁把“激进行动”变成反对异化的生存形式的“对抗行动”。从他的激进行动理论来看，马尔库塞早期的革命观——该立场在他后期的著作中经常出现——就建立在人对自由、自我实现的活动的需要与支配个人并使其异化的非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基础上。

在这里，马尔库塞的根据正是卢卡奇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如何使个体客观化和异化的物化理论。<sup>④</sup>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精彩分析中，卢卡奇描述了商品

[17]

① Marcuse, "Contributions," p. 47; S1, p. 350.

② Ibid.。马尔库塞在此引用了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③ Ibid.

④ 参见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在 1978 年 12 月 28 日加利福尼亚拉荷亚与道格拉斯交谈的过程中，马尔库塞强调了《历史与阶级意识》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并提到了它对他本人思想的影响。马尔库塞还讲到，他认为卢卡奇与科尔施是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去世以后“最有智慧的”马克思主义作家。此外他还讲到，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他效力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的时候，他比霍克海默及其他同事更赞赏《历史与阶级意识》。

此“抵制变革”。<sup>①</sup>如此看来，物化描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客观形式，它与法兰克福学派后来所批判的技术理性、单向度思维以及工具理性密切相关。<sup>②</sup>但在此时马尔库塞的阐述中，按照他的用法，“物化”更泛指资本主义物质条件所造就的非人化和异化的过程，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形式。<sup>③</sup>

卢卡奇的物化分析为马尔库塞在他整个作品中对资本主义及随后社会主义社会的批判设定了纲领和框架。马尔库塞回忆道，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第一版的时候就读到了，他发现它优越于占支配地位的各式各样的正统马克思主义。<sup>④</sup>他所钦佩的是，《历史与阶级意识》复苏了马克思主义被忽视的方面，比如，黑格尔的辩证法，对意识与革命的主观因素的强调及其试图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尝试。尽管他从来都不赞赏卢卡奇对共产党的赞扬、对列宁主义的热情拥护，但马尔库塞却始终都认为，科尔施与卢卡奇对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代表着最高级的、最具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趋势，而该趋势极其深刻地影响到了他本人对马克思的运用。<sup>⑤</sup>

[18] 马尔库塞早期的论文走向了与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社会各个阶层普遍盛行的顺从与“内在性”（*Innerlichkeit*）趋势相违背的激进的行动主义。<sup>⑥</sup>在创造性地阐释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过程中，马尔库塞试图重建海德格尔的“决断”与“本真性”概念，在他的激进行动概念中将它们与马克思的“革命实践”概念融合起来。这一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的存在主义

① 参见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特别是“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章。

② 参见 T. W. 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Seabury, 1972; Max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Seabury, 1974;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74, (缩写为 ODM) ; Jürgen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71; 以及“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Ideology’,” in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70。

③ Marcuse, “Contributions,” pp.47ff; *SI*, pp.350ff.

④ Marcuse, conversation with Douglas Kellner in La Jolla, 28 December 1978.

⑤ 在对卢卡奇著作的重要性进行辩护的文章中，马尔库塞批评说，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是其分析的薄弱环节，参见“On the Problem of the Dialectic,” *Telos*, 27, p. 24。

⑥ 参见 T.W. Adorno, *The Jargon of Authenticity*, London: Routledge, 2002。



结合起来的初步尝试——后来许多欧美的知识分子接手了该事业——不仅充满着困难，而且还牵涉到以多种方式整合不相容的哲学学说到底有无意义的问题。然而我们并不认为，仅仅因为马尔库塞早期的论文是其早期的、不成功的整合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尝试——随后，其他思想家将在不同的历史情景中继续该尝试——就应该对它们置之不理。因为我们认为，他早期的论文不仅把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主题运用到了他特有的越来越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之中，还对海德格尔、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提出了批判，而这一点时至今日仍有其说服力。在下文中，我们将相应地追踪马尔库塞在批判地接触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自身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发展。

### 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过世以后，官方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主流对哲学极不友好，他们都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一种政治实践工具。结果是，马克思理论固化成了僵硬的正统信仰，成了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政府的政治实践辩护的合法的意识形态。作为对这种从理论上讲贫乏的马克思主义的回应，卢卡奇与科尔施试图通过强调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辩证法根源来规定它的哲学维度。与此同时，阿德勒（Max Adler）及其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都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康德的基础上。此外，还有人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之间的亲密关系。<sup>①</sup> 在这种情况下，马尔库塞认为，现象学的存在主义能够提供一种复苏马克思理论并确保其扩大问题域，以便将更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所取消的人的生存、主体性以及文化等

[19]

① 阿德勒的很多文本都被译成了英文，参见 *Austro-Marxism*, ed. and trans. Tom Bottomore and Patrick Goode, New York: Oxford, 1978。维也纳学派的许多成员既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又认为自己是实证主义者，他们看到了自身与马克思主义的兼容性。关于后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唯物主义要素进行辩护的尝试，参见 Sebastiano Timpanaro, *On Materi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具体问题涵括进来所必需的哲学维度。

马尔库塞坚持认为，为了给马克思主义奠定“基础”，应该阐述、发展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预设。也正是这个问题表明，马克思主义为何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不仅成了左翼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而且还变成了想要捍卫马克思主义以反对其他理论以及参与马克思主义事业的知识分子的事务。他们已经注意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依靠未经检验的前设，就是依靠有问题的前设，因此他们纷纷从黑格尔、康德等哲学家那里来寻求对马克思理论的支持补充。就马尔库塞而言，他从海德格尔与现象学那里获得了支持。马尔库塞在激进知识分子试图发展与巩固马克思理论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很有意思。一方面，他是最早让人们注意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预设源头的马克思早期著述的思想家之一；但另一方面，他似乎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的是现象学—存在主义基础，他相信海德格尔能够提供这个基础。<sup>①</sup>

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是异化的、被剥削的、非人化的，而革命实践的目标就是为了克服一切异化形式，以过上“一种人值得过的生活”，马尔库塞断言，马克思的这些主张拥有一个规范的维度。这种批判假定某种制度和实践形式是异化的、非人化的，克服异化对人的解放和幸福而言是必要的，而这个变革的目标是一种更完整的人的生存状态。现如今马尔库塞似乎认为，拥有一个规范性的非异化的人的概念很重要，而现象学可以描述和确立它的本质结构——从这个角度出发，人们可以批判某些压制或毁伤人类的异化的实践形式与异化的社会结构。在另一篇文章中，马尔库塞写道：

由于历史进程独特的超越性，历史情境显露了出来，如此一来，那种把历史阶段当成是不可更改的被给予物的观点就出现了问题。构成

<sup>①</sup> 关于马尔库塞在他自己的哲学视野中对海德格尔的研究以及对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运用的讨论，参见《马尔库塞文集》第五卷《哲学、精神分析与解放》的“引言”。

整个历史进程的现实既不是目前的历史状况这个事实，也不是连续的历史发展这个不间断的因果关系；毋宁说，这些事实性的事态（factual states of affairs）在现实中构成了它们自身，它们的基础结构就是历史中所有事实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事实性的现实，所有历史状况只能是这种基础结构的历史转换，而该结构将以各种方式在每一生活秩序中现实化。举例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类共同生活的途径就是在一般意义上而非某种形式的抽象意义上实现人类共在的基本结构，但却仅限于极其特定的基本结构。那么，真与假就取决于这种基本结构与其事实性的现实的关系：当生活秩序实现了基本结构的时候，它就是真的，而当它遮蔽或压抑基本结构的时候，它就是假的。<sup>①</sup> [20]

马尔库塞在批判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文章中写下了这段话，这表明马尔库塞坚信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克服历史相对主义的困境。<sup>②</sup>曼海姆一直以来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仅仅反映了特定阶级的历史状况，因此只具有相对的历史有效性。马尔库塞希望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要求（Geltungsanspruch）以反对它在社会学上遭到的贬低，希望建立起具有超越历史性的变化王国的有效性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该观点符合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者对现象与本质的区分，也符合他们的要求，即把描述构成较少本质意义的、派生性的、千变万化的现象之基础的本质

① Marcuse, "Zur Wahrheitsproblematik der soziologischen Methode," *Die Gesellschaft*, VI (1929); reprinted in Adorno, Horkheimer, Marcuse, *Kritische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IV (no date) pp.33-89.

② 参见 Karl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36。关于曼海姆的著作所引起的反响，参见 Volker Meja, "The Controversy about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Germany," *Cultural Hermeneutics*, 3 (1975)。关于曼海姆与法兰克福学派，参见 Martin Jay, "The Frankfurt Critique of Mannheim," *Telos*, 20 (Summer 1974); 另参见 exchanges between James Schmidt in *Telos*, 21 (Fall 1974) and Jay in *Telos*, 22 (Winter 1974-1975)。

结构与过程当成他们的理论使命。马尔库塞似乎认为，现象学可以夯实和解释这些基本结构，并提供可以确立马克思主义历史有效性的标准，或一种既定的历史实践形式；也就是说，既定的实践形式是有根据的，因为它一直都在努力克服异化的实践形式，并把实现理论已证实了的人的本质方面当成目标。事实上，马尔库塞确实采取了类似的方法，他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期间就把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哲学用到了社会批判理论上。然而，1934年以后，在社会研究所工作期间，“人的需要与潜能”概念与历史趋势将取代他早先企图抓住人与社会生活的存在论结构的尝试。对他的思想来说，正如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将要讨论的那样，至关重要的发展是他充分运用了马克思的“人类学”、“劳动”概念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劳动”概念。

回想起来，马尔库塞阐发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的最主要的动机是他终其一生都厌恶粗糙的唯物主义与经济还原主义。在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时，马尔库塞认为，人类所有的产品、制度、理念等都植根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个断言并不是“价值排序”。毋宁说：

这个断言并不意味着任何本体的一时间的排序，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首先存在的就是纯粹的生产与再生产，随后而来的是“文化”与“精神”对象领域和行为模式。事实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经常被忽视的基本命题，即作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实存总是同时已经是“物质的”和“精神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这些术语只能用来呈现传统意义上区分开来的领域）。因此，在具体的人类实存的历史运动中，意识形态领域早已被同时再生产了出来（mitreproduziert）。<sup>①</sup>

在这段话中，马尔库塞试图避开一种粗糙的、机械的唯物主义，因为这

<sup>①</sup> Marcuse, "Contributions," p. 634; *SI*, p. 376.

种唯物主义坚持的观点是，精神产品或智力产品只是物质基础的附带现象，仅仅是经济现象或关系的反映，视条件而定的上层建筑自身根本没有自主性或因果效力。这种还原论的唯物主义形式在他所处的时代广为流传，马尔库塞旗帜鲜明地反对该形式。<sup>①</sup>在引文中，马尔库塞对传统的“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对立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这些观念是不清晰的，需要进一步澄清。然后，他解释道，传统上被分成两个不同的存在领域的东西实际上在同一历史进程中被同时再生产了出来，因此，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它们“同样原初”（equiprimordial）。此处讨论的问题出现在了另一个段落中，可以说，这段话对当时“辩证唯物主义”（Diamat）的“基本论题”提出了质疑。

精神或物质、意识或存在，哪一个具有客观优先性，哪一个“是第一性”，这个老问题并不取决于辩证现象学，因为按照辩证现象学的表述，它早已毫无意义。先行给定的只是作为历史的在世之在的人类，它既是精神也是物质，既是意识也是存在；因此只有在此显而易见的被给予性基础上，人们才能对主导现象的基础关系进行表述。任何偏离，即从这一被给予性转向对其某一部分的绝对化，都是独断论，都是蔑视一切辩证法的做法，因为它试图从“第一绝对者”（primum absolutum）这个僵化的抽象概念开始辩证考察。<sup>②</sup>

[22]

基于刚才这段话，我们认为，对粗糙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厌恶是马尔库塞阐发辩证现象学的另一个强大的动机。卢卡奇、科尔施以及后来萨特都

① 马克思并不主张这种粗糙的唯物主义——马尔库塞当时将其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表现，这可以透过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考察清晰地看到，下一节中将对对此做出专门讨论。另参见 Alfred Schmidt, *Marx's Concept of Natur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② Marcuse, “Contributions,” p. 65; *SI*, p. 379.

持有这样的目的。<sup>①</sup> 这些思想家都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以及绝大部分的历史理论，但却反对当时辩证唯物主义盛行的教条，因为它成了粗糙的机械还原论解释，同时形成了不适当的人性、社会、文化与历史概念。马尔库塞似乎认为，辩证现象学可以搁置物质优先的问题，因此可以避免唯物主义形而上的独断。通过在不引起形而上困境的前提下仅仅将重点放在描述既定经验上，现象学解除了物质优先于精神、存在优先于意识的问题，使其变成了伪问题。显然，马尔库塞认为，他可以运用基本的现象学方法，搁置某些形而上问题，根除二元论，避免在马克思主义所声称的“哲学的基本问题”<sup>②</sup> 上犯错误。这种能够避免介入这一主导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现象学方法是

[23] 马尔库塞试图调和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的强有力的动机。无疑，无论那时还是现在，许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毫不含糊地坚持认为存在优先于意识，物质优先于观念，并因此坚持说“辩证唯物主义”是其世界观的基础，但马尔库塞对此不会同意。<sup>③</sup>

马尔库塞转向现象学的存在主义并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新的哲学支柱

① 关于对还原论的唯物主义的驳斥，参见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与 Korsch, *Marxism and Philosophy*；萨特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批判，参见 Sartre, *Th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London: Verso, revised edition 2004。

②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文章中坚持认为，“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涉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因此也涉及对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抉择，他宣称马克思主义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哲学唯物主义，并认为存在与自然是第一性的，而精神与思维是第二性的、派生性的，因此按照该分析，意识是“物质的产物、机能和派生物”。列宁、布哈林、斯大林、考茨基及其他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遵循这条路线，因此该路线也就变成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支柱。关于科尔施对此所作的批判，参见 Karl Korsch, *Marxism and Philosophy*。

③ 参见 Gustav Wetter, *Sowjet Ideologie Heute*, Frankfurt: Fisher, 1962, pp.24–67；参见 the collective work *Marxist Philosoph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8, pp.9–13, 53–83；另参见 R. O. Gropp, *Grundlagen des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 Berlin: VEB Verlag, 1970, pp.17–21, 35–78。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斯泰格沃德在抨击马尔库塞“背离”哲学唯物主义的时候遵循的就是这条路线。

的最后一个动机是，他始终关切具体的生存问题和当前个人的处境（这是马尔库塞早期关注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著述中发挥持久影响的东西）。但正统马克思主义在马尔库塞早期著作这段时期（甚至今天在某些更加乏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领域）一直忽视当前个人的问题，并且经常认为个人只有阶级或集团职能，没有特定的个人利益或价值。马尔库塞反对该趋势，他始终坚信个人的价值、需要、意识和潜能，并一直把个人的解放与发展当成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尔库塞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评论性文章是其早期最重要的文章之一。<sup>①</sup> 他的诠释一直都致力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依据，并且开启了按照马克思早期著作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潮流。马尔库塞的研究仍是针对早期马克思所做的最好的解释之一，它把哲学、政治经济学、革命性的社会理论的综合描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文章还针对青年马克思——他的早期著作对当代思想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还决定性地塑造了马尔库塞自己的理论事业——做了富有挑衅性的探讨。

[24]

马克思的《手稿》<sup>②</sup> 1844年完成于巴黎，但直到1932年才首次出版，它

① 参见 Marcuse, "Neue Quellen zur Grundleg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Die Gesellschaft*, IX, 8 (1932) pp.136-174; 参见英文版, *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Joris de Bres,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73, pp.3-48 (后面简称 SCP); 页码索引将按照英文版, 不过翻译大多是由我们来完成的。我们注意到, 相比马尔库塞早先受关注的程度, 他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评论引起了更大范围的社会公众的关注, 特别是引起了左派的关注。亨利·帕赫特 (Henry Pachter) 曾向道格拉斯·凯尔纳讲起, 在马尔库塞的评论首次发表的时候, 他和科尔施圈子中的其他人都非常赞赏该文章, 而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注意到马尔库塞 (conversation with Pachter, 11 July 1978, New York)。

② 文中提到的《手稿》《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手稿》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均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译者注

的出版一直以来都被称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哲学事件之一。<sup>①</sup> 马尔库塞显然对重要的、新的理论著述非常敏锐，因为，正当他首次完成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诠释时，他也首次发表了对马克思《手稿》的全面诠释。马尔库塞后来曾讲过《手稿》是如何把他从海德格尔那里解放了出来，以及如何使他与马克思走得更近的：

在这整个时期，我一直都在阅读马克思，不断地研究马克思；随后，碰上了《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那很可能就是转折点。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这个新的马克思非常具体，同时也优越于各党派僵化的实践意义上和理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从那以后，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对立的问题对我来说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了。<sup>②</sup>

马尔库塞一定会感觉到马克思《手稿》中的学说的亲和力，因为，在《手稿》中发现的异化理论、人道主义理论——不仅削弱了哲学意义上的唯心主义，也削弱了唯物主义——以及开阔的哲学视域符合他自己正在形成中的理论。马克思早期的手稿不仅为马尔库塞自己的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而且能够激发他去阐发马克思主义整个哲学革命的意义——他认为，这方面正在不断地被现今主要马克思诠释者和趋势所歪曲和遮没。为了获取一种对马克思的事业的正确解释，他对马克思《手稿》表现出了热忱并且充满着信仰，这在其文章的第一段就表现了出来：

马克思完成于 1844 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对马克思研究

① Istvan Meszaros,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London: Merlin, 1970, p. 11. 参见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Collected Works*, vol. 3,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5, pp.231ff.

② 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及其他人的谈话，参见“Theory and Politics: A Discussion,” *Telos*, 38, Winter 1978–1979, p. 125.



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该手稿不仅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的起源与本义的讨论都放在了一个新的基础之上，而且使更富有成效地、更富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实际关联的问题成为可能。<sup>①</sup>

马尔库塞认为，1844年《手稿》把“马克思的基本范畴的本义揭示了出来，因此，这有可能使通过参考后期批判工作的起源来修正当前对晚年马克思的解释成为必要”<sup>②</sup>。马尔库塞宣布了以早期马克思作品为基础修正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这项重大课题的到来。<sup>③</sup> 此类“修正主义”的课题都在试图阐发一

[25]

① SCP, p. 3.

② Ibid.

③ 在解释整个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认为早期马克思的著述至关重要的趋势，而马尔库塞的文章就是该趋势的先声，并对它产生了直接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罗伯特·斯泰格沃德 (Robert Steigerwald) 声称，马尔库塞的文章“实际上是几乎所有直至现在的以早期马克思为基础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尝试的宝藏”，它还“把各种各样的批判以早期马克思为起点的研究，并且直至现在仍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马克思都涵括了进来”，参见 *Herbert Marcuses dritter Weg*, p. 87。对科尔施、卢卡奇与马尔库塞所开辟的“当前这种以马克思早期著述为起点的解释（在西方占支配地位）”，依林·费切尔 (Iring Fetscher)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参见 *Marx and Marxism*, New York: Seabury, 1971, p. 46。以早期马克思著述中发现的新材料为基础来修正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形象这项事业，也曾得到过社会民主党人兰茨胡特 (Landshut) 和迈尔 (Mayer) ——他们编写了《手稿》第一个德文版本 (the *Manuscripts, Die Fruhschriften*, Leipzig: 1932) 的序言——的阐释，但极为不同。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种道德学说”，他们还形成了一种解释，而该解释影响到了后来对马克思的解读中的伦理和人道主义趋向——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征，淡化它的政治经济批判和革命性的社会理论。参见，比如 Karl Lowith, *From Hegel to Nietzsch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7；Jean-Yves Calvez, *La Pensée de Karl Marx*, Paris: Seuil, 1956；Erich Fromm,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3。《手稿》同样对法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还在萨特 (Sartre)、梅洛-庞蒂 (Merleau-Ponty)、科耶夫 (Kojève)、伊波利特 (Hippolyte) 的作品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在列斐伏尔 (Lefebvre) 和加洛蒂 (Garaudy) 的作品中，帮助完成了一系列的针对马克思、黑格尔与存在主义的综合。关于早期马克思对法国的影响，参见 Mark Poster, *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e: From Sartre to Althuss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以批判各式各样的正统的马克思。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领导人长期以来都对《1844年手稿》与马克思晚年作品的联系这个问题保持沉默，认为它们在马克思文献中的意义极其微小；然而，最终，他们被迫参与到了与那些希望以早期马克思为基础创立其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激烈的辩论之中。广泛认可的“正统”观点是，早期“哲学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是一个序幕，早已在马克思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被彻底抛弃了。<sup>①</sup> 不过，早期马克思还是被当成了批判官僚共产主义的武器，当成了肯定一种比在大多数“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看到的、更加解放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的武器。<sup>②</sup> 因此，《1844年手稿》拥有广泛而多样的影响，并且一直以来都是很多激烈论战的主题。<sup>③</sup>

马尔库塞把马克思的《手稿》描述成是“一种革命理论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和哲学依据”<sup>④</sup>。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哲学意义上

① 在《马尔库塞的第三条道路》(*Herbert Marcuses dritter Weg*, pp.86-91)中，斯泰格沃德就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马克思《手稿》的贬低做了简要的说明，并且在该书第116页还罗列了几位“马克思主义者”的评论——“纠正了”对马克思所作的“资产阶级”的解读。还可参见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New York: Vintage, 1968)，在书中，阿尔都塞声称，在哲学的(=“意识形态的”=“非科学的”)早期马克思著作和“科学的”晚期马克思著作之间存在着“认识论的断裂”。

② 为了发展一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批判正统的“斯大林主义”，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早期的著述做了有效的运用。参见弗洛姆主编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Socialist Humanism*, ed. Erich Fromm,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6)中的文章，再就是科西克(Kosik)、沙夫(Schaff)、科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马尔科维奇(Markovic)、彼得洛维奇(Petrovic)、斯托扬诺维奇(Stojanovic)以及其他人的作品。

③ 更全面的关于各种针对马克思《手稿》及其广泛影响的解读的文献资料，可参见 Erich Thier, “Etappen der Marxinterpretation,” *Marxismusstudien*, I, Tübingen: 1954; Jürgen Habermas, “Zur philosophischen Diskussion um Marx und den Marxismus,” *Theorie und Praxis*, Berlin: Luchterhand, 1963, pp.261-335; 这个重要的讨论出现在了德文版的《理论与实践》中，但却没有被纳入它的英译本；还可参见 Emilio Bottigelli, Introduction, *Manuscripts de 1844*, Paris: 1969, pp.viiff.

④ SCP, p.3.

的，因为它的基本范畴“是从与黑格尔哲学范畴的批判的对抗中发展起来的”<sup>①</sup>。此外，马克思辩证法是通过透彻地思考黑格尔哲学的根本问题发展起来的，正如马尔库塞所认为的那样，它不仅仅是把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抽离了出来。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对其革命性的废除所依靠的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人性”概念，而此概念是这一论点的基础，即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异化了，因此必须激进地改造该社会以解放个体。因此，“革命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是有哲学基础的，反过来，也可以说，它深层次的哲学早已包含了革命性的实践”<sup>②</sup>。马尔库塞声称，不仅仅是黑格尔的辩证范畴和方法，而且他的异化及其克服的理论，在马克思思想随后的各个阶段一直都发挥着作用，甚至在晚期，更具体地讲，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也是如此。

因此，马尔库塞拒斥这样的解释，即声称马克思早期的著述与晚期“科学的”著述不同，是“哲学的”，并且强调的是贯穿马克思著作始终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与革命实践之间的**关联性** (*interconnection*)，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连续性** (*continuity*)。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证明了早期的资本主义理论的缺陷就存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比如，斯密、李嘉图、萨伊等）之中，同时还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对人类的迫害。<sup>③</sup> 不同于这些理论，马克思为“新科学”奠定了基础，使其成了一门“研究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的科学”<sup>④</sup>。这场革命不只是一种经济转型，还是“整个人类史的革命和确立其本质存在的革命”<sup>⑤</sup>。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仅是一门与其他学科相提并论的科学，而是“对这一把整个人类都卷入进来的问题

[27]

① SCP, p.4.

② SCP, pp.4-5.

③ 参见 Marcuse, SCP, pp.5ff., 31f., *passim*。关于该主题，参见 Douglas Kellner, “Karl Marx and Adam Smith on Human Nature and Capitalism” in *The Subtle Anatomy of Capitalism*, ed. Jesse Schwartz, Santa Monica, CA: Goodyear, 1977, pp.66-86。

④ SCP, p. 5.

⑤ Ibid.

的科学表达”<sup>①</sup>。按照马尔库塞的解读，马克思拒绝从学术上把科学分成独立的学科，他竭力建立一种“新的人的科学”，即可以成为以人的解放和新社会秩序创设为旨归的、更高一级的、统一的学科。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标，“正如在资本主义社会所看到的那样，是‘总体的异化’与人的现实的‘贬值’”<sup>②</sup>。恰恰是这一现象却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掩盖了起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异化的基础是异化劳动，而后者是马克思所阐发的这门新科学的基础概念。然而，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却忽略了异化劳动，但对马克思来说，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事实，也只有由此出发，才有可能对生产、剥削、利润和工资等诸多政治经济学范畴进行解释和批判。

马克思的成就是，他采纳了黑格尔及其他人所阐发的“异化”这个哲学概念，但却通过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赋予了它具体的物质基础。对马克思来说，异化劳动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它还蕴含着一个基本的人类学维度，因为，它所指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实，更是人类的异化，生命的退化，人的现实的贬值乃至丧失”<sup>③</sup>。这种异化现象是一个历史事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人类历史事件”，而废除异化将“彻底改变整个人类史”<sup>④</sup>。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遭到了马克思的批判，因为它缺乏这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维度和批判维度：“由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其概念结构中根本没有抓住人类及其历史，所以从最深层次的意义讲，它不是‘人的科学’，而是一种关于物和商品的非人（inhuman）世界的无人（non-human）的科学。”<sup>⑤</sup>如此看来，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无法掌握它的根本对象，即作为劳动主体和经济活动基础的人类。而马克思不仅给出了一种

① SCP, p. 5.

② Ibid.

③ SCP, pp.7-8.

④ SCP, p. 9.

⑤ Ibid.

关于人性及其发展的历史理论，还给出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迫害人类的分析。马尔库塞指出，对马克思哲学人类学的思考驳斥了各种意欲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或指责为还原论的经济主义——仅仅把人类看成是经济动物——的企图。<sup>①</sup>

对马克思来讲，异化劳动是一种由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造成的历史现象。“异化”所指的绝对不是无时间性的形而上学状态，马克思也没有像黑格尔的信徒和存在主义者那样把异化看成是“对象化”(objectification)或“外化”(externalization)。<sup>②</sup>对马克思来说，对象化指的是劳动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创造了客观的人力，创造了对象)，而异化仅仅是对象化的一种形式，它只有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才会发生，而为了创造非异化的劳动，就要废除该条件。因此，对马克思和马尔库塞而言，尽管对象化的活动是异化可能的基础，但“异化”本身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历史地形成的，所以只有废除资本主义才能被克服。

[29]

① SCP, p. 9.

② 自马克思的《手稿》发表以来，黑格尔与马克思著作中的“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外化”(Entausserung)与“异化”(Entfremdung)这三个概念的关系成了争论的焦点。在《手稿》结尾，马克思对黑格尔做了讨论，对黑格尔的“双重错误”表示不满(pp.331ff.): (1)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把具体的历史还原成了思维过程，并且试图不正当地通过“抽象的哲学思维”来理解历史(p. 331); (2) 黑格尔把异化当成了精神的外化和对象化，因此，他无法理解革命实践将要消除的异化在历史上特定的物质条件(pp.332ff.)。马克思与马尔库塞都声称，黑格尔把对象化、外化和异化都压缩进了一个本体论的过程，因此，他无法区分外化与对象化在一切人类活动中的必然性和异化的偶然性——消除异化是人类解放的一个主要方面。这一点将在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George Lukács, *The Young Hegel*, London: Merlin, 1975)中凸显出来。卢卡奇比较了黑格尔的“外化”理论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这些术语做了详细的历史和概念分析(pp.537-549);接着，他又从“对象化”概念出发对黑格尔与马克思做了对比(pp.549ff.)。还可参见让·伊波利特的评论与批判，Jean Hippolite, “Alienation and Objectification: Commentary on G. Lukács’ *The Young Hegel*,” in *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不同于卢卡奇，通过对异化与对象化重新本体化和批判马克思的异化能够被克服这种“乐观的”观点，伊波利特为黑格尔做了辩护(pp.87ff.)。

## 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的人类学、异化理论与资本主义批判的阐述

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革命理论整个地都建立在特定关于人性及其本质力量的观念基础上。<sup>①</sup> 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揭示人类的基本需要和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正在遭受压抑和扭曲；因此，异化理论以资本主义对人类生活的压抑性和破坏性为根据为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提供了一种解释。该分析的目的不仅仅是另一种关于人性的哲学理论，而是为了刻画现代人的处境，从该处境无力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发展人的潜能等方面对其进行评估。

马尔库塞揭示了马克思的人性异化理论是如何在与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的对话中发展起来的。为了修正该解释，即夸大马克思早期人类学的费尔巴哈主义根源，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理论的主要方面来源于黑格尔对劳动、对象化和异化的分析，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理论植根于黑格尔哲学问题的最核心”<sup>②</sup>。具体来说，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

① SCP, pp.8ff.

② SCP, pp.8ff. 一些批评者指出，马克思《手稿》中的人类学根本上还是费尔巴哈主义的，因而被当成了反对黑格尔唯心主义人类学的典型。参见 Lloyd Easton and Kurt Guddat,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7; Schlomo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Writings of Karl Marx*, New York: Cambridge, 1968; 以及 Althusser, *For Marx*, pp.45ff. 将早期马克思看成是反对黑格尔的费尔巴哈式批评家的做法是成问题的，因为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既不是黑格尔主义者，也不是费尔巴哈主义者，相反，他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英国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革命思想做了有创造性的综合。尽管马克思经常拥护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他却通过强调人类积极的、创造性的方面和黑格尔的“劳动”与“精神”概念消解了费尔巴哈人性理论中消极的方面。关于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不同起源，参见 R. N. Berki, “On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rx’s Concept of Labor,” *Political Theory*, vol. 7, no. 1 (February 1979), pp.35–56.

以对黑格尔“劳动”与“精神”(Geist)概念进行唯物主义重建为开始,通过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使它们具体化了。可是,马克思随后进一步解释了费尔巴哈从发展人性和构建人类社会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即实践)的角度所强调的人的感性和需要。 [30]

“劳动”概念是马克思人类学的核心概念,因为它发展人的本质**潜能**,实现人的基本**需要**。<sup>①</sup>马克思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即生产客观对象和识别人类社会世界中客观化的自我和人性的创造能力的首要性。因此,劳动是一种使人的基本能力得以体现出来的活动,它能够发展人在理性和智力方面的才能,锻炼身体方面的能力,它是社会的、公共的活动,同时它还能够例证人的创造性和自由。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的需要和潜能是以往全部历史的产物,因此马克思认为,人性从本质上讲是历史的。<sup>②</sup>不同于那种把人性解释为普遍的、不变的东西的倾向,马克思强调了历史上具体生产方式的构建力量。由此来看,人类世界就是一个历史世界;以马克思的话来讲,“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是通过人的劳动诞生的过程”<sup>③</sup>。

就这一点而言,有必要指出,尽管马尔库塞使用了本体论和“本质”的语言,但他却拒绝僵死的、普遍的、无历史的人的本质概念。他认为:

如果把本质与事实对立起来,就会完全错失马克思早在其研究之初就假定了的新观点。对马克思来说,本质与事实,本质性的历史状况与事实性的历史状况,不再是彼此相互独立的不同区域或层次:人的历史经验被纳入了对人的本质的定义。我们将不再讨论对具体历史的各阶段都同样有效的、抽象的人的本质,而是要讨论可以在历史中并

① 马尔库塞最先明确地强调,马克思的人类学是从需要和能力的角度来设想人类的。关于该主题,参见 Bertell Ollman, *Alien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1971; Agnes Heller, *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6。

② *SCP*, pp.24ff.

③ *SCP*, p. 24.

且仅仅在历史中得以界定的本质。<sup>①</sup>

[31] 所以，尽管在马尔库塞的作品中存在着本体论—本质主义的倾向，但通常对它们的解释却是在试图削弱早先的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二分法的理论框架中完成的，因此，他的作品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框架和理论。不可否认，马尔库塞没有充分地阐明该理论，而且他有时候还会使用传统的本体论语言。<sup>②</sup> 虽然他经常进行本体论的概括，但他却要求把它的本体论范畴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比如，为了讨论支配的动态发展而把黑格尔的主奴范畴泛化为普遍的框架之后<sup>③</sup>，他讲道：“在异化劳动的可能性被证明在人的本质中有其根基之后，哲学描述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而如此一来，对异化的真正起源的发现就变成了历史分析的问题。”<sup>④</sup>

因此，马尔库塞或马克思的人类学是“还原主义”，深受“劳动的形而上学”——即把人的基本活动还原成了劳动，过分夸大了它在人类生活中的构成作用——之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sup>⑤</sup> 事实上，马克思与马尔库塞所说的人并不是任何狭隘的或单纯经济意义上的有生产能力、从事劳动的人，而是拥有很多需要和能力——同时也是个人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的多面的人。马克思的日常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概念包括性行为、交往、符号互动交流以及其他的人类活动。早期马克思的人类学绝不是还原主义，它提供的是

① SCP, p. 28.

② 参见 SCP, pp.35-39.

③ SCP, pp.37ff.

④ SCP, pp.37-38.

⑤ 为了批评所谓的马克思把人的本性还原成了劳动，阿多诺引入了“劳动的形而上学”这个术语，参见 T.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5, Frankfurt: Suhrkamp, 1971, p. 270。哈贝马斯及其同仁也曾批评马克思作品中以劳动为主题的还原论的人类学，认为它无法充分使符号互动概念化，并且指向的是一种“秘密的实证主义”。参见 Jürgen Habermas, *Human Knowledge and Interests and Albrecht Wellmer,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New York: Seabury, 1974。



一个多面的人的概念——借此我们可以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片面性与限制条件。因此，马克思关于人及其异化的概念并没有从一种僵化的、非历史的、同一的人的本质——当时已被证明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相抵触的——的立场来评价和谴责资本主义。毋宁说，马克思认为，而马尔库塞也赞成，资本主义下的人类生活不可避免地丧失了自由，丧失了创造性的活动，也因此压制了人的基本潜能，扭曲了人的基本需要。<sup>①</sup>至为关键的是，马克思的劳动及其异化理论通向并且也支持社会主义及其革命理论。

按照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释，为革命奠定基础、提供辩护的核心事实是，人的基本需要和能力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存在着矛盾。正如已经提到的，该矛盾还涉及自由的、多面的、创造性活动与异化劳动的对立。马尔库塞总结道：

[32]

如果本质与存在彼此对立，而如果它们的统一，即它们真正的现实化，才是人类实践真正自由的使命，那么在事实性的条件已经发展到完全颠倒人类本质的地方，彻底废除这种事实性的环境就是这一决定性的使命。正是对人类本质的持续不断的强调变成了促进激进革命的不可阻挡的推动力。因为资本主义的实际状况并不仅仅是经济或政治危机，还是人类本质的灾难——该洞见对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纯粹的经济或政治改革提出了谴责，并无条件地要求通过**总体革命** (total revolution) 来毁灭性地废除现实状况。<sup>②</sup>

正是在这里，马尔库塞最为颠覆性地背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确实，在马尔库塞的很多著作中，他都把焦点从分析政治经济系统的矛盾与阶级斗争转向了引起拒绝与反抗的对个体的压抑。马尔库塞把人性中奋

① SCP, pp.26ff.

② SCP, p. 29.

力实现和表达的潜伏的、解放的力量看成是反抗和斗争的基础，此外，他还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现了该看法的马克思主义基础，随后通过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与“本真的艺术”，他在人性中发现了革命潜能的相似的基体。

[33] 马尔库塞坚持认为——正如以上所述——异化的、剥削的、压抑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类而言确实是“灾难性的”，因此只有总体革命才能克服人类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矛盾。马尔库塞坚信，总体革命是必需的，不仅是因为异化劳动影响到了生活的全部，还因为资本主义下的整个劳动和休闲体系是异化的和压抑的。单单经济和政治改革无法消除资本主义的罪恶，因此总体革命是必要的。紧随卢森堡的“革命”概念，马尔库塞还把革命设想成了即将颠覆和转变整个现有社会的“灾难性的剧变”。<sup>①</sup> 马尔库塞后来的著作将尝试着为该看法辩护，此外，它们后来还使马尔库塞极其激进的思想变成激烈争论的中心。

在马尔库塞讨论马克思《1844年手稿》的文章中，他分析了异化劳动、私有财产、货币、商品、阶级统治和物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这些理念可能决定性地影响到了他自身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理论。作为马尔库塞后期解放理论——它设想了在非压抑性社会中获得解放的人类的形象——的来源之一，马克思《手稿》中关于人的解放的观点同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20世纪60年代的许多左派和反主流文化人士可能也都赞同该观点。马尔库塞在他早期的著作中阐发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反思时，着重强调了需要的满足、感性的培养、非压抑性社会中的审美—爱欲要素，以及作为已获得解放的社会的必然要素的新感性与新意识。<sup>②</sup> 因此，马尔库塞是为数不多的一位重视马克思早期关于解放感性和总体革命观点——包括发展人

① 马尔库塞曾对凯尔纳讲到，卢森堡的革命理论以及俄国与德国的革命决定性地影响到了他早期的“革命”概念，正因为如此，他才把革命当成了“灾难性的剧变”，当成了整个社会生活的重建（conversation, December 28, 1978）。

② 关于马尔库塞的美学理论，参见《马尔库塞文集》第四卷《艺术与解放》。

类新的需要和能力、新的感性、新的人际关系、新的制度、新的劳动体制，总之，发展一个全新的社会，以满足和实现兴趣广泛的人类——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这种方式，马尔库塞在大量的关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讨论中用到了革命社会主义的内容，也发展了该内容。

马尔库塞同样重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即资本主义社会中可以看到的一切对抗、冲突和矛盾在一个解放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都会被克服。如此看来，马尔库塞的和解与和谐主题源于(或至少其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植根于)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马克思相信，借助于社会主义革命，人的潜能与实存之间的对立将通过消除异化劳动、私有财产与阶级统治而得以消除。社会主义有可能把劳动变成对世界“普遍而自由的占有”，使人性“有多方面的发展和表现”成为可能。<sup>①</sup>

马尔库塞对“总体革命”与彻底重构整个社会的强调表明，那些抱怨马尔库塞只不过是倡导一种“人类学上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者是错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是，对马尔库塞而言，革命要求结合社会经济状况和制度的转变来改变人类的行为和意识。<sup>②</sup> 不过，马尔库塞对马克思《1844

[34]

① SCP, pp.33-34.

② Stefen Breuer, *Die Krise der Revolutionstheorie*, Frankfurt: Syndikat, 1977, p. 111。布鲁伊尔对马尔库塞所谓的使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条件实体化为本体论概念的批判很有意思，但他声称“随着实体变成了主体，资本已经把劳动整合了进来”，这却再现了阿多诺的痼疾，即偏执地认为主体性在“被全面管制的社会”消失了。我们所谓的“本体概化的谬误”(the fallacy of ontological generalization) 批判的是这种把历史上特殊的情况投射到普遍概念上的不正当的做法，而我们认为，马尔库塞避开了该谬误。

克思那里也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视角提供了文本支持。

尽管马尔库塞对马克思《手稿》的解释非常出色，但是他自身对资本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些过分依赖马克思早期的作品，他还没有充分吸收马克思后期对资本主义与政治的研究。因此，早期的马尔库塞太过纠缠于早期马克思与德国唯心主义的哲学问题，还没有充分可靠地领会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与历史理论。他的革命理论太过强调人性及其异化，对导致异化的社会经济根源不够重视，或者说，对产生革命斗争与意识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不够重视。1933年之后，在他效力社会研究所期间，他将仔细研究后期马克思，随后他在《理性和革命》中正确地指出：“然而，从各方面来看，马克思早期的作品仅仅是其成熟理论的初始阶段，不应被过分强调。”<sup>①</sup>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尔库塞将在自己的作品中阐发他特有的富有争议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评论，还将阐发他特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及政治变革理论。<sup>②</sup>

### [35] 马尔库塞与苏联马克思主义

马尔库塞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批判马克思主义者”最早的也是最好的试图对苏联社会与意识形态做出全面、综合评价的尝试之一。<sup>③</sup>《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标题恰好表明，在苏联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高度针对性的马克思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对苏联的批判大部分来源于托洛茨基分子、社会民主党人或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充满愤怒地与背

① 参见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0, p. 295。

② 关于马尔库塞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危险遭遇及其流亡的经历，参见《马尔库塞文集》第一卷《技术、战争与法西斯主义》和第二卷《走向社会批判理论》的“引言”。

③ 关于“批判的”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参见 Alvin W. Gouldner, *The Two Marxisms*, New York: Seabury, 1982。马尔库塞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他把马克思理论当成了批判的工具，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运用到了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上。

叛了马克思主义（或他们自身期望）的苏联对抗了起来。不同的是，马尔库塞的研究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批判性、分析性的讨论来克服在苏联问题上所形成的宗派性话语的新尝试。许多先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要么是倾向于不加批判地为苏联辩护，要么是严厉地抨击它，或者，如萨特和梅洛-庞蒂那样，态度急剧转变。<sup>①</sup> 本雅明、布莱希特、布洛赫及其他人，或许私下里怀疑苏联，但却拒绝公开地批评它。甚至科尔施，尽管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最先对苏联做了有主见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战后却不情愿地总结说，抨击苏联是反动的，因为他认为，只能在美国资本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之间做出有意义的政治选择。<sup>②</sup>

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尔库塞的社会研究所同事对该问题通常都审慎地保持沉默，尽管很多成员，比如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和霍克海默，最终变成了激烈的反共产主义者。<sup>③</sup> 马尔库塞是社会研究所最早尝

[36]

① 萨特在 1952 年的《共产党人与和平》（*The Communists and the Peace*, New York: Braziller, 1968；法文原版，1952）中为苏联共产主义做了辩护；不久，在苏联 1957 年残忍地镇压匈牙利、波兰与东德之后，他又在《斯大林的幽灵》（*The Ghost of Stalin*, New York: Braziller, 1968；法文原版，1957）中对斯大林主义做了抨击。梅洛-庞蒂在《人道主义与恐怖》（Boston, MA: Beacon, 1969；法文原版，1947）中曾替苏联共产主义辩护，却在 1957 年他的《辩证法的冒险》（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法文原版，1957）中抨击斯大林主义，也对致力于充当苏联辩护者的萨特及其他知识分子做了猛烈的抨击。

② 参见《科尔施致布莱希特》（Karl Korsch, letter to Brecht, edited by Douglas Kellner, *Karl Korsch: Revolutionary Theory*,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1977, pp.289ff.），以及科尔施早期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性讨论（*Karl Korsch: Revolutionary Theory*,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1977, pp.44-82, passim）。

③ 关于社会研究所成员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对苏联的立场，参见 Helmut Dubiel, *Wissenschaftsorganisation und politische Erfahrung*, Frankfurt: Suhrkamp, 1978。关于霍克海默的反共产主义，参见 Douglas Kellner, “The Frankfurt School Revisited,” *New German Critique* 4 (Winter 1975) pp.131-152。关于魏特夫不断改变的共产主义立场，参见 G.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The Hague: Mouton, 1978。

试全面分析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成员。因此，他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意义重大，因为在苏联问题上，它避开了共产主义辩护者、反共产主义理论家或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宗派性的论战，促进了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供职于战略情报局——即中央情报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前身——以及随后供职于国务院期间，马尔库塞成了共产主义和苏联研究专家。<sup>①</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成了国务院中欧部主要的政治分析专家，帮助起草了一份揭示“世界共产主义的潜力”的长篇机密情报。在他那些曾经同样效力于美国政府的研究所同事——纽曼、基希海默和洛文塔尔——纷纷离开政府部门转而投身学术职务之后，马尔库塞却因为他妻子苏菲的疾病被迫留在了华盛顿。因此，马尔库塞见证了冷战的开始，见证了麦卡锡时代在政府机构中对激进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压迫，尽管他坚持说，他没有直接受到政治迫害。其实，他早就厌倦了政府机构的差事，渴望回归创作和教学。因此，在他妻子 1951 年去世之后，他就辞掉了国务院的工作，谋到了一份大学的工作。

马尔库塞在美国的第一份学术职务来自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和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的鸣谢部分，马尔库塞写到，从 1952—1953 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政治原理——构成了该书的第一部分——做了讨论，而在 1954—1955 年哈佛期间完成了第二部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原理。尽管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研究机构是冷战反共产主义的中心，马尔库塞却在哥伦比亚大学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并且在哈佛以“驻校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in-residence）著称。他的研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表明他既不是一位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也不是一位冷战分子。相反，

[37]

<sup>①</sup> 参见凯尔纳在《技术、战争与法西斯主义》中的“引言”，另参见 Tim B. Muller, *Krieger und Gelehrte. Herbert Marcuse und die Denksysteme im Kalten Krieg*, Hamburg: Hamburger Edition, 2010。

为这种矛盾的解读反映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也就是说，苏联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实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

马尔库塞终其一生都认为，最初的马克思理论就人类对自由、幸福和更美好的世界的渴望做了“解放式的”、“进步式的”表达。他认为，试图在苏联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于“解放的、人性化的手段却起着保留统治与服从的作用，而毁灭一切意识形态的理论却被用到了确立新的意识形态上”<sup>①</sup>。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中，马尔库塞的写作策略是对苏联的“意识形态”与“现实”进行比较，通过揭露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及其在实践中无法实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提供一种针对苏联意识形态与社会的“内在批判”。马尔库塞声称：

【他的“内在批判”】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出发，阐发了它们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学上的各种结论，并依据这些结论对其前提重新做了考察。为了弄清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社会中的实际作用及其历史方向，我们的批判用到了它的对象——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具。<sup>②</sup>

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导言”中，马尔库塞明确提出了一种将苏联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的马克思式的历史分析法。他对苏联社会的“客观趋势”（objective trends）与“趋向”（tendencies）做了辨别，并“依据苏联与西方社会的相互影响”对苏联的发展做了理解。通过该书，他展示了国际地缘政治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趋势以何种方式影响到了苏联的发展。通过把公文、演讲、党的公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文本当作参考资料来利用，马尔库塞的研究将马克思式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与苏联的

① Herbert Marcuse, "Preface to the Vintage Edition, 1961," *Soviet Marxism*, New York: Vintage, 1961, p. xiv.

② Herbert Marcuse, "Introduction," *Soviet Marx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reprinted 1985, p. 1。1958年版的“导言”被莫名其妙地排除在了1961年典藏版之外。

政治分析结合了起来。哲学与政治因素的相互关联使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对复杂、富有争议的现象的表述看起来很难懂，通常也很晦涩。该书遭到了广泛的误解，许多解读者或批评人士不仅无法识别其对解放性与压抑性的辩证分析，也无法识别马尔库塞对伴有持续压抑的苏联可能具有的自由化趋势所做的复杂的解释。因此，尽管有些对苏联显然持批判态度的新左派批评人士没有注意到马尔库塞对苏联社会自由化趋势所做的重要分析，但却都交口称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斯大林主义、苏联的官僚制度和苏联政府。<sup>①</sup>对该书有所讨论的反苏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经常声称马尔库塞是在替苏联辩护，却对马尔库塞不曾间断的尖锐批判置若罔闻。而抨击《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评论家宣称马尔库塞的解释完全是消极的，并且认为他所持的是冷战思维，他是反苏理论的传播者。<sup>②</sup>

然而事实上，马尔库塞的解释并不是态度鲜明地“支持”或“反对”苏联，相反，他对这个解释起来很复杂、很困难的社会的矛盾趋向做了描绘。马尔库塞打破了冷战时期妖魔化苏联的反共话语，但却对苏联背离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性做了尖锐的批判。因此，该书在左派内部开启了对苏联做理性批判、抛弃宗派修辞的新趋势，也就是说，不仅批判官僚共产主义的压抑性，同时也赞赏苏联制度的社会进步潜能。

① 比如，约翰·阿纳森 (Johann Arnason) 述及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章节的题目就是“马尔库塞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参见“*Marcuse Kritik des Stalinismus*”，in *Marcuse zu Marx*, Berlin: Luchterhand, 1971；此外，让-米歇尔·帕米尔 (Jean-Michel Palmier) 在《论马尔库塞》中形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对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政治做了怒不可遏的抨击……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令人痛苦的矛盾无可置疑地做了悲观的分析”，参见 *Sur Marcuse*, Paris: 10/18, 1968, pp.24, 34。

② 一般来讲，《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已被《单向度的人》及马尔库塞 20 世纪 60 年代受热捧的著述所超越，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引起马尔库塞学者的重视。关于例外情况，参见 Muller, *Krieger und Gelehrte*，穆勒把马尔库塞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放在了他从事美国政府公职和学术工作的背景下。穆勒在其著作中还是做出了很多学术贡献，尽管他关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尔库塞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Krieger und Gelehrte*, p. 485) 这一点很有问题。



马尔库塞对苏联社会的“自由化趋势”与“进步”元素的分析使自由派与左派评论家都认为，马尔库塞对苏联的批评不够充分。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即马尔库塞对苏联自由化趋势的分析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由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造成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形成的“解冻时期”的影响。<sup>①</sup>共产主义者及其他人士深受激励，他们似乎看到了希望，即赫鲁晓夫的报告将标志着斯大林主义的终结，将创造一种新型的共产主义。然而，马尔库塞却对凯尔纳讲到，他对赫鲁晓夫不抱任何“幻想”，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仅有一处提到过赫鲁晓夫，他在此分析了赫鲁晓夫二十大报告中那些表明与斯大林政权的目标保持连续的特征，后面紧跟着就是对赫鲁晓夫宣言的引证，“不断强化国家和党的机构仍要提上议事日程”<sup>②</sup>。因此，马尔库塞在1958年似乎并不认为更换政治领导人是去斯大林化的决定性力量。

[39]

毋宁说，马尔库塞从对苏联社会经济形势及其他趋势的研究中得出了他的结论，即存在着自由化的趋向。他认为，“工业基础”就是被用来创造共产主义的高级形式的，而在官僚体制、意识形态、技术与全球政治力量对比中存在着可以推动这些通往文明更高阶段的趋向的结构性律令。因此，马尔库塞在这里表现出了他对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方法的坚守，也就是说，为了识别苏联社会的本质特征，他的注意力放在了它的基础上，而在他的分析中，作为上层建筑，新的苏联领袖并不起导向作用。

① 参见，比如 L. Stern, *Dissent*, vol. V, no. 1 (Winter 1958) pp.88-93；另参见 George Lichtheim's review in *Survey* (Jan.-Mar. 1958) reprinted in *Collected Essays* (New York: Viking, 1974) pp.337-347。《苏联的马克思主义》遭到了左派杜娜叶夫斯卡娅的尖锐批判，参见 Raya Dunayevskaya, *News and Letters*, June-July and Aug.-Sept., 1961；还可参见 *The Marcuse-Dunayevskaya-Fromm Correspondence, 1954-1978*, pp.222-226。

② 参见 Marcuse, *Soviet Marxism*, p. 164；还可参见 Interview with Douglas Kellner on *Soviet Marxism*, La Jolla, December 28, 1978。关于赫鲁晓夫的报告以及他的回忆录的原话，参见 *Khrushchev Remember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70。关于对赫鲁晓夫的报告的反应，参见 Columbia University Russian Institute, *The Anti-Stalin Campaig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在 1961 年典藏版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序言”中，马尔库塞指出：“苏联内部的改革与自由化趋势一直在继续。”<sup>①</sup>由此看来，他显然赞同赫鲁晓夫，他接受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对赫鲁晓夫政权时期苏联修订内外政策的分析。此外，马尔库塞似乎也接受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理论，他所倡导的全面裁军及其所提出的苏联正迈向共产主义的“第二个阶段”。这些不仅表明马尔库塞一直以来都坚信苏联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存在着自由化趋势，还表明赫鲁晓夫政府就是自由化的载体。

然而，在 1963 年法文版《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序言”中，马尔库塞指出，对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是否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这个问题的关注会转移对美国政治——“特别是自肯尼迪政府统治以来”<sup>②</sup>——是否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注意力。按照马尔库塞的说法，美国政治在第三世界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甚至成了干涉主义者，并且正在迫使苏联更多地关注与西方的竞争，更多地关注军备竞赛，因此在愈演愈烈的冷战气氛下终止了自由化的发展可能。因此，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马尔库塞所看到的是一种变动不居的、不稳定的政治环境，而正是这样的环境增加了人们识别苏维埃共产主义国家自由化趋向的难度。

回顾历史，可以说，赫鲁晓夫在 1964 年被迫下台以及随后苏联的共产主义阶段削弱了马尔库塞在 20 世纪 50 年代所隐约看到的自由化趋向。这表明马尔库塞可能夸大了自由化趋势，低估了与斯大林时期的连续性。后来，马尔库塞对后赫鲁晓夫政权感到越来越不满，特别是在 1968 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因此，他对苏联的看法是对不断变化的、不稳定的历史状况的回应，并且在回应不断变化的历史境遇时，修订了他所做的分析与评估。

然而，在苏联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问题上，马尔库塞还是提供了颇具

① Marcuse, Preface, *Soviet Marxism*, p.vi.

② Herbert Marcuse, "Preface à l' édition française," *Le marxisme soviétique*, Paris: Gallimard, 1963, pp.7ff.

挑衅性的批判性视角。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意识形态批判就成了马尔库塞的强项。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第一部分的后面几章以及整个第二部分即“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原理”中，他将马克思式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矛头瞄准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本身。对马尔库塞来说，苏联马克思主义最引人注目、最荒谬的特征是，厚颜无耻的修正主义却乔装成了冷酷无情的正统，而在这里，辩证法的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分析社会秩序的矛盾与对立的批判性、革命性的思想工具，但与此不同，通过将批判的辩证法编纂成一种包含范畴、规律和原理——用来使现存的苏联社会的合理性看起来可以接受——的哲学体系，苏联马克思主义放弃了批判的辩证法，并把它用到了替既定政权的辩护上。在一次很深入的讨论中，马尔库塞解释了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各种文本如何被用到了创作一种在重大方面与马克思本人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分歧的马克思主义上。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尔库塞自身的思想来说很有意义，因为它揭示了他关于苏联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批判之间的相似性。尽管马尔库塞在 1961 年典藏版本的“序言”中宣称他拒绝各种关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趋同”的理论，并决定重点关注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分析在两个社会运行的社会控制与支配的相似性。<sup>①</sup>然而，考虑到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及其他著作中倾向于以一般概念即“发达工业社会”之名同等看待不同的、特定历史的趋势与制度，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更为具体历史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马尔库塞在其他著作中更泛化的倾向。因此，对应于他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的文献，《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尔库塞批判苏联共产主义的重要文献，它使人们注意到了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41]

在 1961 年典藏版的“序言”中，马尔库塞声称，对本书所产生的矛盾的反响表明，“我还是取得了一点点进展，我把自身从冷战宣传中解放了出

① Marcuse, "Preface to the Vintage Edition," p. xi.

来，并且以理性地解释历史发展为基础提供了一种相对客观的分析”<sup>①</sup>。同情苏联的读者可能觉得马尔库塞的表述太具有批判性，而其他人则会觉得它的批判性还不够。其他人可能与他所呈现的“基本趋势”以及他对苏联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解释持不同意见。然而，马尔库塞极力避免在苏联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意识形态话语并给出一种综合的解释的尝试，可以说提供了一种片面化的意识形态解释应该重视的模式。

考虑到美国总统里根在这段时期指责苏联是“邪恶帝国”，考虑到甚嚣尘上的反共产主义这段时期威胁着要强化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敌对行动并把世界推到核战争的边缘，这种讨论方式就会表现出更多的意义。在这个背景下，马尔库塞极力就苏联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给出一种理性的、综合的评估的尝试使人们欣喜地解除了反苏的谩骂——在整个冷战时期弥漫在与苏联有关的话语中。

有趣的是，收录本卷的马尔库塞临终前发表的文章《初期社会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基于巴罗分析之上的一种理论综合》，使他卷入了持异见者巴罗（Rudolf Bahro）对东德“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的批判。巴罗料定在受苏联共产主义影响的社会中有走向民主化的趋势，原因是这些社会正在制造在现存官僚主义的、压抑的制度中无法得到满足的“剩余意识”（surplus consciousness）。此外，像马尔库塞一样，巴罗也坚信，马克思理论中存在着可以推动民主转型的自由化的特征。尽管巴罗与马尔库塞的分析可以解释为何苏联社会大量的个体都游离于斯大林主义的制度之外，都渴望民主化，但他们却都没有预料到“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轰然坍塌了。

马尔库塞的社会主义观念显然不同于苏联共产主义的官僚制，正如我们在下一部分将看到的那样，它与马尔库塞的乌托邦观念及乌托邦式的解放的可能性紧密相关。

---

<sup>①</sup> Marcuse, “Preface to the Vintage Edition,” p. v.

## 乌托邦、技术与社会主义

[42]

在该部分，我们首先要提的是马尔库塞拥护一种深受布洛赫影响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形式，然后我们再来理解马尔库塞自己的观念。在《希望的原理》三卷本中，布洛赫阐发了一种文化批判方法，该方法的目的是在艺术、哲学、宗教、文化与日常生活中搜索可以被用来发展创造另一个社会的想象和实践的乌托邦要素(utopian moments)。<sup>①</sup> 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对文化、哲学与日常生活中的乌托邦要素做了勾勒，马尔库塞认为，该书表现了对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向往，描绘了对具有新的现实原则的非压抑性社会的憧憬，因此，它努力追求的就是在他后期作品中随处可见的乌托邦与解放主题。<sup>②</sup>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马尔库塞对其乌托邦社会主义观点的辩护还是咄咄逼人，他认为，社会主义应该被认为是“一个有着质的区别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彻底发生了改变”。对马尔库塞来说，“替代方案就是社会主义。但这种社会主义既不是斯大林主义类型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后斯大林主义类型的社会主义，而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它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观念，只是极容易受到压抑和抑制”<sup>③</sup>。这样的社会主义观念，与现存的社会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完全不同，所以为了阐述它的解放性，有必要打破马克思对乌托邦式思辨的禁忌。在《从富裕社会中解放出来》中，马尔库塞写道：

我们一直以来都耻于甚至理所当然地耻于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体

① 关于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参见前面的脚注 1。

② 关于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对马克思、弗洛伊德、现代主义美学以及批判理论的整合，参见《马尔库塞文集》第五卷《哲学、精神分析与解放》的“引言”。

③ 参见 Herbert Marcuse, “On the New Left,” in *The New Left: A Documentary History*, ed. Massimo Teodori, New York: BobbsMerrill, 1969, p. 469。

性、激进性及其与一切现存社会的质的区别，但正是借助质的区别，社会主义才真正成了对现存制度的否定，而不管它们真的还是表现得多么有效、多么强大。<sup>①</sup>

乌托邦式的冲动深深地隐藏在马尔库塞的作品中，并且自他占有马克思主义开始一直都是重要的组成元素。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哲学与批判理论》一文中，马尔库塞写道：

- [43] [批判理论] 通常从目前的社会发展趋势获取其目标。因此，它对宣称存在新秩序的乌托邦毫不畏惧。当真理在现存社会秩序中无法实现时，它往往就会在乌托邦中表现出来。这种超越性既不反对真理，反倒支持真理。就像在构建最好的国家与最大的快乐、构建完美的幸福与永久的和平的过程中，乌托邦元素长期以来都是哲学中唯一进步的元素。<sup>②</sup>

马尔库塞向激进的乌托邦立场的转变于 1967 年他在柏林所做的《乌托邦的终结》——载于《五个讲座》（*Five Lectures*，缩写为 5L）——的讲座中含蓄地表现了出来。<sup>③</sup>这段话可以按照两种方式来解释，而事实上，两种不同的解释表明马尔库塞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的作品分两个不同的阶段。以曼海姆看来，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的分析意味着乌托邦的终结：发达工业社会的稳定化使乌托邦式的思考失去了效力，终结了它与社会理论和

① 参见《马尔库塞文集》第三卷《新左派与 20 世纪 60 年代》中的《从富裕社会中解放出来》一文。

② 参见 Herbert Marcuse, "Philosophy and critical theory,"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68, p. 143。关于马尔库塞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及其对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参见《走向社会批判理论》。

③ Herbert Marcuse, "The End of Utopia," *Five Lectures*,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70.

政治实践的关联。然而，在 60 年代，马尔库塞却要求终结反对乌托邦思想的禁忌，他的理由是，乌托邦理念具有重要意义，也具有可行性，所以不能从轻蔑的词源学意义上的“乌托邦”即“乌有之乡”（nowhere）就把它们视为“仅仅是乌托邦的”而排除掉。在《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缩写为 EL）中，马尔库塞认为，生产力也是“乌托邦”，因为现成的技术—物质能力使得创建一个没有贫穷、压抑与剥削的社会成为了可能。<sup>①</sup>

在 70 年代，马尔库塞经常阐述这个主题，他写道：

“乌托邦”这个词再也不应由社会学家来使用，因为所谓的乌托邦已经不再是（比如说）消除贫穷、消除痛苦。如今，社会财富是如此之大，世界上任何一个以个人的利益为旨归的合理的生产力组织实际上都有可能几年内就克服贫穷。此外，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缩短劳动时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任何人都不否认，甚至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不否认，发达工业国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不降低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是可以被果断缩减的。这些实例表明把社会主义描绘成乌托邦的宣传漫画只不过是对其的诽谤。<sup>②</sup>

正因为如此，马尔库塞提议解除马克思反对乌托邦式的思考的禁忌，原因 [44] 是：

[这样一种] 修正是当代社会的实际演变提出的，甚至说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生产力的动态发展剥夺了“乌托邦”传统意义上不现实的内容：被谴责为“乌托邦”的社会已不再是在世界历史中“没有立足之地”和不可能有立足之地，毋宁说，它前方的路已被现有的社会力

① Herbert 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pp.3ff.

② Herbert Marcuse, *Gesprache mit Herbert Marcuse*, Frankfurt: Suhrkamp, 1978, p. 98.

量堵死了。<sup>①</sup>

经常有这样的批评，即马克思主义是现实主义的人民不应该接受的无望的“乌托邦”观念，马尔库塞对此做了反击。他讲道：

我不会被现如今任何一种极其恶毒的意识形态——即，将自由社会最具决定性的概念与形象当成仅仅是“乌托邦”、“只是”思辨来贬低、抨击、嘲笑的意识形态——所吓到。因为，恰恰是社会主义这些现如今被当成“乌托邦”来嘲笑的方面有可能保留着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现存社会乃至最发达的工业社会之间决定性的区别与反差。<sup>②</sup>

这些反思使马尔库塞更强有力地“具体的乌托邦”（concrete utopia）这个术语用到了描述所设想的新社会上。<sup>③</sup> 他坚持认为，民主的、解放的社会主义事实上在今天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尽管“用以变革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从技术上讲触手可得”，但是“它们的合理应用却受到了现存的生产力组织的阻挠”。<sup>④</sup> 这意味着乌托邦式的变革是可能的，但它却只有在与当今社会彻底决裂的时候才会发生。<sup>⑤</sup> 一方面，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应该因为不存在革命阶级就被当成“乌托邦”而抛弃，原因是，它要求在创建一个自由的社会的过程中消除贫困、痛苦和异化劳动，这非常合理，不仅反映了人们对解放的真切需要，也表明了解放的真实目的。另一方面，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主义还不够乌托邦，因为眼前的技术—

① *EL*, pp.3-4.

② 参见 Herbert Marcuse, "The Realm of Freedom and the Realm of Necessity," *Praxis: A Philosophical Journal* (Zagreb) 5 (1969), pp.20-25.

③ 马尔库塞在《理论与实践》("Theory and Praxis", *ZeitMessungen*, Frankfurt: Suhrkamp, 1975, p. 27) 和这篇讨论巴罗的文章 (pp.396ff.) 中用到了布洛赫的术语“具体的乌托邦”。

④ *EL*, p. 64.

⑤ *5L*, p. 62.



物质的发展潜力带来的社会变革甚至有可能比马克思所设想的更彻底、更具解放性。

此时，在描述最发达的、最具解放潜力的新社会的过程中，马尔库塞拒绝了先前在其思想中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工作与娱乐之间的本体二元论。马尔库塞将对二元性的批判归结为对马克思的批判，因为马克思认为自由王国仅存在于必然王国之外，而这就保留了异化的劳动王国，仿佛人们只有在劳动王国之外才可以自由。然而在早期的作品中，马尔库塞似乎主张这样的区分，认为自由只能在劳动之外才能产生，但他却因为该立场而受到了批判，而此时他却写道：

我认为，一种表明自由社会与不自由社会之间质的区别的新的可能性就是看社会是否允许自由王国在必然王国中出现，即在劳动中，而不仅仅是在劳动之外出现。<sup>①</sup>

这是马尔库塞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因为，他此时设想了可以真正自我实现的非异化的劳动，并因此减弱了其理论中劳动与娱乐的截然对立，也克服了过度消极的被视为必需与不自由的劳动概念。

在一系列呈现其早期立场与晚期观点——早期他认为自由不能进入必然王国，但晚期他却提出劳动过程与技术部门（technical apparatus）的根本转变能够使自由活动进入劳动王国——之间过渡的文章中，马尔库塞与马克思所阐述的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之间关系的思想做起了斗争。在1964年版《否定》的“前言”中，马尔库塞引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脍炙人口的一段文字，这段话通过（1）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2）赋予人类控制其整个劳动部门的权力，并因此（3）可以彻底重组劳动过程、劳动部门的结构，从而使非异化的劳动成为可能，强调了在自动化中实现解放的可

<sup>①</sup> 5L, p. 63.

能性。<sup>①</sup> 马尔库塞此时认为，自动化不仅使利用整个劳动部门进行实验成为了可能，还使劳动过程的创造性重建——可以在减少异化劳动的同时扩大自由王国——成为了可能。

[46]

在极权主义的技术社会，只要整个技术部门实现了自治，自由就是可能的，包括为了平息生存斗争和重现平静与幸福而减少或整个地重建技术部门的自由。从现状来看，废止物质贫困是可能的，而和平、欢乐以及废止劳动是不可能的。然而，却只有按照它们并通过它们才能克服现存的秩序。极权主义的社会在其管理下把自由王国带到了必然王国之外，并使它拥有了自身的形象。与这样的未来截然相反，技术部门的自治就是必然王国的自由。可是这意味着，只有实现了今天所谓的乌托邦，自由才有可能。<sup>②</sup>

马尔库塞并不是幼稚的技术统治论者或未来主义者，他不认为，增强了的自动化和技术进步将自然而然地促进人类的自由。他认为，技术发展也有可能增加奴役与支配，个人在这种状况下有可能变成社会—技术机器的齿轮、机器的仆人。对马尔库塞来说，危险在于自由与个性不仅要在劳动领域减弱，也要在休闲领域减弱。1966年，他写道：

在我看来，当代工业社会通过侵入个人存在的各领域（因此预先安排好了自由时间），通过技术进步和大众民主，几乎终结了这一自由王国。在技术工作过程之外，留给个人创造力的就只有爱好、自己动手做东西、游戏了。当然，在艺术、文学、音乐、哲学、科学中存在着真正的创造性的表达，但即使是在最好的社会，也很难想象这种真正的创造

① 参见 Herbert Marcuse, "Foreword," *Negations*, p. xviii; 另参见 Karl Marx, *Grundrisse*, London: Penquin, 1973, pp.690ff.

② Marcuse, "Foreword," *Negations*, p. xx.

性会变成一般的能力。剩下的就只有体育、娱乐、时尚了。<sup>①</sup>

对马尔库塞来说，自动化与技术进步可能增加解放和自由时间，也可能增强奴役，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创造性与个性不仅会从工作世界中消失，还会从休闲世界中消失。<sup>②</sup> 因此，人的解放需要：

以工人与市民“自由联合”的方式集体控制整个劳动部门，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重建劳动部门以生产满足人类所需的消费品同时允许在生产过程中发展人类的潜能；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延长自由时间；使其在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获得创造力、自主性与个性的个人教育。<sup>③</sup>

[47]

从马尔库塞的这个观点来看，“自由王国”才可能在工作过程中，在履行社会必要劳动的过程中出现。到那时，技术设备才可以用来创造一种新的社会、自然环境，人类在那时才可以拥有他们自己的城市、他们自己的房子、他们自己安宁和喜悦的空间，他们才可以获得自由，才可以学着如何与他人自由地生活在一起。只有创建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环境（这在技术的能力范围内，同时又超越了控制技术的既得利益的能力），“美”、“创造性”和“共同体”等词才能指定有意义的目标；创建本身才可能确实是非异化的劳动。<sup>④</sup>

20 世纪 60 年代末，正是这些反思引发了马尔库塞对马克思《资本论》

① 参见《走向社会批判理论》中的《伟大社会中的个人》一文。

② 后来，马尔库塞的朋友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想致力于研究“政治时间”，他认为，新技术可以减少异化的产业劳动，创造新的经济与社会自由。参见 The new edition of Andre Gorz,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Ec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3。

③ 转引自 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 326。

④ Ibid.

第3卷的观念——即“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sup>①</sup>——的批判。马尔库塞此时认为，马克思对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的划分集中体现了人类在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生存的区别，体现了理性、合理性与欢愉、快乐、满足之间的区别，也体现了异化劳动与非异化劳动之间的区别。依据这种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观念，无论工作日如何缩减，必然王国仍旧是异化的王国。另外，这个观念似乎还意味着，自由的人类活动本质上不同于社会必要劳动，并且必须保持这种本质上的不同。<sup>②</sup>

马尔库塞当时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还有另一种观念，即断定自由与创造性活动在必要劳动领域是可能的，因此克服了《资本论》第3卷中自由的创造性活动与社会必要劳动之间的对立。关于“这种观念”，马尔库塞写道：

[48] [它]对全自动化的环境做了设想，在这里，直接生产者可以真正实现与物质生产过程的“分离”，就他可以摆弄和试用技术材料、机器及其生产加工的物件的可能性而言，他变成了一个自由的“主体”。但据我所知，这一极其超前的关于自由社会的观点很显然被马克思本人抛弃了，在《资本论》及后期著作中再也没有出现过。<sup>③</sup>

通过彻底考察“非异化劳动”这个概念的影响，马尔库塞重新对社会主义观念做了思考，对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更尖锐的批判。在他的作品中，马尔库塞自始至终都反对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盲目崇拜以牺牲掉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与人的潜能为代价而任由生产力肆无忌惮发展的倾向。他既支持新技术，同时又反对当前技术在没有彻底重建劳动过程与技术部门的情

① 参见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3,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s a Whol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d., chap. 48.

② Marcuse, "The Realm of Freedom," op. cit., p. 24.

③ Marcuse, "The Realm of Freedom," op. cit.

况下发展。<sup>①</sup>在此，马尔库塞对现存的社会主义既采纳资本主义的技术（流水线和福特主义、核能和武器等），又接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泰勒主义、劳动分层与劳动等级、工资级差等）的倾向提出了批评。相比之下，解放的社会主义需要全新的制度、生产关系、技术和劳动部门。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将使傅立叶所设想的那种非异化劳动、爱欲关系与和谐公社成为可能。<sup>②</sup>按照该观念，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新的人类生存方式”，以此看来，“自我决断”与自由将最终成为大部分人很现实的可能，“这涉及对新的生存理论的看法，事实上，它不仅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生存方式：对自由的迫切需求（a vital need for freedom）与自由迫切的需求（the vital needs of freedom）的形成和发展”<sup>③</sup>。在这个社会中的人类将拥有“不同的感受性和意识，无论男女都将使用一种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手势，听从不同的冲动，他们还将形成一种应对残忍、野蛮和丑恶的本能的屏障”<sup>④</sup>。因此，为了形成这样的社会主义，必须涌现和培养一种从阶级社会侵略性与压抑性的需求、渴望和态度中解放出来的新型的人类，他们团结一致并凭借自身的主动性创造自己的环境、自己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和自己的“财产”。<sup>⑤</sup>需求与价值的这种革命将有助于克服马尔库塞理论中的一个在《单向度的人》中清楚地表达了出来、不断困扰他的主要的困境，即“被管理的个人如何能够不仅从他们的主人那里，而且从他们自身那里解放出来？因为被管理的个人已经把他们受到的残害内化到他们自己的自由与满足之中……如何能打破（哪怕是设想一下）这种恶性循环呢？”<sup>⑥</sup>

[49]

为了冲破这种恶性循环，个人必须改变其现在的需求和意识，形成新的

① 关于马尔库塞的新技术概念，参见凯尔纳在《马尔库塞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中的单向度的人及其讨论（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pp.330ff）。

② *EL*, pp.21-22.

③ *5L*, p. 65.

④ *EL*, p. 21.

⑤ Marcuse, "The Realm of Freedom," op. cit.

⑥ *ODM*, pp.250-251.

需求和意识，以便为社会转变创造必要的条件。<sup>①</sup> 在 20 世纪 70 年代，马尔库塞认为，解放的需求正在现代社会慢慢成熟。那些批判马尔库塞是所谓的极端的乌托邦主义——因为向往另一个世界而整个地拒绝这个世界——的人都没有注意到，在他 20 世纪 70 年代的著作中，马尔库塞并没有推动当代历史状况、需求结构与他提出的新人类、解放的社会彻底决裂。纵观 20 世纪 70 年代，马尔库塞详细说明了可以初步产生激进社会变革的社会条件，评价了可以导致激进结构变革的斗争。此外，他一直都在不断地对新劳动形式与组织、新技术、新制度、新文化、新价值和人类所要创造的新型社会——将减少现存社会所拥有的那些令人厌恶的特征，而这些特征一直以来都是马尔库塞批判的目标——进行思考。尽管马尔库塞从未系统地阐发这些观点，但却有很多迹象遍布于他整个后期的著作，比如，个人和社会的哪种转变可以形成新的需求，把个人从马尔库塞所谓的“压抑”或“虚假需求”中解放出来，并创造一种质上不同的社会类型和生活方式。另外，马尔库塞一直在不断地分析新的支配和权力形式，而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讨论马尔库塞的观点是如何帮助我们阐明在当代新自由主义社会中建构主体性与社会控制的方式的。

### 马尔库塞与新自由主义的主体化

在马尔库塞创作的后期，即他激进主义的后期（1969—1979 年），他作品中一个最一贯的主题，就是从理论上阐明使一种新的人类文化和生物学依据可以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涌现出来的物质基础。这期间，马尔库塞不断地提到未被整合的、边缘化的斗争场所的革命潜能——已经在与资本主义、帝国的支配和控制体系做斗争的各式各样的团体中成为现实。对马尔库塞来说，以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培养新人类的可能性需要从已被整合的工

---

<sup>①</sup> EL, p. 67.

人阶级的外部开始（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因为他认为，美国的工会和庞大的消费群体大部分都受资本主义精神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他认为，激进的学生团体，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美洲印第安人及美国其他边缘化的种族和性别团体的解放运动，“第三世界”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是最有潜力来创造革命的主体形式和融入一种激进主义、“大拒绝”的生活方式的代表。对马尔库塞而言，各种与这些团体密切相关的解放运动暗示着社会生活的替代形式已经开始，因为它们多方面积累起来的反抗与运动的实践正在主动地质疑和拒绝那些支持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剥削其他人而不是使用资本来改善一些人的生活的价值。在马尔库塞开始诊断美国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新自由主义早期阶段开始变得明显起来的新的控制与支配形式的时候，他警告说：“为了反对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左派正在打一场硬仗，但它自身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而走向了分裂。”不过，马尔库塞在这期间还是坚持认为，在政治上与新兴的全球法西斯主义模式的对抗依然保留着革命的潜能。对马尔库塞来说，“它的主要武器仍然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实施政治教育，即反向教育，使人们意识到用压抑来维持现存社会已不再是必需，使人们意识到各种压抑应该被废除而不是被其他的支配制度取代，但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sup>①</sup>。

[50]

鉴于我们完全成熟的新自由主义历史时期压迫与剥削竟到了指数式增长的程度，马尔库塞倡导一种反向教育以对抗“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显得尤为重要。易言之，在通过能够更深入地干预人与自然的生命过程的新的生物技术实践而实施高新技术支配的社会和文化中，反向教育策略的发展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因为它可以在主体层面（马尔库塞称之为生物或本能层面）抵制对生命的毁损和资本化。

比如，请考虑一下自马尔库塞 1979 年去世以来生物技术与生物医学的

<sup>①</sup> 1976 年 5 月 18 日，这篇文章寄给了皮埃尔·多梅尼克 (Pierre Domerque)，发表在了《世界外交论衡》(Le Monde Diplomatique) 上，而我们在本卷也把该文刊发了出来，参见 pp.358ff。

进步到底是如何创造了更复杂、更精密的控制人与自然生命机能的方法的。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第五卷的“引言”中所讲的那样，马尔库塞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批判理论早已指出新技术在哪些方面带有保守的教育学性质。正是工作场所中、起居室中的技术和屏幕上的图像教导人们压抑欲望并使其升华的，而这些欲望继而通过在相对富裕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更进一步的消费及其“不负众望”的能力被进一步异化了。简言之，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之前的绝大多数作品中所讲的那样，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最阴险的管理生产和消费危机的方式之一，就是培养内化了的控制形式，而该形式主要通过以支配与优化单向度的生活——现在称为“扁平世界”（Friedman, 2005）也许更合适——为旨归的资本主义技术来训练。因此，在新自由主义的“扁平世界”的背景下，主体在一个彻底市场化的社会中为了在学校和工作场所获得最优的表现不得不（借助于利他林和阿得拉等药物）调整他们的认知能力，为了评估胎儿的基因健康状况甚至为了选择更喜欢的性别而侵犯女性的身体，通过人工调节性欲与性能力激起人的性冲动，甚至参与对生命形态（转基因的动物和植物）这一新商品的创造和消费。马尔库塞呼吁我们不要通过现在所谓的“生物资本主义”时代所创造的需求来进行自我教育，而在人们开始思考新技术对身体、整个人口以及渐渐地对生物圈所取得的深度控制时，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

新的技术与科学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为更大程度上对人类与非人类实施生物控制创造物质条件的，这实际上也是马尔库塞作品关切的主要问题。在他的《反革命和造反》这部在美国新自由主义改革酝酿期间完成的重要作品中，马尔库塞以惊人的准确性说明了这一点：

当今社会，自然受到了更为高效的控制，而它本身转而也变成了控制人的另一个维度，成了社会及其力量延伸出来的臂膀。商业化的自然、受污染的自然、军事化的自然不仅在生态意义上，而且在生存意义上减少了人的生活环境。它阻碍了爱欲对人的生活环境的贯注（和改



造),它使人无法在自然中发现自己,超越异化的此岸;同样,它还使人无法认识到自然就是独立的主体——与人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人类宇宙中的主体。<sup>①</sup>

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尔库塞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人与自然的支配息息相关;通过科学与技术支配自然的过程,人们了解到,为了使他们在竞争性的市场社会中成为更有效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支配他们内在的心理(和现如今的基因)维度是一种自然的、事实上也令人满意的、可以遵循的绩效原则。

事实上,马尔库塞对人类的生产能力是如何在资本主义支配体系中被越来越当成了目标的集中讨论,也许比20世纪的任何一位理论家都更指向当前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主体化:“自我关照的伦理”到来了,即通过接受那些把重点放在将市场逻辑扩展至分子层面的生命的机构和法人行动者所创造的理性与实践的暗示来指导个体的决策。<sup>②</sup>在我们看来,马尔库塞20世纪60年代末以前最突出的研究领域之一考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社会生活是如何依照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的市场社会——要求人们把自身当成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富有创业精神的个体——被重组的。在当今时代,该问题还包括分析新的生物技术与生化治疗在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中是如何把拥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变成可优化的生物有机体的。

[52]

因此,“技术理性”,这个在他大部分作品中曾有过分析的概念,在当代

① Herbert Marcuse,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p. 60.

② 关于新自由主义社会中的关心自己的伦理,参见 Michel Foucault,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82–1983*, New York: Picador, 2011; Nikolas Rose, *Governing the Soul: The Shaping of the Private Self*,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99; *The Politics of Life Itself: Biomedicine, Power,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and Mitchell Dean, *Governmentality: Power and Rule in Modern Society*,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9。

新自由主义社会的开始阶段就已先行指出了人的主体性本身不仅在意识形态层面而且在生物层面不断地受到管制。为了强调马尔库塞研究的这个方面，即对资本主义控制体系下的主体化的关注，我们在本部分将把注意力放在两个相关的主题上，即主观主义的整合技术（technologies of subjective integration）和根据完全不同的条件重构社会生活的可能。在马尔库塞研究发达工业社会的最后十年，他一直都在研究一个问题，那就是试图确认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不同质的人类存在形象，一种无须再消耗在谋生上的生命形象，异化劳动程度降至最低，最终，出现一种新感性、新道德，从而把身体和自然当成提升生命、保护生命的力量来重新认识”的趋势。<sup>①</sup>对于晚年的马尔库塞来说，新的技术控制形式所造成的对身心控制的加剧重新修改了抵抗路线——尤其是需要阐明可以把主体性从增强了的管理与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空间和实践。

- [53] 在1967年的“解放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s of Liberation）研讨会上，以及在1969年《论解放》中，马尔库塞一直都在介绍他在创造“新人或新人类”上的理论和实践诉求。从他在《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中所做的分析开始，马尔库塞把注意力转向了从本体论层面追问自由与幸福何以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价值框架之外被重建，并变成主体新的生物学基础。对我们来说，马尔库塞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主体化问题的辨识体现了其社会批判理论最稳定的品质，即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较好地讨论资本主义控制与支配体系特定的历史进程的方法运用到了当今时代。当然，这样一种分析并不是说马尔库塞反对马克思（至少他不反对思想家本人），毋宁说，它比马克思本人更认同主体性的重要性及其在演化过程中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的相关性。

从这里来看，我们认为，马尔库塞把目光转向主体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以及哪些解放的潜在在现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幸存了

<sup>①</sup> Marcuse, article in *Le Monde Diplomatique* (1976), p. 4.

下来，这其实是注意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场所中主体的形成与为了确保从工人的身体得到最优化和最大化的剩余价值所必需的各种规训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比如，在《资本论》第1卷“机器和大工业”这一著名的篇章中，马克思并没有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技术对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的影响上，尽管这是该章重要的关注点。马克思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技术进步加剧了异化劳动并因此妨害了手工业、现代制造业以及大工业时期工人富有创造性、有教育意义、充满想象力的能力，他还清楚地阐述了在工厂中已经登峰造极的人机关系中渐渐发展起来的教育学或教育维度。在该章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段落中，马克思指出，工厂中技术的教育能力变成了控制和形塑“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求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sup>①</sup>的能力。换言之，马克思认为，与国家密切合作的资产阶级（在该章，通过工厂立法）最终需要的是从整个欧洲工人人口中得到一种特定类型的主体性。

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工厂主和投资者，与英国议员一样，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化过程已经认识到对直接干预工人人口主体的形成将带来更多的可榨取的剩余价值。从这层意义上说，为了强化积累的过程（并最终从人的劳动力榨取最大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必须把手伸至工厂之外。马克思所指认的资产阶级用以规范工人阶级群体的身心以适应工厂技术的节奏与运转的方式，是通过（工厂以外）学校的职业教育课程实现的。提到资产阶级需要通过工厂技术创造更具价值的主体性时，马克思写道：

[54]

如果说工厂立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

<sup>①</sup>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trans. Ben Fowkes, New York: Penguin, 1990, p. 618.

位置。<sup>①</sup>

从马克思的立场来看，职业和公立学校把重点放在了锻炼四肢、提高耐力，以及通常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人的劳动而训练身体上，而学校中的主体化过程就来自资产阶级增加其主要的价值来源——人的劳动力——的盲目的冲动。

[55] 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与进步辩证地包含着创造可优化的主体性以满足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必要条件，这在《资本论》第1卷第15章表现得尤为明显。工业时代大量的工厂机器，正如马克思在他对不同技术时期的历史分析所表明的那样，不仅按照性别和年龄对劳动做了划分，还通过使资本主义生产场所内的劳动习惯及其惩戒机制标准化和集中化，破坏了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换言之，为了满足机器的需要，把马克思所分析的工业资本时代的工厂的主体（工人）的生命力移交给资本的生产力，而不是交由他们自主地发展成为多维的存在，工人必须具备遵守纪律、受过训练的主体性。然而，无论是在他的巨著中，还是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总体而言，马克思都只是刚刚开始触及从长远意义上对个体劳动者及更多人口的主体性造成的生理与心理影响。我们认为，马尔库塞在其创作的后半阶段向主体维度的转向以某种对我们当今时代极为重要、相关的方式重新占有和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遗产。这也证明了马尔库塞既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那种认为马克思的分析与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问题无关的理论家。毋宁说，马尔库塞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与哲思方式。这意味着，马尔库塞不仅要理解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超越其局限性的要求中发展起来的不断进化的适应性，同时还要辨识社会中拥有革命潜能的场所。

马尔库塞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了晚期资本主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

<sup>①</sup>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p. 619.

他对革命主体地位的分析上。正如马克思对资本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和发展的同时通过它巨大的内在矛盾也创造了自我否定的力量，即无产阶级。马尔库塞不同于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同于他同时代的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并没有首先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教条地考虑成资本主义社会唯一的革命团体，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就是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绘制和识别资本内在规律的轮廓。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应认为，马尔库塞把马克思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的辩证分析的革命成果（无产阶级）嫁接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特别是它向新自由资本主义形式过渡的早期阶段，毋宁说，他在这个阶段形成了特定的关于革命主体地位的历史理论。

对马尔库塞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要理解资本主义本身从何种意义来讲是一个随它的内在局限和障碍（比如，工业时期的工作日法）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历史的、动态的过程。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马尔库塞就看到了资本主义随着工会、民权运动和政府福利项目以及保护环境的立法（比如，环境保护局的建立）所取得的成果变化而变化。在一份从未发表过的 1975 年的演讲稿中，马尔库塞对美国初期日益壮大的新自由主义运动做了一次引人入胜的分析。这份来自德国法兰克福马尔库塞档案馆的手稿，标题是《为何要继续谈社会主义》，它强有力地表明，马尔库塞早已对现如今在美国乃至全球刚起步的各种新自由主义的重组计划的整体特征做了概述。<sup>①</sup> 以尼克松遭弹劾之后的福特政府的政策为例，马尔库塞准确地预测到了在当前历史时期已完全规范化了的经济、社会政策：

福特计划，即帮助富人并迫使穷人更努力地工作，就是对新资本主义的逻辑回答。举例来说，关于减免税收，财政部长西蒙认为，“货币

[56]

<sup>①</sup> 在本卷，我们把这篇文章收录了进来，而赖茨把该文的语境极好地呈现了出来；可参见文本附带的注释，第 146 页。

必须流向年收入在两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因为他们是最大的买家”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22 (1975)]；福特也讲道，惩罚“中等收入的美国人”将是一个错误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23 (1975)]。而此时享有盛誉的补救措施是，结束不断激增的非营利性服务业，比如，“食品券、社会保障金和联邦政府退休金” (Ibid.)，削减教育经费（不减免税收）。为什么呢？为了扭转“企业利润的下滑”。因为“政府害怕转向社会主义” [Budget Director of Los Angeles, Ash,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26 (1975)]。哪些企业“下滑”？同一份报纸还公布了埃克森石油公司、印第安纳与加利福尼亚的标准石油公司 (Stand. Indiana and California)、德士古公司 (Texaco)、美孚石油公司 (Mobil) 以及钢铁工业、银行业等创纪录的利润。其他企业还将继续依赖于巨大的政府补贴 [洛克希德公司 (Lockheed)、泛美航空公司 (PanAm) 等] ——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该计划不会有所助益，因为繁荣的崩溃就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它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呢？<sup>①</sup>

1975年的社会、经济政策目的在于重新巩固精英企业阶级手中的财富，加强对穷人和有色人种的规训，以使他们“更努力地工作”，而马尔库塞在该政策上补画的这幅图景却表明，来源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对人口的压抑与控制”正在不断加剧。同时，通过重新反思“公司资本主义的集权统治”<sup>②</sup>下的马克思的革命主体，马尔库塞还看到，资本主义生机勃勃的新自由主义阶段将为社会控制和规训提供更强有力的条件。在马尔库塞撰写的一篇题为《无产阶级的物化》的短评中，可以说，他对革命主体能够在通过公司垄断资本主义创立起来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产生的方式和地点做了最清

① 参见第149—150页。

② 参见第542页。

晰的解释。(参见第 540 页)

一方面,正如我们在下一节将更加详细地讨论的那样,马尔库塞并没有把无产阶级看成是静态的、广泛适用的盛放革命主体的架子。相反,他持有的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不拒绝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人阶级仍然是资本的‘本体论上的’敌手,是潜在的革命主体;但是,它是极度扩大了工人阶级,不再直接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相对应”<sup>①</sup>。因此,马尔库塞在理论上认为“工人阶级”是一个多面范畴,而该范畴取决于持续进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在它向高新技术的、以知识为基础的体系转变时。从马尔库塞对“扩大了工人阶级”的理解来看,除了传统的工人阶级的劳动形式之外,他把工程师、技术专家、科学家、专家和白领阶层也纳入进来,他们是拥有更多特权的团体,但从事的却仍然是异化形式的工作,因为他们同样没有控制生产资料。借由巴罗对剩余意识的研究,马尔库塞认为,由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计算机处理、医药、食品生产、军事技术等新兴产业中所需要的知识和教育的普及,扩充了的工人阶级的顶层与底层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

[57]

处在新自由主义成长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加快劳动的“机械化和智能化”,因此,马尔库塞认为,“越来越多的综合能力、技能、知识”以有可能为革命变革打下基础的方式不断积累了起来。此外,马尔库塞重新复苏了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革命主体,而这与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奈格里和哈特等对全球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非物质劳动(以知识与符号交流为基础的劳动和情感性行为)的重要性做了富有洞察的分析的当代理论家有着惊人的相似。<sup>②</sup>正如这些理论家所呼吁的在形式“多样的”

① 参见第 540 页。

② Mario Lazzarato, “Immaterial Labor,” in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edited by Michael Hardt and Paolo Virno,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133–147;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资本主义力量的全球网络中重新思考革命与抵抗那样，马尔库塞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这段时期就已经从理论上对典型的革命主体这个多面的概念做了阐释。类似于哈特和奈格里的建议，即非物质的劳动形式在新自由主义的控制技术下构成了主体性得以形成的基础，马尔库塞认为：

剩余意识却试图成为一种物质力量，虽然它不像阶级意识那样根本，但却作为一种对立意识，它会在新的（或者重新占有的）行为模式中表达自身，不过，这种行为模式并不来源于任何特定的阶级，而是来源于依赖性人群中的团体所形成的不稳固的、短暂的“联盟”。这些行为包括“市民请愿”（例如，有组织地抗议核能设施、抗议资本主义城市翻新），反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斗争，学生抗议等。同时，工人的倡议超越了纯粹经济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而要求对工作进行自我组织（工人自治）。<sup>①</sup>

[58] 在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马尔库塞来说，在高度受控制、受压抑的资本主义社会何以可能产生革命主体，这个问题取决于（1）无产阶级与劳动范畴的扩展和（2）各种反抗新的压抑形态和控制技术的集体性场所的创建。正如马克思在他最初系统提出的有关 18、19 世纪创立的工业无产阶级的理论中所讲的那样，马尔库塞也认识到了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技术动力不仅包括为了搜寻新的增加剩余价值的途径而不断地改变生产方式，还包括改变工人的主体性，尤其是能够创造新的知识、技术形式——可以被改造用来满足革命需要而不是压抑需要——的主体性。换句话说，根据马尔库塞在理解新自由主义社会新的社会控制和抵抗形式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资本家在工业时代无意间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所准备的集中化和技术进步的绞索有必要以更具渗透性、更为灵活的方式进行改造。

---

<sup>①</sup> 参见第 542 页。



从马尔库塞关于主体对早期新自由主义社会革命生活的态度所做的历史唯物主义再思考来看，我们注意到，主观主义的整合技术拥有明显的辩证特质。现如今，大众媒体、信息技术和基因食品行业，它们能够在更深的层次（基因）上控制“依赖性人群”，同时正如马尔库塞早先就已意识到的那样，它们也是更为分散的、多样的革命力量形式和否定的场所。因此，革命主体在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阶段并不一定非要与工厂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由于技术在支配工人生命和自然方面的扩张，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阶段创建了它特有的、潜在独立的、不断产生革命主体的抵抗场所。比如，新自由主义政策强迫人们接受农业产业化的政策和实践，并且允许把生物材料和地方性的乡土知识转移至资本主义流通环节中的“生物剽窃”行为，而印度和拉丁美洲的食品独立运动就成了对该政策的有力回击。此外，在土耳其、希腊、西班牙、美国（“占领运动”）、墨西哥、意大利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各式各样的反紧缩运动已经站了起来，开始反抗那些违背发展中国家意愿的强化了的管理措施，开始反抗那些依靠越来越少的企业和军队精英寡头来反对扩充了的工人阶级（移民、教育工作者、农民、难民、性工作者、青年人等等）的发达国家，而这带来了大量的但却分散的革命抵抗形式，也因此带来了主体得以形成的空间。在本卷收录进来的一封致激进德国学生鲁迪·杜切克（Rudi Dutschke）的信中，马尔库塞就革命主体在当代反主流文化空间中何以可能产生举了一个例子：公社。在马尔库塞就反抗资本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东南亚的帝国主义战争等其他压迫形式的政治团体所面对的挑战发表的演讲中，他指出，公社是形成革命主体的潜在场所，很有借鉴的必要，尽管它们有局限性。马尔库塞写道：

[59]

虽然公社仍然拥有强大的潜能，但它们却只有保持住与“外部”政治运动的联系才能取得成果。从这层意义上来讲，政治化决不意味着在公社中持续不断地研究马克思和毛泽东，毋宁说，这些公社实际上、尽管只是暂时地变成了生产单位，它们不仅会改造个人事务，还会改造公

共事业。学习如何务农甚至少量的工业劳动，学习如何操作计算机，熟悉技术，不是为了取得空想的行业政权和技艺，而是为了将来能够进入社会的制造流程，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在社会主义生产的过渡时期工作。通过这些，公社可以带来现实社会主义，并对它进行试运行。以这种方式，你可以将个人生活（以及个人关系）与特定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公社必须着眼于它即将来临的扬弃（Aufhebung）[向更高的形式转变]来组织。只有个人的解放，而不是陷入自我放纵，才可以凭借自律和纪律指导自身通往共同的善。但是，尽管以完整的认识来做这一切，我们的努力也仅仅是一种准备，而社会过程还是会令人厌恶地长久持续下去。<sup>①</sup>

从马尔库塞对主体化自主发展的场所的革命潜能的描述，比如，对公社的描述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新自由主义的情境下何以可能实现反向教育。对于马尔库塞所指认的反向教育的一些重要特征，我们可以从这段话推测出来。第一，公社是主体化的场所，它不能作为逃避现实的避难所，也不能作为对“外部世界”和对生活持续不断的冲击视而不见的政治工程。第二，从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劳动的角度来说，人类生产力不应由教条的原则来规定，而应由以既不强调个人主义也不强调狂热的团体观念的方式共同地、试验性地集体生活在一起的模式来规定。对马尔库塞来说，这样一种试验性的、开放的劳动形式尤为强调，建立在把实践与土地、技术和习惯养成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绩效原则之外重新结合起来的基础上的“公共事业”。最后，对马尔库塞来说，像公社这样的主体化自主发展的空间是生成变化的场所，是人类社会，它可以塑造和展现外在于（但也内在于）资本主义支配和控制体系的替代性、多样化的生活样式。在上述的场所（对马尔库塞来说，它保留了革命主体的潜能）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如何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反

<sup>①</sup> 参见第461页。

向教育，不仅涉及摧毁资本主义的整合技术，还涉及创造不同的主体空间，以创建一种新的、虽然短暂的辩证统一。现在和未来的挑战就是要识别马尔库塞在这里所描述的、可以对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体实施反向教育的空间。随着主观主义的（非人的）整合技术现如今在基因层面不断发挥效力，重建集体生活的场所——可以拒绝自由主义社会并形成替代性的方案——确实出现了新的挑战。不过，马尔库塞系统提出的有关初期新自由主义主体化的理论为当前反资本、反种族主义、男女平等和生态运动——已经形成了极其独特、多样的用以实施反向教育的场所——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指导。

## 马尔库塞、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历史

尽管马尔库塞由于他的“修正主义”受到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抨击，但他却始终没有放弃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主体”的探索。他从未放弃马克思的革命问题，但回顾一下，我们就会发现 20 世纪 60 年代末马尔库塞的解释是有问题的，而其根源是没有追问马克思更根本的概念，比如，被设想为享有特权的革命推动者的“无产阶级”概念、“革命主体”概念和被设想为彻底变革和瓦解现有社会以夺取国家权力建立革命政府的“革命”概念。

问题在于，马克思的模式已经不适合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变革进程。尽管马尔库塞在扩展马克思的话语上，在使它的范畴向新的历史内容开放上，在拥护进步的社会力量上，都值得称道，但最终他的社会变革观念却深深地陷入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而这迫使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更为彻底地修正了他对社会变革、工人阶级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看法。<sup>①</sup>

<sup>①</sup> 参见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他认为，在历史和政治条件暴露了马克思理论的局限性时，马尔库塞以其毕生精力对其各式各样的危机做了回应。当马尔库塞注意到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涌现出了新的革命力量和新的社会运动时，他相应地修正了他的社会变革理论。

[61] 马尔库塞对正统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批判在他与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的谈话——以《组织问题与革命的主体》为题发表在了 1970 年的政治期刊《指南》(Kursbuch) 上, 该文也收入了《新左派与 20 世纪 60 年代》——中表现得很明显。在马尔库塞激进地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并阐发新的革命观点的时候, 恩岑斯贝格却不断地以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资本主义与革命的看法来质疑马尔库塞。马尔库塞不断地重申, 产业工人阶级现如今已经不再等同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 后者只是一个源于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的特定的历史概念, 他认为, 贫困化 (immizeration) 范畴已经不再是描述革命主体的重要标准。毋宁说, 潜在的革命力量的标志是压抑; 那些没有与现行秩序完全融为一体的人, 那些没有认同现行秩序的人, 有可能会发展出为激进社会变革提供主观条件的需求或意识。马尔库塞坚持认为, 这些需求不一定来源于贫困。它们有可能源于工作中的压迫, 性别、性或种族压迫, 也有可能仅仅源于压抑性社会——其生活方式已经无法忍受——的生活体验。这种潜在的激进的反对力量并不仅仅甚至并不主要地来源于产业工人阶级, 它有可能跨越阶级, 在知识分子、学生、失业者、少数民族等群体中出现。

马尔库塞坚持认为, 对马克思来说, “无产阶级”概念既是一个社会经济范畴, 也是一个政治范畴。<sup>①</sup> 作为一个社会概念, 无产阶级描述的是从事

① 在杜娜叶夫斯卡娅 1958 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 从 1776 年到今天》(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2000) 的“序言”中, 马尔库塞写道: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是‘自在的 (an sich) 革命阶级’, 但这个概念指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团体, 即从事物质生产的雇佣劳动者——它是一个真正辩证的概念, 同时也是一个经济、政治和哲学范畴。因此, 它包括三个主要因素——(1) 具有‘自由’资本主义特征的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 (2) 由该生产方式带来的生存和政治条件; (3) 在该形势下发展起来的政治意识。这些因素中的哪怕任何一个在历史上发生了丝毫的改变都需要理论做出彻底的修正。如果不做这样的修正, 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看上去就会既不适用于西方大多数的劳动阶级, 也不适用于共产主义势力范围内的劳动阶级。”(p. 12) 确切地说, 马尔库塞在他最后的十几年一直都关注这个问题。

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阶级，就是卖给资本的雇佣劳动，它既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又与对生产行为的控制“相异化”，同时通过它生产的剩余价值以及随之发生的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占有，遭到了剥削。作为最受异化、最受剥削的阶级，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就是“革命阶级”，它的生活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的否定，他们无法容忍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造就了推翻现有社会、创造新社会的需求。因此，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是爆炸性的政治力量，而且马克思坚信，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在工厂、工会和政党中的组织会使其变成主要的革命力量。此外，马克思还坚信，它是普遍存在的阶级，代表着以更人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取代资本主义这种一般需求。

[62]

马尔库塞再三强调，无产阶级对马克思来说是潜在的革命主体，不仅是因为它没有享受到资产阶级的需求，还因为它的需求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如果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和需求之外，那么它就有能力造就新的社会，因为它没有受到旧社会的需求与价值的影响。可是，如果产业工人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需求与价值的影响，如果他们与其他“底层人口”有相同的需求与价值，那么这样的工人就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主体”。

因此，对马克思而言，“无产阶级”并不简单地等同于“雇佣劳动”或“工人阶级”本身，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指称革命主体的政治概念。在马尔库塞喜欢引用的《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中，马克思宣称，“无产阶级要么是革命者，要么什么都不是”<sup>①</sup>。马尔库塞坚持认为，如今的产业工人阶级已不再激进地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也就不再是革命阶级了。他声称，现如今受压抑和贫困困扰的已不单单是无产阶级，事实上，相比少数民族成员、妇女、服务人员、文书、农业工人以及失业者和无业者，无产阶级更具组织性，薪酬更高，经济状况更好。既然如此，那么产业工人阶级也就不再有推翻现行秩序的“激进的需求”，从而也就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的无产

<sup>①</sup> Karl Marx, letter to Lassalle, 转引自马尔库塞 1972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

阶级。因此，马尔库塞拒绝各种把产业无产阶级当成首选的革命推动者并且盲目迷恋阶级概念的理论。马尔库塞在一次与哈贝马斯的谈话中讲道：

[63] 鉴于无产阶级与现有形势已融为一体，已经再也无法正确地处理该形势，因而，我们必须更多地思考我们的构想。从现如今的晚期资本主义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尽管迄今为止它仍然存在，但却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少数。工人阶级在意识和实践方面早已在很大程度上被资产阶级化。因此，我们不能将物化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直接照搬硬套地应用于当前的形势。工人阶级的范围已经扩大，现如今占到了人口的90%，把绝大多数的白领工人、服务行业的人员——总之，被马克思称为生产工人的所有人——都包括了进来，而这样的工人阶级仍然是革命潜在的推动者或主体；但是，对比马克思，革命本身将是一项完全不同的工程。我们将要面对的是对最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根本无关紧要的群体，比如，那些通过学生、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妇女（她们不是占少数而是占多数）、市民的倡议而组织起来的久负盛名的边缘群体。它们并不是替代者，不能成为新的革命主体。而是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它们是先行者，只是起到催化剂的作用。<sup>①</sup>

这种形势使先前的革命理论失去了效力，而先前的理论曾设想通过无产阶级暴动发动一场激进的、暴力的动乱，以便战胜国家权力，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回应恩岑斯贝格时，马尔库塞辩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已经不再是一个恰当的政治概念：

如果无产阶级像马克思讲的那样称谓的是“工厂工人”，那么该表述就是完全不适当的。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大多数人

<sup>①</sup> Marcuse and Habermas, "Theory and Politics," p. 150.

对少数人的专政，但人们很容易就会忘掉这一点。从这层意义上说，“无产阶级”在发达工业国家还是绝大多数吗？现如今唯独它们受剥削吗？<sup>①</sup>

对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即享有特权的革命主体概念，马尔库塞也许是最执着、最不屈的批评家。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将英国、法国和德国工人阶级的特征融入到了准黑格尔式的革命主体之中，但新时代的历史学家却一直以来对此概念表示质疑。比如，蒂莫西·麦卡锡（Timothy McCarthy）就曾声称，1848年革命、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欧洲的历史状况、巴黎公社，以及随后工人运动的发展就对早期马克思的“革命无产阶级”概念提出了质疑。<sup>②</sup>无产阶级在执行其革命使命上的失败，以及20世纪工人阶级发生了变化的阶级构成，促使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撰写了一部广受争议的著作，即《告别无产阶级》，该书——本着马尔库塞的精神——极力倡导要对工人阶级做出新的理解，对社会变革做出新的认识。<sup>③</sup> 尽管引起了

[64]

许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愤怒，但通过马尔库塞不断地质问马克思理论，他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却也因此迫使那些有志于激进社会变革的人开始起来反思发达资本主义的阶级构成的动态变化和社会变革。

尽管马尔库塞没有否定对抗政治，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都没有否定暴力，但是总体来说他晚年还是更为提倡能够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渐进主义和民主的联盟政治。马尔库塞仍然坚持他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立场，他认为，一种解放和更好的生活的愿景对激发和引导当代进步的社会变革来说是必要的。现在，概括地讲，马尔库塞在20世纪70年代有了升华，他的“革命浪

① Marcuse and Habermas, "Theory and Politics," p. 150.

② 马尔库塞的朋友海因茨·卢巴兹（Heinz Lubasz）认为：“马克思并不是发现而是发明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参见“Marx's Concep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Proletariat,” *Praxis*, 5, 12 (1969) p. 288。另参见 Timothy McCarthy, *Marx and the Proletariat*,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8。

③ 参见 Andre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London: Pluto Press, 2001。

漫主义”没有变成他以及其他人在 60 年代所预期的革命动荡的景象，而是变成了解放社会和人性的理论。

对马尔库塞来说，自德国革命失败之后，西班牙公社失败、法西斯主义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主义日益壮大以及新左派失败，几十年的严重幻灭造就了“革命现实主义”，而这使马尔库塞对革命有了新的理解，也使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及他自己先前持有的观点做了批判。马尔库塞对新视角、新理念很开放，并且随时准备根据新的经验来修正自身的理论，这表明他的思想有着非凡的灵活性和开放性，但这一点却被严重低估了，原因是许多批评家都把他视为“单向度的悲观主义”的牺牲品。但并非如此，马尔库塞极为灵活，他一直都很愿意接受新理念、新视角，直至去世。因此，我们相信，马尔库塞会非常同情 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和从塔里尔广场到华尔街乃至世界各地爆发的“占领运动”。

2011 年，这一年与 1968 年的暴动气氛极为相似，这一年马尔库塞的理念和影响也得到了证明，我们看到了北非爆发的阿拉伯暴动，结果推翻了独裁者，而首先推翻的是突尼斯和埃及的独裁者，随后经过激烈的内战之后利比亚的独裁者也被推翻了。<sup>①</sup> 令人难忘的是，埃及和突尼斯人民不仅推翻了腐败的独裁者，而且以非暴力示威的方式表达了他们支持变革并且渴望民主、自由、社会正义和尊严的意志。正如齐泽克始终坚持认为的那样，因为联合起来的示威者呼唤民主和自由，要求社会正义，所以埃及的（也可以说突尼斯的）革命已经变得世俗化。<sup>②</sup>

[65]

① 参见 Douglas Kellner, *Media Spectacle and Insurrection, 2011: From the Arab Uprisings to Occupy Everywhere!*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Bloomsbury, 2012。

② 参见 Slavoj Žižek, “For Egypt, this is the miracle of Tahrir Square. There is no room for compromise. Either the entire Mubarak edifice falls, or the uprising is betrayed,” *Guardian*, 10 February 2011 at <http://www.guardian.co.uk/global/2011/feb/10/egypt-miracle-tahrir-square/print> (2011 年 3 月 5 日登录)。另参见 Olivier Roy, “This is not an Islamic revolution,” *New Statesman*, February 15, 2011 at <http://www.newstatesman.com/religion/2011/02/egypt-arab-tunisia-islamic> (2011 年 9 月 12 日登录)。



这些暴动不仅证实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人民权力”运动，也证实了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所阐发的“诸众”夺取权力的模式。正如哈特与奈格里在一篇广为流传的讨论阿拉伯暴动的文章中所讲的那样：

对于那些目击席卷北非和中东的暴动的观察者来说，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不能将暴动过多地解读为过去的重复，而是应该解读为开启了新的政治可能性的原创的试验，它们不仅超越了宗教，而且还支持自由和民主。实际上，我们希望的是，通过这一周期的斗争，阿拉伯世界在未来的十年变成最近的包括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玻利维亚在内的拉丁美洲，也即是说，变成一个在强大的社会运动与进步的政府之间进行政治试验的实验室。<sup>①</sup>

在这里，对于那些激发社会运动在民主竞选中赢得国家权力的拉丁美洲魅力型政党领袖的作用，哈特与奈格里没有提到。在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的纪录片《国境之南》（2010 年）中，他把焦点放在了拉丁美洲的几位总统身上，因为是他们促使运动创建了左翼和中左翼的政权。然而，斯通可以说是夸大了他在电影中访谈的拉丁美洲魅力型领袖的作用，贬低了社会运动的作用，其实很可能是，通过把魅力型领袖与密切联系社会运动的进步政党联合起来，拉丁美洲的左翼早已逐渐形成一种进步主义的施政纲领。

依据在缺少中央权威或领袖的非层级的根茎网络中得到清晰表达的革命欲望，哈特与奈格里及其追随者对暴动做了描述。与此相反，齐泽克（2011 年）却呼吁拥有特定方案和目标的强大的政治运动，他声称，抗议运动的自组织性“显然不足以实现对社会生活的重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

<sup>①</sup>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Arabs are democracy's new pioneers. The leaderless Middle East uprisings can inspire freedom movements as Latin America did before," *The Guardian*, 24 February 2011 at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1/feb/24/arabs-democracy-latin-america>.

[66] 能够迅速做出决断并以完全必要的严厉来实施该决断的强有力的组织”<sup>①</sup>。因此，问题就从埃及与突尼斯的暴动中浮现了出来，即缺乏魅力型领袖与进步政党的运动和民众到底能否避免压迫性的制度和暴力，建立起真正的民主社会？然而，他们的挑战也正是创造政治领袖和政治团体，以便培育民主的制度和关系，避免形成压迫性的权力模式，避免回到旧有的独裁政府的镇压模式。

哈特与奈格里依据革命欲望和政治试验的网络描述了 2011 年的政治暴动，齐泽克却呼吁强大的政治组织和革命性的政治策略，而在调和他们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反思马尔库塞的“革命主体”概念和“革命”概念在当代的运用。像德勒兹与迦塔利、哈特与奈格里一样，马尔库塞也关注革命欲望和革命组织在激发政治暴动中的作用，但同样也强调培养批判性主体与批判性理论以便明智地把理论与实践融合起来。此外，马尔库塞从理论上说明了破坏性本能，即依据弗洛伊德的死欲描述了该本能，马尔库塞认为，它有可能产生暴力与破坏，从而危及参与狂热政治暴动的得到释放的主体，因此它是一种危险，批判性的政治主体需要时时保持警惕，以便把破坏性本能引导到解放性的行动和目标上。事实上，正如我们在 2013 年所描写的那样，在埃及、突尼斯、利比亚暴动后持续不断的暴力，以及叙利亚、巴林、也门和其他国家不断上演的暴力，它们都指向了深层次的本能性的攻击行为，而这是数百年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暴力的产物，是解放的障碍。对此，马尔库塞关注的是从理论上说明和培养新主体，而他们会寻求一种免于暴力、剥削和战争的生活。

随着反对圈禁更多生活形式的全球性运动的不断发展，比如，食品安全、土地的再公有化和自主的粮食生产运动，马尔库塞所要求的反向教育，即拒绝对生命更进一步的商品化和控制，并以“新人类”和人与自然之间非

<sup>①</sup> Slavoj Žižek, “Shoplifters of the World Unite. Slavoj Žižek on the meaning of the riot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19 August 2011 at <http://www.lrb.co.uk/2011/08/19/slavoj-zizek/shoplifters-of-the-world-unite>.

压迫性的关系取而代之，正如我们所描写的那样，也正在慢慢兴起。因此，在《马尔库塞文集》最后一卷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学到很重要的一点，即马克思主义、革命与乌托邦在马尔库塞的思想和作品中不仅是识别那些植根于历史的支配与压迫形式的概念和实践，同时也是阐释那些与新型的控制相适应的反抗形式的概念和实践。也许学着做不同的人类，即体现另一种与发达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遵守的价值不同的价值，需要从两个层面采取废除行动。首先必须从主体——甚至已经将更为残酷高效的社会的压抑、摧残生命的权力关系（种族主义、父权制、阶级以及支配自然世界）内化——本能的、无意识的（以及有意识的）层面开始，换句话说，此时主体必须废除各种各样的教育学，因为生物制药学、生物基因食品科学等强大的新兴产业正在拿这些教育学来培训个体并要求以这些教育学的观点来思考健康和身体的最佳状况。

[67]

废除行动的第二个阶段必须从反向教育开始，马尔库塞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时期，实施反向教育的方法就是重新建构、重新设想通常可以进行教与学的地方。正如马尔库塞以及后来凯尔纳在他们的作品中已表明的那样，文化机构，比如媒体和广告业，已经在社会上创建了一种终身教育，而个人正是在这个地方得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最强大的企业的指引。举例来说，制药工业，它们对“公众教育活动”（广告和营销）的预算相当于甚至高于它们对实际研发新药物的预算。<sup>①</sup> 为了满足个人参加重新培训并准备迎接 21 世纪竞争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意愿，高等院校同样把自身当成了人力投资的场所来兜售。然而，教育作为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来销售，这同样依赖于消费者，同时也教育了消费者，使他们把做好充分准备——包括花费，而从学生贷款行业来看，教育本身就是资本积累的另一个场所——以成为知识型劳动力当成了自己的责任。

① 参见 Marcia Angell, *The Truth About the Drug Companies: How They Deceive U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总而言之，马尔库塞经历了 20 世纪的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和俄国革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50 年代资本主义的稳定化和消费社会的发展，70 年代政治、文化动荡，以及它们的衰落和所谓的里根主义的兴起，稍后不久，马尔库塞于 1979 年去世。我们认为，马尔库塞的范畴可以提供一种模式，用以分析保守的反革命运动、90 年代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兴起以及资本主义的胜利。尽管 1989 年苏联与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垮台以后，许多人都预言马克思主义必将灭亡，但我们却认为，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的兴起，各式各样的资本主义危机和生态危机，以及全世界在不断扩大的对抗性运动中对它们的抵制都表明，对于分析和质疑支配形式，从理论上阐明当代反抗与解放的力量来说，马克思和马尔库塞的范畴仍然很有助益。正如我们在本“引言”中所认为的那样，在持续发酵的全球金融危机时代（从 2007—2008 年直到现在），以及从阿拉伯暴动到 2011 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个将暴动与社会动荡重新置于历史议事日程的全球暴动的时代，马尔库塞这种激进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仍然很重要。历史从不重演，我们需要不断地发展和改进我们的理论与实践，但我们可以向过去最好的理论学习，并且利用该理论。因此，马尔库塞的生活和工作仍然与那些对激进批判现存社会、阐发有助于解放的替代方案，以及更好的生活方式感兴趣的有志之士息息相关。

—

[69]

## 马克思主义研究

## 评卡尔·福尔伦德的《马克思生平及其著述》<sup>①</sup>

福尔伦德 (Vorländer) 想要“以事实为基础给予一种坦诚的描述，也就是说，既尊敬伟人，同时又不带丝毫偏见地认识他”。“客观公正” (Sine ira et studio)，即他想生动地描绘马克思“拥有自身个性和世界观的生活经历”，也想“按照它的本质特征”生动地描绘“他在科学、政治上的主要成就”。因此，作者的意图就是一部“客观的传记”，即尽可能不带任何预设地描述历史人物的生平、活动范围和影响。

从一开始，对该任务的这样一种构想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即该意图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获得一种适当的、观察其对象的视角，也就是说，客观的传记是否能够完全理解马克思这个历史人物。传记也就是生平，它为那些从周围世界聚集力量与能量——在他的个性完全成型、他理解了他的时代并形成了他的时代之前，一直都为他提供营养——的历史人物树立了一个英雄形

---

<sup>①</sup> 《评卡尔·福尔伦德的〈马克思生平及其著述〉》这篇文章发表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 (SPD) 的官方刊物上，参见 The review of Karl Vorländer: *Karl Marx: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Die Gesellschaft*, 6 (part 2) , 8, Berlin: 1929, p. 1869。该文本表明，马尔库塞试图去界定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传记是什么样子，以及福尔伦德的不足。具体而言，马尔库塞声称，福尔伦德试图提供一种“客观的传记”的努力，把马克思简化成了关于他生平的传记事实，低估了他的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对福尔伦德扭曲马克思思想的详细批判表明，马尔库塞是一流的马克思学者，而他的成就可以通过本卷的文章得到证实。——编者注

象。因此，独特的个性成了意义最后的单位，而历史力量与能量只是借此把自身反映了出来。因此，这种个性也早已完全成了历史本身，已经历史地决定了。

[70]

完全可以按照该方式来描述马克思的生平和著述。但如此一来，生平和著述就以一种古怪的方式明显被扔到了一边，被搁置了起来。最生动的描述并不妨碍这样的结果。首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疏远和孤立，而这使生平和著述变得没了危害甚至无关紧要。其次，马克思向我们阐释的那种历史必然性被击穿了，被破坏了。这种传记削弱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实践理论。因此，从这些核心观点来看，它还没有发现适合其对象的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从未否定个性的历史力量。但是，与资产阶级的英雄崇拜形成鲜明对照，通过将个性置于两种决定性的力量之下，历史唯物主义赋予了个性全新的意义，而这两种力量就是时间和必然性。这两个概念如果不想继续保持为无关紧要的措辞，它们必须剥除自身从唯心主义的批判哲学继承下来的意义，以便接受它们全然原初的意义。时间在此意味着社会人之此在具体的“内在和外在此在”处境、此在存在的处境，也因为如此，时间变成了“历史”。必然性被理解为“决定命运的”存在和实践，它是随同该处境而被设想出来的，是该处境所需要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的传记必须从那时的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处境——可以被概略地划分为1830年、1848年和1871年这三个革命阶段——着手来写。这个传记必须从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转换——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斗争的开始为标志——赢得它的意义。只有这样，哲学、新闻业和国民经济才会不再仅仅是或多或少由某些风云人物决定性地掌控和执行的特定的行动领域。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把这些领域看成是当时历史处境所需要的、革命必要的助产婆（*accoucheurs*），也就是说，才能把它们看成是激进理论向革命实践的突破。如此一来，《共产党宣言》、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以及第一国际的创立和瓦解才不再是一个独特的历史人物的传记的各个阶段，才会变成历史社会运动特有的战斗阵地——我们现如今仍然可以

从中发现我们自己，而它们甚至在现如今极端的现实状况下也还支配着我们。

[71] 福尔伦德没有提供，也没有想过要创作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传记。他仅仅讲述了马克思从出生到死亡的发展过程。他对马克思的家庭、学校教育、专业、友谊和敌人、成功和失败做了考虑。他对马克思的著述做了简要的分析，概述了其对当前的影响和意义。总之，他把周围的世界仅仅看成是一个人的视域，而不是具体的历史力量。他真诚地、充满热情地对这一切做了叙述，尽职尽责地对资料做了检验，尽管很多尚未发布的资料仍然不断地出现。他的思想态度显得很有胆识、很明确，他毫无伪装地崇拜马克思这个人，欣赏这个人。从福尔伦德的态度来看，相比从未从心理分析的窠臼挣脱出来的奥托·鲁尔（Otto Rühle）的曲解，他更接近马克思的战斗精神。因此，福尔伦德极其成功地复活了马克思这个人物，成功地消除了先前的弄虚作假，阐明了早先晦涩的思想。

但也正是在这里，福尔伦德的描述却使马克思的生平在一些场合沾染了某种小资产阶级情调。这是错误视角留下的第一个迹象。我们仅需引用两段话来佐证。对马克思家中那场家庭斗争的长篇陈述以这样一句话落下了帷幕：“总而言之，在两代人就犹太问题出现分歧之后，在父子之间可能陷入更深的冲突之前，我们会直观地欣赏到一场结局和谐的平和的戏剧。”他接着说道，“我们觉得，马克思缺少本土的永恒性，缺乏泥土气息，而恩格斯可以说并不缺少，尽管从其思维方式来看，他与马克思同样具有国际性”。虽说这仅仅是一些小失误，但却都是些典型的偏离，这也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了该书最根本的缺陷上来。以这种方式来陈述的传记必定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扭曲，因为，它的方法论最终仅取决于与其对象并不适应的、特定的态度。

在“马克思的现代意义”这部分，其中一章的题目是“我们如何坚持唯物主义？”前面提到的令人奇怪的对马克思著述的疏远和孤立在这个地方表现得最为明显。它被接受、被批判，仅仅是因为它是一项“历史”成就。在此，我们可以发现将历史唯物主义融入建基于康德哲学的社会学的所有熟悉的尝试。无论这样一种努力在理论上有多合理，它都无法彻底地破坏马克思



作品的具体历史意义。在这一点上，即使是福尔伦德，也觉得继续给“唯物主义”这个词加引号很有必要。随后我们会从根本上讨论这些尝试，发表在本刊物上，因此现在我们只能满足于指出福尔伦德书中一些特别明显的误解。

首先，他认为，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与科学中“因果论或目的论”之争存在着联系。这种联系完全误解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意义，因为它忽视了这一事实，即辩证法在自身中取消了这两个概念，消除了它们所反对的对象。紧接着，我们会发现，他认为“目的的层级结构”（第 294 页）和设定目的是“共同的、都可接受的”。不过，这些都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脱离具体实践这种倾向的明显标志，因为单就共同的目的而言，在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的联系中，它们是有一定的意义的。然而，他却想让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特定的纯粹哲学问题的立场和解决方案。同样，福尔伦德对马克思

[72]

作品中存在的“哲学理论”的误解和曲解几乎从未停歇，因此，他无法看到它们与革命实践的必然联系。按照福尔伦德的说法，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这个陈述“原本更应该从历史哲学的意义上来理解，或许有人更喜欢[原文就是如此!]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而不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来理解”（第 302 页）。福尔伦德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最大的分歧是，他认为，历史“在黑格尔那里兜圈子”，但这在“现在看来已不再具有必然性”（第 303 页）。福尔伦德并没有领会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不仅如此，他还说，该作品连同《神圣家族》一起都只是马克思临时拼凑的东西（第 104 页）。

在这种情况下，再讲更多的例子已经毫无必要。这些就已足够了，因为它们全都回到了一种基本的倾向上，该倾向在依靠扎根于康德哲学的基本态度得以形成的必然松散却又联合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可以发现。关于这个论点的正确性，稍后我们将尝试做出证明，发表在本刊物上。

## 价值与交换价值<sup>①</sup>

(1) 价值与交换价值并不相同；准确地讲，它们有重叠。它们的不同有什么意义呢？

[73] (2) 价值与交换价值不同本身包含了批判元素。这是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由于人和商品都以它们偶然占有的交换价值来定义，所以价值与交换价值被认为是完全相同的。从（哲学的和宗教的）意识形态来看，价值通常更有尊严，看似与表达交换价值的价格相分离；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概

---

① 译者查尔斯·赖茨（Charles Reitz）写道：“下面这份机打的两页纸的德文手稿《价值与交换价值并不同时发生》（*Wert und Tauschwert fallen nichtzusammen*），档案编号是 HMA 0109.01（法兰克福市立与大学图书馆，马尔库塞档案馆）。在手稿顶部，有这样一个手写的记号‘15. IV. 36’，它可能是机打稿的日期，按照德语的习惯用法，应该依次是哪天、哪月、哪年，因此日期是 1936 年 4 月 15 日。马尔库塞对德语和经济内容的运用同样能够表明，这就是它完成的时间。马尔库塞这段时间正在纽约市，而就在当时，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同事霍克海默正在《社会研究杂志》上以德语阐发他们 1937 年对批判理论所作的堪称经典的构想。霍克海默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和马尔库塞的《哲学与批判理论》最初的德文版都发表在了那年《社会研究杂志》的同一期上。在接下来的评论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最重要的哲学观念，从底层加固了马克思主义对劳动和经济生活商品化的批判。该文本表明，马尔库塞在那时比他的同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更接近经典马克思主义。”我们要补充的是，该文本表明马尔库塞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经济学的立场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他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当今时代的马克思思想。——编者注

念却清楚地表明，这种表面上的分离其实是一种幻觉。原因是，它——从经济学中发展起来，而从经济学来看，资产阶级社会以交换价值来评估一切——本身表现为这样一种价值概念，即其他一些使批评保守意识形态成为可能的洞识可以从中推演出来并得到解释。尽管，价值概念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引入的，但它却与超越于经济领域之上的其他洞识相重叠。

(3) 孤立地从生产或流通过程的某个特定部分来看，商品的价值要么就被认为是仅仅来源于生产过程，要么就被认为是仅仅来源于市场，因此永远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在评估价值和交换价值时，时间顺序必须被完全抛弃；评估商品的价值时，询问它的价值在它来到市场之前何时被确定下来的，或者它到底是在提供给市场的时候获得了自身的价值，还是在实际上被卖出的时候获得了自身的价值，这些都毫无意义。无论谁想理解某个特定的交换活动的价值，他都必须理解社会中生产与流通关系的总体性。

(4)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有一个与对象的历史前提相符合的逻辑前提。简单的商品生产不仅仅是概念上的过度简化，更是历史上的偶然现象 [Vorstufe]。马克思最渴望的就是，完成对经济制度的分析的同时为这个时代提供一种适当的分析。逻辑范畴与历史范畴的这种相互渗透是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特征。

(5) 马克思是以抽象劳动时间为基础来理解价值的。但抽象劳动时间这个范畴却很难理解。它是一个公理吗？如果它是，那只能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他对整个制度的解释使它的公理性被取代了 [aufgehoben]；它被证明是压倒一切的历史关系。

近来的共产主义文献<sup>①</sup>

E. H. Carr, *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 I: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

- ① 《近来的共产主义文献》刊载于 *World Politics*, Vol. 6, Nr. 4 (New York: July 1954), pp.515–525。评论的开篇清楚地表明，马尔库塞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研究从马克思时代到现代的历史发展的，研究当前世界分裂为相互对立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马尔库塞把马克思看成是“自由主义时期天真无邪的孩童”，也就是说，他是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阶段的理论家。马尔库塞描述了马克思何以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会导致它瓦解，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为什么会给它带来稳定，以及为什么会把无产阶级整合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贵族”。

在俄国社会环境下，马尔库塞解释了为什么列宁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决裂——把政党而不是工人阶级变成了革命的主导力量，致使对马克思理论来说反常的社会主义在最发达的西方社会之外发展了起来。评论的其余部分研究了近来有关苏维埃发展和历史的著作，因此它表明马尔库塞不仅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也精通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文献。

马尔库塞首先研究了英国历史学家卡尔的《苏维埃俄国史》，他认为，该书透彻地表达了斯大林控制下的俄国究竟是如何在西方发展之外、以反对该发展的形式逐步形成共产主义制度的，又是如何再生产工业社会的基础的。紧接着，马尔库塞又探讨了你的朋友摩尔的书《恐怖与进步——苏联》，该书分析了工业、农业、科学与艺术中的苏维埃政权，重点分析了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中发展起来以保证政党独裁的恐怖机器。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1958)中，马尔库塞紧随摩尔的尝试，对苏维埃共产主义制度做了理论上的阐述和批判。相比之下，马尔库塞对英国史学家沃森的《从列宁到马林科夫》持更为批判的态度，他认为该书是从卡尔所描绘的骚乱的历史中提取出来的，因此陷入了抽象和“模棱两可的泛泛而谈抑或众所周知的事实”。——编者注

1923; II: *The Economic Order*; III: *Soviet Russi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1–1953, 430 pp., 400 pp., 614 pp., \$6.00 each.

Barrington Moore, Jr., *Terror and Progress—USS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261 pp., \$4.50.

Hugh Seton-Watson, *From Lenin to Malenkov*,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1953, 356 pp., \$6.00.

Rudolf Schlesinger, *Central European Democracy and Its Backgroun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53, 402 pp., 30s.

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一般人，都对包括苏维埃和美国在内的世界社会的未来有一种强烈而自然的好奇心。比如说，西方和苏维埃制度有可能怎么发展？它们对彼此将产生哪些影响？更具体来说，何种趋势从目前来看在它们的发展中清晰可辨？马克思理论在该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接下来要评论的各卷著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全都涉及这些问题，因此，思考他们所提供的诸答案的特征与实质具有重要意义。

[75]

从现阶段的历史发展来看，马克思理论的最初形态看起来就像是自由主义时期天真无邪的孩童。马克思辩证法是自由资本主义竞争的辩证法，而基础性的经济活动将通过该辩证法自由地发展它们固有的矛盾。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极为合理的制度经由无产阶级革命将通向自身的毁灭。然而，随后自由主义时期却走向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期。不断发展的生产力、日益改善的生活标准与集中化的经济政治权力联起手来使大部分的劳动阶级顺从了既有的社会。列宁在与“经济主义”和“自发性理论”作斗争的过程中，就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构想发生了决裂，并把政党而不是阶级发展当成了积极的革命力量，由此，他对马克思理论做了重新调整，使其适应了新的资本主义的现实。不过，尽管在战略上做了重新调整，列宁仍然把革命的辩证法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辩证法。他认为，只有一小部分的工人阶级——“工人贵族”——已经被腐蚀，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仍然是成熟的革

命力量。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来看，社会主义革命仅仅在落后俄国取得了胜利，这个事实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但它却必将使纠正这种偶然的力量涌动起来——也就是说，它将把发达工业社会的革命特别是德国的革命释放出来。

在《苏维埃俄国史》前三卷中，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 H. Carr）以翔实的资料证明了布尔什维克的国内和国外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都是临时的、即兴的——目的是加快从西方手中“解救”俄国之外的社会主义。正是德国革命的最终失败引起了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根本转型，这次不只是建立在相同理论基础上的战略转型，而是创造了新的基础。并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的革命成了历史的转折点：资本主义世界之外与其壤接的新文明开始兴起。马克思曾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推翻该社会的是它的内在发展，现在却成了受该社会排斥、自外部与该社会竞争的外在力量。以国有化、集权化经济为基础，适应且能够调动工业文明科学技术理性的社会制度被建立了起来。因此，出现了两种社会制度，它们在充满敌意、相互竞争的文明中面对未来。面对该挑战，西方社会借由对它自身资源的经济、技术和政治动员做了回应——该过程有可能危及曾经竭力倡导此过程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的力量。某些基本趋势似乎对两个相互竞争的制度来说都有危险：技术理性的凯旋，大工业对个人的胜利；全面协调；管理向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公共生活对私人生活的同化。

[76]

新的历史星丛（constellation）破坏了近两个世纪一直都为社会科学所承认的理论中立的基础。为了保持它传统的客观性，社会理论现在将不得不在由苏维埃秩序及其对立面所组成的讨论范围内发挥效用，同时不得不使两者服从于相同的批判标准，也就是说，在两者得以发展的同一世界历史连续统一体中理解它们。显然，建构这样一种讨论范围有着很大的投机性，并且毫无价值。在两种文明殊死斗争的过程中，超越斗争是一件靠不住甚至危险的事。从长远趋势和影响来看，客观性只有在它从世界历史统一体中抽离出来，并且抛弃眼下的一切理论之后才能处身安全的境地。因此，社会科学家

只有在他同时偏袒和支持自身文明的时候才能确保客观性。他可以指出，与西方世界的自由形成鲜明对照，苏维埃世界是恐怖的；可以指出，相比西方世界较高的生活水平，苏维埃的生活水平还很低；还可以指出，与西方世界的围堵政策不同，苏维埃实行扩张政策。他可以揭示，苏维埃社会以何种方式把个人整个地变成了劳动工具，变成了法令的容器，变成了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想以历史的观点和辩证法来安置这些事实的话，那将需要一种超黑格尔的狂妄自大（hybris）——篡夺世界精神（Weltgeist）的权力。通过回忆说恐怖在一切文明的建设中一直都是进步的教父来获取安慰，这既不科学，也不道德。任何哲学都无法证明数百万人——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都正在再次成为世界历史屠宰台上的牺牲品——的苦难是合理的。不过，共产主义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远不只是、也不同于斯大林主义所创建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真实潜能与实施现状之间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决定着当代苏维埃世界内的共产主义的历史，也决定着苏维埃世界以外的共产主义的历史。在该状况下，没有任何理由把共产主义的社会内容抽离出来，没有理由忽视该内容所造成的长远的历史发展动态，也没有理由贬低它对西方世界转型的影响。

然而，此种抽离在当前关于共产主义的分析中极为盛行。不过，这常常会因遗漏而造成对事实的歪曲——该歪曲更不负责任，因为它极度贬低摆在西方文明面前的发展前景。该分析的抽象性通常被不适宜的具体性隐藏了起来：材料是从历史语境中提取出来的，它要以这种隔绝的形式面对最新的、精确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方法。由于这样的材料，比如，一种想象的、与一切内容都被清除了的现实极其相似的“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操作代码”被建构了起来。该分析即使有概念框架，往往也仅限于“权力”（简写为P）这个主题的变种。《从列宁到马林科夫》（*From Lenin to Malenkov*）认为，共产主义的发展是无情的阴谋集团——越极权也就越邪恶——的恶魔般的计划。布尔什维克的基本目标曾是不择手段地获得、保护和扩大权力，而马克思理论也曾帮助他们把“社会主义”的独裁组织成了最有效的获取该目标的手段。

[77]

这一切可能都很真实，但只能表明分析该从何处开始。布尔什维克政权维系着高度工业化社会——所有团体和功能在这里都与国有化的生产机器严丝合缝地保持协调——的发展动力，也得到了该动力的维持。该制度与更发达的西方工业文明同时运转，而其结构、目标及其实现它们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竞争性的共存关系。无论领导权有多么绝对，也不管他们的个人或集团利益到底是什么，该形势既客观地决定着他们的权力，也决定着他们的目标。另外，共产主义同样也是西方世界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简单地乃至首要地按照苏维埃控制的共产党的策略和成分来评估它；可以用来论证该观点的最好的例子就是，作为一种社会因素，西方共产主义在受苏俄控制之前要更强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苏俄控制的地方同样要更强大。至于苏维埃将走向何方，共产主义的前景如何，这个问题只有通过通过对苏维埃和西方社会、它们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内在趋势和它们的相互关系的分析才能解决。

在《恐怖与进步——苏联》(*Terror and Progress—USSR*)中，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试图通过按照苏俄所创建的社会结构解释它的权力制度来回答这个问题。该书的绝大部分篇幅都放在了控制在苏维埃社会各部门中的实际运作情况上。工业、农业、科学与艺术以及恐怖机器本身都被占据了，因此，控制的运作、控制者的立场、受控者的反应在这些领域表现了出来。这一极为翔实的描述利用了大量的当代素材，其中包括由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成员所主持的对苏维埃难民的访谈。由于在恰当的语境中被小心翼翼地使用，它们不仅提供了新的信息，还可以审核那些缺少直接材料来源的结论。纵观全书，它的重点放在了识别弱点上：相互冲突的利益和政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中不可控的力量，可能成为离心趋势发源地的制度缺陷。摩尔发现了不少弱点，但是，从总体来看，它们就像是一个运转着的制度的裂缝和废弃物，而不是爆炸性元素。然而，这种制度本身不能被认为是静态的，它的运动方向也不能被认为是固定的。

在摩尔的分析中，最重要的洞识都在最后一章，即“未来的景象”。文



中，他试图从自己的发现中推断出该制度的发展动力，而这么做的时候，他却想进一步使苏维埃社会的真实前景也显露出来。在前面的章节中，他并没有把运用于受独裁统治的人和物的相同性质的分析运用于独裁本身：独裁者或独裁者们仍处在云端，在他们自己的、其他人难以靠近的奥林匹斯山上。但在最后一章，独裁本身却被看成是它所支配的整体的一部分。如此看来，它是一种制度，深受其管辖范围内部和外部的制度变迁的影响。摩尔看到在苏维埃社会制度中存在着充当“变革根源”的基本趋势。他认为，该趋势可以区分为三种：(1)“具有动态、极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特征的斯大林主义制度延续了下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强化”（第 223 页）。(2)“相比极权主义……苏维埃制度中的技术合理性和形式合法性”更占优势(同上)。(3)倾向于使苏维埃社会回归到某种半封建的“东方专制主义”的“传统主义元素”复活了（第 225 页）。在不排除第一或第三个趋势有可能发展加快的情况下，一定条件下，摩尔最有可能思考技术统治的形成。它将包括独裁的“合理化”，发展壮大的技术官僚制取代政治恐怖，学院统治取代个人统治，“大批的商品和服务流向”大众（第 189 页）。摩尔冷静、认真的态度避免了过高的评估，而这可以为他的发现提供宏大历史视角。这本书的评论者更相信思辨，他认为，鉴于国内和国际稳定的“正常”条件，苏维埃社会有可能走向极权主义的福利国家。至于国际稳定的可能性，他与摩尔悲观主义的观点一致，即“事物的本质在于，仅仅是统治大部分欧亚大陆的强大的工业国家的存在就有可能危及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而不管它的行为和明显的意图多么和平”（第 229 页）。

值得注意的是，摩尔的分析从国内而不是从国外探究了苏维埃社会的结构，而这在他明确了西方世界的立场的陈述中达到了高潮。但除“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外，两种制度之间的相互联系自始至终也都是一个实质性问题。如果不强调该联系，那么任何关于共产主义趋势的分析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不恰当的。而对于 1917 年到 1923 年这段时期来说，卡尔的《苏维埃俄国史》已经设立了几乎无法比肩的标准。在这本书的评论者看来，卡尔

[79] 的作品是伟大的当代史学的罕见个例：它把精通事实材料与了解和理解理论——能使他在当代文明政治经济转型的语境中认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历程——联系起来。因此，从他的解释来讲，可以清楚地看到，从马克思到列宁的共产主义的命运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方向决非不可逆的历史过程。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没有铲除掉工业社会中不同形式的共产主义的根源。而只要这些根源还存在，世界共产主义史就是相互依存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史。

但是，休·希顿-沃森（Hugh Seton-Watson）的《从列宁到马林科夫》却完全没有把历史呈现出来。他的书的特点是过分简单和抽象，而书中涉及最多的就是邪恶的用权冲动的布尔什维克及其被误导的追随者的遭遇。在引言中，作者讲道：“如果我可以声称我研究这个方法有其独创性的话，那也只在于我对各社会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做了强调……”然而，他并没有实现这个意图。各社会阶级及其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在很多地方都做了讨论，但这种讨论也仅仅是模棱两可的、泛泛而谈或众所周知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它无法指导对材料的分析和描述。该书以 356 页的篇幅阐释了包括殖民地在内的世界所有主要地区的共产主义，从列宁主义开始直至今日的发展。在结论中，沃森宣称，“共产主义的社会原因是知识分子的挫败感和大众的贫穷”（第 352 页）。紧接着，借由准确地指出生活最悲惨的居民往往不是最革命的，他对第二个要素做了限定：“革命的鼓动者”必须“为了他们的目的利用”眼前的“贫穷”。因此，这一切终归要返还给知识分子：“比起大众的贫穷，知识分子的挫败感是共产主义和其他反西方革命运动更为直接的原因”（第 353 页以下）。他问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20 世纪的灾难？”有，特别是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来说，教育制度的改善将使他们有能力满足民众的福利，同时“消除这种吞噬他们的挫败感”（第 354 页）。沃森更加具体地明确了西方政策的目标：它的“目标一定是解放那些受极权的斯大林主义的帝国主义压迫的民众”。但是，“可以抑制斯大林主义并且解放受压迫的民众——包括近 30 年来最伟大的殉道者俄国民众

本身——的手段现如今还不够清晰。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会变得清晰起来，或者说，它们并不存在”（第 348 页以下）。

为了弄清缩略和简化究竟如何改变了革命时期在世界史中的形象，我们只需比较一下沃森讨论中欧革命和第三国际政策的章节与卡尔在宏大的《苏维埃俄国史》第三卷对相同主题的研究。卡尔这一卷的标题是《苏维埃俄国与世界》；它研究了列宁去世前不久的布尔什维克的外交政策，但这样做的过程中，它涉及战后这段时期的欧洲和亚洲史。卡尔展示了既注重苏维埃国家利益又注重国际革命目标的“两面政策”，是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西方与东方、宗主国与殖民地的运动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阐明了该政策的每一次重大转变为何都取决于苏维埃阵营内外的新力量，也阐明了苏维埃政策为何要以继承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战略原则来应付这股新力量。马克思理论在苏维埃政策中的角色无疑是最具争议的，不过事实仍然是，列宁主义的政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苏维埃社会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从一开始就遵循这个基础，即马克思的构想，而马克思主义也一直被推崇为官方的苏维埃意识形态。因此，这种意识形态一旦被纳入社会，它就会成为除个人的诚信和政策制定者的意图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对于“两面政策”是否实现了最终目标，要看马克思的预言有没有物质化：在成熟的资本主义世界，首先在德国建立社会主义。卡尔的分析揭示了“一国社会主义”在斯大林之前在何种程度上被决定了——不过是在德国而不是在俄国；而他有关德国革命及其对第三国际政策的影响的章节的脚注比研究该主题的专著包含着更多的资料、更多的洞见。

[80]

随着魏玛共和国的创建，西方世界在社会和政治上实现了重组，这使它从总体上顶住了中欧左派的革命和法西斯主义的反革命，也使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幸存了下来。从欧洲方面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该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表面上是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力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策略无可争议的解释者。在列宁挑战这种垄断地位的时候，他及其追随者仍然只是少数。然而社会民

主党，在没有失去大多数劳动阶级的支持的情况下，变成了它有组织地反对的这种制度的救世主。无疑，该“成就”是无法依据个性和政党结构来理解的：民主合作政策不能通过官僚制的政党领袖简单地强加给激进的群众。说社会民主党的经历只不过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给予工人更高生活水平的能力日益提升，这种解释也不够充分。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的决定性时期，中欧几乎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81] 在《中欧的民主及其背景》(*Central European Democracy and Its Background*)中，鲁道夫·施莱辛格(Rudolf Schlesinger)通过编写自1862年至民族社会主义胜利以来典型的德国和奥地利工人阶级经济政治组织的历史，试图提供一种解释。政治党派、工会、消费者合作社等等，它们都被看作是成熟工业社会典型的“某群体的组织”(sectional organizations)。在这个基础上，施莱辛格瞄准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欧民主命运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冲突的发展。他拒斥列宁的“工人贵族”理论，认为它不足以解释社会民主党的妥协政策，并争辩道：

【如果把“工人贵族”看成是那些能够由于雇主成功而获得物质改善的团体，那么很显然，可分配的利润在总量上的增加将使这个团体从少数贵族逐渐变成整个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假如它把整个工人阶级都包含了进来，那么没有任何理由解释，为什么任何形式的完整意义上的民主在这种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政治体(body politic)中不能蓬勃发展……而是只有通过处于劣势的国家的反抗，它才会被摧毁——而帝国主义国家将通过备战来迎接这一威胁。(第83页)

施莱辛格把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和妥协主义政策追溯到了该党形成初期，并且揭示了拉萨尔派传统而非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该党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作为证据充分的历史调查，他的著作指出，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态度在20世纪头十年的党和工会代表大会中令人惊奇地得到了坦率的表

达。这些态度的一致性有些被过分夸大，而对它们的反对力量的研究又太过概略。但是，1914年和1918年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无疑是工人阶级机构和组织被有效地融入不断发展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结构这个漫长过程的集中体现。因此，社会民主党早在1918年11月——那次臭名昭著的与军队的联盟就是在当时缔结的——就支持现有的秩序并且反对马克思主义革命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按照施莱辛格的说法，魏玛共和国在这段时期发生的事情仅仅使“社会权力的分配在控制德国的容克资产阶级联盟内部发生了轻微的改变”（第152页）。

从这个观点来看，施莱辛格的著作变成了一部关于德国和奥地利民主衰落和垮台的批判史——站在左翼社会主义立场上批判。他的党派性并不违背和否定事实。他拒绝走捷径，也就是说，把这些国家社会革命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到社会民主党的身上；他也不满足于这样的解释，即德国工人还不具备“革命性”。德国共产主义也要接受同样的批判分析。在他看来，德国工人的阶级目标随着帝国的倾塌已经变得不稳定，因此由共产主义的斯巴达克同盟在革命的前几个月毫不犹豫地制定的战略才会使德国工人走向了左翼。

[82]

施莱辛格的研究阐释了共产主义在这段逐步形成的时期的命运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取决于俄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外的因素。从马克思到斯大林，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受到了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和现实的影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根本联系出现了松动。共产主义的发展前景仍然必须根据现今工业文明的发展前景来评估。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辩证法与逻辑<sup>①</sup>

没有什么比它对辩证法的态度更能够揭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趋势的。<sup>②</sup>辩证逻辑是马克思理论的基石：它不仅是分析革命发展的指南，也是分析前革命时期的指南，而该分析转而又成了这两个时期的策略的指南。任何对辩证法的根本性的“修正”——为了适应新的历史境域，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运用——都将表明，它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仅具有教条的意义）的“背离”，也是在理论上对新策略的辩护。因此，斯大林

---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辩证法与逻辑》载于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n and Soviet Thought*, ed. Ernest J. Simm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347–358。这篇文章登有一个注释，上面写道：“本文是更宏大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的资助”，它确实预示着在 1958 年面世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书。该文表明马尔库塞既熟悉马克思的辩证理论也深谙苏联的辩证理论，表明他把注意力都放在了黑格尔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概念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所发生的转变上，他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发展，它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当成了斯大林及其追随者时代苏维埃制度正统的意识形态。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马尔库塞注意到苏联马克思主义对“内部”与“外部”矛盾做了区分，苏联共产主义已经“解决了”爆炸性的矛盾——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它们可以促成革命——这个断言作为合法的意识形态，苏联马克思主义可以用它来避免把批判性的马克思理论用于批评苏联社会。——编者注

② 本文是更宏大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的资助。

主义的诠释者已不无正确地注意到了该氛围下的事件。他们的结论是，为了从意识形态上替政权——必定以压抑的形式出现，并最终被辩证法所超越——辩护和保卫政权，苏联马克思主义弱化、遏制了辩证法。从苏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矛盾概念（稍后，它就从“否定之否定”这个辩证词汇中消失了）和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重构中，从它对形式逻辑的恢复中，我们可以看到支持该结论的主要方面。

[83]

这些尽显无遗的修正第一条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原理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出现了。在《苏联大百科全书》(*Bol'shaia sovetskaia entsiklopediia*) 那些有代表性的讨论“历史唯物主义”<sup>①</sup>和“矛盾统一与对立的规律”<sup>②</sup>的文章中，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的矛盾就已经被区分开来。该区分在亚历山德罗夫论战(1947年6月)<sup>③</sup>中成了日丹诺夫进行意识形态攻击的主要依凭，并且自此之后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决定性特征。在斯大林最后一篇文章中，非对抗性的矛盾学说成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基础。<sup>④</sup>苏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发展的过程中的另外两个事件都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并且从本质上来讲密切相关。一个是，1950年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Marksizm i voprosy iazykoznaniiia*)给出了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官方声明；另一个是，1944年，经批准，学校重新引入了形式逻辑。但广泛的讨论直到1948年才刚刚开始，1950—1951年达到了顶峰。<sup>⑤</sup>

要评估这些发展的意义，有必要简要地思考一下辩证法在整个苏联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作用。仅靠它们自身，既无法解释自身的哲学意蕴，也无法解释自身的政治意蕴——甚至它们表面上也看不出“修正”的痕迹，我们将

① Vol. XXIX (1935) .

② Vol. XLVII (1940) .

③ *Bol'shevik*, no. 16 (1947) ; *Voprosy filosofii*, no. 1 (1947) .

④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 in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Special Supplement (1952) .

⑤ 关于研讨会的综述，参见 *Voprosy filosofii*, no. 6 (1951)。

看到，三个改动都可以看成是对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完全合法的、“正统的”推理。尽管苏联马克思主义没有修改或拒绝任何一个基本的辩证法概念，但是辩证法的功能本身却有了明显的改变，它从一种以指导马克思主义实践为旨归的批判性思维模式变成了一种与具体实践不再具有内在关联的僵化的一般性体系。该转变本身是马克思主义依据资本主义社会自世纪之交以来的发展所做调整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将试着指出某些要素，而这些要素改变了马克思主义与其致力于变革的现实之间的关系。

- [84] 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历史背景是 19 世纪自由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时期）过渡到了 20 世纪“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使发达工业国家的生活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劳工组织也参与了该提高。因此，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改变了，劳动阶级被认为是社会的“绝对的否定”，但他们很大一部分在社会中却成了既得利益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这种走向阶级合作的趋势，工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成长并不仅仅是一种错误的策略，而是威胁到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本构想。在与修正主义和经济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列宁通过决定性的调整回应了该威胁。实际上，他的布尔什维克理论承认革命力量必须从外部被重建和组织起来，甚至必须反对那些阶级意识已经被现行秩序——他们就在这里活动——攫取的无产阶级的“眼前利益”。作为革命先锋的党的领导起着主要作用，这种布尔什维克学说源于西方社会的新状况（“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而不是源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格或心理。发达资本主义的不断增强、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与这个社会的调和、列宁主义以及“资本主义链条最先从薄弱环节断裂”的理念，是同一历史趋势的不同组成部分和阶段。尽管列宁主义的调整预示着在发达工业文明中心之外的“一国社会主义”有可能发展起来，因此也意味着基本上修改了马克思主义，但列宁并没有坚持完成他的战略调整。他仍然是“正统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说法，他最初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德国这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第一步。就列宁主义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革命辩证法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运作这个意义而



言，它在布尔什维克专政的最初几年是试验性的。直到中欧革命失败成为必然之后，即 1921 年以后，“一国社会主义”才最终确立了下来。社会主义建立在一个落后的并且（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孤立的基础上，这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找不到任何理论指导。列宁以及斯大林从来都没有抛弃过这个观念，即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获得胜利，“一国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胜利。从这方面来讲，与列宁主义一样，斯大林主义也是“正统的”。

不过，那时苏联向一个强大的国家、国际力量的发展促使西方世界走上了统一和整合，因而期望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发生坍塌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现实了。外在于和内在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的不均衡发展”使理论和实践之间产生了裂缝，而这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特征。尽管目标仍然相同，但是实现目标的方法和手段已经大相径庭。作为国际竞技场历史变迁的结果，革命辩证法的历史载体已经不再是发达工业国家的工业无产阶级，而是变成了苏联。它是按照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辩证法，按照非对抗性而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来解释自身的发展的。然而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以外，仍然是资本主义的辩证法。在斯大林主义时期，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以来几乎是禁忌。直到最近，有迹象表明，根据苏联政策的整个调整，辩证法问题被赋予了新的定义。为了理解该发展的意义，重述一下马克思辩证法原初的功能很有必要。

[85]

马克思认为他的辩证法是一种概念工具，它可以用来理解一个具有内在对抗性的社会。这种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分解成其矛盾构件的做法是为了“反映”该社会实际的结构和运动：辩证法的目的是在理论中再现现实中所发生的事件。为了充分地再现它，以便为该社会提供正确的理论，传统的范畴必须被重新定义，因为它们遮蔽了而不是揭示了所发生的事件。社会理论必须根据它所处的时代情形来加以阐释。但是，思维结构与现实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不仅仅是反映和对应的关系。就在黑格尔始终如一地越过思维与它的对象之间明确规定的区别时，就在他谈论现实的“矛盾”（一个“逻辑”术语）、概念的“运动”、量“转化为”质时，他确实为思维与其对象的

同一性做了特殊的规定——他使一方同化了另一方。对于那些注意到黑格尔混淆了两个本质上不同的领域的批评者，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才智是达不到黑格尔的智力和意识水平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概念与现实之间的传统区别是“抽象的”，因为它篡改、损害了真实的关系。思维与其对象有一个共同点，而这个共同点本身是“实在的”，它不仅是思维的实质，也是思维的对象实质。这个共同点，即思维与对象的共同结构，就是存在的结构，它是一个包含着人和自然、理念与现实的过程。如果思维过程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它“理解了”现实，如果它是它的对象的概念（Begriff），那么它就是使对象得以构成自身、成为自身、发展自身的过程。正因为如此，这个过程出现在了自然、历史本身和“纯”思维（逻辑）三个不同的存在领域。它们是本质上不同的“实现”阶段，本质上不同的现实。黑格尔的逻辑学，绝不仅仅是消除了这些不同，而是对它们做了详尽的阐释。但是，对黑格尔来说，它们的共同结构和共同目的（理性——自由主体的实现）确立了概念即逻各斯的现实的支配地位。（正确的）思维过程严格来说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因此，当黑格尔谈到一个概念变成了另一个概念时，他说的是，概念通过思维揭示了最初看起来与这个概念相异甚至对立的内容。在思维过程中，所发生的并不是另一个更适合于现实的概念取代了原先的概念，而是同一个概念把它原初的内容呈现了出来——这是一个按照概念来理解现实的动态过程。现实有（毋宁说是）它自身的逻各斯，因此有它自身的逻辑。这不仅仅是一种言说方式。自希腊人最先把存在的本质定义为逻各斯以来，现实的逻辑本质（逻辑的现实）的理念就一直支配着西方的思想；黑格尔的辩证法仅仅是其最近的一次大发展。

[86]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覆”，但它依然完全相信这个理念。社会进程背后的推动力并不是某些冲突和对抗，而是矛盾，因为矛盾构成了它们得以产生和规定的社会制度的逻各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社会（的逻各斯）反对它本身：它的经济只有通过周期性的危机才能正常地运转；日益增长的劳动生产率使匮乏和辛劳保留了下来，而与日俱增

的财富使贫穷保存了下来；进步是非人化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声称的那样，正是自由的工资合同和公正的等价交换带来了剥削和不平等；正是自由、平等和正义的实现使它们变成了自身的对立面。<sup>①</sup>

理性的制度本身是一个悖谬：正是支配着制度的规律破坏了制度。这些规律源于人们在再生产他们的生活时所进入的基本的社会关系：在这个唯物主义基础上，逻辑被设想成了一种具体的历史结构，逻辑的动态变迁被设想成了具体的历史变迁。

前面对辩证法某些基本概念的简短重述可能有助于阐明它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经历的固化过程。在那里，辩证法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而后者又被视为共产党唯一真正科学的“世界观”。<sup>②</sup> 马克思理论也可以被称为一种“世界观”，但如此一来，它就会要求通过具体的历史内容来证实抽象的哲学总则。诚然，辩证唯物主义可以表现为一系列的一般性假设、范畴和结论——但是一般性的体系紧接着就会消解自身，因为它的范畴只有在辩证运用的过程中才能变成现实。因此，在试图展现辩证法“本身”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只能摒弃对“经典”原理作具体的辩证分析，只能以“非辩证的”思维来诠释和面对它们。这些原理在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都有列举，它们仅仅是改述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命题。<sup>③</sup> 不过，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它们既非真亦非假，因为它们只是空壳。黑格尔可能会以普遍性为中介把辩证法的原理阐释成逻辑学，因为对他来说，存在的结构和运动就是思维的结构和运动，它在绝对理念中获得它的真理。然而，马克思拒绝黑格尔从理念的角度对存在所作的解释，他不可能把辩证法解释成逻辑：因为现在它的中介就是历史现实，它的普遍性就是历史的普遍性。

[87]

① *Capital*, Vol. I, ch.iv.

② 关于逻辑问题的研讨结果的报告，参见 *Voprosy filosofii*, no. 6 (1951)。

③ 关于对“否定之否定”的“删节”，参见第 355 页。

马克思辩证法是否适用于自然的问题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因为强调自然辩证法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特征——与马克思甚至列宁形成鲜明对照。倘若马克思辩证法从其概念结构来看，它是一种历史现实的辩证法，那么就自然本身是历史现实的组成部分而言（从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对自然的支配与开采、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然等等来看），它包括自然。但是，确切地讲，从脱离历史关系在自然科学中以抽象的方式来研究自然这个意义上说，自然似乎外在于辩证法的王国。因此，绝非偶然的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辩证概念看上去似乎纯粹就是类比、比喻，就像是被叠加到了内容上——相比经济学著作和社会历史著作中确切具体的辩证概念，极其空疏、陈腐。然而，《自然辩证法》却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断引证的可靠来源。必然如此，是因为如果“辩证法主宰一切”<sup>①</sup>，如果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那么辩证概念首先必须在最科学的科学即自然科学中得到证实。最终结果就是历史的去历史化。

苏联马克思主义把辩证法固化成了普遍的、科学的世界观，这必定使马克思理论划分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研究社会及其历史”的后者成为对前者的“延伸”和“应用”。<sup>②</sup>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划分毫无意义，因为在他看来，辩证唯物主义自始至终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一个替政策与实践辩护的马克思主义整个科学、哲学体系的特定分支，通过党的官员的解释，被有系统地转化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88] 对苏联来说，这种转变的意义极其明显，以致很多重要的影响被普遍忽略了。在马克思理论中，历史维度是辩证法决定性、验证性的维度，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它却成了一个超历史规律肯定自身的特殊领域。这些被设置在普遍命题系统中的规律变成了历史和自然最具决定性的力量。经过这样

① K. S. Bakradze,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ogic and Dialectic," *Voprosy filosofii*, no. 2 (1950).

② 11 Stalin,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Short Course*, New York, 1939, p. 105.

解释，辩证过程从严格意义上讲已不再是一个历史过程，毋宁说，历史已经被物化为第二自然。因此，苏联的发展赢得了客观自然规律享有的尊严，发展被说成是受该规律的支配，如果规律能够得到正确的理解，并转变为意识，它将最终纠正一切错误，最后战胜敌对的势力。如果说有什么可以明显地将苏联马克思主义与早先的马克思理论区分开来的话，那么除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理论编纂成了意识形态之外，一定就是它根据客观决定论对社会历史过程所作的解释。例如，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Marksistskii dialekticheskii metod*)中，罗森塔尔(Rozental)认为苏联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随后的发展就是制度客观力量演变的不同阶段，而该力量也只能如此演变。斯大林对上层建筑这一“强有力的积极力量”——有助于社会基础采取适当的形式<sup>①</sup>——的强调与这种倾向并不冲突。这不仅是因为上层建筑的活动本身来源于社会基础，而且还因为斯大林在两年后坚称，“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规律是客观规律……它以不受我们意志影响的方式向前推进”，国家只能“依靠”它们，并有意识地按计划来利用它们，但却不能废止甚至改变它们。<sup>②</sup>无疑，一如既往不断强调的重点放在了国家的指导地位上，放在了共产党及其领导——拥有解释和阐述辩证规律的垄断权——的指导地位上，放在了苏联人民的爱国英雄主义上，而他们的行动和成功也只有通过他们对辩证规律的理解和服从才能成为可能。乍一看，这似乎是“正统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始终坚持，历史过程受客观规律的支配，借由自然规律无情的力量来运行。不过，作为客观规律，它们也是历史规律，历史的规律；它们体现了人与自然、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这些规律的客观性保留了“主观因素”：它们包含着主体这个有意识的行动者——不仅仅是规律顺从的仆人和执行者，而且也是中介，只有通过他们的行动和思想，历史规律才能变成规律。马克思关于“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

① “Marksizm i voprosy iazykoznaniiia.”

② “Economic Problems...,” ref. 5, p. 2.

[89] 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sup>①</sup>的说法绝不是一种不经意的评论，它确实道破了在以下表述中有其雏形的唯物史观的第一原理：

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人只须认识自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评价这些关系，根据人的本性的要求，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这样，它就会解开现代的谜语了。<sup>②</sup>

这些表述不仅仅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早期理论的典型特征。<sup>③</sup>虽然1848年之后，特别是在《资本论》中，主观因素似乎被决定性的客观因素完全吞没了，重点和权重的这种变化是由马克思的研究聚焦在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引起的。该批判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命题，即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背着”个人肯定自身。盲目的客观因素至高无上，主体却成了受害者，而这对马克思来说是因为“人受到了他的劳动资料的奴役”。但是，重建主体这个目标没有变。

与此相反，苏联马克思主义却以这种使辩证的过程转变为机械的过程的方式要求主观因素服从客观因素。它对必然与自由之间关系的解释——这是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的主要问题，而我们也看到，这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本身的主要问题——是其特色。苏联马克思主义把自由定义为“被认识了必然”<sup>④</sup>。该原则符合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定义所作的重述，按照该定义，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sup>⑤</sup>。但是，对黑格尔来说，自由不仅仅是对必然的“认识”，

① Marx, *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 ed. Kautsky, Stuttgart, 1910, I, p. 388.

② Engels, “Die Lage Englands, 1844,”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ed. Marx-Engels Institute (Moscow, 1930), II, Part I, pp.427–428.

③ 关于该问题的讨论，参见 Leonard Krieger, “Marx and Engels as Historians,” *Journal of History of Ideas*, XIV, no. 3 (June 1953), pp.396ff.

④ 例如，M. D. Kammeri, in *Voprosyfilosofii*, no. 6 (1952)。

⑤ *Anti-Dühring*, Part I, ch.xi.

也是“被理解的”(begriffene)必然。因此,必然在自由中被实现、被扬弃(aufgehoben, cancelled)。仅仅“认识”还不能将必然变成自由;黑格尔的“被理解的”必然“不仅仅是抽象否定的自由,而是具体的、肯定的自由”——只有这样,它才是必然的“真理”。从必然过渡到自由,是过渡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存在维度,黑格尔称之为所有辩证的过渡中“最困难”的过渡。<sup>①</sup>

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现实中,苏联马克思主义使这种过渡的可能降到了最低,并且使必然同化了自由。这样的同化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辩证的变革——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中表现了出来。这种解释本身仍坚持继承下来的理论构想。马克思的辩证法规定,决定着社会制度的结构和进程的矛盾随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改变。苏联马克思主义把“对抗性的矛盾”(“冲突”)与阶级社会联系在了一起,而把“非对抗性的矛盾”与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联系在了一起。前者无法消除,只能通过爆炸来“解决”,而后者通过“科学的”社会、政治控制很容易被逐步解决。<sup>②</sup>但是,在两种情况下,矛盾都趋向于社会制度的质变——只是量到质的转变在无阶级的社会基础上是“无爆炸性的”。

[90]

消除辩证发展的“爆炸”内在于马克思的构想本身。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量到质的转变的“灾难性”是盲目运行的、不受控制的社会经济力量这个领域的典型特征;随着社会主义的建立,整个社会将会合理地控制这些力量,将会自觉地调节其与自然的斗争以及与自身矛盾的斗争。此外,具有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模式的变迁早已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得到了规定:理性一经达到自由和自我意识的层面(“自在自为存在”),它同时就会支配这个层面更进一步的过渡。与此类似,马克思把“否定之否定”这

① *Encyclopedie...*, Vol. I, pars. 158–159. *Science of Logic*, Book I, sec. iii, ch. iii, C.

② 除上述参考文献外,另参见 M. M. Rozental, *Marksistskii dialekticheskii metod*, Moscow, 1951, pp.283ff.; S. P. Dudel, “K voprosu o edinstve i bor’ be protivopolozhnosti kak vnutrennem soderzhanii protsessa razvitiia,” *Voprosy dialekticheskogo materializma*, Moscow, 1951, pp.73ff.

个概念具体地运用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具有“自然规律般”必然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造成了它自身的否定，而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否定之否定”。<sup>①</sup> 苏联马克思主义宣称，布尔什维克革命为社会主义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基础。所以，斯大林从他的辩证法规律表中除去了“否定之否定规律”。此外，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在中央计划的框架内，社会主义的基础才能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有意识地调整生产关系。因此，即使是基本矛盾也会变得易于控制。他们对辩证法的讨论只不过是反映了这些基本命题。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正统的”。因为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苏联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他们不断地给它披上相应的辩证的外衣。这并没有牵涉到辩证法的“修正”，不过牵涉到了社会主义对非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而辩证法本身按照这种流传下来的正统形式被用到了证实该要求上。

这一切似乎可以证实，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讨论只有通过消除或减少马克思辩证法中的元素才能保护既有政权和替它辩护，因为所有那些元素都表明，社会历史发展是连续的，它将超越该政权，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换言之，苏联马克思主义为了当前的事态只能“束缚”辩证法——意识形态将与现实中受到束缚的社会主义保持一致。不过，现实状况更为复杂。苏联的意识形态及其应用都不可能摆脱客观历史动态的影响，因为该政权宣称这种动态就是它至高无上的规律和基础。甚至最为中央集权的、极权主义的计划也要服从该动态，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的运行超出了计划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发展，特别是西方世界内部的稳定性和洲际整合，似乎驱使苏联走上了全面调整——为了打破“外部矛盾”领域的僵局，要求加大解决“内部矛盾”的力度。<sup>②</sup> 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专门用语，内

① *Capital*, Vol. I, ch. xxiv.

② 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我曾试着阐发过这个论题。关于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之间的区别，参见 *Stalin's K itogam rabot XIV konjerentsii RKP (b) . Doklad aktivu moskovskoi organizatsii RKP (b) , 9 maia 1925 g., Moscow, 1933.*



部矛盾的根源是生产关系仍然滞后于生产力，<sup>①</sup>要逐步调整这种滞后就得通过准备用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措施来完成。这种趋势也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根据现实对意识形态的同化，该趋势不仅会被注意到，甚至都可能会在意识形态中被先行讨论。最近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讨论似乎印证了该假设。他们为了增强该政权的灵活性，似乎正在进行意识形态的准备工作——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生产能力，将重新调整生产关系和消费水平，同时相应地调整国际战略。

这种趋势似乎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中准确地体现了出来，因为他们的立场像是在防范把辩证逻辑运用于当代事态，也可以说，像是在恢复形式逻辑。近来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之间关系的讨论和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整个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该文中，斯大林指出，谈论语言的“阶级条件”和设想一种特定的“社会主义语言”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荒谬的。他坚持认为，语言与“上层建筑”“在原则上不同”，它并不随着基础的改变而改变，而是比这种或那种基础更持久：它并不是某些阶级而是整个社会历经数个世纪创建的，它并不“服务于”某些阶级而是整个社会。出于同样的理由，苏联马克思主义现在坚持认为，将形式逻辑看成“以阶级为条件”并设想一种与苏联新的社会基础一致的特定的“苏联逻辑”是荒谬的。<sup>②</sup>关于逻辑的讨论结果的报告总结道：“思维的逻辑形式和规律并不是社会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形式逻辑是一门关于正确思维的基本定律和形式的科学。”“并没有两种形式逻辑：一个是旧的、形而上逻辑，一个是新的、辩证逻辑……只有一种普遍有效的形式逻辑……”<sup>③</sup>辩证逻辑并没有否定、取消或反驳形式逻辑的有效性；前者从属于不同的知识维度，它与后者的关系就像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的关系。

[92]

① Stalin, "Economic Problems...", ref. 5, p. 14.

② V. I. Cherkosov, in *Voprosy filosofii*, no. 2 (1950) .

③ *Voprosy filosofii*, no. 6 (1951) .

我们在此并不关心讨论的过程和结论。<sup>①</sup>但值得注意的是，正在变化的趋势预示着左派“马尔主义脱离了正道”以后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按照马克思理论的说法，语言与逻辑本身都不是上层建筑，毋宁说，它们是基本的社会关系的先决条件，作为交流和知识的工具，它们对建立和维持这些关系来说必不可少。不过，语言和思想的某些表现是上层建筑，比如，在艺术、哲学、宗教中。依照马克思的构想，苏联的讨论把逻辑本身与逻辑科学区分了开来：作为逻辑的一种特定的解释，有些逻辑科学必须被归入意识形态。<sup>②</sup>但是，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都没有否定形式逻辑的有效性，毋宁说，他们通过在辩证的概念——揭示了“常识”和“科学”必要的抽象性——中展开它的内容保存并证实了它的真理性。

[93] 较之于传统的辩证法，“马尔主义”的语言学和逻辑确实像是粗俗的“左派脱离了正道”，像是共产主义不成熟阶段的“幼稚病”。<sup>③</sup>它似乎是第一阶段斯大林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副产品。为解决国家技术和工业落后发动的暴力斗争，通过对很大程度上被动的甚至敌对的人口实施恐怖行动得到了强化，转而又在各种关于苏联人的独特性与优越性的学说——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占有”，即他将其当成了唯一正确的、进步的“世界观”——中找到了它在意识形态上的补偿。但是，马克思理论本质上是国际性的：在该框架中，仅就民族主义是历史过程的一个阶段而言，它是进步的，因为按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说法，发达的西方世界早已超越了该阶段；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苏联马克思主义在调和它自身的民族主义与马克思的国际主义的关系上从未取得成功，而在“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和真正的国际主义之间、在沙文主义和“苏联的爱国主义”之间费尽心思做的区分就是很好的例证。此外，强调特殊的苏联心态、逻辑、语言等，

① 关于他们给出的结论，参见 *Voprosy filosofii*, *ibid.*；另参见 Gustav Wetter, *Der Dialektische Materialismus*, Vienna, 1952, pp.544ff.。

② I. I. Osmakov, in *Voprosy filosofii*, no. 3 (1950)。

③ 在此，我们仅关注斯大林主义对马尔学说的评价，不涉及学说本身。

这必定削弱呼吁在最终的革命目标上保持国际团结的感召力，而社会主义学说与一国共产主义学说是绝不可能抛弃该目标的。在“魔法般地”利用马克思理论的过程中，“马尔主义”理论可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苏联社会技术、工业的进步，随着苏联国家政治、战略力量的不断增强，它们与更基础性的目标产生了冲突。在苏联政策开始以向共产主义过渡为导向时，马尔主义学说被迫让位给了更为“共产主义”、更为普遍和国际主义的构想。近来重申语言与逻辑是人类共同的机能和内容，似乎是为了促使意识形态与驱往发展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即（按照苏联的说法）社会主义的第二个阶段，亦即（按照更为现实主义的说法）加大改善苏联生活水平和稳定国际环境的力度——的动力保持一致，而根本没有为了稳定所达到的发展水平而“束缚”辩证法的意味。

## 1954年版《理性和革命》的增补后记<sup>①</sup>

法西斯主义与民族社会主义的失败并没有遏制极权主义的发展趋势。自由在倒退——不管是在思想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的理性理念都没有更接近实现；无论是精神的发展还是革命的发展也都没有以辩证理论所设想的形式进行。不过，这些偏离是该理论所发现的结构内在固有的——它们并非来自外部；它们并不意外。

从一开始，理性的理念与现实在现代就包含着危及其自由的承诺但却满足生存的元素：通过人自身的生产力来奴役人；美化延迟满足感；强行操控人内部和外部的自然；在支配的框架内发展人的潜能。从黑格尔的哲学来

---

<sup>①</sup> “1954年版的增补后记”作为第二版《理性和革命》——即马尔库塞的权威研究“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引用了它的副标题）——的补充，1954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刊行出来（参见 *Reason and Revolu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433-439）。然而，1960年面世的灯塔出版社平装本的《理性和革命》加入了新的前言，但却没有包括我们在这里发表的“1954年版的增补后记”。该文本对马尔库塞版本的“发达工业社会”作了简明概括，他认为，包括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在内的“发达工业社会”随着把这一被黑格尔和马克思视为批判意识或革命意识主要特征的“否定性精神”有系统地吸收到了有组织的、顺从的工业技术生产体系，也把马克思理论中的整合工人阶级这个革命手段吸收了进来。对于这篇简短的“1954年版的增补后记”中概括介绍的这一预见，马尔库塞在后来的著作中继续不断地阐发，在《单向度的人》（1964）中完成了对它的经典表述。——编者注

看，胜利的精神却把国家抛给了现实——它没有被精神所征服，尽管它承诺了权利和自由，但它却是压制性的。黑格尔将市民社会及其国家看成是理性**在历史上的充分实现**——这意味着，它们不是理性的**最终实现**。后者被推给了形而上学：借由亚里士多德把努斯（Nous）描述成了神（Theos），黑格尔结束了对自身体系所做的百科全书式的展示。从开始直到最后，西方哲学对理性与自由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致的。精神的神化意味着承认它在现实中的失败。黑格尔哲学是最后一个还敢把现实理解为精神的外在表现的哲学。但后来的历史使这样的尝试破灭了。

黑格尔从否定性力量中看到了精神的生命元素，并因此也看到了理性的生命元素。这种否定性力量说到底就是以不断发展的潜能为依据，通过拒绝已经成为自由进步障碍的“肯定”来理解和改变既定事实的力量。只要自由尚未成为现实，理性在本质上就是矛盾、对立、否定。如果理性矛盾的、对立的、否定的力量被破坏了，现实就会根据它自身的实在法（positive law）运动，并且不受精神妨碍地展开其压抑性的力量。否定性力量的逐渐衰落事实上一直伴随着后工业文明的发展。随着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控制越来越集中、越来越高效，所有这些领域的反对不是被安抚了下来，就是达成了妥协，要么就是已被清算。矛盾已经被积极的肯定所吸收。1816年，民族解放战争结束后，黑格尔曾声援他的学生反对一直以来“吞噬其他利益以据为己有”的“政治事务”和国家，要有捍卫“真理的勇气”，勇于捍卫思想，把精神力量当成最高的价值。如今看来，精神似乎有了不同的功能：它有助于组织、管理和预测各种力量（the powers that be），也有助于清除“否定性力量”。理性本身已经等同于现实：现实的就是理性的，尽管理性的还没有成为现实的。

[95]

马克思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定义理性的尝试是否会遭到同样的命运？马克思认为，工业社会已经创造了理性和自由实现的先决条件，但是它的资本主义组织却阻止其实现。生产力完全成熟，战胜了自然，物质财富在已有的文化水平上足以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低程度的基本需求，这些是社会主义的先

决条件，而这些条件已经具备。然而，尽管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的自由之间存在着这样实质性的联系，但马克思还是认为，只有革命和革命的社会阶级才能完成这个过渡。因为在过渡中，涉及的内容要远比解放和合理地利用生产力更多，也就是说，不仅仅只是解放人本身，废除劳动工具对人的束缚，而是要彻底地重新评估现有的一切价值。只有这个“更多”才会由量变引起质变，从而建立一个不同的、没有压迫的社会——对资本主义的规定的否定（*determinate negation*）。这些新的原则与价值只有通过一个摆脱了过时的、压抑的原则与价值的阶级才能实现，而它们的存在正好体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并因此也体现了反对和克服该制度的历史可能性。马克思把无产阶级视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绝对否定，而这个理念以特定的观念简化了自由的先决条件与自由的实现之间的历史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讲，解放以自由为先决条件，它只有借助于自由的个人——不受需求与利益的支配和压迫——来实施和保持才能实现。除非革命本身通过自由继续前行，否则对支配和压迫的需求就会被带入新的社会，而个人“直接”利益与“真实”利益之间致命的分离就会无可避免；个人就会变成他们自身解放的目标，而自由就会成为一个行政法令问题。进步就会成为进一步的压迫，而延迟自由也将会威胁着要自动推进、自我延续下去。

[96]

直到马克思去世以后，在自由资本主义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过渡中，革命前无产阶级与革命后无产阶级之间关系的决定性意义才得到了证实。正是这一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列宁主义，也决定了苏维埃社会的命运——它在一种新的压抑性的生产力体系下向前发展。马克思把“自由的”无产阶级看成是对现有社会秩序的绝对否定，这个观念系属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在这样的社会，基本经济规律和关系的自由运行将加大内部矛盾，把工业无产阶级变成该矛盾的主要受害者，把他们变成革命地解决该矛盾的自觉的行动者。当马克思设想从发达工业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生产力已经发展成熟，还因为对它们的不合理使用、内部矛盾已经发展成熟并且废止它们的意志也已经发展成熟，而对于马克思

的社会主义思想来说，这些都至关重要。但恰恰是在发达工业社会，自世纪之交开始，内部矛盾就已经开始臣服于越来越高效的组织，同时无产阶级的否定力量也被逐渐削弱了。不仅仅是小规模“工人贵族”，甚至是大部分的劳动阶级都被改造成了现有社会的肯定的部分。过剩的生产力提高了生活标准，这还不足以促成过渡。在恩格斯1895年去世的时候，发达工业社会的劳动阶级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已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有倾向性的改善，大大超过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描述和预测的水平。但是，恩格斯还是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对马克思的预言进行根本性的修正。恩格斯对劳工组织日益增长的合法的议会权力的重视似乎表明，他曾期待，随着工人阶级力量在健康运转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不断提升，劳动条件会得到进一步改善。该趋势似乎也没有驳倒马克思的构想。垄断时期的“超额利润”可以用来解释实际工资的增长，但这却是以牺牲“受过度剥削的”团体和地区为代价，以反复出现备战和战争为代价。并不仅仅是贫穷，而是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力的贫穷才使无产阶级成了一股革命力量。马克思的“贫穷”概念意味着人意识到了受到压制的潜能及其实现的可能性，意识到了异化和非人化。不过，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革命意识的发展。技术进步增加了需求和满足，然而它的使用同时也压抑了需求和满足：它们本身使服从和支配得到了维持。管理方面的进展减少了个人在其中依然可以“通过自身”和“为了自身”的维度，把他们变成了社会的总体目标。意识的发展变成了局外人的危险特权。因此，有可能使个人和团体实现超越的领域正在逐渐被消除，与此同时，抵抗的生命元素也在逐渐被消除。在这里，我们就讲几个主要的使后工业文明能够吸收其否定性的因素。

[97]

生产和分配部门的增加超出了个人和团体的控制，产生了一个职责高度中立的、公共的和私人的官僚层级结构。即使在顶层，职责也是可辨认的、不可更改的，特定的个人与团体利益唯有符合整个部门的持存和扩张这一压倒一切的利益的情况下才能肯定自身。后者事实上就是普遍利益、集体需求的化身。因为至少在发达工业国家，它使社会在不断改善的条件下以更好地

满足需求为目的保持着运转，而抵抗的合理性似乎显得更虚假了，或者说更没意义了。鉴于既定的事实和趋势，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假定，进一步的发展需要摧毁它现有的基础。对立的和解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开始实施，而这表明“客观上”革命的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融入了国家利益。

劳动生产率在现行社会制度框架内的大幅度提升必然带来大规模生产，但也必定带来大规模操纵。最终结果是，生活标准与集中到垄断者手中的经济力量的比例同时提高。同时，技术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力量的均衡。受政府控制的毁灭性工具的使用范围和效力使社会斗争的古典形式变成了守旧的、浪漫的形式。街垒丧失了它的革命价值，就像罢工丧失了它的革命内容一样。与劳动阶级在经济文化上配合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是他们的传统武器过时了。

苏维埃社会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有极大促进作用。它的发展从两方面影响到了西方世界的局势：(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欧革命的失败使布尔什维克革命与它所期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基础分离了开来，使它凭借自身资源走上了恐怖的工业化道路。因此，为了尽可能快地取得西方工业化的成就，马克思所斥责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压迫性和剥削性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出现在了苏维埃社会。较之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并不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少压迫性——但却更贫穷。马克思主义曾经崇尚自由观念，并用以反对普遍盛行的不自由，但它似乎已经丧失了现实的内容。在西方世界，共产主义并没有被当成是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而是被当成了较低的历史发展阶段，被当成了充满敌意的国外势力。为反对该势力，民族事业也就成了自由的事业。(2) 随后，苏维埃国家发展成了高度理性化和工业化的社会，发展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的、按照自身条件完全有实力与后者相竞争的社会，向后者对发展的垄断权和它塑造未来文明的主张提出了挑战。西方世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达成了统一。普遍利益已经把内部矛盾成功地组织了起来，现在正在对外部矛盾进行组织安排。国际合作反过来也能够使国内合作得到加强。顺从变成了一个生

[98]



死问题，不仅对个人来说如此，对国家来说亦如此。

此处列举的趋势被经常地、广泛地以“大众民主”和“通俗文化”等措辞来描述。这样的措辞很容易就变成错误的焦点：似乎该趋势起因于“大众”的崛起或特定文化价值和文化的衰落。后工业社会一旦根据它自身的生产力成功地控制了它自身的辩证法，该趋势就会看起来更像是从该社会的历史结构中生长出来的。这些趋势并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文化或政治领域。对个人进行预处理，把他们塑造成管理对象，似乎成了普遍现象。辩证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所设想的不同形式的理性与自由理念又一次变成了乌托邦。但是，退化与阻碍力量的胜利并没有使这一乌托邦的真理失效。反对个人最终解放的社会总动员，构成了当今时代的历史内容，也表明这种解放的可能性是真实的。

## 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 (1958)的序言<sup>①</sup>

重新思考马克思理论是理解当代局势最迫切的任务之一。也许再没有别

---

① 马尔库塞应杜娜叶夫斯卡娅 (Dunayevskaya) 的请求为她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这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写了这篇序言 (*Marxism and Freedom*, New York: Bookman, 1958, p.712)。杜娜叶夫斯卡娅曾经是托洛斯基 (Trotsky) 的秘书, 在她开始与马尔库塞通信的时候, 她刚成为美国持不同政见的托洛斯基主义团体的一员。杜娜叶夫斯卡娅最初给马尔库塞写信是为了积极响应马尔库塞的著作《理性和革命》, 明确表达他们对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兴趣, 而他们之间的通信保持了数十年; 参见 *The Marcuse-Dunayevskaya-Fromm Correspondence, 1954-1978. Dialogues on Hegel, Marx, and Critical Theory*, edited by Kevin B. Anderson and Russell Rockwell,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2, 这本书包括一篇非常优秀的背景介绍, 还包括杜娜叶夫斯卡娅与马尔库塞之间完整保存下来的通信, 以及杜娜叶夫斯卡娅与马尔库塞往日的同事、有时也是对手弗洛姆之间的通信。

马尔库塞的序言的开场白就是呼吁重新思考和更新马克思理论, 他认为马克思理论“准确地预见到了后工业社会的基本趋势”, 但“从它的分析中”似乎也得出了“如此错误的结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马尔库塞因质疑马克思理论中的无产阶级仍然是革命的主体而名声大噪, 而杜娜叶夫斯卡娅坚持的却是相对正统的观点, 也就是说, 她还把工人阶级当成是撬动社会主义革命的杠杆。但是, 马尔库塞和杜娜叶夫斯卡娅追求的都是批判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 都批判占据主导地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和霸权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尔库塞在序言中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即经典马克思主义就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综合, 并且与杜娜叶夫斯卡娅一样, 也认为哲学对马克思的事业来说一直以来都很重要。马尔库塞同样认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 不仅把马克思主义解读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革命理论, 还解读成了人的解放和发展的理论。——编者注

的理论能够如此准确地预见到了后工业社会的基本趋势——似乎也没有任何别的理论能够从它的分析中得出如此错误的结论。尽管 20 世纪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把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中推导出的诸多特征展示了出来，但这些矛盾并没有爆发最终的危机；“帝国主义时代”看到的不单单是西方世界实现了洲际的重组，还看到了西方世界实现了洲际的稳定化——虽然是或正因为是一种“永久战争经济体”。尽管社会主义革命在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构想的引导下做好了开始的准备，但是后来社会主义在共产主义轨道上的建设却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马克思的理念的实质内容。然而，要想重新思考马克思理论，单单强调现实与马克思的“预言”之间的反差，是无法完成的。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阐释成熟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向社会主义过渡时还没有顾及对它的“验证”，所以可以说马克思理论隐含着预测。但该理论的本质特征却拒绝这样的指认。马克思理论是一种对历史的解释，它以该解释为基础详述了政治行动——能够利用既有的历史可能性来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痛苦和不公的社会——的特征。因此，无论从它的概念结构来看，还是从它的政治实践来看，马克思理论一定都会“响应”历史过程中的现实：修正理论概念与受这些概念引导的政治实践是理论本身的组成部分。

[99]

然而，如果仅仅是为了在新的、意料之外的事实的影响下更正原初的构想才把这样的修正添加到该构想上，那么理论结构本身是会遭到破坏的。后者只有在修正本身就来源于原初的构想的情况下才能保存下来，因为历史的替代方案就内在于它。修正必须明确与理论基础的关联，也就是说，必须明确与工业社会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的关联。这个观念使马克思理论的各个层面统一了起来：最普遍的哲学范畴与最特殊的经济学范畴，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政治行动必须交由它来验证。

[100]

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的功能及其整个内容上的失败大大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理论的讨论。除少数例外（比如，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近来法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思考），辩证唯物主义不是被极度蔑视为马克思理论中的“形而上学的残余”，就是被形式化为一种

技术方法，或是被图式化为一种世界观：杜娜叶夫斯卡娅的著作不仅抛弃了这些以及类似的扭曲，而且还力图完全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在人道主义的哲学中——重新夺回该理论的整体统一性。

人们经常强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的哲学著述为马克思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奠定了基础。在长时期的遗忘或忽视之后，这些哲学著述在 20 世纪成了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全文首次发表之后。但是，马克思理论的哲学与经济学政治学“阶段”的内在统一性并没有得到阐明（也许不可能得到充分的阐明，因为尚缺少最关键的环节，那就是 1939 年和 1941 年首次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杜娜叶夫斯卡娅的著作远胜于先前的解释。它不仅表明，马克思的经济学与政治学自始至终都是哲学，还表明哲学从一开始就是经济学和政治学。马克思理论是在历史辩证法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它对历史辩证法也做了详细的阐述。它的出发点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势。它的“概念”来源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哲学洞察：这个社会为自由、理性的人的生存创造了先决条件，同时也妨害了自由与理性的实现。换句话说（由于“自由”这个词的普遍滥用，这个术语差点遭到禁止），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在没有辛劳、贫穷、不公和焦虑的情况下生存的先决条件，同时却把辛劳、贫穷、不公和焦虑保留了下来。

马克思并没有追问这样一个目标的“价值”。他并没有把“人道主义”当成是哲学，而是当成了历史事实，更确切地说，当成了历史可能性；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可以通过改变阻止该实现的、既定的社会条件而被建立起来。就像人们把健康的价值当成了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标准那样，他把人道的社会（社会主义）的“价值”当成了思想和行动的标准。马克思理论并没有描述和分析“自在自为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不以它本身而是以历史可能性——变成了行动的现实目标——描述和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都是双向度的：以它自身客观历史的潜能和能力来权衡现行的社会。这种双向度特征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统

[101]

一中表现了出来。马克思哲学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每个经济学范畴都是哲学范畴。这种统一在杜娜叶夫斯卡娅对《资本论》的讨论中被很好地提了出来，该讨论表明，马克思对生产流通过程的极具技术性的经济学分析就像他的黑格尔批判及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样，都坚定地相信人道主义哲学。

人道主义的理念一旦不仅仅被看成是马克思理论的起源和目标，而且还被完全看成是它的实质，马克思理论深层次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成分就会显露无遗。社会主义不能以使劳动得到解放和组织的方式而要以“废除”劳动的方式来实现自身。只要人与自然的斗争需要人类为了努力取得生活必需品而辛苦劳作，那么能够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社会劳动组织就是真正理性的。在发达工业社会阶段，此种组织的建立“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对马克思来说，这要通过革命以使生产过程受到“直接生产者”的集体控制来解决。但这并不是自由，自由是没有辛劳、忧虑的生活，是发挥人类的能力。自由的实现是一个时间问题：将工作日减至最低，从量变到质变。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社会，自由时间而不是劳动时间在这里是衡量财富的社会标尺，是个人的生存维度：

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绝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也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能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

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

此外，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像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劳动不可能……成为游戏……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

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个主体。<sup>①</sup>

[102] 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形象，在这里，个人的“职业”会把他的自由时间塑造成他自己的时间，而由自由的个人组织和控制的物质生产过程会创造实现他们“消费”自由的条件和手段。

如果社会主义取决于缩短“绝对必要的”劳动直到使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谋生与生活的关系发生颠倒的程度——易言之，如果自由时间是个人生存的内容，那么社会主义的条件就是拥有最高机械化程度的发达的工业生产。因此，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成熟资本主义的最终事件。但是，社会主义与发达工业主义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技术经济上的。它还涉及发展那些能够带来自由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全面的”）个人的能力，尤其是发展“意识”。在马克思理论中，意识有一种特定的内涵，即对社会特定潜能及其遭受扭曲和压抑的意识，或对直接利益与现实利益之间差异的意识。意识因此表达了对既定社会的“规定了的否定”，是革命的意识，本身也是无产阶级的意识。从这层意义上讲，意识的发展需要制度化的公民权和政治权——言论、集会、组织、出版自由等，而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此提供庇护所。马克思坚持认为，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这绝不是一个幌子或“伊索式的寓言”，而是与他的基本观念紧密相关，因此不能通过同样有力地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差异来贬低其重要性。

历史辩证法不仅把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也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这种统一的力量，正如杜娜叶夫斯卡娅反复强调的那样，并不来源于教条式的体系，而是来源于理解了历史动力。但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要服从该动力。因此，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必须都要以理论与现实之间在历史上的相互影响为基础来进行讨论。杜娜叶夫斯卡娅分析的最后部分专门

<sup>①</sup>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erlin: Dietz, 1953, p. 599.

做了这样的讨论。

自世纪之交开始，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关键就成了“自由”资本主义在国际范围内向有组织资本主义的转变，它稳定的经济和政治，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标准的提升。这场转变以决定性的方式影响到了发达工业国家的劳动阶级。在这些国家成功的官僚制的领导下，劳动阶级的大部分成员都从“绝对否定”变成了肯定既定的制度。随着西方革命潜能的衰退，社会主义也在逐渐丧失其传统的历史推动者和地区，并以本质上与马克思的构想不相容的方式后来在东方的落后地区建立起来。共产主义势力范围的增长反倒使资本主义国家紧密地焊接在了一起，反倒为稳定化和内部统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战争、萧条、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没能阻止该趋势。它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挑战，也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当代共产主义的最大挑战。

[103]

为了应对挑战，杜娜叶夫斯卡娅动用了她在其著作的第一部分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中搜集到的全部概念。虽然该序言的作者完全赞成第一部分的所有要点，及其对马克思全部作品的理论解释，却并不赞成她针对后马克思发展动态的分析的某些决定性的部分，特别是不赞成她针对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关系的分析、对最近东欧剧变的分析，但也许最不赞成的是她针对当代劳动阶级的立场、结构和意识的分析。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是“自在的(an sich) 革命阶级”，但这个概念指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团体，即从事物质生产的雇佣劳动者——它是一个真正辩证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经济、政治和哲学范畴。因此，它包括三个主要因素——（1）具有“自由”资本主义特征的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2）由该生产方式带来的生存和政治条件；（3）在该形势下发展起来的政治意识。这些因素中的哪怕任何一个在历史上发生了丝毫的改变都需要理论做出彻底的修正。如果不做这样的修正，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看上去就会既不适用于西方大多数的劳动阶级，也不适用于共产主义势力范围内的劳动阶级。

1957年7月

## 评乔治·里希特海姆的《马克思主义： 历史的批判研究》<sup>①</sup>

在我看来，这本书对自 1848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马克思主义运动做了最恰当、最明晰的描述。它集中研究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在不断变化的社会这个框架中成功地对各种不同马克思主义学派——修正主义、正统、中间派等——分裂的问题以及在该过程中原初理论的渐进转变做了追踪和分析。关于恩格斯的这一章可以说是其分析中最精彩的部分，它表明对批判理论的整理汇编已开始转向一般性“体系”。随之而来的批判性评论并没有损害它的成就。它们主要针对的是该书的最后一部分，该部分以“马克思的体系的解体”为题，（以 50 页的长度）阐述了自 1918 年至 1948 年以来的发展，不过未能保持先前的讨论水平。

在该书的前言中，作者写道，他的研究“并没有承诺要解救内在于理性思维活动的批判方法”（第 7 页）。在引言中，他说道：

---

① 马尔库塞对里希特海姆的评论《马克思主义：历史的批判研究》最初刊载于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77, 1 (New York: 1962), pp.117-119。这篇完全正面的简短评论认为，里希特海姆这本书“对自 1848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马克思主义运动做了最恰当、最明晰的描述”。在马尔库塞看来，里希特海姆清晰地概述了在历史情境内决定马克思的思想和政治活动主要倾向的因素，尽管里希特海姆也有错误。因为他没有充分考虑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否仍然适合当代条件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以后的岁月中也一直困扰着马尔库塞。——编者注



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他 [马克思] 的作品……它的前提是发展带来了更高的阶段，超越了在马克思体系中有所反映的阶段，换句话说，它假定马克思的范畴已经不再适合当前的历史了。(第 15 页)

但是，“历史的角度”绝不隐含着任何假设，不过，“换句话说”这个措辞似乎掩盖了**不合理的推论** (non sequitur)。马克思的范畴很可能已经不再适合，这是一个完全合法的论题，但必须对它进行证明。里希特海姆没有这么做，他也不会这么做，原因是这样的证明要求分析发达工业社会和这一与共产主义社会共存的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结构变化，而这超出了他这本书的范围。最后一部分对本书来说毫无帮助。在这里，里希特海姆只是重复着熟悉的老调和责难；他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描述很不充分，甚至本身就充满着矛盾，不但如此，他还把马克思完全变成了某种形式的穆勒。

[105]

最后一章的标题是“超越马克思主义”，但除了这个表述之外——马克思的体系已经瓦解，理由是，它并没有成为现实，即使在苏维埃社会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它也是被彻底扭曲了——我甚至连对这样一种“超越”的概括都没有看到。关于这一事实的陈述，即现如今的共产主义不仅没有实现甚至有可能扭曲了马克思的构想，我对此毫无异议，但我并不觉得这一使该陈述变成证明论题的“理由”有任何合理之处。我觉得有必要援引该章的最后一句话：

马克思批判理论能否站得住脚与人的行动会导致“史前史”的终结这个断言正确与否密切相关。除非该断言被证明是正确的，否则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被看成是与过去的彻底决裂。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劳工运动，该结局可能并不奇怪，但是说它意味着马克思的体系解体了，在该体系中有所体现的末世论的希望终结了，就太奇怪了。(第 400 页)

如果接受这样的前提，即已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造成“与过去的

彻底决裂”（至少对古巴来说，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历史的角度”可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史前史显然还没有结束。为什么很难确定该结局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的体系解体了，主要是因为（就像里希特海姆自己令人信服地表达的那样）马克思的思想不是一个“体系”，而是一种批判理论，还因为这种理论并不是一种“末世论的”沉思。里希特海姆在此抛弃了他曾承诺的“历史的角度”。这要把马克思的范畴如其所是地看作是试图在一个对抗性的社会中对趋势与相反趋势进行规定的历史范畴。

在里希特海姆的书中还有另一个论点，它借助于翔实的资料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和阐述。它强调的还是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差别，成熟马克思逐渐放弃了他早期作品（直到1850年）中激进的革命政治纲领，渐渐接受了“从长远的观点看”，即把民主制度的成长和工会不断提升的合法力量当成他分析的框架。按照里希特海姆的说法，这种倾向在1864年就职演说中达到了高潮，在恩格斯的作品中发现了对其的修订。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重提以列宁、托洛斯基为一方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以及其他人为**另一方，他们双方之间展开的那场熟悉的争论。有关这方面的讨论，里希特海姆的尝试就目前来说最彻底，甚至可以说最有说服力。不过，我唯一想知道的是，里希特海姆在陈述他的论点的过程中是否低估了《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和《法兰西内战》中经济分析的革命内容。

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首先表示歉意，而实际上，需要致歉的地方太多了。恐怕，我的演讲可能很消极——但我相信，理解和讨论消极性是一切积极性的基本前提。现如今，“人性”和“人道主义”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困惑。很显然，它们的某些方面已经行不通。这些理念、这些概念看起来好像仅具有古文物研究的价值，也就是说，似乎人道主义与人性只属于历史。但是，它们只属于历史，这又是什么意思？如果某些事就发生在30年以前，那么这就是历史，然而，它却是现在的条件，并且还会影响我们的将来。我们在过去的这30年所学到的、早先并不知道的是：人类可以被迫做些什么。

---

① 正如译者查尔斯·赖茨下面的注释所讲，《人道主义与人性》最初是1962年柏林圣约之子会代表大会的演讲报告。虽然马尔库塞写给杜娜叶夫斯卡娅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8)的序言使他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盟友，但在本文中，马尔库塞却对人道主义的传统做了批判性的质问，并针对全面发展的人，提出了自己的唯物主义理想。依照马克思，马尔库塞强调说，人只有在他们的基本需求被满足并有能力“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的时候才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在演讲稿的后半部分，马尔库塞提出了现如今个人是否有能力独立思考和行动，当今社会是否对人的全面发展留下了余地这样的问题。本文写于《单向度的人》(1964)正在酝酿和准备一些关键的理念这段时期。——编者注  
马尔库塞在1962年柏林圣约之子会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最初的德文版刊载于 Peter-Erwin Jansen (ed), *Herbert Marcuse Nachgelassene Schriften: Philosophie und Psychoanalyse*, Lüneburg: zu Klampen, 2002, pp.122-130。本文的英译者是查尔斯·赖茨。

他们可以被迫成为非人类。此外，他们还能够以一种非常愉快的方式变得很圆滑、适应性很强，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不再保卫自己，因此，他们也就再也无法区分真理与谎言、教育与宣传。在我们能够理解正在发生什么和我们对此可以做些什么之前，我们必须重新学习如何看、如何思考。人类可以被迫做些什么是我们已经忘却的诸多经验教训之一，然而，权力精英并没有忘却。我们都愿意忘却虚假的东西，宽恕虚假的东西，但却不愿意忘却正确的东西，宽恕正确的东西。在历史中，任何东西都不会以同样的方式重复自身。即使某些东西重复自身，它也是以不同的形式，因此，人道主义和人性有了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如果可以，我想简要地回顾一下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历史意义。人道主义是一场发端于中世纪末期的思想运动，这场运动注意到了古典时期的研究有可能成为人格和个性自由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教育理念、文化理念应该反对一切野蛮的东西，反对一切非人的、不自由的东西。人性，是一个类概念，对所有人来说是统一的、平等的，高于种族、国家和文化之间的一切冲突。这就是人性的理念，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具有挑战的任务。

现在我想问的是：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人道主义与人性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通过古代世界的经典、文化教育，文艺复兴与18、19世纪注意到了反抗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与世俗的专制主义——需要人类进一步的服从、不自由、不幸——思想和政治压迫的人文教育。关于此时的古典文化的理念是否真的精确，以及从这层意义上讲，古典文化是否真的反抗压迫和不自由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论。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伟大的人道主义具有异教的、自由的隐含意义，而我们从“文艺复兴的代表”中，从拉伯雷、斯宾诺莎、歌德和（这里，我还想提另一个人的名字，他通常不被认为是人道主义者，但照我看来，他是最后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弗洛伊德——我在报告中很快就会讲到——中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个意义。每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都阐释了一种适合于他的时代的人性理念。但我们说一个理念适合于它的时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我想说的是，人性的理念和人性的实现都取

决于时代吗？换句话说，这些概念都可能被废弃吗？不是！但为了澄清这一点，我想就人性的本真意义是什么做一个简要的说明。人性——人。但人不是一种生物物种或属，并不完全是自然有机体，毋宁说，人是一个爱批判的、理智的群体，是一个历史的总体。这些特质在实践中决定了人之为人，决定了人不同于动物，也不同于非人，从而在这层意义上构成了人类。从根本上讲，这就是智思，但它不是一种抽象的能力，而是理解人的条件并因此改变条件以使残酷、无助、饥饿和愚昧能够被克服的能力。以这种方式理解智思的前提条件是思想独立。因此，它不是简单地遵从最先由其他人形成的思维习惯的能力，而是个人自主思考的能力。换言之，密切关联人性与人道主义的智思就其本身而言首要的就是自由，它把自由视为前提条件。当然，这种能够有力促进实现人的潜能的知识与智思现如今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个人，作为一个孤立的人，根本无法面对挑战。这是文明能够或至少应该承担起的反抗原始大自然，反抗一切压抑的社会、思想力量的历史社会责任。

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变人道了，它使人人平等（正如人道主义所表述的那样）走进了现实。这意味着，人人平等不仅仅承认那些特定的国家、种族或部落中的人，也承认超出该范围之外的人。此外，它反对把不同的国家、种族或部落划分为不同的人性。平等，是因为任何人都具备所有规定人之为人的素质和能力。同时，也正是这种人人平等为自由提供了可能。由于现如今曲解人人平等近乎成了一种义务，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解释这种居于人道主义核心位置的平等的实际意义。平等，从人道主义的意义来讲，按照基督以前的古希腊世界对它的理解，自然不需要人人完全一样，而是正好相反。在人道主义意义上，平等创造了这样的基本条件，在该条件基础上，任何人都能够满足他们自身的需求，运用他们自身的天赋，从而成为真正自由的、存在差异的并且其差异不受压抑的个人。由于这个原因，人道主义必须以这样的平等理念为基础；如果该先决条件不具备，人类就只能以牺牲他者为代价来获得自由。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以牺牲他者为代价获得自

[108]

由的个人依赖于没有自由的他者。为了使人性成为现实而不仅仅是理念，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到底是什么？它们可以被凝结成一个命题，即满足全人类生死攸关的需求。要完全满足，以便使人们的生活不再耗费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上，使工作不再仅仅是生活的手段，而是个人自身人格自由发展的表达。然而，如果这才算得上是人性，如果这才算得上是生存，那么直到现在都不存在本真的人性。因此，长时间以来，我们的文明都没有把我们的人性变成现实；所以，我们不应该轻言进步，也不应该因为古典时代坚持认为奴隶是自然的就迅速地看不起它。亚里士多德通过该断言——就像他的很多命题一样，也被误解了——到底想说什么？

他想说的是，那些人存在，但他们却不能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们必须把生命耗费在生产生活必需品上，从而他们不能过上本身就是目的的生活。这是因为他们是人的工具：他们是不自由的。正如您所看到的，亚里士多德对待自由非常认真。他认为，整天耗费在工作上，或者假期也耗费在工作上的人是没有任何自由的，因此，他认为奴隶没有人性。现如今我们知道，奴隶并不是天生的。我们知道，很有可能任何人都有人性（*Menschlichkeit*）。但是，我们因此已经战胜了奴隶制吗？还是说，它已经被内化了，变得更普遍、更民主、更和善、更不成问题了。生存斗争仍在继续，与以前相比，它的残酷性丝毫不差，不仅对个人来说如此，对全世界的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如此。这种斗争并没有变得越来越容易；它正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越来越有破坏性，越来越不人道。如此看来，当暴力的辩护者说诸如人道主义和人性等概念都是抽象的概念、资产阶级文化的概念——已变成了陈词滥调——的时候，他们还是正义的吗？不是，人道主义不仅仅是那种类型的概念，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作为历史运动的人道主义已经坍塌。但我们也要承认有些事情更复杂：我们当今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人道。这是因为不人道的程度只能以一种方式进行评估，那就是对照使每个人都过上人道的生活的给定的可能性。而给定的可能性，技术的可能性、经济的可能性，现在比它们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大。随着这些可能

[109]

性的增加，破坏性也在增加。文明在核战争持续不断的威胁下，在全球毁灭的威胁下，仍然继续大步向前迈进。不过，人道主义对此无须负任何责任。该负责的是人道主义既遵从同时又抗议的文明。请简单地回顾一下弗洛伊德对这种罪行所做的诊断。他曾预言过这场灾难。他认为，文化进步要求压抑欲望和冲动，压抑他所说的快乐原则。这涉及生物满足自身需求和欲望的最核心的冲动。文化就建立在有机体压抑这种快乐原则并且成了（商品化的、雇佣——赖茨注）劳动工具的基础上。

面对这种压抑，个人会本能地反抗父亲，反抗一切代表父亲和通过社会道德对本能实施压抑的社会因素。不过，这种受社会因素压抑的本能又进一步受到了压抑，因为，愧疚感——由于反抗父亲而产生的愧疚——被固定在了个人身上，并且正变得越来越强烈。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就是：有生命力的冲动和性爱的乐趣持续地减少，倾向攻击、破坏和死亡的冲动却不断地增加。同样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随着文化的进步，这种灾难性的发展动态得到了加强。它得到加强，是因为更多的技术进步使得通过越来越少的劳动来满足生活需要成了可能，而必须再次压抑本能却变得更为紧迫起来。如果没了生存斗争，那么建立在必要劳动基础上的文明就会瓦解。但是，不断发展的文化要想维持这些压力，那就只能为本能提供一个（功能越来越好的）安全阀，它可以把破坏性的冲动释放出来。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这些联系是一种必然。文化是否进步取决于物质和思想资源的破坏程度，因为只有破坏到了一定程度，才能使工作、财富、征服自然、科学与技术成为现实。然而，最终个人要偿还。生活水平与备战程度共同提高；人口与种族灭绝事件同时增加；航空技术与民族侵略齐头并进。这就是弗洛伊德的观点。

还有谁不相信这种发展的不可避免性？请我们不要低估为避免大灾难而必须做出改变的程度。传统形式的人道主义已经被毁灭。我曾说过，这不是人道主义的错，但就像我想简略地向您说明的那样，人道主义也负有部分的责任。人性借以实现自身的方法和手段随时间发生了变化。现如今，人道主义的观念已不足以完成该任务。传统人道主义的主要缺陷是，它坚

[110]

持的是旨在培养人的内在感知和在现实中仅面向精英的特定的生活方式的人文教育。

全面发展的人格、人道主义的理想、智育以及体育训练都以一定程度的物质和精神独立为先决条件，但只有极少数的人具备该条件。因此，人道主义通过逃入与公共领域、社会领域相分离的个人的人道主义这个私人领域避开了可悲的生活条件。人们在家中或在礼拜天有可能是人道的，但在工作日期间却加入了侮辱人性的行列。举例来说，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歌德，这位魏玛公国法院的部长，在一名因杀害自己的孩子而认定有罪的女人的死刑书上签了字，随后歌德在《浮士德》(*Faust*)中——令人激动地把不人道的死刑呈现了出来——饱含同情地对这场悲剧做了描述。但是，社会存在的悲惨现实通过这些崇高的价值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实际上，这些崇高的价值很容易就会成为不人道的社会的包装。人们有可能在为他们的歌德和贝多芬感到自豪的同时，却建造集中营。尽管如此，人道主义还是促进了文化的人性化。文明确实变得更人道了，法治也变标准化了，预测性更强了。社会变得更民主了，贫穷慢慢地消退了，社会秩序也变得更加合理、更加安全。我所说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们必须承认，相比那个时代，现在更缺少人道主义，更缺少自由，却更加暴力，更具有破坏性。人道主义的无力感不断增强，而它的缺陷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它并不正视现实；它还没有完全消除知识的、精神的和理论的限制。它已经对仍然与人类命运紧密相关的政治毫无影响。如今，人道主义必须变成政治上的。它变成某种政治纲领的条款吗？变成统一战线组织的口号吗？当然不是！如今，人道主义与当代任何一个政治组织都不相容。如今，人道主义者对当代任何一个政治组织来说都不受欢迎。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因为这些组织要争取的正好是人道主义者一直都反对的。如今，人道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辨别和交流刚刚发生的一切。识别与谴责邪恶是战胜邪恶的先决条件，这一点现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识别坏的事物就够困难了，而谴责坏的事物就更令人不快和危险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道主义现如今要求的是毫不妥协地批判当



代世界形势，但这很难。

识别那些反对满足的力量已变得越来越难，因为它们越来越多地隐藏在了控制人类与自然的先进技术背后。我们怎么可以批评一个正在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让生活变得更舒适的社会？批判并不容易：真正人道主义的批评把注意力都放在了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及其战略上。因此，人道主义现如今在东方很容易以一种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而在西方很容易以一种共产主义的形式出现。更准确、更具体地讲，现如今人道主义的批评到底需要注意力放在哪些问题上呢？当代文明到底是怎么破坏了它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自我实现的历史机遇的？为了整个地消灭敌人所做的整个准备为何同时也是为了消灭自身？和平的危害相比核战争的危害或削弱现在和未来一代人的智力与体力的危害为何更好，而可能性却更低？为可能发生的战争所做的军事和经济准备怎么会再一次形成这样的力量——它们构建了摧毁人类的工程，而这在我们有生之年曾经出现过。可见，人道主义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文化、教育、同情已经远远不够：现如今，在这些领域，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名人道主义者。但是，仅以这种方式，他们从来都没能阻止屠杀。人道主义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肃，不过人类毁灭的可能性越大，文明就越会运用一切供其支配的科学技术手段来把人性变成现实。

最后，请允许我再给大家提一下 20 世纪伟大的、标志性的创作——勋伯格的《摩西与亚伦》(*Moses and Aron*)，你们中的许多人昨天都看了这部歌剧的精彩演出。这是一件密切相关、内容丰富的艺术作品，因为，正如这个作品所描述的那样，摩西与亚伦之间的斗争似乎从未终结；事实上，它可能仅仅是一个开始。摩西与亚伦之间的斗争：虚假的形象，一种虚假的自由、虚假的人性的形象；与要求实现的（人的解放的——编者）理念和概念相对立。虚假的行动与知识相对立，与要求实现的原则相对立。一个有能力征服宇宙空间的文明也应该有能力把地球塑造成使每个人都享受人类的尊严和价值的地方。然而，我们切不可低估摆在这项任务面前的无尽的消极影响。正如摩西和亚伦的故事所讲的那样，在这项任务可能被完成之前，我们

甚至有可能必须再次走进沙漠。

最后，正如我一开始所讲的那样，我想对我消极的态度再次表示歉意。但我认为，消极是改善的先决条件。

[《为何要继续谈社会主义》(HMA 0500.01)是一篇未竟之作,在其标题上方留有手写的标注(可能是案卷保管员或早先的研究者的笔迹):“HM UCSD Feb. 24, 1975”。对于该文完成的时间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参考,而当时马尔库塞正在他所隶属的圣迭戈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所工作,正处于其知识分子和政治生涯最动荡的时期。越南战争最终于1975年4月以西贡的失败宣告结束(美国早早地就将军队撤离了越南),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之后几无幸免地受到了弹劾并被撤职,刚刚辞去美国总统的职务;福特成了非民选的美国总统;反动的加利福尼亚州长里根的第二个任期刚刚结束,而在任期内,他找了一个迫使马尔库塞退休的机会,使他离开了教职。不过,在马尔库塞退休之后的1975年2月这段时间,他在加利福尼亚圣迭戈分校(UCSD)还是不时地讲课。这段时期政治动乱持续发酵,其中就包括大学激进分子与社会主义团体之间很多有争议的对抗。该手稿有力地再次声明了社会主义在现如今美国的逻辑必然性,但是它的结尾却很唐突,只是对宗派式的争论做了警告。这份19页的文本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激进的演讲的草稿,因为它仅仅拟订了大纲,其大部分为三倍行距,还附有被证明是马尔库塞手迹的修订与补充,以及少许出自不知名的誊写员的旁注。下面的副本完全遵循打字稿,一字不变地保留了残缺句、句子片段以及原初的强调,同时将明显同类的句子合并成了段落。——译者赖茨注]

[112]

## 为何要继续谈社会主义？

为何继续谈社会主义？是因为现存社会制度的替代方案，即这个国家可以实现的替代方案似乎渐渐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马克思把社会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唯一的历史继承者，它认为社会主义在消除了具有破坏性的资本主义之后可以带来人类的进步。要获取客观的描述就必须（尽量）对现存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在马克思看来是否可做如此称谓暂且不作判断，忽略数不清的马克思主义团体（老左派和新左派）——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的无数不同的解释。

“替代方案” = 取代整个现存制度，而这不仅意味着另一种能更好地（更公平地）运作的制度（经济的和政治的），还意味着“新的生活品质”，即新的生存方式 = 非异化的关系……（我稍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但为什么是一种总体上的替代方案，而不是改革，不是在资本主义**内部**修正呢？原因是——我们在这里遇到了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念——现行的危机就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结构，而它势必随着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而更加恶化：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也在摧毁自身！因此，任何改革都毫无意义。这个观点——**整个社会都是病态的、破坏性的，已经过时了**——已有了**通俗的表达**：对这种制度“失去了信心”；职业道德下滑，拒绝工作等。

[113]

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包含着三个需要证明的假设。其一，资本主义在发展

过程中形成了无法解决的、不断恶化的冲突（矛盾），而资本主义本身就建立在该矛盾基础上。其二，同时，各种社会力量从这种制度**内部**生长了起来，而这也预示着这样一种历史可能性，即紧接着将过渡到社会主义，（1）**客观表现**是自由企业经济向垄断与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和首次实现所有权的“社会化”股份公司；（2）**主观表现**是有政治觉悟的工人阶级构成了革命的基础。其三，社会主义是历史上唯一以更加美好的社会为目标的替代方案（= 非乌托邦的、“科学的”、“有规定的否定” [definite negation]）。

从当代美国的景象来看，即从“能源危机”、民主政治的腐败、失业、通货膨胀来讨论，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来讨论。

马克思的理论模型是在自身最适的条件下运行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 = 在竞争条件下为获取私人利润而生产，它只有不断发展，扩大积累、投资和商品销售，才能运行起来，因此它需要通过技术进步、机械化、合理化、高速化的生产系统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资本 = 可变资本 + 不变资本！后果就是，资本越来越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自由竞争造成了垄断（辩证法！），造成了国内市场的饱和，因此，在强化对大都市与第三世界劳动力的剥削的同时，出现了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殖民主义，军备竞赛，自发生产废品，计划报废，适合于受特别优待的大都市居民的小玩意、奢侈品。结果就是持续不断的生产过剩。

但是它内在的**增长极限是**：除少数寡头垄断巨头以外，利润率几乎全面下降；工人阶级抵制工资压力（在这里，容忍同样也是有极限的！）；资本家内部的竞争缩小了世界市场；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

**与这些极限赛跑**：创建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把统治权赋予通常的国际资本利益，即拥有超越于所有国界和意识形态差异（与苏联和中国做交易）之上的权力的跨国公司。不过，在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之间又产生了**新的冲突**：（1）1973年菲律宾的埃克森石油（Exxon）子公司拒绝把石油卖给美国海军；（2）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制定了外交政策，因此也削弱了美国的外交政策；（3）向国外出口**产品**与技术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带来了

失业、收支不平衡，也造就了竞争对手；(4) 主权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已经过时——这是资本主义何以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逐渐破坏了自身的基础的另一个实例，(a) 经济上：自由竞争与自由企业已经消失，(b) 政治上：国家主权不断削弱。

[114] 这场在美国国内与资本主义内在极限的赛跑不仅使生产更为“过剩的”商品与服务成为必需，也使**创造购买**这些商品与服务的需求成为必需。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所付出的代价是以更为挥霍浪费的方式开采能源（自然和人力！），继续保留全日制的**异化劳动**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与此同时，**当前的危机**——增强了的机械化引起了技术性的失业，同时由于价格飙升、市场饱和以及实际工资下降，商业出现了萎缩。资本通过垄断性地实施高价格——即通货膨胀——抵消了萎缩，但有没有达到治愈的效果呢？（参见 Gundar Frank）

【前美国总统杰拉德】**福特计划**，即帮助富人并迫使穷人更努力地工作，就是对新资本主义的逻辑回答。举例来说，关于减免税收，财政部长**西蒙**认为，“货币必须流向年收入在两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因为他们是最大的买家” [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22 (1975) ] ；**福特**也讲道，惩罚“中等收入的美国人”将是一个错误 [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23 (1975) ] 。而此时享有盛誉的补救措施是，结束不断激增的非营利性服务业，比如，“食品券、社会保障金和联邦政府退休金” (Ibid)，**削减教育经费**（不减免税收）。为什么呢？为了扭转“企业利润的下滑”。因为“政府害怕转向社会主义” [ *Budget Director of Los Angeles, Ash,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26 (1975) ] 。哪些企业“下滑”？同一份报纸还公布了埃克森石油公司、印第安纳与加利福尼亚的标准石油公司 (Stand. Indiana and California)、德士古公司 (Texaco)、美孚石油公司 (Mobil) 以及钢铁工业、银行业等创纪录的利润。其他企业还将继续依赖于巨大的政府补贴 [ 洛克希德公司 (Lockheed)、泛美航空公司 (PanAm) 等 ] ——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该计划不会有所助益，因为繁荣的崩溃就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它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那么

这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呢？

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力曾获得过最迅速、最全面的发展，现在却通过破坏性和浪费性的发展——全球性的军火交易、“非生产性的”白领工作、加强对人口的压制与控制——实现自身的再生产。资本的国家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它与利润最大化的需求紧密相关，它使富人与穷人、**资本与劳动**的冲突在国际范围内实现了再生产。贫富差距、发达与落后国家的差距正日益拉大。与此同时，在第三世界出现了有竞争力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支配重要物质资源的权力。这种发展隐含着爆发新战争的危险，还隐含着共产主义的对抗行动和长期的、巨大的以牺牲福利与真实需求为代价的“国防”预算。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巨大的社会资源、商品、知识财富与其毁灭性的、不公平的、挥霍浪费的利用的冲突**只是现代化生产与个人积累——这是为获取私人利润而生产的后果——这个基本矛盾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一般形式**从未如此明目张胆**，从未如此残忍，也从未如此昂贵的以人的生命与幸福为代价。然而——这正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意义所在——此种明目张胆的非理性不仅穿透了大多数人的意识，还引起了以年轻人为主体的需求与价值的根本性变革，而后者可能会被证明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等级结构、优先考虑的事项、道德、象征符号是**不相容的**【反文化、生态（运动——赖茨注）】……资本主义最主要的成就是它不仅带来了自身的退化，也带来了可能的替代方案！

[115]

主要的前提条件早就被提了出来，它们分别是：制定全球性的资源、生产、劳动力配置计划；结束私营企业，实现（私人——赖茨注）所有制与控制的分离，实施自动化，劳动时间有质的减少；尽量战胜短缺，征服自然。它们都指向从当前的压迫解放出来的社会与个人存在方式的出现，以及相应的新制度的可能性。但是在受利润要求束缚的现存社会中，它们受到了抑制，受到了限制，变成了它们的反面，它们通过人们的劳动手段和劳动方式强化了对他们的奴役。（这到底能够持续多久是一个大问题）

它们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也是客观条件。但是，人们应该怎

样为之而战呢？谁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呢？显然，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来看，社会主义本质上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因此要为之而战的话，只能通过那些已经把自身从资本主义好斗的、压抑的目标与价值中解放了出来的人类，通过那些已经从私有制的异化影响中解放了出来、在贪婪的社会没有任何既得利益的人类。对马克思来说**没有任何问题 = 无产阶级不受所有这些利益的支配**，因此可以**无偿地支持社会主义**：贫穷、物质贫乏、痛苦都是革命的动机。（后来改成了“相对贫穷”，因为最穷的工人阶级不是最激进的阶层！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革命动机呢？）此外，考虑到马克思所讲的，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因此，要进行民主过渡，实现“民主专政”！

现如今，在大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已经不再是问题所在。工人阶级不再被认为是“无产阶级”——它改变了组成成分。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就是物质生产中的蓝领阶层。可是，如果不存在有能力改变再生产现存制度的生产方式的阶级的话，就不可能发生任何激进的变革！同时，考虑到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并且由于历史事实，即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在最发达的国家而是在许多极其落后的国家取得了成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被修改了，社会主义已被认为是通过废除私有制和控制，[借由]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经济计划，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

[116] 社会主义的理念就是把“跃入自由”视为质的改变，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但这却被诽谤为“乌托邦”……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团体一直以来都坚持形成于19世纪的观念、目标和策略，但却没有顾及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及其对阶级斗争的影响，同样忽视了在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的最高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可能性及其特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断错失现实关系，说那么多宗派行话，互相攻讦却从未攻击共同的敌人的原因。

【赖茨注：打字稿的主旋律此时突然停止。紧跟着是两页附件，它们详细阐述了两个相关的子主题，即能源危机与食品危机，而我们对此未加考虑，也未加评论。事实上，正如前面所讲，我想引起大家对马尔库塞去世前最后出版物的注意。他最后的思考强化了批判理论中劳动的人道主义和国家



基础，他与马克思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工人阶级仍然是资本‘本体意义上的’敌手……”。(Marcuse 1979, 第 20 页) 通过运用巴罗的“剩余意识”(Bahro 1977a, 第 376 页以下; 1977b) 理论，马尔库塞驳斥了他先前在《单向度的人》中所强调的制度对工人意识的整合。根据他在 1977—1978 年变化了的经济状况下的估计，一种“对抗意识”(1979, 第 21 页) 已经在不断地涌现，而它有可能使“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渗入底层民众”(1979, 第 21 页) 的意识。尽管马尔库塞早期曾提到过“受控制的知识分子”(kept intellectuals)——他们的意识被完全彻底地吸收或整合到了发达资本主义这种单向度的制度的意识形态之中，而葛兰西也提到过“受霸权支配的知识分子”(hegemonic intellectuals)，但是巴罗却坚持认为，即使苏联或东欧的国家工作人员（并未提及美国社会党党派心强的成员和领袖）通常也并不完全认同政治集团的政治路线。当社会矛盾在政治上变得更敏感的时候，制度性的思维很容易受到破坏，而剩余意识(überschüssiges Bewusstsein, 从字面上讲，即意识“泛滥”)在此就会大量地出现。(Bahro 1977a, 第 381 页) 马尔库塞在其知识发展的最后阶段认为巴罗的洞见极为重要。凯尔纳总结道：“实际上，巴罗与马尔库塞一直都认为，批判意识与解放性的需求一直都在发达工业社会——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矛盾的推动下持续不断地发展”(Kellner 1984, 第 308–309 页)。我们还看到，马尔库塞提倡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他就此反复地重申要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平台，而我们也一直都在努力搭建该平台 (Charter 2000, 关于该平台，请参见 <http://progressiveplatform2000.org/Charter-2000-Platform.htm>)。最后让我们重温一次马尔库塞上述生动的结论：“然而——这正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意义所在——此种明目张胆的非理性不仅穿透了大多数人的意识，还引起了以年轻人为主要群体的**需求与价值的根本性变革**，而后者可能会被证明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等级结构、优先考虑的事项、道德、象征符号是**不相容的**（反文化、生态[运动——赖茨注]）……资本主义最主要的成就是它不仅带来了自身的退化，也带来了可能的替代方案！”]

##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跋<sup>①</sup>

马克思对 1848 年革命如何发展成了路易·波拿巴的专制统治的分析可以用来预测晚期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动向：在该社会自身结构基础上清算它

---

① 原文参见 The Epilogue to Karl Marx, *Der 18.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Frankfurt: Insel, 1965, pp.143–150, 经密兹曼翻译发表, 参见 “Epilogue to the New German Edition of Marx’s *18th Brumaire of Louis Napoleon*,” *Radical America*, 3, 4, Cambridge: July/August 1969, p.559。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法国向专制国家民粹主义的过渡——终结了 1848 年暴动之后法国实施民主改革的希望——做了分析, 而马尔库塞为该文撰写的这篇跋再次表明, 他是一位敏锐的马克思学者, 他对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做了深入的阅读。不过, 马尔库塞主要感兴趣的是马克思的分析对于解释当代史的意义, 当代, 就像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那样, 我们看到右翼势力通过民主选举获得了胜利, 他们在 20 世纪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其他法西斯主义领袖一起借助选举攫取并巩固了权力。马克思认为波拿巴主要是一个喜剧性的人物, 而马尔库塞却认为他的 20 世纪的继承者是走向社会支配这个趋势的组成部分, 因为大众选择并认同专制的领袖, 而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现如今理性的大众和力量是如何被占支配地位的技术部门渐渐地吞并的——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此做了系统的分析——是文章结论性部分的重点, 但是文末还是提出了自己的希望, 那就是唤起那些正在从外部反抗现行秩序的年轻抗议者,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马尔库塞认为, 过去革命的经典是不会过时的。——编者注

1965 年岛屿版本 (Insel edition) ——是 1856 年德文版的再版——的新跋的英译本, 载于 *Radical America* 3, 4 (July/Aug. 1969), pp.55–59。本文的译者是阿瑟·密兹曼 (Arthur Mitzman), 经作者与原出版商的许可将其在此刊发了出来。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岛屿出版社持有本文的版权。没有岛屿出版社的许可不得再版该译文。

的自由主义阶段。议会制共和国蜕变成了政治军事机构，它的头脑即“超凡魅力的”资产阶级领袖接管了决议，而这个阶级再也无法通过它自身的力量做出决策并执行决策了。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个时期同样屈服了：无产阶级离开了舞台（要多久呢？）。所有这一切在 20 世纪都发生了——但却是从 19 世纪的角度看到的 20 世纪，然而对 19 世纪来说，法西斯主义和后法西斯主义时期的恐怖性还闻所未闻。这一恐怖性要求我们修正《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开篇陈词：“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二次再也不会作为笑剧出现了。或更确切地说，笑剧比它前面的悲剧更可怕。

[118]

在资产阶级仅仅可以选择“独裁或是无政府状态。显然，它投票选举独裁”的形势下，议会制共和国要走向衰退。马克思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的逸事，当时红衣主教彼得·大利向宗教改革的倡导者大声喝道：“现在只有魔鬼还能拯救天主教会，而你们却要求天使！”要求天使已不再是现如今的议事日程。但是，只有专制统治、军队、出卖和背叛自由的承诺和制度才能继续拯救资产阶级社会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马克思通过特殊的历史事件使我们随处可以看到这一普遍性的主题，现在请允许我们尝试着简略地对其做些总结。

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谓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了。<sup>①</sup>

① *Marx-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1,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1, p. 260.

这种倒转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与社会内容之间存在冲突的表现。统治的政治形式是议会制共和国，但是在那些“阶级构成发达、具有现代生产条件”的国家，议会制共和国“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改造的政治形式，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保守形式”<sup>①</sup>。在反封建中赢得的自由和平等权，在议会的辩论、妥协和决策中被明确下来、制度化了，但它们以后却脱离了议会框架及其所强加的限制：它们通过议会之外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冲突被普遍化了。议会辩论本身以其理性—自由的形式（对于 20 世纪来说，它早已成为过去）把每一种利益、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改造成了“普遍的理念”：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获得了政权，成了社会的普遍利益。但是普遍理念一旦被官方化，意识形态就会朝着它自身的现实化向前推进。议会的辩论在新闻、酒吧、“沙龙”和“民意”得到了延续。“既然议会制度将一切事情交给大多数决定，那么议会以外的大多数又怎能不想也做决定呢？既然你们站在国家的顶峰上拉小提琴，那么你们又怎能因为站在下面的人们跳舞而惊奇呢？”<sup>②</sup>然而，“站在下面的人们”，他们要么是阶级敌人，要么是没有特权的资产阶级。解放和自由在这里的意义完全变了，它们威胁到了当权派。自由的普遍化，即自由的现实化——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是“社会主义的”了。这种命运攸关的发展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它有可能在哪里受到敌人的压制？敌人危险的幽灵在资产阶级自己的阵营中似乎随处可见。统治阶级动员起来，不仅仅是要肃清社会主义运动，还要肃清它自身那些开始与地产和商业利益冲突的制度：公民权、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以及普选权为了该利益都被牺牲了，因此，资产阶级“为了使它能够在不受限制的强硬的政府保护下安心地从事他们私人的事情。它毫不含糊地声明说，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以便摆脱和这种统治地位相连的麻烦和危险”<sup>③</sup>。行政权

① *Marx-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1,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1, p. 232.

② *Ibid.*, p. 261.

③ *Ibid.*, 1, p. 290.

成了自主的力量。

但是作为这样一种力量，它需要合法性。随着自由与平等的世俗化，资产阶级民主威胁到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抽象的、超越的“内在”特质，因此威胁到了在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异所起到的抚慰作用——内在的自由与平等为了外化而不断地努力奋斗。在资产阶级崛起的过程中，它把大众发动了起来，但从那时起，它却一再地背叛和镇压大众。不断演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越来越重视大众，将它们与特定的经济、政治常态融合起来，教它们如何计算，甚至（在有限的程度上）教它们如何统治。专制国家需要民主的大众基础；领导者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他是被选出来的。普选权——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理上被资产阶级否定了——变成了专制的行政机关对抗顽固的资产阶级团体的武器。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对公民投票选举的独裁者做了典范性的分析。在那时，帮助波拿巴上台的是广大的小农。他们在当代的历史地位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得到了反映。波拿巴主义者的独裁统治不可能消除农民的痛苦；农民发现“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是他们“天然的同盟者和领导者”。<sup>①</sup>反之亦然，从绝望的农民这里，“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sup>②</sup>。

[120]

在把握现实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义务禁止教条：也许，马克思理论与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反差最大的时候也就是无产阶级在“少有的工商业繁荣的年头”“放弃了权力”的时候。废除普选也就是剥夺了工人“参政的权利”，而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自己放弃的。

面对着这样的事变，他们却让民主派来驾驭自己，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记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由此放弃了作为制胜力量的光荣，屈服

① *Marx-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1,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1, p. 308.

② *Ibid.*, p. 308.

于自己的命运，并且表明，1848年6月的失败使他们多年丧失了战斗能力，最近的历史进程又要撇开他们自行发展。<sup>①</sup>

早在1850年，马克思就开始反对伦敦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批评他们用教条主义的解释“代替批判观点”，用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唯物主义观点：“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而你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sup>②</sup>

失败意识乃至绝望意识是理论及其希望的真实表现。破碎的思想——是现实破碎的真实表现——决定了《雾月十八日》的风格：并非如作者所愿，它成了伟大的文学作品。通过反讽避开恐怖事件，它的语言把握住了现实。在它面前，任何（即使那些社会主义的）表述、陈词滥调都站不住脚。人类出卖、背叛人道的理念，摧毁或囚禁那些为之奋斗的人到了如此这般的程度，以致再也无法把这样的理念呈现出来，而嘲笑和讽刺就成了现实真实的外观。它的形式不仅出现在了政权在卢森堡宫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大教堂”中，也出现在了6月的屠杀中。在构成政治的混杂在一起的愚蠢、贪婪、卑鄙和残忍面前，语言不可能严肃。滑稽的一幕发生了，每个政党都站在身后的政党的肩膀上，直到身后的政党把他们摔下来并转而站在自己身后政党的肩膀上。因此，才会出现从左派到右派，从无产阶级政党到秩序党这样的状况。

[121]

秩序党耸了耸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

① *Marx-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1,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1, p. 308.

②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ss zu Köln*, edited by Franz Mehring, Berlin, 1914, p. 52.

的双肩上去；它还一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而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sup>①</sup>

真是滑稽，但喜剧本身早已是悲剧，因为输光了一切，牺牲了一切。

总体仍然是 19 世纪：自由主义者和前自由主义者的时代。对马克思来说，更可笑的是，拿破仑三世这个人物早已让位给了其他更可怕的政治家：阶级斗争已经变质，统治阶级也已经学会了如何统治。民主的政党制度要么就是被废除了，要么就是沦为了联合，而只要现存的社会制度不会面临危险，这种联合就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已经衰败，变成了大工业国家劳动群众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支撑和维护着生产与支配部门。该部门促使社会与受管制的总体——可以把工人们与国家动员起来全方位地抵御敌人——结合起来。只要受到了全面的管制，技术力量在任何时候都会变成军事力量，最高的生产力在任何时候都会变成终极的破坏，这样的社会就会以扩大了规模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如此看来，它的敌人不仅在外部，作为它自身的潜能，比如，妥善处理生存竞争、废除异化劳动，还在内部。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竟会如此迅速地、严格地着手处理该潜能，也没有预见到原本推翻资本主义的力量竟会变成它统治的工具。

现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已变得如此广泛、如此明显，它已经无法被合理地掌握或消除。只有一种对真与假之间的区别漠不关心的虚假意识还能忍受它。它在奥威尔式的语言（奥威尔在《1984》中将其过分乐观地形象化了）中发现了它真实的表达。奴役被说成是自由，武装干涉被说成是自我决断，酷刑和燃烧弹被说成是“传统技术”，客体被说成是主体。在这种语言中，政治与公众舆论，商业与仁爱，信息与宣传，好与坏，道德

[122]

<sup>①</sup> Marx-Engels, op. cit., p. 244.

与消除道德融合在了一起。到底该以哪一种相反的语调来清楚地表达理性(Reason)? 经由恐怖带来的痛苦, 发挥影响的已不再是讽刺、反讽, 而是变成了犬儒主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以回顾黑格尔开始的, 马克思的分析从“历史理性”(Reason in History) 获益良多, 而批判也正是从后者及其实存的表现获得了力量。

但此外, 使马克思深受启发的理性当时并不“存在”, 它仅仅以其否定性出现在了厌恶实存、抗拒实存和被实存打败的那些人的斗争中。由于他们, 马克思思想在面对失败和反抗统治理性时守住了自己的信念。同样, 马克思为那些对 1871 年巴黎公社失败感到绝望的人保留了希望。如果说现如今非理性本身也变成了理性, 那也只能是统治者的理性。因此, 就算是被统治者与它合作, 它也仍旧是剥削性和压抑性的理性。不过, 到处都是抗议者、反叛者、斗争者。即使在富裕的社会, 也有他们的身影: 那些尚未忘记该如何看、如何听和如何思考的年轻人, 那些一直以来都在为了富裕而做出牺牲并痛苦地学着如何看、如何听、如何思考的年轻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写给他们的, 对他们来说, 它还没有过时。



这里收集到的本雅明作品完成于德国革命爆发和革命失败（它们的日期几乎一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历史时期。它们都是特殊的“对过往的

---

① 马尔库塞的《本雅明〈暴力批判〉的后记》是写给《本雅明文集》的，被赖茨译成了英文，参见 Walter Benjamin, *Zur Kritik der Gewalt und andere Aufsätze: Mit einem Nachwort von Herbert Marcuse*,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65) 1999, pp.99–106。在德文文本的结尾处可以看到，文章完成于1964年10月马萨诸塞州牛顿市，而此时马尔库塞正准备发表《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注意到，相比今天的话语，本雅明的某些语言有着与众不同的历史共鸣，而且还包含着强有力的革命理论元素。马尔库塞在这里把他对本雅明——他处身法兰克福学派圈子的边缘地带，在试图逃离的过程中，为了避免被纳粹抓获，于1940年在西班牙山区自杀——持续不断的思考大部分都写了出来。正如马尔库塞所讲，阿多诺为德文版的《本雅明文集》撰写了引言，阿多诺在以他自身对本雅明的理解反思时代时采取了神谕的风格，而马尔库塞也采取了同样的风格。马尔库塞思考的重点是本雅明在法西斯主义势力占据上风的黑暗的历史时期不妥协的革命立场。在解释本雅明历史哲学的过程中，马尔库塞注意到，本雅明设想了一种革命性的历史哲学，而历史断裂与中断是其愿景的主要特征，它与西方自由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设想了一种植根于启蒙乐观主义的线性历史进步观——的时间概念不同。与之相比，本雅明与马尔库塞都强调历史中的断裂和倒退，而这也致使本雅明断言反思受压制的过去和渴望不一样的未来往往都可以促成革命性的进步，他也因此给出了一种有独到见解的历史哲学，而这显然引起了马尔库塞的兴趣并对其产生了影响。——编者注

Walter Benjamin, *Zur Kritik der Gewalt und andere Aufsätze: Mit einem Nachwort von Herbert Marcuse*,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65) 1999。——赖茨注

[124]

描述，因为它们都是离散的，并没有认识到自身是有牵连的，所以很可能慢慢地淡出视线”。然而，这里出现的词，比如，“心灵文化”（culture of the heart）、“爱好和平”、“救赎”、“幸福”，“精神事物”、“革命”，也许是最后一次被不走调地、坚定地表达了出来。它们内在的关联性，它们延续下来的真理的轮廓构成了本雅明作品的要旨。阿多诺在《本雅明文集》<sup>①</sup>的引言中做了全面的评论，而我们在这里只想对这本书中的文章做些阐释。<sup>②</sup>

在本雅明的分析中得到详尽讨论的暴力并不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受批判的暴力，尤其不是底层社会在反抗上流社会时所运用（或试图运用）的暴力。确切地说，本雅明在其作品的某些最庄严神圣的段落中认为这种暴力是一种“纯粹的”暴力，它可以对迄今为止一直以来主导着历史的暴力提出“神秘的”抗议。本雅明批判的是对合法性、真理和政治拥有垄断权的既有体制的暴力【具有支配意味的强制力（Gewalt）——赖茨注】。在这里，法律的暴力性是无形的，尽管在所谓的“例外情况”（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那样的情况）下，它表现得极为明显。这些例外情况仅仅适用于受压迫者。然而，按照他的“历史哲学的原理”，这里的挑战是“带来真正的例外情况”，以便打破暴力的历史连续性（例如，支配——赖茨注）。本雅明犹如和平主义者那样认真地研究了“和平”这个词的意义，他已经意识到，我们所谓的和平是离不开战争的，和平总会“不可避免地鼓励每一次胜利”，而这使战争暴力永久地保留了下来。与这种和平完全对立和矛盾的是以康德意义上的“永久和平”来理解的和平，它断言它的过去是人类的史前史。真正的和平是现实的、物质的“救赎”，它是非暴力（Gewaltlosigkeit，非支配——赖茨注），

① Walter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in cooperation with T. W. Adorno and G. Scholem, edited by R. Tiedemann and H. Schweppenhäuser Volumes I–VII,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72–1989。——赖茨注

② 这一卷包括五个文本，它们分别是：《未来哲学的政治议程》（*The Political Agenda of the Coming Philosophy*）、《暴力批判》（*A Critique of Violence*）、《性格与命运》（*Character and Destiny*）、《历史哲学的原理》（*Principles of a Philosophy of History*）和《神学—政治学断片》（*A Political-theological Fragment*）。——赖茨注

是“正义之人”的时代到来了。但是，在正义与非正义中延续下来的暴力使（康德的——赖茨注）非暴力完全变成了弥赛亚主义。在本雅明的暴力批判中，弥赛亚主义显然是一种表达历史真理的修辞：人性解放现在只能被想象为对既定环境的激进的（而不仅仅是规定了的）否定。考虑到既定事实的力量，甚至上帝也变成了帮凶，变得无能为力。本雅明的弥赛亚主义与惯常的宗教虔信毫无关系：罪和复兴（*restitution*）对他来说是**社会学范畴**。社会决定着命运，而它本身也是被抛弃了的：置身其中，人必定成为罪人。“生命，实际上一直以来都遭受谴责，因此它变成了有罪者，而通过把生命作为受谴责者来理解，命运把自身展现了出来。”正如暴力一样，命运因此也是一种既定的法律制度形式，是“一杆秤，它只能计量苦恼和罪，无辜和幸福被发现太轻了，都飘走了”。无辜从来就没有出现在命运中，幸福也只当“它与自身网络的黏附关系在一系列相关联的命运中被溶解”的时候才会出现。幸福从命运中获得救赎，而如果这种命运是一个历史地建立起来的社会，即一种合法地建立起来的压迫形式，那么救赎就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政治概念：革命概念**。

[125]

本雅明是不会在革命概念上妥协的，即使在妥协有可能促成其关注的问题时也不会。他的社会民主主义批判主要还不是批评已成为现状支撑物的政党，毋宁说，是回忆作为历史必然的革命的真理性与现实性（尚未受到质疑）。在很多高深莫测的段落中，本雅明抨击了不断扩张的工业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即生产力、法制、社会进步，而它们在传统中是批评的禁地。他提醒我们说，真正的进步并不取决于改善劳动过程（即雇佣劳动过程——赖茨注），而是取决于废弃该过程；不取决于开发自然，而是取决于解放自然；不取决于人本身，而是取决于“正义之人”。这都是些革命性的挑战，不仅需要消除腐化，更需要“虎跃”（*tiger's leap*），破坏连续性。本雅明的分析做了更进一步的扩充：它刺入了作为社会民主主义遗产的渐进主义的**心脏**，刺入了以更美好的未来为借口通过吃人的生产力来延续残暴的过去的策略和政治。按照“历史哲学的原理”，革命是一次虎跃，是一次“在

历史开放的天空下”受仇恨和自我牺牲驱使的虎跃，但不是跃入未来，而是跃入过去。此种仇恨和自我牺牲“比起与获得了解放的子孙的理想，与庶民祖先的想象有着更多的联系”。这是一个关乎过去的问题，而不是关乎未来的问题。该论点很难被其他人所接受，因为它不承认任何非人的保证——承诺可以在既定秩序的进步中看到自由，允许为了未来表面上自由的子孙剥削现在这一代人。允许这样做很可能来自迄今为止的历史规律，而历史规律构成了一个可以通过辩证思想提升至更高层面的逻辑；老虎必须彻底地跳出该逻辑。本雅明这一被过去点燃的革命论题拒绝通过不自由的手段来重建新的社会。因此，它也拒绝自由主义思维模式的理论解释，目的是为了以生命的神圣性（从未得到过既定秩序的尊重）来反对暴力革命。诉诸未来似乎（至少在《暴力批判》中）会严重削弱他对暴力革命的好感。本雅明对该论题做了讨论，通过评价它的相互关联，他觉得“革命者处决压迫者”令人厌恶。

[126] “我们确信，生命本身比生命中的幸福和正义拥有更高的价值”，因此，通过杀戮，不可能带来“正义的世界”。对本雅明来说，这种态度是“虚伪的、卑鄙的……如果存在仅仅被降格为生存的话，而这就是上述主张的意思”。本雅明在这里提出了我们很难接受的构想：“人类的处境……就像人类一样神圣，而他们肉身的脆弱性却并不神圣。”也许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要从他的希望来看，即“神秘的力量已经从各个角落进入当前的处境”，以致“反对正义的话语都将自我毁灭”，而新的话语将不再逗留于“某些难以想象的遥远的地方”。他后来的文章《历史哲学的原理》同样是受到了这一希望的鼓舞。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现实中看到了“弥赛亚式的使历史过程固定化（immobilization）的征兆，也就是说，看到了为解放被压抑的过去而革命的可能性”。真正的批判理论几乎很少以这样一种唤起回忆的方式来表达：革命斗争的目的是使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固定化，它先于任何肯定的目标，或者说，该否定是第一个肯定的目标。必须停止，彻底地停止人类对人类和自然的所作所为，因为只有那时自由和正义才会开始。本雅明不接受提高生产力这个残暴的概念，按照此概念，

自然在那里只能是被“无偿地”开采。相反，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夏尔·傅立叶的协作（the sociality of work）理念中，该理念“与尽可能毫不费力地开发自然和贪婪地收获果实大相径庭”。获得解放、获得救赎的自然只属于获得解放、从压制性的暴力中获得救赎的人民。早在《性格与命运》中，本雅明就已经指出，主体与客体、内部与外部的分离是不真实的：这种分离本身被当成了剥削的理由。因此，“使历史过程固定化”不仅涉及客观“方面的罪”，也涉及主观“方面的罪”：“思维不仅需要理念的运动，也需要理念停止下来。”实际上，它们也弥漫着不公和错误。历史唯物主义者“绝不是欣赏令他战栗的高级文化造物的起源”。他自己的思想同样有这样的起源。不过，在他意识到它们的起源时，它们停了下来，他的意识随之也发生了改变。思想受到了震惊，再也无法以惯常的方式继续下去；否定变成了建设性原则。其中一个结果就是，了解到我们在法西斯主义期间和结束后所经历的一切“在 20 世纪‘仍然’有可能发生”，现在也不可能感到震惊了。这是 20 世纪的现实，该现实仍被囚禁于它的起源，并被它的起源所主宰。

固定化的“冲击”同样可用以解决该如何对待组织活动和组织事务的问题。在既成事实的总体中，这些活动实际上没有什么害处，至多也只能算是无能为力，而无能为力本身就是不成熟的非暴力。如果革命是弥赛亚式的，那么它不可能在连续中保持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必须等待弥赛亚的到来。对本雅明来说，弥赛亚将完全由那些既定秩序下受苦的被压迫者在阶级斗争中的意志和行为构成。如果斗争不激烈，那么可能自由的形象就只有在完全不同的领域才能看到，不是在扩大了的生产力那里，也不是在某个“技术爱神”（technological Eros）那里，而是“在救赎、音乐或真理那里”。同样，在人们可以谱曲或哲思的空闲时间中也无法发现自由，但是在固定化中是可以发现自由的，正如在最伟大的音乐和文学作品中所发生的那样。从“更高的价值”与唯物主义对立这种破旧不堪的人道主义来讲，是很容易误解本雅明的说法的。本雅明警示道：“阶级斗争是一场为了争取天然的物质事物的

[127]

战争，没有它们，任何美好事物或精神事物都无法获得。”精神事物就隐藏在物质斗争中，前提是这真的是一场“通过谨慎、胆识、幽默、欺骗、信念”破坏连续性的斗争——甚至质疑统治者的每一次新的胜利。

在这种语言与现在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它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法西斯主义胜利之际。现在已经不再属于这段历史时期：在人们似乎有可能通过公开和（或）隐蔽的手段——炸裂历史的连续性——有效地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时候，这个时代被抹去了。炸裂连续性的通道又一次被关闭了。真实的历史过程就这样成了本雅明真理的血淋淋的证据：为自由而战的力量并非来自对未来的认识，而是来自对过去的认识。历史的“新天使”（*Angelus Novus*）<sup>①</sup>“一直盯着过去”，但是一场“风暴却正从天堂吹来”，而“当成堆的废墟高高堆起直至天堂时，风暴必然将天使驱入未来”。该必然性也正是希望，它支撑着所有那些尽管弱小但为了对抗连续性而继续斗争的人，比如破坏者，他们撕裂了立法和执法秩序架起的罪恶之网。

马萨诸塞州牛顿市

1964年10月

---

<sup>①</sup> 《新天使》是保罗·克利1920年在魏玛创作的一幅水彩画，后来被本雅明买了下来。——赖茨注

我想我们都会同意，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初的甚至是扩充了的概念为依据，确定当前历史时期的内容，特别是确定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定困难。当然，我们也能做得到，但要冒产生额外困难的风险。如果同一个理论能够同样很好地阐释 A 和非 A 的发展变化，同样很好地阐释繁荣和危机，

---

① 《辩证法中的否定概念》最早的英文版刊载于 *Telos*, 8 (StLouis: Summer) 1971, pp.130-132。该文本再现了马尔库塞 1966 年在布拉格黑格尔会议上所作的演讲，而它最早的版本是“Zum Begriff der Negation in der Dialektik,” *Filosoficky casopis*, 15, 3 (Prague, 1967) pp.37-59，但卡尔·博格 (Karl Boger) 发表在 *Telos* 上的英译版却来自 Marcuse, *Ideen zu einer kritische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70。该文本是写给黑格尔—马克思的研究者们的，其目的是强调否定的概念对当代批判理论的重要性，马尔库塞对顺从主义的关于黑格尔的解读与辩证法概念做了区分，他认为前者低估了否定概念，而后者力图谋求历史中的否定的力量，并把批判理性的否定作用当成是解放和变革的力量。这份简短的演讲稿断言，现代世界历史的总体“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世界体系”。马尔库塞宣称，现有体系外部的反抗力量借由它们超出体系之外并需要另一生活方式来满足的需求，可以充任否定和剧变的力量，这是马尔库塞一贯坚持的立场。马尔库塞坚信，这些力量并没有集中在任何一个阶级身上，而是变成了无组织的、弥漫开来的激进的反抗，它们以“拒绝加入并发挥作用”为主要特征，以“厌恶一切繁荣，被迫提出抗议”为其主要标志。马尔库塞将继续寻求这些可以成为 20 世纪 70 年代的新的反抗形式和新的社会运动的非传统的否定力量，而马尔库塞直到生命结束都没有放弃拥护这些否定力量的革命潜力并使其理论化。——编者注

革命和革命缺失，工人阶级的激进化和它与现有制度的一体化；那么虽然这可以表明理论是有效的，但同时却也表明，它是平庸的。鉴于这种状况，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以来都因为妨碍了任何可能的反驳而饱受指责。这些困难牵涉到马克思辩证法的黑格尔渊源——在下文中，我会对此关系做简略的讨论。

现时代的主要特征似乎是，否定性的辩证法陷入了困境。我们面临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新形式，因此，也面临着发展各种已修正了的辩证的概念以适应此形式的任务。主要问题似乎取决于辩证的概念，因为，否定的力量正是按照辩证的概念在有规则的、对抗性的体系中发展起来的。而如今，否定性的这种发展在对抗性的整体中却几乎看不到。因此，我想先从否定性讲起，特别是先讲一下，法国就阿尔都塞试图重新规定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的关系而产生的争论。黑格尔辩证法的肯定性、顺从性经常被强调。我敢不揣冒昧地说，在黑格尔辩证法中，否定带有虚假性，所有的否定和破坏都是如此，通过否定最终发展上升至一个更高历史水平的永远都只是自在的存在（being-in-itself）。因此，从黑格尔哲学中一切爆炸性的、激进的最具革命性的变革和破坏来看，发展变化的通常都只是本质，也就是说，本质被抑制的可能性通过否定被释放了出来。这一顺从性并不是黑格尔对外在处境的投降；情况正相反，它恰恰就存在于他的辩证法概念之中，而在此概念中，理性与进步的肯定性最后取得了胜利。

阿尔都塞坚持认为，马克思只是使黑格尔辩证法颠倒了过来，以脚立地，他仍然只是以另一个理性体系取代了黑格尔体系，即使他改变了它的基础。也就是说，他一直都保持在哲学的范围内，并没有超越它。但是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马克思实际上是与黑格尔辩证法发生了决裂，因为他凭借自身的力量以“现实的发展”——恩格斯的表述——为根据阐发了一种新的辩证法。

我将提出一种不同于阿尔都塞的观点：实际上，只要唯物主义辩证法没有破坏进步观念——未来正是借由该观念一直以来深深地植根于现在，只要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没有使朝向一个新的历史水平过渡的观念变得过激，也就是说，只要没有使大逆转、与过去和现在决裂、质的差异成为研究进步的理论的趋势，唯物主义辩证法仍处于唯心主义的理性的肯定性的影响之下。这绝不是抽象的断言。正相反，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最低限度地成为构建一个以**技术**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新社会的模型的问题来看，它是非常具体的。

我想对两个主要的辩证的概念做些澄清：作为对抗性社会整体内在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和每个个体的立场借以发现自身价值与真理的整体概念。就作为扬弃（*Aufhebung*）的否定概念而论，对马克思和黑格尔来说，驱使一个体系自我演化的否定力量与一个新阶段在该体系内部的发展从根本上讲是相矛盾的。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发展，以及作为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发展，都是整体内部反对整体的决定性的否定力量的例证。此外，借由这种在体系内部发展起来的否定，朝向新阶段的运动成了**更高的阶段**，因为，它把现有体系的被束缚的生产力释放了出来。然而，从现有整体的任何革命性变革来看，一种本身已经存在的本质在现有的秩序中却没能实现。如此看来，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已经在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达的技术基础中存在。但那难道不是客观理性的另一种进步形式吗？难道不是自我再生产的死劳动——在技术设备中客观化的劳动——优越于活劳动的新形式吗？

针对该辩证的概念，我要问的是，对抗性体系内部的否定力量是否随同历史必然性以进步的、解放的方式向前发展。必须把阶级和阶级斗争放在这种肯定性的动力中吗？这个问题牵涉到作为整体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关系。难道辩证唯物主义可以通过不够深入地解决社会制度对人的存在和意识的影响，轻视野蛮的力量和事实的力量（即逐渐提高的劳动生产力与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的作用，以及低估科学技术在形成与决定需求和满足中的作用来简化其物质基础吗？换言之，难道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可以低估晚期资本主义的整合和凝聚力量吗？

[130]

尽管可能没有足够强大的知识或思想力量，但至少要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和物质足以抵消整个时代的矛盾，缓解否定的力量，甚至把它们转变为再生产而不是破坏现有秩序的肯定的力量。该假设使人们对否定可以在现有的整体内部自行实现解放产生了质疑。如此一来，它还使人们对历史中唯物主义的理性观念产生了质疑。因此，必须把实践概念从它与这个图式的联结中分离出来，将该图式历来依赖的内部和外部重新联系起来。

讲完这个对内部与外部矛盾有意而为的非辩证的表述，现在我想再讲一下整体的概念。这里提出的问题牵涉到这样的现实可能性，即在历史的变化过程中现有的对抗性的整体从外部（externally）被否定和废弃了，还牵涉到实现下一个历史阶段的方式。我认为，外部（outside）概念——我仍然只能对其做简要的研究——在黑格尔哲学中特别是在他的法哲学中也有一席之地。我一直都在思考资产阶级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尽管一切把国家束缚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的变革得到了巧妙的实施，然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黑格尔从资产阶级社会外部引入了国家，而他如此做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在这个无可救药的对抗性的社会，只有外在于整个利益体系——即资产阶级的“需求体系”——的力量才有可能拥护普遍性。从这层意义上说，普遍性仍外在于资产阶级社会体系。如果说这样一种外部有其历史意义的话，那么每个特定的社会整体本身必定属于更大的总体，而它在此总体中就有可能受到外部的影响。这一更大的总体本身必定再次成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总体。对马克思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局部的整体。但是在这里，内部和外部同样有差别，特别是在帝国主义的概念中：帝国主义的冲突表现为与外在的破坏力，它反对内在的无产阶级革命行动这种决定性的力量。

那么，这个局部的整体与总体到底是何种关系？对马克思来说，曾经是总体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如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世界体系中成了一个局部的整体。在现如今的总体中，我们看到晚期资本主义本身的革命潜力已经被同化。由于这种同化，否定和否定性使它们彼此成了从地理层面和社会层面来讲分离的、独立的整体，对立了起来。在这种全球的对立中，

[131]

内在矛盾自身也在发展和变化。现如今，辩证法肩负着从理论上解决这个本质上全新的形势的任务，但不能简单地将其塞入陈腐不堪的概念中。下面是一些建议：我所讲的外部不能从空间意义上机械地理解，而是要理解为从对抗性的局部的整体内部来克服现有的对立（比如，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但又不能被简化成此种对立的质的差异。换言之，这些社会力量在整体之外，它们的需求和目标在现有的对抗性的整体中受到了抑制，不可能向前发展。新社会新阶段的质的差异因此将不再仅仅是基本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当然，它们仍是一切发展的基础）。它将形成和实现更多的、在对抗性社会中被扼杀的新的需求。这些新的需求将在彻底改变了的人与人的关系中得到表达，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得到表达：团结将取代竞争；爱欲将取代压抑；残忍、粗俗及其语言将消失殆尽；和平将成为永恒的状态。

这里我说的不是价值和目标而是需求。只要这些目标和价值没有变成现实的需求，新旧社会之间质的差异就不可能得到发展。这种人道主义只有得到了现有的新的社会政治力量——有的已经站出来，有的即将站出来反对旧有的压抑的整体——的支持才能变成具体的社会力量。

对抗性的社会一旦变成极度压抑的总体，否定力量的社会地位就会发生改变。在此压抑的总体之外，否定力量起因于尚未被“富足的社会”的侵略性的、压抑性的生产力所控制的社会势力和运动，起因于已经摆脱了这种发展并因此不缺乏人道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机遇的社会势力和运动。从“富足的社会”内部反抗整个体系的否定力量与此机遇相对应。现如今，否定的力量并没有集中在任何一个阶级身上。无论从政治上来讲还是从道德上来讲，无论从理性上来讲还是从本能上来讲，都只是一种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的反抗：拒绝加入并发挥作用，厌恶一切繁荣，被迫提出抗议。这种反抗微弱、无组织，但它所依赖的却是与现有整体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动机和目的。

## 一、辩证法在古代哲学中的意义

1. 初级阶段：芝诺、智者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认为最早运用辩证法的是埃利亚的芝诺，确实芝诺悖论在概念性思维——假定直接经验是真实

---

① 《辩证法的历史》作为“辩证法”这一百科全书词条的子词条载于 *Marxism, Communism, and Western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Encyclopaedia*, edited by C.D. Kernig, Vol. 2,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72, pp.408–418。“辩证法”这个词条分为两个部分：“A. 辩证方法”和“B. 辩证法的历史”。在该书的第 420 页，列出了克恩（Walter Kern）所编的参考书目，从中可以看到，文章的作者是“克尼希”（Claus D. Kernig, A）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B），因此我们断定，马尔库塞是我们此次发表的“辩证法的历史”这一词条的作者。该文本对“辩证法在古代哲学中的意义”做了极为详细的学术研究，然后研究了“辩证法在康德、费希特与黑格尔哲学中的意义”，最后一部分研究了“辩证法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内涵与意义”。该文本表明，马尔库塞是一流的研究辩证法观念与历史的哲学学者，他以一个独立的部分对马克思做了重点研究。在马尔库塞的私人藏书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文件夹，其中就有在百科全书中看到的文本，还有“辩证法”词条的德文版本，但在他的档案中却没有与德文出版物相关的参考文献。该课题表明，马尔库塞是一位国际知名的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专家，他不仅有大量的学术证明材料，而且还在政治和思想上对新左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编者注

的——的基础上完全呈现出了真正的辩证特征，即剧变、否定的特征。通过强调存在是多和运动这个假设中所蕴含的矛盾，芝诺旨在引导我们思考其老师巴门尼德——据他所说，存在是一，是不动者——不可思议（悖谬）的真理。因此，从辩证法的历史初期，它就以与经验的直接性决裂的形式包含着否定：思维的否定性是通往真理的道路，概念是现实的形式，概念（智思）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

不久，辩证法的悖谬性就脱离了其与真理本性的关系，仅仅被当成了一种修辞手法。它被用到了旨在推动某一特定的目标的争论中，而不管该目标是什么，也不管是在市场上、在法庭上、在议会上，还是在辩论中。经验中的矛盾，特别是理念（正义、法律、道德）与其现实的矛盾，正如在智者派强大的、狡猾的、聪明的权利学说中以最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那样，都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当成了真理的相对性的反映。但尽管如此，辩证法在摧毁“意识形态”这一现状的堡垒的过程中还是保留了它的批判力量：思维受到了训练，开始怀疑一切积极的权利，并且拒绝任何由此而来的要求。由此看来，柏拉图所谴责的智者派的辩证法与苏格拉底的对话已相距不远。

[133]

苏格拉底对话的典型特征是，它的结论都是否定性的：你视为勇敢的东西并不是勇敢，你视为虔诚的东西并不是虔诚，你视为正义的东西并不是正义。可是，社会与国家的维系却依赖此种知识。人们生活在愚昧和虚假中——但他们对此毫不知情。他们必须学会思考，而思考就从对一切虚假的却直接被当成是真的东西的深刻洞察开始。思考就源于直接的经验，除非被早已深谙人们生活在虚假之中的哲学家调动了起来，否则它不能超越直接的经验。这种介入并非超越于经验之上，它只是对经验产生了质疑，使其运动了起来，目的是揭示它自身的矛盾。那些从哲学家的介入得到教益的人都认为，该矛盾并不是人们自身缺陷的反映或其特定意识的错误，而是某种普遍的、客观的东西，它与现状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密切关联。问题是何谓“勇敢”、“虔诚”、“正义”；分析表明，这些术语事实上在人们的日常话语和行动中并没有表现出来，因此，该话语和行动就不能被看成是完全真实的。真

理必定以某种方式存在于种种百般的存在模式——或多或少有点勇敢，或多或少有点虔诚，或多或少有点正义——的共同之处，它就是勇敢**本身**，虔诚**本身**，正义**本身**，就是使“多”转化为勇敢、虔诚和正义的不完整、不完善的显现的“一”。正如在埃利亚学派中，思考的主要问题就是“一”与“多”、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术语的意义只存在于这种以不可调和的形式的两极对立中。只有借由“讨论”（*talking over*, *διαλέγεσθαι*）日常话语中被视为自明的东西，也就是说，必须对过早地被看作一致的东西做出区分，必须把过早地被分离的东西再一次聚集在一起，它才能为人所共知。思考变成了对话，而在对话中，各种立场彼此竞争，每个立场也因此得到了应有的认可，也遭到了应有的拒绝。

[134] 经常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苏格拉底的对话仅具有真正的谈话的外观，而该状况在柏拉图后期的对话集中尤为明显：苏格拉底的对话者扮演的是小配角，通常只能简短地表达同意或是拒绝。而事实上，辩证的思维与两个地位完全平等的观点是不相容的：它必须冲破在对话开始之初囚禁发言者的直接性，而这也正是早已冲破此直接性的哲学家的主要贡献。他的问题以这样的方式被提了出来，即它们不允许给任何回答以机会；它们还提出了一个极为特殊的要求，即否定直接性。作为对该要求的回答，如果对话者已经做好了详细阐释其思考的准备，那么他就可以自由地决定是赞同该观点还是与其划清界限。苏格拉底的对话保留了思维与存在、方法与现实之间的辩证的张力。无力超越直接性的思维是贫乏的实践的反映，而思维的剧变也会威胁到它所从属的实践。苏格拉底的审判就揭示了辩证法的破坏性，该特性在柏拉图的主要著作《理想国》中仍清晰可见，但随着辩证法与逻辑的融合，它却消失了。

2.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理想国》第六卷和第七卷中，柏拉图介绍了辩证法，把它当成了使理解最高层次的智思世界（理念的世界和善的理念的世界）的能力联系起来的力量。作为这样一种力量，辩证思维实则就是在无须感觉帮助的情况下就能抓住真实的、本质的现实的理性（*reason*,

λόγος)。(511b, 532a) 辩证理性(像所有思维一样)都以种种前提(假设)开始,但与数学科学不同,在这里前提并不是“第一因”或第一原理(ἀρχαί),而仅仅是关于(实际上)是什么的假设,即“一定阶段的起点,以便从这个起点一直上升到一个高于假设的世界,上升到第一原理,并且在达到第一原理之后,又回过头来把握那些以第一原理为根据所提出的东西,最后下降到结论。在此过程中不靠使用任何感性事物,而只使用理念,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并且最后归结到理念”(511b, Cornford trans.)。

这一最早的有关辩证法的“系统”描述揭示了后来被归因于尚未分化的理念的本质特征:(1) 逻各斯与感觉是对立的关系;(2) 思维的前提仅仅被当成了假设,而从这个起点开始可以一直上升到支撑该假设的“第一原理”;(3) 从第一原理(一旦思维对它们有了深刻的理解,它们就会完全变成知性的原理)向现已理由充分的假设的“下降”就是对直接性进行中介的过程。

毫无疑问,辩证法在这里成了一种探求真理的方法(q.v.),但真理关键是理念的实现状况,而辩证的思维中介构成了存在的实际结构,正是借此,可感世界“分有了”理念,多“分有了”一,特殊“分有了”普遍。所有本真的交流,所有或是或非的谈话,都把特殊视为普遍(这仅仅把它的可理解性、可交流性呈现了出来),并因此按照不可感知的、只有理性——揭示了使“多”之所以为“多”的“一”——方能理解的东西来看待感官所觉察到的一切。对柏拉图来说,真实交流的这一功能绝不仅仅关系到与现实的特定事实内容相分离的形式逻辑(q.v.);思维的逻各斯就是现实的逻各斯;作为方法,辩证法从本质上讲具有“实在论”的特征。这在《智者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中对“假设”的辩证分析使我们有必要以理念的“混合”和相互关系来取代它们静态的统一性和特殊性。这种分析方法把分离与结合整合了起来,不仅把现实存在本身结合的东西分离了开来,还把现实存在本身分离的东西结合起来。(253b-d) 在这里,理念是存在的种(families, genera, γένη),该描述似乎认为理念是动态的、有效的统一体,并据此认为,辩证法是关于存在的种的可分离性与可结合性的科学,它的目标是了解

哪些是相容的、哪些是不相容的，普遍性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依附于每个存在，也就是说，复数的（特殊的）存在中的每个存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把统一的效应显示了出来。一与多的对立、普遍与特殊的对立被证明是真理的镜像，就像辩证地处理矛盾的游戏特点恰好是其严肃性的镜像那样。因此，我们可以把它当成辩证法的标志，而在这篇以智者命名、探求智者的定义的对话中，哲学家的对立面最终暴露了出来。（253c）这篇以智者命名的对话奠定了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也正是辩证法概念把哲学家与智者区分了开来。它的本质就是中介对立面——其可能性现已做了阐述。《斐莱布篇》（16c）赞扬辩证法是诸神的礼物，“它通过普罗米修斯，或某位像他一样的神……到达人类手中”。每个存在既是一也是多，既是有限也是无限，但是，只要一与无限之间（μεταξύ）中介的总数没有被弄清或确定下来，任何存在的多都不能被说成是它的无限性。（16d-e）这种对立面的克服把哲学的**逻各斯**与其诡辩的对应物——在对立（ἀντιλέγειν）中仅仅是发现了对立面——区分了开来。

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过程中，辩证法遭到了贬低，再次靠向了诡辩，而柏拉图曾对两者做了明确的区分。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Metaphysics* 987b，第29页以下）是通过柏拉图对辩证法的关注来解释他对理念的引入的，也就是说，是通过他的“方法”来解释他的本体论的。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辩证法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说服技巧，与哲学无可置疑的科学性不同，它的基础是“通俗的前提”（*Metaphysics* 995b，第20页以下）。

在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中，辩证法有了确切的定义，形式逻辑也从辩证逻辑中脱离了出来。《论题篇》确定了辩证推理的“场合”，并对其做了极富启发意义的观察（155b，第8页），它发现任何辩证的“排列和提问”都只能引起交谈中对方的兴趣，“然而，对于论证前提要真实，要众所周知，独自探索的哲学家并不在意，因为回答者并不参与对它们的设定……”从这种对照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在方法论上抛弃了对话，哲学也撤回到了它自给自足的确定性。总之，尽管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了辩证法比诡辩法



更有价值，但他似乎主要还是把它当成一种论证技巧：辩证法家是“善于提出命题和反驳的人。形成命题就是使多成为一……而反驳则是使一成为多” [136] (*ibid.* 164b, 第3页以下)。

“一与多”超出其在论证中的应用的客观意义在这里被遮蔽了起来。同样明显的是，辩证法与普遍性的关系以形式的、量化的方式被构造了起来。以《辩谬篇》(170a, 第34页以下)来看，辩证法与反驳密切相关，而这些反驳对于所有的技艺(τέχνη)和能力(δύναμις)来说是共同的，它们“以不隶属于任何一门技艺的共同原理为根据”。就辩证法关心所有存在的共同属性却并不认为它们隶属存在本身而言，《形而上学》(1061b, 第8页以下)认为辩证法与诡辩法一致。《修辞学》(1354a, 第1页)开篇就讲道，修辞学是辩证法的对应物(counterpart, ἀντιστοιχος)，因为两者都以非概念性的方法关注各式各样的主题。因此，辩证法不能充任柏拉图赋予它的角色：将复数的存在与普遍的概念联系起来，从特殊来理解普遍。它所能做的不过是指出矛盾(q.v.)：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知识(q.v.)。正因为如此，它在本质上与哲学不同(q.v.)：哲学在切求真知时，辩证法却专务批评。(*Metaphysics* 1004b, 第24页以下)辩证法的不科学性还要对该事实负责，即辩证地处理对立面一直以来是不够充分的。(*ibid.* 1078b, 第25页以下)亚里士多德自己关于对立面的讨论随后进入了对“一”的数个意义的枚举和分类，由此，每个意义都指定了不同的词。(*ibid.* 1006b, 第1页及以下)

3. 斯多葛学派与普罗提诺。在斯多葛学派(自公元前3世纪)那里，辩证法成了哲学学科规划中的一门专业。遗留下来的文本不足以提供给我们关于斯多葛学派辩证法的完备的描述，因此，我们只能满足于偶尔地引用；此外，它们也无法传达各学派之间思想观念上的差异。

辩证法是逻辑的一部分。它有别于其他部分——修辞学，原因是它要以问答的形式完成得体的交谈，而修辞学主要是不停地独白。因此，辩证法是关于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以及何者既不真也不假的知识。(Diogenes Laertius, VII, 42)辩证法被分成了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以具有指示功能的音声(pho-

netics) 为内容, 另一部分以音声的所指和意义 (τὰ σημαίνόμενα) 为内容。意义的对象就是物本身 (τὴ πράγματα)。然而, 由于物在语言之外, 所以辩证法仅仅与以语言 (τὸ λεκτόν) 来表达的意义相关联。(Sextus Empiricus in von Arnim. *Stoicorum veterum fragmenta* Lpz., 1903, Vol. 11, no. 166) 斯多葛学派在意义理论的范围内对传统逻辑的绝大部分——比如, 种, 各种有效和无效的命题、判断与推理——做了探讨。通过断言与反驳、提问与回答来展开主题的方式似乎已被放弃, 取而代之的是系统地描述。对立面的辩证的实现与否定仅仅成了形式逻辑关心的问题。

这一发展对辩证法的历史来说至为关键。逻各斯概念被当成了实体, 成了一个物, 而这将招致辩证运动的实体化。直到德国唯心主义出现后, 这种趋势也没有被扭转过来, 而后来也只是部分地扭转了过来。

对斯多葛学派来说, **逻各斯**变成了世界物质充满创造能力、孕育生命的原则, 弥漫在所有的物质中间——它成了上帝。对立面、一与多、经验(直接性)与现实的统一的问题成了宇宙论和神学的问题。于是, 理解该问题现在变成了逻辑与认识论的任务: 主体与客体(参见“主体”、“客体”)的关系不再以辩证的方式来理解。因此, 辩证法失去了其正当的动机, 失去了由柏拉图所规定的其必要性的基础。同时, 它也失去了否定以及消除否定的理论依据。

当普罗提诺再次把辩证法当成一个现实的过程, 当成运动, 并在这个向上到“一”、向下到“多”的过程中确定层级结构的时候, 人们就会有这样的印象, 即辩证法是一个神秘的概念, 而这样的质疑几个世纪以来从未间断过。即使作为一种认识方法, 辩证法也被当成了神秘主义的东西。普罗提诺不赞成概念性的、论证性的思维, 而是更倾向于一种察觉存在本身的直觉或直观。(Enneads 1, 3, 5) 因此, 普罗提诺的辩证法概念值得进一步的思考, 这不仅是因为它给中世纪带来了巨大的(但却间接的)影响, 还因为它影响到了作为认识方法的辩证法与作为现实过程的辩证法之间的统一。

《九章集》第一卷第三部分把辩证法当成了研究最高的真理和最高的善

的科学。普罗提诺首先简要地概括了柏拉图在《理想国》《斐德罗篇》以及《智者篇》中关于辩证法的讨论结果，但他却没有把促使柏拉图得到该结果的内在逻辑揭示出来。哲学家天生能够摆脱对物质世界的依赖；数学使其坚信智思世界是存在的，如此一来，辩证法就能够渐渐地使他认识到第一原理和真正的存在。（*ibid.* 1, 3, 3）辩证法是科学，它能够理解所有事物的本性与真实的关系，区别、安排属与种，把握存在的事物与非存在的事物、善的事物与不善的事物、永恒的事物与非永恒的事物。但是，为什么否定与对立是真理的构成部分，他却未予以解释，后面仅在普罗提诺讨论宇宙论的上下文中出现过：理性的根本在于原初，在于“一”，而它只能以否定一切谓词的形式来表达，尽管它是一切谓词之所以可能的基础。辩证法在阐明了存在的秩序与本质区别，掌握了智思世界的结构与原初的种的关系之后，分析转向了第一原理。（*Enneads* 1, 3, 4）在这里，它发现自身依赖于对本身不会在多种多样的事物中消散的“一”的直观。因此，辩证法一旦坚定地占有了真理，它将不再依赖关于命题与推论的理论；它可能偶尔也会把它们当成工具，但很快就会放弃对这种逻辑的关注，而转向较次要的学科。（*ibid.* 1, 3, 4 & 5）在傲慢地拒绝了逻辑后，普罗提诺提出了至关紧要的问题：哪些原理能够保证辩证法的绝对要求（*the absolute claim*）呢？他的答案是：“理性赋予灵魂明晰的原理，只要灵魂能够接受它们。”（*ibid.* 1, 3, 5）借由其终极原理的这一不仅适合于理论也适合于我们智的直觉的直接证据，辩证法与存在本身联系起来，与超越于一切存在者之上的“一”联系起来。因此，它不仅仅是哲学家的工具，它还“以真实存在者作为自己活动的素材”（*ibid.*）；凭借直觉，它“连同它的理论一起拥有真正的事物”（*ibid.*）。智的直觉为辩证认识与作为现实过程的辩证法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斯多葛学派僵化的逻辑被推到一边，与此同时，辩证法从字面意义上变成了宇宙的进程。

[138]

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夸大普罗提诺哲学的神秘性。相比中世纪的神学辩证法，普罗提诺的国家是客观存在的中介，是存在的活动范围，也是克服否定的活动范围，在概念上很清晰，这更接近柏拉图的思想，而不是基督教的

神秘主义。他的哲学与黑格尔的哲学密不可分，因此黑格尔自己也特别重视普罗提诺的“理智主义”，并且告诫人们不要误以为普罗提诺仅仅是“迷狂”（ecstasy）。

否定的理念主要地被当成是一种认识的积极力量，这在中世纪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从神秘主义和否定神学角度来对它做出理解。它的概念形式可以追溯至库萨的尼古拉斯的作品。而数学被当成了一种解释学工具。但这一切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崛起没有任何显著的影响。

## 二、辩证法在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哲学中的意义

1. 康德。据黑格尔所说，辩证法概念在现代的决定性转变要归因于康德。按照普通的想法，辩证法是有随意性的，而康德通过把辩证法表述为“理性的必然过程”剥去了辩证法“随意性的假象”（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 Tl 1, 第 38 页）。

[139]

黑格尔认为，仅仅把辩证法看成是一种论证或认识的方法，而不将它的真理性植根于存在本身的运动之中，植根于客体之中，确实太过具有随意性。另外，把客观的辩证法当成宇宙论或本体论的过程，但却与主体完全分离或仅仅与其保持着非本质的关系，这同样是随意的。如果不理解其规定性的必然性，不能把概念展现为它所涉及的事物的运动，那么任何对否定、对立统一、事物总体的关注都称不上是“真正辩证的东西”。因此简单来讲，黑格尔一定程度上认同起源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辩证法和柏拉图的辩证法，但除此之外，他认为康德之前的其他一切辩证法都是假的。而康德自己并没有成功地超越辩证法的主观性，因为在虚幻地把“思维的规定性”应用到物自体的过程中，他把辩证法也仅仅限制在了该规定性中，但通过认清幻相的必然性并由此也认清矛盾的客观性，他还是“推动了逻辑和辩证法的回归”（*ibid.*, Tl 2, 第 493 页）。

在谈到辩证法的回归要归功于康德的时候，黑格尔提到了康德的批判哲学，提到了纯粹理性二律背反的先验辩证论。然而，即使在康德前批判时期的著作中（cf. Deborin,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Dialektik, ...*），特别是在1763年题为《把负值概念引入世俗智慧的尝试》的论文中，我们也能看到同样的倾向。文章开篇对形式逻辑上的对立与“实际的对立”做了根本性的区分，按照前者结合的事物就像矛盾律所说的那样，是什么也不是，而在后者这里，“此时一个事物的两个谓词相互对立，但并不通过矛盾律。”（*Werke*, ed. by E. Cassirer, Bd 2, 第209页）在实际的对立中，就像在形式逻辑上的对立中那样，“同时肯定和否定某种东西”，但与纯粹的逻辑矛盾不同，真实的对立的结果不是什么也不是，而是“某种东西”。这样的对立——在此，否定本身也是肯定性的东西——统治着现实，它实际上就是现实的规律，就像牛顿的物理学在力的合成与分解的规律中所展示的那样，它以数学上的负值概念表现了出来。“因为负值并不……是对正值的否定，而是某种自身非常真实的肯定的东西，只不过与另一种肯定的东西相对立而已。”（*ibid.*, 第207页）康德不仅规定对立统一是现实的结构，还规定了它的动力学原理；他不仅领会到否定规定了肯定（超越了传统），他还认识到否定是任何肯定的东西的基本规定。“相互冲突的规定必须是在同一主体中发现的。”（*ibid.*, 第214页）在这里，康德走向了中介概念，而通过它，实体可以变成主体。但从前批判时期的论文来看，他的整个方法还是局限于数学和牛顿的物理学模式，因此，他的辩证法仍然是自然辩证法，与主体没有任何本质的关系。

甚至在前批判时期的著作中，康德就认识到了形式逻辑的矛盾律的问题，但还没有构建辩证逻辑的想法。不过这种想法在《纯粹理性批判》出现了，在先验逻辑部分，康德在分析论之后对先验辩证论（辩证法）做了阐释。先验分析论是“真理的逻辑”基础，它详细解释了全部纯粹知性认识的基本原理。而在纯粹知性的概念和原理超出可能的经验界限之外加以运用的时候，也就是，在逻辑不被理解为适度利用知性的规则反倒是被当成认识的工具的时候，必然产生辩证幻相，因此与先验分析论不同，先验辩证论是一

[140]

种对辩证幻相的批判。(B 86–87) 每当上述情况出现的时候, 理性就会不可避免地矛盾所纠缠, 而这将通过一系列的辩证推理(比如说, 从有限到无限、从部分到整体)表现出来, 也就是说, 每一个正题都有一个特定的反题, 每一个肯定都有一个否定, 并且它们都能够通过逻辑上一致的方法加以证明。因此, 通过有限与无限、可分与不可分、按照自然律而发生的因果性与由自由而来的因果性(参见“因果性”)、存在绝对必然的存在者与不存在绝对必然的存在者的背反, 康德详细描述了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先验的辩证论可以揭示二律背反的原因, 揭露从纯粹逻辑的角度来看有效的推理的幻觉性质, 但它却无法使这种幻相完全消失, 并不再是幻相。(B 354) 因为, 人类理性的辩证逻辑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幻相不仅从属于真理, 从属于知性的推理: 幻相是真理的表现形式, 也是知性的终结。我们必须超越经验与知性认识并容忍幻相。通过先验幻相而显现的真理是理念, 即拥有规范意义的理性的概念。理念代表着一切理论与实践即使达不到也要努力奋斗的“最大限度”。(参见“理论与实践”) 理念的真理就是人类自由的理论与实践力量, 即超越一切既定的界限。“因为人性必须停留于其上的那个最高的程度将是什么, 因而在理念及其实行之间必须留下的那道裂缝会有多大, 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也不应该加以规定的, 而这恰好是因为, 它就是自由, 而自由是可以超出每个被给定的界限的。”(B 374) 只有在人类行动的领域, 就像在“一部按照使每个人的自由可以与其他人的自由共存的那些法则的有关人的最大自由的宪法”(B 373) 中那样, 理念才能成为“有效的原因”。此时, 康德还谈到了“粗俗地援引据说是与之相冲突的经验——但如果在恰当的时候按照这些理念来做出部署的话, 这种经验是根本不会有的”。而就在这里, 我们发现了理性、自由(q.v.)与辩证法的内在关联。

尽管黑格尔将康德的二律背反看作是“到近代哲学的主要过渡”(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 T1 1, 第 183 页), 但是并不是黑格尔与康德的辩证观念把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不断提到的康德哲学中的“伟大和不朽

之处”其实并不是康德的辩证论，而是他的分析论。因此，分析论是德国唯心主义中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源泉。“《纯粹理性批判》中最深刻、最正确的见解是，它认识到了那构成**概念本质**的统一，是**统觉的原始、综合**的统一，是‘我思’或自我意识的统一。”（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 , Tl 2, 第 221 页）这个概念表示实体是有区别的同时也是不可分割的，或说，同一在自身那里也就是不曾分离的区别（*ibid.*, Tl 1, 第 104 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辩证法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元素，它们分别是“实体即主体”思想、中介思想。但我们必须首先要考虑的是，在康德统觉的统一与黑格尔作为“实体”的主体概念之间费希特对先验辩证法的发展。

[141]

2. 费希特。费希特同样把康德的先验统觉概念也当成了自己的起点。对他而言，它也是辩证法的原始概念，因为，辩证的思考过程，即设定对立面及其解决办法，是先验主体这一原始“事实”的必然要求。由此看来，辩证法从本质上讲就是唯心主义。

先验自我——或“I-ness”——是对立面最终统一的本源：“真正的哲学家提出的一个主要论断是：一俟自我是仅仅为它自己而存在的，对它来说就必然会产生一个在它之外的存在；后一个论断的根据在于前一个论断……”（*Werke*, ed. by F. Medicus, Bd 3, 第 41 页）自我（在费希特那里，还指称先验的、普遍的意识，但决不指称个体）不仅是主体也是客体：“有人不断地寻找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系，但如果不直接从它们的原始统一中去理解它们，这将是徒劳。”（*ibid.*, 第 112 页）目前看来，在康德那里“综合”对立面的统觉所隐含的内容在费希特这里得到了明确的表达。主体只有在他行动的时候才存在（*ibid.*, 第 41 页），而存在者只有作为对立面被设定起来的时候才存在：“于是，一切现实的都是活动的；一切活动的东西是现实的。”（*Werke*, ed. by F. Medicus, Bd 1, 第 329 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康德的认知主体已经变成了行动主体。费希特要求读者“思考活动的概念时，非常重要是要完全纯粹地思考它”，不仅应当“完全抽掉”一切活动的时间条件，而且应当“完全抽掉”活动的对象。因此，费希特的自我与非我、现实与否定的对

立，在某一有限概念中对立面的综合，即 1794 年，他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的第一部分所阐发的整个辩证法思想，仍然是先验的和理论上的。从严格意义上讲，人的活动维度在理论之外，也在理论之上，但是理论在其内在演化的过程中却意识到，它必须把行动当成它自身所提出的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参见“理论与实践”）问题是要找出任何一个 X，凭借它，能够中介自我与非我的对立，而又不丧失意识的同一性。（*Werke*, ed. by F. Medicus, Bd 3, 第 302 页）在理论上，这样的中介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除非通过“理性的绝对命令”（*ibid.*, 第 339 页）否则永远无法解开的戈尔迪之结。理论把自我与非我不可分割的统一当成了活动与受动的统一，但是理论却无法理解这一对立统一的基础，因为它存在于“知识学的理论部分的范围之外”（*ibid.*, 第 372 页）。“理性的绝对命令”宣称：“根本没有非我，因为非我不能以任何方式将自己与自我统一起来。”（*ibid.*, 第 339 页）但是，非我却存在着，而自我也只有与非我一起并通过非我才能存在。原始的主体是一种被规定了的存在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规定存在的方式，但到底是什么规定了这一规定存在的方式的，“在理论上却完全无法解决”，因此，理论越过自身进入了“知识学的实践部分”（*ibid.*, 第 373 页）。知识学的实践部分把“应然”当成是自我的法则：自我的存在就是一种仅仅为了超越有限而本身有限的努力。因此，客体被认为是阻力，而只有超越了这种阻力，自我才能变成自由的主体。而随着一切阻力的消失，自我也会消失，所以，它的努力也只能是不断地“接近”那个本来永远达不到的自由。

在费希特知识学中，通过把直接性确定为中介，辩证法再次——自柏拉图以来也是首次——被当成了理解直接性的所需之物。作为被设定起来的存在者，哲学的任务成了通过概念手段超越被给予者，认识和分辨它所蕴含的否定。实际上，相比在康德那里，辩证法与自由的关系在这里更加明确。辩证法本身就是思想自由：哲学家“能够进行抽象化思考，也就是说，他可以借由自由地思考把经验中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分离开来”（*Werke*, ed. by F. Medicus, Bd 3, 第 9 页）。（直接）经验中的被给予者是一种对立面的结合，而



它的演变构成了现实（的运动）。以事物的本质为基础理解该过程很有必要，因为它是自由活动的理论基础。这要求对（传统）逻辑中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进行分离。逻辑原理不能被当成直接的被给予者，它们自身也必须是推导出来的，也必须受中介的调节，而当它们被理解为主体的结构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再也没有比这更终极的解释了。因此，费希特解释说，同一律（ $A = A$ ）以意识原始的、综合的统一为前提，同时也体现了这种统一，该统一（关于某物的意识）必然包括它自身特有的对立，因而也带来了矛盾律，但它却超越于矛盾律之上。（另参见“同一性”、“矛盾”）而这也为“克服”传统逻辑的辩证逻辑指明了方向。

3. 黑格尔。黑格尔辩证法不能完全被描述成对康德与费希特辩证法的延续或进一步发展。诚然，黑格尔把完成这项从康德开始、后来费希特又承接下来的事业——为逻辑本身的合理性辩护，为范畴奠定基础——当成了自己的任务。也正是借此，传统逻辑的局限性被超越了。虽然观念史中的确有这样的连续性，但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出现了全新的元素，我们可以暂且将其描述为“否定性力量”。诚然，通过非我这个概念及其作用，费希特在否定中发现了辩证过程的动力，而黑格尔则在先验唯心主义的领地之外首次认识到了它的现实性。凭此，作为“统觉的原始、综合的统一”（康德）的“对立统一”也离开了先验构造（*transcendental constitution*）的领域。紧接着，构成的主体性（*constitutive subjectivity*）这一概念也经历了一次决定性的转变：主体变成了真正的实体。辩证逻辑变成了本体论。这意味着，黑格尔辩证法不能和体系分离开来，因为它的结构就是整个体系的结构。对此，黑格尔自己在《逻辑学》最后一章中坚持认为，他的方法“只是概念本身的运动”，“是每一事情自己的方法”（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 , Tl 2, 第 486 页）。

[143]

由于无法以较小的篇幅充分地阐发黑格尔整个体系的理念，我们只能在大多数情况下遵循黑格尔自己的表述，集中强调黑格尔辩证法对马克思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辩证法的动力是，思想必然要变成“流动的”——唯如此，它们才能变

成有能力理解现实的“概念”（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 , Bd 2, 第 35 页）。因此，思想要变成流动的，要提高到概念、科学知识的水平，这是事物本质的内在需要，也即是说，是所要理解的内容的需要，是现实的需要。由于实际存在物的实体是“运动”，因此它不能被传统的知性范畴所把握，因为范畴把真正流动的东西固定了下来，把真正统一的东西割裂了开来。思维及其内容的“纯化”与稳定化，一切形式逻辑公理的原则，特别是矛盾律，这是一切知识的起点——但仅此而已。设定意义明确的区别和规定，从而首先使思想理解现实成为可能，这是知性的工作。因此，知性本身是“否定性的”，因为它否定感觉经验的直接性，并将其放在相应的位置上，即依照其真实性，放在对象的概念秩序中。但是，这一与直接经验的第一重矛盾、第一次破裂，是一切思维和知识的起点，它形成了一个抽象的秩序——不管知性如何拓展它、深化它，都一直无法摆脱它的束缚。如果思维本身从一开始不受现行规范的约束，那么它就会超出知性的范畴：对第一个否定的否定。这是理性的职责，也是它的真实情况。理性“是否定的和辩证的，因为它将知性的规定消融为无”（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 Tl 1, 第 6 页）。然而，在消融的过程中，知性概念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变成了其他概念——仅仅是它们自身的其他概念，而只有这些概念才能具体地把握现实。在任一对辩证法的抽象描述中，理解何谓具体——出现在辩证过程的第三个阶段——至为关键。对抽象的辩证否定与对实存的具体性和非概念的直接性的需求毫无共通之处。理性“又同样是肯定的，从而将前一个单纯的东西重新建立起来，但这却是作为一般的东西，它本身是具体的”，它将特殊包含在内，并且规定了特殊（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 Tl 1, 第 6 页）。具体就是辩证地否定直接性的结果，取决于知性，它是一般，确切地说，是“前一个单纯的东西的”一般。这意味着，结果是对象的概念，或概念的对象，因为现在规定它的是现实的、真实的对象。然而，并不存在两种不同的辩证法，一者是思维的，一者是现实的：它们从黑格尔辩证法发端之初就是统一的。就现实的（概念的）对象的同一性与客观性取决于它所有个

别的规定性(单独来看,它们相互排斥)的统一而言,它是一个“一般”东西。唯有在如此不同的规定性达成统一的时候,客体才是其所是;它的同一性只不过是这个统一的过程,而在该过程中,任何已给予的“他者”(因为任一个别的规定性都包含“他者”,因此也包含否定)都以存在(Being, Sein)为中介。然而借此,客体变成了它自身独特的存在的主体。主体的实存形式在不同的存在领域有所不同;对立统一的过程,即对他者进行中介的过程,在物质中被动地发生,在有机自然界逐渐上升到了意识,而在人类历史上实现了对实存与知性的反思性的掌控。在历史上,主体不仅仅是自在的现实的实体,同样也是自为的现实的实体,因此它是精神。现实的运动就是已给予的东西在概念上发生转变,而这被认为是现实的否定和否定性。只有通过这种使人得以实现自身的知识和活动,他(在此是客体)才能变成其实存的自由的主体,但这种主体无疑是一个“一般”的东西,即通过出现在理论与活动中的、构成整个历史的中介的总体来实现自我的主体性。这一历史主体随后把自然也卷入了其中介的圆圈;自然也因此被认识、被改造,变成了精神的具体表现,也具有了历史性。

黑格尔辩证法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黑格尔对康德的发展,即客体最先被康德的认识主体构造了起来,然后又被费希特的先验设定的主体构造了起来,最后被黑格尔的历史主体构造了起来。黑格尔辩证法中全新的是否定的职能。即使在古代,否定(如:非存在, μή ον)这个概念在辩证法中就起着重要作用,并且在中世纪的否定神学和宇宙论中保留了它的核心位置。费希特将这个概念引到了“构成的主体性”观念中。在黑格尔那里,它变成了主体性的规定,因此也变成了实体本身的规定。“活生生的实体”“作为主体是一个纯粹的单纯否定性,正因为如此,实体是一个单纯事物的分裂活动……”(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 第23页)“自我”和“否定的势力”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ibid.*, 第35页);就这一点而论,它们也是自由的基础,但不仅仅是先验自由的基础。这种关系——在《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中得到了阐释——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经过凝练变

[145]

成了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但是，那些从自己的环境那里分离出来的偶然事物，那些复合的、只有与他者结合起来才具有现实性的东西，本身都具有一个独特的实存和一个独特的自由。此乃巨大的否定势力的表现，是思维或纯粹自我具有的一种能量。死亡……是最可怕的东西，只有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才能够控制死亡。有一种软弱无力的美，它憎恨知性，因为知性要求自己去做无能为力的事情。但是精神的生命不是表现为害怕死亡，与破坏保持绝对的距离，而是表现为承受死亡，并在死亡中保存自身。只有当精神在一种绝对的支离破碎状态下重新找到自己，它才赢得它的真理。精神作为这样一种肯定的力量，并没有逃避否定性。与此相反的做法则是，把某些东西说成不存在或是错误的，然后转移到别的东西上面，就此完事。实际上，只有当精神直面它的否定性，与之周旋，它才是这样一种势力。这种周旋是一种魔力，可以把否定性转化为一个存在。这种魔力和上面所说的主体是同一个东西。（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 第 34 页）

从严格意义上讲，要说出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依据”是不可能的，因为黑格尔辩证法不承认有任何绝对的起点，如果非要说的话，那只能说是对存在之否定性——在超越与被克服的过程中变成了肯定性——的经验。任何存在者（*das Seiende*）都是对其（实际）之所是和能是的否定，就这点来看，它不是它本身，是他者。因此，存在本身变成了矛盾。实存不只是由另一与其相对而立的其他实存决定的某种东西；事物的本质并不是外在于它的某种东西，而是事物自身：它本身就是矛盾的。它的实存就在于“维持”该矛盾；它的实存是一个（不断一体化的）统一体，借助自身对他者进行中介——而它自身不是别的而只是这一中介，继而超越对立。但由于它们在严格意义上是构成了现实存在结构的“内在的”对立，所以它们不可能被它们从属的定

在 (the determinate being) 所克服, 但是它们必然反映从一种定在向另一种定在的“过渡”, 因此也必然反映其现实的否定。这预示着辩证法朝着总体的方向运动。

这可以从思维对象推论出来, 也就是说, 可以从克服自身并成为他物的矛盾本身推论出来。只有从它所处的情境出发, 从它存在于其中的整体出发, 更确切地说, 从它展开自身并超越自身的整体出发, 它才可以被具体地确定下来。任何固定的、孤立的定义都是不完整的, 因此也都是不真实的; 因为它将对象与它特有的可能性割裂了开来, 但只有凭借该可能性, 对象才能实现自身, 并因此使运动——即它存在的规律——停止下来。对象的任一方面、状况、运动以及运动的任一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其内在矛盾得以展现的整体——都没有破坏每个连续的形式, 即它的同一性。它毁灭性的活力从根本上把辩证法与一切整体论或格式塔理论区分了开来。它反映了自然无意识的破坏, 也反映了历史有意识的破坏, 而正是通过破坏, 它证明了自身就是理性。现存的东西在它演变的过程中破坏了自身, 进入了一种新形式, 超越了旧形式的“限制”或否定性; 因此, 新事物就是对旧事物的解放, 这是一个自我解放的过程。如同解放一样, 自由从本质上讲也是否定; 如同 (主体的) 解放过程一样, 客体的运动也带来了“进步”。这要看该过程变为有意识的、自觉的行为的程度, 即对现实及其必然性的理解的程度。在这一理解的过程中, 一般变成了现实: 历史过程将不同领域的存在全部吸收了进来, 使自然本身、物质获得了自由, 而它本身就是精神的具体表现。

[146]

然而通过把一般实体化为理性的、自足的总体, 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丧失了自身特有的冲动, 但它却是整个辩证运动的唯心主义解释的拱顶石。从一开始, 自康德之后, 辩证法就是构造客体的主体的运动, 是原始的、综合的对立统一。一旦它摆脱了纯粹先验的语境, 该活力就会被当成是现实本身在其各个领域的过程。“实体”变成了它自身的主体; 它具体的此在 (Dasein, being there) 成了对立面的统一和克服, 而它的同一性也过渡到了它的他物。

在这种多——代表着它随时被给予的规定和条件——的统一中，它真正的同一性成了通过整个的否定而保持自身的一般。但是，这种一般从一开始就被当成了概念，更确切地说，被当成了构建的过程，因为只有在概念中，由对立的规定所代表的“多”才能被统一起来，而统一也才能拥有稳固的基础。真正的“事物自身”就在其概念之中，而概念是一般（普遍物），也可说是“本身包含各式各样规定的统一的规定性”（*Werke*, hrsg. von H. Glockner, Bd 3, 第 145 页）。但是，如果概念是事物自身“被意识到的本质”，那么它就不可能外在于事物，不可能是“纯粹思维”的产物。毋宁说，事物自身必须努力实现它的概念，它本身必须成为“理解”的过程。物质是达到该目标的障碍，因为在它的领地内，对立统一仍然是盲的、被动的、不完整的。即使在历史中，尽管在自由方面取得了全面的进步，但是（在自然和社会中）物质仍然是从未被完全克服的障碍。即使在最理性的历史阶段，它整个的否定性也会在市民社会的矛盾中表现出来（*Foundation of a Philosophy of Right*, § 243ff.），在这个层面，它不可能得到解决，最多只能通过国家的强制把它控制起来。国家（q.v.）是普遍物，在市民社会层面，它不可能实现，它是自由的主体，

[147] 但以此形式，它还谈不上是真正的普遍物，更谈不上代表真正的自由，因为它仍包含市民社会的冲突，并且它本身也只是诸多国家中的特定国家。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居支配地位的是“激情、利益、目的、才德、暴力、不法和罪恶等内在特殊性和外在偶然性”的“极度动荡”（*ibid.*, § 340），即各种势力的嬉戏——揭示了国家这一“伦理性的整体本身”的偶发性与嬗变性。国家本身在世界历史这一普遍物中只是一个特殊物，而历史中所有特定的总体（东方、希腊、罗马和日耳曼王国）在“理性”演变的过程中都会被超越。但是，到底什么是世界历史的主体，到底是什么在普遍理性中与其对立面达成了统一，并使否定性的历史序列变成了一种实现自由的进步模式（q.v.）？从历史本身来看，我们发现任何东西都没有资格；在这里，理性同样是盲的，普遍物并不存在于个人与民族的自由行动之中。因此，世界历史本身只是更高的普遍物、真正的总体的“表现形式”。只有在这样的总体

中，作为客体的物质，即“抛到”主体的某物，本身才可以是主体，所以它才可以通过所有他物和所有否定成为自身、保持自身。这一主体与客体的自由统一（参见“主体”、“客体”）是（纯）思维，它在自身之中包含着它的对象，即它所领会和理解的对象，拥有现实性与真理性的对象。但是，该思维不可能隶属于任何特定的主体：它是可理解的概念世界，更是不断构建的活动的、运动的世界。在此意义上，它是绝对，是上帝。作为绝对认识，它是使自身在自然、历史中自由“外化”的“理念”，在这一否定性的运动中，并通过该运动，保持自身、回归自身。

真正的现实被看成是绝对理念，在最后的分析中，同样还被看成是绝对认识。起初，黑格尔辩证法不像是一种方法，但最终却被证明，它就是一种方法。绝对理念“显露出自身是这样的，即规定性并不具有一个内容的形态，而是绝对地作为形式……是绝对地作为普遍的理念。这里还待考察的，已不是内容本身，而是其形式的普遍的东西，——即方法。”（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 T1 2, 第 485 页）

### 三、辩证法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内涵与意义

我们不应该认为，黑格尔把思维当成绝对——绝对的方法——就是其辩证法的起点或基础。毋宁说，它是结果，是自由主体需求的满足，是一般与特殊的统一——在物质世界乃至在客观精神王国（社会和国家）一直以来都没有实现。就黑格尔辩证法中任何展开与克服对立的存在和阶段唯有在封闭的总体此一终极的视域中才能发现自身的地位和作用而言，辩证法事实上可以被认为是彻底地改变了现状，而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

[148]

自己认为，三分法“只是认识方式完全表面的、外在的方面”(*ibid.*，第498页)。它只能从作为必然和谐的整体矛盾的次序中获得。不管怎样，在进步的任一个别阶段，否定性和激进的批判起着支配作用。这就是马克思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方式：

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Marx, *Capital* Vol. 1 M, 1961, 第20页)

这也就是说，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并不仅仅是其诸多属性中的一种，而是其理想主义的核心。此概念一旦被认为是事物的“本性或本质”(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 Tl 1, 第14页)，任何事物的直接性，即它此刻偶然被给予的形式，就会被否定，而这一否定并不是一个形而上的命令，它发生在事物自身的概念之中，发生在理解现实的过程之中。“思维丧失了肯定的力量。”(Hegel, *Werke*, hrsg. von H. Glockner. Bd 8, 第71页)虽然辩证思维仍然是思维，但是它具有革命功能：正是借助于其抽象性，它理解并因此超越了肯定的力量，赢得了通往关于具体的新概念的道路。

马克思曾在这样一段众人皆知的话中评论过他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他所强调的是黑格尔与他自身观点之间的差异，而不是两者之间其本质的相似之处：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



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Capital* Vol. 1, M, 1961, 第 19 页）

马克思不断强调黑格尔的现象与现实、理想中介与物质中介等颠倒概念之间的关系（e.g. in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the State” . In Marx’s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Garden City, N.Y. 1967, 第 154 页, 第 159 页），这涉及历史唯物主义与绝对唯心主义的差异，但却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即马克思辩证观的基本要素都源于黑格尔。马克思本人从“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2nd imp. M. 1961, 第 151 页）中发现了辩证法的本质。根据其唯物主义的前提，他认为，否定性就是人的外化和客观化，就是对这一状况的克服，即劳动过程（q.v.）。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是其“关于通过扬弃对象性本质的异化来占有对象性本质的见解……”（*ibid.*, 第 164 页）

[149]

[所以黑格尔把] 人的自我异化、人的本质的外化，人的非对象化和非现实化理解为自我获得、本质的表现、对象化和现实化。// 简单地说，他——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2nd imp. M. 1961, 第 164 页）

费尔巴哈——“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ibid.*, 第 145 页；参见 Marx, Engels, *The Holy Family* M., 1956, 第 125 页）——一旦以现实的人取代了自我运动的概念，“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参见“存在和思维”）就会再次“痛苦地”变得明显起来（*The Holy Family*, 第 73 页）。作为推动原则的否定性，对立面的展开及其在有限领域内的最终解决，实际上现在已经不再是思维的运动，不再是意识的运动，而是现实的人类历史的运动（参见“异化”）。从它的基本结构来看，马克思的

唯物主义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同样地，马克思辩证法同时也是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本质上辩证的整体现在变成了社会(q.v.)，也就是说，变成了历史演变过程中随时被给予的特定社会。因此，马克思把资本主义(q.v.)当成是一种产自封建主义(q.v.)的制度来分析，而在封建社会，生产力与束缚充分就业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对立弥漫在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并最终造成了自身的否定；不过这种否定——把旧制度下被扼杀的生产力解放了出来，并且使新型的社会分工与财产分配秩序变成了现实——早已在旧制度中有其征兆，因此它把“规定的否定”展现了出来，同时依据自身内在的活力克服了现状。

[150] 资本主义的支撑力和驱动力，即它的发展规律，变成了它衰退、垮台的规律。实现资本主义即是否定资本主义；它的自由即是压抑。因此，在公正的劳动合同中，这种完全等价的商品交换原本就是剥削(q.v.)；自由竞争是通向垄断集中的必经之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生产力的破坏和浪费。在此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对社会组织的，但在私有财产和私人控制的结构中已经失控的新武器。

对于唯物辩证法来说，新形式的社会存在源于对立面的最终解决，不过该辩证法现在却面临着一个决定性的问题：辩证的过程本身是否代表着“进步”，也就是说，从拥有更合理的生产力组织方式、允许更大程度的人类自由的意义上讲，新的历史形式是否必然“更高级”？马克思辩证法是否含蓄地或明确地采纳黑格尔辩证法的模式，仅仅是将其放在了唯物主义的地基之上，而一系列的历史领域正是按照该模式以其必然的次序表现着在自我意识和实现自由上取得的进步(q.v.)？唯物辩证法是否同样意识到了历史中的理性？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的答案。在马克思的作品中，历史的发展显然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促进了自由，克服了前一阶段的衰退。同样，这种观点也遮蔽了有可能给现实带来衰退、毁灭的冲突。但从另一方面说，他反对把自己“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

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 [Letter to the editorial board of *Otechestvennye zapiski*, Nov. 1877. In Marx,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 (1955), 第 379 页]。

同样，类似的模棱两可也困扰着辩证的必然性这一概念。无疑，马克思认为，必然性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内在规律的作用”：“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Capital*, vol. 1, 第 763 页）事实上，固有的辩证法概念确实意味着它必然展开、克服对立面——否则它就不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可是，只有通过社会行动，从而使每个行动者或受动者的意识本身构成最终解决的必然要素，这种必然性才能产生。但是，意识、反思以及扎根于反思的否定意志，都与自由紧密相关。按照马克思辩证法，思维与主体仍然是辩证过程的决定性要素：阶级意识的功能（参见“阶级”、“阶级斗争”）可以证明这一点。诚然，这一主体已经不再是绝对理念、纯思维，而是社会阶级，但这仅仅是更果断地把意识这一角色放在了历史过程中。该过程在同等程度上也是“开放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被哲学体系俘获，它同样由潜在的自由（解放）或奴役意识的发展所决定。在这里，自由和必然出现了无法解决的紧张局面。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一直以来都没有决定性地实现：自然（以及类似于自然的异化社会）仍然是一个必然王国、客观王国，因此与自然的对抗（以及与社会的对抗）不可能在主体中得到解决、得到改善。马克思的观念是不容许有自然辩证法，也就是说，不容许物质像主体一样实现自身（参见“辩证唯物主义”）。

[151]

马克思辩证法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自由与必然、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一种无法解决的紧张关系，它剥夺了黑格尔辩证法特有的最终和解和称义。它缺乏我们在整个黑格尔辩证法中看到的肯定性。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辩证法本质上是革命性的。它可以理解人类在整个历史上施加在其他人或自然身上的强制力，但他并没有为此做任何辩护，更遑论以非暴力的废止暴力的形式提供些许的慰藉。特定社会秩序的内在矛盾都是在既定权力的统治下展

开的，而在有意识地与现有权力及由其决定的利益和制度发生冲突的过程中，卷入这些矛盾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产力可被用以帮助过渡到“更高级的”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最终的结局取决于发生冲突的可能条件，以及在冲突过程中形成的意识的状况。有鉴于此，那些拥有这种意识的人们必须认清他们的奴役状态及其成因，必须有自我解放的意愿，并且必须懂得如何才能实现解放。马克思把革命性的阶级意识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冲突都纳入了资本主义的辩证法：资本主义必然生产和再生产工人阶级，并把他们变成无产阶级（q.v.）。在宣称私有制和个人自由是其法律的社会现实中，它的实存就是现实的矛盾。无产阶级并不在该法律的权限以内，或更确切地说，对工人阶级而言，资本主义的法律是贫穷的、人类不可能本身地生存的法律。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是其绝对的否定：它的生存利益与现状完全不相容，并且只有通过现状的瓦解才能得到满足。但前提是，否定现有秩序的、解放的历史推动者是无产阶级：它的实存将不再引起现实的矛盾。它将变成有助于既定秩序的另一种力量，而它的利益也将在于保存该秩序。社会主义自身的必然性取决于无产阶级的社会状况及其阶级意识的发展。因此，马克思的观念包含着它自我否定的可能性，也包含着压抑阶级意识和革命行动失败的可能性。

[152] 在前此引述的 1877 年 11 月的信中，马克思提到了古罗马的发展过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之间的相似之处，它们把自由农民与他们的生产资料都分离了开来，并且促成了大地产的形成和资本的集中。但是这种类似的发展却在两种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在罗马，平民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了“无所事事的游民”，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在人类征服了历史之前，社会本身只是决定其发展可能性的自然的一种表达。在此，毫无理性的模式可循。唯物辩证法在它所理解的开放的历史视野下认识到了自身，并借此向它最关切的人类自由表达了敬意。

二

[153]

## 马克思主义的介入

## 马尔库塞论古巴<sup>①</sup>

### 马尔库塞教授于 1961 年 5 月 3 日在布兰迪斯大学古巴抗议集会上的发言

很抱歉我准备了一些字条。我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有必要严密地参照它

---

① 马尔库塞论古巴这两篇文章创作于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暗中援助的猪湾事件（1961 年 4 月 17 日）不幸地发生后、古巴—美国—俄罗斯间紧张关系一触即发之际，而关于此，在许多著作里已有分析。参见 Jim Rasenberger, *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 Castro, 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 New York: Scribner, 2011; Peter Kornbluh, editor, *Bay of Pigs Declassified: The Secret CIA Report on the Invasion of Cuba*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ocuments),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当时，马尔库塞正在布兰迪斯大学任教，而一场游行示威正在酝酿，以抗议美国对由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实施的干预政策，尤其是抗议美国对古巴进行的封锁。在马尔库塞的个人收藏中，有一个 6 页的谈话抄本名为“赫伯特·马尔库塞教授于 1961 年 5 月 3 日在布兰迪斯大学的古巴抗议集会上的发言：非出版物”，随后还附有两页的手稿，把此次示威置于“极权主义的恐怖”和对异见进行压制的冷战背景下。

马尔库塞的报告突出了他的激进主义，并激烈地为少数者辩护，指出他们有权对其政府的政策提出异议。教员们在布兰迪斯大学校报上发文批评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尤其针对一位负责主持热烈讨论的年轻女生。马尔库塞随后在一篇引起巨大争论的文章《民主的葬礼》中对此给出了回应（参见“*The Funeral of Democracy*”, *The Justice*, May 9, 1961, pp.4, 6）。马尔库塞在校报上挺身而出，在教员们的批评中保护学生，显示出他作为一个

们，以做更深入的说明。

我不去质疑美国在西半球与共产主义战斗的权利——尽管我也许会质疑对西半球的定义，它现在甚至包括东南亚的老挝等地。这是关于定义的事，原因是——在此我严肃地重申这点——“我们在同共产主义战斗”这一短语的意义所在。我们在同什么战斗？<sup>①</sup>如果我们能有片刻从宣传工作和教化的炮火中成功突围，就会发现我们正与之进行战斗的，是落后国家和地区建构一种根本上不同于我们的社会形式的努力。上述社会形式包含这样一些彻底的措施——如土地改革，如至少在基础工业和信贷领域实施国有化，还有对财富和权力进行彻底的再分配，以实现所谓欠发达国家的发展。从这种社会形式看，我们的社会形式不适合这些国家。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场尖锐的斗争中，这场斗争的对象是那些与这些改革相悖的既得利益；也就是说，这一切都以一种专制的形式发生在公民权利和自由受压抑的前提下。这恰恰是革命的天性。如果你在一场尖锐而公开的内战中战斗——也许还不仅是内战，而且是与外部战争联系十分紧密的内战，【并且】既得利益与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努力相悖——那么便无法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因为这有可能使既得利益上演一场快速的复辟，这在历史上已有许多先例。在我所知范围内，没有哪一场革命——包括发生在美国的——不是以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压抑为开始，并且这种压抑还会长期持续下去。我并不是一位美国史学家，【但是】我不相信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反独立者会享有公民权利和自由。

[154]

没有人喜欢——事实上我也不喜欢——压抑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但我厌恶和鄙视那些伪善者，他们专注于将卡斯特罗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压抑作为

---

攻击力强的辩论家要与右翼的教员们进行抗争的意愿。在这次事件之后，美国和古巴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导致了1962年10月24日至28日的古巴导弹危机，并使美苏站在了核战的悬崖边上。参见Anthony Page于1974年的电视剧*The Missiles of October: Robert Kennedy, Thirteen Days: A Memoir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Michael Dobb, *One Minute to Midnight: Kennedy, Khrushchev, and Castro on the Brink of Nuclear War*, New York: Vintage; Reprint edition, 2009。——编者注

我们反对古巴革命的主要理由之一。在我所知范围内，这些可鄙的伪善者们，一方面将卡斯特罗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压抑作为他们在古巴发起和组织介入行动的主要理由（至少是之一），但与此同时，他们没有一个会在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地区、佛朗哥（Franco）统治下的西班牙、萨拉查（Salazar）统治下的葡萄牙、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危地马拉以及其他拉美国家发起和组织军事介入或其他介入行动，即便他们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压抑之无情和野蛮程度远超卡斯特罗的古巴。这似乎就是说，我们只反对左派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压抑，而不反对右派的同样行径。

[155] 如今在一场激烈的内战中，迫使卡斯特罗政权对公民权利和自由进行压抑，使它毫无选择否则将导致依附于外部势力并受其影响的，正是同样的一群人。放眼全球尤其会发现，那些与构建新社会形式的运动相抗衡的既得利益与美国相联合，而那些支持这一运动的则与苏联相联合。首先，既得利益与西方；其次，革命利益与苏联。这使得在世界范围内，那些土生土长的社会革命运动很难与那些受外国势力所决定、煽动和组织的运动划清界限；换句话说，不仅可以把“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口号来涵盖所有这些激进的社会改造运动，而且还可以用它来谴责所有这些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做代理的运动。

毫无疑问，卡斯特罗政权联合了苏联甚至受制于它。我们尽己所能地迫使它们尽早这样做了。当一个为了生存而战斗的国家面临着可能导致其大部分人饿死经济制裁时，你想它会做些什么？如果说卡斯特罗今天在技术上甚至也许在军事上都依赖于苏联的帮助，那么这也是我们自身的过错造成的。

不过以上这些都离题了。我更关注这种政策给我们国家带来的后果——我一再申明不仅是古巴政策，尽管已经有舆论将古巴政策与老挝政策、与台湾地区政策、与全球其他地区政策区别对待。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有迅速向一个不自由的社会转型的趋势，而这正是我们在其他国家所奋力谴责的。民主制度的缩水；新闻出版自由的受限，事情并不会因为有一个自主的审查机



构而变好——而是相反，甚至变得更让人讨厌；我们已经提到的两党的统一战线；批判的停滞，对所有反民主的机构实施最不民主的措施；那份由诺伯特·明茨（Norbert Mintz）草拟的十分精彩的备忘录，专门讨论了《纽约时报》于（我想是）4月9日到23日间向美国公众所传达的信息，揭示了公众所获得的错误信息——我强烈建议你去找一份此备忘录的副本来读，然后你就会意识到，甚至连在报刊中获知原始的真相都很困难；最后一点，我们在这个国家里看到了在其他国家被称为是“个人崇拜”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不打算过多展开，不过我会读一封今天刚收到的信，信是由布兰迪斯大学校友所写的，她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

“有一个抗议美国介入古巴的大型集会，随后还有一场到联邦政府大楼的游行示威。当一群有组织的旧金山大学右翼学生纵声嘲笑、撕毁标志物、扔零钱、投掷鸡蛋雨的时候，我和伦尼正在监控着警戒线。我们的人都十分自律因而没有引发暴力冲突，但这丝毫不归功于警察，他们只是微笑着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激进人士乱扔东西，剪断扩音系统的电线等等。他们的领头人是一个非常小个的、柔弱的年轻男子，他戴着巨大的眼镜并且容色憔悴”——我是在引用——“一直用一把又高又尖的嗓子喊话，说这个国家需要的是更多地使用武力、武力、武力。当我们回到伯克利，我们发现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长——那个伟大的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告诉新闻媒体说我们在旧金山的集会和我们在学校的会议显然都不是自发的。说这些显然都不是学生们的杰作，而是有外部机构从中作祟。”

[156]

我想补充一点，这名学生同时还写到她对在大学生群体中迅速传播的一种有些露骨的反犹主义感到毛骨悚然。你们之中如果有谁对近来的历史哪怕只有一丁点的了解，也都能够意识到反犹主义与这封信中所描述的其他行为同时发作并非偶然。

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如果我们与共产主义进行战斗竟产生这些后果，那就是说这场战斗在其根基处就存在错误。事情还不止于此：我甚至还没有提到最可怕的后果——这从来都是清晰可见、迫在眉睫的危险——

一场核战争。我们仍有必要去提及它，因为那些情愿去死或者情愿作为植物人活下去、让一大堆放射物质留在其骨头里的人的数量，看来要远远多于那些还想活下去并且想活得相对正常和健康的人的数量；撇开我的年龄不谈，我十分肯定自己属于后一类人。

那么到底还有什么可选方案呢？你们总是询问理由；那么这是极少数你们确实有理由去做的事之一。我并不对我们能够完成的事寄予过高期望，但我认为我们有义务去利用那些我们仍然可用的民主的手段和工具，让总统知道——而不是中央情报局：美国的政策是由总统制定的，我们不应让中央情报局成为替身——你对此有何感受。可选方案已经由斯图亚特·休斯（Stuart Hughes）给出：与古巴进行协商，打破我们与全世界最无情的专政的邪恶结盟，对那些在经济状况不如我们的国家中以改善生活状况为目标的运动给予全面支持，即便其所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是我们在自己的国家所不赞同的。谢谢！

#### 附在马尔库塞的古巴谈话后的手写笔记——编者注

[157] 极权主义的恐怖取消了主体与客体、人与物、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区别。极权主义的恐怖移除了西方文明的基本范畴在其上得以发展和实现的地基。要点在于，这些范畴既不是从外部被破坏，也不是被某种不相干的、灾难性力量所否定和破坏，而是在西方进行自我防卫的过程中，被它自身的经济和政治机制毁了。

伴随着这种破坏，西方文明的整个逻辑和话语所进入的“论域”也失去了合法性。它的思想的范畴和法则已不再适合：它们既不再符合现实，也不能指代现实。极权主义话语的反理性结构表达了同样的事实。然而传统论域的崩溃并不会随着对极权主义国家的清算而停止，而是会在解放后仍旧继续。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说“沉默的巨大反叛”已经“在我们之中广为传播”，他还声称“人类的漫长对白已走到了终点”。（*Politica*, no. 4,

1947, 第 191 页)

在德国, 青年学子宣称正是《敬畏语言》(*Scheu vor dem Wort*) 使他们没有把语言当成对他们的关系和观念的表达: “一个人用于传达自己信念的概念不是很多都站不住脚吗? 它们没有出错、没有词不达意 (*hinterhalten*) 吗? 多年来那些滥用它们的人没有把它们弄脏、使它们的内涵缺失吗?” [《每日评论》*Tägliche Rundschau*, August 20, 1947] 大卫·鲁塞特 (David Rousset) 以一种小说的形式描述了集中营的现实: “言语出于怀疑” (*par méfiance des mots*)。

### “民主的葬礼”

马尔库塞博士是布兰迪斯大学的政治与哲学教授。他的这篇文章回应了艾尔·所罗门 (Irl Solomon) 和肯尼思·斯莱平 (Kenneth Slapin) 在同一版面的文章。[来自布兰迪斯的学生报] ——编者注

我通常不会就某几篇以曲解代替事实、以谩骂代替争论、以怨恨蒙蔽感官的作品给出回应。不过对于所罗门先生, 我必须破例, 因为我想保护一名学生免受不负责任的侮辱。我并不打算对书信作者的庸俗愚昧给出回应——我关注的是布兰迪斯的学生们, 我学会了去了解、去接受他们。

据所罗门先生所说, 上周的古巴抗议集会是 (1) 一场“马戏”; (2) 一场“杂耍秀”; (3) 一次“流产”。“主持此次流产” (这种文字风格暴露了作者的品味) 的格尔特曼女士 (Miss Geltman) 挥舞着鞭子迫使会议进行, “意图通过反民主的阴谋来操控所有与会者”。毫不奇怪, 所罗门先生说, 格尔特曼女士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迫的”, “在一件意识形态紧身衣的束缚下”, 这件紧身衣“阻碍学生们去接纳任何更广泛的东西” (!)。她就这样 (与教工小组一起) 加入了“最粗野的政治过剩”, “大批学生”因此而被“洗脑后签了一份含糊其词、毫无意义的请愿书”。到此为止都是所罗门先生的用语。

格尔特曼女士是我遇到过的最文静、腼腆和自律的女生之一；她在会议上几乎很难让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到；她完全按照会议议程行事；面对最吵闹的打断也冷静相待。用粗野的政治过剩来指责她是可笑的，这不是正好表明了指责者的心理状态吗？我承认自己曾“为主席提供了帮助”，这指的是我曾保护她免受粗鲁的打断；我曾帮助她使一场有秩序的讨论成为可能。

### 程序上的事实

事实是什么？那场会议被称为古巴抗议集会，而不是一场关于古巴事务的辩论。它的时间有限，因为华沙集中营的追悼会将于当晚 8 时开始。当一大批学生显然希望将讨论继续进行的时候，大家就决定将会议无时限地延长（我声明只要还有任何问题和意见，我都愿意留下来；我的同事们也一样）。在专家小组陈词完毕、主席宣读了向会议提交的决议概要之后才是提问的时间，这是在一开始便已宣布的。听众席上的一位教员在主席宣读决议之前就打断了他并要求发言。我提醒他注意，根据先前定下的规则，还有两分钟他就可以自由发言了。后来他发言了，而且和专家小组成员说得一样长，也没有被打断过。我的专家小组的同事们作了简短的回应（我完全没有回应因为我无话可说），随后讨论才开始——我重申一遍：将会议无时限地延长是与听众的愿望一致的。那些学生既没有“被洗脑”也没有“被恐吓”去签名请愿。所罗门先生将他们的行为诊断为“偶发性白痴症”，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这方面的专家去处理。但我不能不称赞这位风格和用语如此得体的专家的如下非凡功绩，他指责斯坦教授（Professor Stein）“毫不得体”。

### 遭诽谤的少数者

现在我才来谈这一问题，这一严肃的问题。古巴抗议集会是一次为少数者发声的尝试，这些少数者正在与公共舆论那压倒性的暴政做斗争，以让自

己的声音被听见——这种公共舆论四处充斥着，使人们漠视令人不快的事实、以支持灾难性的政策。在今天，这些少数者遭到了诽谤、恐吓和谴责。专家的那篇“偶发的”作品则给这种诽谤添油加醋。他很幸运，因为他的观点与绝大部分报纸、其他大众传媒、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以及联邦调查局的观点一致。他及其同伙并不关心这样一场作为“马戏”和“杂耍秀”的古巴抗议集会——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为更严肃的事情做准备：他们自己的葬礼，以及民主的葬礼。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既定社会里，民主不是与狼共嚎，不是不假思索地吞下官方政策，不是去诽谤和指责少数者，而是要去保护和行使抗议的权利，抗议一个一边高呼着民主的口号、一边却可能与民主的实质背道而驰的政策。在很久之前就有人说过，也许有朝一日在这个国家中会打着民主的幌子破坏民主。从我刚刚谈及的那封信中就可以窥见一些端倪，也许有一股力量会使这一预言成真。 [159]

### 作为武器的口头中伤

与所罗门先生相比，斯莱平先生在粗鲁和歪曲事实方面更为高明，他利用口头中伤作为政治诽谤的武器。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他的作品也要给一个回应。(1) 他说我“绕了一个大圈以最坏的品味含沙射影地说与卡斯特罗的战斗是被软弱的、容色憔悴的反犹分子所领导的”。“含沙射影”这个词是精挑细选的，因为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引用了一封关于西海岸学生示威的信，有一个（在信中）被描述为软弱的、容色憔悴的男子煽动人们起哄。我并未在这一部分内容中提及反犹主义，而是在谈及大学里有抬头之势的反犹主义时，才从这封信后面的段落中（正如我所明确声明的那样）引用了这一说法。我将信的相关内容读出来是为了阐明，伴随着新的政策而正在这个国家出现的某些趋势。(2) 我并没有谈及“在欠发达地区对公民自由进行压抑的历史必然性”。这种说法是毫无意义的。我谈论的是在一个革命时期对公民自由的压抑，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和在与外部战争相联系的公开内战中。

[160] (3) 作者还高呼：“让他（这里说的是我）再解释一下（原文如此）匈牙利革命在其根基上是新法西斯主义。”我恐怕帮不上忙，因为我不可能重复我根本没说过的东西。我说的是，匈牙利革命在开始时是作为一场对抗压迫性政权的自发的、真正的工人革命，但它后来被一些反动团体歪曲了，我将这些团体称为霍尔蒂将军（Admiral Horthy）的前法西斯政权的支持者。发表文章的那名学生是否曾在 1956 年出席了谈论匈牙利革命的那场会议？如果没有，那么他是否应该给出其信息和灵感的来源？(4) 作者称教工小组为“狂热的‘激进分子’”。这是不真实的，是一次告发。不过，我不认为这是口头中伤，因为在当今大学校园里告发成风、麦卡锡主义广为流传（或是被流传）的氛围下，我（在此我说的仅仅是对我而言）为自己能被称为“狂热的激进分子”而感到自豪。

### 麦卡锡主义的死灰复燃

这又将我引到一个真正的问题上了。我们已经讲过，对于既定政策的本质的异议——是针对其本质的，而不是仅仅针对其“失误”、错估，不是仅仅针对中央情报局，等等——被称为是不民主、反民主、非美国的、共产主义者的异议。麦卡锡主义的死灰复燃不需要到所罗门先生和斯莱平先生那里去寻找确证。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召集会议的人，他们是真正的异议者，正在受到恐吓和谴责，他们的会议被打断了，他们是诽谤的受害者。

在一个真正民主和合理的形式中【都属于（……）】，分歧可以在不掺杂个人的嫉妒、敌意和怨恨的情况下进行辩论。与此相反，我个人已经成了一场人身诽谤运动的目标。其根源是相似的。我不介意成为目标，但我很介意政治事务和人身攻击之间的关联。这是对社会氛围的毒害。

我愿意在任何时候与那些仍然能够理性地进行讨论的个人和团体，讨论相关事宜以及斯莱平先生所提出的具体问题。

## 压抑性社会中的妇女解放：与马尔库塞及 彼特·弗思的一次座谈<sup>①</sup>

[161]

美国哲学家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 缩写为 EC)<sup>②</sup> 影响了《论据》(*Das Argument*)<sup>③</sup> 在这件事上的观点, 而几乎没有别的出版物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感到十分幸运, 因为马尔库塞最近来西柏林访问了三天并大方地同意了就“妇女问题”接受《论据》的采访。马尔库塞和彼特·弗思(Peter Furth)在这次采访中有一场对话, 出于对读者的考虑,

---

① 《压抑性社会中的妇女解放》, 由赖茨翻译, 最初的德文标题是: “Emanzipation der Frau in der repressiven Gesellschaft: Ein Gespräch mit Herbert Marcuse und Peter Furth”, 刊载于 *Das Argument*, 23, West Berlin: October-November 1962, pp.2-12。弗思, 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向的《论据》的成员之一, 他向马尔库塞问了一些关于妇女在当代工业社会中受压迫和解放的问题。弗思的问题突出了妇女在一个压抑性社会中的受压迫情况, 而马尔库塞则强调了各种解放的趋势, 因而他预言了一场不久后他就要予以支持的妇女解放运动; 参见 “Marxism and Feminism”, *Women's Studies*, 2, 3 (Old Westbury: 1974) pp.279-288; 另见 1974 年 3 月 7 日在斯坦福大学的一场讲座的文稿, 它被许多地下出版社再版, 并收录在了《马尔库塞文集》第三卷《新左派与 20 世纪 60 年代》。——编者注

②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1955) .

③ 《论据》(*Das Argument*) 是一本关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刊物, 创刊于 1959 年, 并于 2009 年为其连续出版 50 年而举行了庆祝。它被当作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 Forschung*) 的继承者 [尽管《社会研究杂志》有着更以马克思主义为取向 (道格拉斯·凯尔纳)]。——英译者注

在下文我们将附上少量介绍性的标注。

[162] 在马尔库塞的专门术语中，压抑是一个突出的措辞。因此我们将试图在这里探明其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对这个概念的阐释也能大致地定位马尔库塞思想的一般路线。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里面用压抑和压抑性“表示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内部的和外部的限制、压制和遏制的过程”（EC，8）。在食物普遍匮乏的紧急情况下，这种限制不可避免。“客观地说，本能抑制和本能限制的需要取决于苦役和延迟满足的需要”（EC，88）。压抑的必要性随着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和满足感的预期向好而减小。“只有联系自由在历史上可能达到的程度，本能压抑的范围和强度才能获得其完整的意义。”（EC，88）在现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状况所能够支撑的潜在自由的程度与现实的本能压抑所达到的程度处于显而易见的冲突之中。不合理的统治体系正好解释了这一冲突：“……对匮乏的逐渐征服也不可避免地与统治利益紧密相连并为其所规定。统治不同于合理地行使职权。后者……限于对整体进步所必需的功能和安排进行管理。与此相反，实施统治的是某一特殊的团体或个人，其目的是为了维持和提升自己的特权地位”（EC，36）。统治体系以它在生产方面的优先性为特征，在巩固产品分配的原则中表现了出来。“普遍匮乏，贯穿文明始终……以如下方式被组织起来，一方面使它不是根据个体的需要进行集体分配；另一方面，获取满足需要的物品也不是为了最好地满足个体日益发展的需要而组织起来的。相反，匮乏性资源的分配、克服匮乏的努力以及工作的方式，都强加在了个体身上……”（EC，36）进一步说，“当今的意识形态依赖于生产和消费对统治的再生产及辩护”（EC，100）。不过这也确实有优点，马尔库塞也并非在抱怨消费品的丰富或生产的现代手段。随着自动化以及劳动分工的完善，也就是劳动异化的完善，他看到了人类在社会中克服异化的一次机遇。“把人的潜能从（异化）劳动世界中取消创造出了把劳动从人的潜能世界中取消的前提。”（EC，105）“极权主义笼罩着晚期工业文明，在此生产被统治利益所支配，因而其潜能受到了抑制，发生了转移。”（EC，93）



接下来，当社会压抑成为了主题，也就意味着压迫和操纵远远超过了其客观上必要的程度，并且趋向于极权主义的统治——在该情况下，解放的可能性、丧失力量的事实以及对个人的麻醉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历史的顶点。正如马尔库塞在这场谈话中经常强调的那样，就社会保持着压抑性而言，妇女解放是无法仅从自身出发就实现梦寐以求的解放的。如果这种部分解放的成果仍在一般的统治体系中被制度化，那么这种成果就还是压抑性的。因此，马尔库塞断然拒绝单方面的“妇女运动”组织。无论男女都受到了压抑，妇女无法仅凭自身去克服它。马尔库塞明确地支持所有使更多人觉察到妇女所面临的境况的尝试（尤其是妇女们自己所作的尝试!）。马尔库塞仍然相信，对妇女的压迫就像对黑人和犹太人的压迫一样，只有当社会的压抑被整个地清除之后才会被清除。

[163]

沃尔夫冈·弗里兹·豪格<sup>①</sup>

**弗思：**当今社会上有一种呼声，要让妇女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是实现妇女解放的应由之路；通过该道路，这个社会的这一古老的要求和愿望将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得到满足；如此一来，法律上和经济上的平等就可能实现，而旧的特权将被废止。仍然存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说妇女运动所提出的妇女解放正在这个社会实现；是否仍有未被克服的残余？

**马尔库塞：**这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何为解放。如果我们将解放理解为妇女获得了她们之前被拒绝给予的受雇佣权和职业自由，那么我们就可以奢谈解放。我只知道美国的情况，无法评论德国的情况。因此我所说的只适用于美国。毫无疑问，受雇佣的妇女的数量有了极大的增长（她们的家务活则另计）。如果这就是解放，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尽管

<sup>①</sup> 沃尔夫冈·弗里兹·豪格 (Wolfgang Fritz Haug)，长期担任《论据》的编辑，并于1986年出版了 *Critique of Commodity Aesthetics: Appearance, Sexuality, and Advertis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英译者注

妇女仍然被许多职业拒之门外（但这也不应被夸大）。

但我对解放有更多的理解。消极地说，如果解放仅仅意味着妇女有了一条进入既定职业系统的更宽广通道，在既定社会劳动分工中有了更多的参与，那么这意味着如今妇女所面临的压抑与历史上男性在这些职业中所面对的一模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在一个压抑性社会中人们难以谈论一般的妇女解放，因为在这里解放从未超越社会秩序的压抑。

**弗思：**既然妇女运动宣称自己是一般解放运动的参与者，其诉求当然是更为超越的。她们不只是在困境中全力一搏，寻求与男性的对等，寻求在资产阶级社会秩序之下的成功。

**马尔库塞：**倒不如说是想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超越这一切。

**弗思：**我们难道不能把解放看作有两个方面，或者说这里涉及了这一充满希望的解放所必须要满足的两个因素？首先，大部分妇女将她们自己视为社会所导致的一切苦难的终极承受者。进一步说，[她们认为——英译者注]男性在生产过程中是受操纵、受压迫的，但这些男人希望将这一终极承受者置于更多的苦难之下，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够以压迫者的姿态面对被压迫者并借此确证自身，而如果没有了后者，那么整个社会秩序就会发生改变。

**马尔库塞：**关于这点显然还有一些东西被误解了。这是因为妇女在雇佣方面的解放不是把她们作为妇女来解放，而毋宁说是把妇女变成了劳动工具。这是一种从现存社会秩序方面来说的解放，超过这一点的解放并不存在。

**弗思：**但我们不也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连这些要求都不能满足，而它之所以不能的理由是很明显的。

**马尔库塞：**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并非在所有职业中都如此。有的工作是因为对妇女来说负担过重才被排除。的确不能把这种情况也算进来。其他一些行业，明明对妇女来说很合适，却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不对她们开放。但在这一框架中，依我的判断，社会足以应付挑战。

**弗思：**你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完全解放妇女吗？

**马尔库塞：**就妇女在劳动过程中的位置而言，妇女和男性没有什么不同。她们被解放为劳动力，作为妇女劳动力，而不是作为妇女。而与这一劳动力无关的妇女的品质，在职业的解放中则没有被解放出来。它们是否在别处获得了解放——这是我也想提出的一个完全不同的疑问，即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一再出现的、归咎于社会基础的道德自由化和禁忌自由化问题。当然，在维多利亚时代强制推行的那些禁忌在今天已难觅踪影；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只作为某种要被打破的东西而存在。例如，在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些地区，年轻妇女如果在婚前没发生过性关系，就会失去声誉。这是与禁忌截然相反的。不用我多说，在所有其他的地区中，之前用以反对不忠贞的那些禁忌等，已被相当程度地弱化了。这里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所谓的这种俗化趋势是否是解放，这是另一个重要的疑问。

**弗思：**在这里你大概又是在谈及美国经验，而在我们这里，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反而看到了人们普遍想回到 19 世纪的那些禁忌中去。妇女杂志不断地进行这一讨论：妇女应不应该在婚前有性经验？总体上，我们可以说禁忌已经被彻底打破了。但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如果这些禁忌真的不再被十分严肃地对待了，那么通过抛弃它们而获得的自由，将被用于某种由经济秩序的本性所规定的竞争。也就是说，在性方面的大方和自由获得了一种经济的品质，被用到了以提升地位为目的的竞争中。

[165]

**马尔库塞：**这一解放和所有类型的解放一样，是整个社会过程的一部分。除了在雇佣领域内的解放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值得关注。我尝试在我的新书<sup>①</sup>里讨论的问题是，例如，这种在性禁忌方面的放松是否与压抑的激

① 关于我们针对他这本书的内容所进行的后续提问，马尔库塞回应道：“我仍然没有给我的新书拟定最终的题目。它是关于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因为这代表了一种具有新本质的统治体系。这本书将包含针对社会转型的批判分析（尤其是关于工人阶级在政治和文化上对其对手的吸收；对语言和观念的吸收。还有对实证主义哲学的批判）。主要的问题是：相对于这些新情况，辩证的哲学的处境。”这本书就是《单向度的人》（1964年）——英译者注。

烈化交织在一起。这是因为在一个压抑性社会中的俗化趋势本身就是压抑性的，也许甚至是一种相对于禁忌而言更具压抑性的手段，因为俗化趋势能够让人们与既定社会秩序达成和解。

**弗思：**这意味着解放包含以下内容：在经济、法律甚至道德上使性别差异变得对等，使人与人之间变得对等。在此，解放意味着使妇女对等于抽象的经济人、法律人、受制于禁忌（尽管不再是那种强烈的约束，以至于任何人都要通过赞成或反对禁忌来确证自身）的人。假定有一些礼节，在其中禁忌已不再有意义，不再强迫任何人通过有意识地反抗或融入社会来确证自身、成为一个人，而是让一切事物自由穿梭，那么人们就能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行动，但这仍然意味着人们要在这一社会中行动。

**马尔库塞：**发达的工业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被动员了起来，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否定意识的兴起，而在表面上或实际上对禁忌的放松是达到该目标的一种手段。

**弗思：**还有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早前我曾指出，在妇女运动的开始之处就有两种诉求在推动它的发展。一旦终极承受者从被强加给她的苦难中解放了出来，那么社会就会发生改变，尽管还很难说社会秩序将如何变化。第二个使妇女对解放寄予厚望的有力影响因素也许是，妇女在一种强烈的禁忌中经验到了她作为自然存在，作为这样一种不同于男性的、周期性地受制于自然的自然存在的状况，她在一种周期性的循环中一再面对着这种状况，她也在繁衍及其结果中，在十月怀胎、受制于孩子的过程中经验到了这一状况。  
[166] 从社会价值方面来说，这些也都是充满矛盾的——

**马尔库塞：**但在雇佣的解放当中，这两方面都不是基础性的障碍，我们显然仍未考虑到现代技术和现代卫生保健的发展……

**弗思：**是的，例如我们在新闻报刊和画报杂志上，每隔几页广告就看到这样的内容：用 XY 卫生棉，而这些内容已不再让读者感到窘迫，没有人会在意它。这无疑意味着某种要求或兴趣，反映出了这样一种诉求：希望这种自然的联系能够被消除，希望这一性别的差异能够消失。

**马尔库塞：**为什么会有人想要消除它？它无疑是好的——

**弗思：**你说得没错，不过确实很多人有这种想法。那些对卫生保健观点的玩弄恰好清楚地展现了这一点：人们希望这一差异的自然背景或自然基础能够像魔法一样消失——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人们不想拥有它。

**马尔库塞：**不必对那些戏言过于较真。这种关于妇女卫生需求的公共宣传只是广告。我不认为这样的情况反映出了什么社会问题。这个社会无疑不打算放弃男女之别。不要忘记在一个资产阶级的社会中，尤其是女性的品质作为资产阶级的品质延续着。作为一个自然存在——这无疑是一个抽象概念——妇女没有超越这一社会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无疑成为了社会的自然。

**弗思：**我想重申一遍，在这里解放弱化为仅仅是对等，只是在亡羊补牢：使妇女在这个社会中变得和男性一样，并且扮演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像他们实现价值那样去实现价值。妇女在抽象人的层面上实现了对等，因为人们不想把她们看成是男性，除非她们是男性附属品的抽象。

**马尔库塞：**我已经说过，我不认为那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我们也不打算在卫生保健的细节方面进行太深入的探讨。我更想简短地向你提及一些我认为极度重要的问题，这与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的一个评论——已经不仅仅是评论——紧密相关。他在那里说妇女保持快乐的能力并不源于她作为劳动工具的作用，而是源于她享受乐趣的能力，这与她在生产过程中的直接作用是相互独立的。他十分详细地阐明了这点。身体上与工作最没有关系的部位是最懂得享受乐趣的部位，而妇女越是在生理上或心理上靠近生产过程，她们自己的享受也就越受限制。如果我们跟着他再深入一点，这意味着妇女在既定社会中的雇佣解放——我强调是在**既定社会**中——对于她们享受乐趣的能力会有一种消极的影响。如今这是一个极度分裂、极度成问题的环境，因为不应该有人反对妇女的雇佣解放，甚至不应该有人有此想法。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即我们提倡的东西处处碰壁：在一个压抑性社会中，连好东西也是坏的。但你不能因此就怪罪于这些好东西。

**弗思：**也许法律平等的实现还是有希望真的成为一股进步潮流的，如果这点能够在经济系统中得到承认和鼓励的话。如果妇女有能力在经济进程中上升到男人的水平的水平的话。

**马尔库塞：**这是目前社会发展的趋势。

**弗思：**确实如此。当然美国的进展要比德国快得多。但要重申的是，事情的进展十分微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有越来越多的人试图把妇女限制在某些职业中。不仅仅是让她们远离粗重劳动——妇女们自己也避免从事这样的劳动，至少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如此——而且是其他可以对所有人开放的职业，并没有对所有人开放。例如，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雇主通过开放十分特殊的工作来扩大就业机会（这真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步骤）：如教育、护理等等，这些显然都是与传统妇女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紧密相连的……

**马尔库塞：**……但也要知道，妇女在工业中占有很大比重。设想一下劳动的机械化，妇女在工业中的作用正通过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

**弗思：**是的，但这也多少算是对传统妇女从属地位的再生产。当妇女们被引入纯粹的机械性劳动过程中时，男性工人们则从配件生产线上逃离，从而变成了预装配工、调整工、技工、领班、主管等等。妇女们则只是受聘于最低级的工作。

**马尔库塞：**完全正确。这与如下事实密切相关：妇女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接受的普通或职业培训都非常有限。

**弗思：**这仅仅是偶然的吗？这仅仅是在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吗？

**马尔库塞：**我相信它是一个历史阶段。我看不出为什么它会是一个永久的障碍。但这在根本上取决于劳动的供给、社会有能力提供的劳动量、失业人数等等。并且还要考虑其他因素。

**弗思：**只要保障充分就业，我们能够想象这一过程将会继续进行。我们自然需要对此保持意识，即在危机中首先下岗的是……

**马尔库塞：**首先男性将受雇，因为最后必须有人来做家务。这不是完全不合理的。家务并未彻底机械化，还是需要有人来当家。

**弗思：**没错，如果这真的是一个进步的过程，我们就不得不认为社会秩序需要对家务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尤其是在养育子女这一最重要的方面提供援助、提供设施，以减轻负担。

[168]

**马尔库塞：**无论它是不是进步，养育子女的问题都是另外一件事。机械化正在减轻家务杂事方面急速前行。妇女受累于一些小玩意以及所有最现代的时尚，这与自由时间无关（所谓自由时间其实也是不自由的）。即使在这里也存在着社会生产体系向私人领域的渗透，而后者又一次变成了社会统治和压抑的手段。

**弗思：**下一个问题十分微妙并难以阐述。对此我已经稍微涉及，尽管我表达得比较差劲：我们所注意到的解放在于一种对等，试图遮蔽这些已被制度化的、性别角色的客观差异——

**马尔库塞：**为什么社会要对遮蔽这些差异感兴趣？社会总是对提高出生率之类的事情感兴趣，因此，肯定不会对减少这些差异感兴趣。

**弗思：**因为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一样，压抑可能间接地发生，而不再以禁忌的方式发生，一旦差异减少，那么就会发展新角色。禁忌引发冲突。但冲突不一定是有意意识的；它可以率先在潜意识中发生，就像不去与守门人直接对峙一样。这样的压抑更隐秘得多，也有效得多。因此对我来说，当社会把一些矛盾作为自身的地基时，它无疑就会有兴趣去使这些矛盾看上去没有冲突……

**马尔库塞：**我们可以看看雇佣的领域。在那里，如你所说，冲突激烈化了，难道遏制了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效率吗？

**弗思：**也有一种方法可以实现这些诉求，就是把解放设定为一种可能性，一种基于既定制度而又超越于它之上的可能性：自发的两性关系、选择的自由、把爱从支配中解放出来……

**马尔库塞：**关于在该领域中的选择自由，在既定社会中已经差不多完全实现了。妇女不必再与她们父母挑选的对象结婚，如果我能够这么概括的话。

**弗思：**……但这种已经达到的选择自由，难道不是很显然仍然是我们要从中解脱出来的东西吗？

**马尔库塞：**的确如此，因为这样一种“选择自由”——在一个压抑性社会里是没有自由选择的——仅仅意味着对已经被直接或间接地预先选定的那些东西的选择。就像政治选举一样。

[169] **弗思：**关于这点还有另一个方面。有些像滥交这样的诉求也出现在了解放运动中，这些诉求没有得到实现。滥交以前仅仅属于最上层的资产阶级圈子，在我看来 19 世纪便是如此，所有人都在模仿他们在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作品里读到的东西，但是当现在人们都可以参与进去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

**马尔库塞：**我不是很清楚，普鲁斯特的作品真的如此大量地涉及滥交吗？

**弗思：**是的，的确如此；但我们别讨论这个了。正在发生的是，人们仅仅是变得无聊了。然后人们就想：为什么？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马尔库塞：**确实如此。如果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是正确的话，那么滥交并非必然增加享受。弗洛伊德的观点是，在快乐中有一种制造障碍以增加快乐的倾向，不应该压抑这种倾向而是应该强化它。要从这一角度去看滥交。当滥交被用于、被直接或间接地当成解放欲望的一扇逃生门的时候，它也同样是压抑性的。



## 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sup>①</sup>

首先，在进入我所讨论的主题之前，我想先讲几句。

坦诚地说，在我看来，至今为止我所听到过的简单讨论似乎都很抽象。尤其是未能对那塑造和决定了当今社会主义问题的具体背景——即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存——有真正清晰的呈现。依我看，正是这种共存才能解释资本主义的变质以及社会主义的初始理念在实践中所遭遇的损毁。如今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历史可能性。我想不出有哪一个与意识形态或物质基础相关的问题没有受到这两个体系的共存的重要影响，甚至为其所规定。它不仅属于外交政策层面，而是一个真正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共存是一个决

[170]

---

① 《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初版为德语，参见“*Perspektiven des Sozialismus in der entwickelten Industriegesellschaft*”，*Praxis*, 1, 23 (Zagreb: 1965), pp.260-270。文中给出了一个地址：南斯拉夫，科尔丘拉，1964年夏，本文的英译本可参见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Journal*, 2, 8 (Rome: April 1965), pp.139-151。马尔库塞在20世纪60年代与实践派（*Praxis*）结交，这个学派在科尔丘拉的一个度假村举办了一场夏季会议，并出版了《实践》（*Praxis*）这本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目的是为了寻求一条独立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并对其进行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在这篇文章中，马尔库塞认为，美国与苏联在冷战期间的共存助长了极权主义，而助长的方式则是他在这里所说的“发达资本主义”。这一谈话及其稍后的出版物预示着马尔库塞对工人阶级被资本主义社会整合所做的分析。——编者注

定了资本主义自身社会结构的因素。

例如，共存这一事实是生产力增长背后的驱动力，它推动着资本主义去保持自身的稳定，因此它给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带来了社会一体化：搁置了社会中的对立和矛盾。尽管我用了“搁置”这个词，但我也同样可以这么说，一个“对立各方的恶性联合”即将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在我看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压制了体系中的一种质变的需求，它让这种需求存在但却消除了其绝对的否定性。这正是它的基点，由此出发它成功地吸收了所有革命的潜能。当然，资本主义的矛盾并没有被超越；它们维持着其经典形式；事实上，也许它们从未变得更强烈。在资本主义的社会财富与这些财富的用处之间的矛盾尖锐性无疑是前所未有的。每一股可利用的力量都被聚集了起来，目的是为了对这样一种对立进行伪装。

我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至少在工业社会最发达的中心是如此。多亏了它的技术革新及非凡的生产力，它才得以成功地以这种方式来引导对立并操纵它们。在此基础上，那曾是仅存的作为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绝对的否定的阶级，现在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渐渐地融入了资本主义体系。技术进步、技术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剥削和统治体系**——之所以说是新的，是因为它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改变了阶级关系。在发达工业国家，**存在着**一个阶级社会；阶级间的对等也好，财产所有民主制（property-owning democracy）也罢，所有这些好话都不过是纯粹的意识形态。但在这样一个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已不再代表对现存秩序的绝对否定。我将尝试着去揭示这一至为关键的发展是如何使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如对异化的超越，对每个人个性的解放——发生决定性改变的。

我正在谈的仅仅是工业社会最发达的中心，谈的仅仅是那些还未完全成型的趋势。即使在美国它们也仅仅是趋势，但我认为可以说它们有传染性，并且能够在资本主义的氛围中非常迅速地传播给欠发达国家。事实上，它们将成为某种典型，更多的落后国家将在未来的工业化道路上对其有所借鉴。说到这里，也许是时候让我来界定一下我所说的发达工业社会是什么意

思了。

我说的是机械化大工业已经开始进入自动化阶段的社会，是一个工人阶级和其他人的生活水准一样得到了持续的提高的技术发达的社会。从前的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成了由国家和大垄断者所控制的利润受管制的经济，转变成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体系。在该社会中，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力量被集中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经济被政治所决定，经济只有在国家重要部门的直接或间接的介入下才能运转。

[171]

这种形式极其新颖的“极权主义”社会，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也仅仅是处于起始阶段。它的极权主义之处在于它使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同质化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本质差异被废除了。个人无论到哪都是规则和条例、受操纵的公共舆论和宣传工作的受害者。

还有另外一种极权主义的趋势：所有有效的内部反抗都渐渐地消失了。当然，也会有反抗和讨论，甚至是自由讨论，但往往都内在于体系。在整体上根本不存在对体系能产生名副其实的、有效的反抗。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每一种激进或前卫的运动，都很容易被吸收并大打折扣。这些被吸收了的运动甚至还被用于粉饰体系，以使其显得有吸引力。

由此产生的是一个静态的社会，不管它有多少动力。它的持续扩张、它的生产力狂飙、它的不停增长，这一切都不过是制造了越来越多同样的东西，没有带来任何质变或任何质变的希望。

我必须强调，在这个拥有着史无前例的对文化、军事和政治力量的集中并拥有着如此巨大财富的社会中。否定自身也变成了某种肯定，而对于否定的需求则似乎被排除了。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这一切都无须依靠恐怖政治，而是在一个民主的框架内、在民主多元主义的旗帜下完成的。我会这样来描述这个社会：它站在一个永久战争的立足点上，它所有文化的、技术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力量都处于动员状态。这种动员首先是针对外敌即共产主义的，然后是针对内敌，即它自己的创新的可能性。在外部和内部各有一个敌人——而内部的敌人不是别的，正是被体系自身压制住的它

自己的潜能。

[172] 自动化提供了现实与潜能的对立的一个最具冲击力的例子。对自动化的应用意味着实际上几乎可以完全废除社会的强制性劳动，即异化劳动。这一体系在其自身中包含着一个十分现实的、一点也不乌托邦的趋势，它正在向一个劳动时间将成为次要的而自由时间将成为主要的社会迈进。在该社会，对异化劳动的废除将变得极其正常并且会越来越普遍。但这些可能性在如今的体系内却未能被意识到；它们将向体系所依靠的文化、政治及经济制度渗透；它们显然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后劫难。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需要全面的动员，不仅是为了对抗外敌，也是为了对抗这些潜能。

进一步说，我确信在社会中有另一个重要的趋势，它经常被热烈地颂为平等主义，实际上它是对那些关心消费的社会阶级的消化吸收。

可以这么说，当代美国白领和蓝领工人既可以和他们的老板去一样的地方度假，也可以有一样的穿着，还可以负担得起那些原先只属于统治阶级的奢侈品和小玩意。还可以这么说，随着消费越来越受关注，在白领和蓝领工人那里有一种明显的同质化趋势；阶级矛盾尽管没有被超越，但也因此被掩盖了。而主人和仆人、雇主和雇员、顶层和较低层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减小，也许甚至还增大了。无论是对于个人来说还是对于整个民族来说，生和死的决定权都下放了，并免除了任何的反对意见。社会完全依赖于生产和分配的部门，它处于一种不断扩张的节奏中，创造出它必须去满足的需求，在它可能遭到废除的时候使生存斗争变得激烈起来。必须意识到该部门创造和决定了每一种需求，甚至连本能的需求和个人的抱负也不例外；它还掩盖了自由时间和工作时间之间的区别，并且彻底地重塑了人们的观念，以至于像物化和异化这样的观点也变得可疑起来。

当人们在这个社会中，在他们的摩托车、电视机、小玩意、报纸和政客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中，确实感受到和发现了他们自身的时候，谈论异化和

物化是否还有意义呢？这是一个得到了认同的世界：周围的客体看上去似乎不再那么疏远，那么僵死。当然，在服务行业、在办公室以及在半自动化工厂的工作仍然是异化的，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人道，但是抵抗被无情地扼杀了，被既定社会那无所不在的力量、被那似乎更令人满意的持续增长的商品浪潮和持续提升的生活水准扼杀了。

大众有各种理由使他们自身与这样一个社会一体化；通过这样做，他们就为恐怖活动画上了句号。他们的默许与合作似乎十分明智，他们甚至还加深了自己附属的程度。一旦他们的需求和抱负被调节至适应于体系的要求，一旦他们被预先塑造好了，他们就会不时地发挥自己作为选民的能力去做出政治决定。每两年或每四年，他们便可以做出一次民主选择，在一份候选人名单中挑选出一人，在他们看来这个人将最好地代表他们的利益——这种利益从不与被制造出来的公共舆论相异。他们在利用自己的购买力去获得消费品或文化享受方面，有同样的民主选择的自由。换句话说，大众被安排在了一个民主多元主义的框架内并与其一体化了。在这一民主的外部，或者说在其下方，存在着一整个未与其一体化的部分——也许永远也不会被一体化，他们是少数人种或少数民族、长期失业者、穷人。他们是这一体系的活生生的否定。但他们的组织和意识都不够发达，不足以使他们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体。

[173]

在解释已经发生的稳定化和一体化之前，我想先对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做个概括。

在这个社会中，被生产和用于消费的货物与服务正变得越来越多；对更多的人来说，体力劳动变得更简单了，生活也变得更舒适了；多种多样的组织、看法及异见被允许并付诸实践；在消费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经常被高估的对于社会各阶级的同化作用。但这个社会却为它的成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巨大的产能浪费，有计划地报废，破坏了那些处身一体化范围之外的穷困潦倒的人们的生活必需品，这甚至也发生在富人社会自身内部。该社会，在它终于能够缓和生存斗争的时候，却加剧了这一斗争；

在异化劳动已经不再必要的时候，却将它保存了下来；它以为自己将不得不进行一场带来全面毁灭的战争，并基于这种猜想全面而持久地动员人和生产力。尽管该动员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似乎非常合理，但它同时也使敌人、危险和动员得到了再现。政治和经济领域所树立的敌人，对社会一体化、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增长起到了有力的刺激作用。社会被全面地动员了起来，社会的每一个部门和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都被卷进来。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心智和灵魂、思想和语言——所有这些为了适应部门的需求都得到了调整，而部门的需求也被转变成了个人自己的需要、抱负、行为模式和表达形式。对立面、矛盾和否定性就这样被吸收了，被压制或改变成为肯定性，这样就在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都实现了对立面的恶性统一和中和：知识文化、社会道德、整个繁复的工作生活。<sup>①</sup>

[174] 在此我只能非常简要地讨论恶性统一的一个方面：工作领域内的一体化进程。我之所以会选择谈论这个特殊的话题，是因为它包含了一个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体化的趋势是否暴露了资本主义自身内的一种结构性变化，还是说在类似的体系结构中越来越少有改进，使得它沿着原路继续前行？

我想提出下面这个假设：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体化和稳定化的趋势源自这

① 我并不否认在现存社会中存在着冲突，并且我知道这在法国比在美国要尖锐得多。当然，在私人领域和国家领域之间存在着冲突；这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能够导致资本主义毁灭的爆炸性冲突。

正如我早些时候所指出的那样，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主要的对立与自动化的趋势紧密相连。一方面，体系被拽入了完全自动化；而另一方面，体系又不能接受完全自动化，因为这将意味着现存制度的崩溃。革命的时机不能被安排在今天或明天；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存在未来的发展状况。例如，它取决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是否会允许资本主义阻碍自动化、将其限制在某些屏障之后以免体系被炸裂。或者，它取决于共产主义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能否快到迫使资本主义更广泛地、更迅速地实施自动化以继续争夺世界的领导权的程度。（这一条及随后的注释都摘录自马尔库塞教授在讨论期间说的话——编者）

体系的根基之处。换句话说，这些趋势既不是边缘的，也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现象。

我们只需粗略地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如何处理这些关键性变化的，就立刻承认，面对今天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在发生的事，传统的解释已不再令人满意。例如由列宁所系统阐述的工人贵族，已无法解释这样的情况：在今天的美国，工人阶级中被一体化的不是少数，而是绝大多数。问题已经不是巨头、政府官僚和普通人之间的差异了，尽管这些差异仍然以十分相似的形式存在着；在今天，工作体系的改变以及生活水准的提升已经把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变成了工人贵族，而在列宁时期这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

我可以给出一个最近的例子：今天的社会学家们（我想说的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谈论一种新的工人阶级联合，即那些有组织的工人的联合，他们都是有工作、有安全保障的工人，与此相对的则是那些既没有工作、也没有机会在可预见的未来获得工作的工人。工人阶级自身内部早已出现分裂，几乎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都变成工人贵族。新的分化正在工人阶级内部出现。根据最近的统计数据，在院校毕业生中失业人数持续下降，然而在未受高等教育者中失业人数则在上升。因此，工人贵族的理论如果仍要保持有效的話，看来就必须针对发达资本主义重新进行系统的阐述。

[175]

马克思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则更为贴近现实情况。相比工人贵族理论，它更为全面，因为它考虑到了这一事实：有组织的垄断竞争使得榨取额外利益和剩余价值变得可能，因此组织垄断的大规模工业就有能力支付更高的实际工资——不仅仅是在短期内，而是长期如此。但这种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却几乎总是和古典帝国主义的理論联系在一起，根据后者，不管垄断者们在国际上如何相互依赖，他们迟早会相互争斗起来；周期性的争吵以及最终发生在帝国主义力量之间的战争将摧毁积累至今的繁荣。与这一理论不同，我想说的是，帝国主义的古典形式早已不复

存在。帝国主义当然仍旧存在。但它最有活力的新形式看来是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力量借此在没有军事冲突的前提下再度瓜分世界。当然，在帝国主义的力量间仍有数不清的矛盾（它们不值得我们仔细考察，因为它们实在是太司空见惯了），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矛盾似乎不再能够导致战争爆发。这就是共存的局面与资本主义的稳定化之间的其中一条关键性联系。甚至可以这么说，共产主义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病床旁的医生，而这并非某种过分的犬儒主义，当然事情也还没有彻底变成这样。要不是从共产主义出发，就不可能解释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可以说，该统一体现了总的卡特尔这一古老的马克思主义幽灵。不只如此，资本主义世界的这种一体化并不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而是有其坚固得惊人的经济基础。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革命潜能的衰弱已经有了明显的结果。在美国，真正激进的反对者仅限于很少小型的、不能发挥什么作用的团体。大工会已经接受了一种合作方针；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仍在谈论资本和工人“之间的碰撞”。民主制度研究中心已经出版了一些关于该主题的十分有趣的材料。对汽车工业的一个研究发现，工会并不能将它们自己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分离开来。例如，一个联合起来的工会管理代表团去向华盛顿施压，以阻止某所过时的军工厂被关停，或者要求建一个新的，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这种游说一点也不稀奇。

[176] 我要强调的是，尽管工会有提出反对的声音，但也是微弱的；绝大多数人虽然有些摇摆不定，但也都遵从着我在上文所概述的那种政策。为了说明局势已经严峻到了何种地步，值得注意的是东海岸的码头工人最近拒绝装载准备运往古巴的小麦货物，这是得到国务院批准的。

现在我要试着非常简要地解释一下，对立面的稳定化，即我之前谈到的一体化，是如何在生产中起作用的。如果我们说这些事情不只是表面上的修正，而是真的见证了某种结构性变化，那么我们就必须在生产领域中找到它们的影响和它们的基础。在工作方面，一体化是通过从身体能力到技术能力



和心理能力的渐变而起作用的。这种从体力消耗向心力消耗的转变是以这个加速的体系为中心的；也许现状会比在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粗重体力劳动更为不人道。不过，随着自动化的发展和普及，这些先前体系的残留物便能够被摆脱，至少机械化劳动那些最不人道的方面能够被废除。但半自动化劳动的压抑性体系阻断了个体工人或工队与其工友间的联系。甚至在一家工厂的工人群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机械化程度的加深，隔阂也正在变得越发厉害。这种隔阂助长了政治上的冷漠态度，助长了与体系的一体化。需要补充的是，这种情况的发展通常与作为个体单元的每个工队内部团结的加强结合在一起。

这些以工作形式表现出来的与自动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变化使工人比以往更加消极了，不是更活跃而是更不活跃了。在我看来，对于似乎已使由马克思所定义的生产资料的整个概念过时了的发展来说，这是一个关键因素。在半自动化工业中——在全自动化工业中就更是如此——机械已经不再是旧意义上的生产资料了；它已不再是工人或工人团体手中的生产资料。机械反而成了决定工人行为的整个组织体系中的一个元素，不仅是在工厂中，而且是在工厂之外，在每一个领域或每一项活动中。更多的能量消耗在了心理—技术层面而不是体能层面，该事实表明，物质生产的工作变得更加类似于白领在广告公司、银行或办公室里的工作了。工人失去了其专业的独立性和自身的特殊地位；他与其他服务于机构的阶级一样，都变成了机构的仆人，他也因此既作为客体又作为主体参与到了压抑和管理无所不在的体系之中。统计数据清楚地展示了白领和蓝领工人的这种同质化：如今美国首次出现了这样的状况，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数比从事非生产性工作的要少。不仅如此，这还是一个持续的趋势。结果是，工人在政治上变冷漠了，工会也变弱了。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例外，但总的来说白领工人不愿被组织起来。 [177]

在这种受机器决定的机构里面（机器在其中不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是体系的组成要素），工人生活在一个似乎是自发运转的世界中，这个机械的、

总是按部就班的世界把他拉进它自己的节奏中去。<sup>①</sup> 机器和由机器所规定的行为决定着工人的一举一动，让他融入它们的节奏之中——不仅在上班的时候，而且在逛街时，在度假时，在自由的时间里。换句话说，这种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工作所规定的新节奏，调节着工人的心智和灵魂。在自动化工厂中做过调查的社会学家们注意到，在受物摆布的时候会有一种本能的满足感。工人任由其工作的形式和节奏所摆布，而这也给他带来了十分可观的满足感。我想再次强调这些并非普遍现象，而只是趋势；但我仍相信，随着自动化的发展和普及，这些趋势肯定会变得更强而不是更弱。

我没有在这些趋势上逗留太久，因为瑟奇·马里特（Serge Mallet）无疑比我更了解它们，并将更为细致地讨论它们。有证据显示，对所有反抗者的一体化以及对革命潜能的吸收并非表面现象，而是在生产自身的形式中、在生产方式的变化中有其物质基础。

对于这些趋势向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传播，我不会说太多；我只打算提出一或两个假说。在我看来有一种明显的趋势，即政治上的反抗——工人阶级的反抗——在较不发达的工业国家中正在弱化，这和美国的情况一样。与前段时期相比，在意大利和法国的最强大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方针正朝着社会民主党的方向迈进。看来这些共产主义政党在面对资本主义那改变了的情况时，认为它们自己处在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地位上。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差异：他们的左派显然已没有真正的力量。在涉及的国家中，罢工作为政治武器的效力的减弱，与工人阶级运动的内部冷漠并行不悖。

[178] 总之，我要提出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是否也

① 我不认为技术（technology）是要对这一情况负责的主要因素。在我看来，技术体系（Technik）是一个支配体系；换句话说，在工业化程度高的资本主义国家，技术和技术进步（technical advances）以在很大程度上与现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方式被组织起来。我不会说技术不能有别的组织基础；相反，我认为这是社会主义能够提出的重要课题之一。社会主义并非只是接管资本主义的技术；它还要凭借它自己与众不同的内容创造出它自己的技术。

能够看到我刚才概述过的那些趋势，就像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如果这些趋势真的是在生产形式的技术变革中产生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注意到资本主义的技术（即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支）被纳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说，纳入这种技术基础会导致把其他不良的东西也一起纳入进来的话，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个关键性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必须对两个体系间可能的同化趋势抱有警惕。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公开承认，在马克思那里有大量的观念涉及历史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更迭。马克思没有预见到先进技术社会。他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在共存的条件以及下以及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仅仅依靠自身的技术突破就能够实现的一切。马克思关于自由与必然之间关系的观点也必须被加以追问。你们都十分熟悉马克思的这一观念，也就是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作领域仍保持为必然王国，而自由王国只能在必然王国之上建立起来并超越它。依我看来，考虑到发达工业社会，我们必须对这一观点的持续的合法性提出疑问。基于同样的考虑我们还会提出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也许是所有问题中最沉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这样一些观念：人格的自由发展、个体的完善、对异化的超越，等等。而现在我们必须问自己，这些观念都意味着什么？在大规模技术社会中，当工作时间——社会必要时间——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几乎以自由时间为主的时候，这些观念还意味着什么？我们该如何反击？如果抛弃了“创造性工作”和“创造性发展”这样的旧见解，我们走不了多远。这些观念意味着什么？是让我们都去外面打猎和钓鱼、去写诗和作画之类的吗？我知道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很容易招来嘲笑；我故意说这些刺激人的话，是因为我非常强烈地感到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来说，甚至还不仅仅是对于它们来说，都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必须言归正传，而不是继续快活地谈论个体的发展和非异化的创造性工作：这些观念都意味着什么？因为必要劳动的终结就在眼前；这不是一个乌托邦，而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

最后，我还有另一个也许更为沉重的问题要问。革命的主体到底怎么了？如果我之前说过的话在此处依然有效，如果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对工

[179]

人阶级的一体化是一个明显的趋势，那么我们是否还能够继续断言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唯一历史主体？我想谈谈马克思的一个观点，但它却在人道主义者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思想时被忽略了。依马克思所言，只是因为工人阶级代表着对现存秩序的彻底否定，所以它才成了革命的历史主体。如果它不再如此，那么它和其他阶级就不再有质的差异，因此它也不再有能力创造一个有着质的差异的社会。进一步说，如果稳定化的程度持续增长，那么对于质变的需求就注定会消失。我们应该自问，我们是否应如此轻易地抛弃或重新阐释马克思关于贫困化的观点。我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整个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样，都坚持说不应把贫困化视为革命的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并且工人阶级中最发达、最富裕的部分无疑也可以成为革命的主体。但今天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这种看法。<sup>①</sup>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问：当对革命没有迫切需求的时候，是否仍有可能去设想革命。因为对一场革命的迫切需求，与对更好的工作条件、更高的收入、更加自由等等这些迫切需求是有很大差异的，后者都能够在现存秩序内得到满足。对于那些拥有或者希望拥有好的衣服、储量充足的食物、一台电视、一辆轿车、一间房子等等的人们来说，既然这一切都可以在现存秩序内觅得，凭什么还会迫切地想要推翻现存秩序呢？

① 在我看来，发达工业国家的几乎全部人都在哲学的意义上变成了客体，并且正因如此，也有可能变成革命的主体。这将会是一场整体的革命，不仅需要单一阶级的努力，而且需要整个受压迫、受操纵的社会的努力；当然，除了少数失势的统治阶层。但我们一定不能把这种观点当成意识形态来使用。我知道剥削之所以没有被废除是因为工人们更加富裕了，但我不会如此极端地说工人们有没有电视、轿车、房子等等都是一样的。这样一种极端的声明不仅意味着辩证法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唯物主义的终结。如果我对一个美国工会成员说“你现在和以前一样在被残酷地剥削着。你或许能够承受得起一辆轿车、一间房子、一次去欧洲的度假等等，但这并没有改变剩余价值遭到私下的占用和分配的基本事实”，那么他也许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兴趣，但这并不会有什么实效。最好的情况是他会问：“没错，但我会为了这个关于剥削的观点，去摧毁这个给了我轿车和家的体系吗？”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避免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僵化成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必须使其与现实相称。

我无须为在此提出这样一种极度悲观的分析而道歉。<sup>①</sup> 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情势下，有一条几乎任何严肃对待社会主义的人都不能打破的戒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被任何一种故弄玄虚或幻觉所欺骗。在历史上，这并非第一次难以确定真正的革命历史主体。历史主体在过去也曾多次隐而不彰。这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失去合法性。马克思所提出的那些观点不应被拒斥，而是应该被发展；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包含在了那些基础命题中。这也就是为何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在适当的地方允许悲观的原因。唯有立足于此，我们才能够提出一种不同于故弄玄虚的分析，才不会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批判理论转变成一种意识形态。

[180]

---

① 我并非想要说：“没什么可以做的了。”不幸的是，“要做什么”这个问题不是一场演讲能够说清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可以和一些团体合作，而且必须与其合作。它们不仅是甚至首先不是在工人阶级中的。例如，在美国有一些团体可以被称为人道主义者。换句话说，有一些知识分子不只是坐在办公桌后，而且甚至现在正冒着生命危险在美国南部腹地为争取资产阶级的权利、黑人的基本公民权利而斗争。知识分子的角色确不容小觑。同样的斗志旺盛的人道主义也可以在其他阶层找到。这些团体不仅靠着理论增强和发展他们的意识；而且还有实践。我们都知道在越南、韩国等国家，是学生在扮演着真正的革命角色；再像以前的马克思主义那样轻易地忽略知识分子的作用将是十分错误的。

##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sup>①</sup>

马尔库塞由于他的如下著作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他自 1954 年起任教于布兰迪斯大学，中途曾赴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担任学院主管。他于 1898 年在柏林出生，曾在柏林大学学习，后于弗莱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日内瓦执教一年后，他从 1934 年到 1940 年都待在社会研究所位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分部。他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处工作了将近十年，随后他回到了设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俄罗斯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他还在哈佛大学的俄罗斯研究中心工作过。

[181] 差不多 20 年前，梅洛-庞蒂毫不妥协地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问题。在当今历史时期，构建一个人道的、非暴力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

---

①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一文收于一本有着相似名字的著作：*Socialist Humanism*, ed. Erich Fromm, New York: Doubleday, 1965, pp.107-117。马尔库塞文章标题中的问号提出了如下疑问：“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否是他那个时代的一股必不可少的进步力量？马尔库塞在这篇文章中通篇都在论证，如果不把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转化为现实，那么人道主义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之中都会是一种意识形态。马尔库塞坚持认为，面对当时对人道的否定和压抑，保持对社会主义理念的忠诚是不允许抱有幻觉的，而是要保护并发展出对每个人所应得的真正的自由和正义的意识。——编者注

现实可能性吗？他拒绝了人道主义和恐怖行动这两种方案：这不是对暴力还是非暴力的选择，而只是对两种暴力的方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选择。

在苏联，暴力和欺瞒是官方的，而人道则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另一方面，在民主国家中，规则是人道的，但欺瞒和暴力则存在于实践中。除此以外，宣传工作也大展拳脚。<sup>①</sup>

这两种社会制度被禁锢在了一场全球性的斗争中，在斗争中，我们发现，放弃使用社会主义的暴力就会增强资本主义剥削的势力。但是，社会主义的暴力只要通过“从现状的内在逻辑出发”（selon la logique interne de sa condition）并且有能力把人道主义从意识形态转化为现实的阶级组成的超国家联合体来执行，是有机会打破恐怖和反恐的地狱轮回的。梅洛-庞蒂认识到该情况已经不再占据上风，而无产阶级也不再与共产主义思想和方针的“规章”相适应，但他拒绝从意识形态上救援人道主义，并拒绝抛弃在人道主义“价值”名下的实际发展成果：

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道德优先”的原则忽略了那在从前是最真实的东西以及那已经在世界获得广泛认同的东西，陷入了永远的故弄玄虚之中，回避了问题。<sup>②</sup>

解决方案是：

谈论人道主义，但不谈论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

① Merleau-Ponty, *Humanisme et Terreur*, Paris, 1947, p. 197.

② Merleau-Ponty, *Humanisme et Terreur*, Paris, 1947, p. xf.

[182]

义”，“理解”共产主义者，但自己不成为共产主义者，这显然就是使自己高高地置身于冲突之外。在现实中，这意味着拒绝被卷入混乱和谎言之中。如果西方的人道主义犯错了，因为它同样是战争机器，那么这是否是我们的错？如果马克思主义的事业只有通过改变它的品质才能够存续下去呢？<sup>①</sup>

人的现实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别的主义，没有哪一种理论可以把某种解决方案强加给它。历史在今天突然否定了人道主义，也可能在某一天否定这一否定。与此同时，那些受奴役的人必须实现他们自己的解放。要使他们的良心与意识得到发展，使他们觉察到事态的走向，为未来的方案准备还不够稳定的地基，这都是我们的任务，而“我们”不仅指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指知识分子，包括所有那些仍是自由的、仍有能力自己思考并反抗教化的人，不管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

如今，在去斯大林化之后，共产主义世界获得了解放，并走上了去集中化的道路，在这样的情况下，比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解决方案”不再那么清晰可见了。似乎不仅是与西方达成了共识的苏联，而且连接受了共识的西方同样也没有变得更为“人道主义”。不过共存着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取得的发展表明，应该要在考虑这些社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能力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前景进行再考察。这篇文章只对这个问题做一点评论。

在马克思的观念中，社会主义之所以是人道主义，是因为它在“必然王国”组织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以使人们能够在不受剥削、只付出最低限度的辛劳与牺牲的情况下满足他们的社会的和个体的需求。由“直接生产者”所控制的社会生产将有条不紊地导向这一目标。有了必然王国的这一合理的组织，人就可以超越必然王国这个需要和劳动的世界，进而自由地发展自身成

<sup>①</sup> Merleau-Ponty, *Humanisme et Terreur*, Paris, 1947, p. 203.



为“全面发展的个体”。但必然王国的这个有着全新的质的组织——真正的人的关系的出现依赖于它——相应地也取决于把人的关系的革命作为其迫切需求的阶级存在。只有这一需求和目标预先存在了，社会主义才是人道主义的，也就是说，作为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有其历史先验性。那些构成这一社会的人的基础的人们并没有分享到它通过剥削获得的利益和满足；他们迫切地需要完全超越这种非人的存在，走向一种仍有待满足的普遍的人的需求。因为他们的存在是对自由、对人的否定，所以他们可以自由地争取自己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在这一辩证法中，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内容显现出来，不是作为价值而是作为需求，不是作为道德目标和道德辩护而是作为经济和政治实践——作为物质文明的基础的组成部分。

[183]

关于马克思的观念已经说了很多了。它的历史特征显而易见。社会主义由于其在工业社会发展中的特有位置而“在客观上”是人道主义的，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在超国家的联合体中，以其存在、利益和行动对社会主义进行定义。这一历史星丛已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实际发展所“超过”。这些社会的固有矛盾在何种程度上展开了自身，社会中正在提升的生产力和力量就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地压制住了对解决矛盾的需求。由于技术进步为必需的合理组织提供了各种工具，这远超出马克思的设想（看来不是“劳动的废除”，而是如何避免劳动的废除才是未来的问题），这些工具被用在了延续甚至强化生存斗争上，被用在了总动员而不是和平上。业余时间正遭受着越来越多的威胁，它被管理者用到了维护压抑的现状上。技术理性适应了冷战的要求，它不仅（也许甚至不是首要地）被用在了对抗外敌上，而且被用在了对抗既定社会内部的敌人上，即被用在了对抗一种具有新质的存在的方式上，因为这种存在方式能够使人从由他建立的部门所施行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在现有工业社会中，令人最担心的恐怕是使技术进步转变成人类进步的阶段：在发展那些有可能缓和生存斗争的需求和能力上，生命本身可以做出决断——人类自己成为自己的目的。这不仅是对技术性失业的恐惧，也是对无聊的恐惧，对有待填充的空虚的恐惧，而且这种空虚只能由来自上层或

外部的更强大和更好的管理来填充。不仅是政治部门，而且是(并且首先是)技术部门和生产自身都已经变成了一个统治体系，而劳动阶级则被吸收了进来。他们的“处境”的内部逻辑——据此，他们才成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历史推动者——已不再属于**他们自己**。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客观同一性被消除了。它从不是一种直接的同一性：其现实程度取决于客观情况在何种程度上被历史主体的意识和行动所把握和超越。技术进步成为极权统治的手段，其压倒性的力量压制了该中介，这样的极权统治，不仅通过使经济和军事力量惊人地集中起来而实现其运转，还通过提高被强迫过某种日子的人的生活水平而实现其运转。只要技术进步的既定方向仍然不发生改变（而在共存的时代它肯定不会改变），那么生产工具的控制和所有权的改变就会是量上的而非质上的改变。作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内容，解放的先决条件是在**技术进步的方向**上发生一种根本性的改变，是整个地重建技术部门。这是当今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念。

其他关于人道主义的观念属于 18、19 世纪；它们所保持的人的形象已经被社会的发展超越了。这种古典的形象指导了马克思的早期写作；它通过如下见解表达了出来：全面发展的个体，在自由王国中自我实现的“人格”。但这种见解属于这样一个阶段，即精神文明仍然与物质文明相分离、还没有被吸收进大众的生产和消费，心智和灵魂还没有被科学管理所接管，时间和空间还没有被有组织的忙碌和有组织的消遣完全占用——在此仍然有可能存在一个与必然王国无关的自由王国。即便如此，我们还是难以设想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的个体将做或将不做什么——除非仅仅是从工作和不工作的方面来看。那些每天选择钓鱼、打猎或发挥创造性的自由个体受到了恶意的谴责，然而很不幸，这些谴责也有说到了点子上的。如果这种看法在明天成真了（比起马克思写作的时候，这更加容易实现得多！），这恰恰将是对自由和人道的否定。为什么？

不可否认，马克思对他关于人的自由的早期观点进行了修订：他抑制了那些积极的看法，对解放的状况而不是对已经实现的自由的状况进行了考

察。但成熟的马克思的理论仍保留了一种关于人的观念，这种观念如今看来也显得过于乐观和理想化。马克思低估了人对自然进行征服的程度，低估了对自由和自我实现进行技术管理的程度。他并未预见到技术社会的巨大成就：对自由和必然，对满足和压抑，对政治上、生意上和私人方面的需求的同化作用。由于这些成就，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就不能再根据个体、根据全面发展的人格、根据自主性进行规定了。如果假定这些观念不仅是专属于少数人的，如果它们宣称自己具有普遍合法性，那么它们就会表现得极其缺乏意义和内容。它们的实现需要达到如下状况：人能够在日常工作中实现自我，社会必要劳动能够变成“有吸引力的劳动”，然而这种可能性却被马克思断然否定了；“劳动不可能像傅立叶所希望的那样变成游戏”<sup>①</sup>。简而言之，这些关于人道主义的形象具有来源于前技术时代“高级文化”——脱离了低级文化并在其基础上被不受影响地建立了起来——的压抑性内涵。当马克思将其早期著作中的“形而上学”术语翻译为“政治经济学”术语时，他意识到了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随着交换经济及其制度的废除，随着合理的、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的兴起，人道主义的机遇才会到来；然后，人才有可能与其他人一起自由地构筑他自己的生活的、成为一个人。尽管如此，真正的自由王国，以自身作为目的的“人的才能的发展”，只有在超越这一必然王国之后才能开始。但是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已经创造了自由时间，而“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原文如此！】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in ein anderes Subjekt verwandelt），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sup>②</sup>

[185]

如今，发达工业社会正在创造着自由时间，但这一自由时间的占有者却不是一个“不同的主体”；在资本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中，自由时间的主体都听命于同样的规范和力量，正是这些规范和力量统治着必然王国。因

①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erlin: Dietz, 1953, p. 599.

②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erlin: Dietz, 1953, p. 599.

此，成熟的马克思观点同样看起来有些乐观和理想化。

当今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在客观上已不再具有同一性，我们不能通过把社会主义政策寄希望于传统的人道主义价值，使社会主义变成人道主义的。在共存的情况下（它必须成为任何非意识形态分析的框架），这样一种人道主义化注定会变成意识形态，并难以自圆其说。在这里，我们必须对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做一个区分。在资本主义世界，为了人的权利、为了言论与集会的自由、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斗争开启了自由时代，而当人们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限制和否定的时候，这种斗争却又极度渴望着终结这一时代。此外，这一斗争也受限于它在独自行动和遭受痛苦时能将解放的价值和正当性遵守到什么程度，尤其是当它的对手遭到不受处罚的暴力时。在共产主义世界，关于个体斗争和自由的主张、关于劳动阶级的主动行动的主张将会（并且应该）彻底地反对既定政权所依靠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压抑，这种压抑被认为是在竞争性的共存中进行防御和发展的先决条件。根据该逻辑，当不稳定的国际天平倾向于资本主义时，有力的反对和异议也将随之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出现——而这并不一定能够照亮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前景。因为劳动阶级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对革命感兴趣，并且他们的主动行动也不可能唤起国际社会主义的联合。

[186] 如果要讨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挫折和机遇，如果不想让讨论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上的话，那么就必须去面对这些给定的历史状况。发达工业社会可以一边关照到人道主义的价值，一边去追逐它的不人道的目标：它在发展文化、发展个性的同时，也加深了劳役、不公正、核武器、全面的教化、生产力自动推进的程度。当权者利用紧张局势动员下层民众去反抗他们的解放，这与社会实现这一解放的能力的增长并行不悖。由于这些实现解放的能力被利用来维护支配、维持现状（或在此过程中遭到压制），它们因此依然是技术性的能力，无法实现其人道主义的方面。它们作为技术性的能力，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前景。首先要做的是切断技术方面的进步与支配、剥削方面的进步之间的致命联系。只要社会仍取决于持续贫

穷、不完全自动化、大众传媒、预防性的生育控制，仍取决于不停地生产和再生产大众、噪音和污染，有计划地废弃和浪费，对民众身心加以全副武装，那么人道主义就必然只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这些状况、这些制度都是为了使主流事态得以维持和扩大所实施的社会控制。因此，以人道主义之名来废除这些制度是一种革命性的颠覆，这同时也会颠覆人类存在的需求和必需本身。在前极权主义时代作为自由的先决条件而出现的東西，也许恰恰是其实质和历史内容。因为自由的实质和人道主义的实质一样，必须根据社会中的人的状况、根据他们的能力来加以规定。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负责生产和分配的技术部门已经变成了极权主义的政治部门，协调和管理着生活的所有方面，无论是在自由时间还是工作时间，无论是消极的想法还是积极的想法。无论是对社会的受害者、受益者还是继承者来说，自由王国都已经失去了它的经典内容，失去了它与必然王国的质的差异。他们必须首先投身于工作世界和技术世界：必然王国必须变成他们的自由王国。必须重建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技术部门，必须重新对技术理性加以引导，以使工作世界有朝一日成为人类愿意安身立命的地方，必须消灭那些使技术理性不能朝此方向发展的主人们。这并不意味着劳动的“人化”，而是意味着劳动的机械化以及有计划地生产出新的需求——它们可以平息生存斗争。我们可以对新技术的某些方面做些描述，比如，彻底地重建市镇，在破坏掉压抑性的工业化后重建乡村，建设真正的公共服务机构，照料病人和老人。<sup>①</sup>

人道主义的挫折似乎更归因于过度发达而不是落后；一旦具有压抑性趋势的生产部门成长为无所不在的控制部门，那么无论这种控制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能够实现人道主义式的重建的可能性都十分渺茫。这一情况凸显了马克思的观点的历史真理性。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可能性在客观上既不依赖于生产工具的社会主义化，也不依赖于“直接生产者”对生产工具的控制

[187]

① 关于这些提议的详细阐述，可以参看拙作：*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esp. Chs. 9 and 10。

制——尽管这两点都是先决条件——而是依赖于先于这些变化而存在的社会阶级，他们的人生正是对人道的否定，他们的意识和实践取决于废除这一状况的需求。极权主义的技术阶段没有改变这一真理：无论社会主义的基础变得有多么“技术性”，无论对技术进步和技术理性进行重新定向甚或是整个颠覆有多么重要——这些都是政治任务，都牵涉到彻底地变革整个社会。技术进步表现为在支配方面取得的政治进步，即在压制可选择的替代方案方面取得的进步。事实上，在工业文明最发达的地区，这一压制已不再采取恐怖的形式而是采取了民主的、内化的、生产性的甚至是令人满意的形式，但这并未使上述情况发生任何改变。如果压制能够与个体的自治相容并通过它来起作用，那么个体赋予自身的**规范（Nomos）**就是一种受奴役的规范。这一**规范**是我们的时间法则，它不可能使生存斗争——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社会之间的还是个体之间的——得到平息。为了利益和力量，为了工作和乐趣，为了获得更大更强的威慑力，竞争必须继续下去。此外，它还使整体的生产力得到了提升，而这反过来又使这一类竞争保留了下来，并许诺将其受害者转变为得益者，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尽其所能地做出贡献。随着其他社会也被迫进入这相同的轮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质的差别也正在被消除，被一种通过加大剥削来提高生活水准的生产力所扫除。

社会主义理论没有权利以其他历史可能性的名义来谴责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因为这种增长让更多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但这里的问题不是关于未来可能性的问题；而是关于眼前已处在危急关头的现实问题。在这一现实中，对人道的否定波及一切成就：它在平日里已做好了灭绝的准备，包括在秘密存在的装备中，在更为巧妙地进行浪费的计划中，在媒体的难以避免的无聊中，在隐私的丧失中，以及——也许是最有效的否定——在对这一切的无助感中，在公共认知和批判——即使是没有在强力下被击垮或被迫沉默，也只能对整体的力量无能为力甚至反而会对其有所帮助——中。因此对解放的需求是存在的：它远远超越了某一特定阶级的需求，作为一种普遍需求而存在——但它只“在自身中”存在，而不是为了有需要的个体而存在。社会

主义又一次表现为一个抽象的观念；忠诚于社会主义的观念不包括去培养幻觉。它的新的抽象性并不意味着某种歪曲事实。想要确证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等价的无产阶级，属于工业社会发展中的旧阶段。历史性变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栖息在既定社会中的幽灵，面对它，社会主义理论无论如何正确，都既不能规定也无法预知这样一场变革的未来的推动者。但社会主义理论可以指出这个幽灵象征着一种迫切需求；它可以发展并保护对这种需求的意识，并以此为解散替现状做辩护的错误联合奠定基础。

[188]

## 马克思主义过时了<sup>①</sup>

我感到我不得不在开头就我的文章的题目提出异议。因为它遗漏了最重要的东西——问号。对我来说，这一问号是马克思的理论的辩证法的最为浓缩的象征，它尤其象征着这样一个事实：说它在何种程度上过时了，恰恰也就是说该理论中的基本观点在何种程度上被证实了。用更为平实的话来说就是：导致马克思的一些关键性观点消亡和过时的那些因素，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替代方案和趋势，已经在马克思的理论本身之中被预见到了。因此，要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再考察和再建构，就不能仅仅是根据新的事实调整该理

---

<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刊于 *Marx and the Western World*, ed. Nikolaus Lobkowitz,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7, pp.409-417。1966年4月，在圣母大学举办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国际研讨会，马尔库塞在会上发表了演讲，而这篇文章正是基于马尔库塞彼时的演讲稿而写就。马尔库塞开篇就反对将标题中的问号删除，并提出，马克思的一些过时的观念，比如共产主义是一种解放的形式以及人类社会的更高阶段，确证了马克思的理论的一些基本命题的真理性，即坚称所有理论都是历史性的，必须依照历史的变化来加以辩证地发展。事实上，马尔库塞在文中激情四射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分析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相关性，尽管他谈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谈及自动化的段落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是否有必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工人阶级是否是这一过渡中的关键因素。显然，马尔库塞在这篇文章中既为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理进行了辩护，同时也对正统提出了挑战。——编者注



论，而是必须内在地发展和批判马克思的观点。在我的报告中，我不像我的一些同行那样在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做区分。我更愿意把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希法亭（Hilferding）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视为对原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的发展。最后要说明的是，虽然我被介绍的身份是一名哲学家，但我将着手处理的是十分具体的、直接的政治问题和形势，因此我要为此而致歉。

我的文章的题目并不是在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分析已经过时了；我反而认为这一分析的那些最基础性的见解已被确证是有效的，它们可以被归结为以下五个命题。

[189]

(1) 在资本主义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人们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所支配，也就是说他们的处境受其销路的支配。

(2) 在这一交换社会中，人的需求的满足只是作为逐利的生产的副产物。

(3) 资本主义的进步也发展出了一种双重的矛盾：(a) 一方面是持续提升的劳动生产率和持续增长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是压抑性、破坏性地利用它们；(b) 一方面是生产工具的社会化特征（不再是个体的而是集体的劳动工具），另一方面是对它们的私人所有权和私人控制。

(4) 资本主义只能通过不断增加对生产力的浪费、挥霍和破坏来暂时地缓解这一矛盾。军备生产利润的竞争驱力导致了经济力量的巨大集中、向海外的侵略性扩张、与其他帝国主义力量的冲突，并将最终导致战争和萧条的周期性循环。

(5) 只有当忍受着剥削压迫的劳动阶级夺取了生产部门并将其置于生产者的集体控制之下，该循环才能被打破。

我认为包括最后一条在内的所有这些命题所包含的期望，看来都已被现实的发展所证明了。最后一条命题涉及的是那些曾经即将实现社会主义过渡的发达工业国家，而恰恰是在这些国家中，劳动阶级丧失了革命的潜能。该事实证伪了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这就要求我们对那种使发达工业社会得

以发展起来的国际局势进行分析。

只有在使发达资本主义得以实际运行的国际性、全球性框架内，我们才能够有意义地讨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此框架中，我们才可以弄清下面这些情况。在发达工业国家中生活水准的持续提升不应仅归因于“表面的”现象，还归因于劳动生产率的过剩，归因于向发达工业体系开放的新的浪费性逐利手段。

[190] 另一个推动社会统一和一体化的因素是对需求、要求和满足所实施的高效的科学管理。这种科学管理在公共宣传和娱乐产业中最为有力地运转着，长久以来它已经不仅仅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了；它已经成为基础生产过程、生产必要成本的一部分。如果不去系统地、科学地管理需求，不去科学地激发要求，就会有大量的产品滞销。

这些因素使得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成为可能，而在那有能力停止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生产者”的阶级中，对于革命的迫切需求也不再流行了。马克思关于革命的观点乃是基于这样一个阶级的存在，他们不仅穷困潦倒、丧失个性，而且也不受制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任何既得利益，该阶级因而代表着一股新的历史的力量，拥有着不同质的需求和抱负。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该阶级就是对资本主义体系和既定需求、满足的“有规定的否定”。这样一股内在的否定性力量，其存在和行动将证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但它在发达工业国家中的兴起却遭到了阻碍——不是被暴力压制或被恐怖型政府所阻碍，而是被一种更为舒适、科学的协调和管理所阻碍。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历史联系似乎被割断了，这是体系的基础本身不仅在意识形态上而且也在实践上发生变革的结果。

马克思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一观点处境不容乐观，在此我将简要地提及拯救它的两种尝试。首先是工人贵族理论，它坚持认为劳动与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体化只会对工人中的一些特权团体产生实际影响，例如那些身处工会官僚机构中的人，以及那些控制着政党机器的人，但普通工人并不是这种一体化的主体。我认为这一理论已经过时了；一体化范围绝不限于小部

分工人官僚，而是扩展到了普通工人。缺乏特权的群体忍受着剥削压迫，依然处身于外部有组织的劳动。其次是资本主义和“相对贫穷”的“暂时稳定化”的理论。关于暂时稳定化这个观念，人们只能这么说：在已知范围内，历史中的一切东西都是暂时的；另外从语义上来说，这一概念也没有太大意义——“暂时”是指多久？“相对贫穷”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社会学上都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但在谈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的先决条件时，这个概念就是无关紧要的了。如果当劳动者不只有一辆而是有两辆汽车，不只有一台而是有三台电视机的时候，人们仍然可以谈论贫穷，那么尽管这也许仍是一种贫穷，但我不认为有人能够坚称这样一种贫穷激活了对于激进思想和行动的迫切需求。

马克思的理论是否会因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经典观点的破产而丧失效力？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准备开始讨论一下《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1857)*] 中的一个段落。此段落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显然，马克思试图从革命的无产阶级中“抽离出来”，并彻底地聚焦于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将导致该体系趋向崩溃的技术—经济趋势。

[191]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就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创造性力量）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

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全面的）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sup>①</sup>

在这里，阶级斗争或贫困一次也没有被提到过；对资本主义的崩溃的分析彻底聚焦于内在于体系的“技术”动力，简而言之，聚焦于发达资本主义迈向自动化的基本趋势。在这一段落所描绘的图景和所表达的见解中（人不再处于生产过程之中，而是站在旁边来与生产过程发生联系），这里已经表达了最进步的也是最激进的社会主义观点。

[192] 这段话暗示了些什么？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力在技术上的发展达到了这样的水平：人的体力劳动几乎不再是必要的生产作用物了。然而技术仅凭自身成不了事；要实现从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者向社会主义的生产经营者的转变，仍旧需要一场革命。但在革命前夕，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到了如此水平，以至于它将呼唤一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换言之，马克思本人的社会主义理想似乎不够激进，不够乌托邦。他低估了劳动生产率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所能够达到的水平，也低估了通过达到这一水平而激发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在技术上取得的成就会使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成为可能，这种发展将超越马克思对社会必要劳动和创造性工作、异化劳动和非异化工作、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区分。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一看法确实是不成熟、不现实的，因此他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观点仍是基于生产力的发展与合理

① 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ast-Berlin, 1953, p. 592 ff.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101页。引文中小括号内容为马尔库塞所加。

化；将生产力从压抑性、破坏性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这曾是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但尽管有各种质的差别，关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观点还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技术上的连续性。由于该连续性，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首先是一种量上的改变，即更高的生产力。然后从量变到质变，这个有规定的否定将重新引导生产部门，使其服务于人的需求、机能的满足以及全面发展。

在我看来，与该观点相应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已被发达工业社会超越。在这些社会中，以下几点将逐渐减少：(1) 用于生产商品的体力劳动量；(2) 仅仅作为个体或团体的劳动作用物的机器；(3) 由于生产力低下、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导致的萧条；(4) 有组织的工人对消灭剥削的需求。

这些是发达工业社会尤其是“富裕社会”（我是在讽刺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的可能性。富裕社会意味着被马克思认为是资本主义内在界限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已经成为过去。这个社会已经超越了这些状况，尽管社会上仍有许多穷人。马克思的观点必然包含着贫困阶级与基层直接生产者，即产业工人之间的同一性。这在富裕社会中不是什么问题，因为该社会已经超越了古典资本主义的条件，尽管它破坏性、浪费性地运用着生产力，而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导致资本主义最终危机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之一。此外，富裕社会似乎已经掌控了这一矛盾，因为破坏性、浪费性地运用生产力被证明是有利可图、促进繁荣的。富裕社会真的已经成功地遏制了彻底的社会变革吗？或者说，它已经成功地遏制了革命的潜能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基于主流的历史因素，对过渡理论进行再考察。我想通过在发达工业国家、较不发达工业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进行区分，以及通过非常简要地指出这三类国家中社会主义的潜能的情况，来给这样一种再评价提供一些建议。换句话说就是：如今我们是否能够在这三种社会中识别出这样的力量（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即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通过在马克思的理论所设想的方向上运作，可以发生爆炸的力量？

[193]

我想先从较不发达工业国家和发达工业国家的关系谈起。这里的问题

是：我们能否说富裕社会，也就是当前的美国社会，将为较为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如法国、意大利甚至是德国——的发展提供示范呢？那些反对这一设想的人通常会强调在法国、意大利依然存在着强有力的工人政治运动，强调其新战略“工人自治”——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工团主义要素相结合的产物。这种运动的目标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扩大工人在重点工业管理层及其他当权者那里的影响，增强工人的力量，并逐渐地把控制权交给工人本身。

在我看来，这个新战略只有在革命之后才会起作用，而不是在革命之前。在革命之前、在一个仍旧健康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框架内提出这个战略，多半会推动工人创造出自己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既得利益。美国社会将为较为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一个示范，这个论点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支持，他曾指出，最发达、最富有成效的劳动方式迟早会对较不发达的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现在请允许我同样简要地评论一下落后国家的情况。我认为，在如今斗志昂扬的不发达国家中至少有一系列的有助于社会主义占优势的客观先决条件。

(1) “直接生产者”中的大部分都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忍受着难以忍受的剥削，而要消灭这些状况意味着要消灭既定的社会制度。

(2) 占少数的统治阶级显然没有能力自行指导生产力的发展；国内的剥削受到外国势力的保护并被保存了下来，因此社会革命也就与民族解放相一致。

(3) 一个先进的、斗志昂扬的领导阶层积极地投身到了组织下层民众、发展他们的意识的工作中。说实话，受统治的阶级并非是工业无产阶级而是农业无产阶级；而他们恰恰是“直接生产者”，因为正是凭借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既定制度的社会基础才得以建立了起来，而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正是立足于这些地基之上，无产阶级才成了革命的历史推动者。

[194]

此外，在这些国家中存在着跳过压抑性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致使生产

和分配部门日益强化对下层民众的支配——阶段的可能性。与此相对，落后国家也许有机会实现技术的发展，可以使工业部门与人类的迫切需求及自由发展的能力保持一致。然而这一跳过先前的压抑性发展阶段的历史机遇，似乎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蒙上了阴影：出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要求，这些国家依赖于发达工业社会及其帝国利益。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是富裕社会的形势。重申一遍，在我看来，富裕社会证实了而非驳斥了马克思归因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些内在矛盾。这些矛盾（我已在开篇有所概述）确实被搁置了，确实“得到了管理”，但它们却并未被福利或福利国家所解决。因为该国家在吸收作为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的结果的不断增长的经济过剩时，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不断提升的劳动生产率、大型军工企业的再生产、计划报废以及科研对需求和要求的激励都暂时性地克服了该困难。但这些正在一体化的、紧密结合的趋势却由于自动化的进步而被抵消了，自动化引发了一种技术性失业的趋势，而它却只能通过生产越来越多的不必要的产品及寄生式的服务来抑制。

在压抑性富裕的制度中，青年和知识分子表现出了明显的激进化倾向。这远非单纯的意识形态现象；尽管有着诸多局限性，但它却是一次针对价值的基础性的重估运动。该运动作为人类或社会的力量的一部分，在全球范围内抵抗着富裕社会的压迫性力量。

最后，我想在国际和全球框架内简明扼要地对这些力量进行一下识别。因为我们只有在这一框架内才能够讨论该问题，即是否正如马克思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发达资本主义体系正面临着一场“最终危机”。亚洲或非洲所发生的事情并不外在于该体系，而是体系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如果将此考虑在内，也许就会把具有革命潜能的表现形式概述为：第一，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二，欧洲的“新战略”工人运动；第三，富裕社会的非特权阶层；第四，反对派知识分子。除了这四种之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一种，即既定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一股力量，也许迟早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冲突，但我不会在这里讨论它。这些既定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否会成为积极

的对手？他们是中立的观察者还是资本主义病床前的医生（也就是说，是否正是共产主义的存在激发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团结）？

在我所谓的四种具有革命潜能的表现形式中，主要的催化剂似乎是第一种：民族解放运动。在抵抗解放战争的过程中，富裕社会是在为其未来做斗争，为其潜在的原材料、低成本劳动及投资做斗争。说实话，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观点已经过时了；显然找不到任何基本的经济利益能够用来解释美国在越南发动的战争。然而我们却不得不在全球背景下来看待越南：民族解放运动在那里的胜利，足以成为激活世界其他地区同类运动的导火线，而这些地区离美国本土要近得多，确确实实牵涉到了美国基本的经济利益。与该威胁相比，似乎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激进化只是一个很小的事件。然而我建议从更大的视角来考虑问题。在这里，历史的辩证法影响到了辩证唯物主义本身。如果批判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被富裕社会吸收了并得到了调和，那么将意识从被资本主义强行施加的操纵和教化中解放出来就成了首要任务和先决条件。意识的发展而不是阶级意识的发展，即意识从强制的歪曲中解放出来，看来是彻底变革的基础性的先决条件。随着压抑向整个下层民众的平滑推进和扩张，知识分子的任务，教育和讨论的任务，撕开技术面纱及其他面纱——支配、压抑就在其下面悄然运作——的任务，所有这些“意识形态”因素完全都变成了彻底变革的物质因素。



我将尝试回答针对我的文章所提出的、此前我没有时间回答的两个问题。

我要指出的是，这些问题都是学生提的，同样，如果有学生在讨论中发言，我也会感到十分高兴。在美国（这是其优势之一），在像这样一场讲座之后，是学生们而不是我的同行们的发言时间。我非常喜欢我的同行们，但我同样非常喜欢听学生们认为必须要说、要问的东西。

首先要谈的是“革命主体”的问题。今天的处境与马克思、恩格斯写作时的处境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那么如今我们应如何确定革命的主体？

我将给出一个非常初步的革命主体的定义：它是这样的一个阶级或团

---

① 《革命主体与自治》刊于 *Praxis*, 5, 12 (Zagreb: 1969), pp.32-67。1968年6月在南斯拉夫的科尔丘拉开办了“1968年科尔丘拉夏令营：关于马克思和革命”，其间，有一场名为“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一种再思考”的演说，马尔库塞这篇文章是对由此演说引发的讨论中所提出的问题给出的回应。（以上都刊于 *Praxis*, 5, 12 (Zagreb: 1969年), pp.20-25）在这里，马尔库塞通过指出美国工人阶级大多数已和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一体化，又一次在论证中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经典马克思式范畴——革命主体（无产阶级）重新进行了定义。马尔库塞的“自治”在这个意义上把重点放在了发达工业社会之外的人类自治的新形式的发展上，因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自治大多是一种被市场社会及其消费主义、军国主义的需求所塑形的自我规范。——编者注

体，即由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及所发挥的作用，它有迫切地需求并且敢于拿它在既定制度中所拥有的以及能够获得的东西为赌注来冒险，以便取代该制度——这场彻底的变革确实会涉及对现存制度的破坏和废除。我想重申的是，这样的一个阶级或团体必须对革命有迫切需求，并且即使其能力不足以完成这样一场革命，至少也必须有能力去发动它。

如果我们采纳了革命主体的这一观点，我们便不得不说，没有产业工人阶级参与的革命仍然难以想象。我想不出在哪一个技术发达的国家中，革命可以在没有产业工人阶级参与的情况下完成。另一方面，恰恰是在资本主义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中，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缺少对革命的迫切需求，他们不愿意——这很好理解——把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作赌注来为一个全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冒险。

[197]

我们是否能够调和这两种有着明显冲突的现实？在此我们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看似高度抽象的、哲学的辩证逻辑概念是如何展现出其十分具体的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对**自在的**（an sich）即凭借自身或在自身中的革命主体，和**自为的**（für sich）即为了自身的革命主体做了区分。如果我们根据发达工业国家工人阶级的情况来运用这种区分，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这些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只要他们仍然是构成物质生产过程的人的基础的唯一阶级，仍然是由于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有能力去中止该过程并重新确定其方向的唯一阶级，他们就是**自在的**革命主体。

我说过发达工业国家中的工人阶级是**自在的**，凭借他们自身，**只要**他们保持着在生产过程中的核心的、基础的地位，他们就仍是革命主体。我引出这一时间因素（“只要”），是因为在发展的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相对于白领工人而言，蓝领工人正在衰落。随着越来越多缺乏资质或资质较低的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的必要元素，生产更加趋向于自动化，旧的产业工人阶级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越来越不重要了。不过即便是在美国，该趋势也还远远没有达到使基本情况发生改变的地步。

但如果产业工人阶级仍是**自在的**革命主体，他们就不是**自为的**革命主

体：他们并不拥有作为革命过程的决定性力量的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他们之所以没有该意识，是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与资本主义体系一体化了，这种一体化不仅是由于工作过程自身的推动，还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分享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需求和成果。

我认为，对于一个仍然把马克思的理论作为批判理论而不是作为教条的人来说，忽视或者轻视如今的事实将是不可原谅的，事实上，发达工业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个阶级，也是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阶级。他们压抑或者被迫压抑自身的处境、现实需求和现实利益；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在支配和压抑的体系下去思考、感受和行动。

现在我们该如何强化产业工人阶级客观的、革命的潜能呢？一个革命的工人阶级可以抵消这种一体化；一个革命的党可以发展出这样一种意识和觉悟，即意识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不管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如何；事实上，他们的生活状况是难以忍受的。在会议期间，我在讨论中多次强调除了贫穷、不幸和贫困（Verelendung）以外，还有其他令人难以忍受的状况。

所谓的富裕社会、所谓的消费社会就其侵略性、浪费、暴行和伪善而言，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它之所以令人难以忍受，是因为面对着真正自动化的可能，它却使过时的生存斗争保留了下来，使贫穷、剥削保留了下来，使各种加剧了的不人道的工作状况和压迫性的监管保留了下来。它还使物与人的商品形式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198]

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状况尽管存在着，但它们却还没有引发政治意识，没有引发对彻底变革的迫切需求。具备发展这一政治意识和政治实践的功能的革命党还不存在。与此相反，主流的共产党已经充分地证明了它们的保守（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激进的政治意识和实践的任务就落在了未被一体化的团体身上，这些团体的意识和需求还未被支配系统一体化，因此，他们仍有能力、有意愿去发展一种激进的意识。他们意识到了变革的迫切需求，不

仅要变革制度、变革生产关系，还要变革作为特定类型人的革命主体本身，变革他的价值和抱负。

我相信如今的学生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个团体，这不是说他们自己就是一股革命力量，而是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他们是**雷管** (détonateur)，是催化剂，是斗志昂扬的少数派。并且他们不再是一群“**自由飘荡的知识分子**” (freischwebende Intelligenz) 或别的什么资产阶级世界的边缘团体。

这些学生知识分子是**潜在的**革命团体，因为资本主义会从该团体中为其生产过程招募未来的骨干、技师、科学家、工程师、数学家乃至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甚至还有哲学家！因此这一团体将在生产过程中承担起一种不断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我想谈一下恩斯特·费舍尔 (Ernst Fischer) 向这次会议提交的那篇文章，尽管很不幸它未能发表。恩斯特·费舍尔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学生知识分子的起义意味着他们作为最强大的生产力之一，作为最受忌讳、最受压抑的社会力量之一，公然对社会造反：这是一场在道德上、在本能上——我甚至要说是在生物层面和生理层面 (bi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状况和价值的剧变。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工人自治**的问题。我曾在报告的最后举了一个例子，它已经表明了 my 批判将从何处开始。我认为当且仅当那些愿意并且有能力重新确定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方向、使其走向一种本质上不同的生活方式的男人和女人们实施一种新的控制形式时，自治才会成为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步骤。

这就是说，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然后才是自治。我同意这一点，但我想问的是：它是什么类型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人们不再满足于阶级社会的压抑性、侵略性需求和抱负，不再为了相同的目标生产相同的材料。换句话说，只有当实施控制的团体自身实现了解放性的变革时，企业、工厂、商店的自治才能成为一种解放性的控制模式。否则这一变革不会打破从商品形式和商品生产到管理和关系层面的连续性。

[199]

总而言之，如果不想让自治仅仅停留于一种管理形式上的变革，就必须让它在一个已经克服了阶级社会束缚的政治上活跃的工人阶级内部得到发展。我们不能期待这样一种变革会奇迹般地在实施自治的过程中发生。一旦开始自治，而主体的状况却还未改变，也许我们就只会得到同样的东西，尽管它可能更大、更好。那也许已经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巨大进步，但它显然不是作为一种不同质的生活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开端。

## 对革命概念的再考察<sup>①</sup>

马克思的理论中的革命概念对整个历史时期做了简要的概述，包括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以及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它在严格的意义上是一个历史概念，展现了社会中的现实趋势；它也是一个辩证概念，展现了相应历史阶段中的相反趋势，因为它们内在于这一时期。这些趋势和相反趋势是表现形式，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本身是这些表现形式的本质元素。马克思的理论本身是历史斗争中的一股力量，而它的概念在何种程度上“转化成了”实践，它就在何种程度上成了抵抗、变革和重建的力量，这些概念受制于斗争的兴衰变迁，它们反映和理解斗争，但不主宰斗争。因此，“再考察”是革命概念的一个元素，是其内在发展的一部分。

[200] 这一再考察牵涉到不少问题，这篇文章<sup>②</sup>只能把其中一些提出来。我将

---

① 《对革命概念的再考察》刊于 *New Left Review*, 56 (London ; July-August 1969) , pp.27-34。本文以无产阶级与发达工业社会一体化的状况为根据，对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做了系统的分析。本文似乎成文于 1968 年革命浪潮爆发之前，它是马尔库塞著作中最后带有革命悲观主义色彩的文章之一，在马尔库塞的《论解放》及其 1968 年后的作品中，这种悲观情绪将转变为一种革命乐观主义，参见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69。

② 这篇文章写作于 1968 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前。马尔库塞后来仅仅加了几行字以指出其历史意义。

十分简要地重新概述马克思的革命概念，以此来开始我的论述。革命是：

(1) 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引进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让“直接生产者”控制生产资料；

(2) 开始于发达工业社会（因为资本主义在这一阶段有着巨大的内在矛盾，因为“按需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有了实现的可能）；必须缩短第一阶段，否则压抑会持续存在；

(3) 在一场使既定国家机构弱化的经济危机中爆发；

(4) 通过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来完成，进入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过渡性阶段。

这个概念包含了两个民主的预设：

(1) 革命是大多数人的事；而

(2) 民主为组织、为阶级意识的教育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条件。

这一预设强调了“主观因素”的重要性：对剥削的事实及消灭剥削的方式的意识，对令人难以忍受的状况、对变革的迫切需求的感受，是革命的先决条件。

但是马克思的革命概念却认为，变革中存在着连续性：生产力要继续发展，以前这由资本主义包办，现在将由新的生产者来接管技术和技术部门。

就“再考察”而言，迫在眉睫的任务是不仅要确定和列举出那些被实际的发展所证伪的预设，还要确定作为**整体**的革命概念，因为它的所有元素都是相互关联的。这涉及在如下方面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构关系思想的再考察：

(1) “过渡”的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或作为资本主义的继任者（继承人）。

(2) 根据全球性发展这一新的历史阶段，“**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作为资本主义的“有规定的否定”，社会主义与它相比有什么质的差异？

“再考察”的范围**取决于马克思的理论本身**，也就是说，取决于在分析

社会现实的过程中展开其概念的辩证含义的内在必要性。公司资本主义在何种程度上有别于先前的资本主义阶段——后者对马克思的概念产生了影响，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那么反过来，革命概念也将在此程度上成为一个“新”概念。

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达到的阶段，是决定了先前诸阶段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结果，因而新概念也将是旧概念的内在发展。

接下来的章节只是对新概念的详细阐述提供一些指引。

## 全球化背景

就“再考察”而言，最一般的方面或许是**理论框架的变化**，它反映了**革命潜能的社会基础的变化与扩大**，或者说使革命受遏制、遭挫折的**社会基础的变化与扩大**。

这一关于颠覆性活动的理论框架成了一个**全球化的框架**：任何思想、行动、战略都要作为国际星丛中的元素、机会和选择被展现出来，得到评价。正如越南是公司资本主义制度整体的一部分，因此其民族解放运动是潜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体的一部分。此外，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因为其颠覆性力量，所以取决于资本主义宗主国内部的弱化趋势。

也许有反对意见会指出，马克思的理论一直都是“国际的”，在组织层面也是如此。这是事实，不过这一“国际主义”指向的是产业工人阶级，他们是工业资本主义内部的反对力量；而如今，他们已不再是一股颠覆性的力量。马克思的理论特别重视殖民地和落后地区的人民，但他们主要是作为革命的首要历史推动者的助手、盟友以及“蓄水池”（*réservoir*，列宁用语）。第三世界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在理论上和战略上获得了全面的认可，然而随后钟摆却偏向了另一个极端。现如今，有一股很强的趋势，即民族解放运动被当成了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革命力量，还有另一种（似乎相反的）趋势，即为宗主国地区量身订造的理论和组织模式（例如，



以城市为基础的领导权；党的集权控制；与民族资产阶级结盟；联合政府）强加到了这些运动身上。

在现实中，全球的局势使人们难以机械地将第三世界及其他地区独立地划分出来。倒不如说，我们正面临着对历史力量的三分，**它超越了对第一、第二及第三世界的划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同样使第三世界划分了开来，并且在那里，出现了一股新的历史力量，它也许可以被称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与既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新左派正是这么称呼它的），即为了不同的社会主义建构方式——一种“自下而上”的建构方式，不过它的建构者是一个未融入旧社会价值体系的“新的下层社会”——而斗争，它是一种合作、团结的社会主义，在那里大家集体决定他们的需求和目标、他们的优先事项以及“现代化”的方法和步调。

[202]

### 宗主国内部的反抗

而这一潜在的替代方案（可以避免无限期延长“第一阶段”，可以打破压抑和支配的连续性）在东方和西方的发达工业国家中，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帝国的中心点燃了、加剧了激进的反抗。这一反抗足以成为变革的催化剂。马克思的革命概念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为依据，尽管有一些明显的反例，但革命（全球性革命）的命运很可能取决于宗主国。只有当链条中最强的环节变成了最弱的环节，解放运动才会出现全球性的革命力量向前涌动的势头。

在公司资本主义的中心，**反抗的主角**集中在社会的相反两端：主要是贫困人口（他们本身并非是同质的），还有就是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学生。

这些有差异甚至有冲突的团体之间的共同点，是整个地都具有拒绝和造反的特质：

(1) 强调打破支配和剥削的连续性——不管它披着哪一种的外衣；不仅

强调要有新的制度，而且强调要有自我决定权：

(2) 怀疑一切意识形态，包括僵化成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

(3) 摒弃维护公司资本主义统治权的虚假的民主程序。

这些反抗者的“非正统”特质恰恰表现了公司资本主义的结构（对大部分下层民众的“一体化”）。这两个反抗团体都不构成社会生产过程的“人的基础”——而这对马克思来说，是成为革命的历史推动者的决定性条件。

他们不构成人口中的主体部分。

[203] 他们面对着来自有组织的工人（他们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人的基础以及剩余价值的源头，因此仍可能是革命的潜在推动者）的敌视（以及愤恨），他们还未被有效地组织起来，无论是在国家的层面还是在国际的层面。

## 工人阶级与革命

这些反抗者如果仅凭自身是不能被视为彻底变革的推动者；只有当其获得了工人阶级的支持，并且此工人阶级不再是一体化的囚徒，也不再是支撑这种一体化的官僚主义的工会和政党机构的囚徒，这些反抗者才能够成为这样的推动者。如果新的反抗者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这一结盟没有实质化，那么后者——至少其中一部分——足以成为新法西斯政权的群众基础。

结论是，大部分受剥削群众所持有的**马克思的革命概念**，其最终想要的结果是“夺取权力”、建立开启社会主义化的无产阶级专政，但这个概念现在已经被**历史的发展“赶超了”**：它所涉及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组织阶段已经被赶超了；它并没有设想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更高阶段，包括破坏性生产力、毁灭性和灌输性的手段都令人可怕地集中在了掌权者的手中。

然而，马克思的革命概念的这种“失效”是一次真正的、确确实实的**扬弃**（Aufhebung）；这个概念的真理性和历史发展实际达到的水平上得到了保持并再度得到了确证。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它得以成为社会生产过程的人的基础的地方成了变革的推动者，也就是说，在第三世界以农业为主的地区，革

命的无产阶级在那里为民族解放前线提供了广泛支持。

与此同时，这些地区、这些力量并非外在于资本主义体系。它们是其剥削的全球空间的一个基本部分，该体系不允许它们这些地区和力量离开并转入别的（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因为这个体系要存续下去，就要保证其扩张不受任何更强的力量所阻碍。**民族解放**运动是对全球性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

但正是因为海外革命与宗主国之间的这种关系，**解放**运动的前景和宗主国彻底变革的前景之间命运般的关联才得以持续了下来。海外的“否定性”力量必须与本土的那些力量实现“**完全同步**”，而完全同步并不是仅靠组织就可以达到的结果，它必须在公司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进程中有其**客观基础**。在公司经济的张力和压力中，客观因素凸显了出来：

- (1) 竞争的必然性，先进自动化带来的威胁以及接踵而至的失业，要求通过非生产性的、寄生式的职业以及服务来不断扩大对工人的吸收能力；
- (2) 新殖民战争的成本或腐朽的独裁控制的成本越来越高；
- (3) 随着人类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减少，边际利润也在减少；
- (4) 对需求的创造是社会的要求，而对这些需求的满足则往往会与资本主义的工作所必需的士气和纪律发生冲突；必然王国遭到了这些东西的入侵：非必需品、小玩意和奢侈品——它们与持续的贫穷困苦并行不悖，在竞争性的生存斗争中，“奢侈品”成了必需品。

[204]

如果这些趋势继续发展，那么庞大的社会财富与对它的挥霍及破坏性使用之间的矛盾、自由的潜能与压抑的现状之间的矛盾、对有可能废除异化劳动与资本主义要求维持异化劳动之间的矛盾甚至会变得更为露骨，足以导致社会发生机能障碍，导致士气下降——通常情况下这种士气保障着人们在工作 and 闲暇时的日常表现，以及对于被要求的行为模式的顺从。这也许会使人们意识到技术的进步成为了支配的手段。

法国的五月风暴向我们表明，既定社会的这些冲突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使资本主义与工会的一体化放缓步伐，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推动工人阶级团体和

斗志昂扬的知识分子结盟。

革命概念必须重视这一偶发事件，即体制出现了分散的、显然“自发的”解体趋势，凝聚力从整体上也正变得越来越松散——这表明异化劳动在客观上已经过时，表明把人从其在生产过程中作为代理人（以及仆人）发挥作用这种状况中解放出来的压力正在增大：革命可以被视为“富裕”和过剩体制的危机。

### 变革的推动者

在这样一场危机中，变革的历史推动者将会出现——他们与任何传统阶级都不同。但我们还是能够去评判这些推动者的“资格”的，我们只需回想起那或许是马克思的革命概念中最为决定性的原理，即革命的历史主体必须是“有规定的否定”，该主体所处的阶级还要摆脱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剥削性的需求和利益，不受其毒害，也就是说主体有着本质上不同的、“人道主义的”需求和价值。

[205] 这意味着与支配的连续性决裂，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质上不同的、新的生活形式和方式，不仅要合理地发展生产力，还要重新划定进步的方向，以终结竞争性生存斗争，不仅要废除贫穷和劳役，还要重建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以使其成为和平、美丽的天地：**彻底重估价值，转变需求和目标。**这意味着在革命概念中还有一次变革，那就是打破拥有高生产效率的技术部门的连续性——在马克思看来，这将延续到社会主义社会（摆脱了资本主义的滥用）。这样一种“技术上的”连续性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命运有关的联系，因为从这个技术部门的结构和规模来看，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控制和支配机构。**斩断该联系**并不意味着技术退步，而是意味着要根据自由人的需求重建技术部门，使技术部门受自由人自身意识和感觉的指引，受自律的引导。这种自律会要求有一个分权的部门在减少控制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控制——之所以减少是因为它不会再由

于剥削、侵略性扩张及竞争的要求而膨胀，它会受到相互合作的联合体的约束。

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明显“乌托邦式的”观念是否适用于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即那些可被视为引起质变的推动者的力量？

马克思的革命概念既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概念，也不是一个浪漫的概念，它强调力量的现实基础，强调那些能够独立提升质变的观念，使其不再是痴心妄想的主客观因素，而这样的基础在发达工业国家仍然存在。

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替代性力量仅仅出现在上述的“边缘”团体中：知识分子尤其是学生中的反对者，有明确政治意图的、活跃的工人阶级团体中的反对者。

他们不仅拒斥作为整体的体系，而且还拒斥体系“在现存结构内的”任何转型；他们效忠于一个新的、不同质的价值理想体系。

这些脆弱无力的团体是决定了革命概念的新的历史星丛：

- (1) 反抗那些被一体化的主流人群，包括被一体化的“直接生产者”；
- (2) 反抗一个运转良好的繁荣社会，尽管其并不处在革命的或前革命的形势下。

根据该形势，这种反抗严格说来只是准备性的：他们的任务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激进的启蒙，并且培养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结构进行斗争的骨干和核心力量。

因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恰恰存在于它的全球化结构中：存在于对新殖民统治的坚持抵抗中；存在于刚刚涌现出来的试图在古巴建构一个不同质的社会的有力尝试中，存在于中国；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存在于与苏联的较为“和平的”共存中。这里同样有两股对抗性的趋势，其动力是：

- (1) 在国际动荡面前力量不平衡的“富有国家”的共同利益；
- (2) 确保和维护各自政治与战略轨道的不同社会制度间相互冲突的利益。

## 结论

马克思的革命概念必须理解发达资本主义在范围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以及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在全球化框架下特有的新形式的矛盾，如此一来，对马克思的思想的改良就不会表现为外在的增补和调整，而是表现为对马克思的理论本身的详尽阐释。

然而似乎有一个方面与这种解释不相容。在马克思的骨子里可以说有一股理性主义的气质，甚至是一种实证主义的偏见，即他认为向“人类发展的更高阶段”的过渡有着铁的必然性，并且认为该过渡最终将取得成功。尽管马克思充分意识到了失败、挫折和背叛的可能，选择“**社会主义还是蒙昧主义**”（socialism or barbarism）并非其革命概念的固有职责。它必须担负起这样的职责，因为人对他的劳动资料以及对整个压倒性的生产和破坏部门的屈服，几乎已经成了一股不可控的力量，而这股被客体化和物化的（verdinglicht）力量，就隐藏在技术面纱下面，隐藏在被调动起来的国家利益背后，看起来像是自动的，看起来像是已经得到被洗了脑的、被整合了的民众的支持。它可以在反对力量有能力阻止它之前给予反对力量致命的打击：内在矛盾的爆发会使得对革命概念的再考察成为一种纯抽象的、纯思想的事务。觉察到这种可能性之后，我们应该使反对力量在其所有的表现形式中变得更强大、更团结，而这也是唯一的希望。

鼠辈马尔库塞：

你这个狗娘养的，你的末日快到了。

像令人恶心的臭鼬般的鲁宾，鬼鬼祟祟的霍夫曼，傻瓜金斯伯格，以及疯狂的艺术家的，你们快享受这个国家留给你们时日不多的宽宏大量吧！

你这个狗娘养的，阉割像你这样的在精神上有缺陷的动物是一件乐事，我们很乐意去做。

---

① 马尔库塞时常收到恐吓信，《鼠辈马尔库塞》是其中一封，证明了他的右翼敌人们粗鄙的、愚昧的、反犹的意图。我们再现了这封信的原始样貌，以阐明对马尔库塞以及信中所提到的其他新左派成员的攻击是多么的无礼和粗暴。同一时期的另一封信，似乎写于1970年10月4日，其开篇是这样的：“你这个肮脏的犹太佬，这是你唯一能寻得庇护的国家，而你正在尝试从内部去破坏它。”这恰恰暴露了马尔库塞的一些右翼敌人反犹的和法西斯的天性，信后面还写道：“希特勒是正确的——他没把你当成他烤箱里的食物碎屑清理干净，实在是太糟糕了，你这个肮脏的犹太人（Christ Killer）。”这样一封恐吓信所代表的，不单单是美国极右翼势力中的个别成员或狂热分子；我们认为，这些文字应该从该时期美国的反革命这一更大的背景来阅读，这一背景与一种持续发展的文化相联系——任何对统治精英或占主导地位的保守意识形态构成威胁的个人或团体，都会遭遇暴力和人身攻击的文化。——编者注

必须铲除你的家人——他们是被你释放的毒液毒死的。

民主的卫士  
共产主义猪猡的杀手



## 英格·马尔库塞致威廉·麦吉尔校长及 马尔库塞的评论<sup>①</sup>

[208]

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市，邮编 92037

西里弗力吉大街 8831 号

英格·马尔库塞

1968 年 9 月 24 日

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市，邮编 92038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

---

① 《英格·马尔库塞致威廉·麦吉尔校长及马尔库塞的评论》所标的日期是 1968 年 9 月 24 日，正如此前《鼠辈马尔库塞》一文所表明的那样，在此时期，马尔库塞时常受到生命威胁，信中表达了马尔库塞一家对于保护自身隐私的渴求。1968 年威胁逐步加强，加利福尼亚州长里根和一群十分有组织的右翼人士对马尔库塞发起了攻击，并要求他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辞职。这场运动以及接踵而至的媒体骚动，导致马尔库塞频繁收到骚扰信件、电话恐吓以及遭到其他有敌意的对待，这使得他的妻子英格写信给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校长威廉·麦吉尔，以寻求在这些攻击中保护马尔库塞。这场针对马尔库塞的运动受到了当地一些保守媒体、约翰·柏奇会（John Birch Society）及其他右翼组织的支持，他们要求解雇马尔库塞。马尔库塞的学生们则组织起来去保护他的房子，并陪伴他到大学上班以及出席其他公共活动。——编者注

威廉·麦吉尔校长

亲爱的麦吉尔校长：

我请求您在以下方面给予帮助。

为了保护我们的隐私，使我的丈夫能够在和平与宁静中工作，并且能够最好地保护他的人身安全，我们已经尝试把关于我丈夫的公共宣传减少到最低限度。在这次假期中，要做到这件事还算比较轻松，因为所有的请求都直接发给他，因此我可以自行控制和媒体的联系。在这方面我已成为一名专家，能够用各种礼貌的和不怎么礼貌的方式来说不。

现在他回到了大学，情况变得不同了，因为请求一般会发到公共关系办公室那里去，而他们的看法和我的十分不同。他们坚持要公开地解释我丈夫的观点。而我们则认为这行不通。如果人们想要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他们应该去读他的书。不仅如此，媒体的活动也占用了那些本应用在学生和他自己的工作上的时间。

[209] 因此，可否请您指示公共关系办公室——我知道它直接归您管辖——不要再公开我丈夫的信息，而是让记者和媒体代表们直接给我丈夫写信？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自行控制这些请求，我们认为这是合适的。

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要在这次通信中向您反映。我被海思 [Heise (?)] 女士告知，公共关系办公室在前段时间，将一份关于我丈夫的档案向记者公开了。如果这种行为能够停止，我将十分感谢。当然，您可能很希望在一些特殊场合将这份档案向特定的人公开，但我希望如果没有您的明确授权，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

您恭敬的英格·马尔库塞

赫伯特·马尔库塞

1968年9月24日

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市，邮编 92038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

威廉·麦吉尔校长

亲爱的麦吉尔校长：

我的妻子已请我将信件转呈给您。我知道她这是出于对我的安全与我们的隐私的考虑，如果您能够亲切地回应她的请求，我将十分感激。

您真诚的赫伯特·马尔库塞

## 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论解放》的报告<sup>①</sup>

书评

《论解放》

马尔库塞 著

国家治安——新左派问题

这份备忘录给出了一篇对标题中提及的书的评论，它被保存在了国家情报处内保科共产主义渗透及新左派团体组。

梗概：马尔库塞，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哲学院的一名教员，被称

---

①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这份报告所标日期为 1969 年 9 月 11 日，它表明联邦调查局不仅监控马尔库塞，而且还检查他的著作。此备忘录包含一篇对马尔库塞的《论解放》的“书评”，在这篇书评前面有一个标题：“国家治安——新左派问题”。联邦调查局关于马尔库塞的档案有数百页，包括关于他的旅游报告、关于他的谈话和写作的新闻剪辑、对他的邻居和同事的采访以及其他文本，这些依据信息索取自由从联邦调查局那里挑选的资料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文本汇编。关于马尔库塞和联邦调查局，参见 Stephen Gennero and Douglas Kellner, “Under Surveillance: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FBI”,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Social Theory*, Volume 26, edited by Harry F. Dahms, Bingley, UK: Emerald, 2009, pp.283–314。——编者注

为新左派哲学家。在标题中提到的书里，马尔库塞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倡议要在美国进行革命。美国工人在自由企业体系下做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他们不想要任何马克思式的革命，意识到这一点后，马尔库塞便把关注点转向了国内的少数派——“大部分来自于年轻人、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以及贫穷人口”，以求进行无疑是由知识分子所引导的革命。马尔库塞的革命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消灭贫穷和【劳动】的社会，在那样一片天地中，感性、有趣、安宁和美丽会变成存在的形式”。他鼓吹消灭贫穷和劳动，但没有提供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案，只说这会涉及消灭私有财产、涉及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他声称他的革命的先决条件【是瓦解】道德品行并动摇对既定价值的信念。【马尔库塞】是当今新左派运动中的一股强大力量。虽然【不确定】青年激进分子中的大部分是否真的理解他的哲学，但只要他鼓吹通过单纯地“做他们的事”——用他们的术语来说——来【推翻】现行体系，他们就会意识不到这一事实，即他是在把他们当作工具，以求实现知识分子的专政。在这本书中没有提到联邦调查局。

建议：无。供参阅。

[211]

沙利文（W. C. Sullivan）先生的备忘录

书评

《论解放》

马尔库塞著

100—445771

细节：

作者

马尔库塞（读作 Markoose）被称为新左派的一流文学代表和哲学家，同时也是“叛逆学生的偶像”。1898年，他出生在德国柏林，1934年移民美国，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1945至1950年间，他在国务院任职。随后，他

曾任职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54至1965年间在【布兰迪斯】大学担任政治和哲学的教授。他现在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哲学院的一名教授。马尔库塞受到哲学家乔治【黑格尔】、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作品的影响，也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他承认自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

没有提及联邦调查局

在标题提到的书中没有涉及联邦调查局的内容。

书评

标题中提到的这本马尔库塞献给“青年斗士”的书出版于1969年，马尔库塞在书中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倡议要在美国进行革命。

对于一切自由民主及其基于自由企业的经济制度，马尔库塞都表示出了敌意，【全然不顾】它们在提高【大众】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这使马尔库塞的英雄马克思看起来有些荒唐。马克思曾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将持续加强工人们的不幸，而这将最终导致【它走向】崩溃。马尔库塞发现他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地，即不得不拒绝将马克思所钟爱的作为革命变革【主体】的工人阶级，因为他意识到工人们自由企业体系下做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他们【不想要】任何马克思式的革命，他说这将【违反……】。<sup>①</sup>

---

<sup>①</sup> 文本在此中断，而剩余的联邦调查局报告也未能在马尔库塞的个人存档中找到。

## 安吉拉·戴维斯与马尔库塞<sup>①</sup>

[212]

### KPIX 电台新闻剪辑（1969—1972 年）

安吉拉·戴维斯与马尔库塞——1969 年 10 月 24 日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斯普劳尔广场上的讲话）

00:04:12:15——开始

（语音记录）没有照片：

戴维斯女士的评论和她昨天在密尔斯学院所说的非常相似，她当时谈到

---

① 我们关于安吉拉·戴维斯和马尔库塞的材料，来源于马尔库塞个人存档中的一份档案文件夹，其内容包括：

(1) 一份 KPIX 新闻剪辑的抄本。记述了 1969 年 10 月 24 日，安吉拉·戴维斯和马尔库塞在伯克利斯普劳尔广场的情况，以及州长里根攻击学生激进分子的情况。我们在马尔库塞的一份私人存档中找到了这个文本，这份私人存档的标题为“KPIX 新闻剪辑（1969—1972 年）”。KPIX 是旧金山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在当地的一个下属广播站。在下文我们会看到，这份新闻剪辑涉及学生激进主义、黑豹党人、安吉拉·戴维斯以及马尔库塞。这些剪辑可以表明，马尔库塞是一名坚定的斗士，而里根则是一名坚定的反动分子。事实上，在把戴维斯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席上赶下来之后，里根在一份于 1970 年 6 月 19 日公开的备忘录中声明：“安吉拉·戴维斯，哲学教授，已不再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员。作为校董会的带头人，我和校董会都不会容忍任何共产主义活动出现在州立机构中。对于这个我们所有人共享并为之自豪的、美妙的政府体制而言，共产主义者是一个危害。”

了学术自由和种族歧视。

(中景拍摄：戴维斯站在麦克风前)：

我们不得不谈论一场在社会结构方面彻底的、整体的变革，因为这是确保像学术自由这样的概念还能够保有实质内容的唯一途径。我们必须走上街头。

(语音记录)：没有照片

人头攒动，这是今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最大的一场集会。发

(2) 有一个标着“赫伯特·马尔库塞，NBC，1971年1月31日”的文本，是一份4页的带修正的打印稿。我们不清楚马尔库塞是在哪里作出这些评论的，但它看起来像是马尔库塞在“解救安吉拉”运动时所做的几次讲话之一，在那之前安吉拉因涉嫌提供枪支以用于解救政治犯乔治·杰克逊——索莱达兄弟之一——而遭到了拘捕；具体细节可参见 *Soledad Brother: The Prison Letters of George Jackson* (Chicago, IL: Chicago Review Press, 1994) 以及 Eric Mann, *Comrade Georg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Life, Political Thought, and Assassination of George Jack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戴维斯曾积极参与解救杰克逊以及其他被控杀害加利福尼亚州索莱达监狱的一名狱警的政治犯，因为他们是政治犯，他们是因自己的革命观点而被捕入狱的。戴维斯也被捕了，但经过努力于1972年被宣判无罪，此后她成了犯人权利的主要辩护者和废除监狱的主要倡议者，并在她的著作 *Are Prisons Obsolete?* 和 *Abolition Democracy* 中，以及在她于过去40年里创作的其他各种作品和发表的讲话中描绘了她的计划。

据马尔库塞所说，他曾为戴维斯提供过一份个人证词，强调她对历史和哲学进行过严肃认真的学习，并且称赞她是“我在这个国家超过30年的教书生涯中教过的最好的或至少是极其优秀的学生之一”。马尔库塞也在一条个人记录中总结并指出“安吉拉是我遇到过的最没有暴力倾向的人之一”。

(3) 我们在马尔库塞的私人收藏中找到了一个3页的打印文本，标有“法兰克福，1972年6月4日”。在1972年6月4日戴维斯被宣判无罪后举行的这一场讲座，将戴维斯围绕犯人所展开的政治行动放在了美国黑人解放斗争、全世界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的全球解放斗争的框架下。马尔库塞利用这一机会批评了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他指出他将在20世纪70年代继续介入革命社会主义的全球事务。有关安吉拉·戴维斯在20世纪60年代末被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聘用和解聘的细节，她参与监狱维权运动、涉嫌串谋解放索莱达犯人的细节，可参见 Bettina Aptheker, *The Morning Breaks: The Trial of Angela Davi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亦可参见绍拉·林奇 (Shola Lynch) 的电影 *Free Angela and All Political Prisoners* (2013)。——编者注



言者是新左派哲学家马尔库塞，还有他的学生、公开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安吉拉·戴维斯。在戴维斯女士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之后，加利福尼亚大学校董会随即将她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哲学助理教授一职上撤了下来。后来，一个上级法院的法官恢复了她的职务。昨天，安吉拉·戴维斯向校董会表示了感谢，感谢它让她拥有了数以百万计的听众，而不是她本来要教导的 60 名学生。根据今天数以千计的集会者来判断，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对安吉拉·戴维斯倍感骄傲的马尔库塞教授也是学生们追捧的人之一。

(中景拍摄：戴维斯站在麦克风前)：

[213]

在整个大学中，伯克利学院也许有着最为独特的政治激进主义传统。它一直以来都承担着对压抑行为给予回应的政治责任，而它也有能力使学院中的美国学生参与进来，有能力开展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能够在今天为你们做演讲，我感到很自豪。

(镜头转向人群，有声)

(3/4 镜头：报告者站在麦克风旁)：安吉拉·戴维斯在这里、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所不得不说的话，和许多其他激进分子已经说过的话并无二致。她唯一的问题似乎就是她给自己贴了个标签。她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目击者新闻”记者德尔塔·戴维斯 (Delta Davis)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报道。

(围成一圈的人群) 没有对白的镜头

(远景拍摄：欢呼喝彩的人群) 有声

(中景拍摄：戴维斯——无录音) 没有对白的镜头

(中景拍摄：马尔库塞在麦克风前)：

我相信战斗才刚刚打响。这场战斗的对象是所有想把你们的大学变成确保社会永存的培训学校，但这个社会的安全和繁荣却建立在对其他国内外人民的压迫和奴役的基础上。必须继续与这些势力作斗争，因为……

00 : 08 : 26 : 00——结束

## [214] 马尔库塞，美国全国广播，1971年1月31日

我不想谈论对安吉拉·戴维斯的指控以及她是否有机会得到公正的审判——我更想谈论的是一个我已经认识了超过6年的人，以及这个人在我们社会中所遭遇的事。

她是我在哲学和政治理论课上的学生。在课堂和研讨会上，我们讨论了那些塑造了西方文明历史的伟大文本：从希腊的哲学家们到黑格尔和尼采；从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家们到马克思。我说过她是我在这个国家超过30年的教书生涯中教过的最好的或至少是极其优秀的学生之一（我要重复这一点，因为这是一个事实，也因为这或许有助于解释她的成长，解释她的人生）。

她是一个出众的学生，不仅是因为她的聪明和她学习求知的热情，还是因为她有着那样的感性，有着人的温情——如果没有这些，所有的学习、所有的知识就仍是“抽象的”，只是“专业的”，也就最终是与现实脱节的。

安吉拉学习了伟大哲学家们一直以来讨论的话题，包括人的自由、人的尊严、平等、正义，以及基于这些理念人类关系和人类社会应该是怎样的。她很快就把握住了每一个好学生都会把握住的东西：这些伟大的理念除非不再仅仅是在课堂上、在教堂中、在政客那里所宣称的“理念”和“价值”，否则它们什么都不是，它们就是错误的、与现实脱节的，除非它们为了全人类被转化成了现实。

而且安吉拉对这个她出生和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有着细致的观察：她所属的黑人的命运，那些人们已经对其进行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斗争和抗议但却仍然存在的压迫、不公和苦难——事实上，就在现今社会已经具备了消灭世界上的贫穷、不公和苦难所必需的一切资源时，情况却正在变得越来越糟。

而对这一社会在中南半岛、在监狱和精神病院中的丑恶行径进行抗议的斗士们，对浪费和破坏这些躲在高标准生活背后的阴暗面进行抗议的斗士

们，却面临着这一社会越来越系统性的压抑。黑肤色和棕肤色的带头人遭到了起诉；校园遭到了镇压；卑尔根兄弟（Berrigans）被关进了监狱；安吉拉也被关进了监狱。

这个社会为了破坏——空气、海洋和土地，这个国度所创造的一些最好的人——而生产。这些可怕的事实是阴暗面，以此为基础，社会财富才得以创造出来，生活标准才得以提高，舒适便利的生活用品才得以买进卖出。

我觉得已无须任何精妙的解释，我们便足以理解安吉拉怎么变成了一名黑人斗士、一名革命者。

准确地说，是因为她是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因为她是一名真正的哲学学生，也因为她是一个人，她严肃认真地对待她在书中所读到的东西。

安吉拉是一位出色的教师，甚至她的批评者们也都承认她并没有利用课堂来宣传或教化。她不需要这么做！

[215]

对事实的展示、对主流状况的分析已经够多了。她拒绝把西方文明的解放理念仅仅看成是教科书上的素材，看成是用于考试和获取学位的材料。对她而言，这些理念是活生生的，必须成为现实，必须在此时此刻就成为现实，而不是在遥远的未来，不是永恒的承诺和期盼。

因此，她不能把自己局限在教室里，局限在校园较为安全的孤立一角；她把真理（她的真理、我们的真理）带到了外面；她抗议，她示威，她创建组织，她也没有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她被辞退了——由于政治原因。

我想用我更为个人化的一番评论来做一个总结。安吉拉是我所遇到过的最没有暴力倾向的人之一。（我想人们只需要仔细观察她的脸就能够发现这一点！）而她的四周却充满暴力（这已深深地扎根于这个社会）；她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她的黑人兄弟姐妹们的生命也受到了威胁。然而我却无法想象她会策划或参与暴力。要使我相信这一点，我想必须有很强的证据才行。

译者赖茨：马尔库塞对安吉拉·戴维斯的介绍

法兰克福，1972年6月

安吉拉主要是为了她的人民的解放而战斗——但她知道该斗争同时有一个直接的目标，即美国的资本主义。“直接”是因为它不再抽象了。它就是贫民区、法院、监狱和警察及其日常受害者们**所在的地方**。它同样也是超市**所在的地方**，此外它还是大量多余的小玩意被生产出来，商品被设计成一年就得报废以便重新采购的地方——整个财富行业深陷……脏乱、污染、苦难和犯罪的泥淖。

这就是该社会疯狂的财富及其罪恶运用，而引人注目的疯狂，如今已使压迫变得不堪忍受，也使得对该制度的抗议变得更为普遍起来。但它也会**挫败**抗议。因为抗议与这一制度无所不在的力量、与其繁荣相冲突，而大部分的有组织的劳动力已经与其一体化。

激进的反对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少数群体。黑人就是一个少数群体，他们在解放斗争中，明白自己与学生运动、年轻工人、妇女……一样，都站在反抗资本主义的前沿阵地。

但这种共同的反抗需求并未导致行动上的联合，也没有一个完善的组织来保证哪怕是极小的联合战略。

[216] 安吉拉在抵抗期间总是强调自己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这意味着她知道黑人解放斗争是从资本主义中获得解放这场总斗争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而这场总斗争(当然伴有少数派的冲击)有一个极为具体而又令人恐怖的目标：对越南人民发动的战争。晚期垄断资本主义这种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集中起来对他们发起了进攻。

中南半岛采取的**极端**形式是帝国中心的“普通”形式的极端表现。每天发生在越南的战争罪行助长了**国内**日常的犯罪(而前者反过来也要靠后者滋养)。**彼处**作为维护国家荣誉的必要行动而得到官方授权的暴行，引发了**此**

处的暴行。在此，**本国**对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只是越南发生的整体性、系统性毁灭的一个微弱的回音。

杀死活着的人（男人、女人和小孩）还不够；留给**子孙后代**的森林、动物、收成等营养基础也必须被破坏掉。国家的荣誉（与安全）不会允许任何一个由它所创造并使其军事化的“盟国”被置于危难之中。

但谁都知道这不会成功。也许还会用到原子弹。但侵略者将不会成功……

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这里并不是讨论帝国主义或新帝国主义政治问题的地方。下面只做些一般性的评论：

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不能让它在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如古巴）的规则受到挑战。必须对造反的解放力量实施恐怖的统治和压制。

对越南人民的战争是一场预防性的战争，目的是为了对抗**所有的**解放斗争：亚洲的，非洲的，尤其是拉丁美洲的。**还有国内的……！**

以**真正的**自由为目标的革命不会让自己融入现有的体制，这样的革命必然在全球范围内受阻。在国内也一样，也就是说，在宗主国也一样。因为在那些地方，抵抗也在不断地加强。但抵抗的增长速度比压抑的增长速度要慢得多。

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对抗资本主义统治最后也是最强阶段的战斗仍然缺乏有效的组织。

长久以来，反对的浪潮都在被愚蠢的恐怖行动、小团体间无休止的论战所削弱，对一些小团体来说，相比建立起一支反资本主义的力量，谁才是表面上的“正统”更为重要。

· 最重要的是在各个特定的组织之上（或者，最好是涵盖所有特定的组织）创建包括老左派和新左派在内的**统一战线**，创建更为广泛的抵抗

基础。

- [217]
- 必须停止反革命。否则替代方案就会是法西斯主义。
  - 比起越南的人民来说，身处这里、身处美国的我们，并非处在战斗的最前线。
  - 让我们为他们的解放而奋斗吧！

## 论科学和社会<sup>①</sup>

每当我与科学家们谈起科学在这个社会所起的作用时，我会被告知科学是中立的，[而]科学家是这个社会的仆人，它可以被用来并且**正在被用来推动人类生活的进步及其毁灭**。

让我们接受对科学家在当今世界的地位所下的定义，然后让我们来讨论科学家是什么样仆人以及科学的重要性。离开了科学家，这个社会能否以现在的形式存在，或说它是否离不开科学家？布伦诺斯基（Bronowski）最近在加利福尼亚西部法学院的一次谈话中以非常独特的方式指出，我们所做的任何事，甚至包括在这个大厅中、在电灯下通过麦克风对你们所做的讲话，

---

① 《论科学和社会》（*Conclusions on Science and Society*）是马尔库塞于1969年在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一场讲座的结论部分。在一封于1969年3月12日寄出的信中，马尔库塞受邀于1969年4月7日前往斯克里普斯做了一场讲座。在马尔库塞的私人文件中有一份文本，其中有4页手写的笔记，内容涉及海洋学、科学以及科学家的责任，紧接着就是我们在此所展示的一份3页的打印版笔记。这场以斯克里普斯的教工和学生为听众的演讲表明，马尔库塞积极地驱使科学家们在资本主义的背景下考虑他们的工作，考虑他们的智力劳动对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演讲的结尾部分，马尔库塞把主题推进到科学家们的责任上，恳求科学家们不要把他们的努力看成是资本的侍女，而是要重新设想科学如何能够成为人和自然的解放进程的一部分——将它们从不停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的毁灭性需求中解放出来。——编者注

如果离开了迄今为止的科学和科学成就，都是不可能完成的。如果我们看看科学家身上堆积起来的荣誉以及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支付的价钱，那么我们会很清楚地看到，科学家如果是仆人，那么大概也是社会中**那个**最重要的仆人。如果没有科学就不会有工程。另一个问题是，科学何以可能是中立的？如果科学真的是中立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很清楚地看到，科学所制造的东西以及通过科学之手得出的东西，即那已经被推广和使用的东西**完全**中立，以至于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来做好事或做坏事，也就是说它具有机器人的本质，还可以说它是一件极其**危险的工具**。那么问题出现了，即**谁是**科学所侍奉的**主人**，以及科学的本质是什么：是否所有科学都能变成危险的工具？变成导致死亡而不是赋予生命的工具？

[218]

在任何国家，科学家都会说他的国家是最好的主人，科学在他的国家是最安全的。如果美国科学家赞同他的国家的所作所为，那么他做他所做的就是对的，他思考科学而不是思考政治也是对的。如果他不赞同，那么他就比其他人更应该去思考和参与政治，去阻碍他的国家实施毁灭性的政策。如果说所有的科学都是同等危险的工具，微分方程最终带来了导弹，那么你就是在制造一种杀戮机器。如果你认为可以做出区分，认为向国防部门提供信息和向国家心脏基金会提供信息两者是有区别的，那么你的路就很明确了。必须做出这一决定的是**你们**。**你们是制造者**。这取决于你们，但你不能说：我们**只是**科学家，我们与政治无关。在 20 世纪的世界，无论你们是身在俄罗斯还是在古巴，你们都是主人的仆人，而这一主人一旦没有了仆人也就不成其为主人了。



## 宽容的真实本性<sup>①</sup>

时事评论：马尔库塞的回复

4月5日，《时报》在这个位置刊载了威廉·班诺夫斯基（William S. Banowsky）博士的一篇文章，他是佩珀代因大学马利布新校区的校长。那篇文章起因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尔库塞博士对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反共产主义言论者弗雷德·舒瓦茨（Fred Schwarz）博士提出的抗议。为了公平起见，《时报》请马尔库塞博士对班诺夫斯基的文章做了回应。

令人遗憾的是，威廉·班诺夫斯基博士和坊间的误传一样误解了我的观

[219]

---

① 《宽容的真实本性》刊于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12, 1970, pp.7-8, 可见于马尔库塞的私人存档。这封写给《时报》的信鲜为人知，因为它藏身于马尔库塞私人收藏的一大份档案中，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与威廉·班诺夫斯基——佩珀代因大学马利布新校区的校长——进行争辩的一堆书信和报刊文章。马尔库塞曾抗议弗雷德·舒瓦茨博士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表现出了基督教反共产主义运动的倾向，班诺夫斯基在1970年4月4日致马尔库塞的信中附有一篇题为“An Unwilling Score for Tolerance”的文章，对马尔库塞的抗议做了抨击。班诺夫斯基对马尔库塞的批评以及他对自由主义的宽容概念的捍卫，可参见 *LA Times*, April 5, 1970。而在一周之后，《时报》刊载了马尔库塞以《宽容的真实本性》为题的回应，我们将其呈现于此。马尔库塞明确地表示，他并没有批判舒瓦茨在校园里说话的权利，而是在质疑他是否具有在一门关于当代保守主义的课程上进行演讲的资格。——编者注

点。我并不认为弗雷德·舒瓦茨博士无权在校园里寻找听众；我只是认为他没有资格担任一门正式课程的讲师。

班诺夫斯基认为我这么做的时候漏掉了一点，即想必根据我的“政治哲学”原则，我也会表示反对，因为在班诺夫斯基看来，我的“政治哲学”原则否认与我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的说话的权利。但我必须说，我从未持有这样的观点。

我并没有在我的抗议中援引我的“政治哲学”，因为它不适用于舒瓦茨：我不认为他是危险的，而只是不合格的；而且我也已经提交了我认为能够证明我的观点的材料。我相信我是以一名国际知名学者的身份在大学里发表演讲的，而不是以新左派或其他政治派别的发言人的身份。因此，我在大学里发表演讲一事，不能为舒瓦茨的表现提供任何辩解的理由。

进一步说，声称我持有如下观点是十分荒唐的：“过去的智慧已经与现在无关。”事实上，反过来才是真的：多年以来，在我的讲座和著作中，我已驳斥过这一观点，而任何一名我的学生都能够为此做证。

## 自由的限度

再进一步说，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主张过不宽容一切与我相左的观点，我也从未说过或暗示过我已经掌握了“绝对真理”。我曾建议过，对于确实具有侵略性和破坏性的运动，不应予以宽容；我也曾提倡过对于反对扩大“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医疗护理等”的宣传工作，不应予以宽容。我也确实认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不应该对来自既得利益的压力——反对为穷人、病人和老人提供更好的照顾的压力——予以宽容。

我仍然坚持认为（并且我也相信，这与西方伟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一致）言论自由有其**客观的**限度，它反对打着爱国的必然要求的幌子煽动奴役、种族灭绝和种族歧视。

也许听起来很奇怪，我也相信，有必要宽容。从同样的假设出发，班诺

夫斯基和我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宽容是其自身的目的。根绝暴力、减少压制，直到保护人和动物免受虐待和攻击所要求的程度，是创建人道的社会的先决条件。”我在《压抑的宽容》这篇文章中写下了这些句子，而我写下它们，并不是为了随后将其收回。

紧随其后的句子体现了班诺夫斯基和我之间的根本区别：“这样的社会尚不存在，而比起以往，如今朝着这种社会迈进可能阻力更大，因为它要遭遇来自全球范围内的暴力和压制。”

[220]

我同意班诺夫斯基所说的“在观点的公开交流中，真理将最终取得胜利”以及“思考和提问的权利……被终止不仅仅是礼节问题”。我的整个教师生涯一直都在致力于使这项权利得到保障。准确地讲，我想说的是“观点的公开交流”在这个社会中并不占主流，如此一来，人们“思考和提问的权利”也就变得无效了。

自由主义的传统已经遭到背叛——不是被我，不是被什么阴谋，而是被单向度社会的力量以及那些控制它的人所背叛，受这些人控制的媒体以及导致顺从的普遍压力，几乎垄断了公共舆论的形成。那使真理“最终将取得胜利”的“观点的公开交流”，不仅要求反对这个社会中的某些政策，而且要求反对这个社会本身，要求能够平等地接近媒体，要求有平等地发展它自己的媒体的机会，等等。

事实上这种机会从一开始就被否定了：左派并没有自由竞争所必需的、可供其自由使用的大量资金、设备以及“关系”。类似的情形也存在于教育机构当中。关于大学和学院受左派支配而“对方”发不出声音的观点是恶意的宣传工作；反过来才是真的。

居支配地位的是保守主义，我那些更年轻的、没有终身教职特权的同事们可以告诉你，一旦他们采取错误的政治行动，他们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正是由于当权派在全球范围内采取不宽容的态度以及强迫服从，系统地创造出它自己的多数人并使其长存，才破坏了自由主义的根基。“多数人的暴政”——要知道，这一阶段是由一位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开创的。而一旦这

种暴政站稳了脚跟，观念的自由交流、独立思考的权利乃至可能性将被严重剥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是如此！

我从未否认过（因为，否认显然是愚蠢的）当权者有权这么做。它在自身的存在中感受到了威胁，因此它就会以所有可用的手段来回击。暴力已在其结构中、在其市民的日常居家生活中变得根深蒂固。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历史状况下。作为一名学者、哲学家、教育者，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正以自己的方式与它做斗争。

我拒绝声称这个社会是自由的，同时，我认为那些把现存状况和可以自由交流观念的状况相提并论的捍卫者根本就不诚实。就像经济领域中的“自由市场”一直以来都隶属于有效的垄断统治那样，观念的市场也是如此。它的恢复，毋宁说，它的实现，仍然有待完成。**所有人**自由地、批判地思考的权利仍有待奋力争取。

## [221] 路线并未确定

以哪种方式达到这一目标，目前仍有很大的分歧。我从未声称要垄断真理，也从来都不认为谁“有权利规定谁可以发言”。就像我所有的著作那样，我创作《压抑的宽容》这篇文章目的是为了讨论。我已经完全意识到我处境的危险；我相信它比起下面这种危险来根本就不值一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继续宽容那些把这个国家拖入更严重的战争、浪费和暴力之中的力量的话，我们将面临更可怕的危险。

这些力量无须任何一个聪明的独裁者、绝对真理的拥有者的认同：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来肯定自身，而任何能够反思其所见所闻所读的人很容易就会把他们认出来。

请允许我做个总结。我想我应该努力创造条件，从而可以使宽容成真并惠及所有人，使宽容能够成为它被设想的样子，即变成捍卫人道的武器。人道并非仅仅对美国疆域内的居民而言。我认为，在国内吹嘘自由和宽容，同

时却又使世界各地陷入法西斯的军事独裁，对各个国家进行焚烧、轰炸和投毒，在一个奥威尔式语言的封闭领域内阻碍理念的自由交流，这很荒唐。

我强烈控诉当权者的不宽容，控诉其宽容人对人的暴行。



关于马克思主义、革命以及时事的演讲与访谈

## 马克思主义与发达工业社会的相遇

1964年2月22日<sup>①</sup>

篇章结构：

-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发达工业社会（美国！）现实的相遇
- (二) 这些现实在何种程度上驳倒了该理论：**确证的领域**和**矛盾的领域**
- (三) **马克思主义对矛盾领域的解释**

---

<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与发达工业社会的相遇》是马尔库塞为一场讲座所准备的一些手记，标注的日期为1964年2月22日，试图展现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发达工业社会（美国！）现实的相遇”，其中的感叹号意味着这一关注的对象是美国。在以美国为关注重点的五页讲座手记之后，还有另一组手记，在其页面顶部标有“（四）与苏联社会相遇”以及“紧接着威廉玛丽”，似乎表示这场讲座的一部分被安排在了弗吉尼亚州的威廉玛丽学院进行，尽管没有相关的证明文件来确认这一点。在三页的关于苏联社会的手记之后，是一页关于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社会的资料的汇总统计，看来马尔库塞在讲座中讨论这一话题时使用了它。随后是一页以“苏联社会能够成为福利国家吗？”为题的笔记，接着是一份五页的讲座笔记，标题为“（五）马克思主义理论被驳倒了吗”，但没有加上问号。另外有两页的手写“结论”，给出了一些更为深入的注解，但没有真正给出结论。最后，有一个两页的以“社会主义的人”为题的打印稿被添加到了这些讲座手记中。这些文本表明当马尔库塞即将完成《单向度的人》的时候，他的思想储备既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也有关于工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也罕见地展示了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若干年后，公众对于苏联社会的反应。——编者注



(四) 对该解释的**评估**

(五) 结论：该理论被驳倒了吗？

讨论对象仅限于**最发达的地区和趋势**。这么做是因为：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之间建立起了一种  
内在联系；生产力的成熟和矛盾的爆发；

在最发达的地区所流行的趋势（技术的、科学的、文化的），在落后地 [223]  
区广泛传播并且成了**工业化的典范**。

(一) 与资本主义相遇：

**仅仅列举**我们所熟悉的状况：

- (1) 贫困——生活标准提高
- (2) 愈发尖锐的阶级冲突——愈发加强的阶级合作
- (3) 革命意识——顺从意识
- (4) 国际无产阶级联合——民族主义
- (5) 萧条和危机——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发展
- (6) 帝国主义的冲突——超国家的同盟和市场（总的卡特尔的幽灵！）
- (7) 社会的两极分化，中产阶级的减少——“新中产阶级”的发展
- (8)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

共存——继承

——在**落后**国家取得成功的革命！

（**忽略了**利润率的下降趋势??）

工业后备军？

——马克思预料到了垄断在损坏小企业的情况下会获得超额利润

——在**非生产**部门中雇员数量的增长（“服务业”）

强有力的诉状

——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在 1900 年前后已经草拟完毕

——建立在这些**新情况**基础上的批评，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基：

——**稳定性，如果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结构性转变，那么它就不是一种表面现象！**

[224] 而现在，与这些矛盾相对，

## (二) 确证的领域

(1) 资本的集中与中心化

(2) 持续的产能过剩以及破坏性或限制性地使用生产力

(3) 对生产和分配进行严格管控的需求在增长：垄断的国家控制

(4) 自由企业、自由竞争、自由市场的减少

(5) 结果：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遭到了削弱；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兴起……

(6) 经济和政治影响的渗透力增强，遍布海外：“新殖民主义”

(7) 资本主义联合势力**内部的**冲突：共同市场；国防政策！

然而，**马克思的预测**似乎与现实不符：

这些离心的趋势（内在矛盾的表现）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使**革命的潜能有所增强**，更不用说它们全体了：

甚至是最强有力的共产主义政党、联盟（**法国；意大利！**）的民主战略以及“最低纲领”

最为严重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

——共产主义势力的增长使**世界市场萎缩了**，而殖民地的独立则**促进了资本主义的重组！**

——**共产主义成了资本主义病榻前的医生！**

——资本主义的**联合消解了资本主义的矛盾！**

## (三) 马克思主义的回应

两个阶段与两个层次：

- (1) 苏联的官方教条
- (2) “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关于 (1) 苏联马克思主义

本质上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重新阐述和更新：

- “**暂时的稳定**”，基础是
  -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组织架构
  - 剩余利润
  - “收买”工人贵族
  - 战争经济。
- 重组带来的改善
  - 仅限于极少数工人阶级
  - 周期性地被战争和萧条所摧毁
  - 被加剧了的劳动力剥削所抵消
  - 主要大国（科学管理）的情况
  - 欠发达国家的情况。

[225]

接下来是（斯大林）

- 资本主义社会革命潜能的下降被解释成了“**阶级斗争转变成了富国与穷国（have-and have-not nations）之间的国际斗争**”
  - 不过，富裕国家的“无产阶级”属于另一个阵营！
  - 进一步说，苏联的教条保留了这些概念
  - 资本主义的最终危机与社会主义的历史优越性；

然而，

**资本主义的稳定化**的实在和平共存的理论以及政策中**被认识到了**，所以斯大林认为

- 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更高的生产率和合理性才能取得胜利。**

这种回应的不足之处：

- 工人中间的“顺从者”**不仅仅是少数贵族**
- 外部因素**（非资本主义势力）的介入
- 什么是“暂时的”？
- 什么是“最终的”？？

关于（2）新马克思主义

已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经济与劳动阶级中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 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不变资本的贬值抵消了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使高水平的生活得到了维持；
- 然而，

代价是持续而**有计划地制造浪费**

- 对需求的操纵和教化**
- 持续的核毁灭威胁
- 整体的、持久的动员

尽管如此，

即使这些“相反趋势”也不解决**内在矛盾**：

- 私人部门的收缩，取而代之的是垄断部门和半公共部门；而该矛盾**通常表现为**
- 生产力的持续提高与对需求的系统管理之间的矛盾，进步与把资源分别用于保持社会健康和维持劳役之间的矛盾**
- 并非相对贫困！

[226] 例子，**自动化**

- 将导致劳动时间减少至**颠覆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的传统分配的程度**
  - 这与资本积累的要求**不相容**；足够的利润率与剩余价值
- 因此，**对自动化的抵抗也是对大众失业的抵抗**

——**生产力和进步的停滞!**

但是与这一停滞相对：在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完全自动化的威胁

——在全球竞争中**资本主义会逐渐衰弱**

**马克思于 1857 年：全面机械化将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

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意味着

——商品交换价值减少

——“无报酬的”劳动时间减少，因而

——利润率下降

要想抵消，除非在以下方面实施**全面管控**：价格

企业

投资，等等。

这样的全面管控**也许是有益的**和进步性的，但前提条件是它能够导向一个真正的

**福利国家。**

批评太过肤浅：

——失去经济乃至“文化”自由可能还不是太过沉重的代价，因为随之而来的还有不安全、恐惧、贫穷和劳役

——这些自由的减少可能恰恰就是获得“超越必然王国”的真正自由的先决条件

然而，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也一样），要成为这样的福利国家，就要**预先有一场革命**：

——共产主义世界需要**政治革命**

——西方世界需要**政治和经济革命**

- 计划经济
- 集权政府。

面对该威胁：

**福利国家的替代方案：**

- 与其说自由时间将陷入困境，不如说价值将面临全面重估：
  - 国防部门对生产力的指导和消化吸收
  - 在维持现状的过程中，持续不断地进行全民动员：**

[227]

- 替代方案对物质和精神的压抑——**
  - 在共存的状态下**完全合理！**

如果这种阐释是正确的，那么即使是“富裕社会”也能证实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论题：**

- 如果缺少了更大规模的浪费、破坏以及战争的持续威胁，**资本主义无力维持自身。**

(四) 与苏联社会相遇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苏联社会**还不是社会主义**

- 马克思没有社会主义理论
- 马克思只有关于社会主义**先决条件**的理论

但有

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两个阶段：**

随着革命而来的质变

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量变

第一阶段：

匮乏，压抑：正义 = 非正义  
 平等 = 不平等 } 工资差异……

预先假设：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继承人，  
 但没有讲到，共存 = 敌对共存，即军备竞赛

**苏联的现状：**

- 极权主义国家
  - 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 劳动纪律
  - 独裁管理
  - 激励制度
- } 资本主义的特征！

**结果：**

“社会主义”社会似乎——不是不自由社会的反面，没有从其中解放出来，  
 反而像是其延伸、简化及合理化。

实际的发展是否仍然可以根据两个必要阶段来解释、证实？

(1) 证实的是：物质和技术基础必须为此而被首先创造出来；

持续的劳役和压抑；

同样：

在同残存的“奴性”或“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过程中，与新社会相符合的思想、意识、价值体系必须被发展起来。

(2) 然而，

目的必须决定手段：

可以有一种自由的专制吗？

人们可以“强迫自由”吗？

**历史地看，答案似乎很模糊：**

- 民主化程度**不仅**可以通过大众的**革命**、激烈的内战得到提升，
- 还可以**经由极权主义的**恐怖**阶段得到提升！

(例如：雅典民主  
英国内战  
罗伯斯庇尔)

**“教育上独裁”的历史论据：**

- 反自由主义的力量与利益对人民的影响，
- 不成熟和软弱
- 奴隶们如何能通过自身来掌握可使他们获得解放的工具**

独裁试验的**历史后果同样很模糊**

- 恐怖活动是怎么使民主化进程加速或放缓的？
- 恐怖活动具有历史必然性吗？

**与历史论据相抗的“逻辑”：**

- 怎么会有被支配和强迫的自由？
- 教育上独裁会不会使它想要消灭的下述心理保留下来，比如：
  - 依靠他者的力量
  - 消极被动
  - 非自治：依赖于政府、国家……

**荒谬的结论：**

**人们在获得解放之前不应该享有自由！**

**技术社会使问题恶化了，因为在这里所有的通信方式、信息工具都集中化、**



标准化了，

——个体几乎成了**大众传媒的无力的接收器**

——**从属于一个全知、全能的集生产、分配、政治于一身的部门！**

——**这在同时也提升了个体的生活水准，**

——**并且承诺继续提升，而对浪费、破坏、战争的威胁却置之不理。**

从 1952—1962 年，国民产值翻了一番；年增长率略低于 7%

从 1952—1962 年，人均消费增长了 50%—60%；每年增长 4%—5%

格里高利·克罗斯曼 (Gregory Crossman) 的《共产主义存在的问题》 [229]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rch-April 1963)

**最近的钢铁产量：8500 万—9000 万吨**

**目标：在 20 年内高出美国 10%**

**美国年产能：14000 万吨；实际上目前相当于 60%**

**《纽约时报》8 月 16 日第 10 版**

**苏联社会能够成为福利国家吗？**

在苏联极权主义制度的统治下，生产力和消费的增长：引用数据！

物质和技术基础的完成情况：**苏联时间表（1961 年计划）**

1961—1970 年：创建基础，即在国民人均产值上超过美国

1971—1980 年：完成基础，接近社会产品按需分配的阶段；建立一种所有制形式，即公有制

接下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即国家“消亡”。

**然而即使这一目标实现了，是否就建立起了自由的社会呢？**

难道个体的需求本身不取决于上层社会的灌输，难道它不是不自由的需求吗？

持续发展的福利国家，其势不可当的生产力还有舒适感，

**减少了对自由的基本需求**

**吸纳了所有反对者。**

最后一个问题：

在相互敌对的共存状态下，这样一个福利国家可能吗？

(五) 马克思主义理论被驳倒了么

在什么情况下，一种社会理论才算是“被驳倒”、“被证伪”了呢？

与理论不符的事实**仅凭自身不能构成反驳：**

——否则，只要理论**成功地**转变成了行动就可以证明其历史真理性（法西斯主义！）。

**事实驳倒理论**

前提是它根据理论本身无法得到解释，

——只有根据内在**矛盾**才能得到解释。

马克思**声称已经阐明了**

——自身发展有其限度的资本主义的结构及其“机械主义”，

——要克服该限度（“暂时性地”），只能通过

——破坏和浪费一切资源

[230]

——系统地管理人的需求和才能

——周期性的危机和冲突：**野蛮暴行。**

或许有人希望能够为**预测与现实相符**提供一个强有力的例证，

**然而，这里并没有那样的例证！**

**决定性的检验**

取决于是否存在作为**历史推动者的无产阶级：**

——一个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迫切需要改变无法忍受的状况的阶级

——一个“有意识”并有能力改变社会（即国民中的大多数）的阶级。

在发达工业国家，这个阶级**消失了**。

因此，

新旧社会之间

理论与实践之间

抽象与具体之间**内在的、历史的联系**

被切断了！

**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双重“依赖”：**

(1) 资本主义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2) 资本主义创造了它自己的掘墓人、**内在的“否定”！**

(关于 1) 资本主义构建的技术基础和生产能力使社会主义成为了可能

然后，“只有”实现了**经济和政治控制权的转让**；

否则，在**技术基础与人类的代理人**方面就会有**连续性！**

马克思关于**技术中立**的观点：

——如果处理得当，机器既可以由资本主义公司来操作，同样也可以由社会主义国家来操作；

——不同的社会制度对机器的**用法**（目的）不同。

因此，**量**的发展（技术进步）借由**新社会阶级**即无产阶级**变成了质**。

不过，

技术“**中立**”对于单个的机器而言**也许是真的**，但对于**整个技术部门**而言却**并非如此**，而是已经变成了

——生产、整合、**支配机构**。

技术理性已经变成了**政治理性**，反过来说也一样：

[231] 政治领袖是国家的**管理者**，就像**资本家**是工厂的**管理者**一样——他们执行的都是生产部门的理性决定，即为它的需求服务。

技术社会似乎是一种新的社会形式：

——技术部门势不可当的力量、效率和生产力，**吸收、整合和减少了有效的抵抗**

——它在最发达的地区为其特权群体提供了**更高的生活标准**，使抗议和造反陷入了瘫痪；

提供了新的军事装备，并且没有把其余的人变成敌人。

**之前的敌人、抵抗阶级**（“否定性”）变成了合作阶级，在现存制度中有了既定利益（“肯定性”）——

这一趋势只发生在最发达的地区——但马克思恰好是在这些地区看到了“否定性”的出现。

正如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通过

——不断发展生产力、严格管控经济、洲际市场以及为反对共同的敌人动员整个社会，

**“缓解”**了阶级的内在矛盾（遏制了经济萧条；有计划地报废和浪费成了产能过剩的“补救方法”……）——因此它

同样**缓解了内在的反对**：

——它把**人类的代理人**变成了**团结和稳定的代理人**，而对马克思来说，这些代理人本是潜在的能够带来社会变革的人。

## （六）结论

当理论分析看起来与现实不符时，

**理论的实现似乎受到了阻碍和拒斥：**

——对马克思而言，**理论与实践之间必要的联系似乎被打破了：**

马克思理论现如今**没有群众基础。**

(问题**并不**在于，工人是否“接受”马克思，是否按他的思路来思考……而在于，他们的客观情况、他们的需求和兴趣是否可以表明他们是“革命者”；

——他们是否**活生生地**从他们自身、从他们的社会中**异化了出去。**

异化概念还有效吗？

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缺乏群众基础，理论已变得**抽象。**

**“抽象”并非必然是“错误”！**

**任何社会变革的理论无法创造出它得以实现的基础：**

它只能够规定并**筹划**其得以实现的**可能性，**

作为**既定社会**的真正的、**历史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真正的可能性就会表现为抽象的可能性：**

[232]

——当主流意识、思考模式的自由发展受到阻碍时

——受到现有形势压倒性的力量的阻碍。

在此形势下，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保持距离与分离**并不能证伪理论：**

——历史地看，**理论有可能走在现实前面；**后者低于历史的水平。

马克思曾对该形势——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德国的形势——做过描述：

——**历史所达到的水平，**理性与自由的历史可能性，以思想的形式被时代的**哲学**（德国唯心主义）展现了出来。

——在**现实中，**它们受到了压抑：社会的前景在社会中被社会遮住了。

因此，关于社会、关于社会变革的**批判理论**

——变成了哲学的“**继承人**”和“**翻译者**”。

- 它通过辩证逻辑为批判地分析社会提供了概念武器
- 否定性思维的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抽象得多：

——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并不那么有否定性，它也不力求超越它的社会。

在今天，理性已不再充当“否定性力量”，而是具有了肯定性思维的力量。  
在这股力量面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受到了谴责。

### 结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及其趋势与矛盾的所做的分析仍旧是最适当的。

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别

- 同样的内在冲突具有了新的形式：
- 高标准的生活→以浪费为代价，政府控制的国防经济
- “阶级的平等化”→并没有缩小顶层和底层民众，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差距。

然而，实际的发展已经压倒了本应去解决这些矛盾的社会力量，并且  
——压倒了本应去建设更合乎人性的社会的社会力量。

[233] 这些力量是否会在“外部”兴起？（落后地区？）

无论如何，现有社会可能会长时间持续下去——除非发生核灾难  
——甚至是最为反叛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希望看到它得到证实！

这种现实可能性就是最大的控诉！

## 结论

马克思主义被驳倒了吗？

历史还没有终结；唯有给出合格的答卷才可以终结历史！

### 对于西方而言

——资本主义必须证明它有能力持续发展，同时

无须战争

无须持续不断的战时经济

在其势力范围内，无须一边进行计划报废和浪费，一边又维持贫穷和劳役。

无须进一步削减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 对共产主义而言：

减少对民主的极权主义控制？

提高生活水准

结构化地趋向和平。

## 不过

什么是社会主义？

——它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人们在满足基本生命需求的基础上，自主决定他们自己的人生

——没有苦难和不公；不受他们的劳动资料所奴役

——为了一个和平的世界，人类自由地发展其才能。

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在工作时间中，留给个体自主决定的是什么？

“文化的”、创造性活动？

兴趣爱好？

自由也许会被彻底地重新定义，比如：

——在以新需求和新满足为目标的重建技术部门的过程中

——在重建工作世界的过程中：

——废止大众的团结

——减少使生存斗争持存并加剧的压抑的富裕

[234] 概而言之：

和平！

**科学的作用！**

“社会主义的人”

说到这个尚不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人，其实，也许有人正在为了给他创造条件而斗争：

尤其是在为了唤起新的价值

——而抵抗任何形式的剥削的斗争中

——而抵抗侵略和支配，支持**和平**的斗争中

——在资本主义、该制度的稳定与发展似乎与**和平的条件不相容**的情况下，这已经成了最强有力的社会主义目标！

不过，必须要说的是，

因为作为现代人的**唯一历史替代者**，社会主义的人的形象：

——源自对现有资源和能力的分析，

——源自它实现的可能性，以及

——源自体验到了对他的**需求**。

但我们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分开

——这个形象的本质特征

——与他过时的条件和限制。



他本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的人——无论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的“规定了的否定”。

——“规定了的否定”：作为这个人潜能的外在表现，也是他的对立面；

——这是一个客观的社会趋势，是现在与未来发展阶段之间的动态联系：**下一阶段即是更高阶段**

——**前提是要通过有意识的政治实践来实现。**

——“资本主义的人”：他的整个人生都取决于他在交换经济中的表现和地位，

——也就是说，取决于他对一个部门的服从，他不仅无法控制这个部门，而且还要被迫接受它的要求。

资本主义的人的**特点**：

——作为一个越来越具有寄生性和压迫性的部门的对象，他在商务和娱乐中表现出了攻击性，

——处于竞争（状态）的满足感

——他的心理结构直接“社会化了”……

——结果是全面的人格遭到了全面的扭曲：自由变成了服从和竞争的自由，

——选择统治者和主人，在社会的控制下释放受压抑的本能需求……

通过简短的枚举，很容易就会发现，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所构想的资本主义 [235]

的人和社会主义的人之间的差异已经不再适用：

——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

然后是：按需分配。

不再适用是因为

——个体的需要、个体的无意识、个体的本能都已经被发达资本主义所掌

控，并且经过塑造已与他们**逐利性的**满足相一致。  
这一压抑的成就尚未被摧毁  
——既没有被基础机构的变革（国有化）所摧毁，  
——也没有被这些机构的控制权的变革所摧毁，  
除非这些变革“伴随着”**新的、不同质的需求**的出现。

## 社会主义过时了<sup>①</sup>

马尔库塞—布兰迪斯的告别演讲，1965年4月27日

标题的意思不是说：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错的。**主要论题**如下：

(1) 个体间的社会关系受他们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价值（不是使用价值！）的支配：受它们的市场价值（marketability）的支配；

(2) 在这个交换社会里，人的需求的满足**只是**牟利的商品生产的**副** [236]  
**产品**；

---

① 《社会主义过时了》是马尔库塞“布兰迪斯的告别演讲”的主题，该讲座举办于1965年，在他与管理层发生冲突并申请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教职之后。此时他那本有名的著作《单向度的人》刚出版不久，马尔库塞在此给出了一种治疗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最佳方法。这次讲座把社会主义解释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它是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哪些条件所做出的最清楚的表述之一，此外，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它对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思想的那个资本主义工业时代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的危机时期这一更高发展阶段的联系做了敏锐的分析。正如马尔库塞在讲座开场时所说的那样：“标题的意思不是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错的。”与那个时期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反，马尔库塞不断把马克思作为一个出发点，以便更为准确地阐明资本主义应对、避免危机，最大限度地从劳动力中榨取剩余价值，以及整合具有革命潜能的各个阶层的民众的方法。——编者注

(3)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双重矛盾**逐渐显露了出来

——在日益增长的**劳动生产力**（社会财富）与其**破坏性**、**压抑性**的使用之间的矛盾，

——在生产资料的**社会属性**（不再是个体的而是集体的生产资料）与其私人所有和控制之间的矛盾；

(4) 资本主义只能通过更大的**浪费**（**军备!**）以及侵略性的扩张（帝国主义）来暂时地“解决”这个矛盾，

——将导致战争与萧条的周期性轮回，

——将耗尽繁荣时期的遗产；

(5) 直到忍受剥削的**劳动阶级**夺取了生产部门，并将其置于整个社会的集体控制下。

我认为**所有这些**论题都已得到了**证实**

——除了(5)之外

——阶级斗争转变成了全球性的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斗争；

——后者使在国防经济中持续抽取剩余价值成为可能。

（这是与世界穷苦人民进行斗争!）

那么，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中，**什么过时了?**

现实与马克思的预言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矛盾**：

——劳动阶级没有贫困化，

——阶级意识、阶级斗争没有得到加强，

——社会没有两极分化（中产阶级没有减少），

——在资本主义力量之间没有不可避免的全面冲突。

让我们快速地浏览一下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以重新定义的方式来拯救马克思思想的努力：

——贫困化首先被理解为**人的、文化的**贫困化：抛弃了物质基础……

——**“相对”**贫困化：同前面提到的一样；你不会因为你只有一部手机

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而发动革命。

——阶级意识只是“暂时地”被优先考虑的“**直接利益**”压抑了：区分直接利益与真正利益的能力不强：这以成熟的阶级意识为先决条件；

——中产阶级的衰退被他们在现实中数量上的增长所掩盖，他们**正不断地丧失他们的经济独立性**。非生产性的“服务业”等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等等，这大体来说是正确的，但并非全然如此。

——帝国主义仍旧是强劲的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力量（新殖民主义!），

——“世界市场的萎缩”**加剧了冲突，但与此同时，共产主义的发展又抑制了冲突。** [237]

关键是：

——必须在**全球性的**框架内全面地评价马克思理论：

——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病榻前的医生！

——共产主义促进了希法亭所提出的总的卡特尔！近来，促成了全球的三方割据：资本主义（私人的）、技术共产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初级”共产主义（在落后国家）。

但现在我只想讨论——在我看来——核心的一点：

我们曾假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会实现过渡，但如今看来：

本应**完成**这个过渡的社会阶级，已**不再**对此**感兴趣**——因为在这个本应由他们**消灭**的社会中，他们有了**既得利益**。

但这个不言自明的真理

——**错过了决定性的一点：**

——不是**贫困化**而是对革命的**迫切需求**使劳动阶级成了历史的推动者，也就是说，

成了一个有着**不同质的**利益和追求、有着不同的思想的社会阶级，同时，

因为他们有着质的不同，他们有能力**建设一个不同质的社会**  
也就是说，

人类**新的**生存形式——非异化。

如今，在旧社会中，这样一个新阶级的出现受到了**阻碍**  
——被**富裕社会**的过剩生产力及其创造需求、满足需求的能力所阻碍，这种能力反过来又再生产和强化了这个社会本身：

有着本质区别的、**不相容的利益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

本质相同的利益的竞争！

马克思没有预料到的另一种发展：

——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体力）劳动力的份额的下降（它的下降对非生产性的工人来说有利），

——与此同时，心力逐渐取代了体力（可通过抽象劳动时间来衡量和量化）。

无产阶级本应在两个层面上或凭借两种相互关联的品质和功能来充当革命的历史推动者：

- [238]       (1) 对无产阶级来说革命乃是迫切需求，是攸关生存的问题。  
              (2) 无产阶级提供了资本主义的人的基础，即社会再生产的基础，那么  
              ——因此这个阶级实际上有能力**停止**社会的再生产！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革命理论似乎**崩溃了**。

**拯救它的尝试** [主要讨论 (1)]：

——“**暂时的**”**稳定化**和**一体化**的观念；但还不够，是因为：

——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的变化影响到了制度的基础（生产关系本身）

——过剩的生产力；改变了社会必要劳动的特征；自动化（不仅是技术因素！）

——“暂时的”是指多久?!

——“工人贵族”概念：在普通工人被整合的形势下并不适用。

——根据**国际形势**重构马克思的观念：

——富国人民和穷国人民之间的阶级斗争。

该转变值得专门考虑。

以下三个方面证实了这个国际性的转变：

(1) 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尽管（或说由于?）世界被分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的稳定依赖于同共产主义的斗争；

——落后国家的原始积累依赖于发达工业国家的援助。

在这个意义上，**根本没有“外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势力：

——外部势力是内部势力的一部分。

(2) 对落后国家的下层民众而言，彻底的社会变革确实是迫切需求：

——这是对富裕社会的福祉的“绝对的否定性”；

(3) 作为前工业的、农业的人口，这些人构成了现有社会物质再生产的人的基础。

据此看来，该转变有其合理之处，

**然而，**

落后国家的发展（民族解放运动）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决定了发达国家的发展？

有待讨论的问题：

——发达国家面临的重重困境；

——民族解放运动和发达国家中的反抗运动的结合（理论与实践!）；

[239] ——后发国家的历史优势？跳过压抑性的富裕阶段；有着质的不同的工业化模式？

(这些稍后我会讲到!)

### 新帝国主义

以战争对抗解放战争，无论是不是共产主义的解放战争  
没有“国防工业”的富裕社会

然而，马克思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有另外一种看法：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就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体力）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创造性力量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全面的）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



产便会崩溃……<sup>①</sup>

人将完全摆脱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耗费自身的必然性，

根据人自身的能力，自由地控制物质生产，甚至用它来“嬉戏”……

只字未提阶级斗争！只字未提贫困！

**但是**，马克思自己压抑了该观点，

现在它却是马克思最现实、最有魅力的洞察！

这段话的**言外之意**是：

——生产力的技术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能够

达到**这样的水平**，即**已经没有必要**把人的体力劳动作为生产资料来 [240]

使用。

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向社会主义生产部门的转变

**仍将**需要一场革命，

不过，革命前夕的发展应该达到**倡导一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水平。

换句话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看起来

**还不够彻底，不够乌托邦。**

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技术水平使一种**超越以下区分**的社会主义发展成为了可能

——社会必要劳动与创造性工作，

——异化劳动与非异化工作，

——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

马克思写道，

<sup>①</sup> 括号内容及粗体均为马尔库塞所加。这段引文在本卷第二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一文里也出现过，但马尔库塞的个别用词稍有区别，所补充的括号内容和所作强调等也有不同。——译者注

这个洞察的确**不成熟、不现实**。

——向社会主义过渡最必要的仍然是“**生产力的发展**”：

——把生产力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仍将是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

但这个观点却有更多的意味：

——也就是说，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种“**技术的**”连续性。

照此来看，

过渡首先意味着**量变**：更大的生产力。

**由量到质的转变**，规定了否定

——意味着革命，受剥削的生产者将通过革命来接管生产部门

——并把它投入到人的需求和能力的全面发展中去。

如今这个设想所适应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也就是本应从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这一阶段，**在发达工业国家中完全被超越了**：

——被逐渐消灭的是：

——商品生产中人的体力劳动，

——仅仅作为人的劳动**工具**的机器，

——生产力低下、利润最大化、难以榨取剩余价值所导致的**萧条**，

——废除剥削的**需求**（作为**迫切的需求**）。

富裕社会已经超越了这些情况

——尽管存在着普遍的贫穷

（因为在马克思的概念中，贫困阶级就是“直接生产者”，即产业工人）；

[241]

——并且尽管存在着破坏性、浪费性地使用生产力的状况

（因为这样的使用有利可图并且促进繁荣）。

此外，

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成功地塑造了——并满足了——受剥削者的需求：

这些需求把他们绑在了制度上，并在他们自己的心理结构中实现了该制度的再生产。

结果：

**遏制了社会的质变。**

这种情况**要求重新思考**

——过渡理论

——社会主义观念本身。

过渡理论

区分：

- (1) 发达工业国家
- (2) 较不发达工业国家
- (3) 落后国家：独立的前工业国家，  
——新殖民时代的卫星国

关于 (1) 与 (2) 的关系：

(1) 是否会为 (2) 提供一种发展模式？

**反对的论据：**

在法国和意大利存在着强有力的劳工抵抗运动，

——他们的新战略是：

**“工人自治”。**

**支持的论据：**

该战略只有在革命之后才有效；否则，  
很有可能被制度吸收，

**关于 (3)：落后国家**

在此，社会主义传统的先决条件普遍存在，

——不会因为潜在的革命力量是农业无产阶级这个事实而变得毫无价值！

最重要的是：

**有可能跳过压抑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

——跳过**生产部分**对生产者的支配；

——取而代之的是：

**“以人为尺度”** (*à la mesure de l'homme*) 的技术发展。

[242]

然而，

后发国家的这个**历史优势**，被后发国家的原始积累依赖于发达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危险**掩盖了**。

**关于 (3)：**

富裕社会让我们见证了它的**内在矛盾**：

——这些矛盾通过福利—战争国家被“暂时取消了”、被抵消了，但没有被解决。

**吸收持续增长的经济剩余的困难不断加大，使这些矛盾显露了出来：**

——该制度**试图**通过以下手段来**克服这个困难**

——提高劳动生产力，

——扩大军工企业的再生产，

——计划报废，

——与经济剥削叠加在一起并掩盖了经济剥削的精神剥削：

- 系统性地刺激需要，
- “人为地”创造需求。

但是，

这些出路却被制度自身的内在发展动力**堵塞**了：

例如：

- 导致失业的自动化进程，
- 军备成本降低，
- 年轻人和知识分子的激进化（重估价值）。

然而，矛盾不会“自动”爆发：

- 置之不顾的话，冲突的趋势或将导致法西斯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已经过时了

- 因为劳动在经济上实现了一体化，
- 劳动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份额减少了，
- 统治阶级掌握着现代技术装备；

**“革命”过时了！**

**不过**，内在矛盾在全球范围内表现了出来：混乱的趋势必须在**国际背景**下进行评估。

可以激活社会主义潜能的新的社会力量是什么？

下面是**社会主义潜能的典型表现**：

- 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
- 欧洲的“新战略”工人运动，
- 富裕社会的贫困阶层，
- 持反对立场的知识分子。

补充一点：现有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外在的反作用力吗？

(1) 它有可能是发展的**主要催化剂**，

——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催化剂：

——在抵制解放战争的斗争中，该体系会为了其不可或缺的**腹地**而战，

为了获取新殖民时代的剩余利润，

为了使经济扩张获得生存空间。

**某个地区**的独立运动的**胜利**将意味着

向更靠近本国的地区发出了造反的信号，

**在全球范围内**动员受剥削的有色人种。

但是这一最直接的催化剂与其他三者**并不存在着联系**：

在发达国家里**没有这样的催化剂**，然而，

如果不激活发达工业社会中瓦解的力量，那么过渡几乎不可想象，

——只有在独立运动的进展引发了可能使富裕社会终结的经济危机时，这种高度推测性的事件才有可能发生。

只要富裕社会压抑性和逐利性的稳定仍然占据主流，那么

**知识分子的激进化**——现在与未来之间唯一岌岌可危的纽带！

**意识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因素：

——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

——由于“阶级意识”被富裕社会所吸收和整合，

——因此**意识的解放**，以及

受操纵的**无意识的解放**

变成了**首要任务**和前提条件。

——此外，由于压抑已延伸和扩展到了整个下层民众，

——必须解放“**一般的**”意识及在所有存在维度上的意识，

——**必须打破富裕社会对人的心理结构的控制**

新的需求和才能的出现，

智力和本能层面的反抗是变革的一个**先决条件**：

——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

社会主义观念

[244]

这是最后一个话题：**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的人的形象**

社会主义，作为富裕社会的历史继承者，并且作为它的规定了的否定，与它具有质的不同，

**必须颠倒进步方向，颠倒生产力的发展！**

在何种意义上“颠倒”？

(1) 要在全球范围内克服贫穷和苦役，就需要：

淘汰破坏性的商品和服务，

淘汰寄生性的工作和职业，

淘汰竞争性（状态）的、加剧生存斗争消费。

这意味着：削减富裕社会现有的生产和分配部门，

——**降低生活水准，**

——**并非通往新的社会主义式的清教和炼狱，而是**

**要消除一切使有机体（身体和心灵）陷入压抑性劳动和压抑性娱乐的机构的媒介、小玩意、活动和默从。**

(2)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的进化意味着：

**否定方面**：系统地使用技术部门以摧毁富裕资本主义毁灭性的生存环境，也就是说：

——商业化的自然，

——大众传媒和大众的团结，

——私人事务和私人状态……

换句话说，

消解政治活动、利润和娱乐中引人注目的侵略性。

**肯定方面：**创造一个“爱欲”的环境，作为保护和加强生命本能的中介：

——将自然恢复为一个安宁与退隐的维度，

——恢复隐私，

——恢复自由时间，而不是闲暇时间或消遣

——总而言之：

和平。

**出生率的下降。**

(3) 在发达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所实现的生产力发展的颠倒，将否定并超越马克思主义关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之间关系的观点，

——“异化”与“全面发展的个体”。

“非异化劳动”，即社会范围内的创造性工作是一个前工业、前技术的概念：

[245] ——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将全面发展的人格归入了社会必要劳动王国之外的自由王国，

因为：在工业社会，所有社会必要劳动，作为机械化劳动，都是异化的。

如今，这个自由王国关上了它的大门，因为大众社会已侵入了自然，侵入了海洋和太空。

正因为这种侵入，

——那个“……之外的自由王国”已成为受监管的娱乐或释放压抑的王国：

——受监管的个体将侵略性的需求和活动带入了自由王国！



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水平上，

——不能把异化的废除设想为劳动方式的质变，设想为新的“创造性”社会劳动方式的出现

——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倒退的观念！

劳动过程将会越来越机械化、自动化、技术化，换句话说，消除自治、自发性、个体性。

倒不如说，质的不同将表现为从社会必要劳动过程中分离出来。

——也恰恰是这种分离将赋予人以重新确定生产过程方向的自由。

机械化的大生产仍然存在，不过，

**生产出来的产品与服务将会有很大不同：**

——住房、交通工具、设备等将在技术性的生产中被生产出来，

——但这些产品有助于使人们免受生存斗争的困扰，而不是使生存斗争大范围地持续。

在最大程度的机械化与技术理性的基础上，或将兴起一种新的个人工艺，一种蕴含着技术可能性的新的有趣的实验。

换句话说，

生产必要产品和服务的必然王国，

——将成为自由王国，前提是这些产品和服务要

比如说，培养和满足真正人道的、非侵略性的需求和才能。

——这些产品和服务要在没有苦役的情况下得以生产。

物质生产自身将脱离苦役，并趋向于有趣的实验：

——人，作为生产者，将“不再考虑生产过程”。

[246]

(4) 然而，生产过程如此彻底的转型，牵涉到一种新技术。

一种新的科学理性，

一种新的艺术理性，

**假设会出现完全不同的需求，假设会出现不同的本能结构：**

——彻底重估价值，

——否定主流的具有侵略性、压抑性的道德。

——这场变革的**客观基础**正在通过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技术和经济变革而准备着：

——大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服务行业”）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寄生性**，

——对全职劳动的社会需求正在减少，

——生产**美轮美奂的**、赏心悦目的商品的压力正在不断增加。

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因为这些可怜的、受到扭曲和抑制的趋势与基本的反对趋势联合了起来，所以它们很可能会爆炸……

它们或将动摇资本主义事业的士气，动摇“入世的禁欲主义”，**以及**有组织的消遣和团结。

但是新的解放性需求的兴起的主观可能性是什么，

——也就是说，要有意义地谈论“社会主义的人”，需要心理结构发生怎样的变化？

可以按照弗洛伊德的术语来阐释这一重估

——减少攻击行为，减少破坏性的能量

——增强爱欲的能量

这里，在**与这些趋势**和可能性做斗争的过程中，

作为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富裕社会表现出了极为强大的力量

(1) 通过社会现实各个领域**侵略性的俗化趋势**，

(2) 与此同时，通过可以带来**重复和扩大**的形式来释放侵略性。

关于 (1)：

侵略性从精神病院、高速公路、警察局延伸到了  
 特种部队的训练营，延伸到了越南，延伸到了在战略上征服太空。  
 此外，侵略性还渗透到了  
 ——政客和报纸的用语，  
 ——大众传媒的图像资料，  
 ——唯利是图的商业对自然的侵犯，  
 ——生产过程本身：计划报废，安全至下（safety last），等等，  
 ——社会日益军事化。  
 并且得到了美国国会的动员、批准和资金：  
 引用拉塞尔参议员的话。

[247]

关于 (2)：

侵略性的能量以抑制本能的满足并因此促成重复和扩大的“**技术侵略**”  
 的形式被释放了出来，

并且

**消除了内疚感、罪恶感以及个体责任，**

**因此，防止生命受到肆无忌惮的系统性毁灭的本能屏障也被移除了。**

这种社会性的——并且是理性的！——对侵略行为的动员抵制生命本能的潜  
 在解放，

——抵制一个由生命本能所统治的社会，

“社会主义的人”是那些安于富裕社会的居民的规定了的否定。

新的需求

他的需求和价值表现为

——对侵略与破坏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不是反战主义，而是以侵略对抗侵略  
 者！），存在性神经症，即反感有机体成为异化劳动和压抑性管理的工具，

——需要隐私、安静、独处，

——需要一种自律的智思，以便发现自己的需求，以便创造一个人道的环境。

“社会主义的人”与现如今的人的形象相反，他表现为：

——一种**消极的超人**：

一个渴望**和平**（不是“内心的和平”，而是能让他决定并过上自己的生活的和平）的人，

——他**不需要持续不断地“挑战”**以谋求更好的生活，

——他**讨厌**服务于统治利益的**英雄主义和牺牲**，

——他敢于做**懦夫**，**害怕**他应然的一面。

显然，

这种形象非常不真实，非常乌托邦。

——甚至是与“第二阶段”也不相称；

[248]

但是，

富裕社会的成就已经将该需要提上了日程

即需要强调社会主义观念中超验的、乌托邦的要素，

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才真正是一场有着质的区别的质变：

——人的本质的历史变革。

回到**当今现实**：

**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接合点**，

知识分子与“群众”之间的接合点

是无法被组织和计算的。

尽管这个社会充满了技术理性和计划，

——但它仍是**非理性的**，

——被**盲目的、未能驾驭的力量**所支配，

被它那**展露出来的矛盾和冲突**所支配。

**你们**也是一支反对势力：

——你们的抗议远非“迷惘的一代”的抗议

——它是一种整体的、彻底的抗议：

——道德与政治合成了一体，

——本能与理智合成了一体。

这意味着你们似乎变成了危险，而

不仅仅是“让人感到不安”！

因此

继续去做你们正在做的——不管处于什么领域——

——只要你没有忘记最本质的东西，即

你想要的**不仅仅是一些改善，甚至不仅仅是制度上的变革：**

——你想要的一种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方式。

并且

在坚持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你表达的并不是**少数派**、“知识分子”的需求：

——你正在有意识地表达**整体**被压抑的需求：

生命对破坏的抗争，

爱欲（Eros）对死欲（Thanatos）的抗争。

现如今，现实世界和人类生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技术环境和自然环境无论发生何种转变，这都有可能，而该可能性的立足点是历史。如今我们有能力把世界变成地狱，并且我们也正在这么做。我们同样也有能力把它变成天堂。这意味着乌托邦的终结，即拒斥那些用乌托邦的观点来指责特定的社会历史可能性的观念和理论。这也可以被理解为“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及其环境的新的可能性，不仅不再能够被视为是对旧社会的延续，甚至也不能认为它们处在同一历史连续性之中。确切地说，它们以历史连续性的断裂为先决条件；以自由的社会与尚不自由的社会之间质的差别为先决条件，在马克思看来，这使所有先前的历史仅仅变成了人类的史前史。

---

① 1967年7月，马尔库塞在西柏林自由大学发表了题为《乌托邦的终结》的演讲，随后又与学生们做了讨论。关于该文本，可参见 *Der Ende der Utopie*, Berlin: Verlage Peter von Maikowski, 1967；还可参见“The End of Utopia”, translated by Jeremy Shapiro and Shierry M. Weber, *Five Lecture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pp.62-82。马尔库塞是新左派以及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主要发言人，德国报纸上刊登的演讲综述认为“马克思、毛泽东与马尔库塞”是当时吸引西方青年造反的主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场演讲及与学生们的讨论，表明马尔库塞支持学生的行动主义，支持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也揭示了他极具乌托邦色彩的构想：他把一个拥有新价值、新生活方式的新社会想象成了当时学生造反的目标。——编者注

但我认为，即使是马克思也极其受限于连续的进步观，以至于甚至是他的社会主义观念也未能——或已经不再能——代表它本应代表的对资本主义的规定了的否定。换言之，乌托邦终结的观点在今天至少意味着有必要重新讨论一下社会主义的定义。这个讨论将建立在该问题基础上，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决定性要素是否不从属于如今从生产力的发展来看已经过时了的阶段。在我看来，这种过时在对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所做的区分中最清晰地表达了出来，而根据该区分，只有超越了必然王国，自由王国才可以想象，才可能存在。该区分意味着必然王国仍是异化劳动意义上的王国，按马克思的说法，在其中只可能发生一件事，即劳动被尽可能合理地组织起来，被尽可能地减少。但这却使劳动在必然王国保留了下来，因而是不自由的。我认为，有这样一种新的可能性，它可以指出自由和不自由社会之间质的差异，它可以使自由王国在必然王国出现——在劳动中而不仅是在劳动之外出现。为了以一种挑衅的形式把这个推测性的观念表达出来，我认为有必要直面该可能性，即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也许是从科学到乌托邦，而不是从乌托邦到科学。

[250]

“乌托邦”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指的是被认为不可能的社会变革计划。为何不可能？在通常对乌托邦的讨论中，当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主观和客观因素阻碍了转变——也就是当所谓的社会条件未成熟的时候，要实现新社会的计划是不可能的。法国革命期间的共产主义计划，或许还有，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它们都是真的缺少或声称缺少主客观因素的很好的例证，似乎也正是因为这种缺少使它们不可能实现。

同样，社会变革的计划也会由于与科学上得到证实的规律、生物学法则、物理学定律相抵触而被认为是不可实现的；例如，由来已久的永葆青春的观念，或是回到所谓的黄金时代的观念。我认为，如今只有当社会变革的计划与真正的自然规律相抵触时，我们才能说这是乌托邦的。在严格的意义上，只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才是乌托邦的，也就是说，超越了历史——不过即使是这种“非历史性”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那种由于缺少主观因素而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计划，最多也只能被认为是“暂时”不可行的。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所给出的这些计划不可行的标准是不充分的，例如首先，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就是，不可行只有在事后才会显现出来。毫不奇怪，如果一个社会变革的计划在历史上曾失败过，那么它就会被认为是不可行的。其次，不可行的标准无论如何在这个意义上都是不充分的，因为情况很可能是，革命计划的实现受到了反对力量和反对趋势的阻碍，而这些完全可以在革命进程中被克服。因此，把特定的主观或客观因素的缺失作为拒绝彻底变革的可行性的理由，这一点是有问题的。尤其是——而这也是我们在这里所考虑的问题——在技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法确定革命阶级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就是乌托邦。革命的社会推动者——这是正统的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在变革的过程中才会形成，人们不能指望有现成的革命力量，也就是说，在革命运动刚刚开始就有现成的革命力量。不过在我看来，有一个判断是否可能实现的有效标准，那就是当变革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从技术上讲都准备就绪的时候，即便是现存生产力组织阻碍了对它们的合理运用。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如今我们确实能够谈论乌托邦的终结。

一切能够用于实现自由社会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已就绪。它们之所以没有被用于这一目的，要归咎于现存社会为了对抗它自身的解放潜能所做的全面动员。但是这种状况决不意味着彻底变革的理念是乌托邦。

如我所描述的那样，贫穷和苦难的消除是有可能的，这也是对异化的消除，以及对我所说的“剩余压抑”的消除。即便是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中，也几乎没有一个严肃的科学家或研究者会否认，有可能在技术上借助已有的生产力来消除饥饿和苦难，他们也不会否认眼下正在发生的事必须归咎于压抑性社会的全球政治。然而尽管我们在这一点上有共识，但我们仍没有完全弄清楚这种能够消灭贫穷、苦难和劳动的技术可能性的含义。也就是说，这些历史可能性必须以那些意味着与前一段历史断裂而非连续的形式来构想，即以其否定而非积极延续的形式、以差异而非进步的形式来构想。它们意味



着人类生存在物质基础这一维度将获得解放，需求将发生转变。

这涉及对新的生存理论的看法，事实上，它不仅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生存方式：对自由的迫切需求（a vital need for freedom）与自由迫切的需求（the vital needs of freedom）的形成和发展，即一种不再受制于和建基于匮乏和必要异化劳动的自由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新的质的人类需求的发展看起来就像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必然，它们完全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需求。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大部分受操纵的民众而言，对自由的需求并不是或已不再是一种迫切的、必要的需求。与这些迫切需求相伴而生的新的关于人的理论同样意味着一种新的道德的兴起，而它将是至今为止塑造了西方文明史的犹太—基督教道德的后继者和否定。在压抑性社会中，需求不断得到发展和满足，而正是这种持续性一再地在个体身上实现了压抑性社会的再生产。个体在他们的需求中实现了压抑性社会的再生产，这甚至借助革命得到了延续，而正是这种持续性一直以来阻碍着自由社会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这个观念表明人类需求有其历史性。所有的人类需求，包括性，都超越了动物世界。人类需求受历史决定，并随历史变化。而与那些包含着压抑性的需求决裂，跃入质的不同，并非仅是一个发明，而是内在于生产力自身的发展。发展已经到了为了正常发挥生产力自身的潜能而要求有新的迫切需求的水平。

哪些生产力发展趋势使这一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成为了可能？最重要的是，支配的技术手段逐渐破坏了支配的根基。生产过程（物质生产过程）中体力劳动逐渐减少，被逐渐增多的脑力劳动取代，这在技术人员、科学家、工程师等阶层的社会必要劳动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这表明存在着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可能。这当然只是一个趋势问题，但这里的趋势却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持存。如果资本主义没能成功地开发生生产力及其组织的这些新的可能性，那么劳动生产率就会掉到利润率所要求的水平以下。而如果资本主义注意到了这一要求并不计后果地继续自动化，那么它很快就会遭遇自己的内在界限：用以维持交换社会剩余价值的来源就会枯竭。

[252]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指出，社会必要劳动完全自动化与资本主义的持存不相容。自动化只是必要的体力劳动、异化劳动将越来越多地从生产的物质过程中撤离这个趋势的口号。该趋势如果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那么它将带来一种有创意的发展生产力的试验。随着贫困的消除，该趋势还意味着在游戏中发挥人的和非人的自然潜能也会变成社会劳动的内容。以相应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生产性想象力将会在地构成生产力，并将自由地描绘出自由的人类存在的可能性。为了不使这些技术可能性变成压抑的可能性，反过来，为了使它们能够发挥其解放性功能，它们必须得到解放性的、令人满足的需求的支持和引导。

当不存在消灭（异化）劳动的迫切需求时，而是恰恰相反，当存在持续和扩大劳动的需求时，甚至当这不再具有社会必要性时；当对问心无愧的愉悦和幸福没有迫切需求，反而是有一种不得不在生活中赚取一切东西的需求，以至于这生活要多悲惨有多悲惨时；当这些迫切需求不存在了，或是被那些压抑性需求淹没了时，那么唯一能料想的就是新的技术可能性实际上就会通过支配变成新的压抑的可能性。

[253] 我们已经知道控制论和计算机如何推进对人类存在的全面控制。那些新的需求，对现有需求来说是规定了否定，首先表现为否定那些支撑当下支配体系的需求及其所基于的价值：例如，否定生存斗争的需求（人们一般相信这种斗争是必然的，因此所有谈及消灭这种斗争的可能性的观念或想象与这种被普遍相信的人类存在的自然和社会状况相冲突）；否定谋生的需求；否定绩效原则、否定竞争；否定浪费性需求、否定毁灭性生产力（它与破坏密不可分）；否定虚伪地压抑本能的迫切需求。这些需求会在对和平的迫切生理需求（现如今还不是多数人的迫切需求）、对安定的需求、对独处的需求或只与自己所挑选的人相处的需求、对美丽之物的需求、对“不应得的”幸福的需求——所有这些不仅是个体的需求，而且还是一种社会生产力，是可以通过引导和安排生产力而被激活的社会需求——中被否定。

以社会生产力的形式，这些新的迫切需求有可能对人类生活的实在世界

进行全面的技术重组，而我认为，只有在这样一个重组了的世界中，新的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才是可能的。当我谈到技术重组时，我参照的仍然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那里这样的重建将意味着消除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商业化的恐怖，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恐怖被清除之后全面重建城市和恢复自然。当我说要消除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恐怖时，我希望你们明白我不是在鼓吹一种浪漫主义的向前技术时代的复归。相反，我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技术被消除之后，技术和工业化的潜在的解放性福泽才会变为现实，才会变得清晰可见。

我之前提到的自由的品质，直到现在也没有在新近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思考中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在左翼思想中，社会主义概念也已深陷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框架而不能自拔，尽管在科学社会主义观念得以形成的生产力水平上，该框架曾经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时至今日它至少是有待商榷的。如今，我们必须尝试着讨论和界定——不设任何限制，甚至它看起来很荒谬——作为自由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现存社会之间的质的差异。严格说来，如果我们现在要找一个可以指明社会主义社会中质的差异的观点，那么至少对我来说，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审美—爱欲的维度。这里的“审美”概念采取的是它的本义，即作为感官的感受性形式与作为具体的人类生活世界的形式。如此来理解的话，可以说，这个概念生动地表现了技术和艺术的融合以及工作和游戏的融合。傅立叶的著作在左翼先锋知识分子内部再次变成了话题，这一点毫不奇怪。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意识到的那样，傅立叶是唯一把自由社会与不自由社会之间的质的差异弄清楚的人。他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因恐惧而避免谈论这样一个可能的社会——在此，工  
[254]  
作成了游戏，甚至是社会必要劳动也能够与人的解放了的、真正的需求和谐共处。

最后，请允许我做一個更深入的评论。我已经指出，如果源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不希望止步于仅仅是改善现存状况，那么它自身就必须包容那些在此粗略提及的自由的极端可能性，承受对质的差异的诽谤。马克思主义必

须冒险以使人们觉醒并意识到自由无论在哪都还未实现的方式来界定自由。并且正是因为所谓的乌托邦的可能性并非是乌托邦的，而是对存在的规定了的社会历史的否定，所以如果我们想使我们自己以及其他人意识到这些可能性，意识到阻碍、拒绝这些可能性的力量，那么我们就应该进行一场非常现实的、非常务实的反对运动。反对运动不仅要摆脱所有幻想，而且还要摆脱所有失败主义，因为失败主义纯粹就是为了维持现状而背弃自由的可能性。

**提问者：**你在何种程度上认为当前英语国家爆发的运动是一种审美—爱欲的生活方式的积极的起点？

**马尔库塞：**你可能听说过不少对我的谴责，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据说我曾断言当今的学生抵抗运动本身就能带来革命。再就是，据说对于那些我们在美国称其为嬉皮士而你们称其为浪荡公子（Gammer）、“垮掉的一代”的人，我也曾断言他们就是新的革命阶级。我绝对没有做过这样的断言。我想要表达的乃是如今在社会中确实有这样的趋势，即无秩序无组织的自发趋势，它预示着要与压抑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需求全面决裂。你所提到的团体正是一个体系内部发生崩溃的国家所具有的特征，它仅仅是一种现象，并不是什么革命性的力量，但也许它会在某个时候与别的更强大的客观力量建立联系，从而发挥它的作用。

**提问者：**你说过在技术层面，革命性变革所需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已具备。然而在你的演讲中，你所谈论的似乎是“乌托邦”所需的力量，而不是变革本身所需的力量。你并没有真正地解答这个问题。

**马尔库塞：**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很有必要举行另一场讲座，这里只谈几点：我之所以过于强调需求概念、对于质的差异概念，是因为这与变革问题有很大的关联。阻止变革的一个主要因素——事实上很多年前就已经提了出来——是缺少对变革的需求，或说需求受到了压抑，而这种需求必须表现为那些进行变革的社会团体中的质的差异的因素。如果马克思将无产阶级视为革命阶级，那么他也会这么认为，或许还会更看重该因素，因为无产

阶级不受资本主义社会压抑性需求的束缚，因为自由的新需求能够在无产阶级中发展起来并且不被旧有占统治地位的需求所扼杀。如今，在大部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情况已不再如此。工人阶级已经不再代表对现存需求的否定。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最严峻的事实之一。就变革的力量本身而言，无须进一步讨论我也同意你的看法，即在今天没有人能够对它们做出规定，没有人敢说：“革命力量已经准备就绪，它们是如此强而有力，革命必定成功。”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指出哪些力量有彻底改变体系的潜能。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内部的阶级矛盾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首先，一方面是生产力以及社会福利的空前发展；而另一方面，对这些生产力的破坏性、压抑性的应用也是空前的，如今这个一般性的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尖锐。其次，在当今的全球性框架内，资本主义面临着反资本主义力量的挑战，后者已在世界不同地方向资本主义公开宣战。最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内部同样有否定性的力量，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在此我要毫不犹豫地重提一下知识分子尤其是学生们的反抗。

我们如今应该对学生运动予以关注，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点历史知识就会知道，由学生引发一场彻底的历史变革，这在历史上已有先例。这并非只在欧洲发生过，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发生过。当今学生所扮演的角色也许比以往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甚至是现存社会也会在他们当中招募领导者和管理者。此外还有对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观采取敌对态度的道德一性反叛，作为一个消除一体化的因素，正如我们从它所引起的反响看到的那样，尤其是在美国，它必定会受到重视。最后，也许我们还要算上那些在欧洲还没有成为一体化进程的猎物的工人阶级。以上就是变革的潜在力量，对它们的机遇、力量等方面进行细致的评估显然将是另一场更漫长的探讨的主题。

**提问者：**我的问题是，你所说的新人类学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以及在被你解释为具有历史可变性的需求结构的框架中，那些全新的生物需求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这如何区别于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在他的晚期著述

[256] 中认为自由王国只能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这可能意味着一个自由的人类社会只能在自然史的框架内建立起来，不能脱离此框架，也不能超越必然王国。在你倡导新的生物需求，例如一种新的未受过压抑的对自由、幸福的迫切需求时，你的意思是人的生理结构的质变源于他的自然史吗？你认为如今有这样一种质的可能性吗？

**马尔库塞：**如果你是问，是否通过人类的自然史的一次变革，我说过的新需求就能够出现的话，那么我的回答就是肯定的。人的天性——尽管马克思强调必然王国，但他知道人是有天性的——是被历史地决定了的，并在历史中获得了发展。人的自然史当然会继续。现在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已经彻底地改变了，而当异化劳动能够被完美的技术手段消除，并且大部分社会必要劳动变成了技术试验时，必然王国将成为一个不同的王国。到那时，必然王国将切实地发生改变，我们也许就能够把自由的人类存在的品质看作是在劳动领域自身内部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不得不为其指定劳动之外的领域。

**提问者：**如果说对自由和幸福的迫切需求是一种生物需求，那么它是如何物质化呢？

**马尔库塞：**“物质层面的可转化性”，你是不是想说：这种需求是怎么影响到社会生产，甚至最终影响到生理结构本身的？它通过构建平静的环境来发挥作用。当我说要消除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恐怖时，我就是在试着指出这一点。我想说的是这样一个环境，它本身具有崭新的、平静的特征，这就为这些新需求提供了空间，使它们能够实现在物质上甚至在生理上的转化，这种转化通过人的天性的持续变革来实现，也就是说，通过减少如今以可怕的方式展现出来的那些特性：野蛮、残忍、虚假的英雄主义、虚假的大男子主义、不惜一切代价的竞争。这些同时也是生理现象。

**提问者：**特定的无政府主义战略的恢复与经济之外凶残的暴力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后者在今天已经内化成了一种直接的经济力量，我的意思是操控的代理人已知道如何把官僚和政府的支配机制内化。

**马尔库塞：**但这并非是暴力的内化。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哪些方面正变得越来越明显，那肯定就是纯粹外在暴力即完全旧式的暴力已变得空前强大。我根本没有看到有任何内化。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一事实，即控制越来越不通过暴力来实现了。没有人强迫我花好几个小时坐在我的电视机前，也没有人强迫我去读那愚蠢的报纸。

**提问者：**对此我要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内化恰恰意味着可能有一种虚幻的自由——正如在古典资本主义中，经济力量的内化意味着政治和道德结构可能实现自由化那样。

[257]

**马尔库塞：**在我看来这只是对概念做了过度的延伸。暴力就是暴力，说体系所提供的一些东西是虚幻的自由，例如电视，但事实上我可以随时关掉它，这并非虚幻，我认为这和暴力的维度无关。如果按你的说法，那么就会使当今社会的一些决定性因素变得难以区分，也就难以区分恐怖与极权主义的民主，而后者的运作并不涉及恐怖，而是涉及内化、涉及协调机制：这并不是暴力。当一个人用棍敲打另一个人的头，或者威胁要这么做时，暴力才产生。电视节目将现存事物的状态经过美化或丑化之后呈现给我，这并不能说是暴力。

**提问者：**对新的在历史和生物层面结构完全不同的需求的规划，与那些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用小资产阶级的道德来斥责其为**失去社会地位的**（*déclassé*）的团体的复兴战略之间是否有某种关联？

**马尔库塞：**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失去社会地位的**团体做出区分。据我所知，至今**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和小资产阶级一点也没有成为比以前更激进的力量。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知识分子所发挥的作用非常不同。

**提问者：**但难道你不认为学生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失去社会地位的**群体吗？

**马尔库塞：**不。

**提问者：**在成熟的生产力条件下，是否还有可能或者还能有效地谈论

“必然性”、必然的客观规律甚至社会发展趋势？是否必须把主体性所扮演的角色彻底地重构和重估为当前时期的一个新的有可能使无政府主义的重现获得合法性的因素？

**马尔库塞：**我认为对主观因素进行重新评估和界定，是当前情势下最具决定性的必要举措之一。我们越是强调自由社会所需的物质的、技术的以及科学的生产力已经具备，我们就越要去解放这些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意识。因为向意识灌输反对这些可能性的教化，正是现存社会的特有状况和主观因素。我确实把意识的发展、把发展意识的工作——你们也可以称之为唯心主义的背离——视为当今唯物主义即革命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我特别强调的需求和需要和你们所说的主观因素意义完全相同。

[258] 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揭示和解放那些想要革命的人，他们必须革命否则就会垮掉。这就是主观因素，而如今它已不仅仅是一个主观因素。另一方面自然就是客观因素，即组织，这里我想做一下修正。我所说的既定社会为对抗其自身潜能所做的全面动员，现如今已是空前地强大而有影响力。一方面我们发现了首先解放意识的绝对必要性；而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我们面前矗立着集权，与此相对，甚至是最自由的意识也显得可笑而无力。两方面的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尖锐。一方面意识的解放是必要的，而另一方面也有必要去尝试每一种有望打破现存社会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的可能性。例如在美国，之所以能够有相对自由的意识，只是因为它没什么影响。

**提问者：**你认为是社会变革动力的那些新的需求将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宗主国的特权？它们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技术和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你是否认为贫穷国的革命中也有这些需求，例如中国或古巴的革命？

**马尔库塞：**在现存社会的两极，即高度发达的地区与致力于解放斗争的第三世界，我看到它们都趋向于这些新需求。事实上我们在此也一再地看到一种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已有清晰表述的现象，即正是那些“远离”资本主义体系可疑福祉的人，才会发展出能够招致自由社会的新需求。例如，越南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就不需要从外面把和平的需求移植到自己身上，他们自身



有对和平的需求。他们同样有抵抗侵略、保卫生命的需求。这些需求与既定社会完全对立，它们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是自然需求；它们是自发的。在相反的一极，即在高度发达的社会，正是那些少数派团体有能力带来新的需求，或者即使他们没有这种能力，但他们至少拥有这些需求，否则他们就会在生理上窒息而亡。现在让我回过头来说“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运动。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即简单地拒绝享用“富裕社会”的恩泽。这是需求自身发生了质变。对更好的家庭影院、更好的汽车以及各种舒适用品的需求都被抛弃了。确切地说，我们看到的是对这种需求的否定。“我们不想和这些废物扯上一丁点关系。”因此，在两极都有潜力。

**提问者：**如果一个不同质的社会已经有了其客观基础，那么为何还要花这么大力气去强调在现在和未来之间要有一次彻底的决裂？这个过渡难道必定不能通过调解来实现吗？这种彻底决裂的观念难道不与架起一座跨越鸿沟的桥梁的具体努力相矛盾吗？

**马尔库塞：**我要为自己辩护的是：我认为我并没有提倡一种决裂。不如说，当我观察局势时，我只能将自由社会定义为对现存社会的有规定的否定。但人们不能认为规定的否定最终仅仅是装在新瓶子里的旧酒。这就是为什么我主要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去强调决裂。我不认为这里有前后矛盾的地方。我要和你讨论的，正是在你的提问之中所隐含的问题，即这一决裂如何发生以及随后如何产生解放的新需求。你当然可以问，我也经常这么问自己，既然整个社会在反对这种新需求的出现，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设想这些新观点会在此时此地的人们中间形成呢？这是我们要去解答的问题。这同时也意味着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新需求的兴起能否被设想为是对现有需求的一种激进的发展，或者说是否有必要以一种专政——无论如何它都迥然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换言之，它是一种反行政机构的专政，将消灭由既定行政机构所散布的恐怖——来解放这些需求。这是最令我感到不安的事情之一，我们应予以严肃讨论。

[259]

**提问者：**抛开借助地下亚文化来脱离体系的选择不谈，如何可能在体系

内从事异端活动，效仿异端的医学，不仅能够治疗人们、恢复他们的劳动力，而且能够让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劳动是如何使他们生病的、意识到他们如何能够参与一种有着质的不同的劳动？

**马尔库塞：**关于你所谓的异端元素是否以及如何能够在既定体系中获得发展这个问题，我要说的是：在既定社会中依然存在着沟壑和缝隙，在其中可以实践异端的方法，而无须毫无意义的牺牲便可推动事业的发展。这很有可能。弗洛伊德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精神分析确实应该使所有病人变为革命者。但不幸的是这并没有奏效，因为人们不得不在现状的框架内实践。精神分析不得不处理这一矛盾，并且不得不脱离医学以外的可能性。如今仍有精神分析家至少尽可能地保持着对于精神分析的激进要素的忠诚。在法律体系中，例如还有相当多的律师以一种异端的方式工作，即反对当权派，保护那些受指控的、被当权派驱逐的人，而他们的实践并没有因此而变得不可能。

既定社会中的缝隙仍然敞开着，而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竭尽全力地利用这些缝隙。

[260] **提问者：**难道越共中出现的那种需求与你所谓的那种感受性不冲突吗？它们是否会不相容？人们是否不得不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

**马尔库塞：**第一种趋势指出，人的新形象来源于对第三世界的斗争的声援。那些出现在发达工业国家的新需求，在第三世界根本不新颖，而是人在对付眼下发生的事情时的自发反应。

**提问者：**在我看来，那些决定社会革命运动的需求似乎都已非常陈旧。工业化需要规章制度。而把规章制度与审美意义上的爱欲混在一起，是不是太奢侈了？

**马尔库塞：**但是对自由的需求可不是只有宗主国才能提供的奢侈品。对自由的需求作为一种旧的需求自发地出现在了社会革命中，而在资本主义世界却遭到了扼杀。例如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由于社会运行相对平稳，因此从一开始革命的想法就显得很疯狂。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我们想要的任何东

西。但我们这里的目标是去转变意志本身，以使人们不再想要他们现在想要的东西。因此，在宗主国的任务和在越南的任务不同——但这两者可以联系起来。

**提问者：**支配的技术手段会削弱支配，这个命题是否意味着官僚机构或行政部门自身受到了自身的挑衅，而它必定长期受到挑衅，作为使人们理解这一官僚机构的矛盾和无用性的学习过程？或者说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应去挑衅它，因为法西斯的恐怖威胁将斩除一切变革的可能性？

**马尔库塞：**肯定不是后者，因为现状自身必定会被危及。人们不能以激进行动会危及现状为理由来反对采取激进行动的必要性。对于支配的技术手段，如果我们彻底考虑清楚了技术过程的目的，那么我们会发现它们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相容的。换句话说，以必要剥削和异化劳动为基础的支配，正潜在地丧失这一基础。如果在生产过程中对体力劳动的剥削不再必要了，那么这种支配的状况也就被削弱了。

**提问者：**你是说劳动应被彻底废除，或者是应从苦难中解脱出来吗？

**马尔库塞：**我在“废除劳动”和“废除异化劳动”这两个术语间摇摆不定，因为劳动和异化劳动的用法已经变得一致了。这就是我的表述模棱两可的理由。我认为劳动本身是不能被废除的。如果要肯定相反的论点，事实上就意味着要拒绝接受马克思所谓的人与自然的代谢交换。通过劳动来控制、征服和改变自然，改造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按照乌托邦式的假设，劳动将完全不同于我们所了解或者我们一般设想的劳动，劳动与游戏融合在一起的观念完全有其实现的可能性。

[261]

**提问者：**难道不是在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憎恨到了不顾人道主义原则的时候，革命变具体的吗？可以在革命期间还是说只能革命结束后才能消除这种具体化呢？

**马尔库塞：**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一方面，我认为人们必须承认仇恨剥削和压迫本身就是一种有人性的、人道主义的要素。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在革命运动期间会产生仇恨，革命没有它是不可能的，解放没有它是不可能

的。在一个憎恨被彻底制度化了的世界里，最可怕的训诫就是“不要憎恨你的敌人”。在革命运动期间，这种仇恨自然而然地就会转变为残忍、暴虐和恐怖。两者间的分界线变幻莫测。对此我唯一能说的就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要尽可能地阻止事态这样发展，即向人们指出残忍和暴虐也必然属于压抑性的体系，而解放斗争并不需要把仇恨完全变成残忍和暴虐。人们可以打击敌人，可以战胜敌人，但人们无须剪掉敌人的耳朵，无须切断敌人的四肢，无须折磨敌人。

**提问者：**你的和谐社会理想似乎并不包括宽容和多元性。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谁来决定公益事务呢？那里就没有任何对抗了吗？这种理想是不现实的，并且如果那里没有宽容来消除敌意，那么它将是不民主的，它将需要专政。

**马尔库塞：**一个自由社会没有宽容是不可思议的，同样一个自由社会也不需要宽容，它完全是自由的，以至于宽容不需要被宣扬、不需要被制度化。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只是一个乌托邦理念，但我认为，一个社会虽然存在冲突却可以不通过压迫和暴行就能得到解决，这不是一个乌托邦理念。关于“民主”这个概念，它当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给出临时回应，那么我要说的是我比此时在座的任何一位都更加支持民主。我拒绝的理由是，民主不存在于现有的任何一个社会，显然也不存在于那些自称是民主的社会。我们有的只是一种非常有限的、虚幻的、被不平等层层包围的民主形式，而真正民主的状态还有待创造。关于专政问题，我想说的是，我无法想象一个近乎完全受教条灌输、几乎处处存在着妥协的国家能够以一种进化的方式转向它的反面。在我看来，不可避免的是，必须以某种方式介入，必须以某种方式来压制压迫者，因为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不会压制自身。

[262]

**提问者：**在我看来，今天你的报告的中心思想是社会变革必须以需求变革为先导。但我却认为我们只有首先废除了那些使需求如此产生的机制，改变了的需求才能诞生。我认为你更像是在讲启蒙而不是革命。

**马尔库塞：**很不幸你指出的正是这其中最为困难的问题。你反对的理由是，为了使新的、革命的需求发展起来，必须废除掉那些再生产旧的需求的机制。而为了废除这些机制，就必须先要对废除它们有所需求。这就是我们所身处的循环，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摆脱它。

**提问者：**如何能够把虚假的和真正的乌托邦区分开来？例如，对支配的废除是否会由于社会未发展成熟而无法实现，或者因为这种废除在生物意义上是不可能的而无法实现？如果有人相信后者，那么你要如何向他证明他是错的？

**马尔库塞：**如果能够证明废除支配在生物意义上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会说废除支配的观念就是一个乌托邦。我认为至今尚未有人做出这一证明。也许摆脱任何形式的压抑在生物意义上是不可能的。这种压抑可能是自我强加的，也可能是被他人强加的。但这和支配不是一回事。马克思的理论，甚至远在它之前的理论，早已对理性权威和支配做了区分。例如，飞机驾驶员的权威就是一种理性权威。很难想象会有乘客告诉驾驶员该如何操作。交警则是另一个关于理性权威的典型例子。这些大概都是生物的必需品，但政治支配、建立在剥削和压迫基础上的支配则不是。

**提问者：**在当今发达的工业和官僚机构部门中，在科学家、技术人员等中间已经出现了一种整合工作和游戏的异化形式——比如，规划和战略游戏、游戏理论以及对科幻的应用。你认为这类活动在何种程度上如瑟奇·马里特所指出的那样，能够变成权力结构内部的拒绝？

**马尔库塞：**我不同意马里特对技术人员的评价的理由是，我认为这个群体恰好是在当今体系内获得最高收益和回报的那些人。要使你刚刚所说的成为可能，就不仅要对意识，而且要对整个状况进行一场全面变革。我反对的另一个理由是，只要我们仍孤立地将这个群体视为潜在的革命力量，那么我们就只是完成了一场技术革命，即由发达资本主义变成了技术国家资本主义，但这显然不是我们所说的自由社会。

**提问者：**就新的关于人的理论，我想问的是，对和平、自由和幸福的需

求如何被具体地转化成生物的、身体的需求？

**马尔库塞：**我要说的是，对和平的需求作为生物意义上的迫切需求没必要物质化，因为在此意义上它已经是一种物质需求了。例如，对和平的需求将以不可能动员人们服兵役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并不是把对和平的需求物质化了，而是它本身就是一种物质需求。这也同样适用于我所提到的其他需求。

**提问者：**回到质的断裂的问题。它似乎预设了一场危机，而实际上也确实有一场危机。不过，我们怎么知道危机在何时发展到断裂的临界点？或者这场危机是否会转变成断裂？少数人如何能够意识到对社会进行何种干预才有可能使乌托邦不受阻碍？

**马尔库塞：**从某些象征性的事实和事件——某种程度上是体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中我看到危机正在扩大。例如，越南战争的被迫结束就表明现存社会的危机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大。

**提问者：**就新的关于人的理论的问题，我想说的是，这种新的理论早已在第三世界找到了它的支持者，即法农（Fanon），他说“目标就是要在世界上培育出全面的人”，还有格瓦拉（Guevara），他说“我们正在培养 21 世纪的人”。但我想问的是，你是如何把新的关于人的理论的想法与这两个声明联系起来的？

**马尔库塞：**我本不想冒险来说这个，但既然你提出来了，并且你似乎对此有所了解，那么我现在可以说，尽管我在刚才没有提及，但其实我认为至少在第三世界的某些解放斗争中，甚至在第三世界的某些发展方式中，这种新的关于人的理论将得到证实。我在一篇关于北越的报告中读到了法农和格瓦拉，作为一个彻底无可救药的、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者，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因此我不会用这么简短的篇幅来谈论他们。那份报告极为详细，其中讲到，在河内的公园里，长椅只够两个人来坐，这样一来，别人甚至在技术上都没有打扰他们的可能性了。

## 马尔库塞与彼得·梅塞堡之间的讨论<sup>①</sup>

[264]

由北德意志广播电台于 1967 年 10 月 23 日的  
“全景”栏目播出

**梅塞堡：**女士们和先生们，令人遗憾的是，正如一名国会议员上周末在巴德迪尔克海姆（Bad Dürkheim）所声称的那样，越南战争不仅仅驱使闹事者和暴徒走上了街头。因为在对这场战争的谴责中，政治信仰极为相同的人走到了一起。公开表态的民主党人、保守的戴高乐主义者、反战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变成了同一阵营。在美国和德国的大学中，反对越南战争已成了所谓“新左派”运动的具体表现。马尔库塞正是这些青年激进分子的先知之一，是这个“新左派”的理论家之一。

---

<sup>①</sup> 《马尔库塞与彼得·梅塞堡之间的讨论》最初以德文出版，参见“Gesprach mit Peter Merseburger: Herbert Marcuse und die prophetische Tradition”，in *Weltfrieden und Revolution*, ed. Hans-Eckehard Bahr, Hamburg: Rowohlt, 1968, pp.291-307。这是一份抄本，内容是一场由德国电台播放的讨论节目，这一广播名为“北德意志广播电台全景栏目”（*Penorama Sendung des NDR*），播出时间为 1967 年 10 月 23 日。梅塞堡开篇以大量篇幅回顾了马尔库塞的生平和工作，随后主要从政治方面询问马尔库塞如何看待一个解放了的社会，询问他的工作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及苏联共产主义有什么关联，还询问了关于新左派和暴力的问题。马尔库塞明确地捍卫了自己的观点，并对那些说他鼓吹恐怖和暴力的指控做了反驳。——编者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毋庸置疑扮演了先知的角色。先知构想了一个不建立在强迫和暴力基础上的新的、自由的社会。通向这个社会的道路一直以来被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所阻隔。马尔库塞也认为这种对立造成了不自由，他说我们都生活在这种不自由之中。这是今天特有的状况，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种“舒适的、无摩擦的、合理的民主的不自由”。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开始与马尔库塞讨论之前，我将尝试着简要地为你们做些说明。

[265] 这意味着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机制——马尔库塞称其为体系——已变得非常灵活，以至于旧的阶级对立已不再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变革的媒介。因为当今资本主义体系能够生产出大量的东西，几乎能够使所有的需求都得到满足。这使那些原本渴望对原则进行变革的反对力量，已经不再从原则上质疑体系。因而反对行动就收缩成了对不同政治实践的讨论，或者如马尔库塞所说，收缩成了在现状范围内的不同的政治实践。用马尔库塞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反对派是在为稳定体系效力。

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据马尔库塞所说，整个体系完全按照理性来生产，但它却是极其非理性的，它本身极其不合理，因为它生产出大量的需求，目的只是为了保持生产部门持续运行。将目光放到全球，人们会发现闻所未闻的不幸和闻所未闻的财富、浪费同时存在，会发现闻所未闻的生产力的可能性和闻所未闻的破坏的可能性同时存在。

如果根据其关键词来概括的话，人们可以大致构想一下马尔库塞的计划：他倡导的是一种脱离经济力量控制的、脱离经济体系的自由，以取代经济自由，在他看来，当今经济体系按照自身的法则而不是理性的人的法则来运行。为了实现该自由，马尔库塞认为首先要有一种对精神自由的需求。他认为该自由是必需的，这样一来，如今主要被大众传媒和大众教育阻碍了的独立思考才会再度成为可能。他曾以一种夸张的方式把这一要求表述成了消灭舆论及其生产者。女士们、先生们，正是从这里，激进的学生们收集到了他们的行动所需要的意识形态资源，而他们的这些行动并不仅仅是针对一个



有实力的德国出版商。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他给新左派推荐了哪些战略？在新左派和旧的极左分子之间又有什么区别？

马尔库塞现已 69 岁，他出身于柏林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战争使他成了一名革命者。1918 年，他是柏林莱尼肯多夫区士兵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在魏玛共和国期间，他先是与罗莎·卢森堡意气相投，随后又与所有他认为毫不妥协地忠于革命事业的人交好。1932 年 12 月，他便认定魏玛民主终将覆灭，并于 1934 年前往纽约。他在 1941 年就心理战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建议。现在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圣迭戈分校讲授哲学。

像马克思一样，马尔库塞梦寐以求的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暴力的新世界。马尔库塞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对他那美丽的新世界来说，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马尔库塞：**为此必须形成一种拥有新的价值尺度、新的评价标准和新的目标的新人类。因此不能满足于继续沿着同样的路子去发展现存的技术生产力及其他生产力。真正需要的是断裂，以及重估价值。

[266]

**梅塞堡：**在冲向这个美丽新世界的路途上，共产主义式的极权主义体系是否在起跑线上有优势？

**马尔库塞：**当下看来并非如此。但我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共产主义是有计划的，抵抗力量也并未发生基础性的改变。这就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那些今天自称是往不同方向走的社会主义者带来了可能性。但仍然需要有一场政治革命。

**梅塞堡：**在柏林你曾说过，共产主义所创造的极权主义体系必须接受左派的攻击。这是什么意思？

**马尔库塞：**意思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预设即对生产资料的计划和国有化无论如何不应被抛弃。不过，有必要在争取完全控制这些生产力的同时争取民主参与——但要实现这种民主，只有等到我刚才说过的一种新人类、新目标和新价值发挥作用之后。

**梅塞堡：**但事实上，新左派难道不是在西方体系中有更好的机会，尽管可能同样糟糕，但至少可以进行正式的反对活动，可以印刷任何攻击体系的东西吗？而这些在东方却很难做到。

**马尔库塞：**你对出版状况的看法有点过于乐观。上帝知道，比如，我们不可以说美国的出版社会印刷所有对反对派而言本质性的东西。

**梅塞堡：**但是你的书出版了。

**马尔库塞：**我的书出版……

**梅塞堡：**你可以自由地说话。

**马尔库塞：**……我可以自由地说话。我凭自身资历和受教育程度获得了特权地位。我被允许做这一切，是因为这一切相对无害或总的来说无害。但是人们不应低估这一事实，例如那些没那么幸运的人连找一份工作都极为困难。

**梅塞堡：**但在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体系中，你将没法做上述的任何一件事。你怎么设想一场由左派发起的革命呢？

**马尔库塞：**在西方？

**梅塞堡：**在东方。

**马尔库塞：**我最多只能这样来设想，即当能够推行与现有政策相反的和平政策以及我所谓的重新设定价值的政策的人当权之后才有可能。毕竟我们已经看够了俄罗斯的政权更迭。为什么人们不能沿着这个方向去设想一次政权更迭呢？

[267] **梅塞堡：**你曾说过对于老马克思主义者、资深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新左派就是一场噩梦。但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又说在目标的设定方面，老左派和新左派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差异。

**马尔库塞：**是的，它们最大的差异在于，新左派不再认为马克思称之为无产阶级的产业工人是革命的社会阶级。此外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差异在于，比起传统定义，新左派希望在社会主义中能有更多不同的东西。

**梅塞堡：**希望能有更多什么？

**马尔库塞：**如果让我说的话，那就是希望人际关系能够有质的不同，希望制度有质的不同。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优势并不在于能生产更多的产品，也就是说不在于更为合理地生产。相反，它意味着那里能够产生拥有新品质的真正的人际关系，即自由的人际关系。它意味着生存斗争、国家和国际范围内的竞争已不再有必要。它意味着马克思曾说过的消灭劳动——即消灭不再必要的劳动、消灭异化劳动——事实上已被提上了日程。

**梅塞堡：**如果已经不存在革命阶级了，那么新左派将从何处获得支持呢？

**马尔库塞：**当今新左派确实只能依赖于这一事实，即发达工业社会充满了使这样一个具有新质的社会成为可能的精神和物质资源。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仅仅需要的是去实施这一变革——当然，要给“仅仅”打上引号。

**梅塞堡：**但在今天的美国，根据你的理论，左派所能依靠的除了学生反对者以外，剩下的都是边缘群体，例如激进的黑人或是【知识分子】。但这并不足以发动革命吧？

**马尔库塞：**确实这还不够。有人曾误解并指责我在当今知识分子中发现了新的、优秀的革命力量。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正如我试图表明的那样，今天的知识分子是在表达、揭示历史情境中客观存在的东西。黑人运动和那些其他边缘群体则直接或间接地揭露了体系中的断裂和错误。他们削弱了体系，但至于他们自己是不是革命力量，这是一个没办法在今天做出回答的问题。

**梅塞堡：**至少根据新左派的理论研究表明，存在着一个新的工人阶级。我认为你自己也在柏林谈到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用一点时间来回顾你那场演讲。你说他们是在物质生产中占据关键职位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而你自己说过这些人是体系的宠儿……

**马尔库塞：**确实如此……

**梅塞堡：**那么你要怎么把他们带进这场革命呢？

**马尔库塞：**你在这里抓住了一个客观的矛盾，即这些群体是体系的宠儿，他们薪水最高、过得也非常好。他们的科研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和工业的支持。同时，尽管不是在今天，但根据形势的发展，也正是这些人将会在生产过程中占有关键职位，这使他们能够引发变革，只要他们想的话。但矛盾确实存在，我们自然也不能掩盖它。

**梅塞堡：**你在柏林的演讲中说过，宣扬完全非暴力只会助长现存力量，而它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压制的力量。这难道不意味着，在具体地面对美国的现状时，你实际上是在建议黑人诉诸暴力？

**马尔库塞：**今天黑人在美国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任何建议；甚至不需要任何特意组织的宣传工作。它仅仅是反抗现状、反抗变得难以忍受的境遇的一次起义。迄今为止这都是一场自发的运动。你也知道，最近有人试图给这一运动树立政治领袖，但我们仍看不到有多少黑人或其他少数派愿意追随这一新的领导。

**梅塞堡：**但你在原则上是肯定这种可以将压抑性社会从某些压抑中解放出来的积极的恐怖活动的。

**马尔库塞：**我不会称之为恐怖活动。我支持能够减轻甚至中止现存恐怖和现存压抑的一切运动、一切可能性。

**梅塞堡：**如果必要的话，甚至用恐怖手段？

**马尔库塞：**是的，如果必要的话。但是人们必须非常精确地定义“必要”[一词]意味着什么。不难发现我很容易就会落入陷阱。不过我也并不想避免。有一种革命的恐怖活动：它在任何一场革命中都存在；它在美国的革命中存在，在法国和英国的革命中也存在。这种恐怖活动无论如何与残酷、野蛮、折磨或对无辜者的杀戮都相去甚远。

**梅塞堡：**法国革命的恐怖活动在何种意义上是积极的？

**马尔库塞：**说法国革命中的恐怖活动是积极的，只是因为它确实触及了那些为复辟君主制而四处奔走的人。

**梅塞堡：**一旦革命吞噬了自己的成果……

**马尔库塞：**一旦革命吞噬了的成果，那么它就会真的开始成为一场残忍的恐怖活动。

**梅塞堡：**发展中国家在新左派的理论和战略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我相信你曾经也指出过，不发达国家的农业无产阶级和处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体系的反对者有可能结盟。

[269]

**马尔库塞：**没错。在我看来，这样一种结盟必不可少，并且在本质上建立在共同的利益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的解放战线同样是为了消灭无法忍受的生活状况而斗争，这和最发达工业国家中黑人与其他少数派的所作所为并无二致。换句话说，这并非是一个人为的或政治的联盟，而是产生于共同利益的联盟。不过，现在还不存在任何有效的组织上的联系。我们仅仅是看到了端倪。

**梅塞堡：**但具体地应用于美国的情况的话，那不就意味着激进的黑人领袖不得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玻利维亚深山老林中的游击队结盟吗？

**马尔库塞：**建立联系，努力去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共同战略，或者至少——如果你不喜欢理论这个词——对全球局势形成共同的评价，这对我来说似乎再自然不过了。那么，例如，做到这点的黑人领袖，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是依历史状况行事。

**梅塞堡：**这表明新社会可能实现的景象，正是因为这样的盟约，尽管它还遥不可及。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的理论，它谈到世界农村要站起来对抗世界城市，也就是说，新兴的欠发达国家不仅要站起来对抗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对抗苏联这样的国家。结果是，这个理论从现在来看还不错，并且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你怎么看待毛泽东？

**马尔库塞：**现在你想把我和毛泽东联系起来。总的来说，我并不在意。中国革命领袖，无论他可能做什么，他都是这个世界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你所提到的理论，我认为有些地方需要再斟酌一下。因为它低估了发达工业国家本身所必须发挥的作用。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异议和局限，我依然认为马克思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如果变革没有发生在最发达的工业国家，那么来

自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所有攻击、所有力量，都会变得毫无效用。它们能够起到加快进程的作用，但在我看来，真正的变革仍然依靠工业国家的变革。

## 马尔库塞：新左派哲学家<sup>①</sup>

[270]

(KCET 电台, 1968 年 5 月)

**汤姆·佩蒂特 (旁白):** 马尔库塞, 虽然几乎不被普通大众所知, 但却深刻影响到了世界各地的学生抗议运动。他是新左派哲学家。

**马尔库塞:** 但我并不拒绝对暴力做道德评判。我只是认为, 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对暴力做道德评判。你必须告诉我是哪一种暴力, 它发生在何处、为何而发生。

---

① 《马尔库塞：新左派哲学家》是一份之前未曾出版过的长达 10 页的访谈记录。1968 年 5 月汤姆·佩蒂特 (Tom Pettit) 在南加利福尼亚 KCET 公共电视台对马尔库塞做了这场访谈。这个访谈是另一个很好的例证, 它可以说明甚至是当时的自由媒体也诬陷马尔库塞是一个边缘的革命激进主义者, 指责他煽动了不可估量的对抗国家的暴力活动。对于那些说的他的思想和政治观点助长了暴力的看法, 就像采访人汤姆·佩蒂特所讥讽的“在你看来, 以暴制暴是可以的”, 马尔库塞则给出了他最为坦率的回应。马尔库塞驳斥了这种对宽容和暴力的自由主义式的肤浅理解, 马尔库塞争辩道: “这不是一个它是否可以的问题。这是一个它在何时何地有必要的问题。为了使你自己和你所拥护的东西得以存续, 它是必要的。”佩蒂特以“哎呀, 我终于听到你承认了。有时候……”所做的简单回应, 被马尔库塞的陈述打断了, 他讲道: “你并没有听到, 因为你永远不会明白我说的话。不是因为我害怕, 而是因为我想说实话。你永远听不到我说我提倡暴力。”这次访谈就像前一次那样都表明马尔库塞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有能力去彻底驳斥那些对他的著述和政治观点所做的懒惰的、误导性的解读。——编者注

**佩蒂特（旁白）：**马尔库塞教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讲授哲学。他那些论述了现代人在当今西方社会倍感挫败的著作在欧洲尤为受欢迎。生于德国的马尔库塞深受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影响，1968年，他的人生观变得激进而悲观起来。

**马尔库塞：**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佩蒂特：**为什么你这么悲观？难道我们不是比1910年、1900年的人们生活得更好吗？今天的生活不是更好吗？人们不是更健康吗？不是更长寿吗？

**马尔库塞：**如果你能告诉我“我们”指的是谁，我就能够回答得更加明确了。但现在请允许我先给出一个一般性的回应。如果你从整体上来看世界，而不是只着眼于今天最富裕、最繁荣的社会，我想我会说人类没有变得更好。

**佩蒂特：**为什么？

**马尔库塞：**好吧，我先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你提到的1910年之后，我们有两个世界大战，受害者数量之多、占比之大史无前例。我们有纳粹集中营，嗯……我们在印度尼西亚有大屠杀。我们有越南战争。我们在美国仍有贫民区，此外正如我想已得到充分阐释的那样，世界上富人和穷人的差距是扩大而不是缩小了。换句话说，穷人实际上正在变得更穷，富人正在变得更富，而后者却给我们觉得，我们在总体上都比以往生活得更好。

**佩蒂特：**学生革命怎么会介入呢？

**马尔库塞：**学生革命之所以介入，完全是因为这些孩子们有非常清楚的意识。或者，我想补充的是，对于所发生的一切，对于他们在之后的人生中所能期待的，他们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无意识的感受；也许，如果他们幸运的话，会找到一份好工作，但这会使他们无法像人一样活着，他们要起早贪黑地工作，而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他们会认为自己的工作是非人的、令人神经崩溃的、庸庸碌碌的，等等。由于看到社会本来有巨大的能力去为自由的人类创造得体的生活条件，所以尽管他们一生会过得舒适、奢华，但



他们又会感到空虚、无意义和痛苦。

**佩蒂特：**似乎有许多人认为应该把学生的能量引向更为传统的方案，并且已经有人高兴地指出，有很多学生已经在为总统候选人——如参议员尤金·麦卡锡或罗伯特·肯尼迪——助选了。你是怎么理解这种学生参与的？

**马尔库塞：**我不知道。我是说，我所认识的学生、与我共事的学生，会认为这是在体制内耗费时间和精力。他们也会强烈地感受到无论是肯尼迪还是麦卡锡都不会真的带来很大的改变，最多会在内政和外交政策方面有所改动和修正。但他们所反对的、他们认为越来越难以忍受的东西却不会有任何改变。

**佩蒂特：**你认为通过执政党来实施改革是浪费时间吗？

**马尔库塞：**这要取决于你的目标。如果你的目标不仅是社会改良——绝非学生运动的总目标——而是整个社会的变革，那么这显然不是一条合适的道路。

**佩蒂特：**那共和党呢？你怎么看待尼克松？

**马尔库塞：**不要问我有关美国竞选政治的问题，因为我甚至会表现得比平常更消极。

**佩蒂特：**啊……这难道不是一个适合讨论的主题……

**马尔库塞：**是，但我不认为它是个很重要的主题……嗯……我可以……嗯……很严肃地告诉你。与当今整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大事相比，这的确显得不那么重要。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看看现在正在法国发生的事，看看现在正在中国发生的事，看看现在正在捷克斯洛伐克、正在越南发生的事，那么是肯尼迪当选还是麦卡锡当选的这个问题，也就无关紧要了。且不说共和党阵营的其他非候选人，我认为，尼克松当选是灾难性的，并且一定会使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变得高度压抑，尽管……你还不能称其为法西斯。

[272]

**佩蒂特：**马尔库塞教授，你怎么看待华盛顿的穷人示威？在那里似乎没有太多年轻人。

**马尔库塞：**是的，那里并没有太多年轻人，而且你已经看到，我认为他

们所采取的方式在今天已经不再奏效了。我的意思是事态已经变得十分糟糕了。我怀疑他们能否真的对国会施加压力，因此，我想说的是，现如今他们看起来很软弱。

**佩蒂特：**你是否认为非暴力，作为行使公民权利的有效方式，已经过时了？

**马尔库塞：**首先，我不认为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其次，你也知道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即暴力会滋生暴力。但非暴力同样会滋生暴力，我想我们对此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以，看上去根本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我的意思是，这个社会充满着暴力，因此你不得不区分防御性的暴力和攻击性的暴力，或区分暴力与以暴制暴。很不幸，无论以何种方式，暴力都没有消失。

**佩蒂特：**噢……难道马丁·路德·金错了？

**马尔库塞：**他没有错，但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即使是他也没办法阻止暴力。暴力还是像往常一样到处存在。他被杀了。这就是暴力。

**佩蒂特：**黑人革命和民权运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再加上学生革命——之间有什么关联？

**马尔库塞：**我认为你只能尝试着在斗志昂扬的少数族群运动和学生运动之间建立联系。我发现他们反对的共同点不仅是社会的丑恶面，还包括整个生活方式。他们要求有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要求有不同的价值、不同的目标而不仅是某种改良。我认为，这种要求上的巨大差异正是他们的共同点。

**佩蒂特：**学生运动是从民权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吗？

**马尔库塞：**是的，我认为学生运动是被民权运动点燃的，因为学生们第一次在行动中看到了美国的民主，至少在南方是这样。随后由于越南战争变得更强烈了。并且，时至今日它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佩蒂特：**国外也这样吗？

**马尔库塞：**国外有很大不同。那里没有危险的冲突。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德国都没有，而这两个国家也没有直接卷入越南战争。

**佩蒂特：**那你怎么解读国外学生运动的兴起呢？

**马尔库塞：**因为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一致的。在德国和法国，学生们都感受到了非常强大的独裁主义的压力，这并没有在专制政府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毋宁说，它是一种标准化的顺从主义的压力，而在学生们看来，这在极其堕落、虚伪的社会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他们很快就受够了这些压力，想要造反。 [273]

**佩蒂特：**捷克斯洛伐克呢？

**马尔库塞：**那里的情况完全不同。我的意思是，那里的人们正在试图摆脱残存的斯大林主义式的压抑，即直接的压抑——一种极其愚蠢的压抑。

**佩蒂特：**你个人对学生有多重要？你怎么评价自己的作用？

**马尔库塞：**我不清楚。我认为我是作为一个人、一个社会政治哲学家来发挥作用的，我一直都在试着理解正在发生的事，试着在不承诺任何意识形态的情况下通过文字来批判我们的社会。此外，我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sup>①</sup>，而这是我一直在试图赋予它的——以一种我认为在今天邪恶的，但却既不服务于社会主义也不服务于其他的任何正统的方式。

**佩蒂特：**你知道那些高呼马克思、毛泽东和马尔库塞的人吗？

**马尔库塞：**我知道，你永远也阻止不了舆论宣传。你也永远无法预测它的走向。我的意思是，众所周知，我是一个马克思研究者。我读过毛泽东的著述。我并不完全清楚我和他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对这些事情我无能为力。但他们提到毛泽东，也许是想指出（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一条非正统的、非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佩蒂特：**那么，教授，在这样一个空前繁荣的国度，怎么有可能产生如此强大的不满现状的力量呢？

**马尔库塞：**我认为正是由于这种繁荣，使得不满极大地传播了开来。因为这种繁荣有意无意间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观念，即这个社会在技术和物质

① 这里的问号在原始记录中已有。——编者注

方面都如此富足，因而有能力创造一种得体的自由人的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这种繁荣却又有意识地向人们展示耗费了、被有计划地浪费了、滥用了多少资源。实施破坏而不是建设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这也带来了一种精神分裂的存在（schizophrenia existence），即不断在这两种体验之间摇摆——一种是对能做些什么的体验，另一种是对社会罪恶的体验，而与此同时，人们还享受着相对舒适、相对从容的社会。

**佩蒂特：**你说什么？难道让大家共同贫困更好吗？

[274] **马尔库塞：**贫穷永远不会更好。永远不会。我说的是，今天我们有大量的生产力被浪费了，被转化成了破坏力，而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割除这些在生产中被滥用的技术因素。

**佩蒂特：**你说的破坏性使用是什么意思？

**马尔库塞：**例如，整个军工业。

**佩蒂特：**好吧，除此之外呢？

**马尔库塞：**例如，计划报废。例如，数不清的牌子被生产了出来，数不清的小玩意被生产了出来，但归根结底它们却是一种东西。各种不同标志的汽车被生产了出来，但归根结底却耗费的时间、能源和资本根本不相称，因为它只是对车型、外观做了些许细微的改良，但却把大量的时间和智力耗费在了对这些东西的宣传上。要是没有这些浪费，毫不夸张地说，就能够有一大笔预算来消除当今世界上的很多贫穷和苦难。我只想指出，我认为在这个社会中，恰恰是由于这种毫无意义的繁荣累积了难以估量的侵略性和破坏性，它们很容易就会爆发出来，而在国际层面上，例如在越南战争中爆发了出来。而在国内，它们爆发的层面完全不同，例如，我们的报刊用语，我们的电视节目中的暴力词汇和图像，等等。

**佩蒂特：**好吧，我发现有一种理论，它在黑人和白人年轻人那里都很流行，说的是暴力不仅是积极的善，而且参与暴力还有益于健康。你同意这种理论吗？

**马尔库塞：**我必须告诉你，我相信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说暴力本

身是好的。暴力留给我所知道的那些孩子和那些人的印象是，它挥之不去。暴力在当权者、在警察那里已经被制度化了。他们迟早不得不面对这种暴力，除非他们的抗议仅仅保持为一种毫无影响的、无害的例行公事。他们已越来越厌烦他们在日趋狭小的民主合法的框架中的等待和工作。但他们确实不喜欢暴力，他们也肯定不会在暴力中获得愉悦。这是一个事实。你必须正视这个事实。

**佩蒂特：**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那种理论会认为暴力对其参与者来说起到了某种救赎的作用。他们可以借此释放自己的挫败感、摆脱他们的体系。这对他们来说是有些好处的。因此，参与暴力有积极的社会效应。

**马尔库塞：**不，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当的、庸俗的心理学解释，因为它忽视了抗议运动的动机和目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你都不能根据个人的挫败感、对父亲的敌意或对母亲的爱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来理解抗议运动。我的意思是，这是对精神分析的一种幼稚的运用，这对于现实的政治事务和个人的真实体验而言，都是不值一提的。

[275]

**佩蒂特：**我发现你对使用暴力的态度有些自相矛盾？

**马尔库塞：**你说的自相矛盾是什么意思？

**佩蒂特：**意思就是你的情感错综复杂。有时候你认为它是好的，有时候又不这么认为。

**马尔库塞：**我认为如果有人是为了暴力而热爱暴力的话，那么这一定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我不知道谁会为了暴力而宣扬暴力。有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是个体极为必要的在暴力面前保护自身。而如果你要在暴力面前保护自身，那么你自己也要变得暴力才行。如果有人在大街上攻击你并试图勒死你，而你想要摆脱那人，那么你就不能对此宽容大度。你要使自己变得暴力。但我们需要区分防守的暴力和进攻的暴力。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主张，我不知道它最初来自美国还是欧洲，但我确实发现它在欧洲的抗议运动中得到了普遍认可：“对物的暴力，可以。对人的暴力，不可以。”在我看来，这个主张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运动参与者的想法。

**佩蒂特：**不过，在巴黎的骚乱中确实有对人的暴力。

**马尔库塞：**以暴制暴。这是我所看到的。学生们是和平有序的，而警察则奉命清场，首先清理索邦大学的走廊，然后再清理大街。你知道，警察的清场可不像是保姆哄孩子睡觉。

**佩蒂特：**在你看来，以暴制暴是可以的。

**马尔库塞：**这不是一个它是否可以的问题。这是一个它在何时何处有必要的问题。为了使你自己和你所拥护的东西得以存续，它是必要的。

**佩蒂特：**哎呀，我终于听到你承认了。有时候……

**马尔库塞：**你并没有听到，因为你永远不会明白我的话。不是因为我害怕，而是因为我想说实话。你永远听不到我说我提倡暴力。如果我那么做了我会如实相告。在这方面我绝不是一个懦夫，但我不认为我能担起提倡暴力的责任，而且我认为我已经在《压抑的宽容》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里写得很清楚了。今天那些走上街头、以自己的头颅甚至生命来冒险、为他们的信仰而抗议的孩子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没有人，至少没有一个教育者有权去告诉他们不要那么做。他们是有风险的。我现在毫无危险地坐在扶手椅上高谈阔论，可以说我没有任何干预的权利。

[276] **佩蒂特：**你怎么看待学生抗议运动的目标。似乎大多数人都感到他们并没有什么建设性的目标。似乎更多的是躁动不安，并且也没有积极的计划。是否有一个我们大多数人都看不到的目标？还是说学生革命的特征之一就是没有单一的目标？

**马尔库塞：**我认为，指责其只有否定性或者太过否定性、不提供任何肯定性，这是一种很容易就能够指控整个抵抗运动的方式。如果你想要改变既定状态，你就不得不首先诉诸否定。这就是说无论它们是什么——这有待阐明——它们都必须改变，都必须被淘汰。这就是否定。而到了选择改变的方式时，必须有一个肯定性的目标。否则情况就会真的如你所说的那样，你所知的一切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破坏既定状态，并且毫不在乎随之而来的是什么。你既不知道随之而来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但学生运动的

情况肯定不是这样。他们十分清楚他们想要什么，并且我认为我们之前已经谈过这一点了。他们想要的是一个不会有计划、有系统地浪费资源，不会不断地创造出野蛮化和道德化的需求和满足的社会，在此，人类可以真正决定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不是以一种非常朦胧的、哲学的方式，而是以真正地使他们能够自由地决定他们工作的方式，决定他们想做什么工作，决定他们想如何去追求、去定义他们的满足。所有的这一切都属于“自由”这个概念，如果没有这些，他们会认为我们的“自由”概念仅仅是革命中的意识形态，此外，我们认为在今天我们的确可以创造出这样的一个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观念彻底瓦解了。

**佩蒂特：**取而代之的是什么？

**马尔库塞：**取而代之的，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发生在巴黎的事件意义极其重大的原因。在开始的时候，学生运动只是局限于大学、局限于急需的大学改革。然后学生们意识到、感觉到大学只是社会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一个方面，因此他们就不再局限于大学，而是把目标对准了整个社会的恶。整个事情都是自发的。组织是有核心的，但无论哪一个领袖都是在斗争过程中赢得声望的。他们不像某些人那样用阴谋诡计来组织运动。接着，运动扩大了，而且没有人知道它是怎样从学生运动变成工人运动的。它再一次与有组织的特别法庭，尤其是那些共产党控制的特别法庭斗争了起来。在法国，共产党控制的总工会，首先就内在地反对罢工和占领，只是因为担心运动会不受控制才做出了让步。

**佩蒂特：**我们还不知道的是……

[277]

**马尔库塞：**一种自发的，而你称其为内燃的。就像发生在法国的情况那样，突然有一天一切都停止了。法国这么多年来一直发展得很好。然而现在，由学生运动点起的星星之火，开始通过占领和其他抗议、反对的方式，让整个国家陷入了瘫痪。这与现有马克思主义的甚至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模式有很大区别。

**佩蒂特：**但是你说了这么多，除了破坏现有体系之外，也没有给出一个

具体的目标。

**马尔库塞：**听着，我必须直白地告诉你——而且我认为我不仅是在为我自己说话——对我们而言，无论你指的是新左派还是我的学生们或者是我个人，或者其他的人，我们想要的是一个不需要在越南发动战争的社会，一个不需要在全球任何角落进行干预、建立或支持腐朽的军事独裁的社会。一个能够向前发展的社会，一个能够消灭贫民区的社会，一个能够将仍活在饥饿中的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人的、人道的水平上的社会。这是一个极其肯定性的目标。我并不觉得它有任何否定性、模糊性或抽象性的地方。不是吗？如果你还是不认可的话，那我也只能放弃了。

**佩蒂特（旁白）：**20世纪30年代逃离纳粹德国的马尔库塞，是政治左派的坦率的支持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拒不承认极右派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在他三年前面世的一篇文章中，他说不能把言论自由和集会的权利赋予他所谓的压抑性运动。他对于要达到他自由观所必须采取的手段的看法确实充满了争议。晚安。



## 人道主义诸变体：马尔库塞对话哈维·惠勒<sup>①</sup>

在东西欧的对峙中，对话能否替代冷战？最近有一群欧洲人和美国人为了探讨其可能性在中心举行了会议。下面的文章有的是提前为会议准备的，有的则是在会议的影响下完成的。

马尔库塞教授，你被认为是在最近的一场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有时候人们把这场运动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首先我想弄清楚的是这个术语是什么意思。它与其他种类的马克思主义有何不同？它与其他种类的人道主义有何不同？

[278]

---

<sup>①</sup> 《人道主义诸变体》，载于 *Center Magazine* 1, 5 (July 1968), pp.12-15。马尔库塞就东方和西方不同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点与《中心杂志》(*Center Magazine*)的工作人员、政治学家哈维·惠勒(Harvey Wheeler)进行了对话。这场对话是《中心杂志》——由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市的民主研究所出版的刊物——的专刊的一部分。惠勒和马尔库塞讨论了美国新左派和欧洲新左派之间的关键差异，还谈到了马尔库塞被赋予的头衔——同时是两个左派的领袖。在这次访谈中，马尔库塞一如既往地反对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也反对一般的人道主义)，并强调马克思不应被划分为“青年”和“老年”两个时期，不应该认为前者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阶段而后者则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马尔库塞在此再次举例指出，《资本论》第1卷的马克思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马克思同样都是人道主义者。——编者注

**马尔库塞：**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术语感到不满。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多余的术语。我不认可这种普遍的趋势，即只阅读马克思的早年著作并只在其中发掘人道主义思想，全然不顾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资本论》和马克思的晚期著作中也确实出现了的事实，也就是说，只是尽可能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解为建立一个没有人对人的剥削或支配的世界。并且由于这个新世界还要求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完全不同的制度以及完全不同的人际关系，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同时也就是革命的理论 and 战略。

**惠勒：**古往今来大概有上千种人道主义，而在其中最为杰出的，我认为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以及更新近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你能够把你心目中的人道主义和这些人道主义区分开来吗？

**马尔库塞：**没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不同的，因为它倡导这样一种存在形式，按照该形式，人们可以决定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他们自己的需求、决定他们自己满足和发展这些需求的方式，并因此作为自由人而存在。这些从根本上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明确地区分开了。

**惠勒：**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有区别，但不一定与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有区别。

**马尔库塞：**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十分有局限性的人道主义。它局限于知识界的精英群体，因为绝大部分人都既无手段也无时间去发展他们的人格；他们都是些从事脏活累活的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能力实现人道主义的理想。

**惠勒：**那么你是不是想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的共同点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中被彻底地民主化了。

**马尔库塞：**是的。彻底地民主化了。

[279] **惠勒：**萨特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想正如他的著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题目所暗示的那样，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不过，

在你看来，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变体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些区别？

**马尔库塞：**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别。首先我认为如今提萨特的这本书有失公允，因为他已经或明或暗地表明他不再持有该立场。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理论上他都已远远地超出了那本书。

**惠勒：**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应该关注这个命题本身所包含的内容，而不是去考虑萨特自己的信仰。

**马尔库塞：**有一种关于存在主义定义人的自由——那是一种可怕的自由——的方式的说法，我表示赞同。萨特思想中最令人反感的一个观念是，人即使在集中营里也可以是自由的，因为人仍然可以通过抗议和被射杀来保持抗拒命运的自由。我认为这是对人的自由的一种讽刺。但萨特在今天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一观点。

**惠勒：**你在很多匪夷所思的地方受到了赞美，比如，《时代》周刊与《生活》周刊。

**马尔库塞：**是的。我对此感到十分忧虑。同时，这也是对我的哲学的一种出色的证明，即在这个社会中所有东西都可以被吸收、被消化。

**惠勒：**而你成了当权派的一员。

**马尔库塞：**没错。我成了当权派的一员，我活该。

**惠勒：**《时代》周刊认为你是欧洲新左派的先知，而众所周知欧洲新左派现在正在起义。欧洲新左派有没有新颖的地方？它和美国新左派又有什么区别？

**马尔库塞：**他们的共同点是，在意识形态明显与事实不符的地方，他们都已不再依附于旧的意识形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例如，他们已不再仅仅关注工人阶级并将其视为变革的唯一推动者。对我来说，在欧洲新左派里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深信除非社会主义社会在本质上区别于现有社会，否则无论它可能有多好都是不值得为之奋斗的。

**惠勒：**这是否是对东方集体主义民主制的批判？

**马尔库塞：**是的。因为新左派认为他们仅仅是换了一种控制和支配的形式。同时新左派认为，而我也这么认为，东方的社会主义社会仍旧有潜力发展成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

**惠勒：**他们最核心的部分没有财产关系这个原罪，而这使他们有了终极自由的可能性。正如你所说，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的传统要素。不过如果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革命性变革的代理人了，那么谁是谁呢？

[280]

**马尔库塞：**我已经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长时间，而我恐怕还无法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唯一能说的是，在我看来，我们不应到处去寻找历史变革的推动者。他们可能只有在变革的过程中才会出现。与此同时，人们也不应变成失败主义者，妄称不存在任何可见的变革的推动者。其实，我们的工作的不断推进有助于使这些推动者诞生。

**惠勒：**如果一个人抛弃了产生革命阶级的辩证机制，那么他也就抛弃了大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你是如何理解这种假说的，即革命的代理人已经在民族国家内部消失了，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看到，也就是说，所谓的第三世界成了外在于整个西方工业联合的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定义？

**马尔库塞：**该观点对我影响很大。事实上，我认为它是一种真正的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辩证发展。公司资本主义现如今是一个全球体系，今天看来是外在的无产阶级，从世界范围来看、从资本主义的全球利益和全球力量来看，实际上是内在的无产阶级。第三世界的力量，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继承者，在这个意义上毫无疑问要受到公司资本主义的支配。

**惠勒：**这就在以下两者之间建立了一种有趣的联系：一是非洲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二是美国国内少数派群体的斗争——黑人斗争。作为世界斗争的一部分，他们就不再是少数派了。一直以来被我们用来质疑黑人革命的理由，就是少数派无法完成革命。但根据我们刚才的讨论，他们就不再是少数派了，而是成了一场革命运动的潜在而有力的先锋。

**马尔库塞：**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即在这个阶段，美国

黑人和非洲黑人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并不存在。

**惠勒：**的确如此……让我们把目光转回新左派，因为我想知道欧洲新左派和美国新左派有什么区别。我所知道的其中一个区别是，美国新左派在根基上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欧洲新左派似乎有——怎么说呢？——一种发展的或进化的马克思主义取向。

**马尔库塞：**是的，我称其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惠勒：**还有别的区别吗？例如，美国新左派十分冲动地卷入了争取参与式民主的斗争，卷入了争取共同体的斗争，争取建立新的民主的、非异化的共同体的斗争。这些情况在欧洲新左派那里有吗？

**马尔库塞：**有，不过是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因为欧洲新左派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境下运作。在它所处的社会，至少仍有很大一部分工人运动是潜在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因此参与式民主能够采取更为具体和真实的形式；例如，工人参与管理。与其他地区相比，南斯拉夫在这方面非常强大，但这在美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工人参与管理并不意味着在政治上发生任何彻底的改善；事实上，工人参与管理甚至会导致更坏的结果。

[281]

**惠勒：**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报纸上满是关于西德的游行示威的信息，而正是与你的学生鲁迪·杜切克有关的事件引发了游行示威。为什么他对新左派而言如此重要？他几乎扮演着一个先知的角色。

**马尔库塞：**差不多一年前，我在柏林见过鲁迪，他是一个十分聪慧、诚实而活跃的学生，被那些为了一个更好的社会而努力的人寄予了巨大的希望。他组织游行示威的方式、创建新的组织形式的方式，等等，都毫无疑问地令人惊讶。斯普林格出版社——我认为它垄断了柏林和西德约70%具有决定性发言权的报纸杂志，并且全面支持越南战争——对由杜切克领导的学生抵抗运动所展开的邪恶斗争，已经持续了不止一年。斯普林格出版物上的文字非常有煽动性，以至于我对有人试图暗杀杜切克一事丝毫不感到惊讶。

**惠勒：**但斯普林格出版社不是新纳粹吧？

**马尔库塞：**如果你将纳粹主义等同于反犹太主义，那么它不是纳粹。斯普

林格给了以色列和布兰迪斯大学一大笔钱。但斯普林格出版社是德国一切压抑性的、攻击性的政策的鼓吹者。

**惠勒：**我们听说在欧洲，基督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有一场令人振奋的重要对话，而且也传到了美国；事实上，它也许变得有些过于时髦了……

**马尔库塞：**这正是我所担心的。我担心这场对话有可能以掩盖真实的差别来终结。不要误解我。有这些对话当然比没有更好。否则，如果没有超越的要素，没有把基督尊为弥赛亚的承诺，没有对死后世界的信仰，我难以想象基督教，而这和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境况能够并且应该通过人自己的力量来改善，而任何关于死后世界的许诺只能延长人在现世的痛苦。

**惠勒：**是否可以这样说，马尔库塞在他的《理性和革命》这本书中，在某种意义上提出了超越性原则？

**马尔库塞：**是的，你说得很对，我的确这么做了，但我所谈论的超越性是经验的、历史的超越性，目的是实现不同的社会形式，而基督教的超越性则是超出这个世界，目的是到另一个世界。

[282] **惠勒：**那么所谓新型的基督教神学家是否发展或减少或改变了基督教的超越性，使其变成了你所说的这种教义？

**马尔库塞：**但这样一来我就不知道他们在何种意义上还算是基督徒了。

**惠勒：**说得好。但事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难道基督教神学最令人振奋的发展不是沿着这个方向走的，难道不正是在那些推动了这种神学发展的人中间，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取得了最积极最丰硕的成果？

**马尔库塞：**是的，的确如此。不过我要说的是，基督教真正伟大的变化是，例如，那些基督徒，包括牧师或其他人，竟然参加了拉美游击队，而且与他们并肩作战。

**惠勒：**我对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感到不解的是它带来了什么变化。再就是，世界上还剩下多少基督徒？基督教何去何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想要和它建立联系？

**马尔库塞：**如果依据克尔凯郭尔的定义，那么这世上没几个基督徒。但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至少在这一点是有意义的，即它让我们和我们在东方的同伴走到了一起。这是真正的观念交流，而且我们从中找到了避免或延缓核战争爆发、缓和敌对共存状态的途径，等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高估这种对话的重要性。

**惠勒：**在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话中最为活跃的领袖之一是法国的罗杰·加罗蒂（Roger Garaudy），而在他的工作中有趣的是，他把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当成了沟通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桥梁。德日进是一位牧师、生物学家、进化论理论家。有人说这些都不是他擅长的领域，但他却写出了杰出的著作，有着令人振奋的观点。你是否认为加罗蒂在这方面的直觉是准确的？

**马尔库塞：**德日进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他在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中那么重要，为什么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那么重要。他所做的与其说是使基督教激进化，不如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犹太—基督教教义。无论如何，真正的问题既不是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甚至也不是东方和西方的对立，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有一种超越了东方和西方的全新的对话。它就是第一、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涌现出来的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之间的对话，而年青一代体验到了这些不同的形式，尤其是在古巴、在越南、在以切·格瓦拉为象征的斗争中，等等。这不能根据东西方对抗或东西方对话来理解，因为它直接跨越了这两个世界。

马尔库塞在东西方会议期间抽时间与政治学家、中心工作人员哈维·惠勒做了交谈。马尔库塞博士现在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哲学教授，他写了很多有影响力的著作，包括《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以及《理性和革命》。

[283]

## 1969 年革命：与亨里奇·努斯鲍姆的 讨论（科隆）<sup>①</sup>

马尔库塞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一名哲学教授，也是我们国际编委会的成员之一。亨里奇·冯·努斯鲍姆（Henrich von Nussbaum）是波鸿《天主教评论》（*Kritischer Katholizismus*）的编者之一。

**马尔库塞：**上帝知道，戴高乐政权目前正打算要推行的改良毫无革命性可言。它们都是些技术性的改良。但有的改良的确能够加剧激进化。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我的朋友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的看法（*The Strategy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Late Capitalism*, Paris & Frankfurt, 1967; *Difficult Socialism*, Paris & Frankfurt, 1968）。

---

① 《1969 年革命：与亨里奇·努斯鲍姆的讨论》这个对马尔库塞的访谈最早发表在 *Neues Forum*, 16, 181 (Vienna: January 1969, pp.26-29) 上。马尔库塞在访谈中主要强调了各种团体的革命潜能（与失败），例如法国的学生、非裔美国人的解放运动以及“第三世界”。正好是访谈这一年，马尔库塞出版了他的杰作《论解放》，他在书中建立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观，这种革命观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在学生、少数派和全球穷苦人民的推动下（时常有工人阶级参与的情况下）风靡全球。在谈话中，冯·努斯鲍姆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的创建的潜在来源提出了疑问，马尔库塞对此进行了回应，他还提到了创造拥有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价值的新人类的必要性。为此，马尔库塞提出了一个必须同时在传统教育机构的“墙内和墙外”得到实施的教育计划。有趣而重要的是，马尔库塞认为，为了对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病态而扭曲的价值，革命还涉及一种类型的社会和文化的反向教育。——编者注



**冯·努斯鲍姆：**但要怎么样才能说服那些掌权者，使他们推行超越现有体系的改良？也就是说，他们怎么才会放权让位？

**马尔库塞：**我要说的是，这涉及一种**面向彻底变革的教育**。这是学生运动和所有支持运动的知识分子在目前的首要任务。任务就是实施一种新型教育。这种教育不应停留在课堂和大学校园内，而是要自发地投入行动和实践，并延伸至大学之外的社会团体。

[284]

**努斯鲍姆：**你的意思是说在现有的组织机构之外？

**马尔库塞：**当然不仅是之外。例如在大学里，如果结构性改革能够得以完成，那么它就会抵制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培训的技术性的教育体系。这种改革可以在现有的大学框架内通过学生团体造成压力来引发。我看不到其他任何能够打破受虚假意识支配的路子。

**努斯鲍姆：**通过教育独裁？

**马尔库塞：**当然，如果有人想要这么做，那么他马上就会被扣上不民主的帽子，被指责为想要培育知识精英阶层，被指责为其目标是一种柏拉图式的教育独裁，或者别的什么。我必须坦白承认，我并不认为**知识分子领导**有什么问题。我甚至认为，在大多数工人运动中普遍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愤恨，是我们看到这一运动处于如此悲惨境地的原因之一。

**努斯鲍姆：**你不觉得在学校和大学里所取得的成就面临着因征兵和军事训练而再度被抵消的危险吗？

**马尔库塞：**任何征兵都具有压抑性、反动性。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

**努斯鲍姆：**1968 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有没有让你变得更为坚定？

**马尔库塞：**我早在 1964 年就指出了学生运动的重要性，而且我还讲到，在我看来，比起我们在传统观念中过于强调的代际冲突，我们当下的很多情况完全不同。刚刚我已强调，真正的政治要素已经被激活了，而且不是在别的社会团体或阶级中被激活的。除此以外，我还曾指出，工人阶级在美国的一体化进程最快，而在法国和意大利，一体化的规模还不大。因此毫不奇怪，正是法国的学生运动才引发了一场大型的工人政治运动。我并没有预见

到这一切；我认为，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即使是学生运动的领袖们也不会想到，在一个星期内就有上千万的工人参与罢工。

## 失败之后

**努斯鲍姆：**从运动最终失败，你得出了什么结论？

[285] **马尔库塞：**我不认为它失败了，很简单的理由是，这场运动具有多方面的革命价值。我甚至认为 1968 年 5 月的那些日子代表着资本主义内部的反对者在政治发展上发生了转折。他们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场潜在的革命运动甚至可以从工人阶级之外开始，而随后将工人阶级——或者更谨慎地说，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吸纳到它的阵营中。除此以外，它还表明，一种**全新的反对形式**也可以取得极其丰硕的成果。只是在如下意义上它是失败的，即学生运动没有直接转变为工人阶级持久的反对活动。但我们都知道这种转变之所以没有发生的原因。

**努斯鲍姆：**我们真的知道吗？

**马尔库塞：**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联盟一看到他们不再能够控制运动了，他们立马投身到了缓冲运动的工作中。在那个时候，工人们重点提出的要求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这已经不仅仅是占领工厂的问题了，而是在经济上和在上政治上实行**自我管理**的问题。我认为工人政党现如今最迫切的任务是，阻止工人阶级与现存秩序的一体化，而不是像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联盟所做的那样去加强这种一体化。

**努斯鲍姆：**从这种对革命行动的“缓冲”可以得出哪些一般性结论呢？人们是否可以断言存在着一种规律，即那些犹豫不决的人由于害怕无政府状态，所以再次倒向了缺乏合法性的一边，而成功的革命运动正是在这时走下坡路的。

**马尔库塞：**你的意思是，人们应该避免这样的失败，因为它们会导致失败主义。我认为人们无法避免这样的失败。

认为革命进程就是一连串的成功，这是一个荒谬的想法。当社会以武力来抵抗前所未有的彻底变革时，失败在所难免。最重要的是要估算什么时候可以冒失败的风险，什么时候不能冒失败的风险。

**努斯鲍姆：**在你看来，如果对列宁的**双重领导**的观念有更强的洞察，比如，尝试在总工会联盟和共产党这样的现存机构以外成立组织，那么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根本不同的结果？

**马尔库塞：**你是说类似于由学生和工人组建的委员会那样的机构？

**努斯鲍姆：**是的，但是**不包括**那些不遵守规则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我指的是一个**特别的**组织，它可以成为谈判伙伴，或者作为使总罢工持续下去的动力。

**马尔库塞：**没有你所说的这种辅助力量是不可能的。但这里还留有疑问，即**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组织？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本应有人创立这样的组织机构。无论如何，如果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人们至少应该准备好这样的辅助力量，并且做一些情报工作。

**努斯鲍姆：**那你还坚持认为未来会发生革命吗？

[286]

**马尔库塞：**如果我说未来不再可能有革命，那么我必定是一个卑鄙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卑鄙的知识分子。相反，现今时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大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它们或许会被缓和、管控，但这是有限度的。因此我相信我们的时代确实是一个客观的革命时代。正因如此，现存体系才全副武装了起来。

**努斯鲍姆：**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仍然影响着你对革命的预测吗？毕竟早期资本主义已经自行转变为一种时髦的、开明的新资本主义，并随之发展出了大量的调控手段，这意味着马克思式的机制已经被打破了。

**马尔库塞：**这样的调控手段的确存在。但我不认为这就意味着现存的资本主义可以**安度危机**。安度危机的资本主义已不再是资本主义。我想指出的是，国际货币危机还没有得到深入的解决。这是一个危机因素。**另一个**危机因素是，就算**越南**战争真的平息了，也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带来

衰退和萧条。从第三世界的发展来看，我们还可以发现**第三个**因素，它对于资本主义体系来说也同样是一个沉重的包袱。**第四**，当前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它们都表明两股超级力量的共存有着极其危险的本质。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表明资本主义还远不能避免危机。

**努斯鲍姆**：哈贝马斯曾说过资本主义已经摆脱了资本现实化带来的诸多传统难题。

**马尔库塞**：我无法同意他的观点。正是最近这些年在资本现实化、利润增长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难题，尤其是在美国。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那就是美国买下了半个法国的经济。因为在法国利润要比在美国高得多。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帝国主义。仅凭第三世界是无法制服它的。但第三世界是与**内在弱化的**帝国主义力量密切相关的决定性因素，它仍然是全球性革命的首要条件。

**努斯鲍姆**：令人吃惊的是，证券交易的观察者预言，如果越南战争结束了，那么日本和美国的市场占有率都有望提升，当然战时工业除外。他们认为，越南必要的重建与美国可能全力投入太空探索、计算机研发会比较快地为美国人带来贸易收支平衡。

[287] **马尔库塞**：事情或许就是如此。我一点都不了解证券交易，而且我也不想对它了解过多。但我倾向于相信我的朋友们，他们告诉我当今的证券交易对于**实际**的经济状况没有什么影响。

**努斯鲍姆**：我们是否真的已经证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与第三世界的惨状之间有因果联系？哈贝马斯对整个学生战略得以立足的这个先决条件提出了质疑。

**马尔库塞**：两者间有着惊人的因果联系，对此几乎不可能有什么疑问。那种惨状是旧有的第一世界和新近的帝国主义最深重的罪孽之一。我完全想不到怎么可能会认为这种联系不存在。

**努斯鲍姆**：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帝国主义不就是依赖于战争所造成的浪费吗？这些潜在的浪费对它来说是有用的，因为它需要以此来维持自身的

机能。可是，它不能采取和平的解决办法吗？

**马尔库塞：**如果我姑妈有了轮子，她就会是一辆公交车。我的意思是如果帝国主义不是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一切都会变得不同。和平经济当然是有可能的，但它要求一种彻底的变革，甚至可能要求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一场革命。从一个“纯经济”的视角来看，目前帝国主义在越南无利可图。只能说，并不存在这样一种“纯经济”的视角。要紧的是下面这些：对市场、对自然资源的预防性保障，甚至还有政治保障。所有的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切身利益，不能让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潜在的富裕国家，甚至还有别的国家落入共产主义之手。这是资本主义阵营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阻止的。在这个意义上，军事、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纯经济”的表述已不再适用。

**努斯鲍姆：**哈贝马斯呼吁未来社会要消除**绩效（Leistungs）意识**。你不认为那种想法过于一厢情愿，以至于目前，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都无法实现吗？切·格瓦拉认为纪律和（工作）伦理是必不可少的。

**马尔库塞：**之所以想要消除那种绩效原则，是因为它把竞争当成了生存斗争，而生存斗争在当前条件下已不再有必要，它只是为了维持压抑性体系的存续。在这个意义上，消除绩效原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所有阶级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这一要求之所以在目前未能实现，主要是因为两股超级力量之间的竞争（共存），该状况要求两个阵营持续进行军备扩张。这就使得名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要转变为自由的社会似乎是不可能的。

**努斯鲍姆：**在当前的技术状况下，是否可以在削弱权威结构的同时避免随之而来的合理性和效率的丧失？

社会主义 = 效率低下？

[288]

**马尔库塞：**合理性和效率并不是绝对的概念，它们首先指的是**现存体系**

内的合理性和效率。任何彻底的变革当然都会对**这种**合理性和效率造成损害。问题只在于，这样一种对压抑性的合理性和效率的损害能否带来真正的**进步**。

**努斯鲍姆**：从社会主义国家来看，社会化总是意味着经济在短暂的革命冲动之后出现衰退。例如，在民主德国，这带来了试图再次发挥“个体利益”作用的新经济政策（NEP）。你认为这都是过渡现象吗？

**马尔库塞**：个体利益这个概念对我来说太过抽象。个体利益可以被一个奖励体系或刺激体系生产出来，就像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里一样。但它同样也可以是真正的**团结**的结果，也就是自由人的合作的结果，每个人的个体利益都不再与其他人的利益处在敌对性的对立状态。

**努斯鲍姆**：学生运动突然爆发主要是因为第三世界的问题。那第三世界有没有反过来尽力支持学生运动呢？

**马尔库塞**：第三世界正在忙着解决攸关生存的残酷问题，我们不应该问第三世界有没有尽到自己的一份力来支持第一世界的抗议运动。**我们**应该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来支持第三世界。

**努斯鲍姆**：但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第三世界如何耗尽了投入的资本，真的不好受。

**马尔库塞**：的确如此。但这是两股超级力量竞争性共存的结果。除非在这些力量的内部发生些什么，不然第三世界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是对的，他说过决定性的变革必须发生在**发达国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设想第三世界会迎来真正的、持久的、成功的独立。

**努斯鲍姆**：如此一来，你就限制了**拉丁美洲**革命运动遭遇的挫折所带来的影响。因为毕竟，你主要关注的是欧洲和美国。在格瓦拉之后，拉丁美洲几乎就没留下什么游击队，难道你不会为此感到沮丧吗？

**马尔库塞**：这是一次失败，不过，我差不多早就预料到了。这样的失败只会带来新的想法和更好的准备。问题主要不是转移压力，而是要认识到第三世界只有和第一世界的反对力量进行合作，才能取得成果。

**努斯鲍姆：**你怎么评判暴力是否必要、是否成功？

**马尔库塞：**在此我想起了一句老话——我不是很确定究竟是马克思说的 [289] 还是恩格斯说的，革命总是和它所对抗的暴力一样暴力。如今从“暴力”这个概念发展出了一种语义学的意识形态。人们不把越南所发生的称作暴力；人们不把警察所做的称作暴力；人们不把日常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毁坏、折磨、羞辱的行为称作暴力。因为人们把“暴力”这个词用到了它的对立面。我认为，将防守的暴力与进攻的暴力相提并论，这是虚伪的。这两者完全不同。

**努斯鲍姆：**对下一阶段的议会体制外的运动，你会宣传哪一个口号 (mots d'ordre)？

**马尔库塞：**没有口号。这一新运动最美好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不依赖他人、不依赖权威人士给它订立口号，而是在斗争的过程中找到它自己的口号。

## 1969年5月21日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会议<sup>①</sup>

问题：

——对“民主进程”的异议受到轻视

——右派与左派的**同等化**

——在“公民自由”这个普遍范畴下，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等化

——**暴力**概念与**以暴制暴**概念。

---

①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会议关于公民自由的报告》（1969年5月21日）是马尔库塞1969年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会议上的演讲报告。文本展示了他支持受压抑的政治团体的政治承诺，也展示了他所坚持的看法，即公民权利的扩大是用以对抗极权主义制度的一个更大的历史计划的一部分。马尔库塞认为，公民权利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受全方位监管的社会基础上，同时也受到了这个社会的控制，掩盖了“这些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和宣传真正谋杀性和自杀性暴力的人”，他强调这些人“既没有公民权利，也没有道德权利去要求对校园骚动进行暴力压制！”对马尔库塞来说，公民权利的真正表达历史地从那些受压制的社会群体中涌现了出来，他们对既定社会中那些拒绝承认他们权利的群体的公民权利与特权形成了辩证的否定。马尔库塞在该文本中，着手讨论了他在著作《纯粹宽容批判》中所提出的问题，参见 *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 co-authored with Barrington Moore and Robert Paul Wolff, Boston: Beacon Press, 1965（灯塔出版社在1968年又出版了平装本《纯粹宽容批判》，马尔库塞在该版本中增补了一篇题为《压抑的宽容》的后记）。——编者注



公民自由确实与民主化密不可分

[290]

——公民自由源于反抗世俗或教会的专制主义的斗争：

目的是为了扩大那些受压迫的、弱势的社会群体的自由，

紧接着，

按照它们普遍化的形式，扩大和保护整体的自由；也就是说，所有公民的自由。

随着自由民主在 19 世纪的胜利，

——公民自由成了变革的一个载体，

它可以被用来减轻并最终消除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新的不平等和压迫；

还可以被用来将政治民主扩展到经济民主。

因此，

正如反抗审查制度的斗争、争取集会和组织的平等权利的斗争那样，

——保卫公民自由成了社会主义的主要政策之一。

随之而来的是

言论和集会自由不再以自身为目的，

——而是变成了确保和扩大社会自由和进步的手段，目的是为了它的所有公民——只要他们的言论和集会没有明显地破坏该目标！

根据这个附带条件，

——**言论和行动的区分**、文字和行为的区分就会表现得极其微不足道：

——在许多情况下，言论和由言论所导致的行动之间的间隔**太短了**，以至于无法预防严重的伤害：

——**“迫在眉睫的危机”** 这项条款再度确认了言论自由对高于一切的公共利益的从属地位；或对**统治利益**（压榨机）的从属地位。

如今，“迫在眉睫的危机”的条款揭示了它爆炸性的政治内涵：  
——也就是说，在言论（而不仅仅是行动）对和平、平等和正义构成威胁的时候，对言论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  
——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新技术对公共舆论的控制使大多数民众成了制度化的教育的附庸，这种教育的目的是证明国内外侵略性、剥削性政策的合法性，以及推动政策的实施。

与此同时（我将试着揭示），如果目标是反抗既定的侵略和剥削政策，那么这种情况就要求**扩充“公民自由”**概念，以便把“非暴力地反抗”和“直接行动”也纳入进来。

[291]

然而，

谁来确定这种必要性？

理所当然的是**法律，是法庭。**

不过，

从代议制政府统治下的自由民主来看，法律和法庭本身从属于**民主进程**，是它的产物。

这意味着

对自由和压迫、进步和后退的决定取决于**大多数**，

——这种结果、这种变化源于自由的普选。

民主进程把人民的大多数变成了一切善和恶的**最终的裁判者**，

——与此同时，保障少数人表达异议的权利，**还有权力**，因此，

通过劝说、告知和争论，沿着他们的思路来**改变大多数**。

现在，

这确实是最合理的、最没有压抑的决定方式，

——只要做决定的大多数民众在决定的过程中真的至高无上，并且，

只要大多数真的是自由形成的公共舆论的结果；即

——每个公民拥有自己的观点。

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

——那么大多数的决定就不具有合法性，而事实上，

实际的决定取决于**统治集团**，他们使大多数变成了被灌输、被洗脑的大多数。

那么，如此看来，“民主进程”并不存在，

——它的出现只能是为了**反对**“虚假的”、被灌输的大多数；

而令人感到不快的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能否在民主进程的界限内改变自身？

美国：

免疫的、绝缘的、自我持存的保守的大多数：

——大多数民众所接收到的信息都来源于为既定国家和公司利益服务的二、三线的大众媒体

——既有自我审查，也有华盛顿的直接审查（越南！）

——无休止的商业广告把教化延伸到个体的需求和志向中

——严重偏离既定标准的人则会受到惩罚，比如，失业、丧失提升的机会，等等。

——两个强大的国家政党机器使候选人与基层选民隔绝了开来

[292]

——于是破坏了草根的选举程序。

因此，

美国的民主实际上受到了一小撮拥有共同利益的权力阶层的组织和管理：

——“军事—工业—劳动复合体”。

**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在这个框架内得到了运用**

——在这个框架内，反对是自由的……

这意味着：

在既定框架自身面临险境的时候，民主进程将会停止；

——所有变革都仅仅是现存社会结构内部的变革。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也许是好的，甚至是我们所能做到最好的，

但是，其他人怎么办？

我们难道不应该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新左派的批判，

根据该批判

最有效的使历史车轮停止下来的全球性的尝试就是逐步加紧控制，

——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精神上实施控制。

——在技术面纱背后：支配和奴役；以变本加厉的生存斗争、持续不断的  
不平等、战争、整个社会的野蛮化为代价的繁荣和舒适——在泰勒创造  
(taylor-made) 的大多数的授权下，得到了宽容、得到了准许、得到了  
更新！

现在，为了拯救这个僵化的结构，

要去“说服”已经麻木了的大多数，

激进的反活动必须拥有

——**平等地进入**大众媒体的可能

——**平等地享有自我表达的时间**的可能

——**平等地利用宣传设施**的可能

——**平等地参加政府选举的机会**

换句话说：

在打破寡头对信息和教育的垄断上，拥有同等的资金和权力。

——这种可能性显然受到了既定权力体系的**限制**！

因此，正如大多数是自我持存的大多数(只能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发生改变)  
一样，

——所以，体系中的大多数也就注定是这样的大多数：**超越现状的进步“包  
含”**在现状中！

但我们铭记于心的是，恰恰是**公民自由的历史功能**和“目的”保证了“质的”**进步的可能性**，

——通过将舆论的形成从制度化的教育和自我审查中解放出来，

——通过除去自由研究由于与既定利益的关联而被强加在身上的枷锁，

[293]

——通过真正的通识教育，使成熟的公民能够成为公共利益唯一的裁判。

**只有在真正自由和平等的先决条件下**，大多数才最有可能成为公共利益发展的担保人。

另一方面，

如果公民自由的超越功能在个体这个根基处受到了阻碍，

如果公民只是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他人期望的意见和目标，

那么为了**夺回**公民自由的历史作用，**激进**的政策就是必要的——包括

——**非暴力地反抗**不合法的大多数。

——之所以不合法，是因为它不是对人民主权的表达，

——而是对**凌驾于人民主权之上的权力**的表达，

——主权并不始于投票箱，而是始于个体的意识和本能，

——始于家里——**除了**忠实于人的电视机盒子，

——以及忠实于电视机盒子的人。

考虑到民主进程的僵化，

——为了使人们重新注意到公民自由的社会效应的变化，

我建议

不是要废除它们，

而是要选择性地运用它们。

目的是为了重建如今已严重向保守主义和政治右派倾斜的平衡，

——我的建议是，“对于那些推行侵略性政策的团体和运动，不要对他们的

言论和集会抱以宽容”<sup>①</sup>……（第 100 页）

举个例子！

这种粗暴的建议**假定**：

自由言论的范围和潜在效应已经**先天地**被现存的垄断寡头结构缩减，甚至取消了；

该结构支撑着一个压抑的、退化的、几乎终结了一切社会变革的社会；

[294] (3) 由于个体对侵略性教育的抵制的减弱，言论与行动之间的距离已不再是一道有效的防火墙；

(4) 对侵略性运动的“定义”可以根据**客观**的标准确定起来，

——适用于任何“能力成熟的”公民——没有被洗脑的。

我愿意承认我的建议具有“不现实”性——只能充当“规范性原则”或“箴言”；——在转向别的话题之前，

我想把它表述成“祈使句”：

——在谈到右派和左派时，不应认为两者的社会地位、权力、目标和功能是对等的，

并且，公民权利不应包括煽动侵略战争、种族主义、剥削、野蛮……暴力的权利?!

阻塞民主进程最严重的影响是：

(1) 在既定社会 and 政策的庇护下，**对暴力进行动员**；以及

(2) 在反对者那里，为了对抗该社会而对**以暴制暴进行动员**。

关于 (1)：

这一**最主要的暴力**具体体现在：

——越南战争及其相关报道中；

---

<sup>①</sup> 引自马尔库塞的《纯粹宽容批判》。——编者注

- 大众传媒的图像和文字中；
- 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方向及其技术应用中；
- 治安力量的军事化中；
- 无端犯罪的增加中……
- 之所以说这是最主要的暴力，是因为体系内在冲突受到了压抑，
  - 大量的社会财富与其压抑性的使用之间的冲突，
  - 战争的必要性与和平的可能性之间的冲突，
  - 缓和竞争性生存斗争的可能性与其实际上加剧之间的冲突。

关于 (2)：

冲突完全没有受到压抑，而是自始至终在年轻斗士们的反对活动中激荡着。

在所有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牢骚和行动背后，是人们对整个社会的激进的抗议：

- 抗议它在越南犯下的罪行，
- 抗议它的种族主义及其虚伪的道德，
- 抗议浪费以及挫败感，等等。

面对与媒体宣传的分离，

[295]

面对无动于衷的大多数的冷漠和敌意，

- 反对活动经常提倡一种“**直接行动**”、“议会体制外行动”的战略；
- 破坏、入侵、占领建筑物的行为——
- 努力试图唤醒人们意识到普遍存在的不公、腐败、灭绝人性，**
- 意识到这个社会对精神、身体所造成的污染。**

反对者感到要**靠**自己来对抗社会中无所不在的体制性暴力，

- 一旦“直接行动”超越了合法的限度，它就会遭到攻击，
- 从而使得它弱化为一种毫无效果的例行公事！

确实是暴力引发了**以暴制暴**！

有人试图以“**反弹**”来进行解释

——但是，有两个理由可以证明它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站不住脚：

(1) 每个行动都会引起反作用，左派的行动引起了右派的反作用

——反作用又会再次引起另外的行动。<sup>①</sup>

战略性的问题是：

在行动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强度

以克服反作用！

(2) 学生骚动本身就是对于先前普遍存在的压迫的鞭挞……

**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和差别的公民自由，只能在两种情况下起作用：**

——在仅仅由形成和表达自身意见的“能力成熟的”公民组成的社会中；或者

——在标准化和监管到了使激进的异见注定毫无效果的程度的社会中。

目前的趋势强烈地倾向于**第二种**社会形式。

这种情况下，“公民自由”的概念超越了议会制，走向了

a. 议会外的行动以及通过激进的少数派来“直接”表达意见；

[296] b. 根据这些少数派显而易见的目标，有差别地对待公民自由。

——**消极面**：无法防御显而易见的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种族灭绝的舆论！

无疑，**没有任何防卫和抵御暴力的措施；只有**

---

<sup>①</sup> 而虚弱无力的行动反而可能会导致不成比例的暴力的反弹（即“预防性的反革命”；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了入侵）。



——斗争，不是暴力的症状而是其**原因**，从社会结构本身来看，  
 ——它在战争、军备竞赛和不断升级的军事化中得到了表达，  
 ——它在那些提倡这一暴力的人的语言中得到了表达。  
 这些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和宣传真正谋杀性和自杀性暴力的人  
 ——既没有公民权利也没有道德权利去要求对校园骚动进行暴力压制！

通过大众传媒， } 对这场骚动的讨论几乎完全**没有涉及**  
 以及政客 } **任何学生抗议所针对的基本状况。**

这样的讨论

简直就是野蛮的**宣传**，充满了偏见和欺诈。

在我看来，

要消除校园内的以暴制暴，唯一的途径就是消除引起和再生产二次暴力的基本暴力：

从越南撤军，  
 停止军备竞赛及对外太空的征服，  
 消灭贫民区！

与此同时，

——毫不妥协地实现公民自由，

——尤其是在那些打着公民自由的幌子来压制抗议和异议的表现形式——**超越了已经与自由不相容的“日常事务”的法则和秩序**——的地方，

以自由为目的的教育。意味着：

——要捍卫在抗议后备军官训练队（ROTC）、抗议校园征兵期间的这种破坏活动，

——要捍卫受压迫的少数派的要求，即便他们不同意传统的学术规则。

我们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

——学术的自由、自由的研究、教育的平等，受到的侵害更多地来自现有的实践还是来自对它们的抗议？

**结论：**

我们的下一代真的很迷惘！

[297] 他们感到迷惘的是：

——战争和战备；

——虚伪的、服务于侵略的道德；

——使贫穷、苦役和不公实现再生产的整个社会。

迷惘的一代也许会就此迷惘下去，**无法回头**

**除非**我们意识到了他们通过离奇古怪的、爆炸性的抗议形式和在该形式背后所表达的需求，并因此而行动，

——他们所表达的需求是，这个社会最终并彻底地利用其大量的资源来消除不幸和压迫，**而不是使其延续下去。**

## 比耶尔·维扬松 – 蓬德访马尔库塞<sup>①</sup>

**提问者：**人们把你和马克思、毛泽东相提并论。当他们谈到“3M”<sup>②</sup>的时候，你有何反应？

**马尔库塞：**我不理解。马克思？我深入地研究了著作。但毛泽东？的确如今所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毛主义者（Maoist）。我始终认为存在着替代方案，而我也没有在我的书里仍旧坚持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现如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似乎并非如我所说与其他资本主义社会有“质的不同”。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支配类型，仅此而已。真正的社会主义与此完全不同。我确信从现在开始去构筑一个无须经

---

① 《比耶尔·维扬松 – 蓬德（Pierre Viansson-Ponte）访马尔库塞》在 1969 年 6 月的《法国世界报》（*Le Monde*）发表了出来。我们在哈罗德·马尔库塞（Harold Marcuse）的网站上看到了这个访谈，上面写着：“抄写人：哈里森·弗卢斯（Harrison Fluss）2012；该文的译者是安妮·弗里曼特尔（Anne Fremantle）”（<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rcuse/works/1969/interview.htm>）。该访谈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探讨了马尔库塞与马克思、毛泽东以及古巴革命的关系，探讨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的相关性。就像当时的绝大部分访谈一样，马尔库塞在“黑人力量”和“学生力量”上受到了质疑，他则积极地谈论了学生起义，而为了回应现存体系对学生和新左派的压抑，他坚持认为：“我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永远不是。”——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毛泽东和马尔库塞，三人的名字英文拼写的首字母均为“M”，且均在 20 世纪 60 年代学生运动中受到许多学生的热捧。——译者注

历斯大林主义时期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可能的。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真正团结、真正合作的基础上：在我看来，古巴革命似乎朝着这个方向前行。就像“切·格瓦拉”一样，他就是一个象征符号，他完全不同于斯大林式的官僚，他是一个更接近社会主义的人。

**提问者：**你只是试图解释我们生活的世界还是试图改变它？

[298] **马尔库塞：**这是一个大问题。每一种真正的解释都一定会导向对改变的探寻，在解释和改变之间显然有一种内在的关联。对我而言，我的确早已不再是一名有斗志的激进分子了。我写作、教学、开讲座，我和学生们交谈：这都是美国知识分子的正常活动，因为那个国家不具备任何革命的条件，甚至不具备前革命的条件。因此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首先就是承担起激进教育的使命。在美国，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启蒙时期”。

**提问者：**那么在欧洲呢？

**马尔库塞：**欧洲的情况不一样，因为那里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决定于工人阶级。同样，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区别也很大：西德和美国的“模式”非常接近，意大利也很接近美国。法国则相去甚远。我十分了解鲁迪·杜切克和他的朋友们，也十分了解左翼学生组织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DS, 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的男孩们。鲁迪十分善良和感性，绝不是一名煽动者。而且他也完成了很多工作，做了很多思考；对于他和他的战友来说，理论和行动之间的纽带被坚固地建立了起来。据说这花了他们好几个月的时间。绝非如此：他们花了8年。在法国，你们愤怒的学生有没有完成这项工作？他们有没有建立起可靠的意识形态基础？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并没有。

**提问者：**有时候你是否会感到那些宣布你学说的人超出了你的学说？

**马尔库塞：**或许吧。如果他们变得暴力，那是因为他们都陷入了绝望。而绝望的力量会影响政治行动。例如，美国黑人贫民区里的居民；他们在自己的地区纵火，烧掉他们自己的房子。这不是革命行动，而是绝望的行为、政治行为。不仅如此，在美国，感到不安的不仅仅是学生。学生们不是在反

抗一个贫穷的、乱糟糟的社会，而是在反抗一个极其富裕、奢侈浪费得到了很好的组织的社会，而这个社会中 25% 的人还在贫民区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他们的反抗并不指向这个社会引发的不幸，而是它的利益。这是一个新的、仅仅系属于所谓的“富裕社会”的现象。在德国，进程也是一样的。在法国，我不认为是这样，因为法国社会还不是一个富裕社会。

**提问者：**你怎么看待那些所谓的“黑人力量”、“学生力量”等诸如此类的口号？

**马尔库塞：**在我看来，那种口号是危险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学生里面的绝大多数都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因此如果“学生力量”是民主的，那么它也就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学生力量”意味着左派决不反对大学管理，而是反对学生自身。否则挫败民主进程对它来说就是必要的。这里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

[299]

**提问者：**在你看来，这么多国家发生暴力的学生游行示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马尔库塞：**对于我更为熟悉的美国和西德的学生来说，这不仅是精神要求，更是“本能”要求。他们想要一种完全不同种类的生存方式。他们拒绝只有生存斗争的生活，不肯加入当权派，因为他们认为这已经毫无必要。他们感到他们的整个人生将会被工业社会的要求，尤其会被大财团、军队和政客的利益压垮。例如，嬉皮士，他们反抗的是清教徒的道德，反抗的是美国这么一个任何人一天可以洗十次澡、与此同时却在越南简单粗暴地烧杀抢掠的社会。因此通过留长发、蓄胡子、不事洗漱以及拒绝参加战争，他们有条不紊地反抗起了这种伪善。对于他们来说矛盾很刺眼。但是在学生中，仅仅对极少的人来说这是真切的。这些学生知道这个社会可以把反对它的东西吸收掉，把非理性视为理性。他们都已或多或少清楚地感受到“单向度的”人已经失去了他的否定的力量，失去了他说不的可能性。所以他们拒绝被这个社会整合。

**提问者：**如果有学生来问你，他们的示威【即游行】是否有意义，是否

能够对改变社会有帮助，你会怎么回答？

**马尔库塞：**首先我会告诉他们，在尚且算不上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形势下，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大型的示威，就像那些现正发生在世界各地甚至发生在法国的示威那样，除此以外根本没有其他希望。但我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永远不是。在美国，反对越南战争的声音日渐增多，这已成功地、至少是部分地使美国政策发生了改变。人们不应抱有幻想；但同样也不应成为失败主义者。在这种对抗中，期待大众会加入运动并参与进程，是没用的。在我看来，类似的情况可以在当前的学生起义中看到。但这些起义完全是自发的。在美国，缺乏全国范围内的协调和组织，甚至全国各地都缺乏，他们与任何一种国际组织都离得太远了。这种起义的确无法创造革命力量。但它与“第三世界”的运动、与贫民区的行动汇聚在了一起。这是一股强而有力的瓦解力量。

书信、证词及对批评者的回应

## 致霍克海默<sup>①</sup>

1942年9月21日

亲爱的霍克海默：

感谢您的来信。我也认为我有必要到东方去，无论结果会如何。

我感觉到我们的周遭正以飞快的速度渐渐地暗淡下来。留给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想5个月后我就在军队里了，因为我的延期申请之所以获得批准，主要不是因为家属而是因为工作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尤其想要将我能说的东西写下来。这也是为什么我还不想中断关于操作思维与社会统治的文章。为了获得关于诈骗问题的具体材料，我已查找了一些书籍，但

---

① 《致霍克海默》，所署日期为1942年9月21日，表达了一种悲观的感受。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内部圈子都有这样的感受，即“我们的周遭正以飞快的速度渐渐地暗淡下来”，当时希特勒以及纳粹正在侵占欧洲，美国也即将被卷入世界大战。马尔库塞提出他也许“5个月后就在军队里了”，因而他当时正忙着写下他关于“操作思维与社会统治”的想法。但相关文本却并未在马尔库塞的档案中找到，也许他最终没有写出来，尽管他在收于《单向度的人》的信中提到了关于这一主题的观点。关于马尔库塞和法兰克福学派，参见《马尔库塞文集》第二卷《走向社会批判理论》。

最终马尔库塞没有参军，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是加入了美国情报部门。关于马尔库塞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成果，参见《马尔库塞文集》第一卷《技术、战争与法西斯主义》。——编者注



是可用的原始资料完全不够。我们想要阐明的理论主题如此大胆，以至于在我看来只去引用一些或多或少为人所熟知的著作是不够的，并且我想知道您有没有让基希海默（Kirchheimer）或格伦（Gurland）在纽约收集材料。无论如何，我会尽我所能去收集我能找到的。

[301]

我希望我的文章会与出版计划相符，我尝试通过它使对社会控制的现有形式的理解有所加深。它涉及面相当广，但还远未准备好。我想将它完成到一定程度——我差不多在一周之内做到——然后再和您做整体的讨论。

这里一切都好。万一有危险，我会动用一切可利用的武器来保护您的妻子。

携我家人向您致以最真诚的问候。

您的赫伯特·马尔库塞

## 1957年6月7日、6月11日、10月7日及 10月11日致拉亚·杜娜叶夫斯卡娅<sup>①</sup>

1957年6月7日

亲爱的杜娜叶夫斯卡娅：

您能帮我一个忙吗？在写序时，我希望能在这么一小块地方尽可能恰当地概述您的书的要领。您能就您认为的此书的主要论点及基本思想脉络发一段简要的陈述给我吗？这将十分有助于工作的进展。很抱歉在这么关键的时刻麻烦您做额外的工作。

---

<sup>①</sup> 我们在这里选取马尔库塞与拉亚·杜娜叶夫斯卡娅的部分通信刊登了出来，在通信期间，他正在为她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自由》（*Marxism and Freedom*）作序，在这一卷中我们出版了这篇序言，我们对此也做了讨论（参见第98—103页）。在1957年6月7日致杜娜叶夫斯卡娅的信中，马尔库塞请她写一份对她的主要论点的简单陈述和概要。杜娜叶夫斯卡娅在1957年6月11日回了信，并附了几页对其著作的概要。1957年10月9日致杜娜叶夫斯卡娅的信中，马尔库塞指出他对此书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的美国根源”感到不安。随后，在1957年10月11日的回信中，杜娜叶夫斯卡娅伶俐地捍卫了自己的论点，而马尔库塞则并不完全满意她的这一回应，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和其他批评她的作品的同行是出于一种学术批判的态度，而不是像右翼批评家或历年来与杜娜叶夫斯卡娅争辩不断的那些左派那样，意图对她发起攻击。关于马尔库塞与杜娜叶夫斯卡娅之间的完整通信，参见 *The Marcuse-Dunayevskaya-Fromm Correspondence, 1954-1978. Dialogues on Hegel, Marx, and Critical Theory*, edited by Kevin B. Anderson and Russell Rockwell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2)。在此刊出的对杜娜叶夫斯卡娅的信件的注释为本卷编者所加。——编者注

致衷心的问候。

赫伯特·马尔库塞

1957年6月11日 [302]

亲爱的赫伯特·马尔库塞：

我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我相信您十分清楚，要为一部历时约15年完成的书就其主旨写一到两页的概要，要比写100页文字——如果不是500页的话——困难得多，但我会尝试。

（一）中心点或者说支点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地基，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中所有其他方面都是围绕它展开的。正如我在导言里所说的那样：“本书的目的是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形式，即马克思所说的‘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sup>①</sup>

这就像是一条贯穿全书的红线。因此第一部分以法国大革命和黑格尔为开端，以马克思的早期经济学哲学文章——一种新的人道主义——为结束。这构成了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庸俗共产主义的回答，构成了一种新的世界图景，构建了与黑格尔辩证法紧密结合又相互区别的马克思哲学。青年马克思所确立的论点出现在了第三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在该部分的“[《资本论》] 第一卷的辩证人道主义”一章中，我指出马克思的经济范畴不仅是社会范畴，而且充满了人道主义色彩——这种人道主义来自工人阶级为缩短工作日所做的斗争。正如马克思将如下问题，即我的一天何时开始又何时结束这一单纯的问题，放在比“《人权宣言》中华而不实的条目”<sup>②</sup>更高的哲学层面上那样。《资本论》第1卷中

[303]

① 马克思对其哲学立场的这一描述出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一节中，参见 *Marxism and Freedom*, p. 313；亦可参见 MECW 3, p. 336 (MECW =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参见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cw/>, accessed January 16, 2014)。

② 马克思的相关表述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10章“工作日”。

的真理，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对“第2卷与第3卷的逻辑与规模”来说同样是真理，在这一点上，我的研究表明，对马克思来说全部历史都是为自由而斗争的历史，而这种斗争的基础是工作日的缩短，并且只有从那里出发，我们才能够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列宁好不容易才认识到哲学地基的重要性——在第二国际崩溃之后，为了重建他自己的理性，他不得不回到了黑格尔的《逻辑学》。“行动着的精神”这一节探讨的是哲学地基对于列宁和俄国革命意味着什么，并以这样一种想法结束：正如马克思主义如果失去了它的哲学地基就会变得缺乏意义那样，列宁主义也是如此。他们都不是“经济学家”。最后当我们来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我称之为“自动化与新人道主义”，我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一幅整体图景的渴求。

(二) 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像蒲鲁东这样的激进知识分子所做的区分，从属于本书上述主题，而且与其并行不悖。我主张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对工人阶级力争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开端的新社会的理论表达，而且还为知识分子开拓了一个新的维度。这种新维度之所以会兴起，正是由于马克思没有将理论从历史中剥离出来，包括当时新近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历史的关系被视为一个活泼的元素，改变了马克思最伟大的理论工作的结构本身。在他基础性地修订该结构的1863年与1866年和在他写下法文版的《资本论》的1872—1873年，即从美国内战到巴黎公社这段时期，可以证明理论与历史的密切关联。与此同时，也可以解释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早期文章中所建构的观点，他在1844年就已不再认为社会与个体必定处于敌对状态<sup>①</sup>；同时，他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所称颂的个体的发展是全体的发展的条件<sup>②</sup>

① 在马克思写于1844年的文章《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中，他写道：“我们尤其要避免将社会建设为与个体相对立的抽象。个体是社会的实体 (social entity)。”参见 *Marxism and Freedom*, p. 295；亦可参见 MECW 3, p. 299。

②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中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一表述：“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第65页；亦可参见 MECW 6, p. 506。

重新出现在了其颇受学院经济学家青睐的“最经济学的”著作《资本论》第3卷<sup>①</sup>。 [304]

同样，当我从马克思的年代出发来到列宁的年代，我指出，第二国际的贡献——组织——被列宁于1902—1903年提出的所谓先锋理论（Vanguard Theory）的构想继承了，但当俄国革命实际上发生的时候，他就将其抛弃了——或者至少说彻底地将其理论修订了不下6次，以至于在1917年，他说外面的工人比先锋党更具有革命性 [Marxism and Freedom, 第190页]，以及在1923年，他说除非让无党派群众检查党的工作，否则官僚主义将拖垮工人的国家，他们将倒退回资本主义 [Marxism and Freedom, 第40页]。无论如何，我们的问题都不是会不会有一场革命，而是在那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是否总是面临着一位拿破仑或一位斯大林？简而言之，如果不把无产阶级自发的自我组织与其对普遍性的追求<sup>②</sup>——用马克思在他的时代所用的方式——联系起来，我们就只能预见极权主义的后果。

（三）在我的前言中，我说明了本书思想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1）古典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哲学、法国革命学说，它们与其时代的现实社会、经济状况的关系：工业革命、法国革命直到第一次资本主义危机。（2）马克思主义与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关系，马克思的成熟时期，1843—1883年，同样还有在1889—1923年这段时期的马克思主义。（3）我们的时代——我称其为国家资本主义与工人造反<sup>③</sup>——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对俄罗斯的五年计划的分析，对在斯大林死后发生在民主德国以及沃尔库塔<sup>④</sup>的造反的分

①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引用了《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的如下表述：“作为其自身目的的人类力量的发展，即真正的自由王国”（Marxism and Freedom, p. 145）。

② 马克思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写道“个体对普遍性的追求、全面发展的趋势”，随后写道“自动化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MECW 6, p. 190）。

③ 参见 Chapter 13 of *Marxism and Freedom*, “Russian State-Capitalism vs. Workers’ Revolt”。

④ 1953年7月，位于俄罗斯北部的沃尔库塔强制劳动营的约一万名矿工举行了罢工。参见 *Marxism and Freedom*, pp.252–254。

[305] 析；最后是对自动化<sup>①</sup>的分析，不过该部分相较而言更为简单、发挥得更自由。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已经在导言中得到了概括，在那里我解释了创作本书时采用的方法——研究始于1939年我和托洛茨基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决裂，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的架构一直没有成型，直到1950—1953年，矿工为抵制自动化而罢工的时候<sup>②</sup>，东欧出现造反的时候<sup>③</sup>，我才得以将我的所有观点介绍给了一些工人团体，他们对材料做了检查和讨论。“任何理论家都不可能仅凭自己的头脑来创作，在当今世界更是如此。理论需要在工人自身的行动与思想基础上不断地塑造和重塑观念”（*Marxism and Freedom*, 第23页）。回到黑格尔的《逻辑学》（*Science of Logic*, 第73页脚注），我们看到，他在那里曾指出那些只拿走康德所得出的结论而抛弃其过程的人的做法就像是“为思维懒惰找一个枕头”[SLM, p. 62; SL1, 第73页]一样，而如果这种思维懒惰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在马克思主义者身上累积起来，那么我们在面对氢弹的威胁时，便只能表现出意识形态的落后性。需要的是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新结合，必须由工人阶级的新冲动来开启这种结合，这样一来就会远离思维的退化，也会使理论结出现实的果实。理论家一旦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他的工作就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总而言之，我没有把华而不实的结论当成处方。我展示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并呼吁知识分子以辩证法为基础来观察当代社会，以便使其思想在俄国极权主义和美国“民主”炸弹的统治下摆脱被统治、被威胁的

① 参见 *Marxism and Freedom*, Chapter 16, “Automation and the New Humanism,” pp.266–287。

② 一场长达9个月的罢工，是自20世纪30年代C10诞生以来的最长罢工，爆发于西弗吉尼亚州，最大的煤炭公司康索尔（Consol）在那里引入了自动化的“连续采煤机”。参见 *Marxism and Freedom*, Ch. 16, “Automation and the New Humanism”。

③ 杜娜叶夫斯卡娅指的是1953年6月17日发生于民主德国的、工人们为了“面包与自由”而发起的暴动，1953年7月发生在俄罗斯北部沃尔库塔强制劳动营的罢工以及1956年11月的匈牙利革命。详见 *Marxism and Freedom*, Ch. 15,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Russian Totalitarianism”。

状态。工人们可以靠自己做到很多事，但他们也未能构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但是如果从实践到理论的运动与从理论到实践的运动结合起来，那么就会创造一个**重要的**（serious）开端。

当然本书还涉及另外一些方面，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美国根源，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早期著作及《资本论》的曲解，因为它试图研究我们这个从工业革命到自动化的机器时代。但我认为只要读者抓住了本书的中心点，即其哲学地基，那么他就不会错过本书所涉及的任何内容。

我知道您的《理性和革命》在1941年所带来的影响。他们既不能将黑格尔视为“老狗”，也不能将马克思的早期著述仅仅视作“伟大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的人道主义的附加物。那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像我一样的“一个十足的经济学家”在讲话。当这两者结合到了一起，就会带来荣耀、哈利路亚——还有浩劫。但学者们不要认为自己有多聪明——他们都会掉进“人民战线”（Popular Front）<sup>①</sup>，但是如果没有任何一些坚实的理论地基和社会愿景，那么就不可能与俄国的或其他别的极权主义进行抗争。

[306]

① 从1934年到1939年，斯大林主义化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立了“人民战线”以对抗法西斯主义。在这段时期，共产党与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以及自由主义者在民主和反法西斯的名义下联合了起来。与此同时，在内战期间夺取了国家权力的西班牙的人民战线，以及法国的人民战线都对苏联内部的压抑保持沉默，尽管法国保持沉默的时间比较短。人民阵线也排斥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西班牙，共和国的人民战线政府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它由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组成，与得到德国和意大利支持的法西斯主义者陷入了内战。西班牙的人民战线政府拒绝支持彻底的社会变革，例如由农民来没收土地、由工人来控制工厂，这些事情在杜娜叶夫斯卡娅这样的激进左派看来，是有助于增强共和国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力量。然而斯大林主义者则指责这些激进左派是法西斯的代言人，试图分裂左派。1939年，当法西斯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中击败了共和主义者后，苏联转而抛弃了人民战线政策，签订了希特勒—斯大林条约。就这样，苏联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事实上放弃了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直到希特勒于1941年侵略苏联。因此，像杜娜叶夫斯卡娅这样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左派就把人民战线视为失败的政策，认为它导致了反法西斯事业在西班牙的失利，而独立的左派在人民战线中则被第三国际利用了。

我自然不能说是否成功地达到了我的目标，但如果说意图就是成就的话，那么我可以这样说在《马克思与自由》中的**新东西**有：(1) 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哲学地基的重建，重建所采用的方式是如此具体，以至于我们的机器时代的起源以及最近的自动化时期都变得活灵活现了；(2) 对马克思整个三卷本的《资本论》做了总结，采用的方法可以使读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既是理论也是方法论；(3) 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维度，而它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他能够真正地理解从实践到理论的运动，使他能够与工人一样热切地渴求两者的结合。

我希望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回应您要我概述这本书的要领的要求。我也把前言附在了参考文献中，这样您就可以在那里看到我所有的问题了。

**非常热切地期盼着您写的序。**

\* \* \*

[307]

1957年10月9日

亲爱的杜娜叶夫斯卡娅：

说实话，我对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的美国根源”，以及说马克思在美国内战的冲击下对其《资本论》的“结构进行彻底重造”这样的观点感到些许不安。我不记得您的书是否有对这些构想给出证明——当我阅读它的时候，我并没有这样的印象；但可能我的记忆有误。近来我简略地、非常不系统地检查了一遍，但并不太成功：我并未找到任何证据能够支撑这样的观点。我的朋友炮轰般地向我提问，而我自然更加在意马克思的美国化！

如果您能够非常简要地概括一下您的证据或者只需简单写下主要的参考资料——可以是在马克思的信件中或别的什么地方——那将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抱歉打扰您了——但既然您已经完成校样和索引，那么这个要求也许不



算太过分。如果这很困难，那就算了吧。

致以最好的祝愿。

赫伯特·马尔库塞

\* \* \*

1957年10月11日

亲爱的马尔库塞：

非常感谢您于9日的来信，给了我一个追溯马克思主义的美国根源的机会。此前我已简述了本书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和人道主义。随着出版日期的临近，也是时候该说明一下这一补充命题了。我想用《资本论》的结构来阐明这一点。这本书的结构所发生的变化与第二国际、改良主义者和革命派等无关。直到罗莎·卢森堡在1913年<sup>①</sup>才开始提出这个问题，即恩格斯利用马克思留给他的材料“制造了”什么，而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将其结构上的变化视作一个“文学问题”。共产主义者们延续了这一传统（参见 Leontiev in *Bolshaya Sovetskaya En-*

[308]

① 罗莎·卢森堡（1871—1919），德国和波兰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领导者，她在1905年俄国革命的余波中批判改良主义，并详细阐述了一种关于革命自发性的理论。作为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激烈的反对者，卢森堡于1919年在柏林协助领导一场社会主义起义时遭到暗杀。此外，她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包括在她那屡受外国统治的祖国波兰的民族主义，认为它们过时了。在她去世前，卢森堡敏锐地批判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俄国建立的一党制国家，当时她正因为公开反对德国的军国主义而遭受牢狱之灾。她最杰出的经济学著作是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ic Explanation of Imperialism* (1913); English trans. by Agnes Schwarzschild, London: Routledge, 1951。

*cyclopaedia*<sup>①</sup>)。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都对罗莎·卢森堡发起了攻击——一场引证之战，但都没有进入到《资本论》的结构中，直到1929年的亨利克·格罗斯曼 (Henryk Grossman)<sup>②</sup> 为止。他首次对《资本论》的结构变化做了认真的分析。不过他主要关注的是经济；他反对卢森堡的消费不足论 (underconsumptionism)<sup>③</sup>，也反对将利润率的下降以其马克思主义的形式重新建构成积累理论的中心。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结构上的变化，它们发生在马克思创作《大纲》和《批判》<sup>④</sup> 的19世纪50年代后期，以及《资本论》取得其最终形式的60年代末：

- [309] 1. 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马克思在1858年4月2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 [MECW 40, p. 296] 以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指出《资本论》的最初计划有6卷，分别为：(1) **资本**；(2) 地产 (土地所有制)；(3)

① 《苏联大百科全书》 (*Bolshaya Sovietskaya Encyclopaedia; The 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 分三个版本出版：1926—1947年，1950—1958年以及1969—1978年。A. 列昂季耶夫 (1901—1974年) 著有以下著作： *Political Economy: A Beginner's Cours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5 ; *Marx's 'Capital'* ,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6。

② 参见 Henryk Grossman, *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Breakdow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Being also a Theory of Crises*, trans. Jairus Banaji, London: Pluto Press, 1992, orig. 1929。

③ 这种见解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缘于消费需求的不足；杜娜叶夫斯卡娅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中批评这种见解浮于表面，并且最终是不正确的，她在书中的第8章写道：“通过对消费不足论的驳斥，马克思指出在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 (*Marxism and Freedom*, p. 131)。这是由于生产创造出了它自己的市场，而那些未能被工人和资本家消费的剩余产品，则通过马克思 (以及其他经济学家) 所称的生产性消费的过程被资本自身所消费。杜娜叶夫斯卡娅认为卢森堡最终也是一个消费不足论者，因为她的经济理论预言了凯恩斯主义。要想了解更多杜娜叶夫斯卡娅对卢森堡的批判，参见 “Marx's and Luxemburg's Theories of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Ch. 3 of *Rosa Luxemburg, Women's Liberation, and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 (Urbana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orig. 1982)。

④ 参见 Marx, *Grundrisse*, trans. By Martin Nicolaus, New York: Penguin, 1973。这是马克思写于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述的初稿。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9)》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59)*] 篇幅较短，是他出版的第一本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

雇佣劳动；(4) 国家；(5) 国际贸易（对外贸易）；(6) 世界市场。

在马克思不考虑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指出美国也发挥了阐明劳动范畴的作用：“这种情况在最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美国那里找到了它最为发达的形式。只是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政治代经济学的起点，才在实践中得以实现。”<sup>①</sup>

2. 我在本书第5章“美国南北战争对《资本论》结构的影响”中指出，19世纪60年代的十年对于《资本论》的结构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美国内战、英国北部工人大动员、波兰暴动、法国骚乱以及第一国际创立的历史时期。马克思自己很好地描述了这十年的新事物，在1860年1月1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他写道：“在我看来，当今世界发生的最大的事件，一方面是由约翰·布朗的死所引发的美国奴隶运动，另一方面则是俄国农奴运动。”[MECW 41, 第3页] 两年后，马克思在1862年7月30日与拉塞尔就“北方佬”的话题展开了讨论。[MECW 41, 第388页] 这在马克思于1863年8月15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最为突出，他在信中直接谈到了《资本论》的结构：“当我看着这一庞然大物，而且回想起我曾不得不把一切统统推翻，而历史部分甚至要根据一部分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材料去加工时，就感到他（拉塞尔）和‘他的’已经完成的经济学显得可笑。”[MECW 41, 第488页]

通过比较《资本论》的结构与《批判》的结构，我揭示了是什么“把一切统统推翻”了。我的根据是一些通信以及恩格斯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所列出的材料。除了《资本论》第1卷结尾外，在档案二（七）<sup>②</sup>中，同样概述了改动的地方；列昂季耶夫在讨论《资本论》时也列出了《笔记本》

① Marx, *Grundrisse*, p. 105。另参见 MECW 28, p. 41。我们现在知道这一文本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的导言。

② *Arkhiyy Marksa-Engelsa*, ed. V. V. Adoratsky, Moscow, 1993.

和改动的地方。<sup>①</sup> 同样不该遗漏的还有马克思为维也纳出版社所写的关于内战的报告<sup>②</sup>，在其中他再现了废奴主义者的演说，尤其是温德尔·菲利普斯 (Wendell Phillips)，马克思评论他说：“就最近的情况来看，温德尔·菲利普斯的演说比一份战斗公告更为重要。”<sup>③</sup> (这与他致林肯的信及其他信件一起都出现在了《美国内战》<sup>④</sup> 中。) 如您所知，一些流亡到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边声称自己“反对一切奴隶制、工资和动产” [*Marxism and Freedom*, 第 84 页]，一边又避免自己被卷入美国内战，而与他们相比，马克思则积极地参加了海外的群众运动。与此相反，马克思在 19 世纪 50 年代曾与流亡者群体以及他们的活动保持着距离。正如我在讨论内战对于《资本论》结构的冲击的那一章的开头所指出的那样：“有些人把马克思捧到天上去，吹捧他的天才，好像这种天才是脱离他所生活的那个历史时期的现实斗争而成熟起来的。好像马克思的灵感完全产生于他个人的思想发展，而不是来自以行动改变活生生现实的活生生的工人……崇拜理论与天才而看不到理论著作**局限性**的人们，同样无法认识**理论家的不可缺少性**。” [*Marxism and Freedom*, 第 89 页]

3. 从 1863 年到 1866 年，在对《资本论》进行了三年的艰苦修订后，马克思依旧不满意。在 1866 年 2 月 10 日的一封信中，我们看到了原因：“我对《工作日》一节做了历史的扩展，这超出了我原来的计划。” [*Marxism and Freedom*, 第 88 页；MECW 42, 第 224 页] 当马克思写完了关于工作日的这个宏大的章节之后，他再次写信给恩格斯表达了他的欢喜之情，因为美国工人“由于正确本能”而提出了 8 小时工作制的构想，而这也

① Leontiev, *Marx's "Capital"* (1946) .

② Die Presse 是维也纳的一份报纸，马克思的许多关于内战的文章都发表在了上面。

③ 温德尔·菲利普斯 (1811—1884)，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工人与妇女权利的倡导者，曾短暂地参加过马克思的第一国际。杜娜叶夫斯卡娅对菲利普斯有所引述，参见 *Marxism and Freedom*, Ch. 5, “The Impact of the Civil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Structure of Capital”。

④ Marx and Engels, *The Civil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7.

是他为第一国际的日内瓦代表大会所拟定的。<sup>①</sup> 马克思将此直接写入了《资本论》(在第八章“工作日”的结尾), 当他引述巴尔的摩革命的时候, 他将其与第一国际并称为“在大西洋两岸的工人阶级运动”, 此外他也更进一步地将白人和黑人劳工联系了起来: “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 白人的劳动也不能解放自身。但是, 从奴隶制的死亡中立刻就萌发出一个新生命。南北战争的第一个果实, 就是争取8小时工作日运动……”<sup>②</sup>

[311]

4. 最后, 美国根源不仅存在于(马克思自己)已完成的第1卷中, 而且也存在于其未完成的第2卷和第3卷中。<sup>③</sup> 在“第2卷与第3卷的逻辑与规模”[这一章]中, 我引用了马克思致丹尼尔逊的信, 信中, 马克思让他在翻译第1卷之前不必等第2卷了, 因为他从俄国和美国那里获得的材料太多了: “如今美国已超越了英国……群众更为活跃, 并且手中掌握着更强的政治手

① 杜娜叶夫斯卡娅似乎指的是马克思在1866年10月9日写给德国社会主义者路德维希·库格曼(Ludwig Kugelmann)的信, 他在那里写道: “[与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 同时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代表大会使我感到很高兴。那里的口号是组织起来对资本做斗争, 而且令人惊讶的是, 在那里, 我为日内瓦草拟的大部分要求由于工人的正确本能也同时被提出来了。”(MECW 42, p. 326)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工作日”一章里也写道: “这样, 大西洋两岸从生产关系本身中本能地成长起来的工人运动, 就证实了英国工厂视察员罗·约·桑德斯的话: ‘如果不先限制工作日, 不严格地强制贯彻工作日的法定界限, 要想在社会改革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是决不可能有任何成功希望的。’”(MCIF, p. 415; MCIK, p. 329.)

② 参见 *Marxism and Freedom*, p. 84。马克思的完整表述为: “在北美合众国, 只要奴隶制使共和国的一部分还是畸形的, 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就仍然处于瘫痪状态。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 白人的劳动也不能解放自身。但是, 从奴隶制的死亡中立刻就萌发出一个新生命。南北战争的第一个果实, 就是争取8小时工作日运动, 这个运动迅速从大西洋跨到太平洋, 从新英格兰跨到加利福尼亚。1866年8月在巴尔的摩召开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宣布: ‘为了把我国的劳动从资本主义的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当务之急是颁布一项法律, 规定8小时工作日为美利坚联邦各州的正常工作日。我们决意竭尽全力, 直到获得这一光荣的结果为止。’”(MCIF, p. 414; MCIK, p. 329)

③ 马克思于在世时完成并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 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 恩格斯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编辑出版了第2卷和第3卷。

段，可用来对那种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而实现的进步形式表示愤慨。”<sup>①</sup>因此我认为俄国和美国在第2卷和第3卷中显然应该扮演英国在第1卷中所扮演的角色，显然列宁充实了第2卷关于俄罗斯的内容，而美国工人则在他们对待自动化的态度中使其具体化了。[*Marxism and Freedom*, 第148页]在最后一章“自动化与新人道主义”中，我讨论了1929年的危机问题，讨论了计划者与普通工人的区分，普通工人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产业工人联合会(CIO)<sup>②</sup>，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他们却与他们的劳工领袖反目成仇，因为后者变成了官僚，甚至像工厂的管理者那样压迫他们。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我讨论的主题是“废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理论与实践的新的统一”。

[312] 在我之前写给您的信中，我既没有给出蓝图、也没有高呼“跟着我来”的口号，我只是概述了能够获得新动力的地方——在工人那里：“长久以来，美国工人阶级对于欧洲工人和欧洲知识分子来说，一直是一个谜。在产业联合会成立以前，欧洲人一直试图‘证明’美国工人的落后性。他们的证据是，美国工人一直没有建立起产业工会……美国工人似乎是非政治的，因为他们没有建立起群众性的政党。美国工人似乎是非社会主义的，因为他们对马克思的大部分学说都不熟悉……归根结底，促使社会清醒地面对劳动条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代文明的破产（包括所谓的先锋队政党的破产）的标志是其思想的破产。除非马克思主义就在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愿望中，否则列宁逝世后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空白就会仅仅对马克思主义者有意义。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于从激进小团体那里收罗垃圾和悲天悯人的小论文中，也不存在于从保守的大学的书架上收罗垃圾的貌似惊人的大部头著作中。”[*Marxism and Freedom*, 第276—277页、第282页]我

① 马克思致尼古拉·丹尼尔逊 (Nikolai Danielson, 1844—1918, 《资本论》的俄文译者之一) 的这封信写于1879年4月10日。参见 *Marxism and Freedom*, p. 148 ; MECW 45, p. 358。

② 产业工会联合会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于1935年从更为保守的美国劳动联合会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脱离, 两者后来在1955年合并。

认为我解释了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里所采用的方法，并且我把那些对它有过帮助的美国工人和学生青年称为其真正的联名作者。

现在，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加一些个人的注释，因为尽管这本书还没出版，但对我的攻击已经开始了。您的朋友就马克思主义的美国根源问题对您发起炮轰<sup>①</sup>，而共产主义者则用“真故事”来炮轰出版商和批发商，我被说成是原本1917年就可以逃离俄国，但我却没有，因为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白色的血液”<sup>②</sup>。我希望我不会回到从事秘密活动的日子，就像我还是托洛茨基的秘书时，我不得不随身携带手枪并学习如何射击那样。《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在1944年出版我所翻译并加以评论的俄国修正马克思主义作品时，便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方面苏联使馆指控我为法西斯主义者，而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称该书的出版无益于俄国和美国的“盟友”关系，夹在这两者间的编者需要更多的知识分子的诚实和勇气，否则工作无法继续。作为一个好将军——当今的哲学家也必须是好的战略家——我相信您不会对随出版而来的一切感到惊讶。您的序可以完全表达您的观点，而我也相信我的书本身也会表现得不错。

您的拉亚

\* \* \*

1957年10月15日 [313]

亲爱的杜娜叶夫斯卡娅：

感谢您的迅速回复。在我看来您的文献来源无法支撑如下观点：《资本论》的结构在美国内战的冲击下完全重构了。毫无疑问，原始的计划在

① 参见马尔库塞1957年10月9日致杜娜叶夫斯卡娅的信。

② 有人认为作为斯大林的对手，杜娜叶夫斯卡娅的确是一个保守的“白俄罗斯人”。

1857年和1866年间被大幅修订，但我找不到证据证明这种改变受到美国情况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事实上，阅览了马克思在这段时期的书信之后，我对马克思相当偶然地提到美国感到震惊。或者，如果您拒绝“偶然”这个说法的话：提到美国在我看来，和提到当时欧洲的事件并没有什么不同。抱歉！

我想对您受到的人身攻击做一下回应：将我的朋友的问题与您过去生命遭到威胁并不得不佩枪的回忆联系在一起，这毫无根据！他们将您的宣言视为对马克思的学术性（允许我这么说吧！）<sup>①</sup> 阐释，应该经受知识分子的拷问。相信我，他们想要的是知识，而不是攻击和反击。您此后不应再对此感到愤恨，或不应抹杀他们的态度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

致以衷心的问候！

赫伯特·马尔库塞

\* \* \*

---

<sup>①</sup> 原文为拉丁语：*sit venia verbo!*



## 1961年3月6日致拉亚·杜娜叶夫斯卡娅

亲爱的杜娜叶夫斯卡娅：

感谢您的来信和附件。但我必须表明我对您关于“莫斯科宣言”（*Moscow Manifesto*）的论文极不赞同。而您对艾萨克·多伊彻的攻击<sup>①</sup>则使这种不赞同变成了极度的反感。这些攻击完全就是极为流行的麦卡锡式的指责：多伊彻有着“如此系统的共产主义头脑，他倒不妨戴上党证而不是学者证。”这就像在说：尽管他（很可能）还不是，但他很可能成为一名正式党员。简直太离谱了！这话甚至可以被收进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的秘密档案。

[314]

---

① 马尔库塞指的是杜娜叶夫斯卡娅在《两个世界》专栏的文章《新俄罗斯共产主义宣言》（*The New Russian Communist Manifesto*），参见 *News & Letters* 6:1（January 1961），她在文中攻击了艾萨克·多伊彻（1907—1967）。多伊彻是著名的盎格鲁—波兰作家，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传记的作者。多伊彻自己的政治立场主要是托洛茨基主义，不过他对斯大林的评价又比一般更高，这使得他与杜娜叶夫斯卡娅有着严重的分歧，因为后者是左翼托洛茨基主义者，并且批判托洛茨基为1939年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所做的辩护。在她的专栏中，杜娜叶夫斯卡娅如此描述多伊彻：“他被误认为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独立’思想家，但他有如此系统的共产主义头脑，他倒不妨戴上党证而不是学者证。”杜娜叶夫斯卡娅奚落多伊彻将81个共产主义政党于196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与20世纪20年代的共产国际相比，认为他错把“计算机革命、现存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刚刚从历史上最伟大的自发的革命中诞生的工人国家”混合在了一起。不过，她的专栏的主要内容讲的是俄罗斯和中国试图影响第三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斗争。

我想也许是因为曾给您的书作序，所以我才会仍然关心您的这些事：您结交的朋友，从麦卡锡到联邦调查局。在这里，**世界精神**（Weltgeist）同样不可抗拒。他总是站在正确的一方并找到正确的盟友。而由于我不是被世界精神所眷顾的孩子，我想声明，在我看来，多伊彻不仅是一名伟大的学者，而且还是一个伟人，他敢于在右翼和左翼的仆人们的合唱中唱反调……说到您的论文的内容：将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与当前的国际组织相比较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在这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发展联系。像您那样将两者对立起来也是合法的。但任何人都不能夸大或缩小事实，不能像您那样，将前者当做一个“工人国家”的机构，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政权的典范（在1928年!!），等等。用您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比事实更深入的东西。”（对此您应该再清楚不过了）

[315]

是否有一天您能够克服您那情绪化的毛病，安稳地做一名真正的分析者——一名对得起您所宣称的名号的分析者？正是由于在您的《新闻与书信》（*News & Letters*）中缺失了这样的分析，才使得将“特鲁希略和卡斯特罗的专制”<sup>①</sup>混为一谈得以可能——如果马克思和黑格尔知道有这么一种“工人阶级”，他们会气得从坟墓里爬出来。有时候我会感到好奇，您是否毫不担心这样的表述会与国务院、中情局的表述相近——但可能我这么说会对这些机构不公：我想它们实际上是知道区别的（本质的区别!）。

① 马尔库塞大概指的是彼特·马洛里（Peter Mallory）[约翰·德怀尔，John Dwyer] 在其专栏《我们的生活与时代》（*Our Life & Times*）中的短文《海地》（Haiti），参见 *News & Letters* 6:2（February 1961）。这篇描述学生抗议杜瓦利埃（Duvalier）政权的文章称海地是“一个夹在特鲁希略与卡斯特罗的专政之间的国家”。杜娜叶夫斯卡娅在其《两个世界》专栏中，以《古巴革命一年后》（*The Cuban Revolution One Year After*）为题，首次着重对菲德尔·卡斯特罗那被她称为自上而下的“管理思想”做了批判，参见 *News & Letters* 5:10（December 1960）。1961年猪湾事件以失败告终后，杜娜叶夫斯卡娅在一篇题为《肯尼迪政府与卡斯特罗的古巴》（*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and Castro's Cuba*）的社论中为古巴做了辩护，参见 *News & Letters* 6:5（May 1961）。文中，她写道：“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反对并将继续反对美国对古巴所进行的任何帝国主义侵略”，而同时她又批判卡斯特罗越来越依靠俄罗斯，表达了对古巴革命正从内部遭到压制的担忧。

抱歉！我是否需要去看一下心理医生，以诊断一下我的“系统的共产主义思想”，或者我是否要发誓我现在没有、以前没有、将来也不会觉得“倒不妨”戴上党证？

赫伯特·马尔库塞

## 弗兰茨·纽曼的《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序言<sup>①</sup>

1954年9月2日，弗兰茨·纽曼在瑞士的一场交通事故中丧生，时年55岁。

他是一名少见的政治型学者。从一开始，他的理论工作就受到了政治兴趣的驱动；对他来说，政治是生活的要素，而他也一直坚持努力把他的学术工作和实践行动融为一体。他在法兰克福大学就读期间，深受其师友、德国劳动法之父胡戈·辛茨海默（Hugo Sinzheimer）的影响。他在毕业之后，从1925年到1927年任教于劳工学院（Academy of Labor），随后作为一名劳工律师定居于柏林。从1928年起，他任教于柏林的政治大学（Hochschule für

---

<sup>①</sup> 弗兰茨·纽曼的《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序言，刊登在了马尔库塞为其好友弗兰茨·纽曼所编辑的作品集里（New York : Free Press, 1957, pp.vii-x）。1954年9月2日，纽曼年仅55岁就悲剧性地死在了瑞士的一场交通事故中。随后马尔库塞论述了纽曼作为魏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一名劳工律师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他在二战期间辗转于社会研究所、战略服务局以及国务院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在战后于哥伦比亚大学政务学院获得了终身教职。马尔库塞强调了纽曼在民族社会主义方面的权威研究作品《比希莫特》的意义，认为此书试图“在当代的工业社会中，以及在极权主义兴起于德国的那些历史状况中，确定极权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根源”。关于马尔库塞与纽曼的亲密关系以及他们于20世纪40年代在各项课题中的合作，参见《马尔库塞文集》第一卷《技术、战争与法西斯主义》。——编者注

Politik)。魏玛共和国的命运、民主社会主义的式微以及对抗纳粹政权的斗争成了他的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他因担任社会民主党的行政法律顾问于1933年4月遭到逮捕，但同年5月，他伺机逃离了德国。纽曼是第一批被希特勒政府剥夺公民权的人。放逐并没有减弱他高涨的政治热情：他设法给那些反纳粹的移民提供咨询，无论在实践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他都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与此同时，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主要师从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他敬佩哈罗德并与其成了朋友。

[316]

1936年，纽曼来到美国并加入了社会研究所，随后又成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员。他与研究所、负责人霍克海默及其他工作人员结下了深情厚谊，他们在理论、政治以及私人方面的联系都密不可分；在纽曼去世时，正是同样身处瑞士的研究所同僚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在其葬礼上发表了讲话。

研究所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详细阐明这样一种理论观念，即它能够将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机制理解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结构，从中可以推断未来的发展趋势。这项事业建立在全体成员所共有的某些见解基础上，尤其是，要有一种历史理论作为正确理解社会现象的先决条件，而这样一种理论会为客观地批判既定社会提供标准，从而可以评估其违反人类自由的历史潜能的功能和目标。

在社会研究所期间，纽曼完成了他的《比希莫特》（*Behemoth*）一书，目的是为了在当代的工业社会中，以及在极权主义兴起于德国的那些历史状况中，确定极权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根源。而在他效力于战略情报局稍后效力于国务院期间（1942—1946），纽曼运用他在先前的研究中所获得的洞察力对德国的发展做了分析和预测。他将绝大部分的精力贡献给了可以避免重蹈魏玛共和国覆辙的德国民主化计划；他试图阐明，若要有效地去纳粹化，就决不能局限于肃清纳粹人员和废除纳粹法律——必须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根基发起进攻，即根除德国大工业反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尽管纽曼已经意识到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但他还是在一些仍有努力余地的狭小领域坚持为强化德国内部真正的民主力量而工作。作为柏林自由大学在美国的联络员，

他为这个机构的兴起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此外，他为柏林政治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重新恢复了与德国工会、社会民主党的联系，并且还向美国、德国的朋友和官员提供建议，以应对这个分裂的国家不断恶化的政治形势。

[31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曼加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队伍，而政府的工作对他来说则退居次席。他的人格和他的理念为他赢得了同僚和学生的情谊；他向他们传达了自己的信念，即政治理论不仅仅是意见和评论的集合，而是政治必不可少的基础。因为政治决定着人类的命运，而这些决定来源于支配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他在法西斯和后法西斯时期的经历——民主社会主义的失利以及朝向极权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强化了这一信念。对纽曼来说，这种经历给他造成了无法愈合的创伤。在他最后的日子，他曾试图为如下可怕的问题找到解答：为何人的自由和幸福，在文明的成熟阶段，在实现它们的客观条件空前完备的时候，反倒会减少。他对专制的形式、功能及社会根源做了广泛的研究。他看到民主与极权主义的传统对立在历史事实面前暴露出了其不恰当性。他的工作并未完成，只有收录在这个文集集中的几篇文章可以使我们得以了解他探寻解答的方向。与《比希莫特》时相比，他对经济决定因素的强调有所减弱，而是把这些决定因素放在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框架中。他收集了大量的与各种专制形式有关的历史材料，这些材料有助于加深对当前极权主义的理解。他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底层民众对专制的支持。为此，他重新考察了现代工人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和工会中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瓦解。在这一领域，他最后研究了二战后德国鲁尔区的工业中处于危险境地的共同决策（Mitbestimmungsrecht，工人在管理方面的共同决策）的观念与实践。他对被组织起来的工人在政治思想和行动方面的弱化感到心惊胆战，但他也知道这不能简单地用理想破灭、冷漠无情、贪污腐败来说明。由于当前社会发生的结构性变化，理论工作仍有待进一步开展。而这一理论也会相应地为政治自由提供指引。对他来说，政治理论才刚刚起步：在为一个更好的世界而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这是一件必不可

少的武器。他是最值得称赞的知识分子，当今世界将因他的离去而变得更加贫瘠，更没了希望。

这个文集所收录的大部分文章是纽曼本人挑选和准备的。我添加的部分是：

- 《关于专制理论的笔记》(Notes on the Theory of Dictatorship)。尽管这是一份十分零碎的手稿，但它却展示了纽曼的理论工作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的发展方向。

- 《精神自由与政治自由》(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Freedom)，完成于纽曼在德国波恩的一场以庆祝哥伦比亚大学 200 周年校庆所作报告为框架的演讲之后。这篇文章对另一篇文章《政治自由概念》(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Freedom) 做了补充。

- 《20 世纪的经济与政治》(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318]，是他于 1951 年在柏林的德国政治大学发表的演讲的删节版。我认为这场演讲是一个很好的反映纽曼具体政治思考的例子。

只有少数编辑上的改动，尤其是现在看到的《焦虑与政治》(Anxiety and Politics) 这篇文章，它甚至保留了在终稿中删去的部分。其中有些地方就会出现重叠和重复，但却不能删掉它们，因为如果删掉的话就会破坏原来的语境。

我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朱利安·富兰克林 (Julian Franklin) 和彼得·盖伊 (Peter Gay)，朱利安编译了《关于专制理论的笔记》，而彼得编译了《精神自由与政治自由》与《20 世纪的经济与政治》。

感谢下列出版商，感谢他们允许转载先前已经出版过的材料：《政治自由概念》，1953 年，《哥伦比亚法律评论》(Columbia Law Review)；《联邦制国家理论》(On the Theory of the Federal State)，1955 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导言》，1949 年，哈夫纳出版集团；《论合理反抗的限度》(On the Limits of Justifiable Disobedience)，载麦基弗 (R. M. McIver) 编《忠诚的冲突》(Conflict of Loyalties)，1952 年，哈珀兄弟出版社；

《政治权力的研究路径》(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ower), 1950年, 《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现代社会中法律功能的变化》(The Change in the Function of Law in Modern Society), 1939年,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赫伯特·马尔库塞  
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  
布兰迪斯大学  
1956年9月



先生们：

我想更正一下亚历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先生在其书评（《党派评论》，1958年秋）中对我的书<sup>②</sup>的误评和误读。

“马尔库塞先生的书的主要观点是说，苏联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种连贯的理论，与列宁主义及‘前身马克思的学说’相一致。”

当我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连贯的理论时，我的“主要观点”正好和英克尔斯先生的后半句话相反。我除了曾强调过列宁主义与“前身马克思的学说”之间的决定性差别（第29页以下）之外，还曾试图指出，例如，（1）我将辩证法视为马克思思想的核心，而它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中却变成了和在马克思那里相反的东西（第7章，特别是第150页以下）；（2）第一

---

① 《苏联的理论与实践》，刊于 *Partisan Review*, 26, 1 (New York: Winter 1959), pp.157-158。这篇文章回应了亚历克斯·英克尔斯对其1958年出版的著作《苏联的马克思主义》(*Soviet Marxism*)的批评，批评文章刊于 *Partisan Review*, 25, 4 (New York: Fall 1958)。马尔库塞称，英克尔斯完全错误地断言他主张的是“苏联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种连贯的理论，与列宁主义及‘前身马克思的学说’相一致”，而马尔库塞称自己主张的是相反的观点。这篇回应文章对马尔库塞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中的论题做了有说服力的概述。——编者注

② Herbert Marcuse, *Soviet Marxism: A Critical Analysi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次世界大战从本质上重新定义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推动者”以及革命路线的观念，而无产阶级的结构和功能也已随之发生了改变（第1章和第6章，特别是第34页和第126页以下）；(3) 与马克思所展望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再次变成了一种“具体化的、实体化的力量”——就像社会本身一样（第105页）；(4) 马克思在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压迫性关系中发现了剥削的根源，而苏联社会并没有颠覆而是保留了这种关系（第97页）；(5) 因此，关于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独特见解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第1章）；(6) 苏联体制的合理性是技术合理性，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而国有化（我将其与社会化严格区分开来）与工业化依然意味着“统治的进步”而不是统治的衰亡（第7章，特别是第84页）；等等。

[320] 不过，我的确尝试去**解释**这些变化，尝试去超越而不是仅限于将其表述为背叛、拒斥、矛盾、宣传等等。在试图解释的过程中，我也曾尝试着把重点放在那些对苏联社会的构建与对马克思的理论的重新定义“起决定作用的”、国内和国际局势中“客观的”因素。在这么做的时候，我受到了指控，被当成了“历史决定论者”。抽打马的老人被推出了马厩，“以精准的方向感”，我掉入了“一般来说历史决定论者会失足落入的”所有陷阱。“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屈服于“一种将冷酷的历史决定定义为‘客观事实’的倾向，并认为它就像是气候、资源、人口这类东西一样”。对于指控的前半部分，我没有异议：将历史决定解释为“客观事实”，这确实是我在历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学术观点。因此我根据“客观事实”来诠释斯大林恐怖的工业化政策，比如，根据做出决定时的情况来诠释。英克尔斯先生反对我的诠释，断言“快速的工业化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斯大林下了决定……”，而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关于这一事实的知识和认知已经广为人知了。但我既不满足于对事实的陈述，也不满足于另一个同样耳熟能详的推论，说斯大林“利用他对共产党机构的控制”强行实施他的决定。我想知道的是**这一决定是如何产生的，为何会有这样的决定**；而我觉得根据斯大林的人格、精神特质和权力

欲等等来进行解释，并不能得出恰当的解答。如果这就是决定论，那么我也很乐意被称为决定论者。但英克尔斯先生说我将历史决定和气候、资源之类的视为同类——换句话说，我否定了人的自由和责任这样的要素，对此我则不敢苟同。历史规律的观念只有以人的自由和责任为背景才会有历史意义。正如我在书中所讲的那样，“在人们习以为常的、他们为了与当时的自然和历史条件相适应而赋予自身的制度框架中，人们的行动推动着发展进程，他们是历史的推动者，而**他们的选择和决定就是历史的选择和决定。**”（第5页，黑体是后来所加）

英克尔斯先生问我为何要“费心”去将马克思原初的学说与苏联对它的发展“画上等号”。首先，我并没有费心去给两者“画上等号”，而是要在使它们得以发生的历史连续性中去解释它们。其次，我之所以“费心”去做这个，（我认为）是和英克尔斯先生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费心”去采访成百上千的穿越铁幕而来的难民，对采访进行分析并将分析结果与他自己的理论假设“画上等号”——既因为我想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现在正在发生着什么，还因为我不满足于我们已经知道或认为知道的东西。不过，我们的理论假设完全不同。

赫伯特·马尔库塞

\* \* \*

先生们：

[321]

马尔库塞先生说（第11页）：“事实是，布尔什维克政党与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发展起来的，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的一种具体诠释，而斯大林对苏联社会的重建就建立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后来，在讨论苏联的辩证法概念时，他说（第154页）：“然而必须注意到，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修改在理论上与马克思的概念一致。”我们也许在各章都能找到，甚至多次找到类似的表述，明确断言苏联的理论和

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及列宁主义是一致的。因此，当我说马尔库塞认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及前身马克思的学说相一致”时，就不能说是误评和误读。

事实上，如果要说到误评，我也必须指出马尔库塞先生误评了我的立场。在我的书评中，我并没有说他**否认了**自由和责任这些要素，而是说他忽视了这些要素。至于他从第5页引用的文字，则需要通过他在第8页所说的内容来加以理解：“选择是有的，但要强调它们是历史的选择——是在那些于两次大战之间进行伟大社会斗争的阶级面前所出现的‘选项’，而不是在**对苏联领袖进行评判时出现的选项。**”（黑体是后来所加）

当然这个问题并不能依靠引文的相互对照来解决，尤其是当引文脱离上下文时。关键问题是，这本书作为整体所带来的冲击。我不认为我在这本书的指向性方面造成了一种误导性的印象。如果这一印象不能代表马尔库塞先生真正要表达的意思，那么原因在于他的书，而不是因为我对他的正确看法给出了错误的描绘。在重读他的书的大部分内容之后，我的不满比起我在书评中所表达的有增无减，马尔库塞先生经常使他的读者“陷入彻底的混乱，弄不清楚一个给定的段落所代表的，到底是苏联理论家真的**那么说**，或者是他们没那么说但**意思是那样**，还是马尔库塞先生认为他们**真的是**在那么说，抑或是**他自己**认为是那样”。

亚历克斯·英克尔斯

## 致卡莱尔·科西克<sup>①</sup>

[322]

赫伯特·马尔库塞

马萨诸塞州牛顿市 58

玉兰大道 26 号

1963 年 3 月 22 日

卡莱尔·科西克博士

- 
- ① 马尔库塞于 1963 年 5 月 22 日致卡莱尔·科西克 (Karel Kosik, 1926—2003 年) 的信, 赖茨译。这位捷克哲学家先前曾致信马尔库塞, 问他关于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的最新看法, 而这封信是马尔库塞对此的回应。马尔库塞明确说他现在“拒绝任何声称在海德格尔和马克思之间有内在的 (或外在的!) 亲缘关系的尝试”, 认为海德格尔对纳粹的肯定性回应“不是别的, 正是表达了其哲学中深刻的反人道的、反理智的、历史地反动的、否定生命的倾向”。马尔库塞指出他对当代理论的态度在其 1955 年的著作《爱欲与文明》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 并告诉科西克另一本即将于时年 12 月面世的著作将讨论“发达工业社会的结构和意识形态”, 这说的是《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 1964)。卡莱尔·科西克在 1963 年出版了《具体的辩证法》(参见 *Dialektika konkrétního*, Prague 1963, 1965, 1966), 英译本出版于 1976 年 (参见 *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 Dordrecht: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科西克的这本著作和马尔库塞的早期著作一样, 都将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了起来, 而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 科西克逐渐成了民主社会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发言人, 这导致他在 1970 年丢掉了大学教职, 直到 1990 年才得以重回校园, 他被广泛地认为是他那个时代主要的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之一。——编者注

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 1 区  
城堡区广场 11 号  
捷克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亲爱的卡莱尔·科西克博士先生：

很高兴能收到您于 3 月 6 日给我的来信，里面涉及我在 1928 年对海德格尔的诠释。我已经不再参与这样的讨论了，所以无法对其做出评论，不过我可以向您提供我最近的一些想法。如今我会拒绝任何声称在海德格尔和马克思之间有内在的（或外在的！）亲缘关系的尝试。海德格尔对纳粹主义的肯定态度，在我看来，不是别的，正是表达了其哲学中深刻的反人道的、反理智的、历史地反动的、否定生命的倾向。在最近几十年，这一哲学剔除了其政治维度，失去了实质内容因而不值得被严肃地讨论：无止境地重复无意义的、没有解答的问题——因为它们不是真问题。除此以外，在黑暗中摸索并且侵犯语言的文字游戏来源于日耳曼式的空想（在所有其他语言中，这种文字游戏都失传了，因而它简直就是不可翻译的！）。我的著作《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的哲学探究》也许最好地代表了我如今的立场。要想更多地理解我的立场，可以参见我那本即将于今年 12 月面世的、讨论发达工业社会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的著作。<sup>①</sup>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我很乐意将样书寄给您。得知在您那边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注意到了我关于黑格尔的著作，是一件非常让人高兴的事。

至于您问到的关于海德格尔和卢卡奇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我记得我曾听海德格尔自己说过他从未读过卢卡奇的作品。对此我没有理由去怀疑。

如果您有更进一步的问题，请毫不犹豫地再写信给我。

---

①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致以最美好的问候和祝愿。

【赫伯特·马尔库塞】

## 悼念保罗·巴兰<sup>①</sup>

马尔库塞是布兰迪斯大学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教授。他和保罗·巴兰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起就是**亲密的朋友**，当时他们都效力于德国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

[324] 保罗·巴兰去世了。我希望能够记住他留在我心中的音容笑貌，他给我的印象是，如果不能痛切地意识到自由的表象背后有什么正在发生，如果不公开地揭穿现有体制的谎言，如果不对其原因或从其中获得解放的可能性进行考察或再考察，他简直活不下去。保罗重新抓住并保持了学者、知识分子的理想：在他看来，如果不对阻碍了人道社会兴起的**社会秩序**进行彻底的批判的话，才智和学识就没有意义。这样的才智和学识需要勇气。保罗有勇

---

<sup>①</sup> 马尔库塞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巴兰（Paul Baran，1903—1964年）关系亲密，而在巴兰于1964年去世之后，马尔库塞发表了一篇悼文，参见“A Tribute to Paul Baran”，in *Monthly Review*, 16, 11 (New York ; March 1965), pp.114-115。巴兰闻名于世的著作是他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合著的《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Monopoly Capital: 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以及他发表于《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著述，而马尔库塞认为巴兰是当今社会的古典知识分子、激进批评家。马尔库塞强调了巴兰的勇气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以及他的“智慧中有着豁达”的个人品质。马尔库塞与巴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一同在战略情报局工作，并在战后也一直保持着联系。——编者注



气：他从不妥协。他知道在今天以及在过去，对事实的客观分析都是对事实以及对制造这些事实的人的控告——在今天可能尤为如此，因为进步、生产力和军事经济如此卓有成效地掩盖了压抑、苦难和侵略；因为当今世界的疯狂显得如此正常，其不合理又显得如此合理。对于保罗来说，马克思的理论为理解将生产与破坏、繁荣与剥削、自由和压抑联系起来的机制提供了概念工具，对他来说，马克思的理论同样描绘出了破坏这一致命联系的可能性，以及构建一个更好的社会的可能性。保罗忠实于那些为此而斗争的人。知识支撑着希望，而科学保护着信仰——不是对什么超人或超历史的力量信仰，而是对人的信仰。才智与希望的结合，温和与毫不妥协的控诉的结合，使他成为我遇到过的最可爱的人；这也使他有着绝妙的作为爱的象征的幽默感：和那些真正严肃的人一样，他也会微笑、会捧腹大笑、会开玩笑。在他那不屈不挠的、尖刻的批判中，在他的驳斥和指责中，他也没有夹杂着侵略性和愤恨。在他的智慧中有着豁达——正是这种豁达带来了希望。

## 论改变世界：对卡尔·米勒的回应<sup>①</sup>

[325]

1967年6月以卡尔·米勒(Karl Miller)的名义发表在《每月评论》上的对《单向度的人》的书评，原本并不值得回应，如果它不是发表在《每月评论》这本以促进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为己任的杂志之上的话。在我看来，要完成这一任务，就要拒斥一切意欲通过不加批判地使用那些不足以理解主流社会力量和趋势的概念来扼杀社会主义思想的企图。在我看到对《单向度的人》有这样一种批评时，我感到焦虑，因为它指出我错误地高估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力量和凝聚力，低估了反对的强度和前景。卡尔·米勒的批判讽刺意味十足：他歪曲了我的立场，树立了一个假想敌，然后狂轰滥炸，恶意谩骂，而不是进行实在的论述。大体来说，他的论据不外乎有这么两类：

---

<sup>①</sup> 《论改变世界：对卡尔·米勒的回应》，原文是“On Changing the World: A Reply to Karl Miller”，in *Monthly Review*, 19, 5 (New York ; October 1967), pp.42-48。文中，马尔库塞回应了1967年6月的一篇“以卡尔·米勒的名义”发表的对《单向度的人》(1964)的批评文章。面对如下指责，说他“不了解事实”以及说他的态度会导致“寂静主义”，马尔库塞激烈地为其著作辩护，为自己对当时的发达工业社会的分析给出了强有力的马克思式的辩护。在详细的分析中，马尔库塞举出了一系列的例子，以说明“米勒”歪曲了他的著作，并指出比起米勒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和《单向度的人》之间有一种更为积极的关联。

(1) 说我不了解事实。或者完全蔑视事实，或者没有给出“细节”和“证据”，或者不问“有意义的和重要的问题”（所谓有意义的和重要的问题是指那些评论人认为有意义的和重要的问题）。总而言之，就是说我很愚蠢。或许的确如此，但我不认为卡尔·米勒证明了他的观点。

(2) 说我的态度会导致“寂静主义”（quietism），因此不利于一种以彻底社会变革为目标的理论：换句话说，我的态度有助于巩固现有体制而不是反过来。

我的批评者认为有必要提醒我记住马克思的“格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声称我颠倒了该主张。然而正是由于牢牢地记住了这一“格言”，我才写了这本书——这一意图也许在这样一个读者那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指责我，说我宣称世界无法被改变（第 57 页）。如果不是不情愿或没有能力去不带先入之见地阅读，是得不出这样的结论的。在今天，改变世界的必要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而正是对这一事实的认识要求社会主义的学者们承担起这一令人不适的任务，即理解和解释变革的状况和前景——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际发展所引发的**新的**状况和前景——而且在这么做的时候不能制造假象。

为了指出我的“论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自相矛盾的，卡尔·米勒开始用起了非辩证的逻辑，因而严重破坏了马克思的思想中最为基础的概念。他是这样来摧毁我的论点的：如果“彻底变革的目标是一个真正的可选方案”，那么“就必须有变革的推动者”。但根据我的论点，发达资本主义“有着近乎完美的”手段来“平息那些本来也许能导致其发生彻底转变的内部冲突”（第 49 页），来驯化那些彻底变革的推动者。因此，彻底的社会变革并不是真正的可选方案，它“不在日程表上”。“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无法否认“越来越多的人”将会感到需要彻底变革，那么这样一种变革就是“在日程表上的”，而我的论点就是错误的。

这样的逻辑也许适用于修辞学，但它却忽视了马克思的现实概念和理解现实的概念。卡尔·米勒向读者、向我讲的都是些深刻的不言自明的道理：

“(1) 社会和经济关系是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而 (2) 人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是辩证的而不是线性的” (第 55 页)。我希望他自己也能记住这一点，那么他也许就会想起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正是它在所有层面上都具有动态的、对抗性的趋势，也正是这些趋势引起了体制的内部矛盾，并且其中的一个矛盾，正是一方面是 (不确定的、暂时性的!) 对彻底社会变革的遏制，另一方面是对彻底社会变革的更为紧迫的需求。社会主义理论是关于变革趋势的理论；即使它无法确定在给定历史处境下起作用的变革的推动者，即使在现实中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不相符，该处境 (这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已经表现得很清楚!) 也不会否定变革的历史趋势。反之，如果社会主义学者，不是努力去分析和解释这一星丛的原因，进而去为其转变做准备，而是不愿意去面对事实，只是提出“变革的推动者”，而没有立足于对这些推动者在社会生产进程中的立场和作用进行批判性分析，那么他就会在当下由于对彻底变革有着可疑的、危险的预期而采取不负责任的行动。

在其评论中，米勒自始至终都把一种不属于我的立场、有时候甚至是相反的立场强加于我。下面举几个例子：

(1) 他坚称我使“机构”变成了弗兰肯斯坦 (Frankenstein)<sup>①</sup>，“生成并满足着虚假的需求” (第 50 页)，因此将一种技术决定论归咎于我。然而事实上，我认为“机构”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统治工具，我还强调它在何种程度上生成了需求，这些需求就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了真实的需求。

(2) 他坚称我认为任何“发达社会”都无法免于“技术恐怖”，“无论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哪一种 (第 50 页)。然而事实上，我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具有根本上不同的潜能，与此同时我也指出，只要机构

① 同名科幻小说的主角、年轻的科学家，创造出不被世间接纳的怪物巨人并最终与其共同归于尽。——译者注

仍然是一种统治工具，那么不管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有何不同，社会关系都仍然是压抑性的。

(3) 他坚称，我在评估不发达国家的变革状况时是在从事一种“卢梭式的对高贵野蛮人的追寻”（第 52 页）。他认为，我除了看到可替代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观念与该追寻之间相互对立之外，我看不到其他任何关系。

(4) 他声称我有一种“对事实本身的莫名的轻视”（第 51 页）——对此我只能说卡尔·米勒关于事实的见解肯定很奇怪。

(5) 他认为，我在分析中应该运用简单的刺激与反应关系，但他却没有向我的读者指明“经典、简单的刺激—反应理论”并不总是“起作用”，并且这样一种“简单的因果决定论”如今已经被摒弃了，正如在倾向于“一种整合了因果性解释和目的性解释的模型”的控制论和信息论所表现的那样（第 55 页）。我承认我没有向我的读者指明这一点，因为我的分析自始至终都在更为复杂的意义上使用着这一“模型”，而它乃是辩证思考的入门基础。例如，我没有将“正在进入当前工业阶段”（黑体为后来所加）的人描述为经过长期预先处理的接收器（第 54 页），但我却尝试着揭示了这一预先处理是如何在社会进程中发生的。我同样尝试着揭示了这并不是一种单向的决定，而是被预先处理者反过来也会对处理者产生影响——一种具有系统地“目的性”特征的交互关系。

[327]

(6) 他认为，我本应把这种预先处理说成是“恐怖行为”，而我却强调了单向度社会——在这里，对底层民众的整合完全建立在物质满足的基础上——非恐怖主义的、民主的特征。

现在要谈的是我的批评者对我所作的严肃批评，即我对于发生在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及“正在发展壮大的黑人运动”未能给予合适的关注和正确的评价。

(a) **黑人运动**。卡尔·米勒认为它“恰恰可以成为美国内部最重要的抵

抗潮流”（第 51 页）。“抵抗潮流”这个术语是暧昧的：这样的潮流据说包含着“多元社会”中所谓的相互平衡的所有团体和力量，也就是说，它是在既定社会框架中运行的潮流，而没有凭借其相应的利益、渴望和才能**对其进行超越**。而我的书所关注的正是那些潜在的**超越性**的力量，它们可能会使既定社会**本身**——而不是在其内部——发生变化。即使是粗略地对黑人在基本的社会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对他们的组织、对他们的核心利益进行分析，也很难使人相信在废除资本主义体制方面，黑人运动是潜在的“变革的推动者”。进一步说，很明显，这一体制完全有能力应对黑人运动——它不只是会通过残暴的镇压，如果威胁变得更严重的话，它还会做出相当大的让步和改进。此种让步和改进能够粉碎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社会、政治制度，这样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在骚乱流行了两年之后，这种体制有变弱吗？黑人运动的强度不减无关紧要——正如 1967 年 8 月 13 日、14 日的《法国世界报》所说：“在洛杉矶，一场奇妙的节庆在周五开幕了，预计会持续 6 天。这是为了悼念两年前在华兹黑人区发生的导致 34 名黑人死亡的流血冲突。悼念计划中有展览、爵士乐音乐会以及演出。一些白人也会参加这场将十分有序地进行的娱乐活动。”难道“穷人那里有很多钱”这一高傲的口号不是表达了一种可怕的现实吗？诚然，主要的问题之一是失业，经济越来越受到技术性失业的威胁，但仍然有再教育和创造新工作岗位的可能性。诚然，推动运动向着政治意识和政治目标前进的努力也在增强，但是只有少数黑人支持这些努力，并且不能**有效地**与发生在新殖民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联系起来，此外，其前景也一片暗淡，不知何日方能实现，对于这些事实，难道我们能够轻视吗？宣称我们要支持这些努力是愚蠢和多余的，因为这是自不待言的，而我们的责任是不带幻想地去评估其可能性。

(b) **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殖民地**。在此，卡尔·米勒又一次树立了一个用来打倒的“稻草人”。到底谁是由于在新殖民主义中看到了“受苏联和西方纵容的纯地缘政治的冒险行为”，因而“想要享受片刻安静”的共产主义者、“青年激进分子”、自由主义者？（第 52 页）任何人都可以持有这样的见解，

但我不会。除此以外，卡尔·米勒还批评我没能“将这些社会看作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组成部分——并且是必不可少的部分”（第52页），而正是在同一页他又责怪我高估了这些社会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工业集团的依赖程度。首先，如果仅仅将这些社会视作资本主义世界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对它们与社会主义世界的关系保持沉默，那是完全错误的。其次，为了“证明”我没能将它们视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必要组成部分，米勒将不得不毫无根据地给我戴上愚蠢的帽子。当我说抛弃新殖民主义将意味着美国也要抛弃其“政策”时，我并没有想到一个为《每月评论》写作的评论者会不知道这样一种政策指的不是那种“可以实施和废止”（第53页）的东西！实际上，当我用“政策”这个术语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这一基本事实，即帝国主义的“政策”深深植根于体系的结构之中。

我的论点是，民族解放斗争显然是当今最活跃的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抗的力量。不过，它们还未能动摇体系。（《每月评论》曾经指出过越南战争在何种程度上对美国而言是一件好事！）它们的前景如何？在印度尼西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刚果、尼日利亚、加纳、南非到底都发生了什么？古巴的成功仍是个例，它引起了统治者们的警觉：在他们所能关注到的范围内，都不会再允许有这样的事发生了——而他们仍然拥有阻止它的权力和意愿，越来越残暴的权力和越来越充满侵略性的意愿。这要持续多久？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没有人能够回答。也许卡尔·米勒应该读一读保罗·斯威齐最近在“解放的辩证法”研讨会上（1967年7月于伦敦）的演讲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说想要这些国家独立发展至少还要50年到100年。无论如何都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因为没有有一个社会体系能够免于变革，这是一个值得重复的不言自明的真理。我尝试指出敌人的全部力量，指出敌人能够随意支配的惊人的力量积蓄，指出当前反对力量的衰弱，指出如下残酷的事实，即在美国，有组织的劳动者并没有承担起彻底变革的事业，这也就剥夺了反对行动的物质基础。如果这就是“寂静主义”的话，那么我会信奉它。但我认为这仅仅是事实，或者至少是事实的决定性部分，而对于所有那些想

要尽力使一个越来越非人道的社会体制发生彻底转变的人来说，只有坚持不懈地对体制的真实力量进行评估才是可行之道。害怕变得过于消极，想要寻求更多一点安慰、寻求革命性力量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好的意图会滋生幻想，分散和削弱反对力量，掉进当权派的圈套。

注：马尔库塞，著名哲学教授，目前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



## 《卫报》，1968年12月5日对批评者的回应<sup>①</sup>

我的朋友一直都问我，为何不去回应那些来自右派、来自进步劳工党以及来自中间派的持续不断的中伤。在此我将给出我的回答（我希望一次性对全部都做出回应）：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想本着马克思的理论精神不带迷信、不搞欺诈、没有幻想地继续分析和探讨左派的现状和前景。而且事实上，那些中伤反而在这方面激励了我。我所说的话，在某种意义上或在某处必定会造成打击与伤害，必定会揭示出一些不受欢迎的真理，他们对此的反应，不是经过脑袋思考的论辩，而是脱口而出的唾沫星子。右派指控我是莫斯科或北京的代理人；中间派的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谴责我煽动暴力、挖民主的墙脚，而《真理报》则指责我用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理论削弱了革命。右派觉得我到处煽动学生造反，而进步劳工党则认为我是在中央情报局的指使下试图阻止他们。他们的做法实

[330]

---

<sup>①</sup> 在马尔库塞的私人收藏中，有一个文件夹标着“卫报。1968年12月5日。对批评者的回应”，里面有一个两页的打印稿，上面有马尔库塞的亲笔修改，是对来自右派、左派和中间派的批评的回应。这大概是为英国《卫报》而准备的，《卫报》在这段时期刊载了马尔库塞的一些文章。该文本是一个少有的例子，即马尔库塞对他的主流批评者以及对毛主义分支团体进步劳工党（P.L.）都做了批判。据我们所知，这一文本并没有发表，它从未在先前马尔库塞的作品目录上出现过。

在是太过相像了：右派采用了麦卡锡主义的伎俩；中间派则再次高喊着“**伤寒玛丽**”(Typhoid Mary)<sup>①</sup>（参见小阿瑟·施莱辛格于1951年9月2日在《纽约邮报》上的专栏），而进步劳工党所采用的诽谤方法重现了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者肃清时所采用的方法，只不过换了不同的对象。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些方法面前，辩驳也只是浪费时间而已。因此，无论我是否遭到这样的控诉，说我是在为五角大楼还是在为克里姆林宫工作，是在为纳粹还是在为中国人工作，是支持学生还是反对学生；无论我是否被指责说吃掉了我的父亲或是儿子，我都不为所动——因为这些控诉不值一提。

---

① 原名玛丽·梅伦 (Mary Mallon)，1869年出生于爱尔兰，15岁时移民美国，先是从事女仆工作，后长期从事厨师职业。她本人身体长期健康，但却是伤寒病的带菌者，导致数十人感染，其间因极端不配合隔离治疗而闻名。——译者注

## 解放的辩证法以及激进的行动主义： 马尔库塞与利奥·洛文塔尔的通信<sup>①</sup>

摘要：这是一同立下坚定决心要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分析世界的老朋友之间热情洋溢的通信。其中既有相互的赞赏，有时也有一些紧张。马尔库塞对美国制造战争、制造浪费的行径及其贫穷状况富有战斗性的批判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利奥·洛文塔尔对马尔库塞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和一名政治理论家在 1967 年取得的成功表达了祝贺之情，其中也夹杂着少许的反讽和幽默。学生积极分子对马尔库塞抱以很大的信任，因为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他们的抗议活动保持疏远。对于学生运动的目标，洛文塔尔比马尔库塞持更多的怀疑，因为在他看来那过于意识形态化，还不够彻底。

---

<sup>①</sup> 我们在此刊载出马尔库塞与他的好友利奥·洛文塔尔之间的往来书信，赖茨译，译者还添加了有助于读者理解语境的注释。关于马尔库塞与洛文塔尔的关系，详见《马尔库塞文集》第二卷《走向社会批判理论》。——编者注

[331] 编辑导言<sup>①</sup>

1967年7月，“解放的辩证法”国际会议在伦敦的圆屋（Roundhouse）举办，马尔库塞是会议的主要发言人之一。其他发言人包括保罗·斯威齐、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朱尔斯·亨利（Jules Henry）、罗纳德·莱恩（Ronald D. Laing）、格列高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苏珊·谢尔曼（Susan Sherman）、释一行（Thich Nhat Hanh）、朱利安·贝克（Julian Beck）以及约·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ć）。这一群放荡不羁的文人及政治积极分子组成的豪华阵容使得许多参会者沸腾了起来。这一研讨会被彼得·戴维斯（Peter Davis）以影片的形式记录了下来，而由大卫·库珀（David Cooper）编辑的《解放的辩证法》（Penguin, 1968）则以文字的方式记述了会议内容。马尔库塞的演讲稿《从富裕社会中获得解放》同样被收录在了道格拉斯·凯尔纳所编的《马尔库塞文集》第3卷《新左派与20世纪60年代》（London: Routledge, 2005）。

① 这些文档的出版得到了马尔库塞文学遗产执行人彼得·马尔库塞的许可，这对于进一步的出版工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来自马尔库塞先前未出版作品的增补材料，其中有一大部分现在保存在法兰克福的歌德大学图书馆中，并分别由英国的劳特利奇出版社和德国的克莱朋出版社（Klampen）出版了英文版和德文版，英文版编者有道格拉斯·凯尔纳，德文版编者彼得-欧文·詹森（Peter-Erwin Jansen）。所有进一步出版的权利属于产权所有者。编者向彼得·马尔库塞、彼得-欧文·詹森致谢，同时也感谢苏珊娜·洛文塔尔（Susanne Löwenthal）对这些文档的出版工作给予的帮助。关于在这里展示的两份文档，请注意其中的拼写和标点完全遵照的是原始材料。——编者注

## 1. 马尔库塞致利奥·洛文塔尔

1967年8月10日

亲爱的利奥：

想要说的、想要写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在柏林度过了十分激动人心的一周，在那里我受到了弥赛亚般的待遇，向 5000 名学生讲话。在伦敦举行了一场关于解放的辩证法的完美的、疯狂的、有些梦幻的研讨会。马克斯和特迪（西奥多的昵称——译者注）由于他们的政治（毋宁说，非政治）观点而遭到了激动的学生和反对特迪的传单的拒斥！我试图与他们在瑞士会合，以便讨论我们在政治方面的差异，但马克斯似乎没有准备好！

与此同时，我们打算在采尔马特这里一直待到我们启程前往萨尔茨堡参加人道主义研讨会，以便彻底休息一番。在古老欧洲有很多东西仍是那么生机勃勃——您的情况如何？

[332]

我们在 9 月份见。

携英格向玛乔丽（Marjorie）致以爱的问候。

您的赫伯特

## 2. 利奥·洛文塔尔致马尔库塞

1967年8月16日于伯克利

亲爱的赫伯特：

关于您的头衔，除了您在 8 月 10 日那封热情洋溢的来信中所提到的“弥赛亚”（Messiah）以外，还必须提及另一个以字母“M”为开头的头衔。我在一份德国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报道了这一新的“M”，这一新的传统，即：马克思、毛泽东和马尔库塞！这使我产生了深深的敬意！顺带一提，我从新

闻报道中推断，当您和我们在德国的年轻朋友们面对面时，您应该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即他们因为全球意识形态之树的缘故，不能够看见一个具有不同质的生活的森林。

您的 利奥

## 论基辛格<sup>①</sup>

基辛格在 1972 年 12 月 16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是一场奥威尔式的噩梦。与“技术手段”不同，一大堆的细节、“晦涩语言”、“礼仪辞令”有助于人们相信报告中所展现的是事实与真相，也有助于掩盖一个决定性的事实，即要为延迟停火负责的**不是河内，而是华盛顿**。基辛格自己也陈述了这一事实：在 10 月底，河内已经准备好了签署协定，而华盛顿却突然觉得有困难并拒绝了。基辛格说：“**我们……提议进行另一轮磋商**”，“**我们提议还要厘清三类问题**”（黑体为我所加）。某报纸的社论甚至说得更直白：

[333]

现在我们很清楚，尼克松总统本可以在 10 月 31 日敲定九点和平计划……但尼克松先生却选择不这么做，实际上他在 10 月 22 日就抛弃了两天前他所接受的东西……（《洛杉矶时报》1972 年 12 月 18 日）

---

① 在马尔库塞的私人收藏中有一份两页的手稿，提供了对基辛格的评论，标注日期为 1972 年 12 月 19 日，并标有如下签字：“赫伯特·马尔库塞。拉荷亚市，加利福尼亚州 92037。”看来这一文本是针对基辛格而写的，以批评他作为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时在越南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据我们所知，1972 年 12 月，也就是当马尔库塞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美国加强了对越南的轰炸，马尔库塞对基辛格、对美国轰炸越南的战略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而他的这些批评文字未能得到出版。——编者注

为什么？因为“新证据表明北越的一股军事力量正在南越集结”（*ibid.*；基辛格的报告也同样引用了这一证据）。

这样一种证据显然属于最高机密，大概只能由军事情报提供，其可靠性并非毫无瑕疵。而如果报告内容属实的话，那么为何当南越在着手集结大军的时候，北越及其盟友却毫无动静呢？美国越过越南的国界线，正在强化泰国的军事基地，目的是为了把美国空军指挥部转移到这里（《洛杉矶时报》1972年12月17日）。美国空军在10月底前后对越南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攻击。每一周都会有一场场“最强的”轰炸袭击，而军需物资也源源不断地（甚至需要连夜装载）投送到南越（见《纽约时报》1972年10月27日的初步报告）。基辛格，这个对晦涩语言运用得出神入化的人，是不是把主题搞混了？他归罪于河内的“敲诈”的实施者是谁？美国的轰炸袭击是否无助于磋商，使敌人软化？

基辛格在其报告中曾一度放弃了讲述严峻的事态，转而开始探索起了深层次的心理状态。他认为，“越南人民，不论南北”，在如此长期的战斗之后，也许觉得“战争的风险和危险比起和平的不确定性及其风险和危险更能让他们忍受，尽管很难（原文如此！）”。这是德国黑格尔主义的死灰复燃吗？基辛格是否记住了黑格尔对战争的称赞以及他提醒要对和平的不良影响保持警惕？无论如何，在越南的亲历者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了被烧毁的村落，看到了他们家园的断垣残壁，而这完全不支持基辛格的推断。

这一奥威尔式的骗局在不值得信任的赫伯特·克莱恩（Herbert G. Klein）的办公室所发布的报告那里达到了极点。它发布了对尼克松政府的评估，说“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投入已经逐渐减少”（《洛杉矶时报》1972年12月17日）。对北越的持续的“最强的”轰炸袭击以及圣诞前夕的轰炸，据说是“逐渐减少”投入的有效方法。

他们想骗谁？人民知道或者会知道正在发生的事。但他们沉默了，他们已经放弃了。他们购物，他们销售；他们庆祝。但对耶稣基督所做的喧哗而放纵的颂扬，战争王子在典礼上当着和平王子（指耶稣基督——译者注）所



做的祷告，并不能打破他们死寂般的沉默。这比政客及其媒体的言辞还要响亮，而这也道出了这个社会的真相。

赫伯特·马尔库塞

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市，92037

1972年12月19日

## 致鲁迪·杜切克<sup>①②</sup>

1970年4月11日

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市, 92037

崖脊大道 8831 号

亲爱的鲁迪:

[335] 我的良心备受谴责: 3个月已经过去了, 而我还没有回复您的来信……我又被深深地卷入了**政治事务**之中, 以至于我没办法做其他事。总之, 我们这边的情况和您在来信中所描述的一样; 运动产生了同样的分化, 分化

---

① 在马尔库塞私人收藏的通信中, 我们在此刊出了他写给德国激进分子鲁迪·杜切克(1940—1979年)的几封信, 日期分别为1970年4月11日、1971年4月16日以及1973年2月24日, 由赖茨翻译。杜切克是20世纪60年代德国激进学生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之一, 他的战略“突破体制的长征”广为人知, 马尔库塞也主张这一战略。从1968年的一场暗杀阴谋中幸存下来的杜切克继续活跃着, 当马尔库塞在20世纪60年代末访问德国的时候, 他们相互见了面。马尔库塞对杜切克的评价很高, 从他信件那友善而热情的行文中就可看出。这些信件的价值还在于对学生运动提出了具体的/实践的建议, 这也展现出了马尔库塞与新左派的深厚关系。关于后者, 参见《马尔库塞文集》第三卷《新左派与20世纪60年代》。——编者注

② 这几封德语信件连同其他更多信件, 参见 Peter-Erwin Jansen, *Herbert Marcuse: Nachgelassene Schriften*, Band 4, *Die Studentenbewegung und ihre Folgen*, Springer ; zu Klampen! Verlag, 2004。

并不是因为一些支持替代方案的具有实质性的理由（这不可避免），而往往是因为内部派系的不同诉求。我们这里同样有极端的一翼，他们主张通过个人恐怖活动来与体制较量是唯一有效的方法，而主流意见则比较稳健，认为多少要采用民主的形式（尽管这些形式变得越来越脆弱了）。而且我们在强调自发性和严守激进的纪律之间、在无组织与有组织之间有明显的冲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个人解放与政治解放之间的冲突，特殊群体的具体利益与大局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在整个公社运动（commune movement）中随处可见，而且还激化了嬉皮士和斗士之间的矛盾。虽然公社仍然拥有强大的潜能，但它们却只有保持住与“外部”政治运动的联系才能取得成果。从这层意义上讲，政治化决不意味着在公社中持续不断地研究马克思和毛泽东，毋宁说，这些公社实际上、尽管只是暂时地变成了生产单位，它们不仅会改造个人事务，还会改造公共事业。学习如何务农甚至少量的工业劳动，学习如何操作计算机，熟悉技术，不是为了取得空想的行业政权和技艺，而是为了将来能够进入社会的制造流程，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在社会主义生产的过渡时期工作。通过这些，公社可以带来现实社会主义，并对它进行试运行。以这种方式，你可以将个人生活（以及个人关系）与特定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公社必须着眼于它即将来临的扬弃（Aufhebung）[向更高的形式转变]来组织。只有个人的解放，而不是陷入自我放纵，才可以凭借自律和纪律指导自身通往共同的善。但是，尽管以完整的认识来做这一切，我们的努力也仅仅是一种准备，而社会过程还是会令人厌恶地长久持续下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事情还是会继续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这就是目前的状况。我们要谨慎对待自己的观点：把它们当成口头禅（clichés）的趋势正变得越来越强。此外，我仍会不假思索地指出，在这个国家，从最高层（尼克松政府）到州政府，再到权力结构的地方层面，法西斯式的力量正在迅速地扩张。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正在迅速地被拆解：取而代之的是应对紧急状况的治理，警察凌驾于法律之上，合法化或半合法

[336]

化的暴力，法庭成了政治压抑的工具。我想您已经了解到这些情况了（如果还不了解，我可以寄一些材料给您，不过您在文中看到的这些也够了）。经济局势正变得越来越紧张，而普通工人对工会的错误领导者的反抗同样也越来越激烈，通货膨胀正在持续不断地攀升，而越南战争正扩大到柬埔寨和老挝。黑人和棕色人种的反对行动也正变得越来越毫无保留。而我们这些左派人士却正变得越来越迷茫……说这么多足够了。

您和您的家人怎样？请您告诉我您的计划。我们有望在6月13日到15日去伦敦。如果我们有机会在一起进行真正的讨论，那将会是十分有意义的。如果您必须待在欧洲大陆，我们也有机会见面。

携家人向您致以衷心的问候及最好的祝福。

您的马尔库塞

\* \* \*

1971年4月16日

亲爱的鲁迪：

我们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在信中能够清楚看到您再次“干要紧的事”，而新环境也对您有好处。丹麦看起来真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我们也梦想着要迁到那边去，因为这边正变得越来越糟。关于您问我是否忙于“进三步，退两步”，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这种说法没有意义。也许我说过学生运动最近的倒退属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它不得不后退一步以使得能够前进两步（这无疑是对列宁的话的转述）。我正在撰写的著作有望对在发达垄断资本主义中的激进运动展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一论述将避免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盲目崇拜，尤其是避免使“革命主体”物化。说得它好像是只要某人以恰当的方式观察周遭就能够发现的东西一样。相反，它是只能够从实践中出现的东西。在这本新书中，我想尽可能具体地研究战略的问题。我想告诉您：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我现在更把您的“突破体制的长征”的见解视为唯

一有效的途径。<sup>①</sup>最重要的是分析工人阶级那种发生了变化的结构，分析革命的（固有相关的）基础：物质上已不再令人难以忍受，因此**从一开始**，不应该再追求量化的步骤，而是要追求质的飞跃。我认为在这点上，目前只有“第二宣言”小组（“II Manifesto” group）尝试了一种非仪式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您自己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著作当然也属于这一类。马克思也预见到了，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以及“非生产性劳动”在社会整体中得到发展，将引起无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内部**的“扬弃”[代谢]。我希望有机会能够和您共同探讨这一切。我大概会在6月初到西德（在科隆和杜塞尔多夫待两到三天）。您能来吗？

[337]

不幸的是，并没有多少关于安吉拉·戴维斯的消息。她的共同被告人有能力剥夺法官的资格。现在必须指派一位新的法官，而这意味着很可能要过了暑假才能开庭。

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市，92037

崖脊大道 8831 号

\* \* \*

1973年2月24日

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市，92037

崖脊大道 8831 号

① 马尔库塞在其1972年出版的著作《反革命和造反》(*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中写道：“为了扩大学生运动的基础，鲁迪·杜切克提出了‘突破体制的长征’的战略：一边在现有体制内工作，一边对抗它们，不是简单地‘在内部搞破坏’，而是‘做好工作’，进行学习（如何使用计算机、如何编程，如何在所有层次的教育中授课，如何利用大众传媒，如何组织生产，如何识别出并避免有计划地报废，如何设计，等等），与此同时要在与他人共同工作的过程中保持好自己的意识。这一长征包括要共同努力建设相反的体制……发展起激进的、‘自由的’媒体尤为重要……与此类似，要发展起独立的学校和‘自由的大学’。”(*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pp.55-56)

亲爱的鲁迪：

非常感谢您的两封来信。我希望我能够做出细致而有深度的回复。但我不能。英格正饱受无法治愈的胃癌的折磨，而这也耗尽了我的心力。我想您会理解的。

我赞同您的观点：并不是学生运动及其意图“过时了”，相反，是那些搞派系斗争的人想要把它拉低到和他们同样落后的程度。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自私，仿佛说我们进行反对的目的是不让自己变得落后。这不要紧，我们必须坚信，那些宗派主义者终有一天会发现**他们**生活在一个幻想世界中，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了一种仪式性的意识形态。面对他们，我们必须保卫和坚持的是对这样一种基本事实的认识，即垄断国家资本主义中的工人阶级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了。这一变化不仅发生在意识形态性的“消费领域”，而且也是资本主义（还有苏联社会主义！）**结构性**改良的一个方面。当今的理论需求是要有一种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要辩证地发展出它自己的概念的阶级分析。

我认为宗派主义者可能也并非一无是处，他们至少学到了如果没有**组织**就什么都做不成，因此必须创造出新的组织形式（同样人们也不可能简单地再次占有旧形式）。

[338] 我多么渴望能够和您一起探讨这一切……也许还是要等到这个夏天在欧洲见面。您有什么计划（我已经没法制订任何计划了）？您说您还没有收到我的《反革命和造反》。您是在我赠书的优先名单上的！无论如何我会再寄一本美国版的（德语版的也即将面世）给您。我期待着您的批评建议……

永远与您同在的 马尔库塞

## [1978年] 7月10日哈贝马斯致马尔库塞<sup>①②</sup>

亲爱的赫伯特：

我不知道您是否意识到了您在我的哲学生涯中有多么重要。请让我借您生日之际来向您表达我的谢意。

---

① 哈贝马斯写给马尔库塞的这封信，所标日期为1978年7月10日，信中涉及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由衷的称赞，以及对这些年来的会面情况的概述。——编者注

② 彼得-欧文·詹森最近在法兰克福马尔库塞的档案中找到了这封1978年的信。它的出版得到了哈贝马斯的许可，哈贝马斯于2012年6月21日在施塔恩贝格给詹森寄了一封短笺，里面写道：“亲爱的詹森先生，我当然记得你。我也有跟进你的马尔库塞出版计划。我很高兴你能够出版这封致马尔库塞的信。我们最初的相遇，正如信中所提到的，也同样在我发表于2011年7月2日的《新苏黎世报》上的论德国犹太移民的文章中有所提及。致以热切的问候，尤尔根·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在其发表于《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的文章中写道：“……人们只需想起在那个时期，精神分析的花朵艳丽绽放，在最大意义上成为国际公认的解释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问题甚至政治问题的关键学科……有一名哲学家发表了两场关于‘精神分析视角下的进步观念’的演说，使我兴奋得无以复加，这种兴奋感，无论是在此前还是此后几乎都无人再给予过我。那是我头一次看到马尔库塞展示他的出版著作《爱欲与文明》中的观点。当时我才刚在研究所工作了两个月……我们对马尔库塞的印象，和在那段政治运动岁月中的学生们一样，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关注到他那扎实的学术工作，以及他在弗莱堡所受的出色的哲学教育。在法兰克福的‘旧’批判理论家圈子中，马尔库塞是最为恪守传统学术标准的——《理性和革命》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也同样可以在他8年后关于‘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的演讲中看出这一点，在我看来，如果没有这一扎实的学术功底，马尔库塞是不会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获得如此反响或者带来如此冲击的。”

[339] 您在 1956 年关于弗洛伊德的演讲，是我第一次聆听您的演讲——两场涉及《爱欲与文明》的内容的报告。您难以想象我们这些在传统大学里（例如波恩大学）学习过的人对弗洛伊德和“深层心理学”有着怎样阴沉的印象。您的演讲引导我去发现新大陆！我清楚记得当时的我无比惊诧于看到有人系统地研究弗洛伊德，严肃地对待弗洛伊德。

在您来法兰克福的一年后，我很荣幸能够有机会和您交谈，能够对您有更多的了解。那一次我没有在法兰克福待多久，我不相信霍克海默，虽然我敬佩阿多诺，但我感到有两个缺失的环节阻止我全心地而不是只是在理智上投入到阿多诺的辩证法探索：从当代哲学（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等）到法兰克福学派工作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法兰克福理论到政治实践的问题、到我们针对核武、军事、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等等所发起的游行示威之间的内在联系。然后我读了您的书，与您见面，并发现了柏格森（阿多诺在某种程度上“无法摆脱”他，尽管他研究的是胡塞尔）之后的整个哲学语境，也发现了非常深刻的政治参与，尽管有悲观主义的成分。

那时我称您为“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然，这个称呼有些偏离了您自己的哲学轨迹。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它表达了您在两方面的关切：这里有一位“老”法兰克福理论家，他与伴随我成长的哲学（海德格尔）保持着连续性，而且还拒绝那种不干涉政治的懦弱心态。您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而您公开宣布了这一点。

只需回想一下那个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杜勒斯（Dulles）—阿登纳（Adenauer）的时代，人们就会明白，一个身处完全毁灭之中的德国年轻人在与您这样的人结识并寻求到此种解放时的心情，若非如此，我觉得自己有可能会窒息而亡。十年后，您对另一年代的人产生了真正的冲击。而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我觉得您的影响更为个人化、更为独特——我想我一定要把我的这些想法告诉您。

愿您和谢尔奥弗（Sherover）、莱托（Lettau）以及其他朋友们愉快地共度这个美好的日子。



听说您已经从布施（Günther Busch）那里收到了我们的小黄书。<sup>①</sup>

我们都想念您，祝您生日快乐！

尤迪（Ute）及尤尔根·哈贝马斯

---

① 布施于1978年带给马尔库塞的这本“小黄书”很有可能指的是 *Gespräche mit Herbert Marcuse*, Frankfurt: Suhrkamp, 1978。这本书里刊印了一些由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及其他人参与的圆桌讨论的记录。京特·布施是 Suhrkamp 出版社的编辑，他曾于十年前邀请马尔库塞为其70岁生日编一本《纪念文集》（*Festschrift*）。关于这本书，参见 Jürgen Habermas (editor), *Antworten auf Herbert Marcuse*, Frankfurt: Suhrkamp, 1968。——彼得·欧文·詹森注



**反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革命**

## 马尔库塞在 20 世纪 70 年代 马克思主义与新人性：一场未竟的革命<sup>①</sup>

在当前形势下，伴随着对当今学生运动的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传统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马克思主义曾经相对简单地界定了自身与自由传统的关系以及它在该传统中的位置。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宣称，要把自由主义的诸多进步的理念转变成现实，要把它们从纯粹的价值层面（公开宣称却很少被付诸实践）拯救出来，从整个意识形态层面拯救出来，并且使自由、平等、公正这些概念变成现实。在自由主义已然出现并且自由主义仍与之保持联系的社会体系中，即资本主义的社会体系中，马克思认为这种自由观念转变成现实是不可能的。

[341]

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的自由、平等和公正理念一直都是抽象的、

---

<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与新人性：一场未竟的革命》来源于 1969 年 4 月在天普大学举行的、由宗教学系发起的为期两天的“马克思主义、宗教与自由传统”会议。该文被《马克思主义与激进的宗教：走向革命的人道主义》（*Marxism and Radical Religion: Essays toward a Revolutionary Humanism*, eds. John C. Raines and Thomas Dean,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3-10）收录。会议试图探索宗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对抗马克思主义当权派并融合了革命人道主义的宗教反对派与利用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当权派的宗教进行比较。从我们在《马尔库塞文集》第五卷《哲学、精神分析与解放》中所看到的他对宗教的分析来看，他对宗教是如何既支持压制性的当权派，又维持一种先知的传统——该传统培养了革命意识和反抗——做了批判。——编者注

意识形态的。这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依赖那些拥有和控制了生产过程的阶级，而这个阶级的统治就建立在这种持续不断的控制之上。因此，在该体系中，存在着一种事实的、根本的不平等，它构成了该体系的基础，无法被消除，也正是这种事实的、根本的不平等削弱了自由主义的进步的理念，并且使这些理念的本质和功能受到了日益加剧的限制。

无须仔细考虑马克思阐释这个理论的方式，人们也可以回想起：马克思认为自由就是自我决定以及民主是自由社会的政府形式。但是现存社会是不自由的；因此，真正的民主无法存在，也不可能在该社会形成气候。另外，马克思认为，公民权利和自由是民主的本质部分，但是，除非它们在一个经济上民主的国家中得以实施，否则自由、平等和公平就仍是特权，人民主权也就仍是幻象。马克思通过坚持只有革命才能建立起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公平这一点，而与自由传统决裂了。

## 未竟的革命

但今天看来，这种与自由传统的决裂是不彻底的，并且那种将自由理念转变成现实的方法也不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了。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屈从于它们自身体系内部的压抑的力量。这些压抑的趋势似乎不能仅仅归咎于与资本主义共存和竞争，而是应该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中存在着某种似乎能为从旧社会延续至新社会的各种压抑的趋势进行辩护的因素。同样，目前激进青年的反叛似乎很大程度上主要针对的就是旧社会向新社会的侵入。或者，换言之，这种反叛唤起了被忽视的目标和理念，唤起了在马克思理论中被忘却的自由和自由主义的力量。

人们可能注意到了，新左派中这股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往往表现为从成熟期的马克思回到早期马克思。真正激进的革命思想在早期马克思著作中比在《资本论》中要多得多，以致今天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解读所揭示

的不是温和的马克思式的人道主义，而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激进概念。

[342] 旧社会向新社会的侵入提供了一种植根于理性概念——这个概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但它至今为止却仍在称颂匮乏与控制的合理性——的连续性。以什么方式呢？我们可以在“生产力的发展”这个观念中发现问题的关键。社会主义社会以一种合理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生产力发展为其特点，但这种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却正在变得越来越具有压抑性和破坏性。

正是这种生产力发展观念从过去延伸到了未来。这在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建设所做的两个阶段的区分中被清楚地揭示了出来：创造经济平等的阶段、创造超越必然性的社会的阶段。根据该思想，在第一阶段，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为自由和平等创造物质条件，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创造物质条件。显然需要大量的社会财富将这种“按需分配”的理想变成现实。在创造该财富的阶段，在为自由创造物质条件的阶段，压迫将会持续，不公平将会持续，因为社会还不够富裕，不足以维系社会主义。

现如今，这种两个阶段的思想的危险性已经为人所熟知。原因是，第一阶段，特别是在现行的国际形势下，明显可以被无限延长。但是原因不止于此。马克思认为，即使在充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仍然存在着无法真正自由的王国：社会必要工作、社会必要劳动王国。《资本论》第3卷的那个著名的构想即是明证。根据该构想，这个王国并不存在自由；它仍旧是必然王国。

技术进步是工作日逐渐缩短的先决条件；而技术进步与生产者本身集体控制生产力将本质上改变工作的性质，不过它们仍然外在于必然王国，外在于社会必要工作王国。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在技术上存在着连续性。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是最大可能的劳动自动化，对用于满足需求的物质资源进行科学预算。为了能够发展生产力，发展技术工艺部门——它们已成为资本主义最伟大的历史成就，并且如果没有它们，自由社会难以想象——，社会主义摧毁资本主义政治机构的同时也要接管（并且不得不接管）政治机构。

但是，该想法有一个问题。现如今，日益明显的是，由生产、分配以及消费构成的技术机构绝不仅仅是工艺的、科学的、技术的机构，而是渐渐地变成了政治控制机构。并且既然它是作为一种政治控制机构在运作，那么它也就有助于晚期资本主义在绝大多数先进的发达工业国家中实现，也就是说，有助于将资本主义体系与那些马克思认为是革命的推动者、历史主体的社会阶层即产业工人阶级整合起来。

在资本主义势不可当的生产力与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的影响下，那些原 [343]  
以为必然支持革命的阶级（因为它原本在现存体系中没有既得利益）已经在大多数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发展出了既得利益。所以，只要这种发展还在继续，那么产业工人阶级就缺乏马克思所讲的作为革命的绝对必要因素的品质和资格。

### 新类型的人

既然我们再次遭遇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被压抑或被轻视的要素，那么对该理论进行简要复述就是必要的。产业工人阶级，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革命的历史推动者，不仅仅是因为它构成了生产过程的人的基础，还因为它不受资本主义体系所产生的并在该体系中得到满足的富有竞争性和侵略性的需要的影响。换言之，根据马克思，无产阶级在此意义上是一个在解放之前就已经获得了自由的阶级；并且正是因为它不满于资本主义体系，所以使它成了革命的历史主体。这种理念暗示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同质的社会，它永远都不可能是新制度和新关系的纯粹的副产品，无论它们多么具有基础性。社会主义制度和关系的发展需要一种新类型的人，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类，一种拥有新的需要、能够找到一种不同质的生活方式并构建一种完全不同质的环境的人类。除非社会主义是由这样一种新类型的人类所建立的，否则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将只是一种支配形式向另一种支配形式的转变，可能比资本主义的控制更加有效、更加平等（这本身有很大的用处）。但这

绝不是一种不同质的生活、真正自由的生活——而这些却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本质。

如果要重新审视这种通常被遗忘的观点、这种认为新型人类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前提的主张，那么人们就必须意识到马克思理论中激进的自由主义倾向。该倾向与“个人的全面发展”概念叠加在了一起。马克思通过另一种艰涩的、奇怪的、煽动性的术语对此概念做了解释。他提到了“人是感性的类存在物”。“感性的类存在物”，即一种新类型的人，他不仅要在精神上并通过精神实现人的潜能，也要在他的感觉中、在他的感性和感受性中并通过感觉、感性和感受性实现人的潜能。在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这些潜能中，恰好存在着某种能力，它可以把他的环境、世界变成其感受性可以自由发展的天地。而这将是一个和平的天地、一个快乐的宇宙。

[344] 根据马克思，这意味着构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生产，而是创造，它不仅展示和激活了人的理智与他不可或缺的物质需要，也展示和激活了他的感觉、理性和想象力。与描述感性类存在物的出处一样，在同一时期的同一作品中，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另外一个地方写下了一个听起来感觉的确有些奇怪同时也很少被关注的评论。从字面意义上讨论作为一种创造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大致轮廓时，马克思讲到，人不仅按照他的生活需要来生产，也“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

这正是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自由王国不外在于必要劳动王国——的一个愿景。更确切地说，存在着一个自由进出必然王国的入口，所以生产过程的理性组织能够应对并塑造人的感性，而不是将之扭曲以满足剥削的需要。这将意味着发展生产力，但却是以使人类摆脱物质生产过程，使他们成为生产技术和科技的监督者、实验者为发展目标。同时，这也将意味着生产过程的的目标首先是消灭贫穷和辛劳，然后重建那个已被资本主义社会污染了的精神和物质环境。

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将出现完全不同的人类，他们有着新的感性和感受性，并且在生理上无法忍受丑恶、嘈杂和污染的世界——的这一愿景



是马克思理论中激进的自由主义元素，也是经常被注重生产效率和生产持续增长理性主义者（现在已经过时了）所隐藏的元素。

换言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关系的破裂，也不仅仅意味着政治关系的破裂，也不纯粹意味着生产力发展的上升曲线，它还要求按照前面所说的目标——从本质上重新确定生产过程的方向。对于技术上最发达的（甚至过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可能并不意味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是根据目标消除这个体系面对悲惨、饥饿和压迫时在国内外仍旧持续不断地浪费和有计划地报废。事实上，这意味着（并且我认为我们应该坦白地说）降低生活标准，但只限于降低那些生活穷奢极欲的人的生活标准。

## 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宗教

[345]

这种自由的激进主义似乎将马克思主义和完全不同的西方传统联系起来。这不是自由的传统（它仍然含有大量的压抑性的清教徒主义的元素，因为该传统曾经与清教徒主义紧密相关），而是激进的异教徒运动。自 12 世纪、13 世纪以来，该运动——基督教的自由主义趋势、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自由之灵弟兄会（*Brothers of the Free Spirit*）、以东人（*Edomites*）等等——已经成了西方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马克思的理论与基督教的教条及其机构始终不可调和，但它还是在那些坚持部分基督教教义（对非人的剥削性权力持毫不妥协的立场）的倾向、组织和个人中发现了盟友。在我们的时代，这些激进的宗教倾向在神父和牧师那里复活了，这些人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斗争了起来，他们与第三世界尤其是拉美的自由运动有着相同的动机。它们都是世界反独裁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而这些反独裁运动反对的是东方和西方那些自我持存的权力架构，因为这些权力架构已经对人类进步越来越不感兴趣。这种反独裁的品格唤醒了被长期遗忘和被削弱的无政府主义的、异端的倾向。

甚至那些学生现如今所采取的离奇的、极端的对抗形式也必须严肃地加以对待。它们似乎表明，青年激进分子已经对传统的对抗形式失去了耐心，因为这些形式一直都在继续但却没有带来真正实质的改变，一直都在继续但却仍然保留了贫民窟、仍然保留甚至扩大了贫困和苦难，一直都在继续但却每天还是有数以百计的人在不道德和非法的战争中被谋杀、折磨和烧死。不论我们喜不喜欢，这种对抗已经存在。

我们兜了一个圈子。事实上，在该对抗中有一种力量，宗教和教会应该正确地掌握这种力量，因为在其中存在着一种强大的道德要素，一种长期以来被忽略或无视的道德要素。现如今，这种道德要素已经成了一种政治力量。

## 1970年4月17—23日《街报》和 圣迭戈自由出版社访马尔库塞<sup>①</sup>

[346]

马尔库塞的论题：

大学

音乐

新文化

---

① “1970年4月17—23日《街报》和圣迭戈自由出版社访马尔库塞”标题下写着粗体的“马尔库塞的论题”，紧随其后的是一列粗体的、垂直排列的主题，其中包括“大学、音乐、新文化、生态学、人类和社会自由主义、工人和中东”。正如年轻的提问者所讲的那样，该访谈从激进的反文化的观点提出了很多问题，仅从这次访谈来看，我们认识到马尔库塞从反文化的立场向青年代表发表了演讲，他提出了一系列与当代紧密关切的议题。马尔库塞的FBI文档有一份记录，题为反间谍计划—新左派1970年7月30号就圣迭戈“可能的反间谍行动”致调查局，它描述道：“人民公社——在那里，住着一伙人，他们印制《圣迭戈街报》，即圣迭戈的地下报纸——一直以来都是反间谍计划最合适的目标。调查局先前已经得知，公社坐落在圣迭戈第二大街和第三大街之间的3200街区，后来搬到了圣迭戈J大街2412号。现在，他们已经搬出了J大街2412街区，分散地住在几个地方。”

因此马尔库塞和年轻的“《街报》和圣迭戈自由出版社”成员的面谈处在反间谍计划—新左派FBI的监视之下！关于道格拉斯·凯尔纳手头上的那些马尔库塞的FBI文档，参见Stephen Gennero and Douglas Kellner, “Under Surveillance: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FBI”,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Social Theory*, Volume 26, edited by Harry F. Dahms, Emerald: Bingley UK, 2009, pp.283-314。——编者注

生态学

人类和社会自由主义

工人

中东

马尔库塞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哲学教授。自从五年前来到圣迭戈，他已经“蜚声世界”。在当地，他被《科普利报》(*Copley Newspaper*) 诽谤为“危险人物”。对于他的学生，对于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而言，他是在西方争取自由的几个主要理论家之一。当罗马的学生在街头高喊他的名字时，美国媒体愤怒了。最后他们找到了“新左派”的这个领袖。

[347] 当科普利听说此事之后，他称马尔库塞为活着的魔鬼，即潜藏在密室中的共产党员，他认为马尔库塞最终会煽动我们那些出了名的“激进的边缘”来迫害他。

接下来就是与马尔库塞的面谈。面谈包括大量的主题，它们都与运动密切相关。我们把它发表出来，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提供了独特的辩证视角。紧接着，我们还为那些对马尔库塞的观点感兴趣的人附上了参考书目。

多年以来，马尔库塞一直都在研究他所说的“批判社会理论”。事实上，这种理论极具批判性，所以莫斯科方面和华盛顿（或圣迭戈）方面都不喜欢他。毫无畏惧的批判某种程度上已经使他开始讨论真正的人类社会的现实可能性了。同时，他的辩证视角为传统的激进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维度。

## 大学

**街报：**革命学生对大学的批判这几年日渐增多。大学遭到了抛弃或受到了攻击，因为人们反对它的总体化趋势。你觉得大学还有什么有价值的功能吗？它必须控制学生的意识吗？

**马尔库塞：**大学只能在学生允许自己的意识被其控制时才能控制。只要大学仍然提升思维，提升批判性思维，它也就仍然容许学生看穿它持续不断

的灌输。大学简直是太理性化了，我们很难全然地谴责它。我知道只有极少数的学生从灌输中逃离了出来。他们在大学形成了反抗当权派并把他们的知识应用到工作中的意识。

大学确实变得越来越保守了，不过这是校方的错。他们似乎连一点骨气都没有。看看那些制定教育政策的董事们，他们正变得越来越独裁。校方对于这样的行动应该立刻提出抗议。然而，校方却甘愿接受这一切；最多也只是通过几项表达遗憾与抱怨的决议。

## 音乐

**街报：**音乐已经成了美国新革命团体的一种创新。音乐会将人们聚集在了一起。听众和乐队联合了起来。许多人把这种发展当成是革命本身，或者至少认为它是革命的。例如几周前在长滩的一个乐队——人民乐队（OF THE PEOPLE）——来到了圣迭戈，它把政治与文化放在了一起，把表演者和听众也放在了一起。你怎么看音乐与文化的革命力量？

[348]

**马尔库塞：**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乐队与听众之间的团结，听众自身的团结。换言之，我感兴趣的是摇滚乐与政治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音乐的归属问题？归属于当权派还是归属于反对派？我知道伍德斯托克（Woodstock），我也知道激进者如何将音乐节提升到了全国性的革命性事件（或者说是神话？）的水平；我仍然想知道的是……大众的团结：因摇滚乐而发的大众联合仍然是直接的大众化、直接联合，它本身并不是政治，不激进，并不意味着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人性。许多人得到了释放、放松、娱乐：这没错，但是，它们的政治功能是什么呢？

音乐可以是内在激进的，就像远离所有政治的音乐那样。勋伯格（Schoenberg）、韦伯恩（Webern）、斯托克豪森（Stockhausen）就是例子。音乐也可以是明显政治性的：《国际歌》、西班牙内战时期的歌曲、鲍勃·迪伦（Bob Dylan）的抗议歌曲。摇滚两者都不是。通过直接激发身体，将其

作为一种持续重复的节奏运动的载体或容器，它也能使身体从压抑中释放出来，瞬间现实化，但这却是通过悬置心灵的反思——该中介本身能将个体的、私人的释放与社会的压抑以及对它的反抗联系起来——完成的。然而，这种心灵的成长却没有被意识到，更没有为了美好的时刻而被“加括号”，毋宁说，它被音乐纯粹的噪音、被屈从噪音的大众暴力地压制了。个体成了被催眠的对象——快乐的物化，但终归是物化。他们完全与当权派分享了摇滚。对此我感到很诧异。

我们必须明白这些东西转瞬即逝。对我而言，迪伦的反抗歌曲是当代流行音乐最激进的表现形式，不过，我可能早已过时了，也可能太过保守了。

**街报：**但是迪伦的音乐和表演也仅此而已。人们就坐在那儿。根本就没有任何经验上的统一。

**马尔库塞：**不，这并非本质所在。我相信在沉默中聆听是有效果的，我也相信记忆是有力量的。记忆是整个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它的影响和身体参与产生的影响相差并不大。你希望人们做什么？坐在那儿并且倾听有什么错吗？迪伦的歌词在起作用。它们不仅有助于改变人们的感受，也有助于改变人们的思想。即使是“摇滚音乐节”中所有的政治影响都消失了，他的歌曲的影响绝不会消失。

**街报：**对，我可以同意这一点，此外，所有人和音乐家之间还可能产生共鸣……产生大众的交流。

[349] **马尔库塞：**共鸣是好的，但激进的共鸣是什么？那种交流的东西又是什么？交流本身并不具有政治价值。如果只是建立大众的交流，完全可以由大众媒体来完成。这是大众交流的有效手段。

## 新文化

**街报：**你没有看到任何真正的价值和自由，那么在“新文化”与它不使用语言的交流能力中呢？

**马尔库塞：**我在“新文化”中看到了伟大的价值，我们应该努力将它从歪曲者和承办商那里分离出来。

事实上存在着不需要语言的交流。音乐就是其中之一。但问题不仅是交流的手段，还有交流的内容。然而，摇滚音乐节有什么激进的“信息”吗？

**街报：**从鲍勃·迪伦之后，音乐的本性及其展示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静默祈祷”（Silent vigils）和琼贝兹（Joan Baez）已经成了街头斗士，再就是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曾经的音乐会已经成了“最高的体验”。

**马尔库塞：**我不喜欢“最高的体验”这个词，它是一个极权主义用语。

你试图将音乐中的变革和激进策略中的变革联系起来，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文化中和政治行动中的变革形式完全不一样。情况可能是这样：在音乐中存在着暴力，但这种暴力从任何意义上都并非必然激进。

关于滚石乐队我想说几句。我已经看过那部差劲到不可思议的电影《同情恶魔》（*Sympathy for the Devil*）。我被告知他们的经纪人拒绝涉及政治。我还被告知当他们被邀请去帮助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的时候，他们拒绝演出。滚石当然不是什么和平主义者，但在在我看来，他们的暴力没有任何革命价值。

**街报：**当然，但这意味着什么呢？越来越多的人熟悉了滚石是什么——熟悉了金钱之绊。今天的孩子们知道毒品活动并非时髦的好东西，速可眠、酸定、毒剂都是如此。人们变得更聪明了，或者至少他们能更直接地怀疑事物了。在高中生那里称警察是“猪”已经成了惯例，这难道不令人吃惊吗？

**马尔库塞：**你提到了“惯例”。也就这样了！再说一次，这没有任何必要的政治价值。另外，你应该更多地思考一下当权派为什么不太注意毒品交易？

**街报：**难道你没看到传播毒品与维持美利坚帝国之间的矛盾吗？比如，参加越战的军队都装着大麻或者类似的东西？

**马尔库塞：**这难道能阻止他们轰炸北越或者入侵柬埔寨和老挝吗？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真正有助于削弱当权派。这有可能加速他们取消征兵、以志愿

军来代替的趋势，而这更危险。

## 生态学

**街报：**生态学（Ecology）正在成为使人民逐步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有害的领域之一。然而，它有很多不同的解释，这要看是站在尼克松政府的角度，还是站在革命组织的角度，还是站在其他的角度。你是如何看待这种新“问题”的？

**马尔库塞：**正如你所说，“生态学”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一方面，它被当权派所控制，例如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和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的管理层就支持它。我们不得不将此考虑进去。我们必须意识到，生态学本身并不必然使政治意识获得发展。我们必须坚持这一点，即除非真正的污染源被消除了，否则我们无法创造像样的人的环境和自然环境。即使是最漂亮的兵工厂也是污染源，最干净的氢弹也仍是氢弹。除非消除了这些制造污染的机构和政治力量，我们才能寄希望于为自由的人类提供一个干净的环境。此外，不要忘了，心灵污染是日益严峻的污染浪潮的一部分。

**街报：**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制止污染呢？必须限制工业生产和发展吗？

**马尔库塞：**我并不觉得还会出现相同的状况。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不再与对私人利益的需求紧密相关，而如果这些需求不再控制社会，那么所有的因素都会发生改变。在这样一个社会，污染会被降至最低并能控制得很好，同时还不用限制技术或工业的发展。相反，在当今社会，正是因为对利润的追逐，所以大规模污染不可避免。

**街报：**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关于自然的整个理念以及人与自然的联系方式会发生改变吗？

**马尔库塞：**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完全被当成了受控制、被开发的材料和原料，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不过是得不到真正保护的旅游区。在成



熟的社会主义社会，自然将有自己存在的权利，它将不仅仅是人类和动物的生存空间，还将是其自身创造物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它将成为免受暴力和摧残的自然。

**街报：**这不就是“返回自然”或者一种新的原始主义吗？

**马尔库塞：**相反，我一直以来都认为，自然的解放只有在科技成就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人与自然之间新的关系也意味着人与技术之间新的关系，意味着把技术进步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浪费和滥用中解放出来。

[351]

### 个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

**街报：**文化已经成了联合个人与政治、个体与人们所需求的社会各方面的一种方式。个人的解放的重要性得到了公社——在政治上发挥重要的作用——的发展的强调。

**马尔库塞：**我真正想讨论的是个人的、个体的解放与社会的、政治的解放之间的关系。在此，新左派有崩溃的危险。我仍然坚持我所写的，也就是说，我无法想象任何个人解放都付之阙如的社会解放，我们必须揭示存在于个体之中的解放之根。但问题正始于此！

问题是有一群其唯一目标就是生活在既定体制“之外”的人；他们不想以任何方式支持既定体制。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政治行为，也不认为这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到了每次激进运动——自我约束与个人解放之间的平衡必须在这里寻找——都必定出现的转折点。个人特定的“自我实现”必须从属于共同的政治目标，不仅属于一个公社或者所有的公社，而且属于整个运动，甚至归根结底，属于整个社会。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不管是谁，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自由：对这一残酷事实的认识必须渗透到每一个激进组织的存在中去。在它的行动和价值观念中，它不仅要为它自身、它的同伴负责，还要为它已经过去的历史原因负责。如果不想让整个运动瓦解的话，我们就必须在个体行动和政治行动之间找到平衡。

**街报：**确实如此。因为这正是我们在圣迭戈所发现的维系《街报》和我们自己存续的关键。

**马尔库塞：**对，圣迭戈公社至少在现在是这种平衡的典型例证。据我了解，公社出版了《街报》。现在的情况是，人民撇下了私人关切，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为超越于特定公社之上的政治关切而共同努力上。

随着公社自我孤立并使自身非政治化，它们很容易就会成为当权派的囊中猎物。如果权力结构认为它们有危险，它可以随时将它们摧毁掉。这些孤立的团体因其存在而变得依赖既定体制了。

[352] 它们并没有真正伤害到当权派。当这样一个团体不关心其他人的生命，当它决定走自己的路、为自己建一个小社会，它就脱离了这个运动。

**街报：**你不就是这样认为“曼森家族”（Mason Family）的吗？

**马尔库塞：**除了可以说它足以败坏运动的名声之外，它与运动完全无关。在犯罪和政治反抗之间毕竟仍然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一个罪犯可能是无家可归者，在此意义上不“属于”当权派。不过，他也属于“当权派”，是其虚假的、抽象的否定。就这一点而论，他要称颂这个使他成为罪犯的资产阶级社会。

**街报：**那么，就音乐来说，你觉得有必要为正在发生的一切提供明确的政治语境吗？同时，你能看到公社的必要性和政治功能吗？

**马尔库塞：**我仍然相信，公社是激进的社会变革的潜在核心，它不仅是自我教育的实验室，而且还可以对可能的社会主义关系（无论是工作关系还是其他关系）进行实验。我仍然信奉“做自己的事”，但我认为，现在到了该意识到不是每件我想做的（甚至特别想做的）事情我就必须去做、我就能够去做的时候了。我必须意识到我的事情必然会牵扯到其他人，牵扯到我想参与其中的运动。再就是，还存在着诸如革命的道德甚至革命的自我压抑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必须强调这些方面，恰恰是因为运动已经**客观上**变成了一种对当权派越来越强大的威胁，而运动的意识却落后于它的客观潜能。

## 工人

**街报：**在这个国家，工人阶级概念已经变成了革命政治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但是许多人——包括公社里的人——都觉得它被庸俗化了。它已经成了没有内容的概念，换言之，被许多华而不实的修辞包围了。

**马尔库塞：**是的，他们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变成陈词滥调，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成修辞，将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变成宗教布道，而我正在努力与这些人做斗争。

在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构成了物质生产过程的人的基础，但已不再是资本主义先前发展阶段的那些人；现如今，它包括数量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雇员，比如，技工、工程师、科学家、研究者甚至管理者。他们都参与到了对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中。另外，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在美国，仍然能够保持一种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尽管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社会存在决定意识，最后我们还是应该认真对待这个命题，不要忘记它暗含着重新审视，即痛苦地重新审视。阶级意识不是某种仅仅与阶级相伴而生的东西：它会发展，它会随着社会过程而改变。主观因素（政治意识）和客观因素（经济的和政治的条件）只有在革命中才能（以最佳的方式）达成一致。今天，不管怎么想象，美国的工人阶级都不能成为革命力量，而只有在垄断资本主义开始瓦解时，它才能（并且必定）成为革命力量。通过耐心的政治教育，意识本身会成为这一瓦解的一个因素。

[353]

当左派团体拒绝周密的考虑时，他们就开始变孤立了。对于这些人来说，你需要做的就是按下一个按钮，出现“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按下另一个按钮，出现男性沙文主义。他们抛出这些词，然后期待所有人都上当。但是，人们是不会接受那些他们所不理解的事物的。

我们必须理解不太令人愉快的现实，这你是知道的。仅仅是因为你用了

资本主义那样的词汇，并不代表你就理解了它是一个坏的东西。几乎整个美国制度都表明资本主义是好的，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资本主义在美国并没有否定的含义，但在欧洲工人阶级那里却有。

我们必须牢记在过去的五年里所实现的成就大部分由学生运动完成：不仅通过行动，也通过“对话”。在美国，变革需要漫长的时间，需要漫长的斗争。因此，需要教育，需要组织起来，需要新的组织形式，需要有弹性的、权力分散的组织，而不是传统的政党。不过，至少应该有可能对特定的问题和行动进行统一组织。今天，我们必须避免思想僵化，避免仍在持续的自我毁灭以及不受控制的反抗父亲。这些绝大部分都是愚蠢的。

你不可能通过在飞机走廊穿行、取走乘客的食物来反抗帝国主义。可笑的行为和政治活动是有区别的。我们必须通过教育与行动，集中精力发展我们真正的政治意识。

## 中东

**街报：**谈谈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吧。

**马尔库塞：**直到现在我仍然一直为以色列辩护，因为我无法忘记 600 万犹太人被消灭，也无法忘记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再次发生。也就是说，只要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必须避免犹太人再次惨遭屠杀。但是如今在我看来，以色列的政策远不能防止这样的状况再次发生，或许不如说恰恰推动了屠杀的再次发生，除非它对阿拉伯的政策彻底改变了。因为最近发生的两个事件，现在我态度更坚定了。其中一个事件是在邻近开罗的一所学校发生了炸弹袭击，32 个孩子被炸死了。据报纸所说，以色列政府完全否认指控，而据我从电台听到的一个国际记者团体的报道所说，他们看到了现场和孩子们的尸体。

第二个事件是通过特赦组织（the Amnesty group）散布出来的关于折磨阿拉伯囚犯的报道。

我还想补充一个事件，即以以色列政府拒绝了纳祖姆·戈德曼（Nachum Goldman）的访问，而报道称，他得到了开罗方面纳赛尔（Nasser）总统的谅解。即使纳祖姆·戈德曼不代表以色列官方的政策，我也觉得这简直难以置信。对以色列来说，这是与纳赛尔直接对话的重要机会，它应该把握这个机会。

现在，如果这些报道是真实的，对我而言，确切地说，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个新左派成员，我已经无法再为以色列的政策辩护，而且我不得不同意那些激烈批判以色列的人。

**街报：**如今看来，你反对的是32个孩子死于炸弹袭击。但是，以色列事件的核心问题难道不是一些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突击队以及美国的美洲豹组织和其他世界组织所宣称的，以色列已经成了美国对外政策和石油利益的工具吗？

**马尔库塞：**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成为美国石油利益的工具。以色列没有石油，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也门才有石油，毫无疑问，它们不是犹太人的国家。

**街报：**是的，但有分析指出，以色列的武装力量、以色列的威胁以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驱逐行动，使阿拉伯人的意识停留在了民族主义层面，也就是说，使阿拉伯人的意识停留在了与以色列人做斗争的问题上，而不是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等诸如此类的国际问题上。

**马尔库塞：**这点我没看到，另外，我认为美国政策正在朝有利于阿拉伯人的方向改变，毫无疑问，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不利的。自从尼克松上台以来，这个迹象极其明显。

**街报：**因此你认为对犹太人的另一场屠杀即将到来？

**马尔库塞：**我想说的是，除非以色列最终下定决心，设法建立与阿拉伯人道的联系，并且将他们当成人，否则恐怕这样一种状况迟早会出现。

## 论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与准马克思<sup>①</sup>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哲学教授马尔库塞和法兰西学院哲学教授雷蒙·阿隆（Ramond Aron）曾有过一场辩论，刊登在了《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上，下面是从这场辩论摘录的片段。

**马尔库塞：**我确实认为，民主的共产主义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可能性。退一步讲，我认为，广泛的民主只有在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是可能的。我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是，实际上所有资源必须用来为全人类创造一个合宜的社会、一个自由的社会，而这些资源也早已具备。但是，这样一个社会至今还没有被创造出来，这主要归咎于两个主要原因：首先，现有资源受到了压抑性、破坏性的利用。其次，现如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体系的共存。虽然

---

<sup>①</sup> 《论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与准马克思》是马尔库塞和法国知识分子、哲学家、记者雷蒙·阿隆 [1955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鸦片》（*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一书的作者] 的一场辩论，全文最先刊发在了《新政治家》上，然后节选刊印在了1972年8月15日的《纽约时报》上，现在看到的是节选稿。文本表明马尔库塞和阿隆就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政治现在能否创造一个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持不同观点。阿隆在辩论中自始至终都认为他和马尔库塞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最大的不同是：马尔库塞从一个乌托邦立场出发，相信有可能建立更美好的新世界，然而阿隆从现存社会的现实条件出发，并不确定马尔库塞视作有能力建造更自由的社会种种替代性解放力量是否包含其中。

这种共存被称为和平，但它似乎在迫使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国家去将自己的大部分资源用来加强军事和战略的潜力，因此降低了发展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的可能性。

## 共产主义：125 年之后

**阿隆：**哪种类型的社会可以确保社会主义的经济和自由的政治体制同时存在？

我想以这种方式向你提问：**(a)** 你认为这个正在朝革命的方向走去的历史运动与马克思所相信的道路一致吗？**(b)** 如果这个正在朝向革命方向前进的历史运动既发生在东欧也发生在美国和西方世界，你还支持这个革命吗？那么，你的观点建立在历史革命的趋势上，还是建立在确信后革命时代的政权会比现在的政权要好这一点上？

[356]

**马尔库塞：**我确实相信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凭借其内在矛盾必将走向终结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并且假设还谈得上有任何进步——这是一个很大的“假设”——的话，那就是资本主义政权将变成社会主义政权，就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和中央计划受集体控制。我的确相信指向这一方向的趋势能够得到阐明。

**阿隆：**那么就请为我们阐明一下吧！

**马尔库塞：**我试一下。首先我要说的是内部矛盾的增长。今天西方世界难以置信的社会财富与对这种财富压抑性、毁灭性地利用之间所形成的反差异常明显，它已经开始进入意识，甚至进入越来越大多数人的无意识。

人们开始认识到，现有的劳动组织——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即“异化劳动”，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愚蠢的、非人的劳动——已经不再必要：如果人们不必再把自己变成劳动工具，他们是能够过得更好、更快乐的。对现有资源和社会生产更加人道地利用可以整个地改变现在的形势。我看到过很多严重的矛盾，比如，在地方性的通货膨胀中，在不断上升的地方性失业

中，在国际货币危机中，在第三世界的日益加剧的反抗中。

**阿隆：**你说你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但事实上，几年前你却说过，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因为其自身的矛盾而坍塌。它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东西，几年前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你都认为，因为生产力稳步增长，所以西方社会不存在革命倾向。因此在过去的六七年里，你因为某些偶然事件——从长远的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我认为，这些事件只是西方世界历史上的插曲——已经改变了立场。

确实，在西方世界，富裕民众和少数穷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确实，发达世界和不发达世界在富裕程度上无法相比，但如果你看看苏联制度，你就会发现，穷苦的农民和城市富裕的市民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认为，唯一的不同是：在西方世界，60%到70%的人从普遍的收入增长中获益。我相信，与俄国的世界相比，这个百分比要小一些。

[357] 然后你将货币危机视作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信号，我亲爱的马尔库塞，那可不像你的水平啊。货币危机只是资本主义世界诸多危机中的一个，而你却把它当成是资本主义垮台的征兆，这使我想起了魏玛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幼稚的预测。

你举例说，美国的工人阶级没有革命性——五年前，你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灾难是，工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革命者，因此你做出了彻底的改变。如果你有数百万对自身学位失望的学生，他们应该有点革命性，应该读一读马尔库塞，这很正常。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乐趣，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却与资本主义最后的危机毫无关系。亲爱的，做一个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吧！

“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财富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马尔库塞：**首先，我从未说过资本主义已经解决了它的内在矛盾。我说的是现阶段资本主义仍然能够管理这些矛盾了。但是，我认为，至少从



1968年以来对矛盾的这种管理、控制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也没说过国际性的货币危机表明资本主义最终的危机。它和其他危机一样，正如你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前马克思主义者肯定会知道的那样……

**阿隆：**准马克思主义者。

**马尔库塞：**……作为一个准马克思主义者，最后的危机或资本主义可能会延迟30年、50年甚至100年。很抱歉，没有任何捷径。现在的问题是工人阶级。我曾说过，现在我还得说，美国工人阶级不是革命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从未坚持说任何工人阶级在任何时刻都必须是革命阶级。

我曾说过，在当前形势下，鉴于美国工人阶级不是革命阶级，而政治意识、激进的政治意识又碰巧集中在少数未被整合的那些群体身上，比如，学生、黑色和棕色少数族裔、女人。这需要根据整合的力量来解释，而这种力量本身就建立在相对较高的生活标准和该制度仍然能够生产物质商品的基础上。

你刚才说，看一看资本主义多么强大，它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是：它将在自己的财富里窒息。我认为这一定会发生，因为我们不要忘了，马克思认为，当资本主义成功地满足了大多数人口的物质需求时，这种制度的历史命运也就到来了。

**阿隆：**可能你我之间的分歧的根源是：因为对乌托邦式的充分民主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一直都投身于当前的历史处境，并且试图在现实中工作。我想说的是，我的老对头、老同事和老朋友马尔库塞更喜欢投身于过程的尽头，并且梦想着人们能够通过他们拥有的手段干些什么。

[358]

**马尔库塞：**但我认为，价值的这样一种激进变革正在我们面前上演，也就是说某些人的数量正在增加，他们正在克服现存社会侵略性的、压抑性的、竞争性的价值，他们知道他们无须这种无止境的自我驱使的生产力，也能够过上平静的生活。如今，在这种情况下，你叫我乌托邦主义者，我可以承认，不过，我已经有太多这方面的经验了，我认为价值的这样一种激进变革实际上正在发生。

**阿隆：**我只想说，关于我们眼前可能发生的价值体系的变革的观念或诊断，我不反对。我认为，对于一个生产能力越来越强的社会来说，这很正常。对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的迷恋有可能缓解，也有可能减少，因此下一代的社会价值有可能发生变革，而我也支持这种变革。但是我不认为人的本性会发生变革，因为通过研究各种各样的社会（人类学家正在研究），我们知道西方的竞争精神在人类历史上的价值体系中独一无二。也许总是有战争，总是有某种程度上的压抑，但可以确信的是，西方社会正在我们眼前发生改变，如果是这样，我会很高兴。

## 《世界外交论衡》<sup>①</sup>

特别是对美国而言，我们能说它是压抑的，或者说它是一种压抑的制度吗？美国的制度和机制与其他先进（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似乎只有程度

---

① 在马尔库塞的个人档案室中发现了6页上面附有马尔库塞手写勘误的打字稿，顶部还附有手写的“1976年5月18日寄给《世界外交论衡》皮埃尔·多梅尼克【原文如此】”。在马尔库塞的私人档案里，一打信件与该文稿装订在了一起，其中，他收到了一封标着“1976年5月8日”从皮埃尔·多梅尼克处寄来的信件，多梅尼克想请他为1976年6月4号特别版的《世界外交论衡》——为了“庆祝”美国独立200周年——投稿。“庆祝”一词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世界外交论衡》的主题是如今美国的不平等现象。为了这期特别版，期刊邀请了马尔库塞、山姆·鲍尔斯(Sam Bowles)、理查德·爱德华兹(Richard Edwards)、卡罗尔·洛佩特(Carol Lopate)、霍华德·齐恩(Howard Zinn)、保罗·斯威齐、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及其他美国社会激进批评人士。马尔库塞最先在1976年4月28日复信说：“请允许我直接告诉你，我很乐意并且很荣幸受邀为贵刊写一篇关于美国两百周年庆的公开文章。我很乐意，但是截稿日期是5月，时间可能太仓促了。这项任务如此艰巨，应以谨慎负责的态度对待，因此不应过于草率完成。”不管怎样，马尔库塞还是接受了该任务，并写文章猛烈抨击了“压抑的制度”，这种制度不仅在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其他“先进（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中也都明显地表现了出来”。马尔库塞描述了压抑的制度及其矛盾，但和他的许多访谈以及时政文章一样，没有对抵抗的力量做出评价。文稿最先以法文发表了出来，参见“Un nouvel ordre”，*Le Monde Diplomatique*, no. 268 (July 1976)。本文依据马尔库塞最初的勘误手稿，在此首次以英文发表了出来。——编者注

[359] 和量的不同。所有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通过法律和秩序的力量，把包括暴力镇压、阶级正义、歧视、经济制裁以及技术上和意识形态上不断完善的教化机构（媒体、学校等等）等传统的政治压制形式结合了起来。特别是对美国而言，似乎有些缓和的是，依赖性人群的很大一部分被整合进了现有的社会制度。这种整合之所以发生有两个原因：（1）过去，激进的工人运动遭到了无情的镇压，再就是（2）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压倒一切的生产能力有能力维持（尽管越来越困难）相对较高的生活标准。

然而，同样是这些促进和保持整合的趋势却正在削弱它的基础。正是“消费社会”压抑性的力量、对消费者（即自我驱使的工商业的自我驱使的买家）的奴役、新需求的不断创造，加重了制度内部的矛盾，由此必然使压抑性的控制变本加厉。

大多数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生活必需品（物质的与文化的），资本主义的扩大积累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加大生活用品之外的“奢侈品”的生产。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这意味着加速废品、计划报废品、小物件以及破坏性商品的生产。奢侈品变成了人们唯恐在竞争性市场上——在工作和休闲时——失了自己的“身份”而不得不购买的必需品。反过来，这也意味着，要终其一生都维持异化、非人的生存状态，需要有足够的购买力，并谋到一份再生产奴役和奴役制度的工作。因此，美国资本主义给压抑创造了一个新的维度：为了维持终生的依赖而协同使用技术来征服稀缺（满足必要的生存需求）。

[360] 生产力（可以消除男男女女对其劳动工具的服从）和生产条件（在该条件下，正是生产力促进了并维持着异化和压抑）之间的矛盾，早已进入底层人口意识和潜意识。随处可见的“职业道德”沦丧、自发的破坏行为、无处不在的暴力等就是明证。简言之，社会的运转所依赖的可起作用的价值瓦解了。

但是认为社会凝聚力、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价值等级本身会形成一股革命力量，这也是错误的。分散而又缺乏有效组织的广大民众，不善于表

达，尽管打破了传统的阶级界限，但却仍旧无法突破主观的边界。反抗的目标并没有更多地集中在制度结构及其生产方式上，而是集中在了人的行为和态度（监工、老板、“他们”等等）。更糟糕的是，很大程度上，在被剥削的工人中那些较低阶层的人会因为自己“未能成功”上升到更高的阶层而自责（参见 Sennett and Cobb, *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这种罪恶感的建立可以很好地为当权派服务，因为自我压抑支持上层社会强加的压抑。

但是，自我驱使的压抑的再生产本身要在诸多客观条件下才能实现，而这些条件为压抑的推进设置了极端苛刻的限制。人们对提高劳动生产力的需要越来越大，而为了满足该需要就会采用有可能唤起解放的措施和方法：如果它们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行，有可能适得其反。而这些措施和方法包括扩大自动化、以“人性化”为（明显）目标重组工作：让工人对自身的工作担负更多的责任、减少专业化，等等。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这两种方法都有其内在的限制：自动化、持续的技术优化，有可能降低剩余价值率，增加失业，直至资本积累无法忍受为止；而以“人性化”为目标重组工作，如果其推进超越了工业关系在心理上设的圈套，那将会带来大规模的工人自治，从而给工作世界内外的资本主义等级制度带来冲击。

只有与这种客观的动力联系起来，解放性的思想力量才能展现出自身激进的潜力与承诺。一种不同质的人类存在形象，一种无须再消耗在谋生上的生命形象，异化劳动程度降至最低，最终，出现一种新感性、新道德，从而把身体和自然当成提升生命、保护生命的力量来重新认识。现在，这些都表现为对受新的现实原则——是资本主义的后继者，是其成就的完成——支配的社会的历史期待。

从反抗压抑的具体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斗争来看，它们预示着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在深度和广度上将会超过之前的一切革命：实际上，它将是一种质的飞跃，将走向自由。面对这种现实可能性，现有的权力结构强化了

需要和满足要么无用，要么对当权派有威胁，所以必须削减，以便支持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在通力打击下，学校和大学变成了工作培训的地方，减少了人文和社会科学，降低了非职业教育的标准。通过教给他们说话的语言，通过向他们展示表达感受的方式，通过训练他们去渴求满足，维持制度运转的稳步增长的大量的劳动力从孩童时期开始就通过自身适应了其工作的再生产、社会存在的再生产及奴役状态的再生产。

但是，庞大的具有压抑性的科学和伪科学机构、不停地重新创造需要和满足（使奴役状态变惬意了）能否无限期地掩盖该制度的破坏性与废除该制度的途径呢？20世纪60年代的人已经留下了拒绝和重建的遗产，而它们在一体化的外观下将继续发挥作用。激进的潜力已经发生了转变：工业（蓝领）“无产阶级”不再拥有唯一的历史的革命特权；它将与其它工人阶级群体分享该特权，比如，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妇女、青年人、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他们的活动表明，反抗的范围扩大了：变革走向了总体化，量变正在转向质变。

今天，主动权在另一边：控制的总体化。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可能正在形成：新法西斯主义或半法西斯主义的政权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诸多迹象指向该方向：资本扩张的可能性正在收缩、依赖性人口持续增长、黑手党与合法商业结成了同盟、暴力泛滥、持续不断的种族主义、毁灭性武器集中在了统治者的手中，这些都是民主程序普遍堕落的表现。为了反对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左派正在打一场硬仗，但它自身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而走向了分裂。它的主要武器仍然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实施政治教育，即反向教育，使人们意识到用压抑来维持现存社会已不再是必需，使人们意识到各种压抑应该被废除而不是被其他的支配制度取代，但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作为开场白，马尔库塞教授，我首先想知道的是你如何看待意大利共产党的实际政策以及该党渴望与政府合作这些事情。

**马尔库塞：**考虑到我个人并不熟悉这些情形，我想说的是，你一定更有资格去谈论这个问题。对我而言，决定性的问题是：在你们国家，是否有群众支持共产党左派的政策？这对我是决定性的，因为在这方面法国有着相同的情形。现在你所提到的所有组织我都已经有所了解，据我所知任何组织都没有宣称已经得到了群众的支持。

**皮安尼：**是的。

**马尔库塞：**现在，对于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我——我应该还算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是决定性的，势必决定你的政策。因此，如果你不能得到群众的任何支持，不能得到革命工人或者农民、或者中下阶层甚

---

<sup>①</sup> 在马尔库塞的私人档案中，我们发现了一份从未出版过的文本，题为《1978年4月詹圭多·皮安尼访马尔库塞》(An Interview with Herbert Marcuse by Gianguido Piani, April 1978)。采访者显然是意大利的非共产主义左派，他开门见山地问了马尔库塞对“意大利共产党的实际政策以及该党渴望与政府合作”的态度。马尔库塞避开了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而是从左翼自治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当时欧洲及世界各地的左翼政治事件做了讨论。这是一次与当时政治有关的最有启发性的访谈之一，在此首次以英文把这份7页长的访谈打印稿——马尔库塞对其做了认真修订——发表了出来。——编者注

至其他阶层的支持，那么你在干什么呢？如果你得不到这种支持，那么对于新左派的策略而言，这几乎就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你明白吗？

**皮安尼：**我明白。

**马尔库塞：**对我而言，意大利共产党（CPI）当前的政策也非常清楚，现今作为替代方案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新的法西斯主义形式，这种新的法西斯主义形式是有威胁的，而为了预防它，关键就是要对一个仍然是民主的政府施加至少是间接的、真正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能推出一个宏大的工业国有化计划，让它本身变成这样——但是，你早已在意大利这么做了——，近来，它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它仍然保持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框架。

**皮安尼：**你所说的“新的法西斯主义形式”难道是更有建设性的中间派政府吗？

[363] **马尔库塞：**可能是更民主的，不过要加引号。不断重复像集中营这样的事物已经不再必要。今天人们可以利用更加完美的科技武器来达到同样的效果，我所说的武器可能主要是心理武器，这些武器可以更好地训练和压抑人民。

**皮安尼：**你可能想到了施塔姆海姆监狱对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Baader-Meinhof group）<sup>①</sup>的所作所为？

**马尔库塞：**我并不知道真相如何，因为我没有任何真实的相反的证据，而且我认为也没有人有证据，所以我不得不相信这是自杀。

**皮安尼：**你说的“新的法西斯主义形式”是指新的专制政府形式吗？

**马尔库塞：**专制政府，它将更加彻底地整合人口，并与工会协调合作，实现“一体化”（gleichschaltung）。

**皮安尼：**如今这个世界不得不面对很多重大的问题，比如，人口过剩、

<sup>①</sup> 这个问题涉及声名狼藉的德国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其头目于1976年因恐怖主义被捕；其中一个头目，乌尔里克·迈因霍夫（Ulrike Meinhof），1978年在接受审判之前在施塔姆海姆监狱的囚禁室中上吊了，是自杀还是被政府处决现在还是个谜。



自然资源不足、能源匮乏等。你认为下一个十年总的趋势更有可能是走向社会主义，从而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共享现有资源的方式，还是更有可能走向无政府主义，然后走向一种更加专制的管控形式？

**马尔库塞：**不，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可能会不得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次修正社会主义的形象。因此，它并不是一个持续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在欠发达国家，情况完全不同）。实际上，它是一个如何更加公平地分配剩余资源的问题。这听上去完全就是改良主义，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必须经验主义的，必须考虑到现实情况。你知道，如果优秀的老牌资本主义崩溃了，并不是因为它的内在矛盾，而是因为它的资源、石油、电力等等耗尽了，这确实很滑稽。

**皮安尼：**但是，顶多也就是下个世纪，我们肯定会面对资源耗尽的问题。

**马尔库塞：**确实，没有人知道需要花多长时间，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真正的危险。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形象：不是一个富裕的社会而是一个公平、平等和自由的社会。那么富裕绝对不是必要的前提条件。激进的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前提是革命。这不可能得到现有政府的支持。以这个国家为例，你甚至无法就保护能源制定相对令人满意的法律，因为它们已经被特殊的利益集团破坏了。

[364]

**皮安尼：**我们接着讨论。我想你应该听说过“红色旅”（the Red brigades）以及前总理莫罗<sup>①</sup>被劫持的事情。你认为“红色旅”的恐怖主义手段能否获得人民的支持呢？

**马尔库塞：**嗯，如果你想知道答案的话，那么我要说的是，除非意大利的情况与联邦德国完全不同，否则我认为不会。我认为这种恐怖主义与社会

<sup>①</sup> 原文为Noro，应为Moro笔误。阿尔多·莫罗（Aldo Moro，1916年9月23日—1978年5月9日），出生于意大利南方列切省的马里耶镇，意大利著名政治运动家，天主教民主党主席，意大利总理。1978年3月16日被左翼极端恐怖组织“红色旅”成员（Brigate Rosse）绑架并于5月9日被杀害。——译者注

主义策略毫无关系。这就是犯罪。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反对个人恐怖主义的。这对联邦德国来说也是一样的。我的意思是，在第一代恐怖主义者那里，可能存在着政治因素。但是从一开始，恐怖就肯定不是社会主义的策略，持续的杀戮事实上与左派政治毫无关系。恐怖是右派的武器。

**皮安尼：**你认为恐怖主义者是因为他们的观念而聚集到了一起，还是因为受到了别人的控制？

**马尔库塞：**我不知道。我认为有些迹象显示这或多或少是一场国际运动。但是受谁控制，我不知道。你有何猜想吗？

**皮安尼：**我想不出来。这确实令人疑惑。

**马尔库塞：**意大利共产党的左派组织，比如 *Lotta Continua*（持续斗争组织），是如何看待这种恐怖活动的？

**皮安尼：**嗯。许多人说，或者至少在我离开意大利时他们说这都是些走上邪路的同志，但是不管怎样，还是同志。其他组织，比如 *Manifesto*（宣言小组），反对这种恐怖主义。

**马尔库塞：**嗯，这些恐怖分子是否是同志，这正是我所怀疑的。如果你这样称呼他们，会掏空同志这个词的本义。

**皮安尼：**左派组织特别关注去年发生的一件大事，即恐怖主义者在监狱里的状况，他们作为犯人的权利，他们在受审期间的权利。在意大利，我们会为那些特别危险的罪犯提供特殊的监狱。左派想知道在监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例如，巴德尔自杀就留下了很多疑点……

**马尔库塞：**我的意思是，对我而言，毫无疑问的是，在严肃地拒绝这些恐怖分子的同时，左派也必须与囚禁过程中的不人道的状况做斗争，必须与任何方式的折磨、伤害、隔离、感觉剥夺做斗争。

**我们必须为罪犯的权利而斗争，但这与彻底剥夺他们的武器无关。**

**皮安尼：**最近我找机会看了一下意大利的报纸，在莫罗被绑架之后，它登了许多极其杰出的政治家的文章，其中有文章谈到了死刑以及新的限制人身自由的特别法。这些特别法是否公正？它们会不会增加恐怖主义的危险

性？它们能消灭恐怖主义吗？

**马尔库塞：**我认为这种恐怖主义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被消灭。它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还不清楚。

**皮安尼：**我们稍后会看到。我还想问的是美国与苏联的关系。美国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害怕苏联……

**马尔库塞：**是的，但这却被统治者人为地利用了。我认为，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认为苏联与美国之间有一场大战。这是荒谬的，但有人必定会咬定这一点，以便每年的军费预算能够得到批准，并且“国家安全”还意味着一笔大的国际生意！

**皮安尼：**所以，通用动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和麦道公司（McDonnell Douglas）……

**马尔库塞：**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极其奇怪。一方面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糟糕，另一方面它们却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它们有可能合作。

**皮安尼：**你去过苏联吗？

**马尔库塞：**没有。

**皮安尼：**你认为有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吗？或者说你认为经济增长这种成就可以为缺乏个人自由提供辩护吗？

**马尔库塞：**我认为，不管你想象力多么丰富，你都不能说苏联这几十年所发生的一切促进了社会主义。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皮安尼：**那你如何看待中东局势呢？你认为贝京（Begin）<sup>①</sup>和萨达特（Sadat）<sup>②</sup>是真诚的吗？还是说他们更想获得个人成就？

① 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波兰籍犹太人，以色列政治家，是伊尔贡（Irgun，一个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人。1977年至1983年任以色列总理，是第一位利库德集团出身的总理。他还是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译者注

② 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埃及政治家和总统。领导埃及人民进行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并在外交上推行“积极中立”、“不结盟政策”，与以色列积极谈判，用和平手段收复失地。1981年10月在阅兵式上遇刺身亡。——译者注

**马尔库塞：**我认为他们是真诚的。但是，我的观点是，北京的政策很可能是致命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会支持阿拉法特（Arafat）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的立场，更不意味着我会支持以色列那个如今看来灾难性的政策。

**皮安尼：**那么你自然也不会同意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打击报复以及巴勒斯坦对以色列人民的攻击。

**马尔库塞：**是的，这种打击报复是北京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一直如此。

**皮安尼：**总体来说，你是否认为明天的世界将会比今天的更好？我们通盘考虑一下，比如，原子弹……

**马尔库塞：**我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我是现实主义者，我认为很有可能会越来越糟。过渡到社会主义不仅需要变革制度和生产关系，还需要变革那些（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支持和容忍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的思想。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他们激进化是有可能的，如果真出现了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那么可能就会有另一种激进化的方式。我指的是真正的危机。现在所发生的，我认为并非资本主义的危机。这只是人民的危机，而不是资本的危机，即使在激进化到来时，他们也可能走向保守而不是激进。

[366]

**皮安尼：**世界上哪个国家最自由？

**马尔库塞：**如今，最自由？

**皮安尼：**对。

**马尔库塞：**相对自由，因为如今这个世界上真正自由的国家还没有出现。相对而言，我认为美国、英格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荷兰和比利时算得上相对自由的国家。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即资本主义国家仍能允许某种程度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却被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拒绝。

**皮安尼：**意大利内政部长最近【??】却说意大利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简直太好笑了。

**马尔库塞：**无论是根据我的回忆，还是根据我的了解，我都不信。

**皮安尼：**我也不信。

**马尔库塞：**但是在我所提到的国家中，它们所允许的一大堆事情在其他国家根本不允许。但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信仰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公正很可能与有限的自由相互配合，甚至更重要的是，人们应该问：有没有国家至少正在为自由和公正的社会奠定基础。

**皮安尼：**你如何看待欧洲经济共同体（E.E.C）？你认为欧洲国家未来会怎样？ [367]

**马尔库塞：**欧洲国家，我不知道。有太多的至少是潜在的民族冲突了，这使我相信欧洲现在是并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美国最不太可能改变的竞争对手。虽然资本主义的重建极其有效，但这却是我们能亲眼看到的诸多矛盾之一。欧洲资本一方面与日本资本相冲突，另一方面又与美国资本相冲突，但这种冲突却无论如何都无法通过跨国公司来缓和。

**皮安尼：**我读过你的一些书，比如《单向度的人》。你对共产党的看法以及对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看法完全不同。

**马尔库塞：**与什么不同？

**皮安尼：**现在看来你更现实，而在那些书里，你却没有这么现实。怎么会发生这种改变呢？

**马尔库塞：**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改变。我和很多人一样，仍然不相信新左派灭亡了，也不相信 1968 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不相信。1968 年已经改变了整个价值体系，至少从个人来看，从他们自身的生活来看，从他们自身的意识以及对激进变革的现实可能性的意识来看，确实是如此。20 世纪 60 年代的运动已经开始动摇资本主义社会起作用的价值，特别是虚伪的“职业道德”。坚持强调“新感性”，坚持强调不同质的人际关系，意识到人们可以不靠全日制的劳动也能生活，抗议对生活环境的破坏，这证实了一种新的解放观念，而它与这个历史发展阶段的自由和幸福的新的可能性相一致。此外，这些运动最重要的“信息”也许就是：产业工人阶级不再是解放

唯一的力量，而是成了急剧扩大的工人阶级——包括越来越多的白领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有效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力量，女权运动，激进的学生，连同产业工人阶级，构成了一股极其壮大的反资本主义的潜在力量。这股潜在力量在示威游行和占领运动中、在工人接管工厂中、在工人自治中、在全面罢工中、在自发而又隐蔽的破坏行动中被激活了。质量下降是资本主义生产衰退和不断生产垃圾货的一个迹象。据报道，1977年，美国汽车工业不得不召回 900 多万辆的轿车。

日渐低落但对于制度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的社会士气，成了一种不安定的甚至有可能导致瓦解的元素。

**皮安尼：**是因为像纳德组织（Nader's）那样的行动组织吗？

**马尔库塞：**不是。是因为工作场所本身的条件和那里的行动。

## 米利亚姆·米德成·马里诺维奇

### 1978 年访马尔库塞<sup>①</sup>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当我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时，我参加了由

---

① 《米利亚姆·米德成·马里诺维奇 1978 年访马尔库塞》最先在《社会研究》上发表了出来（参见 Myriam Miedzian Malinovich, “Herbert Marcuse in 1978: An Interview”, *Social Research*, Summer 1981, Vol. 48, No. 2）。米利亚姆·米德成曾在 2013 年 4 月 15 日的邮件上解释说，她和马尔库塞及英格·马尔库塞是好朋友，他们曾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至 70 年代早期居住在拉荷亚市，并且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有联系。1978 年，米德成从纽约（那时她居住的地方）飞往加州对马尔库塞做了一系列的访谈。访谈地点就是马尔库塞在圣迭戈分校的办公室。他的妻子谢尔奥弗——英格已于 1972 年去世——也在场，她为数不多的评论也放在了访谈最后的部分。访谈的主题与有些人的指控密切相关，当时有些人说马尔库塞鼓励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实施恐怖活动，而米德成希望给马尔库塞一次回应这些指控的机会。

米德成解释说最初这篇访谈是准备投给《纽约时报》的，因为当时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上了新闻，他们因在西德实施了一系列的恐怖袭击和绑架受到了控告，随后被关押了起来。她的文章原本想给马尔库塞一次回应这些指控的机会，但是尽管她与期刊签了协议，就在米德成刚刚完成了她的访谈和文章时，米德成的《纽约时报》编辑琳达·奥布斯特（Lynda Obst）却不巧辞职去好莱坞做电影制片人了。米德成后来说：“接手的编辑对该文不是很热心，根本没有深入讨论细节。我担心他想要的是恶毒的诽谤，或某种类似的东西；不久《纽约时报》的一些雇员开始罢工，一直持续了三个月！那时我撤回了这篇文章；我不打算对马尔库塞做出超出我认为是合适的批评，罢工持续了很长时间，结束后，我认为巴德尔—迈因霍夫事件对于一个周刊来说应该过时了。因此我最后把我的稿子编辑整理成了访谈的格式，在《社会研究》上发表了出来。不消说，形势的变化让我和马尔库塞都挺失望。”——编者注

马尔库塞主持的有关马克思的系列讲座。之前我从来没有读过马尔库塞的著作；他异常清晰、深刻、精心准备的讲座鼓舞了我，因此我去买了本《爱欲与文明》。我立刻就被书中的论证迷住了——这是我与“解放文学”的第一次邂逅。但是，我也陷入了困惑。一个能够给出如此透彻易懂的讲座的人，又怎么有着如此晦涩、沉重、浮夸的写作风格？

[369] 大约七年之后，我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拉荷亚市，我再次遇到了马尔库塞和他的妻子英格并成了他们的朋友，而那时他已经从布兰迪斯大学退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任教。我再次陷入了困惑。这时我已经读了马克思及其他同样过着保守的个人生活但却反差明显地写出了火热的革命小册子的那些人的作品，马尔库塞在现实生活中既是一个保守、体贴、负责任的人，同时也是夸张的、有争议的激进作品的作者，这让人很震惊。作者和私人之间的反差经常成为他的朋友们谈论的话题。我仍然记得我们中的有些人得知他可能是20世纪60年代各种反文化和解放运动最重要的英雄时都很吃惊，他们的反应就像任何资产阶级的父母听说他们的继子和儿媳加入了公社时的反应一样。

1978年4月，我回到了拉荷亚，采访了马尔库塞，我发现自己再次被他给震惊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单向度的人》的作者竟告诉我美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之一。我更不敢相信他竟会赞同这样的想法，即第三世界国家大约四分之一的问题是由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

有时候我觉得，他对自己作品的阐释远比我或者他的相当一部分（即便不是大部分）的读者与批评者对其作品的理解要温和得多。私下里，他特别强调限定性条件，而在他的作品中，这却淹没在了他夸张的手法中。

另一方面，虽然我很清楚在他最有名的作品中有种以不严谨的措词去论述并随便去下判断的倾向，但我觉得这种倾向在对话中尤为令人不安。在讨论《压抑的宽容》时，我惊讶地发现马尔库塞居然完全不清楚文中的某些基本的论证。

例如，他告诉我说他没有清楚地解释“该文已预设了一个至少在政治上极其不同的社会”，也就是说，它已经废除了资本主义。不过，后来他又告



诉我说，在文章中，他只是“故意挑衅”，因为他看到主要是在德国出现了一种危险的趋势，即“对纳粹和初期的纳粹运动重新表现出了宽容”的趋势。但很显然他不能兼而有之——如果他首要关注的是自由民主政体对纳粹的容忍，那么文章就不能专门谈论后革命社会。同时，我不禁想知道，如果他认为他的文章“有改进的可能和必要”，那么为什么在 1968 年第二版的后记中他没有改进。如果说《压抑的宽容》有着高度的挑衅性，而事实上许多年轻人也把它当成了干扰大学课程的正当理由，那么他不澄清自己的立场似乎就有点不负责任了。

[370]

你可以简单地由此出发说马尔库塞不负责任；毫无疑问，这不会使他在众多社会理论家中独树一帜。然而，他更令人困惑的是他平日的行为，他是一个极其有担当的人。当学生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暴动时，正如赫伯特·约克（Herbert York）——物理学教授、政府顾问，圣迭戈分校第一任名誉校长——告诉我的那样，“马尔库塞通常是一个缓和因素”。不仅每一个与我交谈的人这么说，甚至马尔库塞在多伦多约克大学做教授时的学生威廉姆斯·莱斯（William Leiss）也这么说。莱斯告诉我说，“就煽动人们采取行动而言，他可能是我见过的最谨慎的人了”。莱斯在马尔库塞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他是圣迭戈分校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员圈子——参与了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的左派政治，因此与马尔库塞特别亲近——的一员。他已经出版了两本与马尔库塞作品有关的著作。

在马尔库塞最有名、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就像其他人一样，莱斯也觉得马尔库塞有“随意处理经验材料”，“毫无道理地做出仓促的判断”，“表述不精确或粗心大意”的倾向。但是莱斯也说道：“与此同时……我也深深地被这个人所打动……我万分感谢他对我的教育。我认为，我能形成自己的方法，包括批判他的作品的方法，这直接源于马尔库塞的教育方法。”像其他与我交谈过的马尔库塞的学生那样，莱斯认为，马尔库塞是一位非常细心的老师（“当我们研究康德和黑格尔时，晚间 3 个小时的研讨班学习，我们只学了 5 页……这种训练完全是非教条的；他从未在课堂上谈及自己的书”），

他是一流的学者（“就像《理性和革命》一样，他第一本关于黑格尔的著作其推理同样极其严谨”），而他的演讲也非常明晰（“他的演讲风格更清楚、更温和、更开放，而这与他的写作风格大相径庭”）。

在我与马尔库塞面谈之后，以及在我听到莱斯和其他人说这个人有着很大的反差之后，我有了这样的感觉，即存在着两个马尔库塞教授。一个是特别得体、负责、明晰、开明的学者和老师。另一个则是这样一位德国哲学教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沉湎于晦涩的语言和包罗万象的宏大理论——它使浪漫奔放的想象力与对人类理性的潜能的深层次的信仰结合了起来。这就是马尔库塞，一名拒绝迎合听众的德国教授，一个似乎不清楚也不关心他的作品可能会导致极端解读的人。比如，当我问他使用“极权主义”这个词去描述西方社会是否明智时，我不由得觉得，在他拒绝承认其误导性的背后，有一个不太现实的、有些自大的假设，他认为读者能够或者应该能够看到文本中所有细微的差别。但事实并非如此，特别是那些难懂却流行的作品，只有很少一部分读者会从头读到尾。

回想起来，作为认真的学者的马尔库塞与作为宏大的理论家的马尔库塞，却不能在其作品中实现统一，这似乎太遗憾了。我认为，那些因他夸张的手法而疏远了他的读者应该早就看到了他以更为审慎、适当的形式对西方社会所做的富有洞察而又深谋远虑的批判。

理查德·古德温（Richard Goodwin）曾这样描述马尔库塞：“这位激进的哲学家在内心深处似乎是一个保守的人，他把理性当成了唯一正确的东西，并且无论理性可能把他带向何方，他都愿意服从理性……难道人们需要被灌输吗？——那么我们在一段时期内就会受到有教养的精英的专政统治。难道人的本性太过脆弱还不能自由吗？——那么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新的人。这一切都非常有逻辑性，但你是不可能把大海组织起来的。”<sup>①</sup>

<sup>①</sup> Richard Goodwin, “The Social Theory of Herbert Marcuse”, *Atlantic Monthly* 227 (June 1971): 68ff.

最后一句话如今使我震惊，因为它用在马尔库塞自己身上尤为中肯。因为我已经认识到要想弄清楚马尔库塞充满矛盾的各个面向是徒劳的，因为这种想法建立在我错误地假定他是理性的、一致性的基础上。事实上，马尔库塞的私人生活和公共形象之间、教师和作家之间的对立异常尖锐，而这也恰好证明了人类心理的复杂性和非理性，古德温和其他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创造马尔库塞所勾勒的理性社会时不可逾越的障碍。

## 爱欲与文明

**马里诺维奇：**你一直饱受批评，因为你在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类——彻底的单面性，整个的痴愚化(moronization)，等等——时，你在《爱欲与文明》中描绘“解放了的人类”时，太极端、太扭曲了。有人认为，你紧接着对当前全面压制与未来全面解放的现实可能性所作的对比，正在误导年轻人。<sup>①</sup>

**马尔库塞：**不，除非这些年轻人相信我不相信的事情，即革命已经被提上议程。早在几年前，我就已经在我的书中指出革命并没有被提上议程，而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该知道的就是我们并没有生活在革命的时代，我们需要年复一年的教育和启蒙，直到我们不用再说这只是一个乌托邦为止。

[372]

**马里诺维奇：**换言之，你想说的是我们需要很久才能使你在《爱欲与文明》中所描绘的那种社会或人类拥有现实可能性。

**马尔库塞：**对，因此我们必须小心谨慎。某种意义上，即使是今天也有现实可能性……若不是整个制度被动员起来反对的话，你原本今天就可以拥有一个更好的社会。

<sup>①</sup> 有人指控马尔库塞，说他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影响了年轻人，使他们参与到了恐怖活动中。马尔库塞在“恐怖主义”那一部分详细回应了这种指控。

**马里诺维奇：**你的意思是，这种你在《爱欲与文明》中所描述的乌托邦或国家在物质层面和心理层面都有存在的可能。

**马尔库塞：**我认为物质层面有存在的可能，但心理层面还不确定。

**马里诺维奇：**那些批评你的人，他们的一个观点是，这件事比你所宣称的要复杂得多——

**马尔库塞：**我不否认这件事很复杂。要反对一个远比你所能想象的要强大而且仍然不负众望的制度，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绝大部分人口的基本需要能够得到满足。

**马里诺维奇：**我想他们说复杂的意思是，他们认为你将某些归咎于人性的缺点，或者至少在证据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几乎完全归咎于资本主义社会。

**马尔库塞：**没有不变的人性。你可以把人类塑造成你想要的样子，而不巧的是，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并不陌生。当然，人类的生存需要自然界。我的意思是人类也是动物，但是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不可改变的。它仅仅意味着人类的发展与自然及自然界的发展密切相关。人类也是自然，但是，自然是可改变的。

**马里诺维奇：**有人批评你，说你没有充分考虑人类可能有攻击本能。

**马尔库塞：**当然有攻击本能，但是这些攻击本能可以被用于对社会有益的目的，比如，被用于技术发展，或者被用于社会主义的竞争。本能确实存在，但它并非必定表现为完全毁灭性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只有在受压迫的社会中才会表现出来。顺便说一下，我【在《爱欲与文明》中】并没有太过超出弗洛伊德；我只是试着说出了在我看来弗洛伊德后期的本能理论所暗含的意义。我想应该是在他写给爱因斯坦的信中或者可能是在《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的结尾处，他提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爱欲将会再次肯定自身，反对它永恒的对手。

[373] **马里诺维奇：**你在《爱欲与文明》中所表达的乌托邦愿景一直以来都因太过含糊而备受批评，比如，有人会说，在这种乌托邦里人们该做些什么？

他们该怎么利用他们的时间？我想听听你对此的回应。

**马尔库塞：**从这种批评来看，你认为人还是会像今天这样受到管控、受到极度的压抑，但你应该把人放入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有着完全不同的制度、完全不同的人类社会。今天我们当然可以说：如果这个男人或女人丢了全职的工作，那么他们就只能坐在电视机前。今天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但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中，无疑，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很清楚要做什么。在这里，有创造性的工作。

**马里诺维奇：**有种观点认为，你的模型主要是艺术家或那些极具创造力的人，但大多数人都很平庸，远没有你所说的那么出色。

**马尔库塞：**即便他们真的平庸，也并不代表这种平庸不可能得到补救。否则人们不可能拥有一个自由的社会。人们必须改变，而我认为人们正在发生改变。

**马里诺维奇：**布兰登<sup>①</sup>说你是一位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家，说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蔑视一切社会联系和家族权威；言外之意，他们的思想来源于你。我觉得他的这个看法来源于你在《爱欲与文明》中的立场——你的立场太模糊了，你赞成废除一切剩余的压抑，但有时却说废除压抑，因此给人的印象是你骨子里就是无政府主义，即“各干各的”。

**马尔库塞：**“无政府主义”是一个愚蠢的概念，但如果通过无政府主义，他想说的是我反对一个受庞大的官僚机构操纵和支配而且在现实中不再对人民负责的社会，那么他说我反对政府就是正确的。我还没傻到认为人们不用组织起来就能实际地变革社会的程度，也没有傻到认为任何行政机构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都是不必要的程度。那样使用“无政府主义”这个词简直太愚蠢了。

<sup>①</sup> 巴德尔—迈因霍夫恐怖主义的三个剩下的领导人在监狱里死了以后，大概又过了半年，我对马尔库塞做了这次访谈。当时，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 驻北美首席记者亨利·布兰登(Henry Brandon)及其他很多作家、学者都试图将马尔库塞的作品和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联系起来。

**马里诺维奇：**你从来都不认为自由社会不需要任何结构的社会组织形式吗？

[374] **马尔库塞：**当然不认为，我可没这么愚蠢……有些事必须模糊表达，毕竟理论家不是预言者。模糊总比什么都不说有意义得多。

**马里诺维奇：**现如今所有的描述仍旧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一种由现如今社会环境形成或受其影响的心理结构，因此，不管是谁，在当今形势下都很难勾勒出解放了的人的生活方式。

**马尔库塞：**确实如此。

**马里诺维奇：**还有一个问题，同样源于对你作品的诠释。有些女性作家，比如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曾经鼓吹要解除乱伦禁忌、废除家庭。那么在你创作《爱欲与文明》时脑海中可曾以任何方式想过，为了消除俄狄浦斯情结所带来的压抑，我们应该解除乱伦禁忌和废除家庭呢？

**马尔库塞：**我从没说过这种话。我既不赞同废除家庭，也不赞同解除乱伦禁忌。相反，我记得在很多场合，我都强调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在很长的一段发展时期内，家庭一直都是进步的力量，并且家庭可能再次成为进步的力量；但前提条件是它能够保护家中的儿童和成人免受现有社会对其生活的压制性的管理，也就是说，私人 and 私密领域能够受到保护，甚至能够成为反抗的起点……到底是谁毁了现今的家庭？如果家庭生活仅仅局限于看电视，那么家庭就彻底毁了。

**马里诺维奇：**……我突然想起《爱欲与文明》中的一段话，你是这么说的：“力比多关系的价值与范围的改变将导致这些制度的瓦解，正是在这些制度下，私人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一夫一妻的父权制家庭被建立了起来。”这句话该怎么解释？

**马尔库塞：**这并不是倡导，而只是一种解释。我并不倡导它。此外，我们不应低估另一种主要由霍克海默提出的趋势，相反，我赞同它，并且对此，我最近又写了些文章——在许多情况下，家庭也能够起到保护作用……因此你必须更为辩证地对它进行阐释，因为两方面都成立。父权制家庭有压

抑性，与此同时，家庭在一定程度上仍能使儿童免受媒体、同龄人等方面的影响。

**马里诺维奇：**虽然你说这不是一种倡导，而只是一种解释，但问题在于，你在书中倡导的正是这种新型的社会。也正是那段话招致了别人的谴责，说你反对家庭。

**马尔库塞：**我不在意这些谴责。我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不能去预言，在自由的社会里到底会发生什么。

**马里诺维奇：**生态问题有没有对你《爱欲与文明》中的这个观点——即 [375]  
高科技使依照快乐原则来生活成为了可能——产生影响呢？

**马尔库塞：**“依照快乐原则来生活”，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因为还存在着其他的原则。

**马里诺维奇：**但你不是说过大意是快乐原则会成为现实原则这样的话吗？

**马尔库塞：**嗯，它有可能促成一种不同的现实原则，但现实原则不单单是快乐原则的现实化。不过，我从来没那么说。

**马里诺维奇：**让我们谈一下你在《爱欲与文明》中所提出的论点：因为技术的发展，所以快乐原则在人的生活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但它是否会因为如今的生态问题而受到严重的威胁呢？你不觉得我们有可能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匮乏的时代吗？毕竟，这本书是你 24 年前完成的。

**马尔库塞：**是的，我从没说过一个自由的社会就是一个富裕的社会。借助于现有的技术资源和自然资源，我们几乎可以马上就着手为争取创建这样一个社会而奋斗。富裕并非必需。正是因为坚持认为社会财富还不够丰富，所以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推迟这项重建任务。

**马里诺维奇：**但你在《爱欲与文明》中确实说过，那样的社会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但在这个历史时刻是可能的，而使其成为可能的正是技术。

**马尔库塞：**确实如此。这是我给出的原因之一。

**马里诺维奇：**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该如何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

比如，石油问题，甚至一切能源问题。

**马尔库塞：**是的，这是一种选择，要看你想要一个自由的社会还是一个舒适富裕但却没有自由的社会。我们必须学会使用现有的资源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浪费资源。

**马里诺维奇：**我觉得，至少在《爱欲与文明》中你似乎部分地认为，因为技术的发展，马克思所提出的劳动意义上的工作事实上可以被彻底废除或被极大地缩减。但如果我们正在耗尽能源，那么这些生态灾难不会危及你的这种观点吗？

**马尔库塞：**不可否认，确实有这样的危险。如果我们耗尽了自然资源，我们将不得不极大地降低我们的生活标准，与此同时，我们还会殷切希望能够找到替代品。

**马里诺维奇：**难道仅仅是降低了我们的生活标准吗？人们是否有可能必须从事不愉快的工作？而为了让人们做不愉快的工作，压抑是否会再次成为历史的必然呢？

**马尔库塞：**为什么那时的工作比今天在流水线上的工作还要令人不愉快呢？我并不这样认为。

**马里诺维奇：**不，不是说更加不愉快，而是说它会使你的乌托邦愿景变得更加不可能。

[376] **马尔库塞：**嗯，我从没说过自由社会可以完全消除异化劳动。只能减少异化劳动，不过可以大大地减少。我觉得，我们不应妄自揣测它会减少得更多一点还是更少一点。无论如何，事实是，人们还是要继续从事异化劳动，不过可能会大幅度地减少。

### 单向度的人

**马里诺维奇：**关于《单向度的人》最常见的批评是，作为一门社会学，它太过脱离实际了，因为你在书中没有给出足够的证据，并且你的描述也太



过夸张了。对于该批评，我与戴克斯特拉 (Dykstra)<sup>①</sup> 做了详细的讨论，我觉得你的回答很可能与他的差不多，他认为，必须按照“科学的模型”进行社会学研究，即发放问卷、长期跟踪调查，这本身就是操纵意识的例证。

**马尔库塞：**我同意这个观点。说到夸张，我想引用一个观点，记得阿多诺曾经说过，在精神分析中唯有夸张是真实的，而在一定程度上，我还想把这个观点运用于社会批判。

**马里诺维奇：**根据该书的方法论，你同意戴克斯特拉所谓的这是一种建立在个人感知——在社会领域得到了验证——基础上的理论分析的说法吗？

**马尔库塞：**不仅仅是个人感知。我认为，相当多的人同样有着这样的感知，而不只是我一个人。在与他人无数的交谈中，这种感知受到了训练，发展了起来。我不想使用“个人的”(personal)这个词，除非你用这种方式去解释它。

**马里诺维奇：**但对你而言，你的描述没能得到大量的数据的支持，难道这不是一种缺点吗？

**马尔库塞：**大量的是什么意思？我当然收集了足够多的素材。这可不是我一拍脑门想出来的。

**马里诺维奇：**大量的意味着要进行大量的社会学研究、发放大量的调查问卷。

**马尔库塞：**我读过社会学研究。只是我没有在书中引用它们，这是另一回事，但并不意味着我没读过。

**马里诺维奇：**对此，我想说的是，你的很多说法早已得到了证实。关于电视暴力对孩子的影响，已有很多研究。现如今，电视的影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现在，为了证实你更早先的很多观点，许多研究也都正在进行。

**马尔库塞：**你说得对。

[377]

① 布莱姆·戴克斯特拉 (Bram Dykstra) 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比较文学教授，也是马尔库塞的朋友。

**马里诺维奇：**戴克斯特拉还提到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必须按照行为科学的模式去证明理论——

**马尔库塞：**你必须证明一个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根据行为社会学去证明。

**马里诺维奇：**你所说的证明是什么意思？能否稍微谈一谈？

**马尔库塞：**就是把它解释清楚，以便让每个人——只要不是智力低下者或完全不识字的人——都能理解它。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依据自然科学或心理实验去证明。

**马里诺维奇：**换言之，如果你描述了这个现象，明智的人就能够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去证实它。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马尔库塞：**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并且通过理解我的观点。当然，他们不需要同意，但是至少他们必须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马里诺维奇：**你有没有因为曾经把“极权主义”这个词用到了西方社会身上而感到后悔？

**马尔库塞：**嗯，存在着很多极权主义形式；它并非必然就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极权主义。比如，通过新技术，使用媒体或电脑，或者任何什么东西，你几乎可以完全控制整个人口。它是这个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不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意义上的极权主义。

**马里诺维奇：**因此，你不认为使用“极权主义”这个词有误导性。

**马尔库塞：**不认为，除非你将它等同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了，不过，你可以说民主的极权主义，或者极权主义的民主，而我想谈的也正是这个。

**马里诺维奇：**有观点认为，当你说到诸如痴愚化时，你没有表现得多么欣赏西方社会的自由，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你对此有任何悔意吗？

**马尔库塞：**毫无疑问，我非常欣赏西方社会中我们如今仍有的自由，否则，我根本不可能在这里出现，也不可能在这里写东西，因此这种观点是错的。我非常清楚，如今这个国家和英格兰，相对而言，可能仍是世界上最自

由的国家。

**马里诺维奇：**你不觉得你在《单向度的人》中给人留下了错误的印象吗？

**马尔库塞：**不觉得，我试图勾勒出各种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趋势，而我会坚持到底。

**马里诺维奇：**按照你所讲的民众的痴愚化，你怎么解释女权运动——？

**马尔库塞：**有很多这样的反抗运动。在这个国家，这种反抗仍是允许的，如果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并且存在着更大规模的激进化趋势，那么它有可能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马里诺维奇：**但是女权运动已经影响到了很多在政治上决非激进分子的妇女。 [378]

**马尔库塞：**这仅仅意味着潜在的反抗力量已经在更大的人群中蔓延开来。它影响到了以前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不关心政治的顺从的阶层，比如妇女。

**马里诺维奇：**她们没有变得更加政治化，比如，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

**马尔库塞：**事实上它也是一种政治运动，因为女权运动的终极目标在这个社会框架下无法实现……我想说的是价值需要彻底的转变。

**马里诺维奇：**我想是在《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的访谈中，当你谈到痴愚化时，你还谈到了社会正在日趋非人化(dehumanization)。但对我而言，社会似乎在某些方面已经变得更加人性化了。比如说，为残障人士而设的法律——当我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时，根本就不招收残障学生，但如今伯克利到处是轮椅。残障人已经完全被接纳了。现在法律要求所有的公共建筑都必须建造残疾人通道。

**马尔库塞：**绝对没理由否认这些因素。但决定性的问题是：因为这种趋势根植于制度，那么它将会变得更广泛还是相反呢？而我将指出，相反的趋势将占据主导。例如，反对环境污染的法律，这项宽松的法律已经获得了通过，但是它一旦伤害到了大公司的利益，特别是核能的利益，它就会被废止或削弱。

**马里诺维奇：**但是，美国拥有最强有力的生态保护法或药事法规，这依然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在欧洲，你可以购买未经测试、在美国被禁的药品和化妆品。

**马尔库塞：**我不否认。但这些趋势有其内在的限制——它们不能违反公司的基本利益。如果说它真伤害了公司的利益，它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

**马里诺维奇：**你怎么看待“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sup>①</sup>？这对你而言是否是一个进步的举措？

**马尔库塞：**我当然支持；因为它至少试着去消除数世纪以来的很多不公的现象。

**马里诺维奇：**你关于社会在心理层面有着高度的压抑性的观点有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就像在《单向度的人》中那样，你仍然觉得非常强烈吗？

**马尔库塞：**我不认为我改变了想法。正如我以前所说，我唯一能察觉到的改变是，1968年以后，我稍稍乐观了一些，因为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379]

## 压抑的宽容

**马里诺维奇：**《压抑的宽容》中有这么一句话：“一旦宽容或多或少悄悄地并且本质上远离了反抗，那么在当前政策下，它就会变成强制行为。”紧接着，你在《反革命和造反》最后几页提到了对反叛的压抑已经变得愈演愈烈。难道这不与你所说的最自由的国家之一相矛盾吗？

**马尔库塞：**我说的是相对自由。在当今世界，根本就没有自由的国家。只是有些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更接近自由而已。比起斯大林主义的苏联，甚至后斯大林主义的苏联，这当然是一个更加自由的社会了，而且对人口的管理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靠民主和宪法的手段来推进。因此这绝不是一种法西斯

<sup>①</sup> Affirmative action，译为“平权法案”，它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风起云涌的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的洪流之中。最早始于1961年肯尼迪总统的一个反对歧视的行政命令，后来几经修改，成为今天一个影响无数美国黑人的重要法案。——译者注

主义或者初期的法西斯主义（*protofascist*）社会。这种说法完全是扯淡，那些说这些话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它是一个铁板一块的社会，在那里，他们根本不能说这些。

**马里诺维奇：**如果对照我刚才读到的《压抑的宽容》中的那句话，你似乎想强有力地说些什么——你说宽容“或多或少悄悄地并且本质上从反抗中撤离”时，有人就会认为，你说的是美国社会……

**马尔库塞：**确实，你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我们从当下的处境着眼，比如，改造教育。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获得一个大学教职正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

**马里诺维奇：**是吗？

**马尔库塞：**是的。事实上，最近的档案已经清楚地显示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对整个所谓有嫌疑的群体监控到了怎样的程度。

**马里诺维奇：**我觉得当你在写作时，你有时倾向于给出两个几乎对立的陈述，想到不同的事，而不是限定陈述的范围。比如，一方面，你在《压抑的宽容》中提到这个社会容忍一切。即使是傻瓜也可以上电视，说出自己的想法，你的意思似乎是，这真的是绝对的宽容。另一方面，在类似的陈述中，你好像又在说这种宽容并不存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马尔库塞：**不是这样的。如果给你造成了这种印象，那可不是我想要的。在这个国家，社会仍然为反对者保留了表达的途径。这就是我如此强调它不是法西斯主义社会的原因。但你也知道，宽容正在变得压抑，你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比如，如果在同一个屏幕上，他们先请一个集中营的囚犯来访谈，然后一小时或一天后又有人告诉你那完全是夸张和虚构的。一个表象破坏了另一个。

**马里诺维奇：**当你在《反革命和造反》中说到对反抗的压抑已经变得愈演愈烈时，你心中是怎么想的？你能举些例子吗？

[380]

**马尔库塞：**对整个人口控制和监管已变得越来越有效。不必举例子——所流出的关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监视活动的一切材料在这个国家尽人

皆知。

**马里诺维奇：**你有没有改变你在《压抑的宽容》中的观点？

**马尔库塞：**我只能说，当然没有太过有意识的改变，而且也很清楚，根本没有大的改变。

**马里诺维奇：**我觉得很难弄清楚你在《压抑的宽容》中所讲的某些观点。我举个例子，你在文章开头说，“在无恶意的辩论中，在交谈中，在学术讨论中，绝对的宽容有其合理之处”，但后来你却又说，“恢复思想自由可能需要针对教育机构的教学和实践制定新的、严格的规范，因为这些教育机构借由它们自身的方法和观念足以把心灵禁锢在既定的辩论范围内”。而在我看来，你说的是两个不同的情况。在第一个陈述中，你的意思是应该在学术层面保留绝对的宽容。

**马尔库塞：**第二个陈述涉及思想自由尚未得到恢复这段时期，它是一个社会事实。而教育在此显然就是政治宣传。在希特勒统治下，也有教育。不过，教育和教育也有不同。

**马里诺维奇：**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已变得很难区分，不是吗？

**马尔库塞：**是的。但是，在这些事情上，人们很容易就会提出极其边缘的情况，从而错失全部事情，所以人们不应该总是强调这些边缘的情况，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很难区分。但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区分并不算太难。

**马里诺维奇：**我不确定是否准确地理解了你的意思。当你说绝对的宽容时，你的意思似乎是完全宽容任何学术讨论，但你现在的意思是对非宣传性的学术讨论保持绝对的宽容。

**马尔库塞：**没错，我不会把宣传称作学术职业。

**马里诺维奇：**有人也许真的在某个主题上持有高度保守的立场，这难道不是很有可能的吗？他可能是一个真实、诚恳但却保守的经济学者。

**马尔库塞：**这当然不包括在我所说的不应宽容的运动形式之中。

**马里诺维奇：**是的，但随后你在同一页中却说你提倡“无须再宽容这些团体的言论和集会……因为它们提倡种族和宗教歧视，反对扩大公共服务、

社会保障、医疗服务的范围”。这句话经常遭到抨击——在《压抑的宽容》中，[381]  
你的观点是，如果有人反对公费医疗，那么无须宽容！

**马尔库塞：**无须宽容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就应该被消灭。

**马里诺维奇：**对，但不应让他表达自己的观点。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如果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又是什么意思呢？

**马尔库塞：**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的是，在失业者人数不止六七百万并且不公平现象仍然存在的现实状况下，如果还有人倡导削减那些已经降到了最低的社会服务，那么人们确实就应该与此做斗争。

**马里诺维奇：**是的，但是斗争与不宽容是两码事。当你说到无须再宽容时，你的意思难道不是不让某人表达观点吗？

**马尔库塞：**是的，或者如果他想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就应该更好地证明它的合法性，但我不认为它有什么合法性。我知道这句话经常有人引用，因为我发现在当前形势下站出来反对一个真正有效的社会福利计划是令人憎恶的。

**马里诺维奇：**现在，我有些迷惑……就拿纽约市破产来说，为了从联邦政府得到钱，他们必须削减某些服务，必须平衡他们的预算。如果在纽约有人说我们必须更加严格地限制福利，或者我们必须削减某些公共服务，或者我们必须减少公共住房，而实际上他们早已不得不这么做了，那么你认为这些声明也不应该被宽容吗？在很多背景下，这些声明都不应该被解释成是一种初期的法西斯主义，难道不是吗？

**马尔库塞：**嗯，如果这只是纯粹的学术声明，它应该被归入那些可以被宽容的情况，但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理解，而更大的背景与其说是平衡预算或者别的什么，不如说它就是一个削减社会服务的普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无须宽容反对社会福利的政治宣传，这样的声明在我看来是有意义的。我想我还是会坚持这一点，因为这不是一种学术情境，而是一个极其紧迫的、影响数百万底层民众的社会情境。

**马里诺维奇：**如果一个保守的经济学教授极力主张我们应该削减某些社

会服务呢？

**马尔库塞：**我会说同样的话。因为这会使数百万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变得更糟，所以那种声明是不妥当的。

**马里诺维奇：**因此也不应被允许。

**马尔库塞：**是的。我再说一遍，作为一个学术型的老师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一个宣传者不行。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

**马里诺维奇：**我已经完全被搞糊涂了。你能更详细地说一下这种区别吗？

[382] **马尔库塞：**你要知道在整个讨论过程中令人费神的是一再地把相对边缘、无害而又完全不是我讨论的核心的那些情况当成了问题。然而，像新纳粹运动那样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

**马里诺维奇：**但是我仍然不明白你的意思，因为很多保守的经济学家都会站出来说我们应该削减福利。

**马尔库塞：**如果他们在上课时这么说，并且允许完全自由的批评和讨论，那么他们可以得到宽容。

**马里诺维奇：**即使他们反对扩大社会的——

**马尔库塞：**即使他们反对，也可以宽容……你可以说我在这篇文章中是故意挑衅，因为我看到了一种危险的趋势，不过，不是在这个国家，而主要是在德国，他们对纳粹和初期的纳粹运动重新表现出了宽容……文章还有改进的可能和必要，但我却一直记得因为宽容纳粹运动及其他右派武装运动而在魏玛共和国所发生的一切。

**马里诺维奇：**这正是我想知道的。你这里的很多说法是不是受到了魏玛共和国的影响，而在你心中有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模型。

**马尔库塞：**是的，因为这是最现实的模型。

**马里诺维奇：**但你陈述的方式却没有给人留下那种印象，而是表现得更激烈。

**马尔库塞：**是的，我知道。



**马里诺维奇：**你敢说你的意思没有那么激烈吗？

**马尔库塞：**毫无疑问，我认为改进和限制是可能的或必要的，但我肯定不会放弃整个立场……你是知道的，另一件不太清楚的事情是我所说的该文已预设了一个至少在政治上极其不同的社会。无疑，当前政府不可能使类似的事情成为现实。因此很明显，它走进了未来。自始至终，它都以一个不同的社会为先决条件。

**马里诺维奇：**不同的社会，我猜想你指的是精英专政。你在书的末尾处谈到过。它是那个不同的社会吗？

**马尔库塞：**不是，我想说的是这么一个社会，它的奋斗目标远非纠正、消除如今阻碍人类进步的基本障碍，而且很重要的是，它不得不与其他威胁它的社会制度做斗争。它就像魏玛共和国那样。

**马里诺维奇：**你说的是来自内部的威胁？

**马尔库塞：**外部和内部。

**马里诺维奇：**改良或限制至少有一条曾经出现在了你的脑海中，至少有一条你之前曾经说过，比如，你说在大学的讲座中自由讨论是可能的，除了彻底的法西斯主义或诸如此类的立场外，任何立场都可以拿来讨论。这么说对吗？

[383]

**马尔库塞：**要看在什么样的社会？

**马里诺维奇：**一个不同的社会，你说过它是先决条件。

**马尔库塞：**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马里诺维奇：**但肯定不是一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

**马尔库塞：**肯定不是。

**马里诺维奇：**同样是在《压抑的宽容》中，你还说道：“人们必须创造使宽容能够再次成为解放和人性化的力量的条件。”不过，将会有有一个过渡时期，这期间不宽容是必要的，你现在是这个意思吗？

**马尔库塞：**完全正确。

**马里诺维奇：**可以这么说，你的目的是摆脱反动势力，但是一旦这么做

了，就会——

**马尔库塞：**是的，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预言家，而那也只是一般的想法。如果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整个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因为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法西斯主义存在的理由。

**马里诺维奇：**至少对你来说有可能的是，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你能够得到绝对的宽容。

**马尔库塞：**不仅仅是可能，它本身就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

**马里诺维奇：**但基本前提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完全不可能再有法西斯主义了——

**马尔库塞：**根本就不存在支持法西斯主义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但是我们谈论的社会还不存在，因此我们无法细谈。

**马里诺维奇：**在《压抑的宽容》结尾部分，你以修辞反问句的方式提到：“除了精英对人民的专政以外，难道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然后，你指出我们现在施行的是商业专政、垄断专政或诸如类此的专政。我猜想，你肯定认为它是一种暂时的专政，对吗？但是，难道你不担心，就像无产阶级专政，但国家并没有随之消亡那样，它有可能也不是暂时的吗？或者根据你昨天的说法，大意是说，目的必须早已在手段中表现了出来，否则目的就会被毁掉，就会丧失。这似乎是在说，如果你不得不经历精英专政，你最终得到的也只能是专政，不是吗？

**马尔库塞：**嗯，我是在反讽意义上来使用“精英”这个词的，而很大程度上它指的是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成为解放潜在的推动者的那些团体和个人。“精英”这个词对我来说绝不是一个骂人的词，而是相反。正如你刚刚所说，我们肯定受制于精英，比如，企业精英、政治精英，等等，因此唯一有可能的就是从一种精英专制变成另一种精英专制。

[384] **马里诺维奇：**正如你指出的那样，除非我们确实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民主。

**马尔库塞：**是的，但不会改变这样的事实，即它仍有可能受到精英的操

纵和管控。民主规则至今还无法钳制精英。

**马里诺维奇：**可是，尼克松被免职了。

**马尔库塞：**他被免职完全是因为他不再符合现有精英的条件了。他成了危险的寄生虫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马里诺维奇：**因此无论如何你都不认为他的免职是一种改变……

**马尔库塞：**制度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马里诺维奇：**但是，当你谈到一种精英专政时，如果结合你在《压抑的宽容》中的说法，那么你最终得到的必定是一种精英统治，而你也会失去绝对的宽容。因为他们甚至有更多的权力。

**马尔库塞：**他们几乎没有权力，因为他们只对底层民众负责，只对人民负责。

**马里诺维奇：**这可能是另一个你经常遭人诟病的观点，但事实上，你把人类的本性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本性想得太好了。

**马尔库塞：**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我不认为人类有本性。

**马里诺维奇：**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当你参与政治时，也就是说，当出现了政治激进主义时，你说在此之前你就意识到了一种新的意识早已出现，我想你是在《论解放》里说的。那么你是否觉得参与 20 世纪 60 年代激进运动的那些人是你所说的本性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改变、意识得到了提高并证明了自身资格的那种人？比如，有些学生领袖？有些激进的教员？

**马尔库塞：**有些确实是，但有些则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退回了现存的社会体制。还有些人中途就退出了。

**马里诺维奇：**你瞧，你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为了使这种转变得以开始，你需要一种新的意识，但你怎么在没有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得到新的意识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

**马尔库塞：**我反对这种鸡和蛋的问题。这不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你可以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发生转变。并不存在什么外部；这个构想很荒谬。

**马里诺维奇：**你刚刚说的是，人的本性可以在这个制度内部发生某些实

际的改变。

**马尔库塞：**至少有发生改变的条件。是的，当然可以。它必须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否则你想去哪儿？今天即使月球也从属于现有的制度。

[385] **马里诺维奇：**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的意思是，20世纪60年代，至少有一部分参与运动的人可以成为你所期待的潜在的精英领袖？

**马尔库塞：**是的。但我不想从人格方面来构想；这不可行。

**马里诺维奇：**那么你会怎么构想？

**马尔库塞：**确实有这样的人。你不必拘泥于细节。很多人已经开始对非异化的两性关系、种族关系等进行实验。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研究人格。

## 学生运动

**马里诺维奇：**我还有些与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有关的问题。

**马尔库塞：**关于我对学生运动的评价，你会在我给你的法语文章<sup>①</sup>中得到最好的回答。

**马里诺维奇：**我昨晚粗略地浏览了一遍。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你觉得它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马尔库塞：**当然。我认为在《反革命和造反》中已经提到过了。

**马里诺维奇：**大概是1971年，你与雷蒙·阿隆在《新政治家》上进行了一场辩论，你说价值的彻底转变就发生在你的眼前。你还提到了侵略性的、压抑性的价值及其克服。你仍然坚持这一强硬的立场吗？

**马尔库塞：**是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持该立场。我坚持认为一个更好的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将会和我们所有先前的以及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质的区别。

---

① 这篇文章是马尔库塞受邀为法国学生和工人起义十周年活动所写，曾在法国电视节目中被宣读。

**马里诺维奇：**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学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70 年代初期真的有了一种新的意识，你同意吗？

**马尔库塞：**是的，而且不仅是这些学生，妇女、少数民族以及部分知识分子都有了一种新的意识。

**马里诺维奇：**我觉得你说的不是政治意识的转变而是心理的转变——

**马尔库塞：**整个心理结构的转变。如果你想，你可以引用弗洛伊德的说法，即爱欲在与侵略性和破坏性的斗争中获得了提升。

**马里诺维奇：**你现在仍然觉得这是一场深刻而非肤浅的转变吗？

[386]

**马尔库塞：**是的。它发生在非常深的层次上，但它并没有充分现实化，没有成为一场政治运动。

**马里诺维奇：**如果你仍然这么觉得，那么你该如何解释学生运动最终失败了？最近的盖洛普民意测验（Gallup polls）显示学生现在变得更保守了。

**马尔库塞：**我认为这是一种暂时的倒退。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形势很有可能发生改变。

**马里诺维奇：**那你该如何解释它最终走向了终结？

**马尔库塞：**有很多原因。首先，越南战争结束了，征兵结束了。其次，资本主义制度变稳定了。

**马里诺维奇：**什么意思？

**马尔库塞：**经济上、政治上走向了保守，与此相伴而生的是压制得到了强化。

**马里诺维奇：**在你说到压制得到了强化时，你脑海中有没有想到特定的事件？比如，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sup>①</sup>？

①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是 1970 年 5 月 4 日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的一起著名事件，当天上千名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在举行抗议美军人侵柬埔寨的战争时，与在场的国民警卫队发生冲突。军人使用武力，向示威学生开枪，共造成 4 名学生死亡、9 人受伤。此次事件引起全美国超过 450 所校园罢课，5 天后有 10 万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游行抗议。——译者注

**马尔库塞：**在这个国家，只要我们还坚持着法制和民主的道路，就不会出现像“职业禁令”(Berufsverbot)<sup>①</sup>这样的事。不过，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会发现自己很难找到工作或者获得升迁。

**马里诺维奇：**你能否说说如果回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学生运动，你有什么希望？那时，你认为运动之所以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比如，你在德国的一场讲座上曾说过：“我认为，只有当高度发达的世界中心内部的爆炸性力量与第三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结合起来时，一种有效的革命性力量才是有可能的。”你是不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认定学生运动与第三世界或贫民区的居民以某种方式联合起来很可能会发动一场真正的革命？

**马尔库塞：**不是在这个国家。法国的形势完全不同。在这个国家，它本身并不是革命运动，不过，起着催化剂作用的团体率先以“新感性”这样的口号有力地表达了需要与价值的这一转变。

**马里诺维奇：**当你谈到新感性时，你是说当今天的学生在政治上变得更加保守或更少参与政治时，他们在某种心理意义上仍然比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的学生更进步吗？

**马尔库塞：**我再说一遍，它不是一个心理问题，而是需要和渴望发生了改变，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竞争性的需要和价值产生了怀疑，坚持感受性、感性的权利——在争取建立更好的社会的过程中，把它们从当前异化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是决定性的环节。这种转变仍然存在。它的政治表达很大部分被压制了，但它确实存在，并且不仅在学生中间存在。对此，我的那篇法语文章也有讲到。

[387]

**马里诺维奇：**你提到了工人。

**马尔库塞：**还有那些依赖性的资产阶级阶层。

**马里诺维奇：**那么无论如何，你关于法国所说的一切是否同样适用于美

① Berufsverbot，译为“职业禁令”，指某些职位禁止有犯罪、政治信仰等问题背景的人申请。——译者注

国呢？

**马尔库塞：**我关于法国所说的一切并非全都适用于美国。你不能说这里也爆发了一场革命运动；但可以说法国爆发了革命，意大利也爆发了革命。

**马里诺维奇：**因此即使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你也不认为美国学生运动是一场革命运动，但你却认为它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它是一次提高意识的经历。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马尔库塞：**不止如此，我认为，它所呈现的是有着质的不同的斗争和目标。

**马里诺维奇：**谈到现在，我的结论是，你没有因为所发生一切而感到失望。

**马尔库塞：**对我而言，失望或者不失望都太过个人化、太过私人化了。我失望与否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我不会用这个词。

**马里诺维奇：**你曾有更多的期待吗？

**马尔库塞：**我认为任何人在那个时候都会有更多的期待。

**马里诺维奇：**如今许多学生运动的批评者都说学生运动已经失败了，所以很明显，它是肤浅的，是年轻人的胡闹。

**马尔库塞：**并不是所有由于压制而失败的事情因此就从本质上被驳倒了。

**马里诺维奇：**你真的要把这种失败主要归咎于压制、越南战争的结束以及征兵的结束吗？

**马尔库塞：**是的。

## 论恐怖主义

**马里诺维奇：**《纽约时报》驻伦敦的负责人亨利·布兰登在巴德尔—迈因霍夫事件之后立即写了一篇文章，说“就他们的政治观点来看，是受你影响”，并且说你是“一位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家”。

[388]

**马尔库塞：**哦，我从来都不提倡无政府主义，也不提倡恐怖活动。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很清楚恐怖是一种非政治的武器，肯定不是一种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武器。我坚信在为社会主义奋斗的过程中，目的必须在手段中表现出来。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借助人道的、自由的社会的意象来为恐怖活动辩护。我已经在近期的《时代周报》<sup>①</sup>上对此发表了声明……我记得是在法兰克福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正值安吉拉·戴维斯被释放了出来，我发表了一个关于反对恐怖主义的声明。我想，应该是在1970年。

**马里诺维奇：**《压抑的宽容》的最后几句话是什么意思？

**马尔库塞：**那些话与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有关，我想说的是，即使这些黑人和他们的同情者使用了暴力，那也是为砸碎暴力的锁链，而不是延续暴力。这句话常常被拿来引用。首先，暴力与恐怖之间是有区别的。占领大楼，与警察冲突可能会引发暴力，但它却不是恐怖活动，除非人们不知道这些词的含义。恐怖活动只有得到了群众、人民或至少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才是一种政治武器。比如，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的恐怖活动。你不能拿它与巴德尔—迈因霍夫来比较，因为后者是完全孤立的，仅仅与少数失意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团体有关。

**马里诺维奇：**你的批评者认为，如果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真的要为彻底的痴愚化、非人化、对人的操纵负责，那么像阿尔多·莫罗那样的政治领袖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有罪，因为他们妨碍了近在眼前的乌托邦的实现。

**马尔库塞：**什么！负责任的不应该是领袖和政治家。压迫与制度本身密切相关。如今的资本主义如果缺少持续不断的管控，不操纵和压抑人类的需要和渴望，它就无法运转。当然，它能够满足大部分人口的物质需要甚至文化需要，但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异化劳动，全职工作。

<sup>①</sup> 《时代周报》(Die Zeit)，1946年在德国汉堡创刊，是一份覆盖全德国的德语报纸，以自由的政治立场著称。——译者注



**马里诺维奇：**有人认为你的整个理论观点会引导青年人犯这样的错误，比如，巴德尔—迈因霍夫，他们最初的一个行动就是对法兰克福的百货商店实施爆炸袭击。他们声明这是一次对消费主义的象征性的攻击。对此，你怎么看？

**马尔库塞：**那种声明并不重要；这和我所说的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巴德尔—迈因霍夫几乎与所有人完全隔离。那些想从理论上对恐怖主义进行辩护的人绝对心怀恶意，不仅如此，他们还抹杀了暴力与恐怖的区别。

**马里诺维奇：**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证来说明一下暴力与恐怖之间的这种区别，比如，在阿尔及利亚。

**马尔库塞：**在阿尔及利亚，你既可以看到暴力，也可以看到恐怖活动。相比较而言，暴力要普遍得多——如果学生或工人反抗武装力量，那是暴力而不是恐怖活动。

**马里诺维奇：**在阿尔及利亚，对百货商店实施炸弹袭击是恐怖活动，但它却是受群众支持的恐怖活动？

**马尔库塞：**没错。但是，你同样应该意识到你没按照我辩护或证明的方式来阐述……我想明确它们之间的区别，不过，我绝对不会说我建议对百货商店实施炸弹袭击。

[389]

**马里诺维奇：**但是，阿尔及利亚的形势完全不同。

**马尔库塞：**那里处于公开的战争状态。

**马里诺维奇：**因此，在那里对百货商店实施炸弹袭击与巴德尔—迈因霍夫对百货商店实施炸弹袭击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意义。

**马尔库塞：**我想你可以这么说。

**马里诺维奇：**但你却不想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即你认为阿尔及利亚炸弹袭击事件在道德上说得过去。

**马尔库塞：**是的，我不想公开表明我的观点。绝对不想。因为大多数牺牲者都是无辜的。

**马里诺维奇：**在希特勒或弗朗哥统治下，或诸如此类的形势下，恐怖主

义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吗？

**马尔库塞：**……就个人而言，我会说是的……你可以这么说。存在着凌驾于现有道德之上的道德理由和政治理由，比如说，参加非法的抵抗运动。从现有政权的角度来看，违背屠杀犹太人的命令是非法的，从现有道德的角度来看，整个的非暴力反抗也是非法的。

**马里诺维奇：**但从你说的话和你在《时代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可以得知，你认为当代所有的恐怖主义行动，无论是巴勒斯坦人的还是爱尔兰人的或是荷兰的马鲁古人的，都适得其反。

**马尔库塞：**是的。

## 其他

**马里诺维奇：**你是否认为第三世界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殖民主义或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

**马尔库塞：**不完全是，但在相当大程度上确实是。比如说，我不会以任何方式将今天乌干达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殖民主义。那是荒谬的。

**马里诺维奇：**据我的一位政治科学家朋友估计，第三世界的麻烦有 25% 是殖民主义导致的，而其他 75% 的问题无论如何都会出现。

**马尔库塞：**我想我同意这个观点。我不知道是 25% 还是 35%，但我基本同意。

**马里诺维奇：**你曾谈起过贫民窟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的“新意识”。现在经常听到有人说贫民窟人民或第三世界人民所希望的只是分得更大的蛋糕。他们并非真的有了新意识。

[390] **马尔库塞：**嗯，就我所知，在这个国家很少有黑人组织是革命性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目标不是废除整个制度。我宁愿以这种方式来解释，而不是用“分得更大的蛋糕”来解释。我指的是这个国家，而不是第三世界。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

**马里诺维奇：**你是不是觉得那里关于新意识的证据更多一些？

**马尔库塞：**是的，而且还有革命目标。

**马里诺维奇：**我绝对支持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来防御以及它的完整性，但是我肯定不同意它当前的政策，因为在我看来这是自掘坟墓。我认为对以色列来说最正当的事就是去创造使大屠杀不再重演的条件。但我最怕的就是当前的政策可能会导致悲剧的重演，尽管不再是集中营那么大的规模了。

**马尔库塞：**你看过《大屠杀》这部电视剧吗？它拍得很棒。我想说的是，作为大众媒体长期的、毫不妥协的批判者，我认为这部电视剧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表明大众媒体也有可能成为一种有望实现反向教育、启蒙的有效手段。它们甚至涉及法本公司（I.G. Farben business），一家索性要求把集中营中的犹太人变成廉价劳动力的德国企业。它们甚至还提到，英国对此无所作为，因为他们有可能暗地里赞成纳粹的所作所为。真了不起！

艾丽卡·谢尔奥弗加入了讨论<sup>①</sup>

**马里诺维奇：**你是否曾经对 20 世纪 60 年代公社的发展特别感兴趣？

**马尔库塞：**是的，我曾经是一个非异化生活的实验者。公社、集体、合作社，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了创造一个非异化的孤岛而做的实验……可笑的是，你会发现，似乎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非异化的生活比异化的生活要复杂、困难得多。

**谢尔奥弗：**你剽窃了你妻子的观点！

**马尔库塞：**是的。这是她说的，但是我完全同意——与丰富多彩的异化生活相比，那简直是太费神费力了。

<sup>①</sup> 马尔库塞在去世的前几年与艾丽卡·谢尔奥弗结婚。她是马尔库塞在布兰迪斯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学生。1973 年，马尔库塞的第二任妻子英格·马尔库塞死于癌症。

[391] **马里诺维奇：**那为什么不停留于异化的状态？

**马尔库塞：**因为归根结底这不仅仅是一个人、两个人或 12 个人的问题；它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为了使非异化的实验真的有意义并且持续下去，你就不得不在一个大的环境下去创造更好的社会。

**谢尔奥弗：**在当今形势下，所谓非异化的存在充斥着对自我的关切；有人隐居乡村，跟着劳动者进行实验，但是，除了发现自我，然后就是更复杂、更无休止地发现自我之外，他无所事事。

**马尔库塞：**她刚才的阐释方式非常好。这就是逃避现实。

**谢尔奥弗：**在我看来，左派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所面临的困难，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也出现过，这正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缺乏主体性的发展理论……它没有解决如何转变人民的意识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真正地转变我们的意识呢？我认为，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缺点所在，也就是说，对这个问题，他们总是漫不经心。我去过许多集会，学生们都会问马尔库塞，“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办？”而马尔库塞却总是回答说，“你们知道怎么做。”

**马尔库塞：**那不是我离开的方式，我不会就这样简单地说一句：“你们知道怎么做。”

**谢尔奥弗：**你经常说：“你们知道怎么做；做好政治教育。”但政治教育是什么却总是模糊不清。它绝不仅仅就是阅读《资本论》。近来，我所说的意识提升团体（consciousness-raising groups）以及诸如此类的团体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要说的是这样一种实践，它对人们该如何真正地摆脱无意识的种族主义、无意识的性别歧视、无意识的阶级主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感兴趣……这正是我的学位论文和我的作品的主题——这就是我在做的。我给出了激进的建议。

**马里诺维奇：**在我看来，参与 20 世纪 60 年代左派运动的许多人的意识都非常守旧。

**马尔库塞：**完全正确。

**马里诺维奇：**你感觉谢尔奥弗的研究怎么样？你喜欢吗？

**马尔库塞：**喜欢。

**谢尔奥弗：**但是……你却有这样的想法，比如，女性可以独立做事。如果她不喜欢某事，为什么她还要继续做某事，而这种想法实际上就是个人主义。女性在一起并不是说她们需要支持，而是说她们要共同做事……

**马尔库塞：**我从不反对这一点，也从未批判过这一点。我批判的是过度占用自己的灵魂或他人的灵魂。

## 无产阶级的物化<sup>①</sup>

我想首先重新阐释一下这个物化了的“无产阶级”概念：无产阶级正是因为它自身的存在而成了潜在的革命力量——这种品质通过它的生存方式被确定了下来。它的存在是给定的，同样，它在社会变革中（潜在的）功能也是给定的——它的存在的现实化。现在我想为这种物化辩护，至少它有这么个好处，即它阻止了不顾一切地去寻找已经失去了的革命主体：这种失去根源于现在普遍盛行的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体化。工人阶级仍然是资本的“本体论上的”敌手，是潜在的革命主体；但是，它是极度扩大了工人阶级，不再直接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相对应。

晚期资本主义重新定义了工人阶级，现如今，在发达国家，产业劳动者已不再是这个阶级的主要部分了。工人阶级的“去无产阶级化”（deproletarianization）不仅表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上，还表现在消费水平的提高上。

---

<sup>①</sup> 《无产阶级的物化》是马尔库塞 1978 年 3 月 23 号于旧金山市召开的美国哲学协会会议上发表的演讲。道格拉斯·凯尔纳参加了会议，在第二天马尔库塞于旧金山酒店楼顶沐浴并接受其第三任妻子艾丽卡·谢尔奥弗的按摩时，他对马尔库塞进行了访谈。参见“*The Reification of the Proletariat*”，in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 3,1 (Winnipeg ; Winter 1979), pp.20-23。马尔库塞在文中批判了那种僵化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对于新左派来说，它是一种理论和实践上的障碍。——编者注

该趋势根植于生产过程自身的发展，它使广大的非无产阶级工人阶层并入了工人阶级，其中包括白领雇员、技师、工程师以及确保剩余价值得以创造和实现的日渐壮大的私人和公共部门的科层人员。所有这些人不得不出卖其劳动力并且从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中分离出来。在这个极度扩大了工人阶级队伍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距被缩小了，知识和教育被普及化了；但是，制度一旦通过非生产性劳动的生产力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那么这些成就也就丧失了效力，它不再增加社会财富，而是通过生产垃圾货、计划报废、自我驱使的武器工业以及控制意识和潜意识等方式摧毁和滥用社会财富。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与日俱增的劳动机械化和智能化，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一般能力、技能和知识，但人的潜能不能在这个既定的生产机器中发展，因为它与全日制的非人的劳动相冲突。这种潜能的大部分被用到了非必要的

[393]

工作中，非必要指的是建设和维护一个更好的社会并不需要，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却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依赖性人群（现在大约占总人口的 90%？）中出现了“反对意识”，他们意识到既定的劳动的社会分工和组织早已明显过时了。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这位激进的民主德国异见者【他在联邦德国出版了著作《抉择》（*The Alternative*）之后马上就被羁押了起来】命名该意识（一直以来含混不清）时用到了“剩余意识”。他将之定义为“自由的心理能量不断增加，它已经从必要劳动和层级化的知识中脱离了出来”<sup>①</sup>。

“剩余意识”描述的并不是一个思想实体，所以它没有重新落入唯心主义的窠臼。毋宁说，这个奇怪的定义指出了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冲击下男男女女的实际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能量的特质。它是“剩余的”能量，是除了既定的生产关系中所必需的异化活动每天都要消耗的能量之外的能量。由于找不到令人满意的、有效的实现方式，它在依赖性人群中变成

<sup>①</sup> *New Left Review*, no. 106, November-December 1977.

了沮丧意识、屈辱意识和浪费意识。同时，资本主义大生产通过展示它能够提供大量的商品，而不只是生活必需品，甚至不只是便利设施，给这种意识带来了持续的刺激。因为扩大竞争性积累的要求，整个制度不得不持续不断地创造、更新对“奢侈品”的需求，不过，这些奢侈品对那些缺乏必要购买力的人来说可望而不可即。晚期资本主义唤起了对更早期、更少压抑、更野蛮的生活的想象，同时却使抵制这种满足的异化劳动永久地保留了下来。简言之，晚期资本主义每天都在阐释这样一个事实，即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的必要资金是有的，但是这个为自由创造出了资源的社会一定会阻止将它们用于提高生活水平（如今看来，它甚至会阻止将其用于保护生命）。

按照这种形式，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进入了底层民众的意识。毫无疑问，他们的表现与他们的本质不一致；剩余意识不去构想晚期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但是，剩余意识却试图成为一种物质力量，虽然它不像阶级意识那样根本，但却作为一种对立意识，它会在新的（或者重新占有的）行为模式中表达自身。不过，这种行为模式并不来源于任何特定的阶级，而是来源于依赖性人群中的团体所形成的不稳固的、短暂的“联盟”。这些行为包括“市民请愿”（例如，有组织地抗议核能设施、抗议资本主义城市翻新），反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斗争，学生抗议等。同时，工人的倡议超越了纯粹经济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而要求对工作进行自我组织（工人自治）。

[394] 在公司资本主义的集权统治下，它的生产性和破坏性，这个对立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人民所支持的激进主义已经失去了空间，运动的范围以及很容易得到满足的需求表现出了意识形态的、改良主义的特征。这是不是向先前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阶段倒退呢？

在这种情况下，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革命的“时间表”有了新的意义。根据这种时间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先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前者为意识形态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以及组织上的社会主义变革（主张并扩大公民权利和自由、削减垄断资本、使平等和公共服务制度化并扩大它们的范围、解放被压迫的种族和少数民族）创造前提条件。现在，大部分



资产阶级都屈服于公司资本主义的霸权，而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增长的极权主义特征则威胁着要取缔 18 世纪、19 世纪的革命成果：它们必须被重新占有并激进化。大部分资产阶级所支持的经济力量的丧失，对新老工人阶级的剥削，这些都有利于变革所需的群众基础的形成。因此，从欧洲共产主义的策略来看，“历史的妥协”、与资产阶级力量联合、拒绝“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都根源于晚期资本主义结构。“欧洲共产主义”既不想通过投票来取代革命，也没有表现出革命本身的特征。它更喜欢宣称自己是与整个（可能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为了使它的世界更安全，以便扩大它的积累，它把整个经济、技术和军事力量都动员了起来——相一致的理论 and 实践。这意味着，就资本而言，它想把阶级斗争控制在经济范围内，它想通过将工人阶级分化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权群体以及国内外的底层民众来获得并维持与工人阶级的合作。在全球体系中，跨国公司避免了竞争性冲突的爆发。

这种全局的资本主义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屈服于垄断资本，这并未导致他们的“无产阶级化”。资本主义的物质成就，它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再加上明显缺乏一种更好的替代品，这两方面使资本主义体系得到了巩固。然而，全球框架蕴含着巨大的反资本主义力量。如果我们把“革命”理解为推翻既定社会制度的群众斗争，那么可以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力量并未导致革命运动。

欧洲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清楚地阐明并赢得这种“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反资本主义（但仍然不是社会主义）的力量的支持。变革是有前途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剩余意识”已经否定了物化，而正是物化把真正的支配机制掩盖在了自由、客观的交换关系的面纱之下。对于谁在实施管控、为了谁的利益、他们的权力基础是什么，这些问题难道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吗？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逐渐消失（不可剥夺的人权？自由竞争的“看不见的手”？私人企业？平等？）——制度的现实已经无法继续隐藏它极度的毁灭性（核能源的扩散、生活环境的污染、长期失业和通胀、人口的严密控制，

[395]

等等)。

因此，我的结论是，趋势是走向保守。但是，它却遭到了更多的反对，不过这种反对力量却由于内部的分工，由于缺乏适应公司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组织，因而在质上被削弱了。同时，资本主义力量之间发生了全球性冲突，并且第三世界试图动摇制度的稳定性，但未能造成有力的威胁。对于左派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是：能否阻止公司国家向新法西斯国家的转变？问题及其可能的答案并不来源于对马克思理论的修正，而是就来源于马克思的理论！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哲学系

## 初期社会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 基于巴罗分析之上的一种理论综合<sup>①</sup>

### 一、巴罗对于晚期资本主义分析的意义

如下内容关注的是巴罗著作中那些具有普遍意义、超出了他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分析的问题。这意味着他所阐释的概念，在他的框架（即“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框架）中无法进一步发展，但却能证明本身与晚期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趋势，而它们与巴罗在初期社会主义（protosocialism）中注意到的趋势相一致。他的著作不

[396]

---

① 《初期社会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基于巴罗分析之上的一种理论综合》，初版为德语，参见“Protosozialismus und Spatkapitalismus. Versuch einer Revolutionstheoretischen Synthese von Bahros Ansatz”，*Kritik*, 19 (Berlin: 1979), pp.5-27，英译版收录于 *Rudolf Bahro: Critical Responses*, ed. Ulf Wolter, White Plains, NY: M. E. Sharpe, 1980, pp.24-48。这篇关于巴罗的文章是马尔库塞在去世前准备出版的最后一篇文章，它表明马尔库塞正在寻找超越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力量、寻找新的革命主体概念——他在民主德国持异见者鲁道夫·巴罗那里发现了这一概念，巴罗因其对“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的尖锐批评被关押、流放，此外巴罗还提出了更民主、更解放的社会主义模式，而马尔库塞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关注巴罗的这一设想。巴罗和马尔库塞的讨论细节以及马尔库塞反思巴罗的来龙去脉已经出版，参见 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4。

仅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做了批判，同时也对迈向全面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做了马克思主义式的分析。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来说，这是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成果。

### 巴罗的方法转变

如果有人说巴罗的很多批评**加以必要的修正**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同时，他的替代方案**加以必要的修正**对两种社会制度也都有效，这并不意味着巴罗所勾勒的是某种趋同理论。毋宁说，他已经阐明了进步与毁灭、生产与压抑、满足与缺乏之间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两种（极其不同的）社会结构中都有其根源。它在两种社会（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低估了它们潜在的稳定性）中普遍存在，只是形式不同，而它只能在尚未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中被打破。

“尚未”实际存在，因此，具体的乌托邦（及其在现存社会遭受的荒谬的否定）变成了经验分析的指导线索。这种经验分析自身表明，对乌托邦的**扬弃**是一种早已存在的现实可能性，事实上，也是一种必然性。他富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该可能性，而这源自方法上的革命：社会主义本身表现为一种现实可能性，而且只当最极端、完整、“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观念贯穿分析始终时，乌托邦的基础才会在现存的社会中被揭示出来。因为废除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尽管这仍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并不是两种制度之间的本质区别；更确切地说，它只是一种使用物质和精神生产力的方式。

……我们一直以来认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视角都亟待修正，它绝不仅仅与时间有关。一方面是废除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另一方面是普遍的人类解放，两者在整个时代一直彼此分离。<sup>①</sup>

最后巴罗抛弃了这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分（它早已成为一种压抑

<sup>①</sup> Rudolf Bahro,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p. 21.

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共产主义，反之亦然。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目标，是“完全的人”。自由王国侵占必然王国——必须（并且也能够）在此时此刻成为共产主义政策与策略的指导方针。 [397]

事实上，这种方法上的革命使马克思主义从意识形态回到了理论，也回到了实践。巴罗在分析民主德国阶级关系的过程中，他挽救了具体，把它从意识形态中解放了出来。不使用任何行话，不对马克思主义概念（或者更恰当地说是措辞）做纯粹反思，这表明他的分析扎根于社会现实。巴罗没有顽固地拘泥于那些过时的命题，为了解释民主德国的（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变化的结构，他的分析发展了马克思的概念。一个决定性的结果是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真正的进步：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重新得到了定义，社会动力的焦点从客观的政治经济转移到了**主体**上，转移到了作为激进变革的潜在的物质力量的意识上。

它 [指人类——马尔库塞注] 必须继续前进，就像“内心旅行”一样。只有在人类与其环境达到了某种平衡的基础上，同时它的发展趋势毅然决然地转向质的、主体的方面，跃入自由王国才是可想象的。<sup>①</sup>

在该转向中，巴罗看到了社会主义“本质上面向总体性、面向活动回归本身的审美动机”。<sup>②</sup>

这意味着要恢复历史唯物主义原有的唯心主义要素：从经济中解放出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目标。历史唯物主义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它是基础本身的发展动力，是日益增长的劳动生产力的组织，它使自我解放的主体性的活动成了变革的焦点。

随着巴罗的分析的不断深入，主体性转向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晚

① Rudolf Bahro,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p. 266.

② Ibid., p. 288.

[398]

期资本主义社会。较之于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由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更多地取决于这种植根于同时超越了物质生产过程的意识形态的传播。巴罗称之为“剩余意识”。它是“自由之人【心理上】的能力，是不再用以满足生存斗争的能力”，而它会转化成实践。工业的、科技的生产方式——在此，脑力劳动变成了本质因素——提高了生产者（“集体工人”）的素质、技能、想象力以及行动与享乐的能力，它们在资本主义和压制性的非资本主义社会遭到了扼杀或滥用。但正是它们推动着人们超越非人的现实，走向真正的人的现实。

在主体的剩余意识中，补偿的兴趣和解放的兴趣被迫达成了统一。补偿的兴趣主要关心的是物质商品层面：更大更好的消费、事业、竞争、利润、“身份象征”，等等。它们可以（至少目前来说如此！）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中得到满足：它们可以补偿非人化。因此，它们与解放的兴趣相抵触。但是，巴罗坚持认为补偿的兴趣不能被简单地削减并改道流向解放的兴趣；它们对幸福和满足有需求，而该需求深深地植根于人的心灵。通过它们，所存在的事物获得了它们的合法性。革命要成功就不能躲在人民的背后；但是补偿的兴趣以及它们的满足压制了解放兴趣的实现。革命意味着跟这种力量决裂，而这种决裂反过来说又只能是革命的结果！

因此，这是一个怪圈，它在巴罗的著作中经常出现，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表述。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理论的核心历史问题。在当前和未来之间，在“不自由”和解放之间，不只有革命，还有需求的彻底变革，与“底层”（subaltern）意识决裂，主体的大灾难。一方面是压倒性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另一方面是灾难性地、毁灭性地使用这种生产力，两者之间的矛盾并没有使资本主义以一种历史规律的必然性的形式走向毁灭；即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引导下也没有走向毁灭。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会必然走向社会主义；它们并不必然打破支配的枷锁，并不必然打破劳动对人类的征服。巴罗认为，马克思有一种倾向，它暗含着这样一种连续性，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会不断提高，生产会越来越高效、越

来越平等。

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阶段，服从劳动不是因为什么别的理由，而是因为统治阶级，因为它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镇压因为经济和军事上落后以及与资本主义的技术竞争而得到了辩护。但是新的支配形式一旦建立了起来，必然性就会转化成美德：“第一阶段”就会被无限期地延长。社会主义社会的质的区别消失了，而消失的速度越快，这种社会主义就会越来越多地采取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模式。补偿的兴趣就会与解放的兴趣斗争起来。两种社会都存在着这样的怪圈。怎么打破它呢？

#### 时间经济、剩余意识和知识分子的角色

[399]

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回到了巴罗作为变革力量的“剩余意识”概念。这种意识在科学技术的生产方式中、在其“理智化的”过程中有其物质基础。在此阶段，它在“理智化了的集体工人阶层中”<sup>①</sup>得到了“具体体现”（但没有得到反思）。此外，剩余意识以一种受阻塞的、不活跃的形式普遍存在于依赖性人群的各个阶层。有人隐约意识到了我们已经不再需要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另一种生存方式。这种隐约的意识在对反对力量有**催化剂作用的**团体（这是我的说法——马尔库塞注）中，即在学生运动、妇女解放、市民倡议、忧思的科学家中成了必然趋势。

无论在何处，只要绝大部分工人阶级被整合进了现存制度，那么阶级关系就会总是倾向于一种**精英主义**的结构，而其中知识分子作为集体工人的一部分总是扮演领导的角色。巴罗为他大胆的理论做了辩护，他认为理智化了的阶层在准备和转变时期“定下了基调”，他们在社会重建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sup>②</sup>

知识分子发挥领导作用，主要有两个原因：

(1) 不同于以往，知识成了一种力量。科学的和技术的、经济的和心理

① Rudolf Bahro,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p. 329.

② Rudolf Bahro,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pp.329, 400.

的机制实现了发达工业社会的再生产，而有关这些机制的信息为信息持有者提供了知识，从而使他们拥有了变革的客观可能性。当然，只有知识不足以实现这种潜在的可能性。但是知识分子并不是孤军奋战。生产过程自身变得“理智化”了，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理智化了的阶层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民主德国，他们是那些控制生产资料的机构的组成部分；而且（据巴罗说）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反对政治官僚的独裁。

(2)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实现他们的补偿兴趣已经不再是其日常关切的一个问题。他们与那些党的官员、上层既得利益者共同享有物质和精神文化。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情况很少，并且仅仅集中在多多少少有些顺从的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不过，这种不怎么有特权的阶层的大多数人至少有教育的特权，而这能够打开原本被封闭了的、超越了现存制度的知识领域。

[400] 创造时间和空间对于那些超出了物质层面的解放的兴趣的发展而言是必要的，今天它决定了一切，因此，它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任务，也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劳动分工。即使在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基本上也是一个**时间经济**问题。重新分配和组织劳动的目的是按照“完全的人”的兴趣完全改变必要劳动和解放性劳动所花费的时间的比例。由于这种时间的再分配涉及整个社会，因而它同样需要彻底地重组**必要**劳动（对于这种重组，巴罗给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新的时间经济将促使自由王国在必然王国中出现。由于它将在社会所有阶层得以实行，所以，通过对它的普遍推广，它将摧毁知识分子的特权地位。

#### 支配、国家和反国家

巴罗拒绝任何声称可以免除共产党、官僚机构和国家的过渡时期的构想，例如无政府主义、冒进的左派激进主义者。他甚至认为，国家是“社会的技术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监工”<sup>①</sup>——现代化意味着创建解放性的制度。作为一个“监工”，这样的国家将表现为一个真正普遍的教育体系，它不仅

<sup>①</sup> Rudolf Bahro,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p. 129.



包含物质文化也包含精神文化，它还要把需求从其受阶级制约的心理基础中解放出来当成自身的目标。大众缺乏主动性、工人阶级被吸收进了补偿性需求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因此，“国家消亡”这一观念的经验历史根据丧失了。社会主义必须创造其自身的反国家和自身的政府体制。“人民和官员——这是任何初期社会主义社会都不可避免的二元对立。”<sup>①</sup> 仅仅初期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吗？这又回到了两阶段理论。

巴罗的构想似乎意味着即使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普遍性仍然要被制度化：作为国家的**反国家**。就国家有助于进一步实现解放性的需求、更广泛地发挥自发性和个人自律而言，国家就是**反国家**；它是一个**国家**，因为它（在决定优先事项、分配工作、教育的过程中）是按照整个社会的利益来组织这个过程的，而它在这么做时所使用的权力是受约束的、是人民授权的。在**反国家**中，自律与对需求的依赖之间的辩证法不断地重演：社会主义国家会按照个体需求在现行需求体系中的表现形式“记下”它们，并按照新的解放形式“超越”它们，随后具有解放形式的需求会变成个体自身的需求。

[401]

巴罗意识到，即使是在有着与现有的社会主义统治机器相反形象的完整的社会主义，合理的等级制度仍然必不可少。他设想了一种民主地建构起来并且受民主管控的自下而上的等级制度。这个等级制度的最高层是一种二头政治 [Doppelherrschaft]：共产党和一个“共产主义者联盟”。后者独立于共产党，从社会各阶层拥有最先进意识的知识分子中招募成员。这个联盟是整个社会的大脑，是民主的中坚力量，在计划、教育、工作的再分配等相关讨论中能够发出决定性的声音。

大众的惰性和无力感，他们的依赖性，已经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人民”的两分法中，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官员—人民”的两分法中得到了体现，这带来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即顶层变成了自治。巴罗审视了这种趋势，而它在初期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化成了完全成熟的支配。他

<sup>①</sup> Rudolf Bahro,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p. 241.

认为，这种趋势有可能被逐步建立起来的**协商组织**（自我管理、合作社）所抵消，而它们的雏形已经在现有的制度中出现。他令人信服地指出，传统的“社会民主”概念过于专注于物质生产层面，因此它仍旧代表着特殊利益。在初期社会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马尔库塞注）的环境下，随着工人阶级——其中，知识分子是生产过程的决定性因素——的扩大，拓宽协商民主将成为可能。人数相对较少的科学家、技术员、工程师甚至媒体代理人，如果被组织了起来，他们是能够破坏制度的再生产过程，甚至有可能使其停滞的。但是“这不符合事实”。正是他们与生产过程的一体化——姑且不说他们丰厚的收入——阻碍了该团体的激进化。但是，这些团体的社会地位可以使他们在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

处在准备和过渡时期的革命需要一个能够**站出来反对**大众补偿兴趣的领导。同时，它还必须勇敢地面对必要的压抑、压抑的“底层意识”、未经反思的自发性以及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

[402] 很明显，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巴罗的分析回到了一种被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所禁止的立场：柏拉图的立场（最有智慧的人对教育实施独裁统治）与卢梭的立场（人民必须被迫走向自由）。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功能如果没有公认的权威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对于巴罗而言，这种权威应该源自有智慧的精英。但是，巴罗可能会始终如一地坚持认为，联盟以及党的领导必须来自所有的社会团体，必须对所有阶层的人民负责，流言蜚语应该继续存在并且必须被保留下来。

### 革命主体的问题

正是在这方面，巴罗对社会主义的阐释最容易遭到诽谤和嘲笑，也正是在这方面，他完全激进的方法、他对马克思理论的忠诚表露无遗。工人阶级的整合使**革命主体**的问题被提上了议程，不过，在这里，这一问题在实际的历史发展水平上找到了答案。拜物教认为，由于工人阶级的“本体论地位”，他们已经被经济、政治发展的铁律预先确定为革命的主体——即逻辑与历史之间被规定的统一，据此，“从逻辑上讲终结的事物也一定会在历史上被

立刻终结”<sup>①</sup>。不过，这种拜物教不是被权威的意见而是被历史自身的过程彻底地废除了。“事实已足够显明，无产阶级不能成为统治阶级。”<sup>②</sup>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太狭隘了，无法改变社会（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甚至经常扮演保守的角色，难道不是吗？）”。<sup>③</sup>这种面向解放兴趣的激进转向超出了底层意识；它作为“内在解放”过程的一部分、作为外在解放的一个条件而发生。考虑到这个阶级的社会条件（异化的“全日制”劳动、无法享受教育特权、失业），只有少数人能实现这种决裂。

任何特定的阶级都无法成为这一在当前历史阶段已拥有可能性的普遍解放的主体。无产阶级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同一性已经不复存在——假设它事实上曾经存在过。普遍解放现如今已不再是一个与“保障生存的物质基础”有关的问题，尽管它仍然是解放的“不可更改的先决条件”。毋宁说，问题变成了：哪一种生存方式？它关乎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关乎作为创造性活动的非异化劳动，关乎创造摆脱了生存斗争的人类关系。它关乎撕碎侵略和破坏之间的欺人的一致性。

[403]

[它关乎] 潜在地广泛占有在其他个体、对象、行为模式和关系中客观化了的人类的本质力量，将其转变成主体性，转变成理性的、道德的个体的财富，进而使它激发出更富有成效的转变。<sup>④</sup>

这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全面的个体”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巴罗的革命性的方法把终极目标变成了起点。由于他一贯地把革命视为一种“文化革命”，他从一开始就从主体性、它对幸福的需求以及幸福的可能性等方面赋

① Rudolf Bahro,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p. 44.

② Ibid., p. 196.

③ Ibid., p. 258。这段话还可以译为：“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利益越来越频繁地扮演着基本上可以说是保守的角色，难道不是吗？”——艾丽卡·谢尔奥弗·马尔库塞

④ Rudolf Bahro,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p. 272.

予了这个概念完全不同于毛主义的含义。即使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措施也应该把人类从“经济的巨大动力”中解放出来。以此为方向的基本措施是全民参与简单劳动：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中心理上的非生产性劳动时间；只根据年龄、性别和天赋的区分来确定需求。<sup>①</sup> 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的自由的唯心主义再一次得到了表达：

问题是去推进意识的“生产过剩”，以便将整个历史的过往放“在它的头上”，并且把观念变成决定性的物质力量，以引导事态发展至一种激进的转变，一种比传统的转变——在同一文明环境中从一个形态转变为另一个形态——更深入的转变。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事实上也已经开始了的，正是一种真实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大众生活的整个主观形式的转变……<sup>②</sup>

巴罗毫不含糊地拒绝了这样一种过分简化的观点，即一个国家不得不卷入与经济、军事上更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多多少少有些敌意的竞争，所以，它无法担负起建设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据说这就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面前的状况。巴罗以一个从总体上讲压抑但却富有启发性的假说做了回答：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即建设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对西方国家施加“转变的压力”。<sup>③</sup>

[404] 巴罗的分析暗含着一个挑衅性的论点，即革命前后的社会主义策略在本质上相同。文化革命是一种总体的转变，但是，即使是在革命前，它的集体主体就已经在其意识和行为中朝着最终目标行进了。这在所有阶层那些**具有**

① Rudolf Bahro,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p. 415.

② Ibid., p. 257. 这段话第一句还可以译为：“这是一种迫使意识‘生产过剩’的问题，以便让历史过程站‘在它的头上’，并把观念变成决定性的物质力量。事态正在同一文明环境中激进地从一种制度转变为另一种制度。”——艾丽卡·谢尔奥弗·马尔库塞

③ Ibid., p. 431.

催化剂作用的团体的实践中早已表现出来，尽管它们在形式上或多或少地独立于整个社会，因此是可疑的、不可靠的。这些团体的运作从本质上讲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去魅和启蒙。革命的焦点在这里又一次集中在了主体性上。“优先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与“增加他们积极追寻幸福的能力”<sup>①</sup>的目标已经决定了主体解放的基本阶段。“内心旅行”不是一种逃避政治和使政治私人化的手段，也不是混日子、放纵自我的手段，它的目的是使剩余意识与想象政治化：

就像“内心旅行”那样，个体存在的内在化，含有一种远离任何客观事物的情感元素，它的基本内容自然就是克服异化，并仍将继续克服异化，仍将继续克服由我们人类所创造的变了形的文明——黑格尔将之视为主观精神的主要工作。<sup>②</sup>

政治教育需要激进的“心理进步”，需要“尤其在政治和哲学的观念层面上直接激发大部分的年轻人”的“情感提升”。<sup>③</sup>

主体性的革命就是需求的革命，巴罗把它视为普遍解放的先决条件。这种需求的革命的主要发展方向显然是“避免去占有那些用于生活和享受而基本上以消费为特点的物质资料”，“走向对文化的占有”；换言之，“广泛消除物质刺激”。<sup>④</sup>必须打破一次又一次再生产出物质刺激的补偿兴趣的支配：不是通过削减消费的政策，而是通过“在那些决定生活标准的消费品的分配中实现真正的平等”。每每谈到人类贪得无厌的需求，巴罗都把它看成是“对

① Rudolf Bahro,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p. 406.

② Ibid., p. 267.

③ Ibid., p. 375。这段话还可以译为：“政治教育需要激进的‘心理推动’ [Aufschwung]，需要能够直接在政治—哲学的理想层面上激发大部分青年的‘情感提升’ [Erhebung]。”——艾丽卡·谢尔奥弗·马尔库塞

④ Ibid., pp.402ff.

现存状况的反映。”

[405] 要实现物质文化与内在于物质文化的精神文化的和解，需要废除收入分配的绩效原则以及绩效原则在非异化的创造性工作和非异化的享受的发展中的现实化。必要劳动时间与异化劳动负担的减少使这种逆转成为了可能；此外，通过“在必然王国自身内部为人格的自我实现和成长打开一个普遍自由的空间”<sup>①</sup>，并且通过把自然并入这个自由的空间，它还弥合了主体性和客观性之间的断裂。

巴罗嘲笑新左派（和老左派）因为将资产阶级甚至是小资产阶级的概念——比如，人格、心灵以及内在性——再次引入马克思主义而感到焦虑；实际上，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这些概念才能被真正地超越。有人指责他偏向唯心主义，而他对此不置一词。他使用这些术语，不是为了再次拯救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而是为了发展出政治经济范畴的超越性的内容。剥削、剩余价值、抽象劳动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获得了客观形式的非人的范畴；通过现已成为一种客观可能的社会主义，它们也变成了对非人的否定。实现这种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受到阻碍的社会主义是文化革命的目标。

文化革命不仅包括伦理维度，也包括审美维度。巴罗只是对人际关系的伦理做了一个启发性的暗示：爱欲、教育和婚姻要尽可能地走向“与他人和谐”<sup>②</sup>。审美动机有助于使“优先权从通过物质生产开发自然转向生产适应自然循环，从扩大再生产转向简单再生产，从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向关心劳动条件和文化”<sup>③</sup>。

生产也要“按照美的规律”（马克思）。它的前提条件是科学技术要适合人类和自然。

① Rudolf Bahro,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p. 406。这段话还可以译为：通过“在必然王国内部为人格的自我实现和成长打开一个普遍自由的空间”。——艾丽卡·谢尔奥弗·马尔库塞

② Ibid., p. 291.

③ Ibid., p. 407.

现在是提出关键问题的时候了：假如巴罗关于社会主义基础的理论已经在概念上和经验上得到了证明，那么又该如何设想现有秩序的转变呢？革命仍然是前提条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实的是，要想实现改革，革命是必要的。对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已经被废除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第一场革命应该是推翻政治官僚机构的独裁统治。巴罗认为，官僚机构中的反对力量分布极其广泛，以至于使这种推翻有了现实可能性。但是，对于人们早已认识到其客观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形势又怎样？两个问题及其回答都超出了巴罗的分析范围，但是它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线索。

[406]

###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模式的批判性总结

历史地讲，现如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明显过时了。其中，两个主要的原因：

(1) 在有些国家，统治阶级掌控着配备最先进武器的强大的军队和准军事组织，并且依靠他们的忠诚，革命群众的武装叛乱和夺权已经没有任何现实可能性。最发达的国家就是这种情况。

(2) 晚期资本主义有着惊人的生产力，它已经为整合依赖性人群中的分散利益创造了广泛的物质基础。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革命群众”的概念早已变得可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扩大了)工人阶级已经与制度“讲和”。经济上的合作与对抗政策很可能会变成政治的，但是仍然不能超越制度本身，走向社会主义。毋宁说，这是走向新的民粹主义；与阶级对抗不同，民众的对抗不可能发动武装起义，更谈不上夺权了。

## 二、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新的“革命”概念

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集体工人和人民

根据当前阶级关系的趋势，发展另一种革命模式有可能吗？

建构这样一种模式需要我们转变马克思传统的“阶级”概念，由此还需

要我们发展一种合乎晚期资本主义的概念。对于“工人阶级”概念来说，这一点尤为必要。简要地提一下这些为人所熟知的事实就够了：

[407] (1) 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非同一性。进入 20 世纪，“无产阶级”仍是用于工人阶级的正统的、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是马克思的这个概念包含着穷困、对权利的剥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否定，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已经不再是这个社会的一个阶级了。但这对于如今的工人阶级来说就不再适用了。

(2)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无产阶级构成了发达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如今，最接近无产阶级的就是工人范畴，即那些直接参与物质生产过程的人，但是，他们已不再是主要组成部分。<sup>①</sup>

(3) 将“工人阶级”概念限定为“生产性的”工人，即那些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是站不住脚的。剩余价值的创造和实现并不是两个相互分离的过程，而是资本积累同一个总体过程的两个阶段。

(4)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劳动过程自身的“理智化”以及该过程中所雇佣的脑力劳动者数量的不断增多，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了。白领工人、职员、甚至是那些收入通常低于蓝领工人的“非生产性的”人，都属于工人阶级，因为他们不享有对生产资料的决策权。但即使是分配和管理过程中有着更高收入的白领工人也属于工人阶级，因为他们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并把自身的劳动力卖给了资本或者它的机构。这种扩大了工人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

(5) 阶级意识？（扩大了）工人阶级本身分裂成了多个层次，他们有着极其不同甚至某些情况下对立的利益。这种趋势倾向于受到补偿兴趣——

<sup>①</sup> 1972 年，美国工薪一族 60% 的人就职于服务行业。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The Congressional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估计到 1980 年这一数字将变成 80%（引自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以及 Al Goodman, in *In These Times*, October 18–24, 1978）。



它们通过积极和消极地参与到制度中得到了满足——的支配。小资产阶级意识而不是激进意识开始盛行起来。

事实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不断增加实际掌权的规模较小的阶级与工业工人之间的中间阶层这个部分，扩大了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社会通过产生越来越多的非生产性工作并使其在整个人口中推广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资本与劳动的基本矛盾仍旧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存在，但在这段时期，它已经变成了总体：几乎整个依赖性人群都成了与资本对立的“劳动”。这也将拯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概念，即他所谓的由大多数人来完成的改造。

[408]

这种分裂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该社会通过“**集体工人**”实现了再生产但同时却受一小撮人的控制。集体工人成了**人民**，它由人口中的依赖性阶层构成。在这种统一体中，矛盾普遍存在。根本不存在与阶级意识相对应的人民意识 [Volksbewusstsein]。各式各样的补偿兴趣，从激进主义到保守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从意欲获得成功到渴望废止工作，已蔓延至整个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民主的整合允许在依赖性人口的统一体中出现这种分化。**普遍解放**的兴趣能够 [从中突然出现] 吗？

按照通常的消费水平，社会再生产很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引起了市场的过度饱和，从而使积累也变得越来越难。资本主义制度将变得更加压抑，并且它还会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自由的现实可能性之间越来越强烈的矛盾带入意识。

#### 阶级意识和反叛的主体性

**谁**的意识？不是某个特定阶级（晚期资本主义的工业无产阶级在“人民”这个包罗万象的总体中是一个特定的阶级）的意识，而是来自各个阶层的个体的意识。因为普遍解放就自身的目的 (telos) 而言就是要使个体作为个体**在团结中实现解放** [solidarische Befreiung]，所以这种解放的准备工作也植根于个体：来自各个阶层的个体，尽管各有不同，但他们却根据共同的利益构成了一个潜在的统一体。他们是那种往往集中在并且局限于缺乏组织的群

体和运动中的对抗性**实践**的潜在主体。在这些群体和运动中，存在着“**集体性的知识分子**”。

巴罗首先根据意识和本能结构的他者性定义了这种集体性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反抗征服，同时朝着禁欲的实践奋力前行。它虽然是一个不太具有学术性的定义，但它却没有嘲弄“书呆子”、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者，因为这些日益流行而又廉价的嘲弄总是致力于诽谤具体的乌托邦以及为了现有的秩序而牺牲革命的理念。

[409] 集体性知识分子散漫的、几乎毫无组织的反抗根本没有任何群众基础，而人们因此很容易就会指责其为精英主义和唯意志论。不过，这是一种大众的拜物教的表现，它与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革命运动——只有在革命过程中才能获得群众基础——的历史根本不一致。**反国家**的政治能够孕育出使大众的积极性成为社会主义解放的决定性力量的基础，因为它首先（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借由激进的劳动重组（废除它的等级制组织）与新的“时间经济”，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能够剥夺传统心理以及这种心理对其社会基础的肯定的手段。但是，如果自决原则还想继续成为主导原则，那么必须废除集权：把它重组为代表并服务于普遍利益的**计划性**机构。这种集权是社会主义专政的核心：在这里，必要的压抑和剩余的压抑被迫交织在了一起。

知识分子只有保留了自己的剩余意识——在其中现有的秩序被具体地超越了——时才能发挥自身预备的功能。知识分子在革命前的潜力及其与大众模棱两可、往往又矛盾的关系植根于社会结构。由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而造成的教育的特权使知识分子阶层从大众中孤立了出来。但是，这也给了知识分子一个自由思考、学习、理解所处的社会环境并且传播这种知识的机会，因此，在与制度化的教育体制（以及在它的领地上！）做斗争时必须赢得这种机会。分享这种教育特权在今天不仅是一个收入问题，还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全部时间都被剥夺了的群众根本无法支配时间。教育体制的民主化因此必须与缩减工作时间同时进行。如果民主化不要求普及教育和知识，那么往往就会摧毁思想超越性的内容，削弱剩余意识和解放的兴趣，并

且往往有助于现有秩序的再生产。确切地说，必须让那些被囚禁在社会中的人类意识到他们能够把未被损毁的知识和想象变成自己的，而这反过来又以革命为先决条件。

知识和知识的交流已经在那些共同决定调查和研究过程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内得到了发展。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是同一过程的两个阶段：在晚期资本主义，因为脑力劳动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减小了。因此，通过“普通教育”来扩大教育的特权已经成为必需。然而，伴随着民主化进程，知识的解放性力量出现了衰退。大量的科技成果带来的却是侵略和毁灭，或者为了依赖性人群的补偿兴趣及其满足而承担着小玩意、玩具和娱乐的作用，因此也强化了底层意识。

#### 本能的结构与革命

进步和压抑的统一在全球性的晚期资本主义结构中促进了对政治—经济矛盾的管理。“还要多久”这个问题无法理性地回答：理论不是预言。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自身的掘墓人，这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且很多事实都指向这个大概的方向）。但是，这些人不再是无产阶级了，而是集体工人、他们身上被抑制的意识——反叛的主体性。正如资本主义进程本身为它自己的毁灭创造了客观条件（结构性失业、市场饱和、通胀、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共产主义的竞争……），因此它也创造了**主观条件**。“剩余意识”仅仅是主体性的一个要素：它的解放的兴趣延伸到了与如今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必须发生的事情相关的知识上，但是补偿的兴趣的支配阻止了意识向实践的转化。革命的主观性不仅仅是一个意识问题，也是一个由知识所引导的行动问题；它也是一个感情问题、一个本能结构问题，它要求在这两个变革的层面上，一是实事求是地对事物进行彻底批判，二是积极地、具体地预期自由，也就是说，让目标在当下的生活中表现出来。

[410]

社会历史上“成熟”的主观条件不仅包括政治意识，还包括被固定在个体本能结构上的对革命攸关生死的需求；它（至少在 20 世纪）不仅包括求生与成功的意愿，还包括停止生存斗争、摆脱生产以及无止境的交换过程的

束缚的意愿；简而言之，渴望令人快乐的自由，渴望自决。

“说某个东西被固定在本能结构上”（假如说弗洛伊德的理论正确），这等于是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被“赋予了”爱欲驱力——渴望从由社会决定的剩余压抑中解放出来、渴望生命本能的满足与强化。（最主要的文明化了的压抑——比如，乱伦禁忌、如厕训练、特定形式的社交礼仪——已经不再是解放的障碍。）因此革命的基本要求，比如，废除异化劳动、均等的自决的机会、与自然达成和解、团结，在主体中有一个**爱欲根基**（正如法西斯主义在毁灭性的人格结构中有其根源一样）。社会以及作为社会历史进程的解放通过爱欲本身——与性和性解放明显不同，因为性解放只发生在阶级社会——采取行动。生命本能和爱欲的演变需要社会变革与革命，而革命需要有本能基础。

[411] 社会变革不仅是人性的变革，也是人的外在自然的变革。这种适合于资本主义的自然也许恰好证明了制度不能超越的**界限**。诚然，它非常有效地从属于资本的利益，但是仍然存在一种无法控制的残余，而这种残余却能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资本主义的自然限制在那些抗议运动中显露了出来，而在那些运动中，自然却变成了一种可以实现社会转变的潜在力量。自然成了这样一股力量，它以一种具体的、与它融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相对立的形象表现了出来，而这不仅仅意味着对自然有组织的保护威胁到了大企业的利润和军队的利益。在反抗核能和环境普遍污染的过程中，为自然而战同时也就是与现有社会做斗争，保护自然同时也是挑战资本。

但除此之外，生态运动也有其心理根源。自然被经验为幸福、满足与快慰的领域，它是爱欲的环境——这是应用于自然的绩效原则的反题。这个反题（支持不善于表达甚至被压抑的大多数）在女权运动中同样活跃。绩效原则是父权统治的历史发展形式。当然，社会主义社会也会有自身的绩效原则——否定了现有绩效原则。它能够准确地确定那种在资本主义统治下被低估或被遏制的社会生活维度：在展示和享受个体的创造性才能方面进行竞

争，同时创造先决条件，以使用资本主义的科技成就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是资本的私人利益。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对绩效原则的克服似乎都披着虚假的外衣，这在那些被定格为“女人的天性”（接受力强、敏感、情绪掌控能力强、亲近自然等）的对比和幻想中表现了出来。这些形象揭示了女权运动的生物心理学维度。在女性争取真正平等和同等权利、争取整个文化领域的普遍解放的斗争中潜藏着对已变为客体的自然的反叛。

反独裁运动、生态学运动以及女权运动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都是本能结构的外在表现（仍然很散漫、很分散），它们也是发生了改变的意识——正在撼动绩效原则和异化的生产力的支配——的基础<sup>①</sup>。因此，这种反抗把那些处在一个一直以来被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的向度中的革命力量动员了起来，而该向度能够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最后阶段使它停止：反叛的人与外部的自然。

在把自然重建为政治实践的一个要素的过程中，这些运动将自身与新左派的逃避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区别开来，新左派把自然提升到了一个绝对的位置，把它变成了非异化的本真存在的标准。逃避主义运动就是唤起（内在和外在外在的）自然来对抗理智，就是唤起直接性来对抗反思。他们加强了在解放过程中本应被废除的二分法。狂热地崇拜直接性是保守的，这是从作为社会发展动力（作为主客体）的自然撤离，回到作为纯粹主体的自然，它本身已经成了与社会中的虚假和恶相对立的真理和善。但在纯粹的直接性中，虚假与恶是无法被克服的，它们只是受到了压抑，或被转移到了其他方面。

[412]

《论抉择和逃避主义运动》批判了这种普遍存在于运动中的矛盾心理：

政治活动的标准早就不再是正确的理论分析，尤其不再是对经济的批判分析；它已经被不同个体的主观体验所取代。因此，人们更愿意以自身的方式体验那种自身应该采取行动的理。某一阶段，对正统的教

<sup>①</sup> 参见拙文“Marxism and Feminism,” in *Zeitmessungen*, Frankfurt, Suhrkamp, 1975。

条主义来说，这曾经是极其重要的政治和批判因素，但是，现如今已经在许多领域变成了对需求的成问题的崇拜。体验不仅得不到理论分析，并且拒绝任何令人不快的、哪怕一丁点的反思，已经沦落为一般水准的情绪刺激。因此它丧失了自身的不服管束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服从整合。因此在被绝对化之后，体验已经从一种自治的中介变成了整合与适应的中介。<sup>①</sup>

[413] 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支配与剥削即是 (eo ipso) 对人类的支配与剥削，这个命题如今可以得到更具体的阐述。资本主义过程就是在不断提高生产率和利润率的原则下改造自然。自然成了纯粹的客观现实，变成了一个由事物及事物间关系构成的领域，而它的**目的**就是为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提供服务（自然成了有组织的再创造）。这需要压制那个抵抗绩效原则的自然。因为内在自然和外在本能构建了一个（历史的）总体，而绩效原则**不利于**爱欲在生活世界中奋力向前发展，不利于从全能的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不断内化的压抑通过社会被强加到了人类身上。自然必须被摧毁，必须被破坏性的社会同化。那个仍然是整体的自然（尽管无法避免它本身毁灭的可能性），决不允许成为一种反文化的生活世界——在这里，个体可以感到幸福与满足，可以反对社会提供的福利。另外，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可用来自绩效原则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越是显著，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就越会推动自然走向毁灭，而破坏力就会变得越活跃。两种基本驱力就会更紧密地“融合”：爱欲本身似乎充满了攻击性，因为个体常常直接反对自己的身体（摇滚和朋克音乐、暴力运动、毒品……）。

反抗固定在了一种解放性的本能结构上，这有可能带来**质的**改变、总体的革命。但是，解放性的本能结构的发展只能被设想为社会过程，同时，也

<sup>①</sup> Wolfgang Kraushaar, in *Autonomie oder Ghetto?* (Neue Kritik Publishers, Frankfurt/M, 1978) pp.45f.

正是这个过程生产和再生产了使资本主义内在化的压抑性的本能结构。又是一个怪圈：解放性的本能结构怎么可能在压抑的社会——它的统治者（不像反对者）早就学会了动员心理的办法——出现，又怎么可能对抗这个社会呢？

只有个人的**体验** [Erlebnis]，即突破了底层意识的个体的体验，才能引领或迫使个体以不同的方式去看、去感受事物和人，去思考其他的思想。巴罗引用了高尔基的一段话：

任何不寻常的事物都会阻止人们按其希望的方式生活。人们从来都不渴望——假如他们有这样的渴望——根本地改变他们的社会习惯，而往往只是渴望更多相同的习惯。所有的哀叹抱怨的基本主题都是“不要阻止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列宁是一个与前人不同的人，他知道如何让人们脱离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sup>①</sup>

本能结构的发展自始至终与意识的发展密切相关：爱欲的破坏力在现有的社会框架中得到了实现。只有与解放的**意识**联合起来，本能结构才能成为解放性的，因为该意识决定了这种实现方式的可能性和界限，并且它还把纯粹的本能吸收了进来。

革命的社会过程开始于那些把解放当成自身攸关生死的需求的个体，而他也正是超越了自我 (Ego) 的个体。解放性的本能结构会使**团结**变成生命本能的力量。尽管它们“价值中立” (value free)，但是，原始的内驱力本身早已暗含了其他人。这不仅适用于爱欲，同样也适用于破坏力。它们含有普遍性，它们是个体的驱力，不过是作为“类存在”的个体的驱力。

[414]

基础性的经验 [Erfahrung] 根源于个体心理对拒绝的需要，因此它永远不会停留在个人主观体验 [Erlebnis] 的层面，永远不会停留在一种对自我

① Bahro, p. 100.

的直接关系的层面。在自我中，“内心旅行”会遭遇**小他者**和**大他者**（社会和自然），而它们不仅是自我的限制，也是自我构建的力量。基础性的直接经验——在这里，与具体个人的关联性可以作为验证标准——也就是**被中介了**的直接性，而激发这种经验的行为是超越了自我的、有理解力的主体的行为。“第一人称的政治”是一种矛盾的说法。这种内心旅行是必要的，因为自我与本我（Id）的发展动力被有效的社会控制湮没了，因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统治下，个性本身变成了商品。<sup>①</sup>但是，如果旅行逗留于未经中介的自我，同时，这种自我的外在表现还被当成是真实的，那么旅行就没有达到它的目标：它屈服于商品世界的拜物教，而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反文化就会变成现有文化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我强调了在转向主体性过程中的矛盾心理。这里同样有迁就必然性的危险。必然性是因为激进的解放运动（尤其是社会主义运动）孤立于大众之外，是因为与现有的统治机构的物质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交锋时，这些运动的组织太过薄弱。根据这些情况来看，超出（或拥护）这种政治的、经济的阶级斗争的抗议和造反出现了**退化**。即使是工业工人阶级中激进的对抗（地方性的自主管理、接管工厂、自发的罢工）也是如此。比起劳工运动史上伟大的群众活动，这些就像是革命传统的无力的尾巴。

但是表面迹象并不代表整体。比如，工人反抗、市民倡议、公社、学生抗议，这些运动都是真正的反抗形式，它们取决于特殊的社会状况，取决于对集权化和极权化的统治机构的反击。这种反叛不够强大，不足以对抗那种本身有着高效的、集中的权力的机构，因此只能集中在某个地方和区域，在这里，运动有一定的范围和自由，行动也有一定的空间。确切地说，这种倒退促进了现有社会客观的瓦解趋势，也即是说，所形成的自主控制的经济单位和社会单位正在日趋减少。这种发展将意味着“大众”概念事实上已经被超越了，因此解放的一个方面早已被实现，即出现了一种个体在与他人的

<sup>①</sup> Kraushaar, pp.37ff.



团结中去感受、去行动的生活方式。

### 结论

巴罗的分析突破了马克思主义伪正统的拜物教和直接的反文化。他的辩证分析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了真正“内在的”进步，充满着对现实的理解。它的基本思想主要在如下理论和实践的几个关键点上被揭示了出来：

(1) 对早已在发达工业社会被超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模式（革命群众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拒绝。对与现实社会趋势相应的新模式的阐释。

(2)（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关系的重新界定；扩大了工人阶级；作为少数的无产阶级；依赖性人群的整合和扩大；工人阶级向“人民”的转变；它的保守性。

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相应的重要作用。大众的拜物教。

焦点从社会动力转向主体性：“内心旅行”与其矛盾心理；作为革命力量的意识。

关于革命主体问题的新构想（和答案？）——（2）的结论。

(6) 关于只要采取决定性措施（重新分配工作与收入，逐步废除绩效原则，民主的教育制度，延伸到工厂的委员会制度……），完整的社会主义就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的证明。新经济即时间经济：逐渐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自由王国内在于必然王国。

## 关于多元主义、未来以及哲学对话马尔库塞<sup>①</sup>

1979年3月，我接受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学系的邀请到访圣迭戈。在与哲学系主任预先商谈之后，我得到了马尔库塞教授的接见。我们在学校里那个被叫作图书馆大楼的他的办公室中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交谈。我想在此把这次谈话笔记的译文（匈牙利语译文）发表出来。

**匈牙利学者（以下简称匈）：**首先我想感谢你能接见我，耽误你宝贵的时间了……

**马尔库塞（以下简称马）：**你想谈些什么呢？

**匈：**我很想听一听你这位能紧跟这个世纪历史的人对当代社会运动、哲学的作用以及未来的看法。

**马：**你问吧。

---

<sup>①</sup> 《关于多元主义、未来以及哲学对话马尔库塞》原标题为“A Conversation with Herbert Marcuse: On Pluralism, Future, and Philosophy”。在马尔库塞的私人收藏中发现了5页的打印手稿，访谈者看来是一位匈牙利学者，他讲到，为了访问马尔库塞，他于1979年3月来到了圣迭戈。在马尔库塞后期的访谈中，这是最为关注哲学的一次，马尔库塞就不同的哲学与哲学问题——其中包括布洛赫和卢卡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们已经校正了匈牙利学者的一些英语和拼写方面的错误，而有些地方则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编者注

匈：1968年的学生运动时至今日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当时，学生的口号受到了马克思、毛泽东和你的思想的启发。这些思想现如今还能带来启发吗？

马：这还不能说成是共同作用的结果。

匈：但是三个首字母“M”是共同的……

马：你又说起了这个陈年往事。那我简要地说明一下吧！我一直都承认我思想中存在着与马克思相同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否认过马克思的思想给我的观点的形成所带来的影响。但是，毛泽东和我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首先，我几乎不知道他的观点，其次，今天所说的毛主义产生于完全不同的环境和经济背景，所以，我们的观点根本不存在任何可能的联系。

匈：你们两个人不都是试图解决创造新人类这个问题吗？难道这不就是一种联系吗？

马：我再说一遍，我不承认与毛泽东有任何共同之处。

匈：我明白了。那么你是如何看待学生们正在变得越来越保守的呢？我觉得当代美国学生都不太关心政治，他们的基本目标就是适应这个制度。

[417]

马：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学生都非常敏感，并且他们的思考方式与他们十年前的先行者并无二致。可能今天他们的抗争不是那么明显，但在内心深处，与以前同样有效。不，我认为他们不保守。

匈：你认为学生运动仍有活力？

马：这是事实。学生们在全世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或许他们已经不再像1968—1969年那样有组织性，但是无论从社会方面讲还是从政治方面讲，他们在解放运动中都是重要的因素。

匈：你认为女权运动非常重要，但有人却觉得，你实际上高估了她们的的重要性。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她们这么重要吗？

马：在西方工业社会，政治解放不仅掩盖了这个破坏我们生活的自然条件并鼓励攻击性的制度，而且还把它当成了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所接受的制度。女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部分环保主义者纷纷呼吁关注解放的局部

性、虚幻性，他们依据真正的解放的要求拒绝了现存制度的合法性。

**匈：**女权主义者从未质疑过现存政治框架的合法性。相反，她们不仅希望通过一种形式的解放而且希望通过真正的、全面的解放去适应它。她们抨击普遍盛行的观点只是因为她们认为自己处于价值体系的对立面，而对这个价值体系来说，合法的概念仅仅是公民的政治解放。

**马：**它可能偶尔会如此这般出现。但女权主义者可能会猜测说这是一种更为基础性的现象。归根结底，妇女正在为自由的生活做斗争，而这种生活是可以通过改变当前的价值体系建立起来的，不过，它以驱力和需要的转变，以生命原则战胜破坏原则的有机发展为先决条件。两性关系的改变有革命的潜能，它可以促进新人类的出现。女权主义运动代表着爱欲能量，只有该能量才能彻底改变破坏性能量并创造愉快的人际关系。这是女权主义运动真正的意义所在。

**匈：**女权主义者们以及批评女权主义运动的政治学家们都不曾用这样的寓言来描述这个运动。为什么我们要这样阐释？

**马：**你说哪个是寓言？

**匈：**就爱欲、死欲、爱欲能量、破坏性能量成了哲学阐释的原则而言，它们是寓言。

**马：**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它们是寓言吗？

**匈：**难道我应该称它们为事实吗？

[418] **马：**为什么，你把什么当成事实？你必须明白我们不得不根据解放的成果来重估事实，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发现事实，如何发现事实中的真理，而这意味着批判，意味着政治立场。但是，请告诉我，你想谈哪些问题？

**匈：**我想谈一下作为政治制度的多元主义以及多元主义理论。

**马：**嗯。这就是你来美国的原因？

**匈：**有人说在这个地方能看到发挥作用的多元主义。同时这也是我的一个老问题，那就是，我们怎么能在一个多元主义的社会中推广普及任何一种

价值体系呢？怎么能够在多元价值体系被合法地接受和认可的制度中对多元主义的意义进行限定呢？

**马：**任何拥有法律体系的社会起码都会以法律的形式——且不说其他形式——规定普遍的价值。

**匈：**是的，但对我而言，多元主义意味着一种形式上的矛盾。多元主义的一个前提是把多元主义的政治框架当成了普遍接受的。然而，接受它却意味着接受强制性的价值，这与价值的自由选择相矛盾，与异端的原则相矛盾。难道我们应该说在多元主义社会中唯一普遍的价值陈述就是容忍多元吗？

**马：**多元主义只不过是表象罢了。宽容本质上讲也是压抑。一旦异议增加并获得了政治意义，最多元主义的制度也会即刻变成压抑性的。异议只有在它不会威胁到制度本身时才会被宽容。在美国之所以有许多团体被宽容，包括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没有实际的政治影响。

**匈：**这很有可能是真的，但是这些实践方面的证据并不能在理论上驳倒多元主义。还可能有这种情况，即多元主义允许异端，而不宽容异端的制度——按照你的说法——就不是多元主义的。

**马：**我不相信多元主义在理论上的可能性。

**匈：**这是否表示你不仅拒绝政治上的多元主义，而且也拒绝哲学上多元主义呢？

**马：**我并非拒绝政治上的多元主义，只是说它在西方社会无法实现。虽然我不明白你所说的哲学上的多元主义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很可能会拒绝它。

**匈：**我的意思是：相反的观点可以被宽容，是因为每一个观点都是某种“完整的真理”（total truth）的一部分，因为所有观点都能被并入一个普遍的价值体系，或者说它们能够被宽容正是因为不存在这样一种真理，不存在普遍的价值体系？后者可能更符合“多元主义的世界”，但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在政治选择方面就只能谈论偏好了。

[419] 马：你看到的是一种文明形式在价值变得空虚时、在现实意义消失时表现出来的危机。这种文明没有前途。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强调彻底变革驱动力与需要的原因。此外，那也是理论的职责范围：让每个人都清楚什么是我们的普遍利益。当今社会压抑了实现这些利益的努力，创造出了这些社会没有普遍利益的表象。

匈：你的意思是西方文明没有前途，还是说，工业社会在通常情况下没有前途？

马：工业社会即西方社会，但即使是东方国家或者非洲国家也都在试图建立这样的社会。似乎只有通过西方的意识形态才是可取的，即使传统的价值体系能够指定一种不同的模式，也是如此。是的，我想说的是西方文明、工业文明没有前途，根据我的判断，它的前途极其悲观。

匈：你所持有的价值难道不是源于你对其命运持悲观态度的文明吗？还是说，你认为在任何历史状况下，无论表现得明不明显，这些价值都是人类存在的固有价值呢？

马：人是一种不断生成的存在。人创造了自身的价值并且展开了自身的历史。通过创造自身的价值，他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历史并且展开了自身潜在的本性。历史的具体性可能促进也有可能压抑该过程。西方文明是压抑的文明，迫使自然的生成方式变成了人工突变。

匈：人该如何在这种状况下“生成”呢？

马：在西方文明中根本就没有出路，因此考虑到我们的未来，我很悲观。

匈：难道要超越这种文明吗？

马：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

匈：对，但是我的问题的另一个意思是：让每个人都接受普遍的、假设性的人类存在的价值，而不取决于社会和文化状况，这有可能吗？

马：我说的不是普遍价值，而是那些在具体状况下形成的价值，是那些在人类存在中有驱动力和基础的价值。每个人都能理性地认识到它们。

匈：尽管在理论上提不出反对意见，但有时一个封闭的文化共同体的成员也不会同意他们共同的价值。不过也可以从理论上提出反对意见，即不可能通过一种逻辑必然性来证明为什么那些价值或利益就应该是你所说的每个人的普遍价值或利益。

马：理性、本能驱力、心理结构基本上在每个人、每个时代都是同一的。它们的表现形式取决于时间和空间，但是它们基本的同一性却为人类关系创造了可能，也为共同语言和共同理解创造了可能。

匈：现代认识论（毫无疑问，它在当代美国哲学思潮中代表着最高水平）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理解确定性。你认为哪种哲学有可能避免认识论问题？

马：我所说的不是认识论问题。在我看来，我们这里的哲学问题并不是你比较欣赏的思潮所分析的问题。 [420]

匈：我是否可以说，哲学的任务就是构想你所提到的可能性呢？还是说，它的任务是通过将普遍利益和价值概念化来帮助实现这些可能性呢？

马：将它们概念化不是哲学的任务。人们必须自己实现它们。

匈：那么哲学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马：在理论上对实现普遍利益的具体限制与从这些限制和压抑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进行概念化。

匈：在你加入法兰克福研究所时是否就有了这种观点？

马：不是，是在其他地方。

匈：你是否介意我提一个与这些主题有关的私人问题？

马：什么问题？

匈：这种批判的视角与你在这里、在加利福尼亚的生活有关吗？

马：我觉得在这很好，可以很好地工作。

匈：难道这不是一种流放状态吗？

马：我在这里可以自由地工作。批判性的距离是知识分子想象力丰富的条件。

匈：你在德国难道不能这样吗？

马：作为一个异见者，我无法在德国生活。

匈：回到哲学，你认为谁是晚近重要的哲学家？

马：萨特。

匈：还有其他人吗？

马：时间范围能放多宽？

匈：比如，整个 20 世纪吧！

马：海德格尔。

匈：罗素呢？

马：罗素？嗯，可能吧。

匈：维特根斯坦呢？

马：维特根斯坦不是哲学家。

匈：即使是晚期的维特根斯坦……

马：他所做的很有意思，但他不是哲学家。

匈：此外还有谁？

马：布洛赫。

匈：那在海德格尔、萨特和布洛赫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马：他们都试图寻找人类的存在论基础。海德格尔提出了历史的意义、历史世界的意义，并且在他的存在论中给出了一个具体的主体……

匈：难道你不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很抽象？

[421]

马：正相反。在哲学经过漫长的真空之后，他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存在论，尽管不是直接的具体，不过，这种直接的具体转而变成了萨特的典型特征。萨特把海德格尔的建构运用到了日常生活中。

匈：你说萨特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家，是不是因为他所做的哲学实验与你的相似？

马：什么意思？

匈：这么说吧，你在前法兰克福时期，萨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试图将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



马：我觉得你不能由此就断定萨特想要调和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有相似的努力也并不代表什么；更重要的是相似的解决办法。萨特吸引我是因为他创造了一种非中立的存在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是中立的，而哲学距离政治只有几步之遥。萨特的富有战斗性的自为（pour-soi）说的就是社会潜能的转变，正如我在重新诠释性的时候、在女权运动中所看到的那样，这对于将人类从压抑中解放出来有着具体的意义。

匈：如果你认为存在论特别是历史的具体的存在论很重要，那么你该如何判断卢卡奇呢？

马：我从来没看过他的存在论。匈牙利怎么评价他的？

匈：他已经被官方完全接受，甚至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研究已经被学院化了；有了一个独立的卢卡奇档案馆。

马：嗯。将他纳入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困难吗？

匈：就我所知，没有。大辩论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结束，而通过他的存在论完全可以表明，他可能没有去理会他的很多学生的期待，他在他的晚期作品中根本没有改变或重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被官方评价为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从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始实际上就已经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了。

马：很可能。请告诉我，他们怎么评价我？

匈：你的名字广为人知；尽管你的著作没有翻译成匈牙利语，但你仍有很好的声誉。

马：一本也没有吗？

匈：可能在读本或教材里有两篇选文，但是没有独立出版过你的著作。

马：即使《单向度的人》也没有吗？它严厉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

匈：人们能在图书馆里读到你的德文版或英文版的著作。请允许我再谈一下布洛赫。你为什么认为他如此重要？

马：嗯，近来，我研究了布洛赫的作品。他早已注意到当今世界纯粹的否定有可能会失去它的批判力量，更不可能通过否定发现真正的内在性、人

类的意义。

**匈：**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建立在对现有社会的有规定的否定之上。

**马：**对于一个更好的未来的确没有肯定性的保证；希望只有通过否定给  
[422] 定性才能表达出来。希望与迄今为止所实现的一切之间就剩下最后一点关系了，那就是与它们相矛盾。人们只有通过否定才能到达这一点。即使这个目标看上去是非理性的，你必须试着以理性的方式去领会它。

**匈：**马克思主义在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中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

**马：**布洛赫实际上延续了马克思自 19 世纪开始从事的工作。他试图从理论上设想人类联合体的实现，设想在改变了的历史背景下正在形成的人的本质的实现。他是 20 世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马克思主义中所看到的不仅仅是政治取向。

**匈：**在我们的谈话中，你认为人类的特点就是“生成”。我想知道，你的这个概念是否与布洛赫在《经验世界》(*Experimentum Mundi*) 中所阐述“自我实验”(sich ausexperimentiert)——即正在形成的世界——概念相对应？

**马：**布洛赫很早就提出了这个思想，并非在《经验世界》中第一次提出。我甚至会说他终其一生都在围绕这个主题做不同的阐释。我认为这两个概念不完全相同，尽管它们有着明确的联系。不过，我觉得我们的会谈该结束了。

**匈：**感谢你的耐心，感谢这次交谈。

## 比尔·里特访马尔库塞<sup>①</sup>

他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河马的照片；人们很难想象这来自一位世界上最著名的、最受尊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然而，就像马尔库塞生命中差不多所有别的事情一样，这里也存在着一个逻辑的、哲学的解释。

他说，“它们是我最喜欢的动物，此外还有长颈鹿和大象”，“它们都是

---

<sup>①</sup> 《比尔·里特访马尔库塞》是一份 17 页的访谈打印稿，上面有马尔库塞的手写修改。根据访谈的附录，这次访谈可能发生在 1977 年。在两页的开场白中，里特总结了马尔库塞的思想，并且指出马尔库塞将访谈分成了两个部分。里特指出马尔库塞的妻子艾丽卡·谢尔奥弗和学生卡罗尔·贝克尔 (Carol Becker) 在后面的访谈时也在场，一位老师、也是马尔库塞的学生乔治·卡西亚菲克斯帮助准备了访谈的主题和问题。比尔·里特于 2013 年 4 月 17 日发来的邮件表明访谈原本要发表在《圣迭戈杂志》上，但显然没有发表，因此这里是首次发表。里特的访谈范围很广、详尽具体而细致地涵盖了当代政治，这在马尔库塞发表的其他访谈中很少见。其中，有相当多的段落谈到了马尔库塞在 1918 年德国革命、法西斯兴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生活与政治参与。访谈最后提到了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该书于 1979 年出版，而它的主题是艺术与解放。关于访谈的时间，比尔·里特在 2013 年 7 月 2 日的邮件中写道：“关于他【即马尔库塞】在 1976 年加州参议员选举中支持汤姆·海登 (Tom Hayden)，我提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可以作为访谈时间的参考。当我问他是否公开支持海登时我说了‘去年’。这说明访谈的时间是 1977 年。”在 7 月 2 日随后的一封邮件中，里特指出他是海登竞选团队的新闻发言人之一。

被动的、非暴力的生物，只有在遇到袭击和威胁时才会变得暴力”。

[423] 作为整个一代新左派的作家、老师和导师，这位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 79 岁高龄处于半退休状态的哲学教授近几年已经很少接受采访。

他的日程不再像以前做哲学教师时那么繁忙了；那时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去听他的讲座、阅读他的书籍和文章，理解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分析以及他所说的唯一的替代方案。

他对 20 世纪 60 年代缺乏经验的学生运动的支持使他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当学生们在 1967 年、1968 年夺回了他们自己的权力时，他就在巴黎和柏林。他引以为傲的美国学生安吉拉·戴维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因与共产党的关系而被开除后成了热点人物。

这一系列事件纠缠在一起，使马尔库塞成了新左派意识形态最主要的哲学先驱。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马尔库塞自己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圣迭戈的保守派目睹了他在国际、国内学生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后，要求解雇他。但是对马尔库塞的抗议不仅限于口头上。右翼组织还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反马尔库塞阵营，他们焚烧肖像、电话骚扰，“三 K 党”甚至还发出了死亡威胁。

尽管就此事叫来了联邦调查局（马尔库塞说他不愿让调查局掺和进来，“但他们没有用我的电话打给调查局；我是决不允许的！”），但是为了保护马尔库塞，他的学生开始自己组织了起来。

在校园里他得到了学生的护送，在教室中受到了监护，白天他在办公室、晚上他在家里也都有学生护卫。这个精心设计的安保系统——那时马尔库塞并不知晓——还包括全副武装的学生警卫。

对马尔库塞的批判不仅限于国内势力。苏联官方报纸《真理报》(Pravda) 攻击马尔库塞，把他说成是“狼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假先知”，并且为了证明马尔库塞觉得“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革命的组成部分”，还引证了他在 1968 年学生运动时前往巴黎的行程。

[424] 马尔库塞驳斥了这些批判，并将其视为僵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

例证。

马尔库塞分两次接受了下面的访谈；在第二次会面时，他的妻子艾丽卡、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员工卡罗尔·贝克尔（Carol Becker）也加入了我们。特别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教师、马尔库塞的学生乔治·卡西亚菲克斯（George Katsiaficas）帮助我们准备好了访谈的主题和问题。

**问：**十年前，在一次深度访谈中，你的分析是美国已经距离革命不远了。这个分析在过去十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答：**据我所知，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美国不具备发生革命的一切先决条件。传统的条件是：统治阶级已经无法保证正常的社会再生产；大部分人口是穷困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有着高度成熟的政治意识。

通常情况下，对统治阶级来说，统治意味着没有恐怖行动，没有不可控的国内危机，也没有自杀式的战争。而它仍然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反革命潮流在全球范围内普遍盛行，是因为制定了防范革命的措施，并且反对力量也没有被有效地组织起来。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资本主义甚至整个资本主义就不会面临日益恶化的状况。但是，从时间上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统治集团长期下去会应付不了这些危险领域。

**问：**如何考虑美国实力的下降？

**答：**先等等。哪个地方表明实力下降？

**问：**很显然，美国已经不再像十年前那样有控制力了。

**答：**并非如此？对我而言，美国在干预越南失败后，却帮助智利建立了独裁政权，而整个拉美大陆都对美国的操纵开放。葡萄牙革命已经被肃清，并且已经被亲美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取代，所以你所说的实力下降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我甚至认为海军陆战队登陆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如今状况可能会发生改变，不过，前提是，比如说，欧洲的状况发生了改变。我认为，自 1967

年至今，与世界形势相比，欧洲有了很大的不同。相比十年之前，如今，欧洲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这主要是因为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现象，也即是说，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共产主义坚持了自身的策略和政策并且从苏联的领导中独立了出来。

**问：**这怎么会影响到美国的政策和策略呢？

[425] **答：**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就潜在的冲突而言，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一边是联邦德国，一边是美国。政治方面，我觉得它们之间潜在的冲突也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削弱。如果法国和意大利左派真的接管了政府，那么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

**问：**从力量的平衡来看，这意味着什么呢？

**答：**根据现在的共产主义策略，至少有些时候，它并不意味着激进的变革。法国的共产党已经公开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也就是说，法国不会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很可能是因为在法国民众中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破坏将会使西欧直接面临苏联的进攻。

**问：**他们认为苏联是最大的威胁？

**答：**正如你所看到的，法国的左派不仅包括共产党，还包括其他团体。社会党在当今的联合政府中已经变得更加强大。为了赢取选票，他们必须依靠平民之外的阶层，而正是这些阶层觉得存在着苏联进攻的危险。

**问：**你怎么看待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呢？

**答：**我们认为苏联正在强化其杀伤力巨大的军事潜能，而他们认为我们也是如此。因此这是一个僵局。

**问：**很像冷战思维。

**答：**确实，又回到了冷战。这是因为五角大楼起到了作用。它在这个国家的经济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不仅对商品的生产与销售——如今武器是规模最大的商品之一——很重要，而且对工作而言也很重要。我认为五角大楼现如今仍然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工业企业。

**问：**中国认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这种状况会促使它们发生战争。

**答：**我完全没看到这种可能性。我认为两个超级大国有太多的共同利益了；这种共同利益就是压制一切真正激进的革命趋势。况且在它们无须发动战争也能得到必要的军备预算时，它们为什么发动战争呢？它们非常清楚战争可能会让它们两败俱伤。局部战争仍会继续。但是，超级大国之间会不会爆发核战争呢？不会。

**问：**你前面提到贫困的工人阶级是革命传统的先决条件，另一个先决条件是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进行管理。这两种趋势还会继续吗？

**答：**如果你所说的趋势是统治阶级可能会做出更少的让步，那么我同意。但是你说的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假设。即是说，贫困程度越高，工人阶级的意识也就越发具有革命性。这从历史上看是错误的。事实上，据我所知，革命都不是由最贫困的阶层发动的，除了某些例外，比如，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中国革命，但那里的形势不同，因为它们发生在战败和整个社会结构全面瓦解之后。

[426]

但是 1918 年爆发的德国革命、奥地利革命、法国革命以及英国革命——这些都不是由最贫困的阶层发动的。

**问：**对于如今美国的人民组织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答：**这意味着，你不能一味地等待工人阶级变得贫困。不管怎么说，这都是非常奇怪的策略。我们必须习惯于那些拥有更高期望的想法。意识不会在贫困的基础上变得激进化，而是在意识到显然拥有更好的生活的可能时才会变得激进化。

**问：**但是这些更高的期望置身于一个限制与日俱增的世界。这难道不意味着统治阶级将更不会施舍，将更加团结吗？

**答：**嗯，我完全同意。统治阶级让步的范围将会比现在更狭小。但这并不意味着会看到激进化了的工人阶级，相反，这意味着更进一步的倒退。

**问：**你认为卡特政府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答：**我们还不确定，他至今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现在我能告诉你的

是，我没有看到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从根本上讲，对外和对内政策仍将继续，因为如你所知，这不是人格的问题和人格发生了改变的问题。庞大的机构在其自身惯性的作用下运行，因此它不允许任何激进的变革。

**问：**许多左派正在推动这样一个理论，即失业者是一支可以组织起来的力量。你也这么认为吗？

**答：**从历史上看，我认为这不大可能。例如，我们都知道，德国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那些年，失业者中可能大部分人都从支持共产党转向了支持纳粹。他们变成了政权最早的支持者，许多年轻人就在其中。而在美国，失业情况可以通过失业保险来缓解。

**问：**去年你支持与加州参议员约翰·塔尼（John Tunney）同台竞选但却失败了的汤姆·海登。在退选演讲中，你说今天的斗争不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资产阶级民主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答：**从这个国家目前的形势来看，确实如此。这里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形势。也没有哪个比较大的阶层是亲社会主义的。集中体现在法律和治安力量中的压抑和权力极其巨大，而政府也极为庞大，所以这样的运动现在看来不可能发生。

必须做好准备，小心翼翼地准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必要与自由民主派的力量结成联盟。现在的情况是，危害较轻的政策就是明智的政策。

[427] **问：**海登竞选参议院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影响？这是否意味着激进派应该试着取得政治职务呢？

**答：**只有在地方或者地区层面上才可行。这个策略在现有的全国性的民主党内不可能发挥效力。因为在一个你需要上百万美金才能成为相对有威胁的竞争者的国家，这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

**问：**就家庭结构和劳动力而言，女权运动已经对社会产生了影响，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它朝着资本主义的重组迈进了一步，因为不管怎样，妇女有了完全平等的工作机会之后，她们肯定会建立照顾儿童甚至是料理最必要的家务



的机构。这同样意味着社会结构要发生变革，意味着朝着集体化迈进了一步，意味着由于家庭变成了整个环境的一部分，私人事务逐步减少了。家庭没有被破坏，但却不断被削弱。我不是说现在，说的是有了平等的工作机会以后。

这会对 900 万失业者产生什么影响，我不得而知。像所有事情一样，这对当权者有利，因为想工作的妇女能够对劳动力施加压力。此外，这还可以被用来分化工人阶级。

**问：**你曾目睹学生在巴黎起义，你在柏林时那里的学生也十分活跃，而当你在美国教书时学生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许多学生视你为导师，因为你极力推动让学生成为先锋的策略。学生运动后来发生了什么？他们留下了哪些遗产？

**答：**许多人说学生运动已经彻底消失了。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运动以不同的形式、通过不同的策略存活了下来。尽管没有被组织起来，但却表明在组织方面做了新的尝试。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学生运动失败的原因很清楚。

首先，对形势做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也就是说，错误地认为这个国家出现了革命的形势，而实际上并没有。他们认为，革命即将到来。然而，当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时他们陷入了极度的沮丧。他们退却了，或者说，表现出了多少有些乐趣的逃避现实的态度，比如，各种形式的上师崇拜（guruism）、超觉静坐、伪宗教、敏感性训练团体，等等。

其次，在这个国家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他们从来都没有群众基础。有人

[428]

说我那时坚称学生在革命运动中将替代工人阶级。无疑，这是胡说八道；我从未说过这种话。我曾说过，学生能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从他们特有的立场和先进的意识来看，他们实际上就是先锋。再就是，如今不管是哪里的革命运动，学生们都在最前线，这是事实。拉美曾经就是这样，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这样。同样，非洲、印度尼西亚曾经也是这样，毫无疑问，法国和意大利也不例外。

**问：**那时，学生运动的主旨就是挑战大学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尽管你同意他们的批评，但你仍然坚称学生应该认识到大学是自由的最后堡垒。

**答：**当时我说的是美国大学，如今我仍然这样认为。我对那些直接攻击大学本身的学生极为不满。我能理解游行示威，也能理解提出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大学仍然是极其少有的你能在其中学习并说出自己想法的机构之一。

毫无疑问，它们正在变成职业学校，人文和社会科学正渐渐沦为可有可无的甚至是危险的学科。

**问：**现如今学生持怎样的态度？他们似乎变得更保守了。

**答：**他们考虑自己的工作，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过于激进而被记录在案，那么他们有可能找不到工作。它就像是一种压抑机制一样运行得很好。

如今校园的局势已经有所缓和。但是仍有很多能够靠自身或者与他人合作而产生政治影响的个人和组织。

**问：**这些如今走出大学的知识分子还像十年前的新左派吗？

**答：**直到现在我仍然这样认为，但他们没那么壮观、没那么丰富有趣，相反，太过温和了。但是他们知道将要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他们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呐喊了，因为，基础问题已经消失了。十年前，民权运动之后，紧接着就是战争和征兵。

**问：**你最初为什么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呢？

**答：**在我 17 岁时，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征召入伍，我离开了学校。在战争结束时，德国革命爆发了，我被选入了柏林的一个地方士兵委员会。当时我特别热衷于政治。不过没多久，委员会成员就开始把先前军队所有的军官都选入了委员会。这时，我选择了辞职。

我记得自己曾经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持枪站岗，而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对马克思越来越感兴趣了。当德国革命逐渐——更确切地说，骤然——走向失败、受到镇压时，听到他们的领导人被暗杀了，我退出了，开始全身心地

投入到了大学的学习中。正是在那里，我开始写东西的。

**问：**马克思主义最初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答：**正如我今天所认为的那样，当时我觉得它对资本主义社会做了真正有价值的分析，而它也是唯一现实的替代方案。

**问：**那时你怎么会把它与苏联联系在一起呢？

**答：**非常肯定地说，因为列宁还活着。甚至是列宁去世之后，直到斯大林露出他作为清算者的真面目之前，我仍然会把它与苏联联系在一起。

**问：**所有这一切是如何引导你写作的？

**答：**因为当时我认为我们必须弄清楚德国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因此我开始更加系统地研究起了马克思主义。我的第一本书于 1928 年出版。

直到 1932 年，即在希特勒显然要上台而我没有任何机会获得大学教职之前，我一直都在大学里写作、工作。如果我留在那里，我会死在集中营里，这是毫无疑问的。1932 年，我离开了德国，到了瑞士，然后 1934 年到了美国。

**问：**在德国法西斯上台时，那里还有什么左派组织吗？

**答：**那时有两个主要的（进步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还有斯巴达克联盟，但它不久就解散了。社会民主党发生了分裂，人们建立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但它也没有持续太久。不过，主要的斗争集中在这两个大党之间。

罗莎·卢森堡是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后来成了斯巴达克联盟的奠基人之一。我只参加了一次他们的会议。

那时有学生运动，但并没有以有组织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起来。

**问：**你来美国之后做了些什么？

**答：**在我抵达美国之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社会研究所里工作，直到战争爆发。1941 年，我去了华盛顿，先是去了战争信息局，然后去了战略情报局（简称 O.S.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问：为美国效力感觉怎么样？

答：我很乐意。为什么这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记得那时美国政府正在与纳粹和法西斯做斗争，但如今它却走向了反面。

问：你曾因为罗斯福总统没有积极营救犹太人批评过他，是吗？

答：是的，这都是有记录的。我们提出了抗议，但却没有用。

[430] 问：有没有什么有组织的活动正式地提出这个问题？

答：我们写了信，那是我们唯一能做的。

问：不过话又说回来，很多人给政府提供了有关纳粹的情报，当时有没有觉得政府得到了你们提供的情报后并没有迅速地采取行动？

答：是的，感觉很强烈。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去纳粹化的工作中；详细列出了纳粹组织与反纳粹组织的名单和信息。我们列出了纳粹经济罪犯和战争罪犯的名单。但很显然，这种情报湮没在了政府的档案柜中，并未得到利用。那些我们所认定的主要的经济罪犯和战争罪犯现如今仍处于最有权势的国际地位上。

我要说的是那个时候力量已经发生了变化，反法西斯战争已经不再是议题了，冷战和反共产主义开始了。

问：战略情报局为了搜集情报把研究欧洲国家的专家召集了起来，但你说几乎没有用到这些专家，是吗？

答：是的。他们只想掌握最显著的纳粹领导人，但是对那些不太显眼的领导人，他们却不闻不问。

问：你也提供过纳粹的情报，但是，当时纳粹官员不是已经与美国政府联合起来开始反共产主义了吗？

答：还没有，那时他们潜伏了起来，但是他们逐渐地走进了人们的视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彻底解除和摧毁德国的战争潜力，另一种是担心苏联。

这种情况持续到 1950 年。从那时开始，战略情报局把精力越来越多地投向了共产主义。1948 年，我们写了一篇文章，指出我们已经不能指望任

何共产党在欧洲掌权，因为激进的潜力正在减少。

我认为那项工作非常有意义，同时我也认为自己自己对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贡献。我从未对此感到后悔。但是我们大多数的研究都湮没在了档案柜里。

在战略情报局，我们这个部门把知识分子聚在了一起，盛况空前。他们无一例外地成了知名的全职教授、作家等等。

**问：**有没有与中南半岛有关的工作？

**答：**有，战略情报局的一个分支机构负责这项工作。那时美国强烈支持越南的胡志明。他们认为他能够统一国家，建立秩序，并且很可能与中国保持距离。他们认为他像卡斯特罗一样，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问：**你什么时候离开了战略情报局？

**答：**1950年。我去了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找到了工作，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然后我在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工作了18个月。我曾是苏联马克思主义专家。事实上，就是在那时，我写了《爱欲与文明》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431]

**问：**你刚刚完成了一本新的美学著作。这是你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和哲学作品之后的主题吗？

**答：**这本书试图全方位地打开那些我既不能在哲学中也不能在社会学、宗教及任何其他学科和领域中找到理念、洞察甚至真理。

1928年，在我出版的第一本书中，我就开始了美学和文学研究。现在我又回到了原点。实际上，我觉得它是任何激进运动或革命运动绝对必要的组成部分，拿1968年来说，当时人们就已经确定无误地发现了艺术与革命之间的纽带。一切权力归于想象力。它是路障下的钢琴演奏家。它是超现实主义。它存在于现存社会的对立面和深处，潜伏了起来，也就是说，它似乎不具有政治性或革命性。

这本书的主题是艺术的社会潜力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审美形式，相比现有的社会关系，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律的。艺术能够产生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但它却不是从生产的角度来分析社会。

**问：**因为你所有的作品，因为你见证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所以成千上万的学生都把你当成他们的精神导师，而你想要给别人留下怎样的印象？

**答：**坦白讲，我压根就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根本就不在乎死后的毁誉。但我却会为自己做了鲜美的沙拉和汤而感到自豪。对，还有碎鸡肝。哦，现在说的话才是人话！

## 后 记

彼得·马尔库塞

这一卷，作为六卷中的最后一卷，是一项非凡成就的尾声，实际上，应该是两项非凡成就的尾声。最直接地讲，它是道格拉斯·凯尔纳的成就，因为他研究、汇编、整理了大量的文本，而这些文本是由一个极其富有经验、善于表达而态度积极的心灵在几乎长达 60 年的时间里以两种语言写就的，其中涉及深奥的（这是实话！）专业和学术期刊文章、书稿、通俗的社论文章、访谈、报纸文章、辩论、讲义、信件、发表过和未发表过的手稿。为了呈现它们的由来和形成的细节，它们被编入了井井有条的六卷本，还附上了极为详尽的注释。该文集并没有仅仅对档案收集的材料进行编年编排，而是围绕各种主题进行了整理，并通过富有启发性地讨论它们的成因、引发的争论、所代表的思想的演变及其在许多仍在进行的深入讨论中的反响和作用，对它们做了介绍。该文集从讨论复杂经典哲学文本本身含有的问题，到介入当时关于正在进行的政治论战的战略与战术的争论，涉猎广泛。此外，它们有时候以简略的、更易理解的方式提到了某些重要的并且在大部头的《理性和革命》、《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中得到了更为详尽的阐释的主题。

不过，几乎很少有人会从头到尾读完这六卷，尽管这是一件有创造性的事。但即使是浏览一下目录，挑出那些吸引人的题目，或因为某个特别的段

[433] 落或引文引起了注意而随意地翻看，都是令人受益的体验。接下来我会总结一下对我从这几卷作品中所学到的东西，不过其他人将会有自己完全不同的理解，激起完全不同的想法，甚至可能是行动。无论如何，道格拉斯·凯尔纳历经数十年收集这些资料，这本身就值得高度赞扬。同样值得赞扬的是凯尔纳与其他那些参与系列丛书的学者的合作，他与克莱顿·皮尔斯共同编辑了后两卷，并且共同撰写了导论和注释，因此把更年轻的学者也吸引到了马尔库塞的研究中来。

不过，这六卷作品还代表着另一项成就，它们也是作者本人的成就。我无法客观地评价该成就。但如果不是作为一名哲学家——我就不是——来看这些成就，而是作为某些讲授城市规划、城市政策的人，作为一个对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有着政治关切的活动者，我相信这六卷作品的文稿非常有实质意义并且具有直接的相关性。它们详细阐明了那几次关键的斗争，而那些斗争将会决定长期的社会斗争的结果会是什么，同时也会决定短期策略的目标以及策略将如何与长期的社会斗争联系起来。

这六卷作品的文稿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标题：政治冲突、经济冲突、文化冲突——此外，它们还极为集中、深刻地阐明了这些冲突之间的关联。我原想把这说成是一种历史发展的三个向度，但马尔库塞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向度”的，而另一个向度就是潜在的替代方案，因此我将使用“方面”这个词，也就是说，一种现实的三个方面。我认为，对这些方面进行区分并有意识地分别讨论，可以为制定反抗和变革的策略提供极大的帮助。

这三个方面分别是：

(1) **物质方面**：现行秩序的经济结构，它如何生产，它生产什么，它如何分配产品，物质生活条件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了社会成员的需求。生产资料 and 消费状况。实际的或潜在的工人（或被雇佣者）与资本家（或雇佣者）之间的冲突，工人与那些靠工人的劳动盈利的人之间的冲突，顶层 1% 的人与那些劳动但却使顶层盈利的人之间的冲突（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



在剩余价值——所创造出来的超出劳动再生产所需的社会成本的价值——的获取上的冲突)。

(2) **政治方面**：现行秩序的政府结构，如何做出决定，谁掌握国家的权力，什么样的反对力量潜在或实际存在，使用什么样的策略。顶层 1% 的政治权力精英与 99% 的实际的或潜在的公民之间的冲突。

(3) **文化方面**：社会结构，构成和塑造人的心理的多重力量。它们包括：个人动机，个人幸福的构成要素，个人对日常生活状况、意识形态、媒体职业、大学、学校系统、广告产业、艺术家和通常意义上的文化工业、宗教、伦理、种族、性别、年龄、关系的反应。再就是，前面提到的 1% 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冲突，即那些觉得现行秩序从根本上给予他们满足和富裕生活的人与那些对事态的发展感到不满意并觉得受到了限制、压抑、剥削，甚至基本上没有安全感和幸福感的人之间的冲突。

[434]

从凯尔纳以其丰富的编辑经验汇编的六卷作品来看，每一卷都有着丰富的材料。它们有一个一致的世界观，即资本主义已经证明，庞大的社会组织为那些早先可能被视为完全乌托邦式的人类生存方式带来了可能，但是资本主义已经在那个方向上耗尽了它的可能性，并且由于它单向度地迷恋增长和利润，将它们当成了原动力，它限制而不是扩大了人类幸福的可能性。今天，对人类来说，更好的替代方案已经出现。问题是如何突破资本主义强加于自由的单向度的限制，并且谁能领导这种突破，谁有意愿以及谁有能力去领导人们为争取替代方案做斗争。这种世界观和这些问题就在文集的各个角落里，时而清晰显明，时而隐而不彰。

第六卷也不例外。看一看这一卷所收集的文稿的范围，它在一定意义上表达了整部作品的目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即工具，革命即手段，乌托邦即目的。这六卷是一个整体，于此汇聚在了一起。

## 索引

(以下所标页码均为英文原版页码, 即中文版旁码)

## A

- absolute idea, 绝对理念, 87, 147, 150
- abstract labor time, 抽象劳动时间, 73, 237, 405
- achievement ideology, 绩效意识, 69, 235, 287
- “ACLU Conference Presentation on Civil Liberties” (Marcuse 1969),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会议关于公民自由的报告》(马尔库塞, 1969年), 289—297
- Adieux au Proletariat* (Gorz 1980), 《告别无产阶级》(高兹, 1980年), 63
- Adler, Max, 麦克斯·阿德勒, 18
- Adorno, Theodor, 西奥多·阿多诺, 123, 330, 339, 376
-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发达工业国家, 170, 185—186, 190
- affluent society, 富裕社会, 192, 194, 197—198, 246
- African Americans, 非洲裔美国人; black movement, 黑人运动, 267—268, 272, 298; educational system, 教育制度, 79; liberation movements of, 的解放运动, 50; agitation, 运动, 327—328
- agents of change, 变革的推动者, 204—206, 279—280, 325—326
- aggressiveness/aggressive movements, 侵略性/侵略性运动, 109, 197, 246—247, 274, 385

- agitation, 运动, 327—328
-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339, 388—389
- alienated labor, 异化劳动; abolition of, 的废除, 121, 162, 171, 204, 256, 260, 376, 410 ; in capitalist society,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 27—28, 31—33, 192 ; conservation of, 的保存, 173 ; cost of, 的代价, 388 ; liberation from, 从中解放出来, 252 ; needs and values with, 需求和价值, 247, 251 ; omnipotence of, 全能的, 412 ; organization of, 组织起来, 249 ; perpetuation of, 永久地保留了下来, 393 ; reduction of, 降低, 52—53, 360
- Althusser, Louis, 路易·阿尔都塞, 128, 129
- American capitalism, 美国的资本主义; 参见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美国经济评论》, 312
- American Indian, 美洲印第安人, 50
- American New Left, 美国新左派; 参见 New Left movement, 新左派运动
- anarchy/anarchism, 无政府状态 / 无政府主义; abolition of repression, 废除压抑, 373 ; advocacy of, 拥护, 387, 400 ; anti-authoritarian character, 反独裁的品格, 345 ; bourgeoisie choice over, 资产阶级的选择, 118 ; fear of, 害怕, 285 ; Marxian theory, 马克思理论, 101 ; negation and, 否定与, 131 ; organization vs., 组织与, 335 ; rehabilitation of, 的恢复, 256, 257 ; societal tendencies toward, 社会趋势, 254 ; trend toward, 趋势, 363
- an sich, 自在的, 定义来自 197
- antagonistic contradictions (conflicts), 对抗性的矛盾 (冲突), 85, 90
- antagonistic society, 对抗性的社会, 85, 105, 131
- anthropological revolution, 人类学上的革命, 33
- anti-authoritarian movement, 反独裁运动, 345, 411
- anticolonial movements, 反殖民主义运动, 50
- anti-communism, 反共产主义, 35—36, 38, 41, 430
- anti-Semitism, 反犹主义, 156, 159, 281
- anti-Soviet propagandists, 反苏理论的传播者, 38, 41
- anti-western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反西方革命运动, 79
- Arab-Israeli wars, 阿拉伯—以色列战争, 353—354, 365
- Arab Uprisings (2011), 阿拉伯之春 (2011 年), 2, 64—65

- Aristotle (Greek philosopher), 亚里士多德 (古希腊哲学家), 108, 134—136
- Arnason, Johann, 约翰·阿纳森, 38 页脚注
- Aron, Raymond, 雷蒙·阿隆, 355—358, 385
- Austrian revolution, 奥地利革命, 426
- Austrian Social Democracy,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80, 81
- Austro-Marxists,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 18
- authoritarian state, 专制国家, 119, 287, 315—318, 363
- autonomous subjectification, 主体化自主发展, 59
- Awareness, 意识; as catalyst, 有催化剂作用的, 399 ; consciousness and, 意识与, 102, 197, 393 ; of self-efforts, 自身努力的, 59, 335, 426 ; as subjective factor, 作为主观因素, 200

## B

- Baader-Meinhof group, 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 373, 373 页脚注, 388—389
- Bahrain, 巴林, 66
- Bahro, Rudolf, 鲁道夫·巴罗, 8—9, 41, 57, 116, 395—406
- Banowsky, William S., 威廉·班诺夫斯基, 218—221
- Baran, Paul, 保罗·巴兰, 323—324
- Being, 存在; structure of, 的结构, 85—87, 89
- Being and Nothingness* (Sartre 1943), 《存在与虚无》(萨特, 1943年), 166
- Being and Time* (Heidegger 1927), 《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 1927), 18, 24
- Belgium, 比利时, 366
- Benjamin, Walter, 瓦尔特·本雅明, 35
- Biotechnology, 生物技术, 5—6, 9, 50, 52
- black movement, 黑人运动, 267—268, 272, 298
- Black Panther Party, 黑豹党, 212, 349
- Bloch, Ernst, 恩斯特·布洛赫, 2, 35, 42, 420, 422
- Bolshevik policy (Bolshevism), 布尔什维克政策 (布尔什维克主义), 75,

77, 80, 82, 84

Bolshevik Revolution, 布尔什维克革命, 84, 90, 97, 321

Bonaparte, Louis, 路易·波拿巴, 117, 119, 121

bourgeois society, 资产阶级社会; democracy and, 民主与, 394, 424, 426; development of, 的发展, 129—130, 309; economics of, 的经济, 28, 251; liquidation of, 的清算, 117—121; Marxist theory in, 资产阶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15, 17, 22; negation of, 的否定, 407; petit-bourgeois morality, 小资产阶级的道德, 71, 257, 401, 405, 407;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 27—28, 394; proletariat and, 无产阶级与, 62;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社会主义民主与, 102; the state and, 国家与, 146; value and exchange value in, 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与交换价值, 72—73; women's movement and, 妇女运动与, 163—164, 166; 亦可参见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

Brandon, Henry, 亨利·布兰登, 387

Brecht, Bertolt, 贝托尔特·布莱希, 35

Bröckling, Ulrich, 乌尔里希·布洛克林, 4

Brothers of the Free Spirit, 自由之灵弟兄会, 345

## C

Cambodia, 柬埔寨, 335, 350

Camus, Albert, 阿尔贝·加缪, 157

capital, 资本, 定义来自 86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alienation, exploitation and oppression under, 异化、剥削与压迫, 32; communism vs., 共产主义与, 175, 195; confrontation with, 相遇, 223;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在当代社会, 27; continuity with socialism, 与社会主义的连续性, 342—344, crisis of, 的危机, 366; development of, 的发展, 83—84, 114, 190; dialectics of, 的辩证法, 85; disintegrating tendencies of, 的崩溃趋势, 191; final stage of, 的最终阶段, 199—200; forms of control, 控制形式, 51;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的内在矛盾, 56, 91, 96, 114, 194, 200, 203, 357, 363; Marx analysis of, 马克思的分析, 149; modifications in, 的修正, 112; monopoly capitalism, 垄断资本主义, 175, 215, 352; natural limits of, 的自然限制, 411; negation of, 的否定, 95, 249; negative forces within, 内

部的否定力量, 255 ; neoliberal capitalism,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 3, 7, 12, 67 ; neoliberal stage of, 的新自由主义阶段, 56 ; opposition within, 内部的反对者, 285 ; partial vs, whole, 部分与整体, 130—131 ; safe from crisis, 安度危机, 286 ; shifting of, 的转向, 55 ;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社会关系与, 189 ; structural change in, 资本主义的结构变化, 174, 356—357 ; theory of, 的理论, 34 ; 亦可参见 late capitalism, 晚期资本主义

capitalist industrialization, 资本主义工业化, 97, 194, 241, 253, 256

capitalist production, 资本主义的生产 ; decline of, 衰退, 367—368 ; human labor and, 人类劳动与, 203 ; material process of production, 物质生产过程, 252 ; Nature and, 自然与, 411 ; negation and, 否定与, 90 ; new material for growth, 发展新材料, 4 ; potential within, 的潜能, 53—54 ; socialist freedom link, 与社会主义的自由的联系, 95 ; socialist productivity within, 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力, 129 ; unnecessary work in, 资本主义生产中非必要的工作, 393

Carr, E. H.,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75, 78—80

Castro, Fidel, 菲德尔·卡斯特罗, 154, 269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会, 118

*Central European Democracy and Its Background* (Schlesinger 2003), 《中欧的民主及其背景》(施莱辛格, 2003年), 80—81

Central European revolutions, 中欧革命, 84, 97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民主制度研究中心, 175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 154

China, 中国, 113, 206, 366—367, 425

Chinese Revolution, 中国革命, 258, 269

Christian Humanism, 基督教的人道主义, 278

Christianity, 基督教, 108, 138, 281—282, 345

civil disobedience, 非暴力地反抗, 290, 293, 389

civil liberties, 公民自由, 159, 289—297

civil rights movement, 民权运动, 55, 272, 388

Civil society, 市民社会, 94

Civil War, 美国内战, 309—311, 313

class consciousness, 阶级意识; changes to, 的改变, 353; 定义来自 407—408; democracy and, 民主与, 200; function in dialectical process, 在辩证过程中的功能, 150—151, 243; Marxian theory and, 马克思理论与, 236; of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的, 84; rebellious subjectivity and, 反叛的主体性与, 408—409; of working classes, 工人阶级的, 197; 亦可参见 bourgeois society, 资产阶级社会; 和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

class struggles, 阶级斗争, in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发达工业国家的阶级斗争, 170; aspirations of class society, 阶级社会的抱负, 198; class-consciousness, 阶级意识, 151; collapse of capitalism and, 资本主义的崩溃与, 191; Feudalism and, 封建主义与, 118; for material things, 为了争取物质事物, 127;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 3; 亦可参见 working class, 工人阶级

Cold War, 冷战, 10, 36, 38, 40, 183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Marcuse 1998), 《赫伯特·马尔库塞文集》(马尔库塞, 1998年), 10

collective worker concept, 集体工人概念, 406—408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113, 175, 224, 328, 389

Comintern policy, 第三国际政策, 80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 159

Communes, 公社, 58—59, 390—391

Communism, 共产主义; anti-communism, 反共产主义, 35—36, 38, 41, 430; capitalism vs., 资本主义与, 175, 195; development of, 的发展, 77; domination and control in, 的支配与控制, 4; Eurocommunism, 欧洲共产主义, 394—395;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的历史发展, 98; Marx's reflections on,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反思, 33; real potentialities of, 的真实潜能, 76; recent literature on, 近来的共产主义文献, 74—82, 355—358; soviet communism, 苏联共产主义, 35—36, 35页脚注; transition to, 向共产主义过渡, 91, 215—216; US fight against, 美国与共产主义战斗, 153

*Communist Manifesto* (Marx 1848),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 1848年), 70, 303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 communist unions and, 共产主义联盟与, 285; composition of, 的成分, 77;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意大利共产党, 361—

368 ; liberalizing trends, 自由化趋势, 37—38, 40 ; role of, 的地位, 88 ; world outlook of, 的世界观, 86

compensatory interests, 补偿的兴趣, 8, 398—401, 404, 407—410

competitive market society, 竞争性的市场社会, 51, 359

“Conclusions on Science and Society” (Marcuse 1969), 《论科学和社会》(马尔库塞, 1969年), 217—218

concrete utopia, 具体的乌托邦, 44, 396, 408

the Congo, 刚果共和国, 328

Congress on the Dialectics of Liberation, 解放的辩证法研讨会, 331

consciousness, 意识; development of, 的发展, 257 ; identity of, 的统一, 141 ; liberation of, 的解放, 258, new consciousness, 新意识, 384—385, 389—390 ; radical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激进的政治意识, 198 ;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革命意识, 94—97, 102, 223 ; subaltern consciousness, 底层意识, 401, 403 ; surplus consciousness, 剩余意识, 7—9, 57, 116, 393, 398—400 ; 亦可参见 class consciousness, 阶级意识

conservatism, 保守主义, 218, 220, 293, 408, 415

continuum of progress, 进步的连续性, 249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arx 1859),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 1859年), 100

“A Conversation with Herbert Marcuse: On Pluralism, Future, and Philosophy” (Marcuse 1979), 《关于多元主义、未来以及哲学对话赫伯特·马尔库塞》(马尔库塞, 1979年), 416—422

Copley Newspaper, 《科普利报》, 346—347

council organization system, 协商组织制度, 401

countereducation practice, 反向教育实践, 50, 59—60, 66—67, 361, 390

counterrevolution, 反革命, 217, 242 ; 亦可参见 Marxism, in era of counter-revolution, 反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Marcuse 1972), 《反革命和造反》(马尔库塞, 1972年), 51, 336 页脚注

counter violence, 以暴制暴, 270, 272, 275, 289, 295, 299

critical social theory, 批判社会理论, 1, 9, 12, 347



-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社会批判理论, 2, 11 页脚注, 12, 20
- Critique of Violence* (Benjamin 1964), 《暴力批判》(本雅明, 1964 年), 123—127
- Cuba, 古巴, 206, 366
- Cuban Revolution, 古巴革命, 258, 297
- Cuba protest meeting, 古巴抗议集会, 9 ; defamed minority, 遭诽谤的少数者, 158—159, funeral of Democracy, 民主的葬礼, 157—160 ; introduction, 引言, 153—157 ; McCarthyism and, 麦卡锡主义与, 160 ; procedural facts, 程序上的事实, 158 ; weapon of slander, 作为武器的口头中伤, 159—160
- cultural progress, 文化进步, 109
- cybernetics and computers, 控制论和计算机, 252, 327
- Czechoslovakia invasion (1968), 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1968), 40, 273

## D

- d' Ailly, Pierre, 彼得·大利, 118
- Davis, Angela, 安吉拉·戴维斯, 9, 11, 213—217
- defamed minority, 遭诽谤的少数者, 158—159
- definite negation, 有规定的否定, 113, 190, 200, 204, 421
- democracy, 民主 ; bourgeois society and, 资产阶级社会与, 394, 424, 426 ;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阶级意识与, 200 ; educational system and, 教育制度与, 409 ; funeral of, 的葬礼, 157—160 ; liberal democracy, 自由民主, 211, 290, 291, 369, 384, 426 ; mass democracy, 大众民主, 46, 98 ; as preparation for socialism, 是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 102 ; Social Democracy, 社会民主党, 80, 81, 177 ;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社会民主党, 13, 81, 177, 316—317 ; of utopia, 乌托邦的, 358
- democratic pluralism, 民主多元主义, 171—173
- Der 18.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Marx 1965),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 1965 年), 117—122
- de-Stalinization, 去斯大林化, 39, 182
- Deutscher, Isaac, 艾萨克·多伊彻, 39
- Dialectical Logic, 辩证逻辑, 91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辩证唯物主义; fundamental thesis, 基本命题, 21—23; material basis in, 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基础, 130; as metaphysical rest, 被视为形而上学的残余, 100; as series of general assumptions, 表现为一系列的一般性假设, 86—87

dialectical theory of revolution, 辩证的革命理论, 6—7

dialectics, 辩证法;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 85; concept of, 的概念, 130; history of, 的历史, 132—152; logic in Marxism and 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与, 82—93;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唯物辩证法, 149—151; paradoxical character of, 悖谬性, 132—133; Plato and Aristotle,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134—136; Stoics and Plotinus, 斯多葛学派与普罗提诺, 136—138; systematic portrayal of, 的系统描述 134; Transcendental Dialectic, 先验辩证论, 139—140; of Zeno, Sophists, Socrates, 芝诺、智者、苏格拉底的, 132—134

Dialectics of Liberation conference, 解放的辩证法研讨会, 53

*Dialectics of Nature* (Engels 1883), 《自然辩证法》(恩格斯, 1883年), 87

“Discussion Between Herbert Marcuse and Peter Merseburger” (Marcuse 1968), 《赫伯特·马尔库塞与彼得·梅塞堡之间的讨论》(马尔库塞, 1968年), 264—269

domination system, 统治体系, 162, 400—402

Dominican Republic, 多米尼加共和国, 154, 328

Dualism, 二元论, 22, 45

Dunayevskaya, Raya, 拉亚·杜娜叶夫斯卡娅, 61页脚注, 98—103, 301—315

Dutschke, Rudi, 鲁迪·杜切克, 58, 281, 298, 334—338

Dykstra, Bram, 布莱姆·戴克斯特拉, 376—377, 376页脚注

Dylan, Bob, 鲍勃·迪伦, 348

## E

Eastern European Marxists, 东欧马克思主义者, 26页脚注

ecology concerns, 生态学问题, 350—351, 375, 411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Marx 184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 1844年), 23—29, 31—34, 344

- economism, 经济主义, 28, 75, 84
- economy of time, 时间经济, 399—400
- Edomites, 以东人, 345
- educational system, 教育制度; of African Americans, 非洲裔美国人的, 79 ;  
countereducation practice, 反向教育实践, 50, 59—60, 66—67, 361, 390 ; de-  
mocracy and, 民主与, 409; neoliberal educational reform, 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  
4 ; reform, 改革, 7, 409
- Ego and Id, 自我与本我, 414
- Egypt, 埃及, 64—66
- emancipated society, 解放了的社会, 2, 5, 33, 264 页脚注
- “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 in a Repressive Society” (Marcuse 1962), 《压抑  
性社会中的妇女解放》(马尔库塞, 1962 年), 161—169
- emancipatory socialism, 解放的社会主义, 44—45, 48
- “The End of Utopia” (Marcuse 1967), 《乌托邦的终结》(马尔库塞, 1967 年),  
249—263
- Engels,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87, 96, 104, 253
- England, 英格兰, 311, 331, 366, 377
- English pop movement, 英语国家爆发的运动, 254
- Enzensberger, Hans Magnus,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 61, 63
- Eros and Civilization* (Marcuse 1955), 《爱欲与文明》(马尔库塞, 1955 年),  
10, 42, 161, 180, 323, 368
- eschatological speculation, 末世论的沉思, 105
- An Essay on Liberation* (Marcuse 1969), 《论解放》(马尔库塞, 1969 年), 3,  
43, 210—211, 384
- the Establishment 当权派, 299, 351—352, 361
- ethics of self-care, 自我关照的伦理, 6 页脚注, 52 页脚注
- Eurocommunism, 欧洲共产主义, 394—395
- European New Left, 欧洲新左派, 279—281
- exchange value, 交换价值, 5, 67, 72—73, 189, 192, 235
- 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 (Sartre 1946),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  
特, 1946 年), 279

**F**

Factory Act, 工厂立法, 54

Farr, Arnold, 阿诺德·法尔, 11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American style of, 美国式的, 50, 361; communism and, 共产主义与, 79; counterrevolution and, 反革命与, 217, 242; defeat of, 的失败, 94; 定义来自 379; destructive character structure and, 毁灭性的人格结构与, 410; equalization of, 的同等化, 289; German fascism, 德国法西斯主义, 13—14, 316; new form of, 新的法西斯主义形式, 362, 363; during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127; struggle against, 与法西斯主义斗争了起来, 345; as stunned, 感到震惊, 126; triumph of, 的胜利, 64

feminist movement, 女权运动, 367, 378, 417, 421

fetishism, 女权主义, 17, 402, 408, 414—415

Fetscher, Iring, 依林·费切尔, 25 页脚注

Feudalism, 封建主义, 118, 149

Fichte, Johann Gottlieb,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 138—147

Five Year Plans of Russia, 俄罗斯的五年计划, 304

food sovereignty movement, 食品独立运动, 58

Ford, Gerald, 杰拉德·福特, 112, 114

Formal Logic, 形式逻辑, 91—92

Foucault, Michel, 福柯, 52 页脚注

Fourier, Charles, 夏尔·傅立叶, 48, 126, 184, 253—254

Frankfurt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 10, 11 页脚注, 17, 420

Freedom, 自由; capitalist production link, 资本主义生产与自由的关系, 95; of choice, 选择自由, 168; leap into, 跃入, 115; liberal ideas of, 自由主义的自由理念, 341; limits of, 的限度, 219—221; Reason and Freedom, 理性与自由, 94—95, 98, 232; structure of, 的结构, 89—90; in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统治下的自由, 46, 94; unfreedom, 不自由, 45, 97, 107, 125, 264, 398; 亦可参见 human freedom, 人的自由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革命, 232, 268, 302, 426

Freud, Sigmund,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07, 109, 169, 259

*From Lenin to Malenkov* (Seton-Watson 1953), 《从列宁到马林科夫》(希顿-沃森, 1953年), 79

für sich, 自为的, 定义来自 197

Furth, Peter, 彼特·弗思, 161—169

## G

Garaudy, Roger, 罗杰·加罗蒂, 282

German communism, 德国共产主义, 81—82

German fascism, 德国法西斯主义, 13—14, 316

German idealism, 德国唯心主义, 34, 137, 141, 232

German Revolution, 德国革命, 123, 428—429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德国社会民主党, 80, 81

Germany, 德国, 80, 167, 272—273, 298

Ghana, 加纳, 328

ghetto violence, 贫民区暴力, 298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110

Goldman, Nachum, 纳祖姆·戈德曼, 354

Goodwin, Richard, 理查德·古德温, 371

Gorz, Andre, 安德烈·高兹, 46 页脚注, 63

Gramsci, Antonio, 安东尼奥·葛兰西, 116

“great refusal”, 大拒绝, 5, 12, 50

Greece, 希腊, 58, 214

*Grundrisse* (Marx 1939), 《大纲》(马克思, 1939年), 45, 252

Guatemala, 危地马拉, 154

Guattari, Félix, 菲力克斯·迦塔利, 66

## H

Habermas, Jürgen, 尤尔根·哈贝马斯, 62, 286, 338—339, 421

Haiti, 海地, 154, 314

Haraway, Donna, 唐娜·哈拉维, 4

Hardt, Michael, 迈克尔·哈特, 2, 57, 65—66, 65 页脚注

Hayden, Tom, 汤姆·海登, 426—427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bourgeois society and, 资产阶级社会与, 130; dialectics and, 辩证法与, 138—139, 142—148; idealism, 唯心主义, 28; identity between thought and its object, 思维与其对象的同一性, 85—86; philosophy, 哲学, 1, 10, 26, 129—130, 304; theory of alienation, 异化理论, 29—30

Hegelian Marxian distinction, 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分, 20

Heidegger, Martin, 马丁·海德格尔, 14—15, 19, 322, 420

“Herbert Marcuse: Philosopher of the New Left” (Marcuse 1968), 《赫伯特·马尔库塞: 新左派哲学家》(马尔库塞, 1968年), 270—277

“Herbert Marcuse in 1978: An Interview” (Malinovich 1981), 《1978年访赫伯特·马尔库塞》(马里诺维奇, 1981年), 368—391; communes, 公社, 390—391; eros and civilization, 爱欲与文明, 371—376; introduction, 引言, 368—371; miscellaneous topics, 其他话题, 389—390; One-Dimensional Man criticism, 评《单向度的人》, 376—378; “Repressive Tolerance” criticism, 评《压抑的宽容》, 379—385; student revolution/movement, 学生革命/运动, 385—387; on terrorism, 论恐怖主义, 387—389

“Herbert Marcuse Lead by Bill Ritter” (Ritter 1977), 《比尔·里特访赫伯特·马尔库塞》(里特, 1977), 422—431

Hilferding, Rudolf, 鲁道夫·希法亭, 188, 237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历史唯物主义; application of, 的运用, 55; dialectic of, 的辩证法, 243; discussion over meaning of, 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 24; force of personality, 个性的力量, 70; messianic immobilization, 弥赛亚式的固定化, 126; representative articles on, 代表性的文章, 83; as sociology, 作为社会学, 71; in Soviet Marxism, 苏联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唯物主义, 87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ukács 1971), 《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 1971年), 13, 17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 (Carr 1950), 《苏维埃俄国史》(卡尔, 1950年), 75, 78—80

Ho Chi Minh, 胡志明, 430

Holism, 整体论, 146

Holland, 荷兰, 366, 389

Holloway, John, 约翰·霍洛威, 2

Homo economicus, 经济人, 7

Horkheimer, Max, 马克斯·霍克海默, 35, 300—301, 330, 339

Hughes, Stuart, 斯图亚特·休斯, 156

human freedom, 人的自由; background of, 的背景, 320; consciousness of, 的意识, 180; decline of, 的减少, 317; 定义来自 279; early notions of, 的早期观点, 184; historical potentialities of, 的历史潜能, 316; increase in, 促进自由, 46—47, 150; materialistic dialectic, 唯物辩证法, 152; practical power of, 的实践力量, 140

humanism, 人道主义; as concrete social force, 变成具体的社会力量, 131; as historical fact, 当成了历史事实, 100—101; libertarian humanism, 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 345; of Marxism, 马克思主义的, 307; Marxist Humanism, 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278; Marx' s reflections on, 马克思对人道主义的反思, 33, 302; New Humanism, 新人道主义, 302—305, 311; Renaissance Humanism, 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 278; socialism and, 社会主义与, 112—117; “Socialist Humanism”,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180—188; study of, 的研究, 106—117; “Varieties of Humanism”, 《人道主义诸变体》, 277—283

human liberation, 人的解放, 19, 27—28, 46—47, 99, 111

human potentialities and needs, 人的潜能和需要, 30

Hungarian Revolution, 匈牙利革命, 159

## I

Idea, 理念、观念; absolute Idea, 绝对理念, 150; of man, 人的, 184; in Marxian theory, 马克思理论中的, 178, 184, 188; Reality and, 现实与, 85, 134—135; universal form of, 的普遍形式, 147

identity, 统一、同一性; of consciousness, 意识的, 141; as inseparable difference, 不曾分离的区别, 141; instinctual drives in, 本能驱力, 419; Marxian concept of, 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概念, 192, 240; objective identity, 客观同一性,

144, 146, 183 ; principle, 原理, 142 ; between proletariat and the universal interest, 无产阶级和普遍利益之间的, 402 ; shaping of, 塑造, 4 ; of socialism, 社会主义的, 185 ; between thought and its object, 思维与其对象的同一性, 85—86

*Ideology and Utopia* (Mannheim 1936),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曼海姆, 1936年), 20

immization category, 贫困化范畴, 61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99, 188, 287, 353, 369

India, 印度, 58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270, 328, 428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化(工业革命), 253, 260, 304, 320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息技术, 9, 58, 327

Inkeles, Alex, 艾利克斯·英克尔斯, 319—321

instinctual structure and revolution, 本能的结构与革命, 410—415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社会研究所, 34—36, 316

institutionalized violence, 体制性暴力, 295—296

intellectual intuition, 智的直觉, 138

intelligentsia, 知识分子; communists and, 共产主义者与, 401 ; frustration with, 的挫败感, 79 ; fulfilling function of, 发挥功能, 409 ; late capitalism and, 晚期资本主义与, 406—408 ; left-wing intelligentsia, 左翼知识分子, 253 ; the masses and, 群众与, 248 ; middle-class intelligentsia, 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202, 210 ; militant intelligentsia, 斗志昂扬的知识分子, 204 ; opposition among, 知识分子中的反对者, 205, 243 ; privilege of, 的特权, 361, 400 ; protosocialism and, 初期社会主义与, 399—400 ; radicalism and, 激进主义与, 194—195, 242 ; role of, 的作用, 257, 399 ; student intelligentsia, 学生知识分子, 198, 255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内在矛盾; in affluent society, 富裕社会的, 242 ;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 56, 91, 96, 114, 194, 200, 203, 357, 363 ; concept of revolution, 革命概念, 206 ; 定义来自 231 ; Marxian theory and, 马克思理论与, 229, 356 ; negating forces, 否定的力量, 55 ; neo-colonial domination, 新殖民统治, 205 ; organization of, 的组织, 91, 98 ; stabilization of, 稳定化, 3



International Herbert Marcuse Society, 国际马尔库塞学会, 10—11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国际社会主义, 169, 185

“Interview with Pierre Viansson-Ponte” (Marcuse 1969), 《比耶尔·维扬松—蓬德访马尔库塞》(马尔库塞, 1969年), 297—299

Israel, 以色列, 281, 390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意大利共产党, 361—368

Italy, 意大利, 58, 177, 193, 284

## J

Jansen, Peter-Erwin, 彼得—欧文·詹森, 338 页脚注

Jews (Judaism), 犹太人 (犹太教), 353—354

Judeo-Christian morality, 犹太—基督教道德, 251

## K

Kant, Immanuel, 伊曼努尔·康德, 138—141, 146

Kantian foundation for Marxism, 把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康德基础上, 18

Kantian philosophy, 康德哲学, 71

*Karl Marx: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Vorländer 1929), 《卡尔·马克思生平及其著述》(福尔伦德, 1929年), 69—72

Kellner, Douglas, 道格拉斯·凯尔纳, 10, 32 页脚注, 38, 67, 116

Kennedy, John F. (administration), 约翰·肯尼迪 (政府), 39, 314 页脚注

Kerr, Clark, 克拉克·科尔, 156

Khrushchev, Nikita (administration), 尼基塔·赫鲁晓夫 (政府), 38—40

King, Martin Luther, Jr., 马丁·路德·金, 272

Kirchheimer, Otto, 奥托·基希海默, 36

Kissinger, Henry, 亨利·基辛格, 332—334

Klein, Herbert G., 赫伯特·克莱恩, 333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KPD), 德国共产党, 13—14

Korsch, Karl, 卡尔·科尔施, 13, 15, 22, 35

Kosik, Karel, 卡莱尔·科西克, 322—323

Kugelmann, Ludwig, 路德维希·库格曼, 310 页脚注

Ku Klux Klan, 三 K 党, 423

## L

labor, 劳动、工人; abstract labor time, 抽象劳动时间, 73, 237, 405 ; capitalist production, 资本主义生产, 203 ; metaphysics of, 的形而上学, 31 页脚注; militant labor movement, 激进的工人运动, 359 ; organization of, 的组织, 249 ; philosophy of socialism, 社会主义哲学, 33 ; process of, 劳动过程, 48 ; productivity of, 劳动生产率, 97 ; saving of labor time, 节约劳动时间, 101—102 ; wage labor, 雇佣劳动, 61—62, 125, 309 ; 亦可参见 alienated labor, 异化劳动; non-alienated labor, 非异化劳动;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 working class, 工人阶级

labour aristocracy, 工人贵族, 74 页脚注, 75, 81, 96, 174—175, 190, 224, 238

Lamas, Andrew, 安德鲁·拉马斯, 11

Laos, 老挝, 155, 335, 350

late capitalism, 晚期资本主义; achievement of, 的成就, 342 ; developments of, 的发展, 128, 130—131 ; introduction , 引言, 5—8 ; possible freedom of, 的潜在自由, 162 ; problems with, 的问题, 55 ; production of, 的生产, 393—394 ; proletariat and, 无产阶级与, 62 ; working class and, 工人阶级与, 392 ; 亦可参见 “Protosocialism and Late Capitalism: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Based on Bahro’ s Analysis”, 《初期社会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 基于巴罗分析之上的一种理论综合》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58, 154, 288, 345

Lazzarato, Maurizio, 毛里齐奥·拉扎拉托, 57

leap into freedom, 跃入自由, 115

left-wing intelligentsia, 左翼知识分子, 253

left-wing political movements, 左翼政治运动, 19, 216

Leiss, William, 威廉姆斯·莱斯, 370

“Le Monde Diplomatique” (Marcuse 1976), 《世界外交论衡》(马尔库塞, 1976 年), 358—361

Lenin,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列宁; death of, 逝世, 312; economism, 经济主义, 75, 84; instinctual structure and, 本能结构与, 413; labor aristocracy, 工人贵族, 81; theory of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理论, 188; Vanguard Theory, 先锋理论, 304

Leninism, 列宁主义; beginnings of, 开始, 79; capitalism and, 资本主义与, 84; Communist Party and, 共产党与, 17; interplay between theory and reality, 理论和现实之间的相互影响, 102; Marxian theory and, 马克思理论与, 96, 303, 321; Marxism-Leninism, 马克思列宁主义, 37, 40, 366, 406; Stalinism and, 斯大林主义与, 84, 102—103

“Letter to Max Horkheimer” (Marcuse 1942), 《致马克斯·霍克海默》(马尔库塞, 1942年), 300—301

liberal democracy, 自由民主, 211, 290, 291, 369, 384, 426

liberation, 解放; African American movements of, 非裔美国人的解放运动, 50; from alienated labor, 从异化劳动中, 252; Communist Party trends, 共产党的发展趋势, 38, 40; of consciousness, 意识的, 258; human liberation, 人的解放, 19, 27—28, 46—47, 99, 111; oppression vs., 压制与, 371; personal and social liberation, 个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 351—352; self-liberation, 自我解放, 146;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妇女解放运动, 163, 378, 417

Libya, 利比亚, 64, 66

Lichtheim, George, 乔治·里希特海姆, 104—105

limits of freedom, 自由的限度, 219—221

limits of growth, 增长极限, 113

living standards and war, 生活标准与战争, 109

London Central Committee, 伦敦中央委员会, 120

Löwenthal, Leo, 利奥·洛文塔尔, 36, 330—332

Lubasz, Heinz, 海因茨·卢巴兹, 63 页脚注

Lukács, Georg, 格奥尔格·卢卡奇, 13, 15, 22, 55

Luxemburg, Rosa, 罗莎·卢森堡, 32, 32 页脚注, 188, 307 页脚注, 429

## M

McCarthy, Eugene, 尤金·麦卡锡, 271—272

McCarthy, Timothy, 蒂莫西·麦卡锡, 63

McCarthyism, 麦卡锡主义, 10, 36, 160, 314, 330

Malinovich, Myriam Miedzian, 米利亚姆·米德成·马里诺维奇, 368—391

Mallet, Serge, 瑟奇·马里特, 177, 262

Man and Nature, 人与自然, 85

Mannheim, Karl, 卡尔·曼海姆, 20, 43

Maoists/Maoism, 毛主义者/毛主义, 297, 416

Marcuse, Herbert, 赫伯特·马尔库塞; Brandeis Farewell Lecture, 布兰迪斯的告别演讲, 235—248;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社会批判理论, 2, 11 页脚注, 12; Dunayevskaya, Raya, correspondences, 致拉亚·杜娜叶夫斯卡娅, 301—315; encounter with Marxism, 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 13—18;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历史唯物主义, 18—23; humanism, 人道主义, 106—117;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Manuscripts of 1844, 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 23—29; introduction, 引言, 1—12; Löwenthal, Leo, correspondences, 致利奥·洛文塔尔, 330—332; Marxian anthropology, 马克思的人类学, 21, 29—34; Marxism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历史, 60—68; neoliberal subjectification, 新自由主义的主体化, 49—60; phenomenological existentialism, 现象学的存在主义, 14—15, 19—23; philosophical views of, 的哲学观点, 416—422; safety and privacy concerns, 出于安全与隐私的考虑, 208—209; utopia, technology and socialism, 乌托邦、技术与社会主义, 42—49

Marcuse, Inge S., 英格·马尔库塞, 208—209, 390 脚注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biography of, 的传记, 69—72; capitalist production, 资本主义生产, 53—55; dialectic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辩证法, 85; dialectics, meaning of, 辩证法的意义, 147—152; doctrines of, 的学说, 312; humanism, 人道主义, 100—101; *Manuscripts of 184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3—29; materialism, 唯物主义, 21 页脚注; materi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唯物史观, 88—89

“Marx and para-Marx on Capitalist Contradictions” (Marcuse 1955), 《论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与准马克思》(马尔库塞, 1955), 353—358

Marxian anthropology, 马克思的人类学, 21, 29—34

Marxian concept of revolution, 马克思的革命概念, 32, 205—206; 另参见

“Re-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Revolution”, 《对革命概念的再考察》

Marxian interventions, 马克思主义的介入; “Angela Davis and Herbert Marcuse”, 《安吉拉·戴维斯与赫伯特·马尔库塞》, 212—217; “Conclusions on Science and Society”, 《论科学和社会》, 217—218; Cuba protest meeting, 古巴抗议集会, 153—161; “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 in a Repressive Society”, 《压抑性社会中的妇女解放》, 161—169; FBI Report on an Essay on Liberation, 《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论解放〉的报告》, 210—211; Inge Marcuse, letter, 英格·马尔库塞致信, 208—209; “The Obsolescence of Marxism”, 《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188—195; “Rat Marcuse”, 《鼠辈马尔库塞》, 207; “Re-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Revolution”, 《对革命概念的再考察》, 199—206; “Revolutionary Subject and Self-Governance”, 《革命主体与自治》, 196—199; “Socialism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 169—180; “Socialist Humanism”,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180—188; “The True Nature of Tolerance”, 《宽容的真实本性》, 218—221

Marxian philosophy, 马克思哲学, 1, 10, 17—18, 20, 75, 321

Marxian proletariat,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 84, 95, 115, 255

Marxian taboos, 马克思的禁忌, 42, 44

Marxian theory, 马克思理论; abandonment of, 抛弃了, 280; advance of, 的进步, 415; analysis of capitalism, 对资本主义的分析, 232; codification of, 编纂, 88; development of, 的发展, 5—6, 104; deviation from, 背离, 82; dialectic of Negativity, 否定性的辩证法, 128—131; hypotheses within, 的假设, 113; Idea in, 的观念, 178, 184, 188;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nd, 内在矛盾与, 229, 356; as international, 国际性的, 93; Leninism and, 列宁主义与, 321; modifications in, 的修正, 99—103; orthodox Marxism,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23, 88, 92, 403; as refuted, 被驳倒了, 229—231; repression of,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被压抑的要素, 343; as ritualized ideology, 成了仪式化的意识形态, 337; three types of societies and, 三种社会与, 193; as world outlook, 成了世界观, 86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as answer, 马克思主义的回应, 224—229; application of, 的运用, 53; areas of corroboration, 确证的领域, 224; classical Marxism, 经典马克思主义, 259; contemporary history, 当代历史, 60—68; dialectic and logic in, 的辩证法与逻辑, 82—93; method of, 的方法, 73; obsolescence

of, 过时了, 188—195 ; orthodox Marxism, 正统马克思主义, 23, 88, 92, 403 ;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to, 的哲学维度, 18 ; recent literature on communism, 近来的共产主义文献, 74—82 ; value and exchange value, 价值与交换价值, 72—73 ; Vorländer, Karl, opinion on, 卡尔·福尔伦德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69—72

*Marxism: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 (Lichtheim 1962), 《马克思主义: 历史的批判研究》(里希特海姆, 1962年), 104—105

Marxism, in era of counterrevolution, 反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 ; Arab-Israeli wars, 阿拉伯—以色列战争, 353—4 ; ecology concerns, 生态学问题, 350—351 ; economic growth and, 经济增长与, 365 ; “Le Monde Diplomatique” (Marcuse 1976), 《世界外交论衡》(马尔库塞, 1976年), 358—361 ; “Marx and para-Marx on Capitalist Contradictions”, 《论资本主义的矛盾: 马克思与准马克思》, 353—358 ; “Marxism and the New Humanity: an Unfinished Revolution”, 《马克思主义与新人性: 一场未竟的革命》, 340—345 ; music and, 音乐与, 347—349 ; New Culture, 新文化, 349—350 ; personal and social liberation, 个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 351—352 ; radical religion and, 激进的宗教与, 345 ; Street Journal & San Diego Free Press, interview, 《〈街报〉和圣迭戈自由出版社访马尔库塞》, 346—354 ; the University and, 大学与, 347 ; working class concept, 工人阶级概念, 352—353

*Marxism and Freedom: From 1776 Until Today* (Dunayevskaya 1957),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 从1776年到今天》(杜娜叶夫斯卡娅, 1957年), 61页脚注, 98—103, 302

*Marxism and Philosophy* (Korsch 1970),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科尔施, 1970年), 13

“Marxism and the New Humanity: an Unfinished Revolution” (Marcuse 1969), 《马克思主义与新人性: 一场未竟的革命》(马尔库塞, 1969年), 340—345

“Marxism Confronts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Marcuse 1964), 《马克思主义与发达工业社会的相遇》, 222—235

Marxism-Leninism, 马克思列宁主义, 37, 40, 366, 406

Marxist Humanism, 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278

Marxist theory of monopoly capitalism, 马克思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 175

- Marxist theory of revolution, 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5—6, 15 页脚注
- mass democracy, 大众民主, 46, 98
- materialism, 唯物主义; 参见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历史唯物主义
-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唯物辩证法, 149—151
- materi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唯物史观, 88—89
- Memorial Meeting on the Warsaw Ghetto, 华沙集中营的追悼会, 158
- Merleau-Ponty, Maurice, 梅洛-庞蒂, 35, 181
- Merseburger, Peter, 彼得·梅塞堡, 264—269
- metaphysics of labor, 劳动的形而上学, 定义来自 31 页脚注
- Mexico, 墨西哥, 58
- Middle Ages, 中世纪, 137, 138, 144
-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 growth of, 不断增长的, 352; intelligentsia, 知识分子, 202, 210; lower middle class 中下阶层, 362; redistribution of wealth from, 财富再分配, 3; reduction of, 的减少, 223, 236; 另参见 bourgeois society, 资产阶级社会
- militant labor movement, 激进的工人运动, 359
- Mill, John Stuart,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7, 105
- Miller, Karl, 卡尔·米勒, 324—329
- Mintz, Norbert, 诺伯特·明茨, 155
- Mitchell, Juliet, 朱丽叶·米切尔, 374
- monopoly capitalism, 垄断资本主义, 175, 215, 352
- Moore, Barrington, Jr., 巴林顿·摩尔, 77—78
- moral-sexual rebellion, 道德—性反叛, 255
- More, Thomas, 托马斯·莫尔, 2
- moronization, 痴愚化, 371, 377—378, 388

## N

- National Socialism, 民族社会主义, 81, 94, 315
- Nazism (Nazi movement), 纳粹主义 (纳粹运动), 322, 377, 382, 430
- negation, 否定; of bourgeois society, 资产阶级社会的, 407;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 95, 249; capitalist production and, 资本主义生产与, 90; definite

negation, 有规定的否定, 113, 190, 200, 204, 421 ; of the negation, 否定的, 90, 129—131 ; power of, 的力量, 299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Marcuse 1968), 《否定: 批判论文集》(马尔库塞, 1968年), 45

Negativity, 否定性; dialectic of, 的辩证法, 128—131, 149 ; final blessing of, 的最后的祝福, 148 ; movement of reality, 现实的运动, 144 ; of the old, 旧的, 146 ; power of, 的力量, 94—95, 97 ; as precondition of improvement, 是改善的先决条件, 111 ; subjectivity of, 的主体性, 145

Negri, Antonio, 安东尼奥·奈格里, 2, 57, 65—66, 65 页脚注

neo-imperialism, 新帝国主义, 216 ; 239

neoliberal capitalism,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 3, 7, 12, 67

neoliberal educational reform, 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 4

neoliberal subjectification, 新自由主义的主体化, 49—60

neo-Nazi movement, 新纳粹运动, 382

Neumann, Franz, 弗兰茨·纽曼, 36, 315—318

new concept of revolution, 新的革命概念, 406—408

new consciousness, 新意识, 384—385, 389—390

New Culture, 新文化, 49, 346, 349—350

New Humanism, 新人道主义, 302—305, 311

New Left movement, 新左派运动; critics of, 的批评人士, 37, 270—277 ; escapist movements in, 逃避主义运动, 412 ; industrial society and, 工业社会与, 267 ; liberation and, 解放与, 210 ; Marcuse, Herbert, involvement in, 赫伯特·马尔库塞卷入了, 334, 346 ; opposition to Marxism, 反对马克思主义, 341 ; in revolt, 起义, 279—280 ; Vietnam war and, 越南战争与, 264

Newtonian physics, 牛顿的物理学, 139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155, 387

Nigeria, 尼日利亚, 328

Nixon, Richard (administration), 理查德·尼克松, 55, 112, 271—272, 333, 350

Nomos (norm), 规范, 187

non-alienated labor, 非异化劳动; creative activity, 创造性活动, 402 ;



Marxian distinction,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非异化工作的区分, 192 ; pre-industrial concept, 前工业的概念, 244 ; self-fulfilling, 自我实现, 45, 47—48  
 nonantagonistic contradictions, 非对抗性的矛盾, 83, 85, 90  
 normative concept of non-alienated human being, 规范性的非异化的人的概念, 19

○

Obama, Barack, 巴拉克·奥巴马, 7  
 objectification concept, 对象化概念, 28, 28 页脚注  
 objective identity, 客观同一性, 183  
 “The Obsolescence of Marxism” (Lobkowitz 1967), 《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洛克维茨, 1967 年), 188—195  
 “Obsolescence of Socialism” (Marcuse 1965), 《社会主义过时了》(马尔库塞, 1965 年), 235—248  
 Occupy movements, 占领运动, 2, 11, 64  
 Oedipal complex, 俄狄浦斯情结, 374  
 “On Changing the World: a Reply to Karl Miller” (Marcuse 1967), 《论改变世界: 对卡尔·米勒的回应》(马尔库塞, 1967 年), 324—329  
*One-Dimensional Man* (Marcuse 1964), 《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 1964 年); capitalism and, 资本主义与, 51, 53 ; communism in, 对共产主义的看法, 367 ; consciousness in workforce, 工人意识, 116 ; criticism of, 对《单向度的人》的批评, 376—378 ; end of utopia, 乌托邦的终结, 43 ; liberation and, 解放与, 48 ; negation and, 否定与, 299 ; review of, 的书评, 324—325 ; socialist humanism,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180 ; subject analysis of, 的主题分析, 165 页脚注; trends in, 的倾向, 40—41  
 ontological-essentialist tendencies, 本体论—本质主义的倾向, 30—31  
 oppression, 压抑、压迫; alienated labor and, 异化劳动与, 388 ; alternatives to, 替换, 6 ; under capitalism, 资本主义下, 32 ; criticism of, 的批判, 10, 32, 162 ; development of, 的发展, 290 ; happiness and, 幸福与, 125 ; liberation vs., 解放与, 371 ; racial oppression, 种族压迫, 57, 59, 61 ; revolutionary forces in, 的革命力量, 61—62, 66 ; sexual oppression, 性别压迫, 57, 61 ; struggle

against, 反抗, 58, 213—215, 261—262, 344 ; of women , 对妇女的, 162—163

Oriental despotism, 东方专制主义, 78

orthodox Marxism, 正统马克思主义, 23, 88, 92, 403

## P

Pacifism, 和平主义、反战主义, 124, 247, 264, 349

Paris Commune (1871), 巴黎公社 (1871 年), 63, 122, 303

parliamentary regime, 议会制, 118—119

peace economy, 和平经济, 287

“people power” movements, “人民权力”运动, 65

People’ s Commune, 人民公社, 346

pernicious unity of antitheses, 对立各方的恶性联合, 170

personal and social liberation, 个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 351—352

petit-bourgeois morality, 小资产阶级的道德, 71, 257, 401, 405, 407

phenomenological existentialism, 现象学的存在主义, 14—15, 19—23

Philippines, 菲律宾, 113

Phillips, Wendell, 温德尔·菲利普斯, 309—310, 310 页脚注

Piani, Gianguido, 詹圭多·皮安尼, 361—368

planned obsolescence, 计划报废; economic surplus and, 经济剩余与, 242 ;  
elimination of, 消除, 344 ; by military establishment, 军工企业造成的, 194 ;  
poverty and, 贫困与, 233 ; in productive process, 生产过程中的, 247, 274,  
359, 392 ; wastefulness of, 所带来的浪费, 113, 173, 186, 231

Plato (Greek philosopher), 柏拉图 (古希腊哲学家), 2, 133—136

Platz, Alexander, 亚历山大广场, 428

Plotinus, 普罗提诺, 137—138

pluralism, 多元主义; conversation over, 对话, 416—422 ; democratic plu-  
ralism, 民主多元主义, 171—173 ; harmonious society without, 和谐社会不包括,  
261

political radicalism, 政治激进主义, 348, 378

Popular Front government, 人民战线政府, 306 页脚注

popular sovereignty, 人民主权, 292—293, 341

Portugal, 葡萄牙, 154, 424

poverty concerns, 贫穷问题, 43, 210, 251, 274

power of Negativity, 否定性的力量, 94—95, 97

“Preface” to Franz Neumann, *The Democratic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Marcuse 1957), 《弗兰茨·纽曼的〈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序言》(马尔库塞, 1957年), 41, 315—318

*The Principle of Hope* (Bloch 1986), 《希望的原理》(布洛赫, 1986年), 2, 42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 bourgeois society and, 资产阶级社会与, 62; class consciousness of, 的阶级意识, 84; concept of, 的概念, 61—63, 392—395; identity and universal interest, 无产阶级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同一性, 402; late capitalism and, 晚期资本主义与, 62; Marxian proletariat,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 84, 95, 115, 255; reification of, 的物化, 56—57, 392—395; 亦可参见 “The Reific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的物化”; working class, 工人阶级

proto-Nazi movement, 初期的纳粹运动, 382

proto-neoliberal movement, 初期的新自由主义运动, 55, 60

protosocialism, 初期社会主义, 7—8, 41, 395—396, 400—401

“Protosocialism and Late Capitalism: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Based on Bahro’s Analysis” (Marcuse 1979), 《初期社会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 基于巴罗分析之上的一种理论综合》(马尔库塞, 1979年);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rebellious subjectivity, 阶级意识和反叛的主体性, 408—409; domination, State, Antistate, 支配、国家和反国家, 400—402; economy of time, surplus consciousness, and intelligentsia, 时间经济、剩余意识和知识分子, 399—400; instinctual structure and revolution, 本能的结构与革命, 410—415; Marxist-Leninist model for revolution, 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模式, 406; significance in, 的意义, 395—406; the subject of the revolution, 革命主体, 402—406; summary, 结论, 415; toward new concept of revolution, 走向新的革命概念, 406—408; transformation of method, 方法转变, 396—398

“pure” violence, “纯粹的”暴力, 124

## R

racism, 种族主义; advocacy against, 反对, 219, 294, 391, 393; life-destroying power of, 摧残生命的权力, 67; opposition to, 反对, 212; patriarchy and, 父权制与, 11 页脚注; social movements against, 反抗种族主义的社会运动, 3, 59; spread of, 泛滥, 361

radicalism, 激进主义; intelligentsia and, 知识分子与, 194—195, 242; as opposition, 的反对力量, 215;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政治意识, 198; political radicalism, 政治激进主义, 348, 378; radical religion, 激进的宗教, 345; with student groups, 与学生团体, 50; working class and, 工人阶级与, 128

rational authority, 理性权威, 262

“Rat Marcuse” hate mail example, 恐吓信《鼠辈马尔库塞》, 207

Reagan, Ronald, 罗纳德·里根, 9, 41, 112, 208, 212

Reality and Idea, 现实与理念, 85, 134—135

Reason and Freedom, 理性与自由, 94—95, 98, 232

*Reason and Revolution* (Marcuse 1941), 《理性和革命》(马尔库塞, 1941年), 94—98, 180, 281, 305

Reason of domination, 统治者的理性, 122

rebellious subjectivity, 反叛的主体性, 408—409, 410

reductionistic materialism, 还原论的唯物主义, 21, 22 页脚注

“Re-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Revolution” (Marcuse 1969), 《对革命概念的再考察》(马尔库塞, 1969年); agents of change, 变革的推动者, 204—206; final stage of capitalism and, 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与, 199—200; global context, 全球化背景, 201—202; opposition in the metropolises, 宗主国内部的反抗, 202—203; working class and revolution, 工人阶级与革命, 203—204

reification, 物化; in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社会的, 33; music and, 音乐与, 348; of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的, 56—57, 392—395; with revolution, 与革命, 261; theory/concept of, 物化理论/概念, 16—17, 172, 336

“The Reific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Marcuse 1978), 《无产阶级的物化》(马尔库塞, 1978年), 392—395

Reitz, Charles, 查尔斯·赖茨, 55 页脚注, 215—217

Renaissance Humanism, 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 278

“Reply to Critics” (Marcuse 1968), 《对批评者的回应》(马尔库塞, 1968), 329—330

repression, 压抑, 109, 186, 360—361, 373

repressive tolerance, 压抑的宽容, 275, 369—370, 388, 418

“Repressive Tolerance” (Marcuse 1965), 《压抑的宽容》(马尔库塞, 1965年), 379—385

revolution, 革命; anthropological revolution, 人类学上的革命, 33; anti-western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反西方革命运动, 79; Austrian revolution, 奥地利革命, 426; Bolshevik Revolution, 布尔什维克革命, 84, 90, 97, 321; Central European revolutions, 中欧革命, 84, 97; Chinese Revolution, 中国革命, 258, 269; counterrevolution and, 反革命与, 217, 242; Cuban Revolution, 古巴革命, 258, 297; dialectical theory of revolution, 辩证的革命理论, 6—7; forces in oppression, 压抑的革命力量, 61—62, 66;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革命, 232, 268, 302, 426; German Revolution, 德国革命, 123, 428—429; Hungarian Revolution, 匈牙利革命, 159;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253, 260, 304, 320; instinctual structure and, 本能的结构与, 410—415;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内在矛盾, 206; Marxist-Leninist model for revolution, 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模式, 406; Marxist theory of revolution, 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5—6, 15页脚注; new concept of revolution, 新的革命概念, 406—408; privilege of, 的特权, 361; Russian Revolution, 俄国革命, 13, 67, 303—304, 307; stabilization vs., 稳定化与, 178—179; the subject of the revolution, 革命主体, 402—406; working class and, 工人阶级与, 203—204, 361; 亦可参见“Re-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Revolution”, 《对革命概念的再考察》; student revolution/movement, 学生革命/运动

“Revolution 1969: Discussion with Henrich von Nussbaum” (Marcuse 1969), 《1969年革命: 与亨里奇·努斯鲍姆的讨论》(马尔库塞, 1969年), 283—289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革命意识, 94—97, 102, 223

“Revolutionary Subject and Self-Governance” (Marcuse 1969), 《革命主体与自治》(马尔库塞, 1969), 196—199

revolutionary subjectivity, 革命主体, 5, 8, 12, 55—63, 66, 196

Ritter, Bill, 比尔·里特, 422—431

Rose, Nikolas, 尼古拉斯·罗斯, 6 页脚注

Rousset, David, 大卫·鲁塞特, 157,

Rühle, Otto, 奥托·鲁尔, 71

Russia, 俄罗斯、俄国; Five Year Plans of, 的五年计划, 304 ; government changes, 政权更迭, 266 ; influence by, 的影响, 14 ; producers and, 制造者与, 218 ; socialism in, 的社会主义, 75, 80

Russian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 36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俄罗斯研究中心, 36, 77, 80

Russian Research Institute, 俄罗斯研究所, 430

Russian Revolution, 俄国革命, 13, 67, 303—304, 307

Russian totalitarianism, 俄国极权主义, 305—306

## S

safe from crisis, 安度危机, 286

San Diego Commune, 圣迭戈公社, 351

Sartre, Jean-Paul, 让-保罗·萨特, 166, 279, 420, 421

saving of labor time, 节约劳动时间, 101—102

Schlesinger, Arthur, Jr., 小阿瑟·施莱辛格, 330

Schlesinger, Rudolf, 鲁道夫·施莱辛格, 80—81

Schwarz, Fred, 弗雷德·舒瓦茨, 218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7

scientific socialism, 科学社会主义, 15, 18, 24, 72, 253

Second International Marxism, 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 22, 304

self-liberation, 自我解放, 146

self-realization, 自我实现, 16, 184, 351, 405

Seton-Watson, Hugh, 休·希顿-沃森, 79

sexism (sexual oppression), 性别歧视 (性别压迫), 3, 57, 59, 61, 391, 393

sexual taboos, 性禁忌, 165, 374, 410

- Sherover, Erica, 艾丽卡·谢尔奥弗, 390, 390 页脚注
- Sinzheimer, Hugo, 胡戈·辛茨海默, 315
- slavery, 奴隶制, 46, 108, 121—122, 150, 310—311
-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7, 27
-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社会民主党, 13, 81, 177, 316—317
- socialism, 社会主义; abolition in, 在社会主义废除劳动, 101;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阶级意识与, 151; construction of, 建成, 92—93; continuity with capitalism, 与资本主义的连续性, 342—344; democracy as preparation for,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 102; development of, 的发展, 84; discussions about,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112—117; domination and control in, 社会主义中的支配与控制, 4; emancipatory socialism, 解放性的社会主义, 44—45, 48; idea of, 的观念, 244—247; identity of, 的同一性, 185;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国际社会主义, 169, 185; labor philosophy of, 的劳动哲学, 33; as leap into freedom, 就是跃入自由, 115; National Socialism, 民族社会主义, 81, 94, 315; objective identity of, 的客观同一性, 183; objective prerequisites for, 的客观先决条件, 193—194; “Obsolescence of Socialism”, 《社会主义过时了》, 235—248; protosocialism, 初期社会主义, 7—8, 41, 395—396, 400—401; redefinition of socialism, 重新定义社会主义, 200; in Russia, 俄国的, 75, 80; scientific socialism, 科学社会主义, 15, 18, 24, 72, 253; “Socialism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 169—180; transition to, 向社会主义过渡、过渡到社会主义, 96, 115, 190—191, 222; utopia, technology and, 乌托邦、技术与, 42—49; utopian conception of, 的乌托邦观念, 396
- “Socialism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Marcuse 1965), 《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马尔库塞, 1965年), 169—180
- socialist democracy, 社会主义民主, 102, 314
- “Socialist Humanism” (Marcuse 1965),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马尔库塞, 1965年), 180—188
- Socialist Man, 社会主义的人, 244, 246
- socialists, 社会主义者; freedom link, 与社会主义的自由的联系, 95; as inefficient, 效率低下的, 288—289; productivity within, 的生产力, 129; socialist humanism,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180; “Socialist Humanism”, 《社会主义的

人道主义》，180—188

socialist synagogue, 社会主义大教堂, 120

Socialist theory, 社会主义理论, 326

socialist violence, 社会主义的暴力, 181

Socrates (Greek philosopher), 苏格拉底 (古希腊哲学家), 133—134

South America, 南美, 328

*South of the Border* (Stone 2010), 《国境之南》(斯通, 2010年), 65

soviet communism, 苏联共产主义, 35—36, 35 页脚注

Soviet Marxism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参见 Marxian theory, 马克思理论;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Soviet Marxism (Marcuse 1958),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 1958年), 35—42, 180

“Soviet Theory and Practice” (Marcuse 1959), 《苏联的理论与实践》(马尔库塞, 1959年), 319—320

Soviet Union, 苏联, 35, 39, 155, 365—367, 425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PD), 德国社会民主党, 13—14 页脚注

Spain, 西班牙, 58, 123, 154, 306

Spirit, 精神, 94

Springer Press, 斯普林格出版社, 281

Stalin, Joseph, 约瑟夫·斯大林; communist control by, 对共产党的控制, 320; death of, 死后, 304; doctrine of nonantagonistic contradictions, 非对抗性的矛盾学说, 83; law of the negation of the negation, 否定之否定规律, 90, 120—130

Stalinism, 斯大林主义; communism vs., 共产主义与, 76, 79;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建成社会主义, 92—93; critique of, 批判, 37, 82; end of, 的终结, 38; interplay between theory and reality, 理论和现实之间的相互影响, 102; Leninism and, 列宁主义与, 84, 102—103

Stalinize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omintern), 斯大林主义化的共产国际 (第三国际), 306 页脚注

Stoic Schools, 斯多葛学派, 136—138



Stone, Oliver, 奥利弗·斯通, 65

*Street Journal & San Diego Free Press*, 《街报》和圣迭戈自由出版社, 346—354

student revolution/movement, 学生革命/运动; ghetto movement and, 贫民区运动与, 272; impact of, 的影响, 288, 353, 385; importance of, 的重要性, 284—285; objectives, 目标, 215, 271, 276—277, 330, 337; opposition to, 反对, 399; political emancipation, 政治解放, 417; questions about, 与学生运动有关的问题, 334, 385—387; regression in, 的倒退, 336, 427; role of, 作用, 340, 387, 417, 428; support of, 支持, 423

subaltern consciousness, 底层意识, 401, 413

the subject of the revolution, 革命主体, 402—406

“Supplementary Epilogue Written in 1954” (Marcuse 1954), 《1954年版〈理性和革命〉的增补后记》(马尔库塞, 1954年), 94—98

surplus consciousness, 剩余意识, 7—9, 57, 116, 393, 398—400

Sweezy, Paul, 保罗·斯威齐, 323页脚注, 329, 331, 358页脚注

Syria, 叙利亚, 66

## T

taboos, 禁忌; conflict and, 冲突与, 168; Marxian taboos, 马克思的禁忌, 42, 44; sexual taboos, 性禁忌, 165, 374, 410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技术的发展, 129, 194, 241, 375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技术理性, 17, 52, 76, 183, 186—187, 245

Teilhard de Chardin, 德日进, 282

Telos, 目的, 定义来自 85

*Terror and Progress—USSR* (Moore 1954), 《恐怖与进步——苏联》(摩尔, 1954年), 77

terrorism, 恐怖主义; in anarchy, 处于无政府状态, 387—389;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 216; support from, 获得支持, 364—365

terroristic industrialization, 恐怖的工业化, 320

Thier, Erich, 埃里希·蒂尔, 26页脚注

Third International Marxism, 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 22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113, 114, 201—202, 288

tolerance, 宽容; harmonious society without, 和谐社会不包括, 261; indiscriminate tolerance, 绝对的宽容, 380, 383, 384; limits of, 的极限, 113; repressive tolerance, 压抑的宽容, 275, 369—370, 379—85, 388, 418; true nature of, 的真实本性, 218—221

“total experience” phrase, “最高的体验”这个词, 349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 communist type, 共产主义式的, 266; domination and control in, 极权主义社会的支配(统治)与控制, 4, 183, 305; freedom in, 极权主义社会的自由, 46, 94; as many formed, 很多极权主义形式, 377; realm of freedom in, 极权主义管理下的自由王国, 46; Russian totalitarianism, 俄国极权主义, 305—306; “total experience” phrase, “最高的体验”这个词, 349; trend towards, 的趋势, 171, 317

total transvaluation of values, 彻底重估价值, 205

trade unions, 工会; bureaucracy of, 的官僚机构, 190, 203; co-operation among, 之间存在着合作, 175—177, 204; dissolution of, 的瓦解, 317; growth of, 的成长, 84; process of production and, 生产过程与, 62; sectional organizations, 某群体的组织, 81

Transcendental Analytic, 先验分析论, 140—141

Transcendental Dialectic, 先验辩证论, 139—140

Transcendental Logic, 先验逻辑, 140

The Transition Theory, 过渡理论, 241—243

“The True Nature of Tolerance” (Marcuse 1970), 《宽容的真实本性》(马尔库塞, 1970年), 218—21, 379—85

Tunisia, 突尼斯, 64—66

Tunney, John, 约翰·塔尼, 426

Turkey, 土耳其, 58

Twentie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苏共二十大, 38

## U

unfreedom, 不自由, 45, 97, 107, 125, 264, 398

universal suffrage, 普选权, 119—12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大学, 112, 155—156, 265

utopia, 乌托邦; conception of, in socialism, 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观念, 396 ; concrete utopia, 具体的乌托邦, 44, 396, 408 ; democracy of, 的民主, 358 ; “The End of Utopia”, 《乌托邦的终结》, 249—263 ; false vs. genuine, 虚假的和真正的, 262 ; full democracy of, 的充分民主, 358 ; possibility of, 的可能, 372 ; technology and socialism, 技术与社会主义, 42—49

## V

values, 价值; with alienated labor, 与异化劳动, 247, 251 ; exchange value, 交换价值, 5, 67, 72—73, 189, 192, 235 ; total transvaluation of values, 彻底重估价值, 205

Vanguard Theory, 先锋理论, 304

“Varieties of Humanism” (Marcuse 1968), 《人道主义诸变体》(马尔库塞, 1956年), 277—283

Vietnam, 越南, 260, 295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112, 195, 216, 263—264, 333

violence, 暴力; ambivalence over, 对使用暴力的态度有些自相矛盾, 275 ; counter violence, 以暴制暴, 270, 272, 275, 289, 295, 299 ; ghetto violence, 贫民区暴力, 298 ; in history, 历史上的, 124—125 ; institutionalized violence, 体制性暴力, 295, “pure” violence, “纯粹的”暴力, 124 ; socialist violence, 社会主义的暴力, 181

Vorländer, Karl, 卡尔·福尔伦德, 69—72

## W

wage labor, 雇佣劳动, 61—62, 125, 309

Watergate scandal, 水门事件, 112

Weimar Republic, 魏玛共和国, 80—81, 265, 315, 382

Welfare/Warfare state, 福利—战争国家, 3

Western, Cal, 加利福尼亚西部法学院, 217

Western communism, 西方共产主义, 77

Western Marxism, 西方马克思主义, 35, 55

Wheeler, Harvey, 哈维·惠勒, 277, 283

Wittfogel, Karl, 卡尔·魏特夫, 35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妇女解放运动, 163, 378, 417

Worker Councils movement, 工人委员会革命, 13

working class, 工人阶级; anti-capitalist potential of, 的反资本主义的潜在力量, 367; concept of, 的概念, 352—353; European understanding of, 欧洲人对工人阶级的理解, 312; expansion of, 扩大了, 56—57; as labour aristocracy, 工人贵族, 174—175; late capitalism and, 晚期资本主义与, 392, 406—408; new perceptions of, 新的理解, 63—64; privilege of revolution, 革命特权, 361; radicalism and, 激进主义与, 128; redistribution of wealth, 财富再分配, 3; revolution and, 革命与, 203—204; 亦可参见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

## Y

Yemen, 也门, 66, 354

York, Herbert, 赫伯特·约克, 370

## Z

Zeno of Elea, 埃利亚的芝诺, 132

Zizek, Slavoj, 斯拉沃热·齐泽克, 64, 65, 65 页脚注, 66

责任编辑：曹 春 钟金铃  
封面设计：木 辛 汪 莹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尔库塞文集·第六卷，马克思主义、革命与乌托邦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高海青，连杰，陶锋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  
书名原文：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UME SIX  
MARXISM, REVOLUTION AND UTOPIA  
ISBN 978-7-01-018873-7

I. ①马… II. ①赫…②高…③连…④陶… III. ①马尔库塞（Marcuse, Herbert 1898-1979）-哲学思想-文集 IV. ①B712.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9865 号

## 马尔库塞文集 第六卷 马克思主义、革命与乌托邦

MA'ERKUSAI WENJI DILIUJUAN  
MAKESI ZHUYI GEMING YU WUTUOBANG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高海青 连杰 陶锋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37.5

字数：555 千字

ISBN 978-7-01-018873-7 定价：19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MARXISM, REVOLUTION AND UTOPIA: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by Herbert Marcuse ,Douglas Kellner and Clayton Pier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9 b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s through Sandra Dijkstra Literary Agency, Inc.

in association wit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5-4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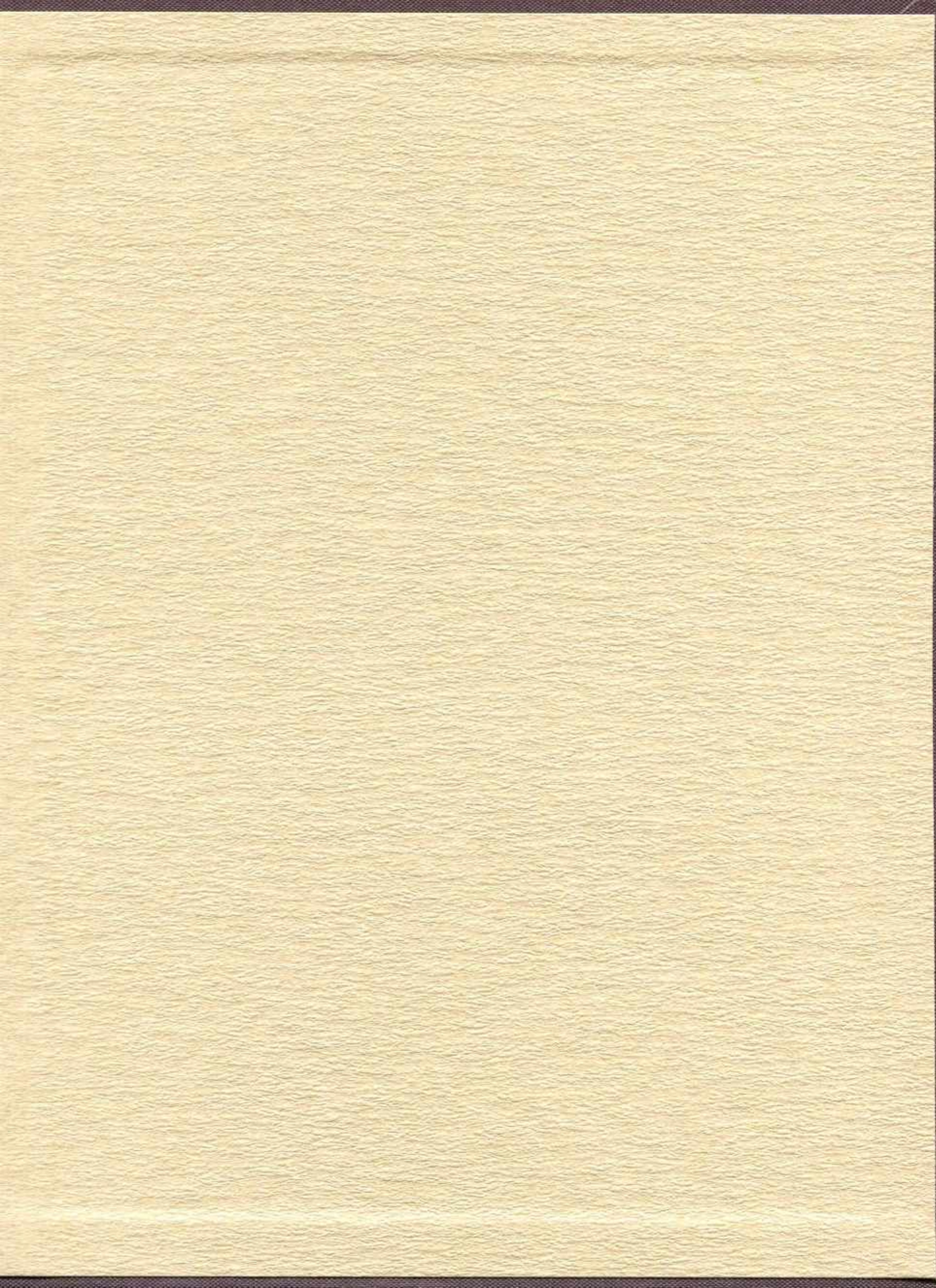












马尔库塞文集

第六卷

马克思主义、  
革命与乌托邦